李济文集

卷五

主　　编　张岂之

执行副主编　李光谟

封面、扉页题字　王元化



1928年第二次赴美国回国所摄

1920年4月，李济所写《仁友会史略》一文原稿手迹一页



1928年初，李济托胡适转交梁思永一信的信封影印件



1924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李济

1937年12月摄于桂林的全家照（为办理经安南转昆明的护照用）



1934年4月，李济致丁文江信的原稿第一页



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前后）在昆明郊外合影的四位大学者。左起：傅斯年（史学家）、梁思成（建筑史家）、李济（考古学家）、李方桂（语言学家）



1941年，李济负责组织的四川彭山发掘工作团的主要参加者。**中博**：吴金鼎（左一）、王介忱（左二）、夏鼐（前右一）、曾昭燏（前右二）；**川博**：冯汉骥（前中）；**中研院史语所**：高去寻（后左一）、李济（后左二）；**中国营造学社**：陈明达（后右一）



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的合影

1955年3月19日，由胡适、李济、赵元任主持的中研院在北美院士谈话会的留影（在纽约）



1956年李济代表学术界友人向六十五岁的胡适献上一本论文集作为生日礼物



1957年，第二次院士会期间，李济（左）与李方桂（中）、董作宾（右）二院士在台北合影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向胡适移交院务时的合影



1968年10月,史语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期间,李济夫妇和从美国远道而来的老友赵元任夫妇在台北史语所门前的合影



20世纪60年代摄于史语所办公室



李济之子李光谟在位于台湾北海福田的李济墓地（摄于1995年9月）

目　次

学 术 论 谈

序跋致辞

学事忆旧

书文评介

未 译 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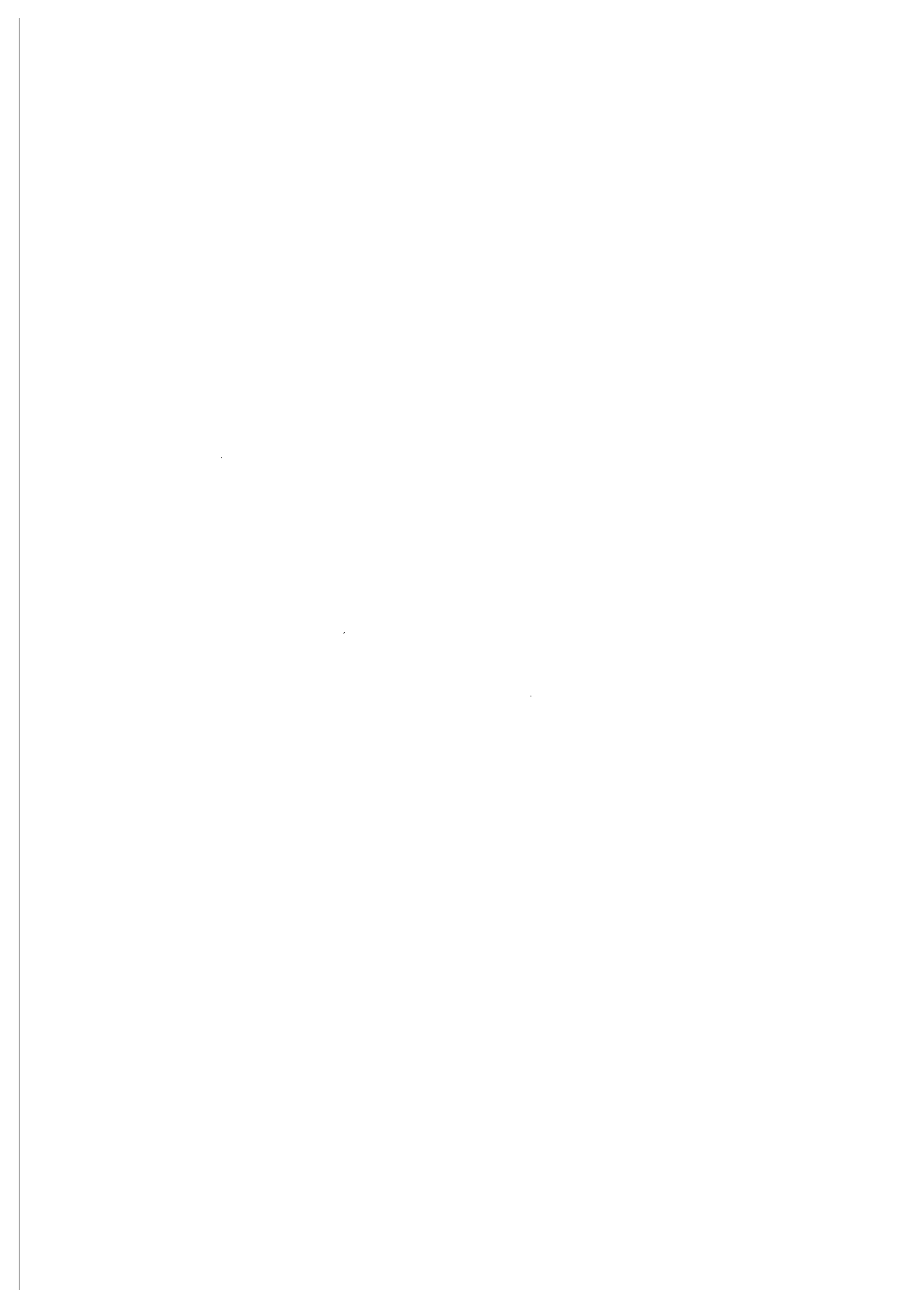
* 著者在 1923 年另发表了一篇同名但内容不尽相同的论文,其译文已收入文集卷一。

早年文录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



学术论谈



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

在现在的中国，要是派一个没学地质的人去采矿，人们总以为是一个笑话；但是"考古"呢，普通人总觉得是谁都可以办得到的。一年半前，中央研究院约董作宾先生去试掘殷墟的时候，就有好些朋友笑他太不惮烦了；他们说："你何不叫人掘出来，去收买；又省钱，又省事，何必自己找麻烦呢？"这种很富于常识的忠告，自然可以代表一般人对于考古学的态度。就是四十年前的欧洲学者，对于这种见解，也可表相当的同情。许礼曼掘荷马故址的唯一的资格，是因为他有钱。那时的希腊学者多当作笑谈。但是许礼曼确是一个欧洲考古学的先驱；近四十年西方科学的挖掘一天精密一天，多半是他创造出来的局面。到了现在，古物挖掘差不多同采矿一样的专门。就技术方面说，掘古物较采矿尚复杂得多；非有若干年的预备绝不敢轻于一试。现在的中国学者，有好些对于考古学尚有一种很普遍的误会。他们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这种误会，可以说有两个来源：(1) 因为缺少自然科学的观念，(2) 以为古物本身自有不变的历史价值。由第一种误会就发生一种人人都可考古的观念；由第二种误会就发生了那"唯有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那种偏见。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像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学。

现代考古学的工作，大致可分两大段：挖掘与考证，两者都分不开的。挖掘不考证，出来的古物就无价值可言。考证的依据，大部都靠着挖掘的记载。记载就是出土物件的灵魂。没有出土的记载，考证的结果，决没有头等的科学价值。这是金石学与考古学很重要的分别。什么是挖掘的记载？我们可以分两段来讨论：(1) 记载什么？(2) 如何记载？

谈到"记载什么"，必须聊谈到挖掘者的资格。一个专以挖宝贝为目的的人，自然谈不到这件事。就是叫他记载，他也不知道记载什么。现代考古家，对于一切挖掘，都是求一个全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要作到这件事，他至少要相信"知识"

---

* 本文原载《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29年)。

是他最后的目的。但是这种态度,是慢慢训练出来的,养成的;不是要"有"就可"有"的;或者可以"封"到别人身上的。这种训练包括着:(1) 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2) 人类史的大节目;(3) 一地方或一时期历史的专门研究。头二种为一切考古家的普通训练;第三种定本人工作的范围。就现在的趋势看,这些资格也许不必全具于一人;却在一个团体内,总要全代表出来。有了这种训练,考古的人就可自己知道他所求的是什么。他就有了问题,他就可以设计来解决这问题,他就可以应用一切方法使这计划实现了。有了问题,设了计划,定了方法,自然知道记载什么了;那记载的内容也自然丰富了。但是只知道记载什么,不知道如何记载,不特劳而无功,终算不了科学的考古。这种"如何"的解决,也是一种特别的训练;一位不能定高下,不能辨东西南北的人,就是有一大堆极好的问题在心中,他的记载终归失败。一个照相,往往胜于一万个字的叙述。但是照什么东西?用什么镜头?用什么版片?亦不是没有预备而能做得到的。最要紧的还是文字的记载,这种记载不但指那出土物件的位置而言,要包括它的所有的环境;换句话:这种记载的目的要能使挖出来的物件仍旧可以归到原来的环境。以上是就普通挖掘说。实际上,各遗址有它的特别情形;处理的方法,也有小异。挖一个城与挖一个墓不一样。掘一个大墓又与挖一个小墓不一样。

殷墟的挖掘,本是很难的一个题目。考古组同人谁也不敢说全具现代考古家的一切资格。但是各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都有若干年的预备,并有相当的经验;所以小心翼翼的合作起来,对于现代考古研究所需的知识,尚称齐备。因为这是一件国家的事业,所以我们预备了极长久的计划。我们并没有期望得许多甲骨文字。在我们认定题目范围之内,除甲骨文字,可作的工作甚多。自然,这遗址的重要全是因为有文字存在,时代上没有许多疑问。所以一切无文字而可断定与甲骨文同时之实物均有特别研究的价值。就殷商文化全体说,有好些问题都是文字中所不能解决而就土中情形可以察得出的。这里面显而易见的几个问题,如:这个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忽然埋藏着这些带文字的甲骨?又何为而被废弃?关于这类问题,就是只有甲骨文字兴趣的人,也有时不免要问问。但是要实际解决它们,却很费一番手续。这种题目虽说可以提开问,却并不能提开解决;只有整个的问题解决后,这两个问题也随着解决了。

"整个"这观念,本来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我们在这地方就是说要把小屯村地面下一切物件先作一个类族辨物的工夫,看它们空间性是否混乱,时间性是否复杂。做这件事,我们先要解决所谓地层问题;我们的理论上的出发点是假定着:要是地层没翻动过的话,我们可以认定凡与甲骨文同层出土的物件,都可定为与之同时。要是地层经过翻动,我们应该区别那种物件是原在的,那种是后加的。所以我们拟定的工作秩序,有下列的重要题目:

(1) 殷商以来小屯村附近地形之变迁及其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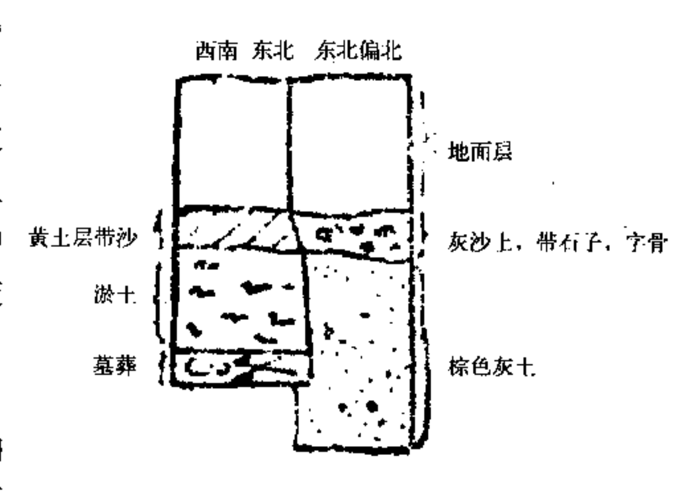
(2) 小屯村地面下文化层堆积状况;

(3) 殷墟范围;

(4) 殷商遗物。

这四项题目内,甲骨文字可以说只居第四类之一部,而第三题与第四题又完全看第一题与第二题能否满意的解决。要解决第一题与第二题又非有专门的训练不为功。第一题不但为一地质专题,兼涉及历史地理。我们解决的方法是(1)先从测一地形图入手,当时担任此事者为地质调查所所员裴君文中(注:即最近发现周口店北京人者)与北大地质系毕业生王君庆昌,然后,(2) 再西入太行勘察洹河沿岸地质,(3) 东测黄河故道找它与洹河的关系。我们深信要解决殷墟的兴废及废后的变迁,必须先要有这一部地质上的基本知识。殷墟地层之构成与附近河流的变迁,息息相关;地形地质的问题不解决,地层的问题也不能全解释。在我们对于第一类题目春季只作了一部,绘了一幅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秋季本拟继续作第二与第三分题,因为发生纠葛,遂尔中止。同时我们对于地质以外的地层问题,却大部分解决了。解决这类问题所用的方法,也可略加说明。一个最大的关键在掘墓时的观察。小屯自从殷商废弃后,历代多作葬人之用。每经一次墓葬,地下即翻动一次。然历代习俗不同,有掘及黄土方葬者,有未及黄土即葬者。由这些不同的习惯,我们就得了研究地层很好的几个标准。由这种观察所得的结果,我已经作了一篇论文,在安阳报告第一期发表。此处我只举一个例说明这方法的应用。

右图是十八年春季在村中发掘的一个墓葬,上边的纵剖面东北,陪着一段极清楚而没翻动的地层。我们就这个接触可以显然的看出,当这墓破土时,那旁边地面层下灰沙土,带石子的字骨层已经成立。我们又用连锁法定这墓为隋唐时(参看原文)的一所墓葬,所以我们因此得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这含沙的字骨层在隋以前已经构成,并且可以推定隋唐以后小屯村至少又经过一次大水。



西斜南东支与小连沟纵剖面的接触

此种类似的证据很多。我们把各时代这种层次看清楚了,积起来,我们把小屯地面下堆积的历史就可弄得清楚。堆积的层序研究清楚了,我们才能断定孰为殷商,孰不是殷商。若就位置深浅论,是殷商的不必全在深处,有时竟在浅处。这种现象有时可以给我们研究地层的反证。我们对于各种出土物品的位置都用三点记载法或层叠

法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的地方很多。一方因地层而定殷商遗存的性质,一方又假殷商的物品考较地层的变化;两者相互为证,现在我们对于小屯的一部分地层已经近于完全解决了。从此再进而研究第三类与第四类,就可迎刃而解。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对于殷墟发掘应用的方法之一部,并不是说凡是挖掘都可应用此种方法。凡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都知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题目才有问题,有问题才选择方法,由方法应用可再得新问题,周而复始,若环无端,以至全体问题解决为止。我们要知道时时刻刻我们可以有意料以外的发现,所以时时刻刻要预备着新的应付。譬如说在这次的挖掘,我们因方法的应用,无意之中,发现了铜器时代有俯身葬的习惯。由此而发现小屯铜器时代俯身葬与甘肃俯身葬的关系问题;又无意之中发现了隋唐时已有了束足的习惯,替中国风俗史加了些新的证据。而此种观察,固非有心人不能得之,若一经毁弃,即永绝人世。所以现代的考古家经过十数年的严格训练,方能荷锄持铲,去田野工作。自出问题,自解决之。若号称专家者,运筹于千里之外,而听雇员指挥工人在田野为之,终不能成事。这是我们所不取的。

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

这几年来，我们在做考古的工作；今天和关心我们工作的朋友们谈谈我们的经过，以及我个人的感想。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开始这个工作，地点在河南安阳。安阳旧属彰德府，清末袁世凯韬居于此。我们到安阳时，他的遗产已经充公，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

我们开始工作，所以选择安阳的理由很多。安阳旧殷墟（以下称殷墟），自从甲骨发见以后，研究上古文化引起深浓的研究趣味。近十年来，史学上的讨论非常热烈，顾颉刚先生提出上古史上许多问题，尧舜禹是"人"或"物"的辩论，就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但是辩来辩去，只根据那残缺的文字记载，难得可依信的结论。因此，我们觉得非从地下去找新的史料不可。

殷墟所出的甲骨文，大部分是殷晚期的史料。但那次甲骨的发见，极少合乎现代考古的方法；文字以外，几乎全无可考见。殷墟的古物，这几十年毁坏得太厉害了。我们到那边开始工作，许多人以为甲骨早已挖完，这种工作是徒劳的。直到我们做了以后，结果很好，他们才相信这是值得做的。从十七年始，先后发掘了七次，前三次发掘的经过，详见《安阳发掘报告》一、二、三期。十九年，因为战祸，不曾发掘。最近这四次，始于二十年春天，直到今年秋天。在安阳所得甲骨很多，经过详细研究，研究的结果，有的已在那报告上刊布出来。不过我们并非只研究甲骨，那边所发见的铜器、陶器及其他什物很多，也正在研究。

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就全世界文化来看，这是极可注意的事。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我们新近讨论殷末铜器和西方的关系，就形式上看，和青铜期第四纪的器物极相近似。例如矛的体制和英国的古矛相近，还

---

*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研究院（上海）的讲演。笔记稿由曹聚仁记录，经作者校定。原载上海《国闻周报》第11卷第24期（1934年）。

有一种空头锛,和欧洲第四纪的铜器相似,和西伯利亚出土的也相形似。英人类学家塞里格曼(Seligmann)曾说:"这种器具是埃及、小亚细亚、伊兰与印度所没有的;却见于欧洲、南俄、乌克兰、西伯利亚之叶利塞河流域,及暹罗北部、缅甸、坎波的亚与中国之云南及山东。"在结论中他说:"这种器具由欧洲到中国走的是西伯利亚大道,不是希玛剌亚山南的或海上的一道。"欧洲铜器第四纪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与小屯之殷墟前后同时;要是塞里格曼教授所说属实,那铜器时代西欧与东亚的交通可谓敏速之至。——东方和西方,在最古已经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无疑的了。

在那边,陶器也发见了许多种,白色陶片、黑色陶片还有一块仰韶式带彩的陶片。关于古陶器,以前已有人研究。我们发见了带釉陶器,曾送到伦敦去研究,他们都说是釉的初步(好些块的釉已渐剥落,足证那时敷釉的艺术尚极粗浅,仍在初级试验中)。

就各种发见的古器物看来,安阳一带实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中心点。各种样式的骨极多,鲸鱼的大肋骨、脊椎骨,大如风扇的肩胛骨,象牙,粗如圆柱的象腿骨,象下巴骨;还有男女所用的骨器,饮食用的叉匕。有人以为这些动物都是外来的;但"卜辞"中有"王出猎获象"字样,出猎不会猎得很远,可以断定这种动物决非来自印度安南一带,想必黄河流域本地就有这种动物。其他又有虎骨、牛羊骨。各种动物,在这一区域当时非常繁多,苟非文化中心,决不会这样聚集起来的。

前三次发掘,对于什物的配置,研究得颇有把握。别人也以为我们有了成绩,可以满意。但我们自己觉得和初愿相差太远了,所希望对于殷代宫室、明堂的建筑的探求,如《史记》所载纣王的瑶台,在什物挖完以后,竟不曾得丝毫的证明。我们曾推想:那时代还不曾有瓦,又不曾有砖,以往的建筑,经过大水冲洗,便没有什么遗迹了。我们的考古工作,困于经济,不能如发掘巴比伦那样大规模的进行;而小规模的挖沟办法,又只能做部分的工作,对于大问题很少帮助。不料在失望时期中,忽然开朗出一个新局面来,最近四次发掘,完全改变了方向。我们在山东历城发掘的时候,发见了一处石器时代的城垣,那城垣既非用砖,亦非用石,乃系用泥土筑成——所谓版筑。今代乡僻的筑泥墙,还用这个办法。在城垣旁边,有当时挖土的遗迹,每个凹下处,形式如砚台的蓄水池一样。那时我们这些工作的人,都在那边,大家都记起殷墟那边也有这种遗迹,而且很多。形势一开朗,我们乃觉得别有可研究的资料了。这种地方显出比较法的用处。二十年春天,我们再到殷墟去工作,几乎随地都有这种遗迹,只是面积太大,经费太少,这种刮地皮的工作,不能一气呵成。我们划分全区为好些小区,彼此分别去工作。

在殷墟第四、五、六三次的发掘,所发见版筑的遗迹,和山东历城的遗迹完全相同;可是殷墟的版筑,非用以造城,用以造房屋的基土为多。孟子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甲骨文数见爹父之名,丁山先生说就是傅说),在这里得了事实的证明。那时工人可以

做官,可见殷代社会还不曾有阶级观念的。

对于殷代宗庙明堂宫室的建筑方式,我们稍稍可以想象成型。可惜有许多版筑,经过随唐以后的破坏,已经失了原型。有一回,一位同事,发见了有花纹的版筑,他以为发见了雕墙,大家都兴高采烈去研究。一经考察,那些花纹,乃是隋唐的雕刻,就原墙上动刀的。所以分别何者为原型,何者为后人破坏后的新型,极为困难。后来,经过几度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渐渐有了把握。版筑的土基,大都作长方形,四围多有大石卵,石卵与石卵之间,虽不十分正确相对,总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可以想像石卵是柱礎,上面安柱;由此可以想象门在何处、内室在何处了。再进一步,想像彼时的上面建筑,既无砖又无瓦,想必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概是近于真实的。或者有人要怀疑,上面既说过殷民族的物质文明已经程度很高,何以建筑还这样简陋。其实茅茨建筑,不一定是简陋的,南洋群岛即有茅草造成的大建筑。

又有一次,我们发见一处纯黄土,绝对不参杂他种泥土的大台基。台基方向正南,和指南针所指的方向绝无差别。台基前十数公尺也有大石卵。排列成弓背形。这种相距十数米突的石卵,使我们想象到那时庭柱的严整排列,和我们所见于颐和园、明故宫的差相仿佛。黄土台的四周围,又发见了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黄土台和当时的祭祀必有连带关系。先前祭天时用黄土铺地,也许是沿袭这种黄土台而来! 由此,我们对于殷代宫殿有相当的印象了。

我们又于坑土之下层,发见了长方坎,有十公尺大小,有阶级可上下;其间发见了破陶器、牛骨、狗骨之类;足证在版筑以前,还有穴居的遗迹。究竟那是殷代的遗迹,还是殷代以前的遗迹,现在还无法证明。这种坎穴,面积很大,和上海里巷厢房相上下;坎的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的坚固。也有几个套成的坎穴,一个套一个。甲骨文中的"宫"字,作右式:



这样的宫室,固然简陋,但古人并无宫室怎样宏大之说。地下挖了一个洞,地边一堵墙,上加遮盖以蔽风雨,人居其中,冬温夏凉。这并非凭臆悬想的,《诗》说"陶复陶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渐进,宫室明堂宗庙的制度,我们会有解决的希望了。不过做考古的工作的,丝毫不可有一点含糊之处;必须有相当的忍耐性,方可免去许多错误。社会对于这种工作,也得包容一点,使从事工作的人鼓得起勇气来。社会上以为我们前三次所得甚多,这三次并无所得。实际上说,我们的多量成就却在后三次。此后进行这个工作,对于解决古代文化的问题,大家都相信有办法;不过无钱不行,要完成这个工作,尚非百万元不行。当此全国经济破产之际,我们也只能做一步是一步,不敢存什么奢望的。这几年的研究结果,甲骨文部分已整理就绪,不久可以出版。陶器、铜器部分也已整理完毕,二三年内可以出版。

关于殷墟部分的工作,可说的还很多,我今天不说下去。以下再报告浚县方面的工作。

在河南南部,离彰德七十里许,有一浚县,京汉铁路经其地有一小站。站西约五里为辛村,是我们发掘的地方,属浚县。其地临淇水边上,古卫国之地,风景很好;淇水中产鲫鱼,名淇鲫,又肥又嫩。辛村这个地方,北西南三面皆山,淇水蜿蜒而来,山水回绕,若依堪舆家的眼光,真是风水最好的去处,可以大旺大发的。

前年,我们得报告,说辛村那方面,流水沟中,土人时常挖出铜器;得器易货,土人也颇以为幸事。后来,那方面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考古工作的大敌,就是一班专靠古董吃饭的古董商。他们规模很大,有数千万资本,在法国巴黎设了总机关;中国北方各省,每处有他们的分机关。他们专门勾结流氓土匪及绅士做盗坟的勾当;任何坚固宏大的坟墓,包你三天可以盗得干干净净。河南北部一带,有名的盗墓流氓,叫做郭小六;他和住浚县的军官勾结起来,开始到辛村去盗古墓。据村人说,郭小六所盗得的有数尺高的大鼎,有粗大的象牙雕刻,还有无数的宝物,先后售得数万元的重价。那些宝物始终秘而未见。他们挖坟的技术很高明,地面上只有数米突方的孔,直下二三丈,挖入坟中,整日整夜在里面工作。辛村的民团保安队,本来也很顽强;只因郭小六勾结了军队,又穿了军衣,悬了手枪,不敢阻止。郭小六且威迫土人作工,不给工资,大家更是不平。乃由民团长往见驻军的长官,探知并无正式命令;土人乃连结起来,将郭小六等一群盗坟的赶逐出去,自己来动手挖掘。以前郭小六挖了一个多月,土人们自己又挖了好几个月。土人之间,忽因分配不均打起官司来,县政府的师爷们见此中大有油水,又和土人们上下其手,得了一些宝物。还亏教育局长稍明大义,把这件事呈报了省政府;中央研究院也知道了消息,派人特去调查。乃与省政府商定合作办法,向那边发掘去。

我这样详细报告以上的故事,无非想请大家注意这一类的事。在中国考古,实在困难万分;古董商们勾结土匪专做毁坏的事,而民众又限于知识不能十分谅解。我们到辛村以后,几乎要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应付土人,只有百分之五的力量来做工作,进行自不能不十分纡缓了。

浚县辛村的墓葬,经过上述两次大破坏以后,我们只想看看他们所破坏的成绩,替他们清理未了的事宜。不料清理的结果,成绩之佳,出乎意外。首先便惊异那些墓葬的闳大,宽约二丈,长约三丈,离地面约二三丈深,这样闳大的墓葬,决非常人所能经营。去年春天所清理那个墓葬墙壁,有嵌入的车轮,轮轴有玉器、铜器之类。清理一个墓葬,要一个半月,自去春至今秋,清理了七个墓葬。墓葬的外周,并有马坑,最多的埋有六十九副马骨,杂有八副狗骨。墓葬中有车上的装饰,车轮、马勒、马鞍;以马殉葬的史迹,这是第一次发见。古代匈奴酋长,生前骑用的马匹,死后即以殉葬,叶尼塞河流

域也有这样的发现。这种以马殉葬的制度,并非偶然的事,彼此之间,必有连带的关系。

有了这次墓葬中古物的发见,我们对于古车的制度,已有相当的明了,车轮的配置,车辕的架成,马勒的形制,都有些了解了。所未解决的,只有车厢一部分的问题,古人谓"和鸾锵锵","锵锵"即是"铛铛"。我们且听这个马铃声(手中所执者便是),即可证明"锵锵"之形容得当。不过这次墓葬中所见的古车,乃是战车,并非平常乘坐的车子,因为各部分都非常阔大,并且所配置的都是战场用的武器。

墓葬中也发见一些戈矛戟等武器,有一对戟矛上有二字,一系戟字,另一字还没人认识。这种戟,大概不是实用的戟,做得艺术化一点,专用以殉葬的。又有盔甲残片、束腰的链子,这都是武人的用器。使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墓主生前的事业。

关于那时的棺椁制度,我们也得了些材料。大概上古人未必都用棺,穷的人连席子也未必用,挖一洞埋了便算了。这些阔大的墓葬,棺椁都是很完备的。墓葬大多有墓道,有的南北两墓道,有的南首一墓道,最长的可至十余丈。墓底平地有一条长方坑,那是放置棺材的地方,殉葬的东西放在坑的四周围,棺的上面加了一层席,上面也是殉葬的东西,再加上一重土,上面又是殉葬的东西。有一墓葬中,发见了一副人骨,不知是不是殉葬的人。

这八九处墓葬,大体相同,亦有小小的差异。有的没有墓道,有的墙壁直矗,有的墙壁斜落,上大下小,墙壁的筑法亦与殷墟相同。其中有一女人的墓葬,所殉葬的有玛瑙,有象牙雕刻,有一对雕刻极精致的象牙鸳鸯。还有一具四方小铜盒,许是调脂粉用的盒子。

这些墓葬,时代必有先后,村西也许还有未经挖掘的墓葬。墓主生前尚武,殉葬了一些武器;若是墓主生前尚文,必以生平所读的书殉葬。若我们能发掘得一所像汲冢似的以书籍殉葬的墓葬,那中国古史的面目,将如埃及古史的大改变了。这都是可能的事。

以往发掘所得的古物,大部分在开封,一部分在北平,将来交通便利,大家可以往那边去看看。

我们也曾对于这些墓葬的时代加以推测。依一部分的传说,此地正是古代殷陵,若是盘庚辈古帝王所葬的地方,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照事实看来,也颇有些相合;这样大规模的墓葬,若非王室也难得筑成的。但亦有可疑处:古器阶级有一定的嬗变过程,这些墓葬中的器物,显系晚出,与殷墟所见颇有不同。这种饕餮(有实物),殷墟所无;这种锛,殷墟所有;这种贝,殷墟所有;这种戈矛的花纹,殷墟所无(均有实物)。有人以为这是卫国的古地,也说得过去。至迟不会是战国以后的墓葬(其中没有铜币,也无铁器,玉器亦显然是早期的形式),殷陵的流风余韵,多少总保存着一些。

说得很多了,且结束我今天的报告。我们极希望有力量的帮助,如果能够得到煤油大王之流的帮助,三五年里面即能把这种工作完成。否则尽我们的能力,在最少的经济限度中做去,我们这些同事,很多是愿意全部精力奉献给这种工作的。

博物馆与科学教育*

二十世纪是个科学的世界，这句话没有人能否认的。现代的教育以科学为中心，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但是科学教育是如何进行的呢？把"科学教育"四个字口念千万声，笔写千万遍就算了吗？决不是。科学教育不过是个名词，要把这个名词变成事实，是必须要旁的东西来辅导进行的。辅导的东西是什么？具体的来说，第一当然是图书。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了。所以小学、中学、大学一种最重要的工作，是叫人念书；所以有图书馆来保存书籍，有专门的人才来做编目与分类的工作，让人家好利用。可是进一步说，图书虽然可以增进人的知识，而对于科学，不一定每一种都能给人以亲切的感觉；要人对于科学有亲切的认识，还得靠实物。实物和图书性质稍有不同。图书是经过人手写一遍而后出版的（也有不出版的），数目无论如何的大，但是有限。实物是随地皆有的，是无限的，所以更需要专门人才来做选择、收集、保存、分类、编目、陈列的工作，而实物保存和陈列的地方，就是博物馆。换句话说，博物馆就是实施实物教育的所在。

博物馆学本来是一种新兴的学问。在二十年前，在欧美的大国家中，一般人的观念，还以为博物馆不过是一个古董的收容所，让人在闲暇的时候消磨时光的。可是这个观念，在近二十年来就渐渐消除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博物馆是教育中心和研究学术的场所，与学校图书馆以及研究机关同等重要，所以他们国家对于博物馆事业是尽力的提倡，社会人士是尽力的赞助。在这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前，国际联盟已设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而美国和德国的博物馆，各到二千五百所以上，大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里面，就有一个博物馆，这样速度像赛跑似的发达，真够惊人的了。

可惜得很，这种新的认识，还没有深入到我们国民心中来。试问现在一般人，听到"博物馆"三个字，是个什么感觉？恐怕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观念吧！前面已经说过，"博

---

* 本文原为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作者在重庆电台作的讲演词，后载索予明著《故宫文物浅说》一书（1959年台北版）作为代序。又曾收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考古琐谈》。

物馆是施行实物教育的所在”,现在来谈谈实物教育的重要,举几个浅显的例子来说。

我们在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本中读过:太阳的直径是八十六万六千英里,地球的直径是差不多八千英里,木星的体积大约是地球的千三百倍,土星是七百三十倍,天王星六十四倍,海王星六十倍,水星、金星、火星、冥王星都比地球小,九大行星都绕着太阳公转,每个行星又自转,许多行星又有卫星,地球的卫星是月亮,月亮绕着地球转。这些现象,这些数目字,我们平常除死记着来应付考试以外,心中到底是不是有个很清楚的观念。当然我们可以画图来表示太阳月亮地球和其他许多星子的大小远近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教科书上已有了图),但是把散布在空间的东西全画在一个平面上,是容易使人发生错觉的,尤其是对这些原理还不十分懂的人。我们的小学甚至中学的教师们,可以对学生作一个测验,问他们地球的自转是从左向右转的,还是从右向左转的,它的公转是顺着钟表的方向的,还是逆着钟表的方向的。这个简单的问题,限他们在几秒钟以内答复出来,看有几个人能肯定的答出来而没有错误,恐怕不会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吧!这样常识的缺乏,不是我们教书的人平常不努力,乃是我们教育设备的太不完备。假使我们在每个城市中,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能将太阳系的一群星子,做一个或几个模型,使它们的位置和大小远近的比例,都相当的正确。这些星子的自转和公转,最好能用电力控制,使它们的方向和迟速的比例,都可以表现出来;在没有电力的地方,也应当用图画或其他的方法来表示。小学生们看了这个模型,自然心中明白也记得了。在德国慕尼黑的博物院中,设有一个天象室,是一个圆顶的暗室,可将天体的现象,早晚日月的出没,四时星宿的运行,在十几分钟以内表演出来。人们看了这个以后,比读几本枯燥的天文书要受益得多。

再谈到地理吧。大家都知道,喜马拉雅山是亚洲一条很大的山脉。地理书更可以告诉我们,喜马拉雅山从前是个海,后来因地壳褶曲,造成现在的高山。它从帕米尔东南走,横贯在西藏和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中间,东西长约二千五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二十公里。它有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公尺的额非尔士峰,山上积雪,终古不消,并有许多的冰河。山中在四千八百公尺以上,植物稀少,仅有坚韧的短草,但有古代海洋性的化石。较低的地方,则有鲜美的青草,南边并有茂盛的森林。动物有鹫鸟、山猫、爬虫一类的东西,山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这样的描写,不可谓不清晰。当然我们还可以更详尽的写好几本书,更可以画地图来表示山脉的趋向,河流的道路,地图上用颜色来表示地势的高低,用标志来表示矿产的所在。但是有这些东西,我们是否就对喜马拉雅山有具体的认识呢?恐怕还不够吧!假使我们能做一个模型,将喜马拉雅山的摩天的高峰、激流的冰河、深长的山谷、皑皑的白雪全在模型中表现出来。再将从喜马拉雅山所采集的化石、植物、动物、矿物的标本,以及历次往喜马拉雅山探险的人所摄的照片、所作的地图,以及他们的用具等等,一齐陈列出来。那对于研究喜马拉雅山的人是如

何的有益处呢!

现在我们中学里面的同学们,也许最感头痛的一件事,便是上物理、化学课时,没有做实验的仪器吧。其实外国有许多学校上课,就在博物馆里面来上的,在战时尤其如此。只须博物馆有一套仪器陈列在那里,每班学生来,便可表演给他们看,如果多有几套,也可让他们自己来实验。这是很经济的一件事,因为一个城市的教育经费往往是不充足的,与其把不充足的钱分散与各学校,造成几个简陋不堪的实验室,不如把财力集中了,设一个小小的科学馆,普通的仪器,购置得相当完全,有专人来负责保管,也可以减少许多损失。

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见敌人或我们的主力舰或运输舰被潜水艇袭击沉了的消息。究竟是怎样袭击的,我们可以从报上的描写和图画上知道一个大概。但是潜水艇是怎样构造的,为什么可以潜到水里面去,鱼雷是怎样构造的,为什么可以投到水里,还可以前去袭击敌人的军舰;这些道理,不是容易解释的。假使博物馆里,能造一两个配景,作成大海中潜水艇袭击军舰的情形,再造一两个潜水艇和鱼雷的模型,将它们的剖面和内部的重要各部展示给人看,再加以图画和文字的说明,便是普通人看见,也容易明了的了。在欧美的博物馆中,就专喜欢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复杂的科学。

目前在战时,我们更容易感觉到这种科学设备和教育的方式,直接与国防有关。对于新武器的研究和发明且不去说,就从使用新武器的技术人员或战斗员的培养和训练方面说,也是很有关系的。在欧美国家,儿童们除了平时上学校去读书,就是星期日和假期,也有父母率领着到博物院里去看。在这里看见宇宙的现象,看见人类的历史,看见现代世界各处的生活情形,也看见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坦克车、无线电制造和使用的方法。他们年纪长了,各走各的路,有成了文学家的,有成了商人的,也有成了倒垃圾的工人的,对于他们小时候有形或无形中所得到的一部分知识,也许终身不用。可是一旦国家有事,他们从社会上各个角落里被召集到营里来,对于这些飞机、大炮、无线电一类的东西,好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一般,运用起来,自然容易熟悉得多,而不会有无所措手足的麻烦。

从以上所说,大家可以知道实物教育的重要。这并不是说,有了实物,就可以不要文字,实物和文字,是相辅并行的。施行实物教育,也像教书一样的难。我们必须有个相当高的水准,对于实物的选择和陈列,必须合于教育的需要,不是收集了一批实物,摆一个杂货摊便算了事。一个博物馆里陈列得不好,就好像一本教科书写坏了一样,对于人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坏影响的。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读了毛子水先生在中国文化论集所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颇有所感,因草此文。毛先生的论文,肯定了两件事:(1)“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中国科学思想》,第67页);(2)他同意李约瑟的说法:“如果以往中国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同上书,第71页)。我没有看过译文的全文,也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检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何如,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就是不好听的话。

虽说现在尚有不少的爱国人士以辩护中国古代文化为职业,但是说“西方一切学术都可以在中国古书中寻出根源”的人可以说已经少得不足数了。

所以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时代精神,有两种趋势是很显然的。一般的意见都承认,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西方的科学;同时,一个更坚定的意见却是,科学中最先需要的为科学工业(作者常用“科学工业”这个词称呼应用科学部门。——编者注)。以上两趋势,不但在现代政府的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的倾向表现得尤为具体。以今年投考台湾大学的考生选的科目论,志愿在工学院的逾两千人,医预科的逾千人。农学院的也将近千人;但理学院七系,全部投考的学生仅二百余人。换言之,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觉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

* 本文系作者应方子卫先生之邀为其编辑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一书所作。经方氏同意,先刊于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9卷第9期(1953)。曾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

在这一气氛下，要推进科学思想，我们确实还需要作一番反省的工夫，因此，又不能不追问到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这一问题了。我对于毛子水先生所引李约瑟博士把中国没产生科学的原因推到中国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觉得有点笼统，觉得有些因素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因为使中国没产生科学思想的因素也正是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分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这些因素赤裸裸地托出来检讨一下。这可以分数节来说。

一、中国学术的主流

在中国文化早期形成的时代，我们的先圣先贤对于学术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不利于科学思想发展的；但是由其中若干观点所引起及养成的思想习惯却另走了一条路径。秦汉以及秦汉以后，在政治上独尊的儒家，对于学术的总体，说得最清楚明了的，同时留在政治与社会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荀卿。荀卿《劝学》的内容：

>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这一课程表，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除了与诗教有关，孔子说过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可以附会于科学外，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气味。荀卿的意见是：与"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最有关系的"礼"，就是学的最高峰。

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的中国文化系统，自然涵育了很多人类珍贵的创获，但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地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了。荀卿这一宗派传下来的礼教，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均发生了决定作用。儒家的正统说法，礼教的最高境界俱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记得二十余年前，有一位朋友追悼王静安先生的自杀，曾说："……《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但是这一最高境界虽说是富有诗意的，为无可奈何的感情所寄托，却并不是针对现实情况的任何推论。同时，由这同一来源所养成的另一社会形态，境界既不高，流毒又更大。《礼论》篇中，有此一段：

>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这些"有称"的等差，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讲究的"面子"问题的理论基础。不过，"面子"的涵意还要复杂。荀卿的原意大概只是要说，有德者应该有位，有位的人都

应该享受“有称”的养。但到了末流,却只讲位的等差与养的配给,并不究位的等差与德是否相称。《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显然只是为实际的社会与政治供给一种理论的基础。

这种极端形式主义形成的过程,仍是值得追述的。最初的理论原是本着“有德者必有位”的假定,而提倡了“有称”的养;目的是在养德。由此一变而为“有位者必有德”的说法,位与养的关系更亲切了,位与德却脱了节。更进一步的演变,位成了社会中所公认的绝对的主体,连德的有无,都可以不论了。“位”的实际的社会意义,用通行的语言解释,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地位”的重要,因为它不但具有社会的意义,更富有经济的意义,以及群众心理的默许。每一个人对于他的自己地位的自觉及希望别人对于他这种自觉的尊重,就构成了社会所公认的“面子”心理。中国人喜欢“装阔”,一半是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一半是要别人尊重自己的地位;由此遂得了一种要求社会给他特殊待遇的一个理由:他比别人本来地位高、面子大。更进一层的演变,就是由地位的自觉,化为人格的自觉;这一心理的结合,可称为地位化的人格自觉心。这一自觉心的形成,实是“面子”心理最真实的基础。于是,作了皇帝的,当然就是圣人;作了方丈的,当然就是菩萨;作了神甫的,当然就代表上帝;作了社交妇人的,当然就是美人;作了学生的,当然就是读书人了。若是自己不如此想,或是任何别人不如此想,可就丢了面子了!由此所引起的心理上的反应,是极端严重的。

面子心理造成的社会类型,最明显的一节,为一般地承认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表里两个标准,表面的标准重于里面的标准。以虚伪为礼貌,人与人相处互不真诚,尊之为世故;对公事公开的欺骗,名之曰官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像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有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

面子问题所牵涉的方面太多了,现在举一个与科学思想有关的例,以结束这一段。三十余年前,英国的罗素讲中国问题时,曾写过他在北平讲学的经验。他说,他在北平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他的责任,直率地教导他们,如同他教导英国学生一样。但是据他的观察,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有些学生不努力而为他告诫的话,他们总表现忸怩不安的状态,而不是恭敬受教的状态;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感觉失去“面子”似的。罗素跟着就说,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两种标准,究竟孰得孰失,他说,他并不能断定。不过有一点,罗素却指明了: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

二、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制度

中国旧日教育的内容，理论上虽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节目，实际的演变，终到了以读书为唯一的目标。"读书人"就等于"士"、"君子"，或者用现在的名词说，"受过教育的人"。读什么书？如何读法？读圣贤书，从识字起。这些都没有可讨论的地方。不过这一目标的追求，及所采取的追求方法，卒致使我们这一民族思想活动力关闭在一个极狭窄的范围内，就是最高天资的人，也好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行者，无法施展他的能力。这罪过并不在识字与读书的本身。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方看得出它的核心。这一核心，我认为是旧式教育制度所训练的"对对子"的思维法。

中国的儿童在发蒙时期，甚至发蒙以前，就要学对对子，是人所习知的；真是四海之内，各府、各县、各乡、各镇、各村，只要是有教化的地方，有读书种子的地方，总可以看见白胡子的祖父带着三四岁的孙儿，学对对子。记得清华大学有一次招生的国文题目，只是要考生对几副对子就可以完卷。这主意出于一位国际知名的教授。他的理由，据传说是：中国语文，无所谓文法，只是讲对仗而已；能对好对子，就会作好文章。这一议论曾引起教育界的广泛的注意。是否有人驳过他，我不知道；我个人相信，这是不容易驳的一个命题；因为它不但是洞中窍要，同时也破了神秘的中国思想这个谜。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学——自汉朝的词赋到清末的八股——只是一连串的好对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读了书的中国人的思想，也只是一连串的对子思想。

对子本身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物，它可以启发人不少的美感，增加人类（中国人）生活无穷的意趣。我常设想，并自问，对对子所得的快乐，与解决几何习题所得的快乐，是否有什么分别？它们在精神上的价值也许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中国教育制度的错误，是在把这一训练当作读书人的毕生之业。它固然可以提高人生的情操，但是，不可免地，也压低了学习者的理性。我并没有意思说，讲逻辑与对对子是先天地不相容；但是，"先入为主"这是我们中国的老话。现代心理学所发现的"联络定律"，十足的证明了，行为与思想的习惯都是在成人以前养成的，愈早的教育，扎根愈深。假如在童年的时代所贯注的全是"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一类的巧妙联语，这一脆弱的心灵，要听着人说"凡人皆有死，孔子人也，故孔子也要死"这一类的话，他一定要感觉到这话的浅薄凡俗有辱圣人了。我说"感觉"是有意的，因为他的理性已经为对联关锁了，他是看不出这一话的逻辑性的。

由对对子的文化产生的另一精神负担,就是对联塑定的中国文字的结构与性能。用这种文字来作推进科学思想的工具,有点像用珠算的器械与方法计算统计学内的复杂公式一样。凡是读过中文本的有机化学或解剖学或者分析心理学的人们,大概都有这一感觉。但这只是不方便而已,很可以随着用的人思想发展加以改进;这并不是科学思想的致命伤。

三、对于文字的态度

中国人对于文字的态度,似乎只有一小半把它当作工具看待,一大半仍滞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画在洞穴里的壁画所持的态度:把它们当符咒看待,以为文字具有无限的威灵,可以随便降灾赐福。过去的对联,现代的标语,都可以代表这一迷信。但这还是比较容易说明的。更深一层的,我们过去,确认为文有载道之事。"文以载道"这句话是不容易加以简单的解释的;不过既信了道在文字里边,求道的人,亦只有求之于文字了;这跟向书中求黄金、求美人,以及求富贵功名相比,似乎也就没有很大的分别。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

现代科学思想的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的威灵,不把它当符咒供奉。科学家使用文字,与使用其他的符号一样,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决不把它当作装载思想的神器看。所以他们思想的原料供给,大半由五官的感觉得来;别人的经验,记录在文字里的,只有供他们作比较参考的作用。

由这一观点所发展的教育制度,就是注意官觉与外界的实物接触。一切自然科学均由此作起,冒生命的危险而探险,田野的采集,室内的实验,观察站的建设,所有这些工作的进行,固然都离不开文字,但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这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基点。

文字既然只是工具,也就同其他的工具一样,用的人可以把它的结构改良,可以规定它的性能,可以限制它的活动。结果是文字的神秘色彩虽是减少了,文字的功能却增多了。

四、今后的科学教育

以上所说,仅就管见所及,说明中国文化没有产生科学的几个可能的主要原因。

革命以来，一切的情形都维新了：不但学术主流早已变向，对对子的儿童教育以及以书本子为学术终极的看法，亦皆随时代而俱去；照说科学思想应该欣欣向荣了，为何尚没有长足的进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原因自然是有的，但是主要的，似乎还是上说的三个原因在作祟。要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习惯作一次民俗学的考察，我们将发现，随虚伪的礼教而去的只是个人的尊严；面子心理仍是社会的一个堡垒。美术的对称爱好，已因儿童教育方法的革新而渐消失，但逻辑的训练尚没能代替它的地位。一般的所谓科学入门的教学法，过分地倚赖教科书的文字也是事实。假如我们的教育当局肯下一大决心，以提倡科学教育为某年度的基本工作，下列的几个办法值得考虑一下吧？

（1）小学、中学的自然、常识及其他科学方面的教育，以实物的认识逐渐代替文字的背诵。

（2）大学里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随着工厂去，不必设立在学校内。

（3）近乎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了运用本国文字的能力外，必须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他的思想工具，方准入学。

这不是一个偏方，也不是特效药。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1953年8月4日

太平洋科学会议*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八十八次座谈会上的约定讲话和解答

约 定 讲 话

关于"太平洋科学会议",报章书刊已有不少报道。我今天想籍这个题目,谈谈整个科学问题及中国的科学研究。

联合国成立后,对科学研究工作,尽了很大的力量,以政治为中心的工作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其重要性超过政治工作并有世界性的文教工作,包括各种重要的科学活动,则不甚为一般人所注意。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国联文教会(UNESCO)。联合国在太平洋区域设有五个机构,一为国联文教会所设的科学合作处;上海原有一分处,迁设马尼剌,其任务为协助所在区域办理文化科学教育交换情报交换专家及代购仪器书籍等。二为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世界一般卫生情形及传染病。三为世界粮农组织远东分部,研究粮食问题与农业问题。四为气象研究机构。五为民间航空研究机构。以上机构都是研究具体问题的,是配合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积极活动,也可以说是政府设立的机构。

纯民间团体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很多,其中最大的要算美国创设的太平洋学会。美国太平洋外交政策虽已改变,惟该会人物与刊物,对美国外交政策仍有影响。

此外就是半官性的科学研究组织,太平洋科学协会。太平洋科学协会的工作从纯科学的立场看,较上述两种更为重要。该会成立于1920年,系在夏威夷发起。有些先见的美国学者感于太平洋区域的科学问题,亟须研究解决,故发起设立这一机构,推进有关太平洋区域的研究工作,邀约太平洋沿岸各国科学家参加会议,交换意见;这一建议受到了热烈的反应!受邀请的各国科学家多踊跃参加。该会在日本举行第三次会议时,通过宪章,揭举两项目标:(1)联络太平洋沿岸科学家,藉此增进太平洋区各国各民族之友谊;(2)推进太平洋科学研究的合作。该会组织分为四个部门:(1)评议会:由各会员国代表推选十人至十五人组织之,负制定政策及行政计划推行之责,并决

---

* 本文原载台北《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

定大会开会地点。(2) 各专门委员会:专门研究其本范围内之科学问题,如气象委员会由气象科学家组成,专研究有关太平洋区域气象之科学并交换意见。各专门委员会设主任委员综其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负责干部,人选为由各国科学家推举,均为世界科学权威之士,凡研究题目之议拟及经费筹措人员物色,都由其负责。(3) 大会:每三年至五年举行一次,由主办国(拟主办者事前须向评议会申请)邀约太平洋各会员国派科学家出席;各国代表之推选由各国之科学研究最高机关执行之;会期二周至三周,各出席科学家分组报告太平洋科学协会所指定之专门研究工作,或发表个人论文。此外尚有专题讨论的座谈会,自成组别,如地震、椰子、科学教育医药以及传染病等,均各有联合讨论之座谈会,使各国专家得有交换意见之机会。凡此皆可使所有与会者明了各方所研究之材料,并沟通不同之见解。研究报告、论文宣读及演讲,以及座谈会完成后,出席各科学家,在散会前,根据会议讨论之结果,决定各科学进展之方向及应继续研究之题目,构成若干决议案,送各会员国政府及科学研究机关分别注意研究;所有报告论文则印成专集,在科学文献里占了很重要地位,为科学家宝贵资料。去年冬在马尼剌举行之太平洋科学会议为第八次,共为二十组进行。第七次系在纽西兰举行,第六次至第七次相隔十年,因二次大战发生,太平洋成了多事之区,受影响而停顿。菲律滨政府为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拨出经费五十万菲币,所以不惜钜赀,旨在促进菲律滨之科学发展,趁各国科学家集菲开会之便,请各科学家协助解决科学问题,并使各国人士认识菲律滨各地情形。菲律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东方各国类似,均属比较落后。下次,大会已决定在曼谷举行。(4) 秘书处,专负联系工作,调查大会决议案各会员国执行情形,并协助各国科学家之工作。

中国接受近代文化相当的晚。明朝末年虽已与西方科学文化,开始接触,但并不重视。直到庚子以后才改变态度;自英国的戈登协助清廷击败了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鉴于西洋的船坚炮利,竭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文化。但只是为打仗而学的。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深知科学对民生的重要,对学习科学的倡导,不遗余力,国民政府成立后,才算是正式的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而有中央研究院的设置。若干年来,在国内所看到的,确有相当进步,但与外国比较,仍相差很远,这次本人奉派赴马尼剌出席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发生了三点感想:

(1) 中国民族是否有研究科学的能力?二十世纪以前,一般地说,中国没有科学。这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做科学工作能力的证据?好些西方人,尤其是科学家,都是如此想。自从中国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以后,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来所努力的成绩,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国人能做科学工作的答案呢?要答这一复杂问题,我们须先了解,所谓科学工作,并不是零零碎碎的机械发明,而是推动这些发明的动力,即科学问题之研究。就中国人个人的成绩说,在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面,如数学、逻辑,都可以赶上西方人的;在最需要动手动脚的方面,照西方人的观察,以中国人的体力及人生观,绝

对不能在野外做科学工作。可是近年来,许多年青的中国学者从事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的研究,已有相当成就;这些成绩可以证明,假使我们下一决心把我们民族的智慧贡献于科学的研究,一定可以做出若干事业来,一定可以帮助科学的进步。

(2)但是,现代的科学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担任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说得好:所谓"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就是说,科学工作不是散漫的、零碎的;而是把一般的知识组织起来;组织成了便是科学。现代科学工作小而言之须由机关进行,大而言之,须国家的力量甚至全世界的合作共同去做。因为科学牵涉的范围很广,没有各方协助,不容易有成就,故百分之九十九,须靠机关或国家的协助领导。以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所见,中国人的智慧如能作适当的运用,是有做科学的能力,与各国的科学家个人与个人比,我国科学家并不落后。但是就组织的成绩比,便不如人了。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有六十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是请各会员国政府注意的,如测量各区磁场、测量沿海水面温度、碱性;透过教育各层的机构,宣传"保管"自然资源观念等是。现在的科学与行政已打成一片,目前美国、加拿大、纽西兰,英国的许多行政机关同时就是研究机关,研究机关同时是行政机关。南太平洋岛各保护国的行政工作,也是放在科学家身上,南太平洋委员会是一个科学机构,兼负行政责任,效果相当的良好。

(3)有区域性的科学工作,各区域的人若自己不研究,别人便会代为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有区域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是整个的一部分,各部分互有联系的;如地质、气象、海洋、动植物、人口等,各区域均有连带性。譬如,台湾的部分,台湾的科学家固然要研究清楚,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需要知道,假使我们自己不研究,他人便会代我们作;因为缺乏了台湾的部分,整个研究工作就不能完成。若是别人来代替台湾的科学家研究,台湾的科学家,既自己不作,能不让别人作吗?或者以为别人替我研究,岂不省事,要知,自己的事自己不知,别人却弄得清清楚楚,久而久之必定要吃亏。说不定连自己的这块土地就会变成了别人家的了。殷鉴不远,清朝的外交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科学知识。我个人的见解,以为文化是无地域分别的: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曾讨论世界文化问题,有许多名家发表高论,台湾报纸也讨论到中西文化,一般人都把文化分成东方系统西方系统,而且许多人拚命地想在书本里找中国文化的优点,说它胜过西方文化,以为这样作才有面子。这种情形值得我们同情,发扬本国文化是应该的,多一分自信心,可以多一分勇气。不过我个人认为世界文化并无区域性,尤其是科学文化。实在说,全体人类文化只有一体;这一个体也许有若干面,就构成这一整体各个分子说,保存下来的是优良的;淘汰去的是坏的。西方的历史证明,西方文化并不完全是西方人创造的。不过,在最近几个世纪,他们的工作多一点表现得大一点罢了。在全部人类历史里,文化的中心点,是常常变动的!在某个时代某个区域表现得较好,别的区域,相形之下就要差些。譬如唐朝武则天时代,历史家均承认在这一时代,长安不

但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并且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我不相信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可融化的区别。真正文化的区别不在地域的东西,而在时代的先后,现在固然可以分为有科学的文化与无科学的文化,但时代的进展,没有科学的,总要变成科学化的。

现在最紧要的工作为改良中小学教育,培养青年科学家,在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中,一般地说来大家对中国科学家都相当尊重,对中国的地位也很尊重,对中国科学家将来的期望很大,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悲剧,西洋人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能力是十分清楚的。抗战时期曾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作科学官的一位有名的化学家李约瑟在重庆曾说:"中国的学生的科学天才相当的高;比之若干其他国家有许多地方可以胜过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科学能力应有自信心;有了自信心,科学工作便可事半功倍了。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妄自尊大。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培植青年科学家,培养青年科学家的自信心和人生观。但是中国的科学教育尚待研究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育;就现在的情形看,可谓毫无科学研究基础。譬如社会上对于博物馆的设立,绝对地缺乏兴趣;以致青年儿童只被关在教室里背死书,甚少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在外国,中小学学生所受的实物教育,博物馆的教育是骨干,书本教育是辅助的。他们经常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启发好奇心,研究大自然,中小学教育如能转向这方面去注意改革,中国埋没了数千年的科学天才,就有希望可以发掘出来,迎头赶上西方的现代文化了。

自由讲话(另四位与会者的五次发言从略)

六、李济(综合解答)

谢谢各位先生的批评。今天的演讲,我是要写出来的,但能否令人满意,便没有把握了。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是一个很大的讨论题目。我刚才的话是以研究科学的立场来说的,当然不能说我的话就是对的,我只是以研究科学的立场,唤起大家对科学的注意。我从事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数十年,从这些材料中认识了人类的进化;最紧要的方面为求知识的方法之进步。所谓科学知识,只是比较准确的知识,根据这些准确的知识,我们往往可以判断并预言若干未来的现象而不错。科学有它的客观的标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凡是做科学工作的。总有问题,有设想,有辩论,有暂时的推断,而有不同的意见;问题的解决,完全根据客观的事实;事实的收集是科学家的第一步工作。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跟着来了。在会议场中一面整理过去的知识,一面发动研究将来的问题。科学会议的作用也便在此。至于某个问题应如何解决,某种观念是否正确,可以说就是会议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这些活动究竟是从外而内或从内而外的,这就难说了。

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

中国传统的历史，一般都从黄帝谈起，但新兴的史前史却还可就地下遗物的发掘，把古代史远远向更早期推溯。

史前文化与见诸记录和传说的历史、接近或有关系和线索可寻求的，有彩陶和黑陶。彩陶分布以豫北晋南为中心，向西延伸到甘肃和新疆，东到热河和东北南部。黑陶以山东半岛为中心，向北到辽东，向南到钱塘湾以至更南地区。这两种文化最接近于中国历史的黎明期(新石器晚期)。

在长城以南地区，考古学者发现一特殊现象，就是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遗迹丰富(如彩陶、黑陶等)，而中期及早期甚少发现。因此便发生一项问题，新石器晚期的文化究竟是在本区发生成长的，或者是自外移来的？若果认为是黄河流域发展成的，那么，我们应该解释何以中期和早期的文化遗迹甚少发现。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项事实是若干外国考古专家在长城以北内外蒙古地区发现新石器早期的遗迹相当多，晚期的也有，但比较起来很落后，中期、早期远比长城以南地区为多。中石器时期的遗迹在长城以外也有发现。

Folk Bergman 和 B. Bohlin 所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曾从绥远向西到新疆，其考察途径大致在沿北纬 42 度南北地区。他们在这一带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期的遗迹，其中早期、中期、晚期都有。从这次考察发掘中得到两项值得重视的结论。

(1) 有许多遗址所在地，在沙漠边缘，或在水草干涸不能居人的地区。由此可以推想到当地气候经过了重大变迁，原来水草肥美、人迹稠密之处，荒废而成为今日沙漠。

(2) 就是中石器时期及新石器早期的遗迹较长城以南丰富。

长城以南地区——新石器晚期遗迹多，并且从遗物可看出其文化之鼎盛，但中早期甚少。

长城以北地区——中石器时期及新石器中早期较多，晚期虽有但已呈衰落之象。

---

* 本文原载 1954 年 4 月 23 日台北《"中央"日报》。

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比较而作一假定,认为长城以南之新石器晚期文化系由长城以北移来,迁移的原因则为长城以北的气候变迁。

对此假定,我们还只有简要的证据,就是长城以北的遗迹多在沙漠或其边缘,而长城以南黄河流域之新石器晚期文化有突然发展到鼎盛的现象。

长城以南新石器文化的主人翁,我们已能从遗骸验知其与今日华北人之形态无大差异,可推知其为今人之远祖。长城以北新石器中早期及中石器文化之主人,尚无任何可据以假想推定之实物。惟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东北沙锅屯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也与华北人无大差异。

我个人的看法:在新石器中早期活跃于长城以外的人群,可能就是新石器晚期活跃于华北民族的先祖。当然其中也可能杂有自东北以及西北来的新成分,与原在内蒙古者合而南移。

旧石器时代终了以后,新石器晚期以前,华北的土著居民,我们尚无发现。地质学家认为今日弥漫华北之深厚黄土,为一种特殊气候所造成,即有极强烈之风暴发生;其强度较之今日华北最强之风暴还超过10倍,黄土即为此风暴留下的沉淀物。在此种强烈风暴挟带大量沙土来袭之时期,华北一带似难为人所居。若果华北原有居民,此时大部分或已北迁,到风暴停,黄土定,而值内蒙古又发生干旱,于是又向南移到华北。

在这个时期,人多赖渔猎游牧为主,到华北仰韶文化才为农业文化。相传黄帝是迁徙无定处的,显然是还在游牧时期。黄帝曾与炎帝、蚩尤作战,大概当时是三强争霸的局面,黄帝一支战胜了,于是定居在华北。以上这种解释即使没有错,但从黄帝到商代间,仍然是一段空白;传统的历史虽把他们穿插衔接起来了,但没有地下发现的直接史料可证明。

就商代的文化来看,其发展的形态也颇与新石器文化相似。我们试举出三项:

1. 青铜器

商代青铜技术发展甚高,但青铜器也少早期的发展遗迹,似乎是忽然出现,已臻于鼎盛状态。商代青铜器之伟大及制作之精良,旷世罕有其匹,而其突然发展的情形也和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一样。

2. 文字

商代已有甲骨文,但更早的演变经历尚无从追寻。

3. 车

也是在商代突然出现。

因此种突然发达的情形,有认为系自外传入者。这种推定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从事考古发掘才只短短一二十年,工作的时间短,发掘的范围小,大多地区在考古上还是处女地。现在我们在国内找不到遗迹,可能是由于工作尚

未普遍的缘故。

不少外国学者,急于为我们找寻外来的痕迹。他们以为青铜是由西伯利亚传人,彩陶来自中亚,黑陶也是外来的。早期文化之接触当然是可能的,但在发掘未普遍、证据不齐全时,骤下结论,是不够科学的。

从事区域文化研究者,也常发现某种文化的发展,中间有不接头之处;这种情形颇为普遍,尤以史前期较多。因史前文化的研究全靠实物,其发掘搜集鉴定都很费时费力。对于这种现象一般的解释是:如果工作已经做得够、做得好,可以证明某种突起的文化是外来的;要是工作不够,应该继续多做,才可再下结论。

谈到这里,我个人有一点很大的感触。在研究世界人类史中,常常见到有些人因地域偏见、国家观念而对所谈的问题故作畸重畸轻之论。爱本国、爱本族的观念当然应该有,但史实贵乎存真,畸重畸轻的结果,加深偏见和歧视,不仅增加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仇恨纷扰,也使人类历史失其真面目。过去德国和日本就惯于强调自己的文化,而轻视别人。现在有的人更把这种偏见发展到极端,他们把最好的文化,最好的发明都算作自己的,往往不惜歪曲改造史实,就研究科学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不正当的、错误的方法。

在研究中国远古史时,西方的学者们往往偏向于把中国的时代拉迟,或者把早期的文化解释为自外传来。历史自有真面目,我们虽不必斤斤与之争辩,但我以为要写一部准确的、可靠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世界人类历史,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先要放弃国家地域的偏见。要这样必须建立一种观念,这就是:全部人类的历史不以地域来限制,在叙述人类发展史时,把文化本身当作全人类的一件事,把创造文化发明新事物视为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

文化一分畛域,就可能为外来或本国独创等意念所影响。实际上没有一个区域的文化是完全孤立而独自发展成长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不足奇。一个民族能吸收外来文化而作进一步的新发展,这是有大希望的民族。相反的抱残守缺、对外来文化采深闭固绝态度者,终将落伍而受淘汰。大家作此想法,不仅有助于今日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远古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更易求得真实。

人类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新发明;这些为人类所绝不能少的发明,早已变为人类共同的财产。人类在有文字记录前,文明的发展实已甚高,许多为人类不可少的事物都已发明,而这些重要发明都无法确定的指出是谁发明的。试想,我们能指出火是谁发明的,小麦是谁先开始种植的,船和弓箭等是谁先使用的吗?不仅不能指出是谁人,连何种民族也不能确定。虽然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传说,但其不可靠是大家了解的。许多事物的发明或有先后,或者同时发明,如果争先论后,徒增纷扰。我们只有把文化的创造和新事物的发明视为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德国人曾说莎士

比亚不是英国的，而是世界的，因为他承袭的文化遗产，不是一城一国的，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由此我们可以想知，许多大发明家、科学家、哲学家的成绩都非他自己独创的，而是全人类智慧文化的累积。因之，我们不必强调某一文化的创造者，而要多注意某一文化、某一发明对人类的贡献。

历史学者抱着此种廓然大公的态度，方可在研究讨论中不故意强调某一部分，也不抹杀某一部分，要这样才容易保存历史真面目，才可望有一部能为世界各国人所共同采用的世界人类史。

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或将被别人视为过于理想，事实上也不容易做到，但我总以为历史学者应该把目光看向更远大更长久处。

说明了我这一观念、这一想法后，回头再来为我国的远古文化做一推定。我认为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内蒙古新石器中早期文化的影响甚大，而内外蒙古——可能包括蒙古以北的贝加尔湖以及叶尼塞河流域——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摇篮地。所以孕育中国远古史的中心地带，没有疑问地固然在黄河流域的华北，但其全部背景，却不是长城与扬子江所能限制的。这一背景的范围，包括东亚的全部以及环太平洋人类足迹达到的地方。

如何办科学馆？*

在很多热烈地赞成办科学馆的人们中，我算是一个。因此，在这宝贵的篇幅中，就想把赞成这一运动的理由及所知道的办法简单地说明一下。

办科学馆最紧要的目标应该是教育的；这话说来似乎是容易懂，但办起来不小心，就会把目标转了向。尤其要避免的，是把一座科学馆办得像一家百货商店，或者一幢商品陈列馆。现代的中国更容易走错这条路：中国是现代工业尤其是科学工业落后的国家，假如我们计划的科学馆要陈列现代工业的模型，势必要向前进工业国家的工厂征求这一类的样品。据一般情形推测，这种征求，一定可以得到若干正面的答复，不过百分之九十九捐助人的兴趣总想藉此作广告，而不是在提倡科学。就是在国内响应这一号召的人们，目标大半也是要作宣传。这种生意经的心理不是不可以利用的；不过要是办理的人只图贪小便宜，结果就会把原来的目标忘记了。所以我们办科学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计划，有一清楚的目标。

假如说吧，科学馆的第一个计划是以实物的陈列为公众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这一计划的详细节目，应该不限于陈列几种蒸汽机、内燃机而已。若只有如此的范围，陈列品是不难找的，但教育的价值未必很大。要充分地发挥这一陈列计划，就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猎人利用的自然弹力，农人利用的水利，以及驯服的兽力等等都有很长久的历史，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这些说到蒸汽机的发明以至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顺理成章就是一部很自然的历史。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的春天，我在慕尼黑（Munich）参观过世界著名的科学博物馆，即德意志博物馆，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记得在飞机的部门使我最惊奇的，为无数的昆虫及飞鸟；乍看好像是放错了位置似的。看到说明，才知道这些昆虫与飞鸟的飞行的姿态都是研究飞行的基本资料；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

飞机的历史可以如此陈列；动力利用的演进史当然也可以照此精神排列出来的。

---

* 本文原载台北《中国一周》杂志第 211 期（1954 年 5 月 10 日）。

若是上说的基本陈列可以实现,就可再进一步用实物及图表说明各国以及各社会利用自然界动力的程度,以及与社会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现代文明的核心为节省人力,利用物力。物力利用的范围愈广,人力就可以节省得愈多。节省下来的人力,用着作科学研究、艺术创造,以及一切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当然社会就昌明了。但这一点很清楚的道理,似乎尚未得到中国社会的同情考虑;所以这是极值得科学馆用实物来宣传的一件教育工作。记得三十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有一位教物理的美国人告诉我说:他曾计算过中国苦力阶级每人每年能用的全部精力的总和,约等于半吨煤炭的燃烧力量,换句话说,一位劳动阶级的中国同胞,胼手胝足,终年辛苦,对社会所贡献的动力,等于烧了半吨煤的机器所做的工作;所以火车头烧了半吨煤的运输力量,就等于一个挑担子的中国人挑了一年的担子,一位拉人力车的车夫拉了一年的车。这些事实若能用实物陈列出来,看的人能够无动于衷吗?

总而言之,既是要办科学馆,无论采用何种计划,审查计划最紧要的标准,应该是看它:(1) 是否有教育价值;(2) 是否宣传真正的科学知识;(3) 是否有社会的意义;(4) 是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陈列出来。切不可无辨别地、聚集一大堆现代工厂出品,或杂乱无章地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使一般参观的人耳聋眼花、莫名其妙。要达到科学陈列的目标,有极其繁重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个人极不赞成一个科学馆兼营其他的业务。就是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可以留给专门研究的机关去做;若其不然,一定是要“劳而少功”的。

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做起*

女娲氏炼石补天这一故事经曹雪芹加以点缀粉饰，成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章最瑰丽的作品，这决不是偶然的；现代的民俗学家同意了，每一个民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或故事，亦最足代表这一民族最深邃的思路与习惯。以具有世界最长久历史的中国民族，而人数又如此的众多，究竟有什么自别的思想、风俗习惯？要是我们自己问，也许当局者迷，一时答不出；但旁观者，在神志不清明的时候往往比当局人更加糊涂；不过这里却可找出来若干例外。三十余年来，作者常常注意外国书里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意见；这里，荒唐的、带偏见的、恶意宣传的、善意恭维的都有；同时也有不少锐利的观察，见我们自己见不到的，我们习惯上的特点。其中使本人最难忘的一句话，是在一位英国学者、剑桥大学的教授狄更生先生所讲中国文化的著作中。他说：中国民族喜欢"改进自然"(Improve nature)。这句话钉在我心中几十年了，老是拔不出来。"改进自然"，真是谈何容易，我最初读了并不十分了解这位希腊学家、哲学家的意思。我想他指的也许是中国流行的，对于女性美的观念吧，中国人嫌女人的天足不够标准，于是把她们缠成他们所想象的标准美——三寸金莲；这一"改进自然"的工作，曾经得到万人的欢呼，普天的同庆，中国民族自以为有了最标准的美人了！这在小脚女人丛中长大的中国男人自然看不出有何不自然的地方；在没有这一风俗的外国人看来，却有些奇怪。把一半人口的小生命，如此的折磨了，是不容易使人懂的一件事。狄更生说我们"改进自然"，并没有讥讽的含意；与我们喜欢的民间故事"炼石补天"的传说对照一下，我们长时间的对于三寸金莲的爱好，是可以互相照应的。中国人对于自然不满足；所以要补它的阙，要改进它。

如此想了好久，自以为得到了一种满意的解释。去年秋天有一个机会跑到雅典去了一次，并在克里(特)岛流连了一天，一个人欣赏这爱琴文化的中心，又看了马拉松英雄的石像、雅典神庙，凭吊了雅典城附近各处的古迹，六天的光阴就匆匆的过去了；这一经验不禁使本人又回想到狄更生说我们"改进自然"的习惯。读到一位剑桥大学的

* 本文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6年8月5日第8版。

学者——屈臣爵士——讲希腊艺术的一本书(Sir Charles Watson: *Alcamenes*)序说中有一句话,想用作下段讨论的起点。屈臣爵士论希腊艺术中的"经典式典型"的建置过程说:希腊的艺术,在公元前四七五至前四五〇年,短短的数十年间完成了调合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把二者溶成一片的这一奇迹,通俗一点讲,古希腊人建国的精神是与"自然"合作的。他们认自然的本身已经是最美的境界,人工可以加以点染,但是不能改进;这与荀卿所提的"物畜而制之"的态度,显然不是一条道路了。希腊人似乎是最欣赏人体美的,犹如他的欣赏"大自然"一样;而人体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小片段,裸体神像,固不自希腊开始,不过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时期,雅典没有疑问地是这一艺术的中心。这一希腊艺术的传统与犹太教汇合后,更加增了人体的尊严;《旧约》的《创世记》所记的:"神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体既是神像的影子,也变成是人的所有,最尊贵的一段了。

中国的传统中,对于造像艺术却完全是另一种表现;留存下来最早的人像是商代的,已是衣冠整齐的模样。汉代衣冠,就成了中原文化的象征;而汉代的雕刻艺术显在希腊之后,所雕的人像,都包裹在宽衣大袖中,很少有以人的自然身体本身形象作主题的;佛像塑雕发展,裸体人像更是列入龌龊观念以内去了。

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没有发展任何正确知识,可能有两种重要的原因:一是哲学的,一是宗教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这一说法显然代表了身心两元的观念,而"心"自然是主体;"身"是一个包袱,是一种"大患";没有"身","吾"仍可以存在。以后受了佛教的影响,更把"身子"当一种臭皮囊了。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对于"肉体"研究的基本障碍。连习于与人类生命最有关的职业的医生,对于人的身体的构造,始终没有发生一些好奇心。西方固然也有一个时期经验了与中国类似的情形,但终因希腊人所发展"爱好自然"的这一伟大传统,在文艺复兴以后,使欧洲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对于人自己的身体渐渐地聚集了系统的知识,而在与"人"有关的若干科学上,完成了不少辉煌的成就。到现在我们所有的关于人身体各部门的准确见解,可以说全是欧洲人最近几个世纪研究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科学文化虽逼开了我们的门户,我们的社会却仍在"欧洲中世纪的气氛"中徘徊。有人说中国民族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也许是下意识里仍保持着一种宗教的偏见:这臭皮囊没有可以使人骄傲的地方,所以仍时时刻刻想改造它。譬如有的人仍习于补鼻梁、换眼皮的若干勾当。中国的文人,过去描写美人,大半都是讲的改造部分,或是化妆的部分,很少说到身体发肤的本质上去;这是禁区,要说到那一部分,文人们自己也感觉是下流了。

但是我们的身体,究竟是我们的最真实的部分,要是我们对于这一单位现象,没有

一种准确的认识,我们所学的其他的知识等于悬在半空中,我们对于这些知识就得不了真实的感觉:下列的几个项目都是现存的,好像陈列在百货公司的货物一样,可以任人参观抚摩的常识。

(1) 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这个"我":"我"是身体感觉出来的! 此处我们可以套老子的说法,把他的意思改一下:"吾之可以有大知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知?"当然人们可以把"知"当作"患"讲,这一价值问题,此处不讨论。

(2) "我"是知识的总汇:知识的源泉都在身体的感觉,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口之于味也,鼻之于芬芳也,皮肤之于寒暖疼痛也……这些声音、形色、甘辛、香臭、寒暖与疼痛的感觉,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基本资料;到了大脑皮层,起了调合的作用,就变成意识。意识的存在,是人类最骄傲的部分,哲学家视为神明,宗教家尊为灵魂。这些心理现象的大部分,尚是科学家没有研究到的区域;但是与半世纪前的心理学比,我们就可以发生一种信心,相信这种神秘境界,只要科学家追求进去,那"神秘"的方面也就可以逐渐地消散了。

(3) 但是"真理"的追求,却是一种集众工作;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它决不是靠一个人身体上的感觉及意识能完全取得的。自然有些先知先觉的启发作用必须承认,但这只能作一个追求的开始。由知识所表现的真理,却是一件社会事业,必须能在大众的感觉中激起共感,大众的理性中呼起同鸣;这种共感与同鸣是真理独具的品质;不是一个人关着门制造出来的。

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人士,常想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找出些预言的根据。以比较法研究得出的几种结论说,有些很显然的中西文化的分别,是可以觉察得到的。中国人对于现代科学知识,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在任何艺术上发展爱护与尊敬的表现。这中间是否有些联系? 一般地说来,一层最大的难关,而中国知识阶级尚没十分克服的,为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种研究对象,作一种真理追求的目标。有了这一类的比较准确的知识,我们方有了一种比较可靠的、可以衡量的、装载知识的工具;再由此,追求宇宙中其他的现象——真理或者科学的知识——然后对于真理方有一种适当的安排。上面说的这一秩序,当然是以团体的进步言,不指个人的进修言。

假如为中国民族文化前途设想一种方案,"真理的追求"应该是最正确的目标。要是把实行的节目更计划出来,最要紧的一条应该使每一个青年得到些关于自己身体的准确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他方能取得更多的他种准确知识;由此再作真理追求的准备,方能说到真正的真理追求了。

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

甲、前　　言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小时读了《孟子》的这一章,除了对孟子个人肃然起敬外,又曾胡思乱想地以为照孟子这一说,大舜皇帝虽是东夷之人,也许他的生地诸冯,并不在齐国的范围之内;若在齐国,这一章就讲不通了。现在重读这一章,发生的感想却又是一样;由此联想到的是现代世界最大的历史学权威,托因比教授的著作。假如有人套孟夫子的话对托因比教授说:子诚印欧人也——这是就语言系统说——知释迦牟尼,耶稣而已矣!不知道托因比教授是否能释然于怀!

一个人的乡土观念,不但可以影响他的行为,并可影响他的思路;四川老乡喜欢谈苏东坡,湖南老乡喜欢讲曾文正;这些情绪,就是大圣人大豪杰也难免除尽净。看来孟子的乐尧舜之道,固然比公孙丑的胸襟博大,但也是因为这两位圣贤都是北方的创造品。假如他们两位是扬子江以南的人物,他老先生就未必如此轻易地称颂他们吧!

过去的历史大半是有所为而写的;无论其写"皇帝家谱"、"微言大义",或者是"彰往"、"资治"、"觉迷",写的人下意识中都要受乡土观念的局限。读历史的人们要是他们的兴趣是同作者一样咧,就无所谓了;要是想把这些历史当作一种学问去做,这些资料的价值就大有等差!

史学这门学问是气象万千的;入此门者不但各异其趣,而深浅的程度可以相差甚远。近代科学方法的进展、价值标准更有主观与客观的不同。不过,研究目标的扩大,只是近半世纪以内的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成就,为把人类文化的研究推进成为历史学的主要课题。

---

* 本文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6年10月2日第6版。

在现代人文科学里,“文化”一词有它的固定的界说:这一词的含意包括着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物质的创造、社会的组织、政治的演变、精神的发展——等等;其中最紧要的一点为:各民族及其代表人物的最主观的观念,也可以当作客观的资料研究。

在这一立场上谈中国文化,尤其是早期的中国文化,谈者听者都可以耳目一新了。这一意义,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诠释。

1. 资料的范围

假如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立场谈中国古代的文化而论其原始,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何种资料可以根据着作讨论的起点。在文字记录方面,中国古史的材料显有深厚的基础,但经过古史辨的讨论以后,不带神话性质的古史料似乎缩小到了一种很几微的程度。不过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带来了采集史料的新方法——田野考古学与民族学——,而前一方面尤直接与古代史有关。这两把钥匙用得适当的话,替史学家打开了两座储藏史料的宝库;库内所藏丰富的及珍贵的资料,只有进了这大门的人才能有些具体的印象。材料的种类,也是多样的。近半世纪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这一类的史料,呈现出来了两层价值。(1) 它把秦汉以前留存下来不容易解释的若干记录点活了;(2) 它把中国上古史的时限推远了;由不及五千年的传统历史推远到数万年至数十万年的时间。这些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上古史整个的观念;改变了上古史问题的性质。

2. 问题的性质

上项资料最紧要的虽属于有文字记录的这一类的发现(如甲骨刻辞),但是最多的却是没有文字的哑巴材料。哑巴材料虽无文字标定它们的时间,但都是人造品,因此就可象征人类的活动,并且同文字一样,具有一种普遍的比较性。一种器物,各为甲乙两地同有,固然表现历史的意义;若为甲有乙无,或乙有甲无,也同样地具有历史意义。譬如殷商时代用作贞卜的卜骨;见于史前的黑陶文化,不见于史前的彩陶文化;见于历史期间的西伯利亚、蒙古、中亚,西至欧洲的爱尔兰,非洲的摩洛哥,但不见于早期文明中心的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这些都各有其历史的意义。由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把各文化单位的独立程度与相互的关系辨别出来。因此古史的问题,其性质与一般科学问题的性质相比,就没有两样了。它们都是一种客观性质的、物物间的关系问题。

3. 研究者的态度

不过要解释上项材料及比较所得的结论之意义,研究者的态度可以生出很大的差

别。这又有两方面可说:一为观察方面本身所发生的不同的反应,如研究者的五官构造以及生理基础之个别差异,色盲的人不能了解颜色在绘画上的意义,音聋的人不能解释音阶在音乐上的意义。更有一种后天的习染,如乡土观念、国家意识、种族偏见,各自说来,都有在群众生活内的地位。若是这些习成的主观见解渗入了科学工作里,就能把科学家搜集的资料,化成类似儿童们积木游戏所用的木块;可以把它们用作建筑任何想象中的空中楼阁。这是建设科学历史最大的难关。这一关若不能通过,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真价值也就看不出。不过习于搜集科学材料的专家们,因为他们已有一种比较客观思想的训练,对于上说各种习染的戒备要够森严的话,也就可以少受它们的束缚了。

乙、本　　论

比较地说,根据考古资料所讲的历史要比专以文字记录所讲的历史客观得多,真实得多。回到中国历史本身来,以下的几项资料都是先前讲中国历史的史学专家所不知道的,而是近半世纪发现的资料:(1) 中国境内有过原人;(2) 中国有旧石器文化;(3) 中国有细石器文化;(4)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差异;(5) 华北中国民族的体质四千余年来,没有显著的变化……等等。

根据这些资料,搜寻中国文化的原始,比根据古史传下来的资料,不但较为可信,并且更有着落。但要讲中国文化的原始,我们应先把中国文化的意义说明白些。若是从北京人讲起,这一线的材料,隔断的多,连续的少,在现阶段中,是衔接不起来的。若从中国现代的文化向古时追,到了新石器时代,显然是一个大分划的开始。换句话说,传到现代的中国文化,若干最重要的成分方开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这一期间。如:

(1) 我们的农业基础,是新石器时代开始建筑起来的;

(2) 家畜的豢养,在新石器时代已很普遍;

(3) 村落的组织,也可推定是新石器时代的发展;

(4) 新石器时代已有纺织业,并有开始蚕桑业的证据;

(5) 陶业在新石器时代已发展到很辉煌的程度;

(6) 骨卜的最早发现在大部分的黑陶文化遗址中;

(7) 版筑式的建筑,在新石器时代亦有痕迹可寻;

(8) 青铜业虽在小屯开始,但中国青铜文化,在小屯的这一面不是最早的;

(9) 文字同青铜业一样,在小屯的已是成熟的产品;

(10) 车战,继青铜业俱来;

(11) 城市宫殿建筑,同前;

(12) 以人殉葬,同前;

(13) 龟卜由骨卜进展出来;

(14) 石雕与骨雕代表太平洋沿岸艺术最早的作品。

上列的十四条文化成分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陆续在华北一带出现;史学家及大众的兴趣集中在它们是否中国的发明这一点。今就考古发现的事实,分别论列,再作进一步之分析。

(1) 以农业说,稻种与黍种最早的发现都在东亚,可能都开始在中国;但小麦虽在殷商时代已种植,在中亚与小亚细亚的发现更早于殷商三千年以上。甲骨文的"麥"与"來"同形;文字学家说这是小麦来自异域的证据。

(2) 家畜中的水牛可能原始于中国;其他的家畜如猪、羊、马、黄牛等可能是外来的,但尚难确定。这些家畜在西亚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要比华北早数千年。

(3)蚕桑业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开始的痕迹;这是早期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

(4) 陶业在中国早到何时,仍是待考的问题;但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有辉煌的发展。

(5) 骨卜与龟卜以在华北者最早。

(6) 青铜业在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一带,开始于公元前三千年前后;殷商的青铜业比两河流域至少要晚一千五百年;但殷商的青铜器之形制与作法,大半是中国的创造。

(7) 车战、人殉,都是西方的输入品。

(8) 装饰艺术,在殷商时代所发展的,完全属太平洋区域的传统。

(9) 文字的最早发明,也在两河流域,约公元前三千年前后。殷墟的甲骨文字,要晚一千五百年以上。甲骨文显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可以早到何时? 现在无答案。

上项的分析所得的结论可分三类:(1) 为中国本土发明的一类,可明白言定者为:A. 骨卜与龟卜;B. 稻黍以及水牛的驯服;C. 蚕桑的发现与发展;D. 青铜业中大部分的礼器与若干武器。(2) 显然是外来品或受外来影响者:A. 铸铜业;B. 车战;C. 以人殉葬;D. 小麦。(3) 尚难断定来源者:A. 水牛以外的若干家畜的豢养;B. 版筑的营造方法;C. 文字的开始;D. 陶业的开始;E. 埋葬风俗;F. 村落组织。

第三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现在无法说。可以预言的,科学家继续努力将使这些问题逐渐解决。就是第一、第二两类似乎已经解决的各问题,也要随着新的

发现逐渐改观。

科学的研究已能使史学家对于文化现象分别的处理,同时对于文化的本质也养成了一种新的看法。新的看法是,人类的文化只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各区域的发展,各代表这个整体的一面;每面的形成又赖其他方面的支持。中国民族性特点之一为能吸收其他区域文化之优点。我们的祖宗有不耻下问的风度,肯向别人请教,所以才能留给我们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追求中国文化的原始,不可忘了中国民族的这一性格。

1956年9月30日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

英国是进化论学说的老家。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件有关进化论的人造化石轻轻地欺骗了英国最前线的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他国在这几门科学的最高权威——欺骗了他们前后四十年。这一骗案出现在英国本土,人造的化石是百分之百的英国制造。案正式开始在1913年,正式结束在1953年;前后恰为四十年。案情大致如下:

1913年出版的《伦敦地质学会季刊》,载了下译的一段科学新闻:

> 若干年前(1908年),我在皮尔当附近的农场散步,看见补修路面的石子中,有甚为别致的棕色燧石,是在附近区域所不常见的。但探寻的结果,知道这些石子,就是从这一农场地面下的砾石层中掘出;这使我甚感惊异。不久我就追踪到出这种石子的地方访察了一次,正碰见两个工人在掘石子铺路。发掘的地点,北出所知道的燧石矿层边界约四英里。此一发见鼓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因此就作了一番更切近的考察。我问作工的人们曾否看见过骨殖或化石一类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注意到。我乃拜托他们;假如有这一类的发现,把它们妥为保存。以后常往访问,有一次一位工人就递给了我一小块很厚的、属于人的颅顶骨;随着我就在当地搜寻了一次,没有收获,工人们也没有看见另外的骨头。……以后又陆续访问了好些回,再也没听到新发现。此处的地层,似乎不出什么化石。好几年后,1911年的秋天,再游这一地方,我在那雨水冲刷过的,翻过的砾石堆里,却检出来了一块较大的、属于(与头一次得到的颅顶骨)同一头骨的前额骨:包括一部分左眼眶上的眶上脊……。(译自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913, Vol, 69, pp. 117 - 又见 *Arthur Keith: Antiquity of Man*, 1925, Vol. Ⅱ. 491 转引)

上文的作者为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他是一位业余的古生物学家,本行

---

* 本文原载台北《现代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1957年)。曾收人《李济考古学术论文集》。

是法律。他酷好古生物学，对于地质学、考古学更有兴趣。根据上述的及继续的发现，道森氏的老友、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古生物学主任研究员斯密士·伍德瓦德(Smith Woodward),把人骨的部分作了一次彻底的检察：全部资料包括九碎块头顶骨，一残块下颚骨。头顶骨最不寻常的部分是那特大的厚度——八至十二公厘；残阙的下颚骨仍带有第一、第二臼齿；它的形状、大小,肌肉生根处的纠结与沟脊,全形的曲度及结构——这些形态都个别地加了详细的研究。伍德瓦德的结论是：

> 头顶骨重要处皆是人形。下颚骨似属于一个猿的；所具有的一切形态，除了臼齿外，没有可以列入人形的(J.S.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p.5)。

这一初步结论的含义,最重要的而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化石人所代表的品种：头顶已取得人形,但仍传有猿形的若干痕记;下颚虽保持完全的猿形,所装载的大牙却表现了人式的咀嚼磨擦面。这一介乎人、猿之间的体形凑合,恰恰地暗符了主持进化论学者的一种长期的愿望。猿与人之间,似乎必须出现此一体形,方能充实生物进化论的理想论证。因此,当时英国自然科学界的重镇,除了大卫·瓦特斯顿(David Waterston)外,如伊里的·斯密士(Ellit Smith)、阿瑟·吉士(Arthur Keith)、杜克威士(W.L.H.Duckworth)、梭拉斯(W.J.Sollas)等,都很热烈地欢迎了这一新人形种属;伍德瓦德命名的"道森氏·晓人"遂正式排入人类宗祠里的祖宗灵位了。

配合了并加强了这一初步结论其他的论证,为古生物的、地质的,以及考古的若干观察与发现;这些发现大半都由道森氏得来,它们奠定了晓人(俗名:皮尔当人)的年岁计算的基础;属于这两门的主要证据为：

(1) 地质方面的:出晓人的地层,在砾石层的最下面,砾石层是更新统冰川时代冲积成的。

(2) 古生物的标本有河马、鹿、獭、马骨;又有更老的古象及犀牛的遗存;有些化石,道森认为与晓人同时,有些,也许比晓人更早。

(3) 考古学的证据为若干早期的旧石器及更老的晓石器出现,并有一件古象的腿骨制成的骨器。

但是,自从道森于1916年去世后,别的科学家在这一地方的搜寻,都失败了;直到1950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在皮尔当附近一砾石台地进行,移动了成吨的土方,所有的土方均经铁筛滤过,却没有寻出任何人工遗存或化石。

自1913年后,四十年间,讲进化论的书籍论文中,道森氏·晓人所占的地位,比出土较早的爪哇猿人,引起了更大的注意;因为大多数的权威学者都承认晓人的时代在更新统的早期,而他的脑容量已发展到与现代人相等——1358立方公分(参阅E.A.Hooton, *Up from the Ape*, p.309,1049);认为同出土的石器与骨器,证明晓人已经有了文化。这几点,在这一个时期构成了人类学家一般的信仰了。虽说是与头骨相配的下颚

骨不断地使专门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对于晓人在进化论的地位并没发生摇动。例如,以研究北京人出名的魏敦瑞博士(Dr. Franz Weidenreich)在1945年对此表示过一次意见,他说:

> 自从皮尔当人发现以后,凡是所知道的与早期人类有关的事实,均证明"人"不可能有一个带着猿形下颚骨的老祖宗;……发现的事实却是相反的;人形的下颚骨与人形的牙齿配合在保持着猿形品质的头骨下,却是常有的。(Franz,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 1945, pp. 22–23)

但在1946年改版的《由猿上堕》(*Up from the Ape*)一书中,哈佛大学的虎藤教授(F. A. Hooton)仍坚信英国学者复原的晓人是没有重大错误的;该书第311页有一段此类的辩论,今节译如下:

> ……有些人以为皮尔当人的头骨与下颚骨原属于两种不同的动物:下颚是猩猩的或黑猩猩的,头盖骨是人的。这是根据着一种错误的人类进化观念得出的结论。进化并不是一个机体的各部分之平均发展:它是跳动的,不对称的演变。人的身体,有些部分,如上肢,仍保持着爬虫的形态;别的部分,如下肢,在演化中却很快地变了形:适应新的环境,发生新的功能。人的身体好像一座常加革新的古老房屋似的,有些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全改革了,有的扩大了,有的装了电灯,加了抽水马桶,有的保持原样……

虎藤教授如此比喻人类的身体,大致是不错的;但是用在头盖骨与下颚骨的部分却不十分适当。不过这一说法足可代表英美的人类学家大多数的意见。除了少数的专家外,道森氏·晓人在1946年前后所享受的信托仍有点像华盛顿发行的美国钞票一样。

事情的转变开始于1948年。

1948年10月,古生物学家用以测量古生物化石年代的新方法——氟量测验(Fluorine Test)——第一次用到皮尔当发现的化石人骨上。以氟量测验法断定化石年代在法国开始较早;这一实验的根据为埋在地下的骨骼吸收地下氟质的情状:埋藏年岁愈久,骨殖内吸收的氟量愈多。法国的矿学家加诺氏(Carnot)就他研究所得,曾编成一表如下:

埋藏时	所含氟量平均数
近　代	千分之三
更新统	百分之一·五
第三纪	百分之二·三
中生代	百分之三·四
古生代	百分之三·七

(上表见:Ruth Moore: *Man, Time and Fossils*, P. 306, 1954。)

继续的实验证明这一现象大有区域的差异:埋在地下的生物骨殖吸收氟质的多

寡，要看所在地氟质的储量：储量多，吸收就多；储量少，吸收亦少。此外又要看各种骨殖在地下的结合状态。有的利于此项吸收，吸收率快；不利于此项吸收的，吸收率亦递减。因此单独靠化石中所吸氟量，并不能断定它的相对的年龄。但是，出于同一地点埋藏情形相似的化石，氟量与结合状态既无差异，若是有时代的不同，这一不同的程度即可由各标本所包含的氟量检定出来。与最后这一点有关实验的完成，大半是英国的地质人类学家峨克莱博士(Dr. K. P. Oakley)的工作。

峨克莱的实验成功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负责人乃允许他检查道森氏·晓人各化石标本包含的氟量。由此一检查所得的发现，最重要者可以分两层说。

(1) 晓人的头顶骨与晓人的下颚骨所吸收的氟量完全不等。不但如此，两部分的骨殖所含的其他化学成分如氮气(N)、碳素(C)、水分、硫酸盐等，互相比较，均相差甚大。这些成分在枯骨中的含量都具有时代的意义。根据这几方面检查的结果论断，认为是晓人下颚骨的时代与新近埋在地下的骨殖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分别；头顶骨的部分所含的各种化学成分，只能与新石器时代埋藏的生物骨骼相比。由此计算，四十年来在各种书刊中习常看见的现代人类的最早祖先晓人的面貌，所根据的复原资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两种的时代都不能到达如道森氏及英国的几位大权威所标榜的岁数。

(2) 再从别的方面检查晓人的头顶骨部分，更发现这一部分是陆陆续续地杂凑起来的一件赝品；道森的关于这些骨块的报道几乎无一可信。新的检查发现了：甲. 出晓人的顶盖骨之砾石层，经过几次重掘，没有独立地出现过任何化石；砾石层内的化学状况，并不宜保存骨殖。乙. 头顶骨的氟量虽比下颚骨的较高；但若照一般所估计的年岁，所在的砾石层可以供给的氟量应远比所包含者多多。丙. 头顶骨的颜色曾经人工加以铁质颜色的涂抹。丁. 道森氏自己的记录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证明，他检取的这些骨块是由没有经过搅乱的地层掘得的。戊. 与晓人的头顶骨含有同量氟质的河马化石，亦经证明由他处搬来，表面加了有铁与克罗米成分的颜料涂抹；所以决不是皮尔当地方的原藏。

(以上两段参阅 J. S. 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pp. 189－205)

自从1953年11月，克拉克、魏纳、峨克莱三氏的联合报告发表后，晓人的案件可以说告了一个结束；这一报告澄清了四十年来讨论人类进化问题一层最大的障碍。这一伪件——一具假古董之王，所糟蹋的全世界知识阶级的精力与时间是一种无法计算的损失。作者的业师，哈佛大学的教授虎藤先生，由于他早年所受的牛津大学的教育，向来是笃信晓人真实性的一位纯挚的科学家。晓人的伪装揭晓时，他尚健在。当时有一位报馆的记者去访问他的意见，只得了他一句话。他说："这好像有人向我报告，美

国通行的华盛顿发行的钞票是假造的!"作者1954年访问剑桥时,他老先生已归道山,就没得机会与他谈此案件。那时有的同学告诉作者,虎藤先生的逝世,与这一案件有些关系;他为这一事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极大,这是上了年岁的人难加支持的一件事。

这一件假古董之王的出现,照已经揭穿的事实看来,确实经过了一番最缜密的布置与计划,所以能把当代若干最有经验的科学头脑哄骗了四十年;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了。不过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骗案;这一案的经过实在可以给予从事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工作的人们几种严厉的教训。现在可以从三方面讨论此案的教训:(1)此案的造成以及取信一时的原因;(2)所引起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的问题;(3)可以供史学家参考的地方。

一、晓人案的造成以及取信一时的原因

魏纳氏分析此案的经过,以为这一伪装的人类祖先所以得到初期成功最大的原因,是那时的科学界对于人类早期的发展留存在地下的证据有一种期待。这一期待因爪哇猿人的发现而更加强。二十世纪的初期,英国的生物界都熟悉达尔文、赫胥黎诸先进对于早期人类的可能形态说的预言,一旦真有近似这形态的化石人出现,真要使研究人类原始的科学家喜欢得手舞足蹈了。于是迫不及待地,不管他的籍贯族望门阀世系,大家都争前与他握手认亲。

阿塞·吉士说:

> 迟早我们总要发现像皮尔当人这一种人的,自从达尔文后,这是人类学家信仰中的一条信条(Arthur Keith: *Anitquity of Man*, 1925. p. 667)。

杜克威士说:

> 从解剖学上说,皮尔当人的头骨,把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们所期待的实现了(W. L. H. Duckworth: *In Discussion to Dawson and Woodward*, 1913, p. 149)。

梭拉斯说:

> 在道森氏·晓人的体质中,我们似乎实现了一种已经修到了人的智力,但尚没完全失去更早祖先所具的下颚骨及战斗犬齿的一位生灵(W. J. Sollas: *Ancient Hunters*, 1924, 3rd. cd.)。

伊里的·斯密士说:

> 晓人的脑内模是所发现的人脑型最原始的最像猿形的。

在这四位权威学者领导之下,关于晓人的科学意见差不多近于统一了。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如大卫·瓦特斯顿的见解因此就默默无闻。这四位大权威固然脱不了疏忽、

蔽于若干偏见的责任，但他们都是君子人，说的都是真话。* 同时主持这一喜剧的内幕人物——现在大家已共认是道森本人——他的手段确实高妙。譬如晓人复原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大半都由道森经手发现，但是他的记录既不完备，他很早就顾及到由他经手取得的此项资料的手续，可能引起外界的疑心。因此，他就把此组资料中几件极重要的项目，借重到场参观的另外一位科学家而问世。那时法国籍的德日进神甫——自民国十二年后，在中国工作了二十余年，对于远东区域古生物研究有极大贡献的一位卓越的古生物学家——正在英国进修，碰上了"晓人"的诞生典礼。对于这一重要"发现"，一位青年的古生物学者如德日进神甫当然要发生绝大的兴趣。得了道森的允许以后，并经他的邀请，德日进神甫在晓人出现的地带"发现"了：古象齿一件、E 字 606 号石器一件；并在 1913 年 8 月 30 日，发现了晓人的犬齿。最后的这一发现，是德日进神甫应道森氏的邀请而得到的；此一工作帮助他成了大名。但是最近重新检查的结果证明：古象齿是由非洲突尼斯(Tunisia)输入英国的标本；E 字 606 号石器，曾经涂过含有克罗米成分的颜色，也不是皮尔当本地的产品。至于那更重要的、点睛的发现——一枚犬齿，据过去的记录，伍德瓦德在晓人的犬齿出土六个月以前曾替它作了一个预测的模型，而德日进神甫的发现差不多与模型完全一样。伪犬齿的原形是一颗年轻的尚未长成的标本，但是外表的印痕却显示了广大的且紧迫的磨擦；这是与自然情形最相乖违的部分。所以，假手德日进神甫问世的三件与晓人有关的证据，已经证明件件是假——假件造好了，埋藏在皮尔当附近的地方再由造假的人约请他去表演一番发现的工作。这一幕戏剧演得如此精采，当时的科学界也就很容易地被瞒过了！

晓人享受的信誉，不但有早期进化论学说的支持，很显然地还有若干感情的成分在内。分析二十世纪初期世界学术的风气，英国没有疑问地是生物研究的中心。这一事实，英国科学家感觉得尤为敏锐。他们自己有此感觉，别国的科学家也尊重他们的这一感觉。晓人的出现，可以证明最大头脑的人类最早生在英国；换过来说，最早的英国人也是现代人类最早的祖先。这一有生物学根据的事件所给予英国人的下意识的满足，可以与"大英帝国国旗飘扬处太阳永不没落"所给予的是一样的。由此，大英帝国人之领导人群的地位可以说是由于生理的禀赋了。英国科学家接受晓人证据的轻易态度与过分的热烈，大半可以由潜伏在他们的下意识内的这一情绪解释。

---

* 在李济这篇文章发表三十三年后，1990 年 6 月 5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澳洲史学家郎罕姆(Ian Langham)和美国人类学家斯宾塞(Frank Spencer)都怀疑那位曾被李济称为"君子人"之一的阿塞·吉士是这一伪造案的主犯，并已发现一些确凿的证据。详情可参看余英时《〈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载《中国文化》杂志 1990 年 12 月版，第 3 期。——文集编者注

二、本案引起的原始资料之鉴定问题

“原始资料”可以说是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们所追求的第一对象;不少的成名的学者,成名的凭藉就靠着一批别人没有的资料。不过原始资料的价值,显然也是有等级的;等级类别的标准固然没有定说,它们的存在却可以由资料本身出现的情形与取得的手续看出。若将北京人与皮尔当人(即晓人)两件举世皆知的发现作一比较,专就出现的情形说,两组资料已有很大的分别。构成皮尔当人的形态及年岁的原始资料经过了最近的一次检查发表后,都知道是一件假古董,但在五年以前大家尚不信此说;因此这一名贵标本伪装的暴露,科学家都要归功于研究方法的进步——如氟量的检定。氮量的检定、X光线更精密的检查方法,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不过,要是回顾皮尔当人取得的手续,照考古学建立的标准说,这类资料的品质,尚够不上第三等的资格,因为(1)它们没有准确的出土的记录;(2)没有正面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实物与土层的直接关系;(3)第三者在该处发掘,不能证明所说的出土地层有出此类化石的可能。北京人的原始资料,从最早的一批起,即保有准确的田野记录;所出的大量化石,莫不有本有原,各有其原在地点及同层出品。故两组资料有关本身之报道,详略程度相差之距离甚远,其品质之高下亦可由此衡量。魏敦瑞所写关于北京人研究之报告,出版已逾十年,其资料之真实性与可靠性,无人提出疑问。

皮尔当人所以能成为一大骗案,若略加分析,作伪者之存心玩弄科学界尚是次义,只负一小部分责任;大半的责任实应由当时的几位权威学者担负,因为他们忽视了那时古生物学家及考古家已经建立的科学水准,忘记了皮尔当人这批资料甚低的品质及可靠性,他们所作的解释及推论都超过了逻辑的范围。照田野工作的习惯,像皮尔当人的复原所依据的几块碎骨用于拼凑工作,像斗七巧图似的,自无不可;但是用这些基础不稳定的复原标本,进一步地讨论人类进化的大问题,实在有欠斟酌。这类大问题的基础,只有第一等的原始资料方能负荷那建筑的重任。

所谓第一等资料者,若专就考古这门学问说,至少应该具有北京人那批资料的品质:为一有计划的发掘,有详细的地下情形之记录的资料。但是这一类资料虽是人人可以寻找的,并不是人人能有机会得到的,而田野工作很显然也只是少数人的专门职业。故考古家同别种科学家一样,在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地要采用品质庞杂的资料,其中大半是第二手或第三手货。这些二转三转的材料,却往往具有极高的品质,能否尽量发挥它们的内涵,就要看用的人的眼力了。此处可以举中国药材店的龙骨为例说明此一意义。

中国药材里有龙骨一味,照中医的想法可以治若干疑难病症,古生物学家对它们却另有一种意见。他们从药材店里储藏的龙骨中可以寻出非常重要的及非常有趣的古生物的原始资料,并可以找出古代人类的化石。北京人的发现,最早的朕兆就是从中药店所采的龙骨中露出来的。最近十余年香港的中药材店又出现了同等宝贵的类似资料。对于它们的鉴定工作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为实物本身;一为鉴定人的心理背景。实物本身(假定它确是真实可靠的),固具有不同等的科学价值,反映出来的意见所具的学术意义,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等级。同是龙骨,中医对于它的意见与古生物学家对于它的意见相比,完全是两个境界。古生物学家在龙骨中所能发现的学术资料又要看有关它们来源的记录而分等级,如下列各例:

(1) 来源不分明的:例,香港药材店里的巨人臼齿。

(2) 采集范围可以说明,地点不能确定:例,河套人的门牙。

(3) 有采集地点但地下情形不能说明:例,爪哇猿人。

(4) 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例,周口店的发掘品。

(5) 上项采集品中的新发见:例,北京人的头骨。

上列五例完全由它们的原在情形见于记录的而分等级,由此归纳出来的一个原则是:关于它们的身分可靠的记录愈多,所具的科学价值也愈高。故香港药材店的巨人臼齿,只能供形态的比较研究,河套人的门牙已有地域上的联系,可以用作进一步的推论了。若爪哇猿人,因为与若干其他的古生物有了亲切的关联,更具有一种对于猿人的生存时代讨论的根据。周口店的发掘记录,连北京人的文化阶段,都能加以确切的判断。

由此一比较可以看出原始资料的学术价值并不完全附丽于资料的本身,也不全靠工作者的搜寻能力;这里有些机遇的成分,可以促成若干资料在科学研究中的特别用处。但是,因为工作者的低能,头等的资料降为三等以至于完全无用的例却是太多了,太普遍了。一般地说来,所有古董商经手的古物都属于这一类的例。但古董商同药材商人一样,本是与学术无关的企业,是不能以学术标准苛责的。最可惋惜的还是以学术相标榜的一部分职业收藏家的若干习惯。譬如广泛地搜索有文字的器物(墓志铭)而毁坏无文字的器物(全部墓葬的内容),如高昌墓砖作者的行为,结果只是把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化成毫无价值的废物。

构成原始资料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在研究者的思想程序中寻找。搜集资料的人有一个问题在心中盘旋,碰见了一批东西,使他感觉到这批东西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这批东西对于他就发生价值了。要是这批东西未经人用过,它的价值将更加提高。由于知识阶级接受了进化论,古生物留在地下的骨骸都成为研究进化学说的资料,这些资料也就取得了学术的价值。对于进化论不感觉兴趣的人当然也

就看不出它们的学术价值,只把它们当作龙骨看待。不过这究竟只是这一问题的片面;资料的本身仍是构成资料价值的核心,也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颇有可以与实验室所得的资料相比处。以实验室的资料论,固然皆开始于实验者怀抱的问题、构思的计划,但其所追求的形象,要无客观性的存在,设计无论如何巧妙,实验是得不出结果的。实验室取得的资料,是人人在同一情形下可以复按的;若其是真,反对者不能使之永久湮没;若是不真,迷信者不能使之永不暴露;就是实验者自己的催眠,也不能长期欺骗自己。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内,资料的客观价值虽同样地存在,本身的性质与实验所得的却完全两样,一经毁灭即永久毁灭。皮尔当人的资料,若同北京人的一样,在战时失踪,他的真相就不会暴露了;他的真伪或将成一永久问题。不过这儿仍有一个限度:怀疑晓人的真实性,很早就存在若干科学家的心中;早期因为这一态度有违时代的风气,就没得发挥适当的作用。近三十余年,北京人、爪哇猿人以及南方人猿的新发现,证明初期人类进化所循的路线是一种与晓人所代表的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些新资料研究的结果使晓人这副嘴脸在理论上已渐渐地没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就是与晓人有关的原始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完全毁灭了,他的真面目不能用科学方法揭穿,他的地位与重量也要与时俱灭以至于无的。

三、可以供史学家参考的地方

将近三十年前,傅斯年先生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发了一个宏愿,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10页。民国17年10月刊印)。他在战前的努力都循着这一方向;不幸八年的抗战把他壮年的精力大半浪费在消极的方面,但他所建筑的这一基础直到现在仍为史学家所重视。经过了这一长期的考验,现在可以检讨一次他所许的这一宏愿的理论上的根据是否稳定了?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具有可以讨论的两层意义:第一层是问题应如何开始,第二层是资料如何搜求;两层的关联虽是密切,仍可分开讨论。生物学与地质学的一般背景及所包括的范围都没有区域的限制,若要把历史学以及语言学建设得和它们一样,意思是否要把传统的夷夏的界线与中西的界线完全取消?取消了这些疆界,代替的应该是什么?对于最后这一问的答案,可以说是全部人类文化史的背景。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建设中国的历史学,不但是一个新的观点,更是一个搜求历史资料的新路线。由这一看法到达的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是黄金,只要有人

拣。”这话并不是单就地质学的立场为地质学说话;他的话也是为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大众说的。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尧舜以后人类堕落的故事说,或当作周而复始的循环故事说,一部二十五史已说得淋漓尽致了!现代史学家可作的工作范围是很窄狭的;可用的资料也就大有限度。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就是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资料出来——由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到最完整的钟鼎彝器,由最落后的区域的陋俗到最崇高社会的礼节,由穷乡僻壤乡人的土语到最时髦社会的演说词——这些都成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

大部分的史学家现在已接受这一观点了,从这一方面搜求材料的结果已有若干成绩可以列举出来。譬如:民国十二年的时候,胡适之尚向顾颉刚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一册200页)现在没有人再说商朝是石器时代;因为从垃圾堆内寻找史料的工作人员已经寻出不少的确实可靠的商代青铜器。

废墟中蕴藏的固有黄金,但也不尽是黄金,这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应该以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有了这类工作经验的人们都知道:同是资料,而以亲眼看见的为更可信赖;同是看见的,又以自己找出来的更可鼓舞研究的兴趣。所以新史学的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资料与人接触之间,永远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面在人,一面在物。资料能否取得人的信赖,是物的品质问题;人肯不肯信托自己所见及所得的资料,是人的见解问题。两面接触的结果,经常有下列的四类可能:

甲. 资料是真的,人亦信是真的:如法国南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居延出土的汉简。

乙. 资料是真的,而人不信是真的:如章太炎之对甲骨文字。

丙. 资料是假的,而人信是真的:如1953年以前,人类学家之对晓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以前,中国读书人之对古文《尚书》。

丁. 资料是假的,人亦知道是假的:1953年以后的晓人,《尚书古文疏证》以后的古文《尚书》。

甲、丁两项可暂不论;乙、丙两项,不但引起纠纷,并且妨碍学术的进步。问题又回归到这类情形发生的最初阶段;这仍应该从资料的原始情形与取得手续说起。假定一批资料是真的,它能否取得人的信赖又要依靠另外的两个成分:(1)最真部分若是发表出来了,是否符合当时的风尚,以及研究者的思想习惯?(2)取得手续的巧拙及其安排。第二成分比较容易说明,今以甲骨文出土以后的历史为例:甲骨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章太炎,而能取信于现代的文字学家?因为章太炎所见的甲骨文是古董性质的;古董这类资料向来是有真有假。近代学人往往讥笑章氏的顽固;但就他不轻信罗

振玉传拓的甲骨文说,却甚近于科学家的态度。至于现代的文字学家相信甲骨文字的理由,也是容易说明的。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的资料,在地面下的情形、出土的情形以及出土以后的情形,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每一步的历程所保存的记录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互相校勘的。最要紧的证据自然是:殷商时代确有用龟甲兽骨贞卜并刻文字的这件事,而骨卜的起源远在商朝以前已有不少的实物可以证明。在这一情形下,真实资料之能取信于人似乎是必然的;至少就甲骨文出土的历史看,可以作此一判断。

学术的风气与研究者的思想习惯影响学术资料的命运也是很显然的一件事。假古董之行世并不完全起源于"存心欺骗"。作假是由仿效演变出来的;仿效实为艺术发展之初步现象;古董之成一种商品也就等于仿制品取得了经济的报酬;这一发展,没有任何学术的意味。摹仿的作品有时要超过原件,若专就艺术而论艺术,真假之间并无辨别的需要。若是当作历史资料用,辨伪的工作却是必要。辨伪完全是一件斗智的工作。为假古董所蒙混的,与其责骗人者之不道德,不如说受骗者之不细心。伪古文《尚书》之所以行世千余年,因为千余年的中国读书人不细心;晓人之受崇拜四十年,也是因为这一时代的大部分的生物学家,以及有关部门的科学家之不细心。

假古董的骗人虽为害甚烈,遇了细心的人把它揭穿,随时就可剔除。史学家最大的难题却在如何处理真材料。这一难题牵涉的方面很多,中心的事实是如此的:真的史料与哲学家追求的真理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无情的、不变的。它们的出现可以为时代风尚加注解,可以把个人的思想习惯纳入正轨;也可以讽刺当代的迷信,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细心人处理这些材料,若要把它们各作适当的安排,更需要一种职业上必具的胆量。故新史学家的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

现代史学界最前线的工作者所喜欢的一句口号为:"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这句口号喊久了,似乎尚需要重新界说一番。证据是否指所有的原始资料?要证的是什么?这真是史学界的大题目了。原始资料既可分成若干等级,可以作证据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要证的是什么,却是最可以使好问的工作者"辗转反侧"的了。要证过去有个黄金时代?要证将来有个大同世界?要证文化只有一个来源?要证民族只有一种优秀?要证天命有常?要证人类进步?这些,好多史学家都尝试过了,但都在材料本身中发现了矛盾。用作证据的资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为证明资料本身存在之真实性。史学家所有的工作企图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待证的问题,也许就随着解决了。这是史学家可以追求的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

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

同样的。

附注 本文前段所用资料，凡未个别注明出处者，皆根据魏纳氏《皮尔当伪件》一书（J.S.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19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特此申明。

1957年2月8日 台北

文化沙漠*

前些时,在一个意外的场合里,听了一群没考取大学的青年们,哼了一首1959年的民歌,开头的几句为:

有些人的儿女,在美国结婚;

有些人的儿女,在台湾当兵!

结婚的儿女们,快成美国人了;

当兵的儿女们,要回大陆去……

这几句唱使我有点神往;情不自禁地,就听下去了。我曾把这全首的词句抄录过一遍;不过,因为它们有些"不雅驯",我就不经意地,随便放在一个地方,没有再理会。连日收拾书籍,再也看不见这些字条;不知道丢到哪一个角落去了。

这首民歌开头的几句,却打动了我的心思。作了十余年的教书匠,养成了一种习惯:看见了学生们,就想到中国的命运。他们集体的思想、行为,与人生观似乎就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缩影。他们与中国的命运,中间的关系,不但有最大的分量,可以说是,绝对地不容忽视的。所触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可以暂从两方面提出。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施行中的高等教育,一般的倾向,是不是就包括在这首俚词的头四句?另一方面,较为复杂,但仍可如此地提出来:就是我们决定的对策与大众的信仰及希望说,似乎与我们在行为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相符。说得更具体点:譬如,大陆出来的人,都想再回大陆去;但是考察一般的情形,却并没有尽所有的力量,向这一个目的推进。是否我们咬着牙写在书面上的决定,有克服不了蕴藏在下意识里"本能的固执"之困难?我现在分别讨论它们。

先从留学生问题这一方面说起。最近看见了好几种报告,都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三千以上;但愿意回来,而真能回来的,到不了十分之一。准确的数字,甚难确定。不过,大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说是由台湾去的。这一大类,又可分为若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21卷第10期(1959年),转载于李济《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再版。

干小类:最紧要的一个小类,大概是得美国的奖金出洋的这一群。此外,有自费留学的,有公费送出去的,有各种基金会选拔的,有各机关特别资送的等等。若要作一个详细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品种。但在此处,却没有这个必要。此处我想讨论的,可以再分两点来说;第一点为:很显然的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最佳的出路,是出洋深造。这一现象的本身,又可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从教育制度说,大学毕业生,再想深造,必须出洋:至少证明在高等教育制度上,我们没有可以供给这些毕业生们深造的地方。自然,好些大学已设研究所了,并且都招有研究生了。不过这些研究所,似乎尚不能满足这些研究生的深造愿望;而在研究所执教的先生们,不但同意并且同情这些高级学生的愿望。所以这些研究生的最佳出路,还是出洋深造。学问之道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深造"也可以说是没有止境。学生们也就有永远"留洋"的理由。记得十年前初到台湾时,故台大校长傅孟真先生在研究院一次会议席上曾主张,在这一动荡时期,把学人尽量地送到外国去。他说:如此"储蓄"人才,可以保留"元气"。他的主张很快地发生了效力;第一个结果,就是迁到台湾的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差不多全部储到美国去了。

我提这件事的意思,是要指明:现在的留学生,留在美国不回来,是可以从教育上、哲学上,以及政治上,确实可以说出些甚为动听的道理。储蓄人才、深造学问——这是再体面不过的事了!但是,这一件事,只有如此简单的一个说法吗?我们现实一点说吧:十年来施行的高等教育所得的结果,已有使高等教育近于瘫痪的趋势。这是一种最客气的说法。这一原因在哪里?是否与留学生不回来有关系?最近看见了三位美国学者对于美国某团体作的一篇有关台湾教育文化的报告。他们都是治社会科学的人。他们说,就他们关心的几门学科说:

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

这一判断未免使台湾的读者有点刺耳。公平吗?我们当然可以问的。请大家注意,这几位学者所说的话,是根据他们自己在台湾长期调查所得的结论。他们并且对于这一现象,作了甚为详细的历史性的分析,举出了下列的理由说明这一沙漠形成的程序:

(1) 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作了教授;

(2) 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

(3) 教育界有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作任何长期打算;

(4) 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的受了限制;

(5) 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

他们对于青年的留学生不肯回来以及不肯回大学教书这一问题也分析得很详尽,

并且找出了下列理由：

(1) 台湾没有学术空气；

(2) 很少的，等于没有的，研究经费；

(3) 低到不能维持生活的薪水；

(4) 出国的限制；

(5) 与外界隔绝的恐惧。

他们举的这些理由，似乎有点过分地平凡；因为这些理由差不多是人人都知道，也是很多的人说过的。但是在台湾，虽说可以听到这些话，却没有人想到，我们知识界的表现，在旁观的人看来，只是一片沙漠。由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理由演变的结果——为一文化沙漠。这一联系，是这三位美国学者的新贡献，一种极有意义的贡献；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我们高等教育日趋瘫痪的缘故。

不过这三位学者究竟是外国人；把台湾的这一问题，只能分析到一半。因此他们提出来的补救办法，能否收效，仍要看着好些若干别种情形。就一个在台湾作了十年教书匠的经验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所以接近瘫痪的缘故，固然应该由好多外在的情形解释，如上文列举的；但是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应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观里寻找。

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纯粹知识——亦即现在所谓科学知识——是没有地位的。至少，"知识"只能算末流，在这一点，儒家与道家，差不多持有同样的见解。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可以说没有"知识即是德性"，更没有"知识即是力量"这些观念。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对于"德性"与"力量"的估价均甚高。而追求知识的人——假如有这种人的话——只能与一般的匠人并列。社会上盛行"教书匠"这一名词，就可以反应这一心理。在过去，作一个老师，大受尊敬，因为老师的基本责任是"传道"；所谓"道"者，可以说是与纯粹"知识"并无亲切的关系。现在的老师，是要传播知识的了——他们的地位，也就由"天地君亲师"的"师"一变而为"军公教"的"教"了。在这一情形下，他们在一般人的眼中，也就与各种工匠，绝对地没有什么分别。

提倡科学文化的先进诸君子，似乎对于"知识即是力量"没有作足够的宣传；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仍不相信"知识"可以发生力量。记得蒋廷黻博士前数年在台大讲演，以国家的力量为题，曾把"知识"的部门予以较高的估价，尤其是在国际战争的场合，他说：军备只能算一国全部力量一部分，而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一讲演，发生的作用并不甚大。

现在对于台湾文化沙漠的状态，与高等教育的瘫痪，不但政府筹不出适当改进办法，一般民众似乎也漠不关心。有远见的人们，只想把他们的儿女送出洋，送到美国去赚美钞，以至变成美国人；自己可以作"美国人的爸爸"(这是黎东方教授的名句)，在台湾享福。他们当然不愿儿女们回台湾的。如此再过十年，我们的大学也要关门了，或

者完全变了质！我的理由如下:老的教授渐渐地更老了,衰了,不能教书了,以至死了。他们教的徒弟,好一点的都出了洋,不愿回来,不能回来以至不准回来。我们渐渐地已经是不能维持一个最低的教学标准了;现在旁观的人已经说台湾是文化沙漠了。如此再演变下去,那就……？同在大学教书的朋友们,大概都可以证明,我这话绝没有说得过分。若是要挽回这一恶劣的趋势,并不是绝对地不能找出一个方案。基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性质,若没有清楚的认识,什么方案都是没用的。

“自由”的初意*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群己权界论》,在凡例中译者严复说:

> 中文自由(原译皆用繇代替由字),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由,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由。其字义训,本为最宽。……

这段话引起了若干重要的文字学问题:(1) 所谓“初义”应该是指“自由”这一词最早的、即开始为人用的意思。(2) 根据第(1)项假定,问题就转到,这一词的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若把构成这一词的两个字分开考证,它们各有不同的经历。“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最初完全是一个像人的鼻形,象形字,但见于甲骨文的“自”字,虽都像人鼻的样子,大部分所用的意思却当从或当由讲。至于“由”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竟没把它收入,不过这个字在汉朝以前早已出现,是文字学家所默认的事实。治《说文》及说经的专家为这件事聚讼了很久;到了王国维,这一问题才算得了一个结论。照王观堂的考证,“由”字也是原始于一个象形字,像一个器物形的字;渐次地,经过了许多音变、形变,就衍化成了“由”字的。

把这两个字联合在一块儿当一个词用,不但是文字学上的一件大事,也表现了思想上一个重要的新动态,这件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王应麟在南宋时代算是最淹博的一位读书人了。在他的时候,“自由”一词,已是通行的俗语。他在《困学纪闻》(卷十九)里说:“自由出五行志。”

这是引《后汉书》的“五行志”。原文如下:

> 建武元年,赤眉贼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刘盆子为天子。然崇等视之如小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19卷第4期(1968年)。

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后正旦至，君臣欲共飨；既坐，群臣更起，乱不可整……。

诸桥辙次又在《后汉书》的"阎皇后纪"找了一条：

……于是景为卫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

以上所引两条，可以说是"自由"一词，见于中国文字最早的记载，这两条都出于《后汉书》。《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公元第五世纪的人。他是否铸造这一词的原始人，自然仍是一个问题，因为范氏的《后汉书》是根据好些更老的史料和实录写的；很显然地，不但大部分的名词，也许很多篇章的全部都是誊录旧文，如班固之抄司马迁一样。此外，流传下来的"五行志"是否范氏的手笔仍旧是一个疑问。

不过我们知道，范蔚宗是提倡"以文传意"的一位史学家；他曾自述作文的甘苦，云："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匈怀……。"他自己对于这部书的评语，认为是"体大而思精"的一部著作。一千四百余年后，王先谦说他的这本书"……比类精审，属词丽密，极才人之能事，虽文体不免随时，而学识几于迈古矣……"。

我引了范蔚宗和王先谦的这些话语，只是要证明：见于《后汉书》的两处的"自由"字样，为范氏所创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后，自由一词就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唐朝的几位大家，如杜工部、柳河东、白香山等都曾用过它，也把它所代表的意思渐渐地净化了并注入了宗教中的"无挂碍"、"无拘束"所指的一种精神上的境界。到了宋朝，自由一词已成为俗语；这是否与佛教的流行有关，却是极值得研究的一个思想史上的问题。

所以严幾道说自由的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把"放诞"、"恣睢"、"无忌惮"这些"劣义"认为"是后起附属之诂"，显然是把这一名词在中国文字中的生命史读颠倒了。第五世纪范蔚宗所描写的樊崇逢安等的"自由"，以及阎氏兄弟们作威作福的自由，恰恰符合严幾道所说的劣义的自由；到了盛唐晚唐时代，杜甫、柳宗元、白香山等歌颂的"自由"，方才得了"不为外物拘牵"的意思。若我们找不出比《后汉书》写作时代更早的证据，"自由"的初义，只能以樊崇逢安以及阎氏兄弟所享受的作例来解释了。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

——考古琐谈之一

1930年6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古物保存法》共十四条;兹就第一条、第七条、第十三条所引起的问题先谈。

第一条对"古物"有一广泛的界说。原文所列的古物,系指与(1)考古学、(2)历史学、(3)古生物学及(4)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其范围及种类,照原条文,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定之。

第七条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

第十三条为关于古物流通之限制;原文:"古物之流通以国内为限。但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因研究之必要,须派员携往国外研究时,应呈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出境护照。……"

"古物"一词,在中国语言文字中,虽说是习用已久,但国家为"古物"制定专法保护,这却是第一次,所以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以及负行政责任的人对这一名词所包括的范围有一种更精密的界说之需要和实际要求。

保存法第一条所列举的范围自然是很清楚的,但却并不能满足这一实际的需要。1936年,本法颁布后的第六年,上海市总商会,曾为古玩业同业公会,呈请财政部代向政府当局请愿,内云:

> ……江海关布告部令,对于限制古物出口,并无具体标准,一旦实行,同业势必陷于绝境……

这一请愿,即时得到政府的慎重考虑,很快地就由财政部转内政部交给主管这一事务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查。当时参与这一审查案件的专家们,大概尚记得这一经过。讨论的集中点有三:一为古物的年岁问题;二为古物保存的价值;三为是否愈古的器物,保存的价值愈大?

就古物的年岁说,当时的讨论曾得到两种建议,但都没有被多数采纳。一部分的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19卷第5期(1968年)。

意见可以说是根据"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观念发展出来的：即，凡是人造的器物，超过了它制作时代一个固定的年限——五十年、一百年或五百年，由本会标定——即算是古物。以书籍为例，委员会可以定：凡是五十年以前出版的书——或更短、更长——都算古书。

另一意见，更为简便，即选一固定年月，作为"古物"年岁的下限：如辛亥革命或庚子之变；以公元计算也可以——凡是在这一固定年限以前的器物，都当作古物看待。

建议以上两条意见作审查"古物"的范围，讨论时大半用书籍为例，说明每一意见的适当或不适当。这自然是因为书籍不但是"文化有关"的古物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它的年岁也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但是谈到其他的器物上，两种意见适用的程度就显然大有限制。保存法第七条已有"埋藏在地下……之古物"的一个范畴，要是把古物的年岁作一个肯定的界划，所有旧家的祖坟，若是埋葬时期超过了"古物"规定的年岁，即成为国有的财产了！

而且，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古物，保存的价值实在难以年岁的长短作估计的标准。试看林白上校第一次飞越大西洋所乘的飞机——圣路易精神号——当年即成了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的天字第一号的古物了！以中国说，凡是孙中山先生生平接触过的东西，岂不都是我们应该保存的古物。所以当时审查到结束阶段时，大家都同意，问题的核心，不单在古物的年岁，而是：什么是值得保存的东西？理论上，这一课题可以构成学院中永久讨论而不必即时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古物保存法颁布以后，"古物"成了海关人员每日要处理的事件中常见的项目；若没有一个标准作凭藉，禁止出口的命令，显然就无法执行了。1936年解决的办法如下：

> 公布之古物范围大纲，立意原在概括，冀免挂漏而防流弊。若仅就现今研究之范围，而规定具体标准，似仍难周详而适用。审议结果，拟请免予拟订。惟为便利商民起见，嗣后凡各地古物，欲运出国境者，拟准由起运人，于起运之前，先行呈经本会委托专家或学术机关鉴定，核给准可证明文件，一面由本会函知财政部饬关验放……。

所以"什么是值得保存的古物？"照这一文件说，要靠专家或学术机关审查的意见。上项法令解释、施行了约有一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敦煌学的今昔*

——考古琐谈之二

若是古物的保存价值，要完全靠着专家或学术机关的意见，包含在这条文内的，就有一则大前提的存在之假定。这一假定为：公家经常对于这一类的机关和专家能维持它们的继续存在。

不过，一般地说来，学术机关和专家们的兴衰存亡，与大城市内设置的动物园和园内饲养的珍禽奇兽一样，在群众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这一路的发展固然由于历史的趋势使然，但也有若干人为的成分在内。我们试以敦煌学的今昔为例，说一说中国古物的伤心史。

敦煌千佛洞石窟寺宝藏的发现之经过，似乎应该是中国学术界熟悉之事，但实际上谈此事的人们大半得之传闻；传闻中又以不正确者居多。斯坦因串通王道士盗取敦煌经卷之经过，已由斯坦因本人记录，中文本发表在向达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内（1936年，中华书局）；这是抗战时期学术界所普遍知道的一部讲西北边疆历史的书。但是这本书在台湾的书肆中却早已绝迹。数日前，笔者曾亲自到中华书局访问，台北中华书局门市部的人，似乎对于这一书名，也感觉得陌生。以台北现在翻印大量绝版书的风气论，这部书不为人注意自然是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一需要。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十余年前即在他的馆内特辟一室，邀请到过敦煌的罗吉眉先生和夫人，在室内的周壁复制了一部分千佛洞的壁画。这一有意义的陈列，可以说是在台北市的无数展览中，最富有历史教育价值的了。但是，受到这一展览的感染，而想对敦煌学作研究的，有人没有？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由下述的一段经历推知一二。数年前，故蒋廷黻博士于回台述职之便，邀请了一部分对历史学有兴趣的朋友商谈编辑中国通史的计划。来会的人们，屈指一算，竟找不出愿意主持编辑两汉晋南北朝唐宋时代的一位编辑人；因为大家想象中的这样一位史学家，必须是对于敦煌学有相当修养的学者。而在台湾以及与之有来往的学人中，敦煌学是不能吸引他们的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19卷第6期（1968年）。

兴趣的！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往北平；所长傅孟真先生对于敦煌学颇想做些推进的工作；他就敦请陈援庵先生将他正在编辑中的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经目录赶快完成付印：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列为史语所的专刊第四种。《敦煌劫余录》的扉页第二面，并附有一英文名称如下：

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这一英文名称，若译回中文，应为：《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手抄卷的分析目录表》。

为什么同一部书的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不一致呢？这问题不但需要解答，提出来的答案且需要些注释。中文名称中的"劫余"二字，意思似乎是很明显，实在并不太清楚。说这两字的意思很明显，因为陈寅恪在他的序文中提到："……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所以"劫余录"的书名，只是"寄愤慨之思"的意思。但陈寅恪实在并不以此说为然。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的主意，而不是新会陈先生的原意。

这部书的中西不对照的名称，也曾引起了些国际误会。那时欧洲的汉学泰斗为法国的伯希和教授；他就是《敦煌劫余录》的作者陈援庵在序中所指的"……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的伯希和。他看到这书的中文名称用了"劫余"两字，感觉有些别扭，虽然发不出大脾气，却也在他所编的通报上，作了小小的抗议。

表面上，这只能算是一种"茶杯里的风波"。那时的中国学术界，因为伯希和在敦煌学的发展上，实有创导发扬的业绩，不像普通传教士的空口讲汉学似的，所以对于他抱有很深的敬意。

同时，他大概也渐渐地了解了，敦煌劫余录所指的劫盗行为，实包括敦煌所遭的无量数"劫"的总数。

敦煌所藏的卷子，照各处所知道的统计起来，远超过了20 000卷。20 000余卷中，有将近9 000卷的数目，运往北平：即《敦煌劫余录》所编目录之内容。准确数目为8 679卷。陈援庵说：

> ……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今藏北平图书馆……。顾何以十之九九为佛经，则以国人研究古物，只能于有文字处求之，其无文字而为图像器物之属，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汉文，而为中亚古代语言，亦不贵也。国人所贵

者，汉文古写本；然汉文古写本为人所同贵，故佛经以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遗者又沿途为黠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只此也。……

以上一段文字，见援庵居士为《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原序；它的价值，除了为一种正确的历史记录之外，同时也代表了，在古物保存法颁布以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古物的一般看法，以及中国传统中所讲习的古器物学评价的标准。文中所说的“捷者先得”以及“黠者巧取”的情形，在向达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有较详的记录：

……1914年，我率领第三次探险队到敦煌……得知京城命令实施时，可痛可惨的情状……整捆所藏的写本，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问的！(第149页)。

这段文字的口气，可以证明，斯坦因同伯希和一样，在他们心中，他们到敦煌取经，不但不是“劫取”，而且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中国京师命令下的官吏们的行为，对于原藏在敦煌(千佛洞石窟)的这批宝藏，却真奖励了若干实际的劫盗例！

1937年，笔者在伦敦遇见了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向达先生；他到英国游学最大的目标，为读斯坦因运到伦敦的敦煌卷子。这些卷子都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并不完全公开；中国学者要求阅读，必须办很多手续，消耗大量的时间。向达想读的卷子，究竟看到了多少，不得而知。他对于敦煌学的造诣，在中国学术界内，是“预于此流”的学者所共同称道的。抗战时期，西北一带成为后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亦甚方便，那时有若干学术团体赴玉门关一带考察，顺道访问了敦煌。虽说观光的事业，未必带有很多的学术意味，学术团体利用这一机会作些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可能的。敦煌研究所就是在此时成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同时也有不少的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收藏家访问了这一艺术圣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劳榦、石璋如两先生，都是在这一时期，远游敦煌，作了学术的访问。

最可惜的是抗战时代发扬的敦煌学风气，虽曾带到东南宝岛来，但并未能发展下去。如今，这些到过敦煌并迁到台湾的学者，大半都已散在国外了。敦煌学的课程，在台大文学院已经不能不停开了。

1957年，朱骝先先生告诉笔者，日本的东洋文库，摄有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斯坦因的全部敦煌文件的显微影片，他嘱史语所洽购一份复制的照片，这一部复制的敦煌卷子照片的代价，为日金3 671 480元，折合美金10 198.56元，实为史语所历年来在图书项下付出的最大的一笔开支。这一庞大的开支，若无骝先院长的大力支持，绝不是史语所所能担任的。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若干年来，这部文献，维持了剩余在台北学术界不绝若缕的敦煌学兴趣。

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

——考古琐谈之三

民国初年，余杭章太炎先生所享受的盛名，不但是一代文宗，并且为全国学术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当袁世凯作皇帝梦的时候，他的策士们替他计划的所以安抚学术界的办法，就是邀请章太炎到北平去讲佛经。此计虽未行成，这件事实却可以证明章氏在那一时代中国学术界所占的地位及统治阶级对于他的仰仗。

章氏的经学、小学（以及佛学）留传到现在的，似乎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有关他的若干传说，有两种为一般人晓得较多一点：(1) 与革命有关的轶事；(2) 他认为刘鹗、罗振玉拓印的甲骨文为假古董。

他不信甲骨文为殷商时代的文字，所举的理由最重要者，有下列的一条：

> ……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照乘之宝、瑹珌之削、馀蚳之贝，今无有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上·理惑论》第50页，原文无标点）。

这一段文字，要是现在大学的学生读了，遇有手勤的人，查查字典和类书，也许尚能读得懂；但是读懂了，所说的理由可以服人吗？"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这话若可信，岂不把古生物学全部科学的大前提都否定了吗？

我们必须记着，章氏写这段文章是在民国的初期，若以民国元年为一定点计算，距离那位荷兰医生杜布瓦(Eugene Dubois)在爪哇发现第一个猿人头骨已经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了；这一轰动了欧美科学界二十年以上的大新闻，显然没有冲入中国学术界内。那时，地球上出现的人类骸骨，入土过万年以上的，已可以成打计数了！至于"化石人"的年岁更可以追溯到数十万年前去。

本来地质学、古生物学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已是发展很快的两门科学，这正是中国的大陆开始感受"西方文明"压迫的时候。不过这两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开始了很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19卷第8期(1968年)。

久,世界打过了一次大战,才算到了中国。

中国人对于地质学之发生兴趣,最初的动机是由于要富国强兵,要调查煤矿、铁矿。由调查矿产到调查一般地质——这一长段经过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开始最重要的一页历史,这是另外的一件事,不在此谈。

此处要讲的为由地质调查到古生物研究所引起的与考古有关的问题。

葛利普(A. W. Grabau)教授在中国地质学界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名字。他可以说是与中国这段历史关系最切近的一位科学家。他在中国不但创造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风气,实质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训练了一批作现代科学研究的人才。他对于考古学,也具有极大的兴趣;他是鼓励这路研究的最热心的赞助人,也供给了不少理论。最富于刺激性的,为他及他的一群朋友所设想的人类原始于中央亚细亚的说法(这一说法,已成为过去。但在1930年的前后,仍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说)。

这一说法的事实根据,在喜马拉雅山山脉年龄的估计。地质学家计算现代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说这山脉最后一次向上升高2000米的时代,照地质年龄的计算,实在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更新统开始以后,最多不过100万年左右。

连带着高升的,为附近的若干山脉以及西藏高原。这一高大屏障的形成,把印度洋一带的热空气所挟的大量水分,完全隔断,印度洋的季节风就吹不到喜马拉雅山以北以东的方向。于是中亚,包括青海、新疆以及蒙古一带渐渐地由原来的森林化为草原,变成沙漠。

葛利普氏认为这一地壳运动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现代人类的诞生。因为森林的衰落,原居住在树上的猿猴被迫下地谋生,人的直立姿态,得以完成。心灵生活,由此开始。这一转变发生的地点,照这一学说,就在中央亚细亚邻近的地方。最直接的证据为喜马拉雅山最后上升的年代,恰与生物学家所推想的现代人类的诞生的时代相符。

葛利普这种说法,也是根据许多专家的意见综合起来的结论;它只能代表地质学家对于亚洲中部地形形成所作的很多解释中之一种。他采纳了这一类说法,即引起了若干方面的注意,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为地质调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学家,所接触的原始资料及田野工作人员,比其他的欧美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研究此一问题者,更为切实,所以比较地更为可靠。第二他所谈的人类起源问题,正值全世界学术界对于爪哇猿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人类发源的地点所在这一问题,当然也就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于葛利普开始在北平作古生物研究时期,花了大量的金钱,组织了数次科学远征队,到蒙古、新疆一带,采集地质学、古生物学资料,以追溯人类的起源。队长安笃思善于宣传,所以远征队的工作常有通俗文章在《亚细亚》杂志发表,

引起了科学家很大的兴趣。

此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设置未久。由于创办人的远见，所内的工作除了作实际调查外，并建立了很正确的研究基础。邀请葛利普到北平主持古生物学的室内工作，以及改组北大的地质系，都是在这一时期所作的事情。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科学远征队队长安笃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科学家，但远征队的工作范围始终没扩张到华北。这并非他原来不想如此作，而是新兴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把这位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挡了驾。安笃思募集了大量金钱，号召了很多专门人才，到亚洲来寻找人类的原始遗存；但他所得的结果，最足夸耀的为一窝恐龙的蛋。与人类原始最有关系的“北京人”的发现及研究，却被在北京组织的新生代研究室有计划地完成了。

这不是一件平淡的故事。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民间的外交，最成功的，常常是世间知道最少的。这一类成功的基础，总是在实际的工作，决不靠虚伪，或夸张的宣传。安笃思所领的工作队没把寻求人类原始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华北，基本的原因，就是地质调查所已经在这一区域进行古生物的科学研究，且有了很好的成绩。

这些研究的成绩为北京人的发现奠了两块基石：科学的和法律的。华北的学术界受了这一感染，开始对于“化石”的价值有了真切的认识，对于“古董”的时代，扩大到了万倍以上。开始的期间，这种观念的转变，只限于少数有专门知识的人们。这些少数人的知识，却发生了实效。故周口店的发掘，经费和专门技术以及科学的指导，虽都来自国外，发现的标本，却保存在中国，研究工作亦在中国进行。这一合作条件的取得，早在古物保存法颁布以前。保存法将“古生物”纳入保存范围之内，很显然的，是受了新生代研究室与洛氏基金会所订合同的影响。

若是现在仍有人要说“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这一类的话，周口店出土的大量变成化石的骸骨，就是否定这一愚而诬的胡说最有力的实证。

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

——考古琐谈之四

乾隆皇帝有多少牙?

当孙殿英劫盗乾隆、慈禧陵墓的消息揭开后,这件事不但引起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愤怒;那时的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强盗行为,也认为是北洋军阀的横暴、愚昧已经到了最后的、不能再欺骗老百姓的一个阶段了。参加这件善后工作的人,有不少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关于惩罚孙殿英这一劫盗行为的事,似乎仍是照例的,“以不了了之”,没有清楚的下落。关于清理劫余的陵墓工作,也没有看见过一份正式的报告发表。不过有机会参加这一清理工作的学术界人士们,在不同的场合中曾经透露过若干侧面的消息。

笔者在南京时,曾听过一位学术界的前辈谈到他所眼见的几件事情,他是一位极受收藏家、鉴赏家及目录学家尊敬的老学人。他的博闻强记,是他同时的朋友及晚一辈的后学所共同钦佩的;他参加过处理孙殿英将军盗掘清陵的善后工作。谈起这件事,他总是带些严肃的态度。最引起笔者个人兴趣的,为他所说的乾隆的尸骨。这位老先生曾抚摸过乾隆的头骨,这一经验在他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笔者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这更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心,就有以下的对话:

笔者问:“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尚有多少?”

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保存得很整齐。”

笔者感觉到了些惊异,就说:“这不可能吧?”他有点误会了,他说:“绝对的,没有错误,我曾数过。”但是,笔者向他解释,说:“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一切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有 40 枚牙的呀!”

老先生有点惶惑了;他说:“我确实曾数过。”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 19 卷第 10 期(1968 年)。

笔者告诉他："这是不必辩论的；因为灵长目各科属动物，所具的牙齿数目，已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人类的牙——若是正常发展的——自从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32枚的。一般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只在28枚至32枚之间。因为烹饪术的进步，人的第三臼齿，即上、下两边最后的一个大牙，往往是长不出来的。"

老先生显然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话就没说下去了。但是，他心中似乎仍不相信，他会把乾隆的牙数错了。

"北京人"发现的第一条新闻

在古老的北京城内，1926年10月至11月间，瑞典的王储——即现在的瑞典王陛下，访问中国的时候，北京的学术界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庆祝他的访问。这位贵宾是一位非常喜爱考古学的学人。在这一欢迎会中，他与北京的一群考古家、历史学者(有梁启超在内，任欢迎会主席)、古生物学家讨论了有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欢迎会将终结时，代表瑞典学术界的安特生博士宣布了一条很重要的科学新闻。他说：在瑞典的一座古生物研究所内，韦曼教授所检查的北京周口店的化石中，发现了原始人形的牙齿。这些化石的年代，照这些专家检查的意见，至少是在三十万年以上。这是有关北京人发现的第一条新闻。这一科学研究所根据的原始资料，为中国数千年来，在药材店可以买到的用作治病的龙骨。但在现代古生物学家的眼中看来，这些龙骨中就有若干人类的骨骸。人类骨骸当作龙骨用的，以牙齿最多，因为这是最坚实可以保存较久的部分。牙齿的形态，有多方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形态上，不但可以看出它所代表的时代，也可以认辨它的血统及具有人的生活习惯。换句话说，每一个生物——包括人在内——的体质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保存的前一代的遗传痕迹，都可以聚积在他身体的一部分上。动物的牙齿就代表这一现象；所以一个脊椎动物的牙就像一本书全部内容的引得。若是把数十万年以前人类祖先的牙齿找到了，这就等于说把数十万年前的这位祖宗的生活习惯以及他所具的一般体质可以作一番追寻。

韦曼教授鉴定周口店化石的意见，就是北京学术界发起周口店大量的、系统的发掘之科学根据。这一工作的收获在化石人类学上写了崭新的一章，所发现的最实质的贡献，即众所周知的北京人。

亡友傅孟真先生，每每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人吃猪肉、羊肉，吃了四千余年了(考古学的估计)，但始终没有由两种肉味的不同，而吃出些对于这一经验作些研究的兴趣，为比较解剖学奠定一点基础。"猪和羊为身外之物，中国的学者不甚注意，尚有一套说法。最可怪的，自然是我们的祖宗，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像对猪和羊一样，同样地忽视。

受中国文化涵养的学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肯对"自我认识"下功夫的人。

在北京协和医学校建设的初期,有一位讲解剖学的教授许文生(Prof. Paul S. Stevenson)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说,他在讲堂里对中国学生经常要说这样的一段话:

> 你们所用的解剖学教科书和参考书,都是英文本。这些书本的教材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尸体解剖得来的。现在,你们将要解剖的尸体却是北京城内各地送来的标本。他们大概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身体是否与欧美人的身体完全一样呢"?这是你们学习解剖学时,就应该注意的问题。

许文生教授是一位用人体测量法测华北人体质的科学家,他的这一报告,直到现在仍是论中国人体质的一部最具权威性的资料。他对学生的讲话,应该发生了些实际的效验。但是现在各医学校,讲习人体解剖学这一课程,所用的教科书,似乎尚找不到一本完全根据中国人尸体的资料写成的。现在,我们在中国药材店里,仍旧可以买到大量的"龙骨";把这些价值无法估计的、宝贵的科学标本,煮成药水天天吞人肚中,乞求那不可捉摸的治疗神效!

史前考古学所研究的“人”和“自然环境”*

——考古琐谈之五

今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国际人类学会议以后，有不少欧美学人便道来台湾观光；其中有若干国际的权威学者。英国剑桥大学史前史讲座的克拉克教授，就是来台北访问的一位先史学的大师。他在台北停留了4日。第1日他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陈列室消磨了一整天的光阴；第2日(9月13日)赴南港参观，上午演讲，下午看殷墟出土品并与史语所考古组同仁交换意见。克拉克教授的研究工作，早期集中于中石器时代，但近二十年来，他的兴趣扩展到史前史全部——上自人类原始，下至文字发明的初期。所以，他对安阳的考古资料，早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了。他最近发表的一本书，是讲“世界史前史”的。这是一本销行很广的教科书，这本书中有关中国部分的，他虽说得很简单，但是很扼要。

克拉克教授在南港的讲题为“晚冰期及冰后期的北欧猎人(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八千年的历史，是他致力最多的一段研究工作，亦即先史学上所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中石器时代的研究，可以说是由克拉克教授开始，方有深入的追求，现在已蔚成了史前史的重要部门了。他的研究资料以考古家在北欧一带发掘出土的为主体；在这一时代，欧洲的北部，因为冰川渐次北退，压在冰山下的陆地逐渐出现；地面藓苔遍生，一群爱冷的动物，尤其是驯鹿，就随着苔原的扩展而向北进。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法国南部一带的猎人已养成了追逐驯鹿的本领。藓苔生长的区域吸引了驯鹿，而驯鹿又吸引了这一群追逐它们的猎人；从此欧洲北部就有人类文化；这是北欧最早的一段历史。克拉克教授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类遗存，把见于地下的考古资料所表现的各种文化因素连贯起来了——由气候的转变，到人口的移动——这一连锁所代表的，中石器文化开始的阶段。进而说明中石器时代人类最大的成就，即农业的发明和农业社会组织的开始。耕种最早的原始地，原在亚洲西部，史学家所称道的“新月沃壤”附近。根据波罗的海一带埋在地下的人类遗存以及其他地质现象，欧洲的先史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13卷第11期(1968年)。

学者把全部中石器时代有关的考古资料,分成三组排列:

(1) 根据冰川进退的痕迹,中石器时代时波罗的海一带的气候,约有七次变动。

(2) 每一地区的植物,显然随气候的变动,而有苔原和森林互相轮替的现象;即藓苔繁殖的时代气候甚冷;温度若转变上升即有成林的树木长成。每一区域植物的遗存,构成了每一区的寒暑表。

(3) 因为植物种类的变动,依靠植物为生的动物,也跟着有新陈代谢的并行现象。考古学已经证实的事实为:自公元前一万三千年到公元前八千年时,波罗的海一带是驯鹿的天下;但自公元前八千年起,这一区域的驯鹿就突然减少,以至完全灭亡。同时,另有其他的动物,逐渐在这一个区域内繁殖,如熊、野马、狗、野猪、爱尔兰大鹿及红鹿等。古代遗存,很清楚地揭示了:驯鹿的绝迹与森林的滋长显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北欧的猎人在中石器时代的初期,由完全追逐驯鹿开始,渐变而兼及狩猎他种动物,发展渔捞。森林繁殖后,苔原就萎缩了,地下冰的解冻又使湖沼增多了。而靠海的部分于冰川解冻后出现了清楚的海岸。

适应森林代替苔原后种种的变化,人类的活动集中在三个方面:(1) 为猎取能在森林中生活的动物;(2) 为采取湖沼及海岸中丰富的鱼虾蚌蟹,发展了最早的渔业;(3) 为对于广大的森林,尽所有的能力,加以利用。

渔捞这项职业,虽也是季节性的,却有固定的区域限制;这是与完全靠追逐野兽以谋生的生活方式一大不同之点。有了固定的采取食物的地方,就可以有固定的住所。定居习惯养成后,接受农业这一新生活方式,就比较地容易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说:北欧的农业发展,只是渔业定居后的延续文化。

农业传到欧洲,在公元前五千年以后。有若干考古家却认为:农业在北欧虽是外来的,但有些助长农业的重要工具,北欧有它自己的发明:如砍伐木材的工具斧和斤;这是开辟农田的主要工具。农业技术最初传播到北欧时,北欧的地面已为大片的森林所占据,可以垦殖的地面,极为有限;农业经济的扩展,势必要扩大耕种的地面,扩大耕种地面就必须砍伐森林。要清除森林,更需要特种利器和专门的伐木技术。斧和斤两种利器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得以发明、改进以至完成的。考古家在北欧的发掘中得到一系列有关斧斤形演变的资料——包括原始演变的阶段,及极进步的斧和斤。出土的有极丰富的各型砍伐器,可以证明波罗的海的人在中石器时代继续不断改进这一类型器具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五千年去,最原始的斧斤形器的出现,远在中东农业传播到北欧以前。

人类的生活习惯,大半由于在居住地带可以取得的食物之品质养成。食物的品种——包括植物和动物——全靠所在地的气候及土壤决定。人的智能发展到了能创造、改进和迅速应变的能力时,就能突破若干自然的限制,如因接近森林,中石器的人

发明了斧斤形的砍伐器。砍伐器的发明,最初原只为折取细小的枝条,用作制造简单的住所或交通工具的。及至受到外界的刺激,尝试农耕,而农耕需要大块土地;砍伐森林就成了适应这一变局的主要活动。于是斧斤这一类的器具,就有迅速改进的需要。需要为一切发明之母:继续的、更紧迫的需要,促进了砍伐器急剧的改进以至完成。

新开辟的农地,不但影响了一个区域的土壤而使之变质,也导致了各区域性的气候转变。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工是可以影响自然环境的。这一类的事在历史中是不断发生的。但在克拉克教授所研究的中石器时代,先史学家可以看得格外地亲切:即,气候控制了人类最初谋生的道路;生活的需要,刺激了人类应变的能力。应变成功的人群不但能调整自然环境,并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将环境中无用的化为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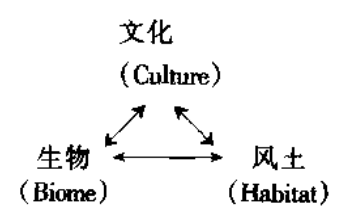
克拉克教授说:"任何社区在任何时代的经济,必定是文化阶段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的产品,若是有人能访问史前的欧洲,他就有机会可以寻找到,在一片很广大区域内,有一种普遍安定的生活———种似乎近于完全的、若干种品质不同的经济因素之调和。这些因素包括有群众的需要和愿望,谋生能力的技术造诣和组织,与所在地的天然资源。它们的互相配合所得到的平衡与安定。这种平衡,这种安定,也是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在现代的原始社会里常常发现的。"

民族学权威伊文斯·普利察德教授,根据这一类的资料,把自然环境的现象和人类生活几者之间的联系,简化成一幅三角的连环,这三组现象所包含的成分如下:

(1) 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及人的本身。

(2) 风土:指居住地的土壤及气候。

(3) 文化:指人类自己创造的一套生活技术。如采集食物(中石器时代打猎、渔捞的工具),以及一切与食物的取得及其他生活有关的方法,以及其养成的习惯及表达这些习惯的行为。虽说这三组现象都是很复杂的单位,但是每一单位各具有它的个别性和统一性。



这一示意图虽说是根据原始社会的研究构成的,克拉克教授用以解释若干考古资料,并可以把好些出土的器物与人类的原始生活,连贯起来。

笔者按:克拉克教授在南港讲演的内容,大旨如此。他所说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焦点,在他的最早的一部著作《不列颠的中石器时代》(1932 年出版)——已

发其端;四年后,他成名的著作,《中石器时代北欧人的安置》(1936)书中对于以上各点有充分的发挥。先史学家所说的人类历史的"第一次革命"大半取材此书。1952年,克拉克的最重要著作《史前的欧洲经济的基础》问世,仍以中石器时代的经济演变为主要内容,所讲各点,取材更完备、更精审,论断之谨严而不游移,已是炉火纯青的光景了。

他在史前的欧洲第一章说:"先史学最大的吸引力,为在这门学问里,有一机会研究:群众的社会愿望,与环境的自然力量——二者之间的一种长期性的往来相应。"

这可以说是现代的"天人之学"了!一门有科学基础的天人之学。

“沧海桑田”的考古学例证之一*

——考古琐谈之六

葛洪《神仙传》卷七：

>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麻姑(对王方平)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

海洋水平的升沉

沧海变成桑田，在地质学发达的今日，久已失去其神话性质的神秘意义了。台湾宝岛之海埔新生地的出现，几乎是一件经常可以读到的现代新闻。海洋学者已经把全地球的海水水平，作过普遍的调查；在很多靠海岸的地方，海水的起落历史，可以追溯到极远的远古时代。例如，直布罗陀峡，在第四冰期的第三冷峰时，海水的水平，比现代的低 50 公尺；在第四冰期的第二冷峰时，海水的水平，低过现代的至 70 公尺；在第四冰期的第一冷峰时，海水的水平，低于现代的 100 公尺。在更古的第三冰期，同地点的水平有一时比现代的水平低过 200 公尺，但在第三间冰期的时候，直布罗陀峡水平的记录上升到了超过现代的 18 公尺。

这些升降的记录，也就是沿海岸的沧桑史，是一种全球性的地质演变。下面谈的一件考古报道，是与东亚上古史有关的一则沧海桑田的科学故事。

美国的第 49 州，为阿拉斯加州，在北美洲的西北角；最西北的一角威尔斯亲王角，约在北纬 70 度一带。这是新大陆最西的触角，西濒白令海峡，与亚洲的东北角隔海相望。白令海峡最宽的海面，约 36 英里；峡水的最深度，在 40 公尺上下。美国地质调查所在此处测量，把海水升高和降落的历史已追踪到 25000 年前。这一期间，白令海峡的水平有四次的起落：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 19 卷第 12 期(1968 年)。

第一次,约在公元前22750至前12250年间,海水逐渐下降,到现代水平面下近120公尺处,再向上升,至现代水平面下约36公尺的深处。

第二次,约在公元前9500至前8650年,海水降落到现代水面下约53公尺,然后回升,至现代水面下约18公尺止。

第三次,在公元前7750至前6500年间,海水下降至现代水面下53公尺,再向上升至现代水平面下约13公尺。

第四次的海平下降,不及现代海面下37公尺,未到峡水最深处,峡水未干涸(最深处约40公尺)。此后,白令海峡的海水,就把美亚两大陆隔断,以至现在。白令海峡在北极圈边缘,虽经常为南来的热流冲击,气温较同一纬度之其他地点为高。但在冬季,海水仍要冻结约三个月以上。一切爱冷动物可以通行冰上,来往美亚两洲之间无阻。

白令海环绕白令海峡,面积颇广;以现在水平计算,海深很少超过70公尺的;所以在更新统冰期的极盛期,北半球大陆冰山高耸,海洋水平低落,白令海底全部暴露,构成了大片的原野。原野地面,藓苔遍生,吸引了广大的鹿群和其他爱冷动物,地理学家称这块新生陆地为白令原野(Beringia),在长逾一万年的时代(即第四冰期第一冷峰时,约公元前22500年至前12500年),北美的阿拉斯加州,现代北美合众国的第49州,与亚洲大陆联成一体。同时这块地与北美洲大陆的其他部分,为广大的冰山隔断,失去了一切联络。阿拉斯加州靠海一带,得到南方暖流冲刷,未遭冰劫;因此西伯利亚的土著生物就可以经白令原野这一交通通道,到阿拉斯加殖民。这一地质学的论断,已由最近在阿拉斯加州离白令海峡海岸约125英里地方一处古代遗址——葱港(Onion Portage)的考古发掘全部证实了。

葱港(Onion Portage)发掘

美国考古家安特生(Douslas D. Anderson),最近在《科学的美国人》月刊,本年6月份里,发表了一篇考古报道,标题为:《在新大陆大门口一处石器时代的营寨遗址》,子题释义如下:

> 阿拉斯加州的葱港(Onion Portage)是一处不寻常的,在北极寒带所发现的考古遗址。地下材料证明此地居住的人群,至少有8500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一层文化更证明,此地的占据人跟他们在亚洲大陆的先祖生活比,相差不远。

这一结论,所根据的证据是什么?

葱港的文化层中,出现的遗物与成层的地层现象,已经经阿拉斯加大学、乌布萨拉

大学及阿利桑那大学分别研究；对于发掘出来的(1)土壤的化学成分，(2)植物的花粉分析，以及(3)碳十四的放射性作了详细检查。根据这些检查初步的报道，众专家认为，这一遗址的年代，至少有8500年的历史，并可以更远地，再向前追6500年。文化层可以分九个时代：

第一层(最上的一层，以下是往下数的层次)，公元1700至1000年：寒带林木区的埃斯基摩文化(Arctic Woodland Eskimo)。

第二层，公元800年至400年：(甲)北印第安文化(Northern Indian)，(乙)诺顿·伊普犹达克文化(Norton Ipiutak)。

第三层，公元前500年至前1500年：柯里斯文化丛(Choris Complex)。

第四层，公元前1800年至前2200年：顿拜燧石器丛(Denbigh Flint Complex)。

第五层，公元前2200年至前2600年：葱港文化丛(Portage Complex)。

第六层，公元前2600年至前3900年：悬崖文化Ⅱ(Palisade Ⅱ Complex)。

第七层，公元前3900年至前4000年：同第六层。这两层(第七、第八)中间有一空白地层，占时共2000年。

第八层，公元前6000年至前6200年：柯布克文化丛(Kobuk Complex)。

第八层以下，公元前6500年至前13000年：阿克玛克文化丛(Akmak Complex)。

照安特生教授的分析，葱港地面下堆积的九层文化，代表三系不同的传统。最老的文化传统为第八层下的阿克玛克文化丛。这一层出土的石器有两大类：一类为大块的石瓣器，两线平行，由制成的石核加工打制成的。另一类为双面器，即器物的两面，均经人工打制，器型甚多——包括长条形刮器、弯尖雕刀、盘状刮器，以及小型的石片和石瓣器。这些器型，都没有在阿拉斯加早期的发掘出现过。双面器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出土的石器(公元前13000年至前10000年时代的遗址出土的)比完全相像。

葱港的阿克玛克文化，照地下的层次及材料所鉴定的年代，终止于公元前6500年；它的开始可能早到公元前13000年。在这一时期，正是“白令原野”将阿拉斯加与亚洲大陆联成一体的时候。所以，阿克玛克文化，表现了与西伯利亚的血缘关系；而北美洲的印第安旧文化，却毫不相干。接近北美洲温带的早期文化与阿拉斯加的阿克玛克文化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任何联系，这恰可证实那一时代所存在的地理形势。

第一个传统的第二阶段为柯布克文化丛(第八层)。这一层堆积不厚，所出的石器，大半都是长方形的细石瓣器，用作嵌入骨柄或木柄；这些石器，也见于附近地点的地面采集。柯布克时代甚为短暂。终止后，葱港的文化堆积有段长的空白，约占2000年。

第七层文化的开始时，为公元前4000年，这是悬崖文化的第二期，也是第二传统在此地出现的初期。自第七层起，出土的石器，表现了一套崭新的技术：细石瓣器已完

全绝迹了;起而代之的为抛掷器,器端装粗制石尖。照安特生的解释,第二传统象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由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文化,一种森林环境产生的文化,向北向西推移到达了葱港的结果。在公元前 4000 年时,柯布克流域气候日暖;苔原向北萎缩,已为寒带森林所代替。悬崖文化第二期带来的抛掷器,起源于北美洲东部的林产区。故第二传统为新大陆本土自己发展的一种早期文化的传统。涵濡在这一传统的北美洲土人,于公元前 4000 年,在葱港占据了荒废已二千年的这块地,重新施与人工。此后,在此地的文化变更,大半是北美洲的家务了。

以上报道的事件,有下列的主要历史意义:

(1) 阿拉斯加州,在第四冰期,有一万年以上的时间,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均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

(2) 白令海峡将亚美两大陆最后一次的隔断,为公元前 6500 年以后的事。

(3) 阿拉斯加州的最早文化为亚洲文化,与贝加尔湖一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完全类似。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一)*

——考古琐谈之七

完成北京人初步研究的魏敦瑞,是研究化石人类学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这一门科学中的一位幸运儿。他承继了步达生教授的一笔精神遗产,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探讨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人身上。他不必把他的宝贵时间浪费在筹划工作经费、调整人事或对付外界的干扰——这些科学家常常遭遇的命运。

魏敦瑞研究北京人的最后报告却是于抗战期间在美国完成的。《中国猿人之头骨》的出版时期在1943年,出版地点为重庆。但这部稿件的写作却在美国,他似乎没到过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

他在美国时除了继续研究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人外,也常作一般性的学术演讲。1945年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所讲的五讲,当年即为芝加哥大学出版部替他印行问世,书名为:《猿·巨人·人》。全书风行一时,二十余年来,为讲人类进化论者必读之书。笔者在台大主持考古人类学系时,课堂中经常介绍此书,并劝有志专习体质人类学的同学试译这本小书。但是,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中国学人感到此一兴趣;今后,这本书译成中文本的可能性,大概更要减少。理由是,新材料、新学说、新问题都是与时俱增,相形之下,1945年的“新”,现在已变成老古董了!

不过,学术上的“新旧”,究竟与穿衣服不同。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是可以经久而不“老”化的;新的材料出现,往往更可以增加老问题的研究价值。笔者此次所谈的,就是二十余年前,魏敦瑞所讲的一个问题。

魏敦瑞教授在加大第二讲的讲题是:《人形的体型之进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fically Human Form*)。在这一讲里,他用了一张表,藉以说明人类进化的最后的一大阶段。这一表的英文名称为:“Pedigree of Hominidae”;笔者的正式译名是“荷谟形科的谱系”,但同时为便于讲解,又借用了《汉书》的一个旧名称,称这一表为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20卷第1期(1969年)。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这一通俗名称,很容易地就取得了一般的了解。

班孟坚为《汉书》编的《古今人表》,就体例说,实特具一格。第一,表虽号称古今人,但表内没有一个汉朝人,如普通文字中所说的“今人”。表内所列的今人,最晚的只到秦二世时代,比班固的时代,早200余年。第二,表中虽没有汉朝人,表却编入了汉朝的朝代史中。班氏的原意,大概只是要把这些“虽不考虖孔氏,然犹著在篇籍”的古人,为后世的学者保存下来。他把这些列在篇籍的古今人,用孔子的上、中、下三“等”作标准加以类别,并再详分为九级,命名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一类别的方法,很像心理测量学家以分数计算儿童的智力一样。不过班氏品评古今人的标准,虽自认为是以上智下愚和中人为三大类,但在实际的运用上,却受了罢黜百家后的儒家所持的道德观念之影响。后来,班氏的《古今人表》最引起了争辩的——如老子与墨子的地位,班表把他们俩人都排列在中上格,即中人的第一级——显然是受了这一影响所排列的缘故。由于传抄的错误,现在保存的班表,常有与班氏原表不符的地方,这些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古今人表的格式及其内容,虽未为后代编朝代史的史学家普遍采纳,对中国发展的史学,至少具有两大贡献:(1)它为评定历史人物的史学家供给了一种很具体的而又甚为抽象的标准;(2)也为后世的史学保存了很丰富的上古史资料。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

荷谟形科的谱系					
	相	(1)澳大利亚人群	(2)蒙古人群	(3)非洲人群	(4)欧亚人群
新近人亚科	Ⅹ Hos	澳大利亚人群	蒙古人群	南非人群	欧亚人群
	Ⅸ Hof	瓦渣群(爪哇)	周口店群(上洞)	波斯柯群	克罗玛农群(西欧)
古旧人亚科	Ⅷ Pae				斯鸠耳群(巴勒斯坦)
	Ⅶ Pan				塔布犹恩群(巴勒斯坦)
	Ⅵ Par			罗得西亚群	
原始人亚科	Ⅴ pis	梭罗猿人群			
	Ⅳ Pie	直立猿人群	中国猿人群		
	Ⅲ Pir	精壮猿人群			
	Ⅱ Meg	大人群			
	Ⅰ Gig		巨猿群		

据:Weidenreich(Franz),Apes,Giants and Man. P. 30,1946,Chicago University Prees。

魏敦瑞的古今人表之编制,目的与班表略有不同,他想把近百年来发现之各种化

石人，就其体型之发展实况，加以类别，并按其存在年代及出现区域加以排比，以志从猿形到现代人形逐渐演变之迹象和序列。代表最后一大阶段的人形演变之化石人，一百年来出土的数目颇多；各化石人之科别、属别、类别、种别之鉴定，专家们大半都有自己的见解，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魏敦瑞的表就是想从这一紊乱情形中，找出一种简单秩序。他把这一阶段的化石人分为三亚科，极像班氏的《古今人表》中的上、中、下三等。但他用的类别名词，却是按体型的演化形态铸造的，这三大类型可翻译如下：

(1) 原始人亚科(Archanthropinae)

(2) 古旧人亚科(Palesanthropinae)

(3) 新近人亚科(Neoanthropinae)

魏敦瑞采纳了班孟坚氏的同一方法，把三大类型又各分若干等级，名之曰“相”；不过每类的等级，却不像班氏那样平均的切划，各分为三。魏表中的原始人亚科分为五相，古旧人亚科分为三相，新近人亚科只分两相。计由猿形到人形全阶段之代表化石人，照他的意见，可以分为十相。十相之个别名称如下：

1. 原始人亚科

		(原名)	(简号)
Ⅰ	巨猿属	(Gigantopithecus)	Gig.
Ⅱ	大人属	(Meganthropus)	Meg.
Ⅲ	精壮猿人属	(Pithecanthropus robustus)	Pir.
Ⅳ	直立猿人属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Pie.
Ⅴ	梭罗猿人属	(Pithecanthropus soloeusis)	Pis.

2. 古旧人亚科

Ⅵ	罗得西亚旧人属	(Paleoanthropus rhodesienses)	Par.
Ⅶ	塔布犹恩古旧人属	(Tabun Group)	Pan.
Ⅷ	斯鸠耳古旧人属	(Skhul Group)	Pae.

3. 新近人亚科

Ⅸ	周口店上洞老人属	[(Choukoutien (upper csve)]	Hof.
Ⅹ	有辨的荷谟属	(Homo saplens)	Hos.

以上的十相，在表中，Ⅰ相排在最下，依次的向上，Ⅹ相排在最上；魏敦瑞称这十相为人的“形态年”(Morphological age)；最大最老的形态年，由第Ⅰ相代表，代表标本为华南出土的巨猿化石；最年轻的为“有辨的荷谟属”，由现代人代表。这一标准，与班孟坚所采取的上智下愚的尺度比，自然是较为具体，也较为客观。

魏敦瑞的表格之横排，是四分的，并列四个地区，出土的化石人群，即：(1) 澳大利亚人群；(2) 蒙古人群；(3) 非洲人群；(4) 欧亚人群。四个区域的人群，照现代的人类

体质说,虽都在一相〔即同一等级(Ⅹ)〕,同时却很清楚地透露了分化现象。在这四个区域内,各出土了若干形态年不同的化石人,魏表就以形态年的十相为直轴,表示时间的秩序及人类演进的里程碑;以地域的四分区为横轴,表示同时并著的分化情形,编制了他的"荷谟形科的谱系"。

笔者翻译上表,删去了原表中的八行直线及所有的斜线,以求简便易读。横排中的"荷谟形科的谱系",原在格外,本表纳入框内,并把原表中写在这一地位的"横的分化"略去。此外,表上的新标题,不见原文,这也是应该说明的。

删去的直线和斜线,在原作者的意思,是表示这些化石人可能的血缘关系;这一想法在魏敦瑞编制此表时,似未完全成熟。他死后,有些人类学家继续的探讨,意见甚不一致,引起了很多激烈的辩论。这一切留在下次谈。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二)*

——考古琐谈之八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荀子·非相篇》

在我们的下意识里,似乎每一个人都潜伏着些:“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面孔”的愿望。这是与用镜子化妆美容不同的一种愿望;笔者姑且作此一假定,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要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最简单的方法,是从认识全人类在大自然的地位说起。关于这一点,生物学家近两世纪所成就的可以算得最准确可靠了。公元 1758 年,现代生物学的鼻祖、瑞典的林奈氏,给现代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为分类学定了一个学名,用拉丁文制定名曰:Homo Sapiens(音:荷谟·塞庇恩斯)。“荷谟”,拉丁文作“人”字解;“塞庇恩斯”作“智慧”解;两字联用,意思是:人,有智慧的。照中国的习惯说,为:有智慧的,人。

两百年来,中国的生物学家,对于这一在分类学已根深蒂固的学名,尚没想到一个可用于科学讨论的中文译名。很多的学者,图一时的方便,把它译为“智人”,或译为“真人”以及其他类似名字。这些旧瓶装新酒的译法,因为合于一般的习用语口气颇易取得一般的接受。但“人”字这个符号,当文字用,在中国文化圈内,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兼差极多[1],内容沉重,所以它所能取到的普通意义,总不易肯定。用这个字作分类学的译名而不加以特别界说,先天地就缺乏了学名所需要的谨严不苟的品质。

在生物分类学上,一个学名的制定,所根据的基本观念为“类型”。制学名的一条简单规则为用双名制,双名制的主要内容是指命名生物的属别(Genus)和它的类别(Species)。所以界说这属别和类别的方法,就是列举这一生物的体质特征。

---

* 本文原载台北《自由谈》杂志第 20 卷第 2 期(1969 年)。

[1] 用何容先生广播“一日一字”时用此一词的意思。

这些特征必须是它群生物所没有的。在编制这些学名以前,分类学家必须将所分类的标本,作一番检查的工作。分类学家习用的分类命名方法之出发点,可以说与荀子在《正名篇》所说的相同。荀子说:

> 同则同之,异者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读懂了这段话,也可以了解现代生物分类学命名的基础。在运用这一命名的原则时,现代分类学更进一步地,把荀说中的"推而共之"及"推而别之"两细则,条例化了;如同建筑九层宝塔一样,排成纲、目、科、属、类、种等大小不同的圈次,及其相互的关系;并用共同的体质特征和个别的体质特征,厘定各圈次的范围及与邻近圈次的联系。学名的最大功能就是把这些圈次钩连成脉络贯通的体系。所以现代分类学制定的学名之特色,为使每一名称都具有"共名"跟"别名"两大作用。

今举"人"在分类学所属的圈次为例,谈此一方法实际运用之过程。

"人"属于灵长目,为什么把"人"放在灵长目这一目内咧?因为"人"同其他属于灵长目的动物一样,具有下列的体质特征:

(1) 有脊椎骨梁。

(2) 哺乳。

(3) 有胎盘。

(4) 两眼向前,两眼眶甚为接近。

(5) 大脑盖着小脑。

(6) 乳头一对,在胸前。

(7) 指和趾,均具扁的甲;拇指和拇趾,与其他四指(或趾)有较深的分歧。

(8) 乳齿及恒齿,均已分化:有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各类型。

以上列举的八点特征,合在一块儿说,都是"人"所具有的,也是灵长目中其他的科、属各动物共同具有的。因此"灵长目"就成了这些科属的大共名。

灵长目范围内的动物,所表现的进一级的分化,在四肢结构之变化。有一部分灵长目的前后肢,尤其是四肢的末梢,显不出很大的区别;例如类别在狐猴形亚目、眼镜猴亚目的各形动物。但在人形亚目的圈次内,所有动物的前后肢,就具有显明分化的趋势;前肢的末梢,演向手形结构;后肢的末梢,演向足形的结构。这一分化趋势,开始于这一亚目的动物群由树林上下地,试用后肢走路时。这一行动习惯的改变,使那些用两足在地上走路的一群动物,得到了生存的优势。两足走路的习惯养成后,全体的

躯干，也取得了笔挺式直立的姿态。这一重要变化的发端，可以说就是人形演进的开始。灵长目下的第三亚目，分类学家命名为 Anthropoidea（音：安刺罗泼衣迪亚），是根据希腊文"人"字意思的"安刺罗泼恩"编制出来的。

由人形亚目，再精细的区别，经过科、属、类三个重要的圈次，方缩小到现代人类这个小圈圈。今将笔者采用的与"人"有关的各圈次之学名与普遍译名列表如下：

类别圈次	分类原名	普通译名	笔者采用名	笔者所用通称
Order 目	Primate	灵长目	灵长目	灵长目
Sub-order 亚目	Anthropoidea	人亚目	人形亚目	人形亚目
Family 科	Hominidae	人科	荷谟形科	荷谟形科
Genus 属	Homo	人属	荷谟属	荷谟
Species 类	Homo Sapiens	智人(或)真人	荷谟，有辨的	有辨的荷谟

对于上表中的译名，笔者所采取的，与习用的比较，最重要的不同处，为将拉丁文的"人"字原名译音：即用"荷谟"代替普通习用的意译。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制定这些学名的分类学家，把这些范围大小不同的圈次，用不同的符号标定，实根据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即每一符号，只能代表一种固定的内涵。在分类学中，每一学名，必须代表一组固定的形态特征。如用灵长目这一名称，意思就是指具有前所列举的体质特征的一切动物。

用人形亚目这一名称的话，就是单指猴、猿，以及人所属的各科属；不包括狐猴及眼镜猴这两群了。再进一步的选择为现代人所属的一科，范围就更加狭小，故所谓"荷谟形科"的动物，必定具有下列的体质特征：

(1) 尾脊骨的脱失。

(2) 躯干逐渐直向上，至全部直立为止。

(3) 具有同样数目的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臼齿和第二前臼齿的齿峰之排列模式，大致相同。

(4) 脑的体积，逐渐扩展。

没有这些特征的动物，也就不能划分人这一科了。科以内的"属"以及"属"以内的"类"，范围更为狭小，划分这两圈次所需的体质特征，就必须再加多，更详尽了。"有辨的荷谟"这一"类"的动物，必须具有下列五条特征：

(1) 他的脊椎骨必须能上下直立，使头顶向天，脚跟踏地。

(2) 他的下肢坚固而细长，完全只用两只脚走路。

(3) 他的上肢可以转向各方，手腕转动，灵活自如。

(4) 他的脑容量，平均在 1350c. c. 上下。

(5) 他的头盖骨之最大宽度在头顶部分。

以上各点，只是就形态上可以测量、可以保存在骨骼上的若干部分说的。凡是新

发现的骨化石,具有上列特征的,就可以列入“有辨的荷谟”这一类了。

本文所说旨在指明,分类学中,与“人”有关的,自“亚目”到“类”五个圈次的学名,各指有若干可以列举的体质特征,虽详略不等,它们必须各有一个清楚的、自别的符号作代表,然后不会有导致混淆的毛病。

中国学术界,图暂时的方便,把这些范围不同的圈次,概用“人”字意译,为:“人亚目”、“人科”、“人属”、“智人”,等等,遂使“人”这一符号,失去了任何固定的意义,使读者以及听者难以区别这一些圈次所代表的不同的体质特征。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所引起的理论纠纷,集中于“有辨的荷谟”的体质特征之解释。假如我们仍把“荷谟塞庇恩斯”译为“智人”,用中文谈这一纠纷的原委,那就要像理乱丝的人,把一团丝放在浆糊盆内乱搅一阵子,再拿出来理一样,结果必定是愈理愈乱。

若用不同的符号代表这些分类学的圈次,学术工作中认识“人”在大自然的地位这一课题,就可以减去很多不必要的辛苦。这一则琐谈全是由于想用中国文字谈魏表所引起的理论纠纷,附带地引申出来的翻译问题。所涉及的,却为用中文翻译一切科学文字的很重要一面。

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

王局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人感到很大的荣幸接受文化局邀请讲我自己很关心的一个题目。这是提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我所想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开始以来，由于全国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讨论，我个人也听见过很多的不同意见，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见解，可以说各有千秋。不过讲到文化的内涵，一般说来，包括有最好的，也包括有若干成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甚至不需要的。所以谈到中国文化的素质，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就是把文化的内容作一分析。究竟有那些优点应该保存，继续予以发扬光大？关于这一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本人今天要提出来的，只就个人的看法作讨论的起点。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个大前提应该澄清，就是这个问题是与历史研究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同意讲中国过去的文化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所走的有好些不同的方向，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根据，决定他走的那条路。本人也根据自己的见解，选择了我的研究途径。我本来不是受传统历史训练出身的人；就传统历史说，我走的这条路，也许有些人认为是旁门左道。但是现代人类学、考古学，大家都认为是条正当途径。这几十年来我转到历史，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从历史方面说，有很多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不过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现在讲中国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完全根据记录的历史，即所谓传统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在国内发展很快的，根据由考古以及各种不同的科学所聚集起来的若干与历史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把中国历史作了重新建设。这两个方向，当然都是历史研究。谁也无法评断，哪一个绝对地对，哪一个绝对地不对。不过有些事实，我们早已知道，就是传统历史保存的资料，掺杂许多想象的成分，与可以说明经过的事实是不相符的。例如古代的历史传说，有益为启所杀，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杀了季历，都与正史上记录不一致；我们就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完全假造的，或真有这些方面为正史的作家所删。又如传统历史记载前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母亲在池边洗澡，吃了一个蛋就生了努尔哈赤。这一类史实

* 本文系作者讲演记录稿，发表于1969年初。发表时，作者只校改了一千余字。——文集编者注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神话性的,靠不住的。但传统历史却把过去这些神话都详细记录下来。在民国初年,一位中国很杰出的学人王静安先生,在清华大学开史学新证课程,提出"地下材料"四个字为史学新证据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地下材料在西洋早已发展成一门大的学问;王静安是第一个把地下材料介绍到中国史学界的人,他是研究甲骨文最有成绩的一位学者。自他以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在中国渐渐为学术界注意,到现在已将近半世纪;可以说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研究上古史这一部分的,起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四十年来地下出土材料重新建设上古史,现在已经开始。因为本人参加了这件事情;我们根据这些地下材料,可以认定它们与传统历史所记录的大致是相符的。不过地下材料范围相当广大,可以把过去传统历史的简略记载加以大量的充实。今以殷商历史研究为例。司马迁《史记》记载仅短短几句话,现在我们知道的多过《史记》登记的几千倍以上。地下材料的出土,供给了研究中国历史新的资源,也证实了传统历史若干不确定的记录。地下材料和现在一般社会人文科学发展可以扣合起来,将人类主演的故事可以打成一片,不像传统的记录,有很多失去联络,和自然界观察的现象合不起来。

要了解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所应注意的不仅是材料的可靠性,同时更应该注意使用材料方法的问题。根据地下材料认识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并以现代的方法处理这些材料,我们往往可以看出若干传统看法看不出来的事情。例如在抗战期中,有一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他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在英国是头等学人,有文字学天才。他在很短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将原来学的生物化学放弃,研究中国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讲,依他的看法,在纪元前一千八百年以前,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流传到西方去的有二十余件,西方的发明流传到中国的不过四件。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相较毫无逊色,不仅不落后,还稍有领先。中国文明落后只不过二百多年时间,为什么中国过去对于这件事情看不出来,由英国教授看出来,这是因为一般的看法不一样,中国对于这一类的事情,觉得它的价值没有什么了不得,因而把若干发明埋没下去。例如冯道发明印刷术,因为觉得冯道不是重要人物,对于印刷术的推进也就不甚努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不必谈。现在的看法,从若干社会人文科学看中国历史,比较客观,与历史经过相符合。过去的看法固然有一套逻辑,不过很多与实际现象不相符合。现在就以最近四十年中国所发现的考古的史实,重新建设中国上古史;由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两个大问题形成时代的情形,可以了解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在最早形成时代所表现的成绩及精神。

现在我把民族和文化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讲,是因为有很多学者把文化当作独立存在,单讲文化,有时愈讲愈远。因此我感到要谈文化必须谈到人;要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中国民族。如果不讲中国民族,单讲中国文化,所讲的也许与实际情形距离太远。

我们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讲，就认识文化是人所创造的；地球上的生物，只有人有文化，其他生物没有文化，这是一个大前提。

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和人本身一样，有所谓孕育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成熟以后，假如新陈代谢停止，就衰老下去；假如继续新陈代谢作用，就可以跟上时代。中国文化在年龄上好像比西洋文化要高。记得在幼时读书的时候，常常听到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种种文化，它们过去都有光辉的成就；现在却只有中国文化还在地球上巍然独存。这话使我们感到兴奋，可是历史家所讲恐怕是虚构，并不切合实际。中国文化诚然可以说在世界上所有文化中比较老大，西洋是新兴文化，如美国、英国、法国，都是比较新的。这是表面上看，实在西洋的文化学家、史学家有另外的看法。所以要把文化和人连在一起讲，对于文化的了解更清楚，这是我今天把这两件事件归并一起谈的基本原因。

现在就谈到"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题目的本身。我们一讲到人文科学或文化本身，或在经常口语中，以至于做文章时，"文化"和"文明"恐怕是交换使用，两者是相等的。不过专门讨论的文章中，文化和文明是分开用的。

人类的文化，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没有文字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叫史前时代。人类发明文字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最多不超过一万年；中国文字在年龄上比不过埃及。人类有了文字才有文明；文化则包括全体，凡是人类生活的方式，都叫做文化，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文明形成的时代，以中国来讲，是在商周之间。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诞生、成长，现在地下出土的材料供给我们很丰富的研究资料。中国民族传统的说法，好像是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的后代渐渐就分布到各区域，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这个传统的说法当然也有若干根据，我们不敢说绝对对或绝对不对。现在研究地下出土人的头骨成为专门的学问，是研究人类文化很重要的资料；由此对于中国民族在殷商及周的时代形成过程的大概情形，以及创造的文化，有一点认识。根据这个认识发现中国文化的特征似乎有一点长生不老，其秘诀在什么地方，在这里面比较容易找。根据考古资料研究这个时代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形成，在民族方面是融会很多不同的成分；就体质来说，包括很广泛，大体上是蒙古种居中——黄皮肤黑头发是蒙古种的特征。不但商朝是如此，据步达生先生说，华北黄河流域一带中国人的体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和现在华北人没有很大分别。他说这句话是在安阳地下材料发掘以前。有的则和西伯利亚人，还有南部的若干民族，体质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是各方成分汇杂在一起，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商周之间，渐渐融合成一个伟大的中国民族。这是就民族本身形成的一般的说法。从文化方面可以追溯更远，不仅新石器时代，更可以到中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总而言之，有很多成分可以列举出来，就是一直在中国本土渐渐出生、发育、成长流传到现在；同时在

长成的过程中,也无限制地收纳各方的长处,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亚,而且显然是有选择的纳入中国本土文化系统,渐渐消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中国列祖列宗创造中国文化,一方面当然是根据自己原有的文化,同时看见其他民族好的文化将其吸收进来。消化以后,更进一步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在秦以前,根据地下材料可以归纳出几个要点:第一,中国文化在秦以前的创造性,从现在的社会人文科学看,是人们生存必要的条件。人类必须时时刻刻运用智慧来征服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环境是常常变的,人类必须有应变的能力,不断的创造,才能够活下去,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看见外面好的东西对自己有用处的就吸收进来,以节省自己的精力,更进一步创造新的东西,增进自己的生活,这是很显然的常识问题。在秦以前,殷商及周朝时代已表现非常清楚。这时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正在形成时代,当然有很大的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根据现在地下材料供给我们的资料。知道那时候的民族能够融化各种不同的成分,没有狭隘的看法,是很超然的。中国文化没有像外国希腊、罗马文化有种族偏见;中国民族相当复杂,其所以能够融合,是由于有良好的民族性。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恕”是中国最高德行的境界,也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容纳别人。这种恕道品德的发达,与中国文化的远长延久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儒家哲学和外国宗教不同。外国宗教具有排除性,信仰上帝就不能信别的教,认为别的教是邪教。但是中国很早就发现恕道,成为儒家的中心观点,这是根据生活经验体会出来,到了孔子发挥到最高程度。孔夫子说:“温故而知新。”做一个老师,温了故不知新,就不配做老师。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求进步、求新。从实际生活上发挥,就是要创造。现在发现,当时创造的成绩的确相当多。先从殷商历史说起,商朝的历史经过考古学家四十年来的努力,成为很大一部专门的学问。

我现在举一个比较具体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中国形成一个国家,有国家观念的群体感,最重要的关键可以说是对外战争。在中国上古史上所写对外最早的战争,是“五帝本纪”所说的黄帝阪泉战炎帝,涿鹿战蚩尤,不过没有证实。但是今天对殷商时代的研究的确有非常伟大的成就,在甲骨文中记载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注意,就是殷高宗和鬼方的战争,那时不叫鬼方,是叫𢀛方,还有土方,甲骨文记录关于殷高宗有五百几十条,其中有大部分是讲与𢀛方及土方的战争。这件事情在过去的历史上寥寥数字,内容一点不知道,战争如何打的,当然更是茫然;战争的范围究竟多大,当然都不知道。在最近甲骨文出土以后,知道这是中国民族对外第一个大战争。中国在海禁开放以前,大部分外患都是从西北来的,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鬼方就是周朝时的玁狁,战国时的胡人,汉朝时的匈奴。唐朝时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无定河就是在河套一带。根据地下材料甲骨文资料,远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殷高宗和西部鬼方的战争,其艰苦情形,可以由很多事情看出来。为与鬼方打仗,告庙(在

宗祠祭祀)有很多次,征兵有时候一次可以征到三千人,打了三年,把鬼方打败。自此以后,商朝天下安定二百多年,在艺术上、工业上、政治上各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一直到后来春秋战国及儒家的哲学,都受这时的影响。那时中国已形成一个大民族,与现在的西伯利亚、蒙古、太平洋都有接触,在黄河流域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至于对舌方、敌人的仗怎么打法,这也是近代考古学新的贡献。大致可以作初步的估计,甲骨文并没有记载。从其他地下材料研究,商朝已经是青铜时代鼎盛期,铸铜技术发展很高,能够一次铸成近乎九百公斤重的大鼎;在器物、美术各方面的表现,一直到现在还赢得全世界专家一致的称赞。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世界青铜文化以安阳为中心。西方铜器比中国早,但是这个时代中国发展到巅峰,不但东南亚、太平洋区域赶不上,欧洲地中海所有区域也赶不上,这是现在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学人大家都同意的事情。那时候用青铜所铸的武器,发现的至少有七八类:第一是戈,第二是矛,第三是箭头,第四是弯头大刀,第五是小刀,第六是盔,还有车。同时一次征三千人到前线作战,规模相当大。舌方敌人没有文字,不知道他们的文化,但是知道他们是中央亚细亚的游牧民族,活动力相当强。把整个世界文化连在一起看,可以看出舌方、鬼方侵犯中国的国土(甲骨文有详细记载),商朝奋然而起,战争打了三年,把他们打败,奠定中国文化形成时代二百多年太平基础。从武器研究,我总感到中国应该有武器博物院。中国在西北的战争,从殷高宗起一直到汉武帝,经常对付的敌人是从西北来的。他们非常强悍,有时打不过他们,有时候把他们打败。一连串的战争所用的武器,现在从故宫博物院不收藏的破铜烂铁中研究出一番道理。中国最早的武器是戈,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戈同现在的镰刀差不多,在商朝时的戈尚很原始,以后才一步步发展。矛不是中国的,是西洋的东西。西方用矛很早,中国早期用的矛,底下安柄的地方是铜的,把柄插进去。西洋的矛最早也是插在柄里面,以后渐渐变成圆筒。安阳出土的矛与爱尔兰第三青铜期的矛完全一样,我感到奇怪。一个远在西方,一个远在东方,两者完全一样。经下过一番工夫研究,中国的矛很可能是从另外地方输入的。到了周朝,春秋、战国,中国的武器起了很大的变化。旧剧有“辕门射戟”,戟在战国时已经完成,是将矛与戈合在一起。当时中国军工很了不起,在考古方面发现,战国初期戟还没有完全成功,到战国时才配备在军队中打仗用。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武器,汉武帝打匈奴也是以戟为重要武器。这一点研究有一个很具体的意义,值得现在的史学家、教育家注意的,就是在商周之间,这些列祖列宗有一种试验的精神:自己技术不到的,能够收纳外人的东西,而用的时候并不甘心这样就算了,还要继续改进。把矛与自己发明的戈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变成戟,经过八百年的试验才成功。假使没有耐心,没有久远的计划,就不可能成功;这固然由于国家有此项需要,但毕竟中国人有容纳外人的雅量。一种大文化的形成,无论希腊文化也好,罗马文化也好,没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必须能够利用现成

的,再经自己消化,作一番创造的工夫,然后变成自己的。中国在西北的战争已经有很长的时期,当然武器发明的很多,不止这一件。我提这一件,只是显示考古学材料证明不容怀疑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很多。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在形成时代所表现的精神。确实是如此。

中国文化在基本上是本土创造的多,而且有些事情到后来变成所谓东方文化的特性。我从中国古代史研究铜器,进一步研究了装饰艺术。所谓装饰艺术,就是做一件器物当然注意适用性,行有余力,还可以加一点工,使其好看,令人起一种美感。这种装饰在中国是很特别的系统,和西方系统是并行的;这一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人,早期不能了解,现在可以解释。殷商的饰物雕刻、骨头雕刻、纺织品,进一步在殷商以前时代的陶器、石器、玉器、各种不同的器物上,那时候的艺术家在上面加的装饰,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影响很大:在大的建筑和小的雕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流传的范围,达整个南北美洲,以至于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装饰艺术在基本观点上,都受过商朝艺术的影响。但是中国在此时期也接受西洋若干文化,譬如杀人殉葬这种事情。商朝一个帝王死了,埋葬的时候,往往杀很多人殉葬,将人头与尸体分开埋,十个人头埋一坑。最初我们感到很迷惑,不知道作何解释。中国有很多事情,假如关起门不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去看,不容易解释。但是假如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研究,有很多可以得到解释;有些事情本来认为毫无意义的变成有意义,认为毫无价值的变成有价值。现在我们知道杀人殉葬,在青铜期初期,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这个阶段。最早是两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前就有这种事情;以及埃及、希腊、爱斯基摩,一直到新大陆,在铜器时期都是如此。因为从青铜时期开始,人类有了权的观念,而在石器时代,用石斧石刀杀人不容易。青铜武器发明以后,杀人比较方便。人类既有了政治组织,又有了比较方便的杀人武器,酋长的权力相当大,杀人像宰小鸡一样。同时对于自然界的信仰有一个说法:一个人生存的时候,要多少人侍候,死后也就要多少人侍候。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当时普遍的程度,达到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由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受了西洋很多的影响,幸亏一到人文主义哲学兴起,把这件事情废除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直到现在才知道孔夫子说这句话时非常悲恸,他是悲天悯人的意思。中国周朝晚期的人文主义和希腊同时,当时有很了不起的成就;此项成就始建在商朝,但是周朝更表现发挥,原有的好的接收下来,不好的毅然废掉。

今天根据本人接触的若干资料,一知半解地给各位先生作最诚恳的陈述。我的见解不见得大家同意,我也并不如此希望,不过是陈述个人的见解。我所讲的是根据可靠的事实,可靠的历史。

〔以下为听众的提问和李济先生的回答〕

某甲君问:

(1) 文化有两种形式,一是精神文化,一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当然是以文字为代表,物质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今天李先生所讲的具体的文化。李先生所讲的我们已经很满意,但是在文字上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以什么东西为代表?我在其他许多东西上看到,六艺为中国文化代表,而司马迁与《汉书》所讲六艺不同。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是不是六艺?如果是,究竟是司马迁所讲的六艺,抑为《汉书》所讲的六艺?(2) 北京人、爪哇原人、德国原人、英国原人在文化上所发生的效用如何?

李先生答:

(1) 关于班固和司马迁二人所讲的六艺当然有所不同,不过文字的问题我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根据个人看到的资料,我觉得做学问的人看材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运气好,看到的材料既多又好,有的人运气不好,看的材料少。但是中国文字是很超然的,商朝甲骨文已经有二千多字,现在认识的有一千三百多字,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历史。商朝和周朝用一样的符号,但是意义常常不同,有时候相差很多,这方面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辩论。文字是代表思想的符号;现在流行一种看法是:中国文字固然代表很多东西,但是以其代表科学思想就不适当;例如以中国文写现代物理、化学、医学、解剖学。中国人不懂英文的人,当然看中文本,懂英文的人就看原来,不看中文本。据说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报告非用英文写不可,用中国文写不通,这当然是事实。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字本身的问题。中国文字的命运就在此。能用中国文字代表科学思想,六艺的问题反不难搞了。班固和司马迁两个人(的主张)都是有毛病的东西。

(2) 现在世界上发现的原人很多,但事实上真正研究人类原始演变的材料并不太多。北京人引起注意,就是有人讲依北京人的体质去看,北京原始人与现在人不相干,但实际上由北京人发现,北方人与蒙古人的体质有密切关系。但是进一步却没有很多证据。最近人类学家又有很多辩论,认为现在有智慧的人,各有不同来源。总而言之,做学问有了新的可靠的材料,就有进步;没有材料专凭文字,相信不大容易进步,是劳而无功的事情。

某乙君问:

今天,大陆上科学一天天进步,我们好像不如它。但是今天的战争不是全凭武器,全凭人多。因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的,请李先生以历史学的眼光看我们何时可以胜利。

李先生答:

打仗不是要凭武器,武器固然重要,但是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比方刚才讲的中国民族不光靠武器,背后还有组织,没有民族形成的组织力量,战争就不能打。

某丙君问:

中国人的臼齿是不是和北京人臼齿一样?据闻台湾大学招考新生曾经实验过一次。

李先生答:

美国有名的人类学者在西伯利亚一带考察研究,门齿背后凹进去的,以黄皮肤的蒙古人最多,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百,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形。根据台湾大学招生体质测验,发现台湾的百分比占很大数目,这个问题的起源,就是北京人牙齿一百几十个也有这个情形。另外一个美国教授把世界上白人的切齿作普遍调查,凹痕有的很浅,有的很深,跟这个情形不一样。有一个说法认为蒙古人是北京人演变而来,就是根据蒙古人有这种牙齿,一直可以追溯到北京人时代。北京人的年代,据推考有三十万年,五十万年,甚至一百多万年。

试谈治学方法*

一、引　言

我想从暑期中台湾学术界经常见的两种现象说起。这两种人人都知道的现象：(1) 是高中毕业生的投考大学；(2) 服过兵役的大学毕业生纷纷到国外去留学。这两种现象对于学术界发生的真实意义何在，可以说各有各的看法，我无意在此尽先详细讨论。

我想先讨论的是要提请大家注意的另一件事：即在台湾夏季中颇值得我们记录的学术界出现的第三种现象：就是外国学生和学者到台湾来作学术工作的人数，也渐渐地增多了。他们除了正式申请入大学随班听讲外，有很多青年的学者，专程来台湾作短暂或较长的居留。他们的目的是来搜集各种学术资料，作他们进一步治学的预备——也许是写一本书，或者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在台湾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些外国留学生，有很多以为他们是羡慕我们的古老文化，特别来学习的，也就加以特别的款待。若有能说几句流利的中国话的外国学生，他们就可以被大众捧得如星星月亮似的。

但是，似乎尚没有人把这些外国学生在中国学习的方法，和中国学生在外国进修的方法作一比较。现在我既然要谈"治学方法"，就觉得从这一比较谈起，话可以说得清楚些。

外国学生到中国来，有些已经能说中国话了，有些是来学说中国话的。台湾大学的外国学生，在中国文学系注册的最多；他们大半都不在乎得一张中国大学毕业文凭，但他们都想学会说中国话。假如可能的话，他们也想很快地学会读中国的书。他们停留在中国的时间，也许只有两年或三年的期限，很多却能达到这一目的。

另外的一种学生，却是专门为搜集资料而来的。这一类的学生大多数不但会说中国话，会读中国书，并且有一个研究问题在心中。他们所要搜集的材料，集中于解决他

* 本文原载台北《"中央"月刊》第 2 卷第 10 期(1970 年)。

们心中的问题。若是其中有一位研究中国的手工业——如烧陶器的方法,他们就亲身到烧陶器的现场去访问、观察,并用种种方法作极详细的记录。凡是旧式的烧窑工场所在地,他都亲自去访问,作同样的调查。如此所得的资料,累集起来,就构成了作研究工作者所称道的原始资料。既然是由研究者本人自身采集的,也就是我们所类别的第一手的资料。把这些资料与他处同类的资料作若干比较,研究者也许就可推寻出这一手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对发生这一手工业之社会的经济及历史的背景,可以得到若干了解。

这一类的工作,现代的中国青年学者,会作的也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跟美国老师学,成绩好的,在短期内也可以在各门学术中:(1) 拿出有价值的贡献,因为他们学会了外国一种或数种外国文;(2) 学会了搜集材料的方法;(3) 学会了如何处理他们所搜集的材料,解决他们心中的问题;(4)学会了如何从旧问题中再提出新的问题来。

假如我们要对于现代治学方法作一概述,我们可以根据所述的前例,在下段分列几个步骤谈。

二、现代治学方法概述

1. 初步预备工作

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治学”只能算是少数人的专业,从事这一专业的人们固然需要相当的才智,更需要适当的训练。人的才智是不容易衡量的。人各有所长,长在何处,不但需要长期的旁人观察,更需要长期的自我省视——例如自己真正兴趣,往往自己一时也摸不清。所以一个社会要培植学人,要有长期的预备工作。这一预备必须是多方面的。这一预备时代需要多少年,就现代流行的学制说,应该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至于预备的节目,鄙见如下:

(1) 在这一时期,一个预备以治学为业的人,应该学会运用一切治学必需的工具。他不但要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也至少应该学会另一种外国语言文字。若能更多学,当然更好。

(2) 大学毕业时,他应该对于现代学术一般的情形,有一种广泛的认识,具些入门的知识,并能熟悉地运用一切有关的工具书,如有关的字典、各种类书、百科全书,以及各式书目及引得;尤其紧要的,他应学会用卡片记录旧的知识、新的见闻。

(3) 对于自己在学术中的兴趣,应该有一个集中的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把有关

的资料,作过若干方面系统的研读和整理。

2. 第二步预备工作

在正式作学术工作以前,必须经一个时期的研究训练,姑称之为研究所训练。这种进一步的训练应该着重三点:(1) 学生把精力集中兴趣所在的有关课目作进一步之研读;(2) 寻找研究问题;(3) 对于研究题目作初步的试探研究。

学习研究应该视为治学之初步阶段。什么样的工作才能算作研究? 当代学人对于此一问题,显然各有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也许有甚为一致的,也许有大不相同的。此处我只能说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想先从反面说起,即什么样的工作不能算研究? 一篇读书报告,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重述,一本不能增加新知识或具新见解的杂抄……这一类的东西,无论是短篇文章、论文、长篇报告或成本的书,是不能当作研究看待的。一件名副其实的研究工作,至少应具下列的条件:

(1) 研究的题目是全新的,或是前人未完成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研究人把它完成了,并解决了。若属于后者,应该把过去有关的研究及未完和未解决的部分,充分地先加说明。

(2) 所用的资料必须是自己搜集的或实验得来的,具有绝对的可靠性。资料的品质可以经得起复察,并且都是与所研究的题目有直接关系的。

(3)所得的推论或判断都有可靠的资料作证据。推断的范围,没有超越证据的性质。

以上所说的(1)、(2)两项即:选择研究题目与搜集研究资料,最足表达现代的治学方法。关于选择题目的条件,若要彻底实行,从事研究的人不但需要充分的预备工作,对于他想研究的范围内有关的各种之理论及相关问题之解决,也应该有一种清楚的了解。有了这一类的了解,所选择的研究,题目范围就可以宽大了许多。但是最要紧的一关,为解决问题的资料之搜求。有了问题,找不到适当的资料,问题终久是要悬空的。不过这只是指一部分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而言,尤其带历史性问题的,与这一类问题相关的资料一经毁灭,那部分历史就要永久湮没;但是大部分的数理科学,所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资料,可以在实验室用人工设计实验出来,资料的搜集可以完全靠人类的聪明才智设计和取得。生物的过去,却是不能在实验室重复的;人类的行为,就属于这一范畴。故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的工作者,在完成他的预备工作后,到了选择研究题目时,除了前述的条件外,最后必须取决于资料的有无。所以有些远见的史学家,为自己或学生排列研究工作程序单时,把找新材料放在找研究问题以前。至于研究资料的性质,却甚难下一机械性的定义。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有句名言,他说:在中国研究社会和自然科学"到处是黄金,只要有人捡"。他所指的"黄金",完全是就科学价值

而言。这种抽象的"黄金",也许是一块泥土、一堆化石、一件破瓦罐……。试看太空人从月球上带回地球来的泥土,不是全世界当作无上珍贵的宝物么!

再归结上说,我们又可以对于治学方法引申出下列三个重点:

(1) 学术本身,只是一项职业,它的任务,为了解自然界(包括人的本身)的现象。人能对自然界的了解多一分,就是他的知识增加了一分。知识是累积的,每一位工作者加一点,积久了就构成了学术的基础。

(2) 知识的追求,是一种纯理性运用的收获。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都能了解,现代知识的取得,大半是一合众工作的结晶。这是与艺术的创造不大相同的一点。

(3) 要推进现代学术工作,有三件事是不可缺少的:A. 必须有研究机关;B. 定期刊物;C. 专门学会;可以使同行的人经常的交换意见。

三、现代治学方法的例证

现在我们可以对美国学人到中国的学术活动,再作些讨论,以为上说的例证。我们可以注意他们治学方法之实际运用。第一,试看他们的学习中国语言与搜集原始资料的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美国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就发展了一套学习外国语的速成法——即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把学习人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一种外国语——包括说、听、读。教这一语言的人也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收最大的效果。虽说是由于天资高低不同,学生的成就也有快慢不同,但这方法却有奇效。受训一年后的学生,往往能说、能听、能读。更聪明的,可以写中国信(假如所学的是中国语言)。抗战后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记得还都后美国大使馆在南京第一次开酒会招待中国的教育界的时候,我也收到一份请帖;赴会的时候,所有招待中国来宾的美国主人都能操流利的中国话——这件事完全出乎我意料以外!这是在七七事变以前,绝对不会有的现象。现在研究远东的美国学者日渐增多,他们大多数都能直接用中国材料,不像他们的前辈汉学家专靠翻译了。不过除了研究语言学为目标的这一群外,他们之说中国话,是把它当作学的工具;他们凭藉这一种工具可以搜集他们所需要的原始资料,作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准备。他们的兴趣各有所专,却是极广泛的。中国学术问题之多,在他们完成了预备工作后要比我们自己的专家所想像的多。这些年来到台湾的美国青年学人,对于故宫的书画、高山族的语言、道士的法具、市场的组织、拜拜的仪式、日本统治时代的账单、地面的破瓦片等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假若他们有机会搜集的话,他们都很热心地搜集。这些资料到了他们的手中,都可以构成他们全部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原始资料。他们所以肯下工夫做这些

工作，自然是靠他们长期训练所得到的一套价值观念。说通俗一点，这套价值观念可以说起源于人类要了解他的四周环境及环境与自身的关系这个念头。所谓科学研究者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这一关系弄清楚。不过在人类发明文字以前，人类在地球上已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日子；在这一时期，由于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自己的身体和行为的因时因地的变迁，于是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就呈现了天人之间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象。若是想了解这一不甚简单的光怪陆离的景象，科学就把它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各方面的成绩积久了，乃有科学的知识。就研究的成果说，表面似乎是繁杂，使人目眩心迷；若就最初的目的说，这些专门的科学都是殊途同归的。即人想对大自然与人类相互关系取得一种比较清楚的了解。人类对于自然若能得到一部分真实了解，无论在纯知识方面或就真感情上说，都得到很大的精神上报酬。这是一切学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一切问题的最后归宿。

最后，我想我们应该略谈当前面临的教育问题。报上偶尔见到的，是留学生中成功的少数，他们大半入了美国籍。但是还有一部分沉默的大众，学既未成，回国似乎也对于国家不能在学术上有所贡献——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我们的社会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咧？还是教育问题咧？若是教育问题，是否与我们所谈的治学方法有关？

在美国的朋友中，若干关心中国留学生问题的人，谈到这些问题，总要提到以下两点。第一点：台湾送往美国深造的学生，语文程度往往太差，讲堂上听不懂课，自然也就学不到什么。第二点是：勤苦的学生，花很多的时间，把语文学会了，研究工作的能力就很难赶上，只好放弃在学术上努力这一途径了！

上述的两项事实之根源，是否可以在台湾大学中的讲习方法上找些线索咧？据我个人的经验看，这似乎是可以的。中国有句俗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者，天赋甚高也；"大未必佳"者，愈老愈糊涂也。第二种情形的出现，固然可以起源于一个人生理上的变化，但教诲之不得法，实在构成"大未必佳"的最大原因。在中国的教学传统中，填鸭式的讲学法——即以教学生背诵为最主要的方法，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实。一个学生若能过目成诵，就是神童。而普通所谓"博学"者，大半靠一个好记性，如古本《今古奇观》所记"拗相公"（王荆公）的那种能力。在这一传统中治学的最大范围——一直到前清末年废科举的时代，总是如荀况在他的《劝学篇》所说的："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废科举，兴学堂"，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这六十余年的时间，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治学方法，确实经过了很大的改变；这在表面上看，是很显然的——我们的大学有文、法、理、医、农、工各院，并且有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社会中具有远虑的教育家仍在问"西方的科学，是否能在中

国生根”的问题。

教育家所以问这一问题,各专家也许有不同的理由。我个人也同意,教育界确有这一问题,我所持的理由是——自小学起我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仍是沿袭着数千年的老习惯,以记诵为主,所以每届考试季节,平时不用功的学生,总是忙于“背”讲义,“背”笔记,以及猜题目“背”有关的某一段书。这个方法,大半都能应付一般的考试;运气好的学生,用此方法就可以考得高分。

至于入学考试,若是出题的老师大胆一点,出一两题测验考生“悟心”的题目,很可能就要引起各方的责难。

在美国受大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大概都有此类的经验:美国学生喜欢问问题——有时也许问得很可笑;中国学生则善于听讲(如果语文的工具已学会)。美国的老师固然欣赏中国学生的勤读,但更奖励美国学生的多问。这一类教室中的学习经验,当然就为专心治学的人铺了路;在中国大学中,学生发问的风气似乎尚未养成。

四、结　　语

归纳以上的拉杂话语,我对于治学方法的意见归结起来如下。一个想以治学为职业的人,有下列三个步骤必须遵循:

(1) 选择一个他要研究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他必须熟悉前辈学者已完成的工作及理论;同时并应该认清他们的理论是否符合各种有关科学所发现的新事实。若有未解决的旧问题或新发现的新问题,他就应该有勇气把这些问题把握在手,想法子去解决。

(2) 假若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工具方能解决——图书、未学习的外国语言、新的仪器或他种技术训练等。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必须想法子学会这些工具或与能运用这些工具的人们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

(3) 解决问题要依证据——所用的资料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可靠性,这一点是不能打丝毫折扣的。解决方案公布后,应该公开的征求客观的批评,若无心的犯了错误,用了不可靠的证据,或加了偏见的解释,一经公平的评判,工作者应该坦白承认,加以改正。

科学运动的现阶段及其展望*

年来倡导科学工作，为此事花了大量的金钱，已是大家周知的事体；但执行的人们似乎有点像武陵渔人闯进了桃花源，亲自经历了一次那地方的人群"怡然自乐"的境界；但等到出境后，再想回去，虽说沿路上留下了很多标志，却"迷不复得路"了！

迷不得路的原因，可以说由于原来留下来的标志，经过了风吹雨打认识不清了，也可以由于蔓草丛生把它们遮蔽得看不见了；更可以说，由于岔路太多，原来就忘记了留标志。西方科学家发明了高空测量术，假如现代的"武陵渔人"能够升空测量，也许不难发现正当的路途。

以上虽说只是一段喻言，却正可以形容现在从事科学专业及执行这一运动的负责人所遭遇的困难。要说明这件事，我们应该先把科学运动的最终目标认清楚。

这个目标已经过好些当代的贤达讨论过。就是如何使西方近三百余年发展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生根，使它自然地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

要向这一目标迈进，照个人的经验看来，我们所遭遇的难关重重，岔路甚多；其中最难克服的障碍，似乎是科学工作人员如何表达他们的研究结果这一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的科学界有一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已构成了一种信仰。即数理科学跟自然科学的研究，只能用欧洲文字写作——用得最多的就是英、法、德三国的文字。在"国家"科学会设置的初期——即改组以前的时期——常务委员会中有一次曾讨论过受补助人送回的年终报告，所用的文字问题；因为收到的数理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报告，很多全是用英文写的。当时的常务委员中，多数的看法，都以为这是很自然的，理由是若用中文写，不但研究的人感觉到表达的困难，审查的人大半也许看不懂，这岂不是浪费时间。更重要的——多数人的意见，加重了他们的语气——用中文写数理和生物研究报告，不但看得懂的人很少，国际的科学界也永远不会承认这些新贡献的价值，无论它们是何等重要。

就现代的情形说，上说的理由，不但切合实际，并且是公私两便——即为受补助的

---

* 本文原载台北《"中央"月刊》第3卷第3期(1971年)。

人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审查的先生们节省时间。

我个人在那时也曾参加这一讨论,对于这多数专家的意见,总有点感觉不贴实。于是心中就起了一个疙瘩。这个“结”的形成,绝不是起源于褊狭的爱国心。在我心中所荡漾不止的,为:若是这一情形持久不变,中国的科学之促进,不就永久要靠我们具有一种以欧洲文字表现的能力吗? 有人说:科学研究是一项专门的职业,是没有国际界限的。

既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要精于此道,自然应该学会一种外国语文。现在在大学修博士学位的学生,第二外国语已经是必修的课程,所以用外国语文发表科学研究,似乎并不算一个严重问题。这一答案,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也可以同意,不过这也只答复了全部问题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一面,为如何使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这些新的科学知识? 若是这些新知识的接受必须靠着读外国文字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家能够使只受国民教育的读者办得到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二面,似乎也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即翻译呀! 如在编译馆中,专译科学名著,以及作各专门科学论文的索引的工作等等。这一答案,表面看来,似乎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但实行起来,现代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我说“现代”不包括中世纪翻译佛经工作那批高僧),没有不感觉困难重重的。姑举几个简单的例,说明我的意思。先从翻译名词说起,试看下举的例:

1. 专门名词:

(1) Newton 有翻牛顿的,有翻奈端的。

(2) Einstein 有译恩思旦的,有译爱因斯坦的。

(3) Joseph Needham 自称李约瑟,中译尼丹约瑟夫。

2. 普通名词:

(1) Evolution 有“天演”、“进化”、“演化”的不同译名。

(2) Democracy 有翻“民主”的,有音译“德谟克拉西”的。

(3) Mathematics 先前称为“算学”,官译定为“数学”。

由以上所举的六个例,可见从事翻译者所临的困难。其中一位最老的前辈(严幾道先生),曾描写他进行此一工作的辛苦过程。他说:“往往为一个译名的选择,绕屋数日而不能决定。”以他的中文、英文的修养境界,他所译的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论》,照现代能读原本的人看来,仍只是“意译”,一种迁就当时中国读者的权宜办法。他并没有(并不是不能)把原作者的科学意境逐字逐句的完全表达出来。严先生的成功,完全靠他苦修古文所得到的用中国古文法的文笔表达方法,说明了当代西方生物学家几条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法则,而这些法则,用他典雅的古文,生动的笔调,有力的表达出来,就使当时关心国事的士大夫阅读后,受到感动——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促成了革新运动的高潮。

但这些动听的名词,虽说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学术上似乎并没有产生同等效力——我所指的当然是就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的精神说。这一认识,要等到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后,方见其端。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时候,在万端待理的时期,就毅然决然地遵照国父的遗教,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并法定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研究近代科学为主要业务。中央研究院最先成立的研究所为:物理、化学、工程、气象、地质五所,这实在是中国两千余年的教育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中山先生的遗教,就中国全部历史说,不但表现了他的划时代的创见,更充满了革命的精神。

不过促进科学工作与使这一工作"化民成俗",这两件事却有一段艰难长远的道路。要达到这一远大的目标,牵涉到中国的全部思想史及文化史。我仍想用翻译工作为例,解说这一路程的距离。

在前举的译名六例中,最后的一条,即官定译名 Mathematics 为"数学"的历史。这是前清华大学校长陈可忠先生亲自告诉我的,应该没有错误。他那时的职务是国立编译馆馆长,一切经过,是他亲身经历的。当最初编译馆征求全国数学家(从官译)对于 Mathematics 这一基本科学名词定一译名时,国内的数学界,就有两种建议:一派主张译为通用已久的"算学",一派主张用"数学"。两派都有权威学者支持,最后编译馆请了各位专家开会用投票方式解决。但是开票的结果,两派的票数相等。那时主持这一会议的为教育部长,就是党国元老陈立夫先生。陈部长是学工程出身的,对于此一名词的含意,当然不是外行。当编译馆长呈报这一开票结果时,陈部长以主席的身份,就投了一票,赞成用"数学",于是官定的 Mathematics 译名就是"数学"。"数学"成了一个大众公认的代表英文名词中 Mathematics 所代表的全部内容了。但是主张用算学的这一派,仍旧常常地表示不满。他们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为 Mathematics 在英文的原意所包括的不单是与"数"有关的研究,譬如"代数"、"几何"、微积分",或用符号或讲"形"说明各种的关系。很多重要的"数学"公式,可以完全没有一个数目字,所以以"数学"译 Mathematics 这组学科,远不如"算学"的正确。这一官定译名就有点像"糖尿病"这个译名一样,糖尿病的原名为 Diabetes,但是患这一病的人排泄出来的小便,很多就没有糖的成分,只有抽血检查方能断定病人的真实病状。像这一类的例,通行于科学界的可举的很多。名不正则言不顺,若不识原意,单靠中文译名的联想,不但可以引起阅读人的误解,也可以使作研究的走入歧途。用中国的方块字所组成的思想工具(我认为文字只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促进思想的工具),与拼音字构成的思想工具比较,所产生的思想系统,在品质上,确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值得研究比较文字学的专家作仔细的研究。

近代西方的科学报告,一个最大的特点,为每一固定名词,必须具有一个简短明白

的固定定义,尤其是关于所指定的具体实物,更需要具体描写作它肯定的界说。习惯上,他们大半只是利用已经死了的希腊文或拉丁文作语根制造这些名词,或借用其他的外国名字。这些专门名词,一般人读得总有些拗口,看得有些不顺眼,但是一经科学家采取,下了严格的定义,就可以约定俗成,不会引起任何误解。动植物的分类学的学名就是最清楚的例。

上说的困难是否能在中文里克服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必须一个长期的全国学术界共同努力,并且要认明下列的几件铁定事实:

(1)"文字"只是一种符号,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它们不是像先前过去道士所画的"符咒"似的,先天地包含有什么神秘,不可了解的奥妙意义。它们只像一把斧头,或一架飞机一样,由人制造听人使唤的。人们可随意定它们的意思,表达他们的任何思想,它的定义一经大家承认后,它的功能就具备了。

(2)中国文字是综合形、声、意三方面创造,经过了会意、转注、假借手续而发展到现在,比起西方拼音字造成的经过要复杂得多,但使用起来似乎各有短长。

(3)以中国古代发展的文字为思想上的工具,我们的先祖曾创造过世界最优美的文学及纯美学,这固然由于中国民族的禀赋气质;但文字的品质,实在助成了这些贡献,表现了很多特征。这些发展在汉唐时代产生的作品,表现得尤其是辉煌。

(4)但是说理的文字,自宋代以来,却以语体文为最方便,朱子语录便是最好的例。自近代白话文风行以来,证明用语体文也可以产生美术文字,但事实证明它最要紧的用途,是在可以用着表达科学思想。孔德说:"科学只是有组织的常识。"常识都是以用口语说出来的多,以白话文写科学报告,可以说配合得恰到好处。

(5)科学的发展是一门日日新又日新的学问,新的发展靠新的观念,要表达新的观念又要靠新的符号。如何制造这些新的符号而纳入我们固有的文字系统呢?我们可以就从事翻译科学及研究科学的人们已经在采用的若干方法中,看出若干道路出来:

A. 铸造新字。如化学家们经常用的"氧"、"钴"、"镭"等字,以及大部分的化学家发现的原子新名称,都是化学家造成的,现在已经为一般人所采用了。

B. 音译他国已有的重要专门名词。这是民间经常用的方法,如中世纪的"和尚",现代的"雪茄"、"香槟",科学界的"维他命"、"荷尔蒙"等词,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晓得的口头词汇,但它们都是外国字的译音,来自国外;它们可说已经在中国的文化内生了根了。科学家已经大量地采用这一方法。

C. 死字活用。翻过中国字典的人,都很容易找很多古字早已弃置不用了的例子,这一群弃字中,我相信有好多可以安排它们的新用处。如数目字中的"四"字,甲骨刻辞多作"亖"字。殷商时代的这个"亖"字,也许数理及化学以及别的科学中,在某种情

形下,需要两个不同形而指同样意思的符号(如 tetra-quarter),它就可以具有这特别的功用了。

D. 利用各处方言的词汇,这是极丰的资源,语音学家可以大量的供给。在必要时也可大量的用注音符号。

以上各条,仅举可以用汉字造科学名词的例,可见造科学名词的基本材料在汉语中是很丰富的。实在所说的只是个概略,这是要数理科和自然科各学会或编译馆,下一番大大的工夫,归纳出若干铸造新字的条例。新的条例必须根据原习惯不忽视原意,更须要简单易晓,这些条例也必须成一个逻辑的系统——如分类学家对于动植物所命的学名——使专门治科学的人容易运用,可以照办。各科有了大家承认的共同用的基本词汇,并有了铸造新字的原则可以遵循,再以语体的方式表达研究人的研究结果,并由政府加以公布。在各级教科书内规定必须采用,如此地提倡,我相信科学的名词,就跟"和尚"这一名词一样,不久就可以在中国文字中占一地位。在中国文字中长大的科学家,就自然会日日增加。日久年深,科学也就在中国本土自然会生根发芽了,不必用外国语作他们的训练或写他们的报告,若有重要的发现或发明,外国科学家也不能不重视的。治"七年之病"的"三年之艾",请自今开始。

在结束本文以前,有一句话我应加重申明。我的这些展望或愿望,并没有意思要科学家(无论是现代的或将来的)不学外国文(在这一过渡时代,学一种欧洲文字,是学科学的必要条件),我只是为"如何使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这个大问题设想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固只是一个愿望,但是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若是青年的语言文字学家,能热心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实现的效力就可以加快了。

中华民国所颁发的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依照古物保管法(民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古物保管会所拟之《采掘古物规则》,到了民国二十四年方完成,并于当年三月十六日由行政院公布。

第一个学术机关,按照这一法令呈请发掘执照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院长。

两年半以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清理该所所存档案,王勉初先生发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执字第一号执照(见附图)仍完全保存在卷宗里。颁发的年月为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九日。申请及接收执照的人为蔡元培院长。执照由内政教育两部盖印。田野工作的领队为梁思永,采掘古物的地方为: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小屯村侯家庄附近一带及洹河南北两岸。

按史语所考古组田野工作的记录,这一次的执照属于安阳田野工作的第十一次。发掘的成果收获最为丰硕:现在借给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所陈列的侯家庄西北冈一〇〇一墓的全部发掘品大半就是第十一次安阳出土的。

一年前(1969 年 11 月)包遵彭先生所著的《博物馆学》出版:分章讨论现代博物馆的历史,分类、采集工作、展览方法及教育意义。其中对于古物之维护工作叙述尤详(共三章)。惟对于古物之发掘有关之问题仅根据联教组织略加提及,未及详细讨论。包先生所著的另外一本书即 1966 年出版的《古物保存法》第 7 页,在讲法律的一段(第七页)说明:

> 古物保存法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制定,同年六月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二十年六月十二日施行。

《采掘古物执照》是照《采掘古物规则》规定的,而采掘古物规则的办法,就是古物保管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当包先生写这两本书时,他曾询问过我:"采掘古物执照是否尚有样本可资参考?"当时我只记得我们在安阳发掘的后期确实遵照法令领取执照;但是抗战时,迁移频繁:此类文件恐多已佚失。不意迁台近二十年后,在清理本所档案内,竟发现了一张,而且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所颁发的第一号。事出意外,其历史价

* 本文原载《包遵彭先生纪念文集》,1971 年台北版,第 69 – 70 页。

值不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重要文件；亦可证明政府对于古物保管法令四十年前已有甚周密之规定。

此事为包先生生前甚关心之一案件，特将原执照摄影放大刊出以资纪念。

1971年1月14日李济记


採取古物執照

內務部

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

现在一代的知识阶级，包括年老的以及最年轻的三辈或四辈，可以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我们需要科学的发展。科学是由西洋的 Science 一字译出的。这一名词，从何时用起？现在不必加以追述。不过我们大家都晓得：在民国初年，就有一群留学美国的留学生，用中文办了一个杂志，名叫《科学》。创办的人们，有许多都已经去世了，但也有一些活到现在的。存在的这些人，都是七十岁以上将近八十岁，或过了八十岁的人了。

到了台湾以后，除了教育部的教学机构提倡科学这门知识外，最近并且设了一个专门机构：为鼓励并且支持科学研究的工作。所以现代年轻的一代，也同好些别国的年青人一样：认为追求科学，是一种很当然的课程，我用"当然"这两个字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一风气，要就中国近代史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新的事业。五十岁以上的教育界人士，大半都可以记得，科学在中国是一门输入的，也可说是进口的一种学问。这句话自然可以引起许多争论的。我今天不想对此事加以肯定或否定。我只是想藉此事说明一件历史的经过。这一历史的经过，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即——"中国地质学对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研究的影响"。因此，我就要先从地质学最初的一段历史，据我所知道的几点重要发展，作些说明。不过，在陈述这段历史以前，我也必须声明的一件事，即：我本人并不是一位地质学家！就我所学的行业说，可以说连初步的地质学训练都没有；但因个别的原因，在我投身学术界的初期，正是中国地质学兴起的阶段。因此，我就很幸运，认识了若干学地质学的朋友。同时，我也有了机会，对地质学发生若干浓厚的兴趣。又因我是一个学人类学的，而人类学却与地质学有不可缺的联系，所以我虽没有受过地质学的专门训练，但对它却并不是完全门外汉；具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在民国十二年自美国留学返国，从事大学教育，在那时的北京和天津，正是地质学发展的时代。我就有机会与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如丁文江先生、章鸿钊先生、李四光先生、翁文灏先生等，都有了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因为对他们有了认

* 本文原载台北《地质》杂志第1卷第2期(1975年)。

识,我也就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渐渐地听了不少的故事。这段历史为什么重要呢?我认为有好几个理由,最重要的是,这一门科学的兴起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它在中国生根萌芽的过程,也可以说,代表西洋科学在中国萌芽生根的过程。

中国读书人和西洋科学接触,实际上可以早溯到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时,天主教有计划地向远东传播宗教,已带进了新兴的西方科学方法,尤其是天算这门专门的知识,以及地理的测量;譬如:康熙皇帝时的天文、地图,都请教过利玛窦一派天主教徒。不过,这些人在中国史上,虽留下若干痕迹,却没有影响到士大夫阶级。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精神,因此没有随这些传教士流传到中国。一直到太平天国以后——到了光绪年间,中国因直接受害于西方的坚甲利兵以后,士大夫方开始感觉到:西方另有一套东西,值得中国人去学。但当时的士大夫所重视的仍是以枪炮、海军、机械为主,而对于这些坚甲利兵的背后,所谓"西洋科学"仍是没有任何真正的认识。这一情形,可以说一直到辛亥革命时代还是没改。前清末年虽有些维新运动,但除了少数人外,实在谈不上有任何科学精神的意义在里面。

情形的转变,也许可以从辛亥革命说起。但却不能用准确的年月来算,历史事象本是一件长期的演变,不过仍有一个具体的事实经过,可以用来说明这演变的发端,同时并可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很长久地踌躇徘徊,拒绝接受西洋科学精神的主要原因。

在这儿,我可以再讲一段历史故事,作上例的说明。在胡适之先生作的《丁文江的传记》中,有一节记载着说:丁先生由英国学成回国时,第一次在中国旅行,地点是西南,他放弃人人常走的海道,而选择了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沿途走路,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这些工作,可以说都是他日后调查西南矿产的准备计划。就在这一行程中,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出版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仍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康熙时代所测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用了不知有多少人——却没人发现这些错误。直到两百年后,丁文江用腿走路,才发现这一错误。丁文江先生后来得到机会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并且做了第一任的所长,这才使这门科学——即地质学,在中国学术界滋长起来,以至生根。

讲到丁文江的治学精神,胡适先生在他作的传记中说得很详细。我个人对他也有些另外的认识,这儿我愿加点资料,除了证明中国地质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及发展的原因之外,而这种精神的培养和扩展,把地质学以外其他的科学,也连同振兴起来,为一般的科学开了一条康庄大路。

丁文江先生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以前,曾经做过工矿部地质科的科长。他发现这个科长没有事可作,只是在桌上看公文,因为那时的机关只是一个衙门,所以也同别的衙

门一样"办公而已"。衙门没有让学地质的人出去调查的经费。当时的北京大学原也有地质这一门功课,但因为收不到学生——冷门——却解散了。地质系有一批图书标本存放着,丁文江觉得衙门中既无事可干,就向北大借了这批东西,由工商部开了一个地质训练班,训练调查地质的专门人才。

丁文江训练人,有他的一套方法。他有两句话,等于他训练人才的标语,就是: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他这两句话不但是有所为而发,并且是所有田野工作者应该了解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位德国有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作了一次地质调查,回国后写了三大报告。在他的序言里,他说中国人的读书的能力很高,但要他用腿走路,他们却以为不是读书人的事,所以中国的学者不能也不会学地质学。丁文江先生要对这句话加以反证,就为学地质的人说了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不能走路,却是不肯走路。现在他决定学地质学,也就同样地能走路。他一生调查都切实作到这两句话。换言之,他生平有一位他所佩服的中国学者——徐霞客。徐霞客研究中国地理,而要自己亲自寻找真凭实据。他向不依书本上的知识,随便论断。我特别提出这段故事,实在是因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特别认为学问只是在书本中寻找的事。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富贵功名,都在方块字中。"实事求是"地去找证据验证,只是一句空话。两汉以后的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实在是由孟子的两句话引起的——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记载孟子抨击许行的思想,曾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这段话,可以代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尤其是宋朝以后的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他们把心和力分成两个没有关系的事件。西方的哲学家,虽说对于精神和物质,也作此分别,但对于身和心却没有像孟子似的,把它们的功能两分得如此隔绝。中国传统中——自宋以来——又进一步将劳心演变到读书,与走路出力完全无关了。汉武帝以后,中国对劳心的人特别尊重,而劳心的人都就流成以认字读书为天下第一件事了。至于"劳力"与劳心者的相距,愈离愈远。这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但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有这个分别存在。因为有这一观念的存在,所以我们的知识阶级,在下意识中,就将自己限制在劳力工作以外了。天主教在明末清初传到中国,对中国这一传统的观念,并未发生丝毫影响。虽然传教士也做过若干动腿动脚的事——这些动作,对那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是与"劳心"的工作无关。直到民国初年,地质学在中国学术界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起,这个界限,可以说才渐渐地打破了。

《丁文江的传记》中,另外还有一段故事,也值得一提。北大在民国五年恢复了地质系。丁文江与蔡元培校长商定合作,由北大训练学生,而地质调查所专门从事调查。传记中说:当第一次毕业生被送到调查所,丁文江就亲自考他们;考他们的方法很简

单,分给他们每人十块岩石,要他们认别,结果却没有一个人及格。丁先生就将这一成绩单拿了去找胡适之先生,两人商议定了,并一同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听了丁文江对地质系的批评,并看了成绩单,就虚心的请教丁文江博士指导:如何改良地质系的教学方法。商议的结果,北大就接受了丁文江的推荐——把李四光和葛利普(A. W. Grsbau)两位地质学家请到北大来主持课系。北大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所以蔡孑民先生登高一呼,提倡了这门学问,就引起全国的注意。葛利普是古生物学家,他同时在北大和地质调查所两边训练人员,并选择优良的人才派送出国。他一直留在北平工作,到抗战后才去世,北大同仁把他埋葬在北大地质馆的前院。民初时,我曾有机会与这位老教授多次见面,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生活很简单。后来因为风湿病,行动不便,因此将学生叫到家中上课。在他门下的古生物学家,如赵亚曾、斯行健、杨钟健、黄汲清、谢家荣等——这些人都是他亲自训练的学生。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古生物学志(*Palaeontologia Sinica*)有好几十种,大半用欧洲各种文字发表在中国各处实际调查的结果。这一系列的出版品,为世界各大学的地质系及研究地质学、古生物学的机构所必备的书。总结一句话,地质调查所由于丁文江及其同志的努力而发展起来,后来又有北京人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学术界的注意。这可以代表西方的科学传播到中国留下的精神种籽。这个根生得有多深?多紧?是另一个问题。但无可否认的,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衷诚地承认地质学这门科学,是一门真实的学问。更重要地,也同时开始承认了科学在学术界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演变。换言之,我们的学术界,无形中变了质了——承认了"劳力"的工作也可以构成知识的一部分。

由于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大学的支持,地质学乃在中国生根发展了起来。民国十年至二十年间,是这门科学发展得最辉煌的时代。我想我应该连带地提到几位国外的科学家,尤其是几位在中国作过长期工作的古生物学及地质学的专家们,和他们对于这些学问的贡献,以及他们帮助这些学问在中国学术界滋长起来的事实。我特别要提到的,有五个人。他们的国籍都不同,有瑞典人、加拿大人、法国人、美国人,以及澳洲籍的德国人。我所以要提出他们五位,因他们不但在地质学上有重大贡献,同时,他们的工作也牵涉到其他的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以至社会调查。这些学问在中国的发展,都受了他们的影响。五个人中有前面已谈过的,如在北大任教的葛利普先生,他不但在专门学术上有宝贵的贡献,就是在人事接触上,也在当时学术界发生了良好的影响。他是当时在北京一带外籍科学家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前辈长老。凡有学术聚会,学者们都尊他为大老。他的言谈,在当时学术界中,都具有无穷的影响。

我说的瑞典籍的地质学家,就是安特生(J. G. Andersson)博士。安特生博士本人

到中国很早,远在葛利普教授以前,就应了北洋政府之聘作顾问——到中国来,帮助矿产的调查。他同别的瑞典科学家一样,除了地质学的专门知识外,也具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和知识。当时,他受任为中国政府矿冶顾问一职,除了为那时的政府发现了不少新的煤矿和铁矿外,他对中国华北一带的古生物调查,也有很大的兴趣。

除了屡次发现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古生物外,他并且是第一个人,到周口店去发现龙骨而引起了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我现在要讲一段故事,就是与北京人发现有关系的。在座各位,都知道些有关北京人发现的经过。最初的工作者,都是一批瑞典学者。当时一般中国人称古生物化石为"龙骨"。安特生最初在周口店发掘的"龙骨",都送到瑞典作分类研究,因为中国学术界中根本就没有这门学问。民国十五年,现在的瑞典国王——当时的皇太子——以皇储的身份,游历各国。他对考古学很有兴趣。曾在欧洲作过发掘。安特生博士史前遗迹的发现,引起了这位皇储的兴趣。所以,在他的旅程中,瑞典的学者就替他安排了在北京停留一个时期;并且在北京举行一个欢迎瑞典皇太子的盛会。在这一会期中,安特生约集了许多专门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地质学家——等人,来欢迎这位对学问有兴趣的贵宾。当时有许多中国学者也参加,如老一辈的梁启超,和年青一辈的丁文江、章鸿钊等人。梁任公讲中国考古学,将北宋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如金石器物文字的考证,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此外,大半都是外国学者的报告。到了最后,由安特生发表一短篇新闻:他说在周口店发现的"龙骨"中,有一枚牙齿,经专家的鉴定,认为大概是原始人类的牙齿。最有趣的自然是报告以后的事,许多听讲的科学家们,对这一条新闻的反应是不同的:多数的很赞同,但也有表示怀疑的。不过结果却是建设性的。地质学会、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这三个机关就联合起来,要求洛氏基金会帮助这一研究的进行,请他们拨款研究周口店一带的古生物。于是就有了"新生代研究室"(Cenozoic laboratory)的产生,由当时的协和医院解剖室主任步达生(Dr. Davidson Black)博士主持,作有计划的发掘,以后的工作不必我在此说了。不久龙骨中又出了一些牙齿,由发掘人亲自送交步达生研究。根据这些新发现,步氏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后,不但证实初期的断定是对的,并推测周口店一带一定还有更多的大量的人骨在。此时,步达生更大胆地根据一个牙齿,为这些人骨取了一个学名——支人属北京类(Sinanthropus Pekinensis)——也就是通称的北京人。这一学名也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里也不用多提了。

另一个我所要讲的是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也参加了欢迎皇储的聚会。他怀疑安特生的论据,在会后,他写信给安特生,表示他自己有些疑心那一颗牙齿可能属于其他的肉食动物。德日进原是法籍天主教神父,早期致力于古生物学研究。他对英国轰动一时的"晓人"案件,可以算是一位案中人。后来"晓人"化石经人类学家数十年的辩论,骗局方才揭穿了。这是古生物学里一件大案子。德日进

初来中国时，与地质调查所无关。他是由天津的另一位天主教神父桑志华请来的；因为桑神父在河套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古生物遗存，自己不懂这一行，就约请了德日进来华共同研究。大家都知道初期的史前考古学，是法国人创作的，到德日进时代，已经是第五代了。他承继了法国优厚的学术传统，在中国作田野工作，可说是开荒工作，以他的经验技术论，自然是游刃有余了。他初期到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文章都发表在法国的专门杂志。后来为中国学术界所借重，并参加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田野及研究行列，鉴别了许多化石标本，为周口店古生物研究的最有力的一支生力军。他更从事了很多其他各地的考古工作，把中国史前考古的许多空隙逐渐填满。他所发表的专门报告及普通书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直到抗战将结束时才离开中国。

自从洛氏基金会支持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正式在周口店发掘出人的牙齿及其他体骨后，北京学术界中，常常谈论此事。步达生发表了他为北京人定的属名种名，问题就更热了。有一时期大家要知道所出的化石是男人还是女人？葛利普在一次宴会上，酒酣耳热之际，就发出了这一个有趣的问题，问安特生博士道：“发掘的北京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我提出这一故事，只是要告诉大家，当时在北京有非常浓厚的学术风气，这个风气是纯洁的，代表真正的科学精神，没有其他成分掺杂在内。而且是超国际的，任何国际的科学家均融和在这种风气中。而这种风气的造成，显然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有关。在此也不用多谈。

还有一位科学家，我要谈到的，是继承步达生博士的澳洲籍的德国人魏敦瑞博士(F. Weidenreich)了。步达生死于他的研究室中。当时因工作进行得正紧张顺利，同时中国的科学家也训练成熟；洛氏基金会决定继续支持。于是国际学术界以英国的人类学权威(Elliot Smith)为主席，就公推魏敦瑞教授这位头等的化石人类学家来接替步达生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魏敦瑞对北京人研究成果的报告很多，其水准是世界少可比得上的，报告内容不但是资料全，而且分析得更清楚。所以，虽然北京人的标本后来丢了，但能有这报告集完成，也是很幸运的。直到太平洋战事发生，魏敦瑞才离开中国。

这五个人，有两个死在中国，其他三人都曾作过长期的停留。他们都有丰富的报告发表，他们的工作，为中国输入了西方科学最高精神，构成了若干里程碑，给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但很大，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最后，我所要谈的是，早期的这些中国籍或外国籍的学者们所努力的结果，除了影响到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外，对其他的许多学科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举例来说：如考古学，我这样说，不单凭感情的成分说，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我和梁思永都受过地质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将八百年来的传统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学家多半带有好玩的性质，俗谓“古玩”；古玩，是有意义的；传统的考古学者所重视的是艺术性，真正

从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认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须要自己跑路,与地质学家一样。除了考古学以外,民族学、语言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也与地质学有关。丁文江在云南调查矿产时,就发现当地是一个作民族调查、语言研究的好地方,并且曾作了初步的尝试。在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对社会的界限都还不清楚,社会学研究所刚开始组织时还找不到所长,先后由蔡元培、傅斯年兼任。像丁文江对云南箇旧锡矿工人的生活调查,就很少人知道。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有比这更早的有科学意义的社会调查。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今日各科的学生都懂得作报告、写专书要自己去动手动脚找材料。这的确是和过去中国知识界中将劳心和劳力作严格分界的传统不同的地方。孟夫子的一段话,现在只能作历史参考了,再不会有人把这两句话奉为经典。

李济的一些观点*

关于文化传播：

人是动物。他们四出活动，就连高山也不能让他们却步。凡能满足我们祖先的需要的发明，都会得到采用（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妨碍他们！）。早期的世界交通只受到不可通行的水面的阻拦。佯维思（H. L. Movius）教授曾指出，印度尼西亚在旧石器时代很可能跟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因为“北京人”和“爪哇人”是相近的。

马拉战车是由于中国跟西方接触才传播进来，这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安阳出土的矛头，不论在外形或是从细部上看，都跟爱尔兰青铜时代第三纪的制品有异常相似之处。李济在1936年去英国讲学时，曾带回一整套《古物》（*Antiquity*）。他发现其中有一篇论爱尔兰青铜时代的长文，其附图表明了上述那种惊人的相似。

关于政治：

李济承认他有一种厌恶政治的偏见。他认为这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宁愿作一名默默无闻的小京官，而不愿出任地方上的长官。“那种地方让人堕落：罪恶、腐败和权力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不过，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要是没有人去担负行政职务，地球又怎么运转呢”？

在李济看来，国民党的垮台主要是坏在二陈兄弟的所作所为……还有孔祥熙和宋子文。

---

* 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是李济的多年好友。1977年9月，费慰梅到台北访问李济，专门为他作了两次口述历史（自传）记录。次年二月，慰梅把整理好的记录寄给李济，并附上一信请李修改和补充。李济作了少量修订，并在8月复了慰梅一信。

费慰梅所作的口述记录，至今未见发表，但她把记录的最后部分加上了一个“李济的一些观点”这样的题目寄给了我。这几段文字（自然，是经慰梅整理过的）很有意思，代表了作者晚年的一些看法。我把它译成中文收在这本文集里。——文集执行副主编李光谟

关于美国的长处和短处:

长处:从罗马法继承过来的……对法律的尊重。

早期建立的自由教育制度(例如1830年建立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关于一定规模的居民社区必须设立高等学校的规定;国家拨给土地建造工科和农科大学。

富人大量捐款用于公益事业(如公共图书馆、基金会)的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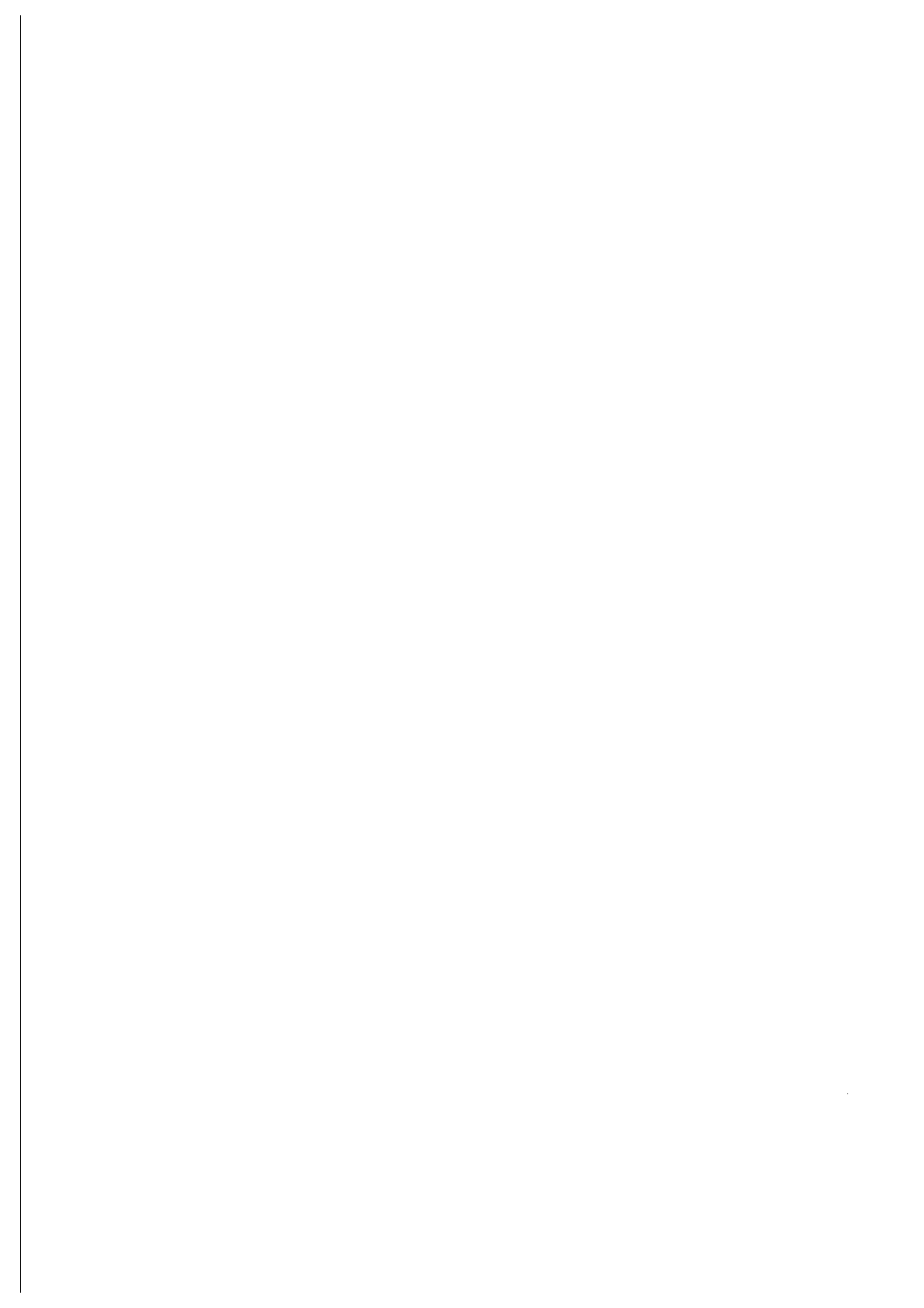
短处:种族偏见。

1978年整理(英文稿)

1980年译成中文

序跋致辞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

我们这次得了政府的提倡,友人的帮助,在安阳实行了一次有计划的挖掘:参与此事的同人,虽经过十分的辛苦,都是始终忘倦。所得的实物有好多都是先前所不知道的。从最初挖掘的时候起,凡是出土的,我们不论巨细都收起来;就是丢去的瓦砾,也都经过我们的眼,认为毫无价值的方才丢去。积的东西多了,研究的手续也繁重了;不但文字的考订需要专门的知识;一副骨头、一块木炭、一个瓦罐子、一片破铜的研究,也一样的需要专门的知识。有了这种专门的学者参加,方能得到相当的结果;但这不是短时间所能作得到的。

同时:有好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急于要知道我们这次挖掘的经过及新出土的实物。因为挖掘没完,我们事实上不能作个完全的报告;因为我们又要继续挖掘去,时间上也不容许我们这时就作一篇完全的报告。因此我们决定部分的分期发表我们研究的结果;这种专刊就是为此而设。刊内发表的意见,不一定是我们最后的意见;但在我们作得到的范围内,发表的事实是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殷墟的发掘何时能了,我们现在不能预定,这种工作不了,谁也不能有最后的意见。但是实物是不变的!随时公布它们出土的历史,以备大家共同研究,也是我们当然的责任,这是我们发表这个刊物的又一个意义。

李　济

1929年10月1日

附　蔡元培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作的序**

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

---

* 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 本文原载《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都有很大的贡献。后来经过汉学睥睨宋朝一切学问的一个时代,未免太把宋人低量了。直到阮芸台、吴清卿等手中,古代文字器物学又大振作,然后渐渐觉得宋人知识之富、审鉴之精,远非正统汉学家所料到的。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

但,学问一事和世间上其他事业一样,总不能"故步自封"的,总是"后来居上"的。我们的古学虽然在宋朝已经有那样的成就,但宋朝到现代七八百年。近几百年中,世界为自然科学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适合现代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补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

下列的一册,虽是试验发掘所得结果之一部分,但确是因应上文所说的要求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颇可纪念。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托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殷墟情形,看其尚可工作否。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一次,断其后来大可作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人暑作一结束,回到北平整理。这一本便是李、董两君整理到现在的结果之一部分。

这件事业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完成的,即就去秋试验之打探、今春短期之发掘而论,下文所布亦不过当全部所得十分之一光景。但这几篇文字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

(1) 立足点是整个的。古来研究文字者每每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统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这样,实在尤其不应该是这样。现在李君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董君于试探之始即注意在此文字层之如何来,并设定其为冲积而成。这样的把问题整个抓住,不但做一件一件的捉摸,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

(2) 问题之组成,正如自然科学之组成,非复如传统古学者之但成一家言。此如李君之初论陶器,董君之统论龟卜,一语一说皆取实物为证。有材料乃生问题,因问题而求旁证参考,资此旁证参考而置此问题于其正当之视线上,不以设定为决论,不为阙漏作补苴。这样的处置问题,乃真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这不过仅举其大概,至于一义之辟,一解之精,李君比综异地文化遗留,董君贯通吾国经典材料,读者可以随时遇到,不待我现在去标举。近年治汉学者每流成书本上的反复辨论,李、董诸君却向地下寻新材料,流传器物所负问题之难决,由于不知其出土情形,不得已而阙疑;李董诸君却处处求之于目证。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经久以后,总能为中国古学开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必是读这一册的人和我共同的印象!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叙于上海

蔡元培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序*

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要没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种殷勤，清代小学的研究，就不会有那种朴实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适在清代古文字学隆兴之后，两相衔接，中国一切旧学，因此就辟出来一个新的途径。由此而注意发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资料，只是向前进一步的事，可谓一种应有的趋势。再加以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化的考古学就应运而生了。

现在我们只是起首作这种工夫，好些研究的组织，尚不十分完备，那是不可讳言的。但近十年来，所得的材料，已不少了。卫聚贤先生现在把关于这类的事实，汇集起来，作了一个节略；并将相关的出版品，作了总介绍；冠以阮芸台、梁任公、王静安三篇考古的著述，成《中国考古小史》一本；使读者一阅而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事实，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因为之序。

李　济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

*本文原载《中国考古小史》(1931年)。

《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

在第一期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中,我们曾申述印行这个刊物的两个旨趣,为随时报告发掘的经过及刊布研究的结果,自民国十七年秋天史语所试掘殷墟起,现在已经快到五年了;发掘虽有七次,报告却只出了四期,并且决定以这一期作一暂时结束。这是经过一个长期考虑的决定。

安阳发掘虽不以殷墟为限,然而这些次的活动却专重殷墟,事实上并以出甲骨文字之小屯为工作的中心。据现在发掘的状况,不但殷墟尚没作完,即小屯村左右,也只掘了一小部分。不过由这一小部分的工作所得的材料,我们对于殷墟所代表的殷商文化,已经可以形成一个具体的概念。几个基本问题——如建筑,青铜,文字系统,与早期文化之关系等,均由此得了一个大致不错的解决的方向。继起的工作,自可加增新的材料;但在殷墟范围以内,那些材料的性质,是我们现在可以估料得到的。因此,我们觉得这种只具临时性质的报告,现确可作一结束;并且应该开始作正式报告的预备了。

在这七次的发掘中,事务及组织均经过若干变迁。有的,是在各期报告中已经提过的;有的尚没得机会说过,今总括如下:

发掘次数	时　　期	工作人员	参加人员	发掘地	经　　费
1	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日	董作宾 赵芝庭 李春昱 王　湘	张锡晋 郭宝钧	小屯村北 村内	史语所工作费
2	十八年三月七日至五月十日	李　济 王庆昌 董作宾 王　湘 董光忠	裴文中	小屯村北 村内 村南	美国复利尔艺术陈列馆协助费
3	十八年十月七日至十二月十二日	李　济 张蔚然 董作宾 王　湘 董光忠		小屯村北 村西北	美国复利尔艺术陈列馆协助费

* 本文原载《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续表）

发掘次数	时　期	工作人员	参加人员	发掘地	经　费
4	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一日	李　济 刘屿霞 董作宾 李光宇 梁思永 王　湘 郭宝钧 周英学 吴金鼎	关百益 谷重轮 许敬参 石璋如 冯进贤 刘　燿 马元材	小屯村北 后　冈 四盘磨	史语所工作费
5	二十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董作宾 刘屿霞 梁思永 王　湘 郭宝钧	张　善 李英百 石璋如 刘　燿	小屯村北 村内 后　冈	文化基金会补助费
6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李　济 李光宇 董作宾 王　湘 吴金鼎 石璋如 刘屿霞 周英学		小屯村北 王裕口 霍家小庄 侯家庄	文化基金会补助费
7	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李　济 李光宇 董作宾 石璋如		小屯村北	文化基金会补助费

关于第二次及第三次所受美国复利尔艺术陈列馆协助经费的经过，是殷墟发掘早期的一段重要历史，现在应该追述一下。但要把这段历史说明白，有一段涉及编者个人的事实，须连带叙述，请读者原谅。

是在民国十四年的春天，那时尚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我收到了复利尔艺术陈列馆代表毕士博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约我加入他们的考古工作团体。经过好些书札与当面的商量，在两种了解之下，我接受了他们的聘约；那两种了解就是：

（1）凡一切由我主持之田野工作必须与一中国学术机关合作。

（2）凡由此种工作所得之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境内。那时适逢清华学校筹设研究院，约我去作讲师；所以我受聘于复利尔艺术陈列馆之后，第一次的正式工作，就是用清华研究院与复利尔艺术陈列馆两个机关合作的名义。那合作的条件，是由两个机关直接商订的。我的责任，只是向每一机关作一个正式的报告；民国十四年、十五年我到山西去了两趟，发现了夏县西阴村彩陶遗址，并正式发掘了一次，同时作了两份报告。中文报告由清华研究院出版，英文的现尚庋藏在复利尔艺术陈列馆。

民国十七年，清华研究院决定改组。那年我到美国去了一次，对于工作的组织，复利尔艺术馆方面也没新的意见，仍付我全权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这种工作。那年适值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在我没回国时，研究院即电约我主持史语所考古的事业。十七年十二月，道经广州，第一次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

我告诉了他两年来我的工作经过,他就把考古组主任一职付与我了。从十八年春到十九年夏,我同时兼了两种职务:一方面主持复利尔艺术陈列馆田野工作;一方面作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但实际上只是一件事情。我的薪水仍由美方支给,同时研究院每月也送我一点津贴,完全照先前清华研究院的办法,这都是两个机关互知的。不过名义上虽是如此合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合作条件。因为这是一种新辟的事业,两个机关均想先尝试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是实际上合作得到的条件。

十八年工作两季,均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个人的责任就是写两份同样的报告;一份送呈中央研究院,一份送与美方。

十八年的冬天,毕士博从美国回到北平,开始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商量正式的合作条件。两方都具有相当的诚意,但也各有自身的立场。磋商了差不多两个月,但是找不到一个两方都能同意的方式。就我个人说,这自然不是一个经久的办法,所以我于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方辞了我的职务,同年六月底,他们就允许我解职。二十年十月底我完成了对于美方英文的报告。现在也在美方庋藏,并没发表。

十九年夏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议决赠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讲座一席,由我担任;从十九年七月起,在职务上我只对于史语所负责;同时对于基金会方面我只每年作一次工作经过报告。自二十年度起,基金会又协助史语所田野工作经费每年一万;故第五、六、七次安阳发掘均由此项协款拨付。

安阳发掘我们仍要继续下去的;以后是否要继续这种报告,我们只有看发掘情形再说。我们现拟定将来关于发掘报告的三个办法:

续刊安阳发掘报告

另组考古田野工作报告

集刊发表

究竟采取哪一种,现在自然尚不能说。

安阳发掘的正式报告,我们现在也预备了一个大纲了,大致分类如下:

(1) 发掘经过

(2) 建筑遗址

(3) 骨卜、龟卜与甲骨文字

(4) 冶铜术与青铜器及他种金属品

(5) 陶器

(6) 石器,骨器,蚌器等

(7) 兽骨

(8) 附近遗址

(9) 墓葬

(10) 宗教艺术及社会组织

这些工作大部均在进行中,但完成时总在二十三年本所南京新屋落成后。

李 济

1933年6月27日

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序*

本书作者李霖灿君到云南一带旅行，最初的动机，完全是艺术的。他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就以卖画筹旅费的办法，东跑西跑的跑到丽江去了。在这地方看见了麽些文字宛如画图，他就不自觉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完全是他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前的事。博物院听说他在丽江工作的成绩，就托他担任搜集丽江一带民俗材料的任务，并指定特别注意麽些经典。他在丽江一带游历，前后将近四年，共采集了麽些经典 1231 册；中间除了 3 册是用音标字写的外，其余的都是象形文字。在这时间，他并学会了说麽些话，读麽些文字，编辑了一部象形文字字典。当他最初将所编字典的稿本寄到李庄时，我们送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李方桂先生审查。李先生看后说，编制得还好，但所用音符应该照国际音标，原用符号的音值，是否准确，就不能断定了。三十二年的秋天，李君由丽江回李庄，同行和才君原是一位“道地”的麽些读书人，本来预备学习“多巴”的；在丽江一带，他已经帮了李君好几年的忙。因此我们商得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意，就请张琨先生与和才君将字典中各字的音，都校订了一遍；由和才君发音，张琨先生听音，标注音符。张先生是方桂先生训练出来的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语言学家，现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所以这部字典单就发音与注音方面讲，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已值得印出来供研究民族学及语言学家的参考了。

国内学者注意“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的人，已日渐增多了。要认识这些问题的真面目，最要紧的似乎是应该从说他们的话、读他们的书(假如有的话)入手。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如民族学、比较语言学，自然更应该走这一条道路。人类虽说是用文字用惯了，但创造一种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中并不是常见的事。有了这件事，无论它出现在地球上哪个角落里，都值得若干人们钻研一辈子。在东亚这个区域内，除了汉字集团外，其他的系统是有数的；麽些文字就是这有数系统内极重要的一个。无论这文字将来命运如何，用这文字写的经典，已经支配了麽些人的精神及社会生活若干世纪，

---

* 本文原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4 年印行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石印本。

或者还要继续着如此的支配他们好些时。单从文字方面看,我们自然可以说,麼些的象形文字是在急剧的变化中。音标字的突起,不久的将来也许会代替全部的象形文字。假如这件事要实现,那岂不是现代学者求之不得而忽然能亲眼看见的一种奇迹!好像埃及象形文字用音符代替的历史重演一次!好像甲骨文到注音字母的三千多年的历史,来了一个撮要。要是我们跟着麼些文字的变化走,体会出来它演进的种种原故,岂不是也可以用作解释其他象形文字演变的若干原因的一部分!

我们决定印这部字典,一半的理由也是希望能引起若干文字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注意。

编辑一个字典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的。若是要"求全",这"全"的标准却也是一个大问题。无论在记录科学或实验科学中,要是求他们不断的进步的话,我们最应该宝贵的是继续发现新的事实:材料的新,观念的新,方法的新,解释的新,都值得表扬。只有如此方能使一门学问继续进步。在这个意义下,虽然这字典排列的方法,以及许多推论,都带点尝试性质,我们觉得那所采用的材料是够新的了。假如由这部字典可以继续的引出别的新材料出来,使我们将来可以编一部"较完"的新麼些象形文字字典,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作者的贡献却不以此为限,他把拿喜人(即麼些人)迁移的路线弄明白了;他把象形字与标音字出现的先后问题解决了;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新贡献,均值得称述的。

李 济

1944 年 8 月 5 日

《中国考古学报》前言*

自《安阳发掘报告》改为《田野考古报告》,出了一期,抗战就开始了。七七事变一年的春天,我们正作殷墟第十五次的发掘;那时的田野考古,就组织及训练上说,均渐臻完备。田野工作的范围,正在渐渐的推广,并有了不少的新收获,所以编辑《田野考古报告》的人,对于这刊物的前途,具有极大的信心。战争终于爆发了。国难期间,考古组同人所荷的负担是特别的重,他们对于那将近十年所采集的资料,无论是一块残石头,或一块破瓦片,都不肯轻易舍弃,故终于把它们保存了;虽说不是完全无关,但重要部分都没遗失;这一点想是世人很喜欢知道的。资料是要人整理的;没有采集人的说明,这些资料的价值就不能全部表达出来。这一期的稿件,在抗战的第三年就集成了;所有写作人,都是田野工作人。但在二十九年夏天付印的时候,他们大半都已星散。战事的演变,终于使这部稿子,虽得付印而不能按期出版;直到了敌人投降一年以后,承印人才把打的纸版清出来。纸版居然没毁,实给予编辑人一种望外的喜悦。

但这个喜悦却包含着无限的酸辛。试看这个统计:六篇报告的作者已死了两位,改业的又有两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寻两君抱残守阙到了现在;但他们的健康已被战事折磨了大半。至于去世的是祁延霈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传略。这种损失在将来的和会上是否可以列入赔偿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赔偿可以抵补这种损失么?不过无论麦克阿瑟将军所主持的盟军总部对于此类损失作何打算,我们仍希望负责计算中国在战争中文化损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这一项的道义的和法律的意义。

这本刊物终于能与读者相见,自然是一件可幸的事。编辑部主张把这刊物的名称再改一次:叫作《考古学报》,并从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就改起,即最近翻印这一期时改为此名:这是很有道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没有;但考古组的工作却不能不继续。田野工作人员从此在屋内读读书,除写作未完成的报告外,再多写点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许对考古学可以有更新的贡献。这却并不是说

* 本文原载《中国考古学报》第2期(1947年)。

《考古学报》将没有《田野考古报告》的文章;只是说,《田野考古报告》将来只能成为这刊物的一部分稿子,也许是大部分的稿子,那要看环境与发展了。

李　济

1947 年 3 月 24 日

《殷虚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

《殷虚文字甲编》将出版，彦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作了一篇自序寄回来；序中有一段说："如第四次发掘的E16坑，这是一个圆井，应该叫做窦的，井中只有一、二期的卜辞，深至10米，下及水面；因为两丈以下全是沙土，第二期祖甲时，此窦塌陷，也就废而不用了。所以当时存储的东西，也就留到如今……"

这段话说得有点过于简略；既牵涉到了若干原始材料的时代问题，E16坑又是我亲自看守它发掘的，我觉得应该加点补充的说明，以免引起误解。这坑的发掘开始于1931年4月10日上午8时，终结于5月2日，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中间因为下雨及星期日的停工，实际只工作了九天。这九天发掘一般的经过情形，见《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564—567页；读者可以参考。自序说"两丈以下，全是沙土"，这一句话，大概是指原记录所说的：4月16日上午，5.2—5.8米："下层渐有粗沙"，同日下午，5.6—6米："……土色如上，渐夹沙土"。但4月20日上午的记载(坑深：6—6.6米)却是："壁旁仍为黄沙，数日前所见之黄沙，并非地下之沙层，确为淤入者。"以上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我个人对于殷墟文化层的构成，也常因新的事实发现，而变更我的见解；但关于E16坑的堆积情形，我始终没有看出有何种现象或事实可以算作这坑在祖甲或其他时代塌陷的证据。到了将近最下层，诚然有石块渐多的记录，但这只是最下1米上下的现象，也不能作塌陷说的根据。总结起来说，照当时的发掘记录，我们所知道的是：5.2—6.6米深处，坑内有一段淤沙，但并非"地下之沙层"。在5.2米以上，坑内已出有带字的龟甲及大宗铜器；在淤沙的一段，曾掘出大量的兽骨，多数都是肋骨与腿骨；但大部分的甲骨出于7米以下近坑底的地方。彦堂说："井中只有一、二期的卜辞……"，这自然是一个经过长期研究，且非常重要的结论，给我们解释E16坑文化层堆积一个最可靠的凭藉。让我们看看E16坑出土的甲骨，在坑内由上往下分布的秩序(表1)：

---

*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

表 1

发掘日期	坑深(米)	出土甲骨	图版编号
4月14日	3.5—4.5	(甲)3	(甲)2941,2942
4月15日	4.5—5.2	(甲)7	(甲)2943—2949
4月16日	5.2—6	(甲)11	(甲)2950—2959
4月20日	6.0—7.1	(甲18;(骨)1	(甲)2961—2977 (骨)3330
4月21日	7.1—8	(甲)27;(骨)2	(甲)2978—2999;3324—3328。(骨)3361,3362
4月22日	8—8.8	(甲)173;(骨)10	(甲)3000—3144,3322 (骨)3331—3345
5月2日	8.8—9.4	(甲)46;(骨)1	(甲 3145—3176 (骨)3346

据表1,E16坑带字的甲骨在14日就开始出土,那一天所掘的深度,自离地面3.5米起,到离地面4.5米止:离坑口在1.6—2.6米之间,在这个深度以上,我们并没找着任何可以作解释这坑早期塌陷的物证。由离地面4.5米向下掘,带字的龟甲陆续出现,与它们同出的,有带釉的陶片(15日)、白陶片(16日)、黑陶及方格纹陶(16、20日)、"将军盔"式陶(21日);大宗铜器(15日),大堆蚌壳(16日),大量肋骨(16、17日),成层蜗牛;土层的变迁,由灰褐色、灰黄色,而渐夹有木炭、粗沙,色渐变黑(16日),而夹类似石灰质粒(16日下午),而带淤沙(20日)及大块木炭(21日),而成淤泥(21日),夹大量石块(22日),直到水面(5月1日)。虽说多数的带字甲骨均出于离地面7米深以下,但其他的重要出土品,均在较上的位置出现,并有少数的带字龟甲在同一水准上,似乎可用作证明它们的时代。

照董先生的论断,凡是E16坑出土的器物,都属于祖甲或祖甲以前的时代;这条重要的论断同时包含下列几条必然的推论:

(1) 见于E16坑的各色各式陶器——黑色陶、灰陶、红陶、白陶、带釉陶——都是祖甲或祖甲以前的陶器。

(2) 见于E16坑的各种铜器——各式斧形器,各式句兵、刺兵,各样铜矢,各种装饰小件——都是祖甲或祖甲以前的铜器。

(3) 见于E16坑的其他各种实物——朱砂、黄金、玉器、雕花骨器等——也都是祖甲或祖甲以前的实物。

假如我们确能证实E16坑是在祖甲时封闭或塌陷的,上列的推论自然不会引起什么疑问。若说照断代的研究,这一坑所出的甲骨文字,没有比祖甲时代更晚的,因此也就可以连带断定,与甲骨同出的器物,也必然与它们同时——这个"必然"却需要另外的证明。关于这一点,彦堂在他的自序内,却没详细地说明,他只说:甲骨文字"是可以确证遗址遗物的年代"的。在原则上,我们自然可以承认这话的正确性;但它的正确性

也应该是有条件的。至于如何才能把这一原则运用得恰到好处,大半要看我们对于与甲骨同著的现象是否也作过同样的、彻底的研究。若说,在一块版筑土中,找出一块可以认为是祖甲时代的带字龟版或兽骨,就断定这片版筑也是祖甲时代筑的,这就可以引起大大的争端,譬如,看一所专藏宋版书的现代图书馆书库,我们不能因为书是宋朝的,也说庋书的书架、库内用的桌椅、纸张笔墨,甚至连库房的建筑,都必定是宋朝的。同样地,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坑内出有某一时代的甲骨,也就断定其他的实物与甲骨同时;甲骨的存在,若运用得适当,只能给同坑出土的实物一个最早时代的限制;至于最晚时代的限制,单靠甲骨文的联系是不够的。

E16 坑出过带釉的陶、白陶,若干不同样子的铜矢——有些,我以为是较晚的形制,却出现于最下层——这些当然都可以早到祖甲时代或以前;不过这一类的判断是否能与这遗址内所有的现象相符,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假如这些实物分类的与个别的研究所得的结论,能与甲骨文字研究所得的结论扣合起来,我们对于 E16 坑全坑的堆积时代,自然可以接受董先生的意见;要是所得的结论证明,有若干实物不能早到祖甲时代,我们也就不能单靠一方面证据,把 E16 坑的最后堆积强为提早。

好久没与彦堂讨论这些问题了;近日交通当局把邮费提高了一个数,简直使我们发不起一封去外国的信——似乎有意地要没收我们与在国外朋友的通信权。读了他的自序,想起殷墟发掘的历史,如作梦一般。这篇短跋,只算代替了与他通信,并志想念之情。

1948 年正月 17 日　李济跋于南京鸡鸣寺路,史语所二楼

石璋如《考古年表》序*

"田野考古"这一观念,虽说借自欧洲,但在中文里,这一名词却完全创自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十七年,傅斯年先生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发表创办的旨趣,说道:

"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集刊一本一分第九页)又说:

"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集刊一本一分第十页)。

所以他就尽了最大的力量向这一个方向发展历史语言研究的工作。

田野考古终极的目的,自然是寻找史料,但其开始必自调查入手。这里包括对于史学观念的一个基本改变。古之所谓博学者,为读穷万卷书——有字的书;治史学也只是如此。故治史学的人们,就是读史。但是傅先生虽是一位极博学的人,他办史语所却不以"读书的人"自居;他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故他所奖励的是——跑腿而能"找东西"的人。

找什么东西?石璋如先生编辑的这本小册子所记录的就是这些"东西"内容的一部分。这册子包括了五个表;五个表算是把史语所二十余年来田野考古的成绩总括叙述了一次。就史料说,它们的价值是不十分相等的;不过相差的方面,只是程度,不是品质。它们的品质,都代表十足的现代考古学的成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作学问的一点消息出来。

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

---

*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35本(1952年)。

我听这话已近二十年了。那时这一册子的作者刚出了大学的门限。假如他早生二十年,他一定也要走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条路的。他没有生早,他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又生在中国文化发育的家乡,所以他选择考古为职业,实占有时代与地理环境的两重便宜。他对于学术的见解,信心、耐性、忠实及恒心,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这些都是一个作田野工作的人必备条件,而璋如却是无一不备。他追求这一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他的恒心尤值得称赞。

同时我们更应知道,现代的学术是一种集团工作,或者说,用傅先生的一个旧名词,是一种"合众"工作。这在十九世纪以来发展的实验科学、自然科学,固然是很显然的;在文史学也不例外。以考古学论,若要推进这一门学问,绝不是一两个私人所能担负的。试看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在中亚工作的组织,他们差不多有全国家的力量在他们的背后作后盾。再就研究方面说:各部门都极端专门化了,一次发掘的收获,往往需要十数个专家整理;不然,你就得不到适当的结论。不过要把这些专门的工作集结起来,固然需要各自对于现代学术性质的认识;尤需要的是一个机关的存在,总汇一切,使劬学之士,一方面可以认识已得的成绩,一方面可以传递智慧的火炬,安稳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参予工作的个人寿命,同一切的寿命一样是有限的。现代学术机关的功能,就是把无数的有限生命的精力,凝成一股无涯的智慧力量;在这一长流内,使老年的得以融会,壮年的有所发扬,青年的可以学习;这就是现代的科学。

这本手册,把本所二十余年以来的调查发掘工作,录在一起,目的是在使后来的考古者,可以在短时间明了已得的成绩;完成及未完成的工作,何处必须继续下去,何处不必再下工夫,旧的问题如何解决,新的问题何在;使他们可以再向前进,不必再走不必走的道路,也可以认明新的方向。

作者编这一手册目的在此;本所印这一手册的目的更是如此。

李　济

1952年8月28日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

本文写于1948年春夏之交,为整理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第二篇报告。第一篇讲容器,刊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这一篇原编入拟定1949年出版的《考古学报》第四册内,1948年8月即送商务印书馆排印;但等到最后校稿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已搬到台湾来了。最后校稿送印刷厂后,也就没得到关于此文的任何消息。作者初迁台时,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丧失殆尽;旋为生活所迫,执教台湾大学,不得不重理旧业。两年前,得到日本友人的来函说,《考古学报》第四册已出版,并到了日本;但是否原样,因为作者自己并没得到一本,就无法知道。除了日本,其他国家,此文是否流传到,却甚难判断。不久以前,英国的叶慈教授来函询问,《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在何处购买,这至少证明在英国,也不容易买到这一类的出版品。瑞典的高本汉教授[1],似乎也没看到本文;美国的 Max Loehr[2] 与维也纳的 Karl Jettmar[3],在近两年讨论铜刀子问题,虽说提到早期《安阳发掘报告》有关的资料,但与他们最有关的本篇报告,却没有列入他们的参考书报之内。

作者很感谢《文史哲学报》的编辑委员会;他们很慷慨地允许了把这篇论文重印一次,使这一部重要资料得与各国关心安阳发掘的人士相见。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二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长城以南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

---

* 本文原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册)。曾收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考古琐谈》。

[1] Bernhard Karlgren: *Some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 E. A.* pp. 22–25 BMFEA, Vol. 21, 1949.

[2] Max Loehr: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pp. 77–161, Vol XIV, Artibus Asiae, 1951.

[3] Karl 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pp. 83–126, BMFEA, Vol 22, 1950.

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他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文，有时虽也免不了“卤莽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青铜刀子引出的问题，也是中国早期文化的原始问题，即公元前三千年前至前一千年前黄河流域的若干文化活动，与西伯利亚的额尔济斯河流域、叶尼塞河流域以及勒那河流域的人类迁徙是什么关系？作者并不能同意马克斯罗越(Max Loehr)的说法；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我们习用的殷商年代，最近虽已经若干专家作过精密的商讨，仍没达到确定的程度。所以专就这一面说，问题是方才提出；在解决以前，必须作的工夫还很多很多咧！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李　济

1953年2月28日，台北夜12时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

没有来到台湾，早已听说了台大搜藏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的标本。

考古人类学系成立时，所承袭的一笔最大的资本，就是这些标本。不过，经过了一次战乱，标本已经佚失了不少；关于搜集的经过，也很少原始的记录；纵有，也是语焉不详：这是甚令人失望的！但是标本的本身却都是真实可靠；差不多每一件都有它的科学价值。本系成立后，教授、助教与学生，各就其兴趣所在，对此项标本加以论述的，已经完成了好几篇论文了。

经过了数年的考虑，对于这批资料的处理，本系同仁，都同意下列的几项办法：(1)我们必须把每一件标本，作一次详尽的记录，登在卡片上，说明一切；尤应注重的，是器物的来源及搜藏的经过。这一编目工作，已于两年前开始了。(2) 较重要的登记及研究的意见即时公诸同好以资商讨，并藉以促进社会上对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一般的兴趣。(3) 出版的方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大篇的研究，我们可以送请《文史哲学报》登载，有国际意义的，也可以在国外刊印；但是(4)通常的记录以及若干科学问题初步讨论，却找不出适当的地方发表，而发表它们，实是促进这几门学问发展的必要工作，并且，(5) 本系规定有田野实习的课程，考古学与民族学标本年年的增加，是必然的事件。对于这些新加标本的描写及叙述，虽说大半只是归档，但也必有不少是值得公布的；公布它们也是我们的义务。因此我们就提议了发行这一刊物的一个草案；经过几次审慎的讨论，并得到刘教务长及沈院长的赞助，这一刊物的出版，就因此实现了。

本系同仁决定出版此一刊物，除了上说的实际理由外，尚有几条与教学及科学研究有关系的意见，撮叙于此，以说明本刊之旨趣。

我们现在所遭逢的是一个动荡时代；一切学问的资料，都是难得而易失。这一类的例实在太多了，真是举不胜举；周口店的古生物以及北京人的研究，要不是步达生与魏敦瑞几位不分昼夜不惜生命地硬干，决不会有现在的成绩；经过第二次大战后，它们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期(1953年)。

或已为科学界忘却了。安阳发掘时,开始我们就注意采集遗存内的木炭,很小心地把它们检取出来,放在玻璃管内保存着——不是要用它们定年岁,那时世界上还没有这门学问,只是要鉴定它们的种类;——但是卢沟桥的炮声发动了东亚的"圣战"后,殷墟发掘团仓皇地离开了安阳,历史语言研究所仓皇地离开了南京;那时的命令虽说是尽量地把这些标本搬走,但是要搬走的东西太多了,竟没有把它们列进去;到现在,碳素第十四(Carbon 14)尚没有找着一条安阳的例,岂不是考古学上一个莫大的损失!一种适当的以及即时的记录虽不能完全免除这一类损失;但至少可以使它们有案可稽,不至完全沉没。

"专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带些神秘性;"过分专门"已有讥讽的意义了。但是社会,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是崇拜科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都是科学事业,若是有过分专门的嫌疑,也许还是它们的专门专得不够彻底的缘故吧!真正的专门学术,没有与社会完全脱节的;试看考古学如何影响了历史,历史家的意见如何影响了现在国际的关系!民族学如何影响社会以及政治!这些影响都可以放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去。但是它们的影响的开始,必须追根到这些科学本身的培植与滋长。在这一方面,本系同仁甚愿有所努力;这是我们出版这一刊物的一个基本意思。

1953年5月

《殷墟建筑遗存》序*

对于小屯地面下的情形逐渐的认识，可以说是殷墟发掘团在安阳田野工作的成绩中，最值得称述的部分。根据这些新知识——尤其是版筑的发现——我们：

(1) 对于华北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一个可靠的指标；

(2) 对于中国建筑早期的发展，得了若干基本的认识；

(3) 对于小屯出土的器物，有了一种断代的标准；

(4) 发现了殷商时代的墓葬区。

这些新的发现更供给了从事田野考古的学人们一种追求新工作的力量。

这些新知识不是侥幸得来的。读了石璋如先生这本报告，可以充分地意识到，它们是如何累积起来的。这虽是一件极端辛苦的工作；但是工作的"趣味"，可以使作者把他一生最好的精力消耗在这一件事上，这里必定有些道理存在。

留心安阳发掘的人士都知道这一工作的重要，因为甲骨文字是在这一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字出现的重要，又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中国境内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字。若是甲骨文字只见于古董市场，它们就不能取信于一般的学术界，它们的重要性就要减少，以至于无。古董市场的货物，向来是有真有假；假的古董是不能永久欺骗学术界的。但是由锄头掘出来的甲骨文字——尤其是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掘出来的——就不能由人随便地说"信不信由你"了。它们是上古留下来的原始文件，或是后人埋入土中的假古董，发掘的人必须给一个正确的判断；判断的证据，必须充分地拿出来——他们必须把发掘的地下情形，作一详细的报道。

作这一件事的难易程度，可以相差很远。就安阳发掘的历史说，这一部分知识确实是得来不易。若把它们的取得，与两河流域、新月沃壤区，以及尼罗河、爱琴海一带的发掘成绩相比，中国考古家所遭遇的困难，要大得多。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晚期——即安阳遗址的殷商——苏味、巴比伦以及埃及各王国的建筑早已利用大块的石

---

* 本文原载《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1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1959年)。曾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0年)。

头、烧过的砖了。用石头与砖建筑的宫室、庙宇,不但规模宏大得多,它们荒废了以后,留下来的遗迹也是不能完全埋没的,并且容易复原。

中国建筑的利用砖石,是商朝以后的事。殷商时代的建筑材料,除了木材及若干容易毁灭的其他材料外,最主要的是就地夯打出来的版筑土。"夯土"是安阳的土话,略等于文言中的"版筑";但所包含的意义更要宽广些。自伊朗以西以至地中海的东岸,在公元前七十个世纪的前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已经在捶土作他们的住房了。在这一带的考古家,叫这些捶打出来的土块及地层为"丕宰"(pisé)。但是这一种建筑材料,到了文明开始的时候,在中亚与西亚就渐渐地为砖与石头所替代。只有在中国,版筑的方式,一直用到营造宗庙、宫室、陵寝这些大建筑上去。故在华北一带,留存在地下的夯土,颇为普遍;但是经过了两千年以上的破坏,这些遗迹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辨认。

故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在最初发掘的几次,田野工作人员并没有关于版筑建筑的任何观念;那时探坑式的发掘,使出现的夯土得不到即时的认识。田野工作人员对于版筑建筑之真实性与重要性,是发掘城子崖黑陶遗址以后逐渐了解的。开始认识这类遗迹的意义时,大家都感觉到无量的兴奋,计划着将殷墟全部遗址全盘翻一下;但因为筹措大量经费的困难,故对这一新发现之利用,没有争取到时间,即时地充分发挥。事情的转变,在侯家庄墓葬之发现与发掘。发掘侯家庄墓葬的经验,更加深了田野工作人员对于夯土建筑之了解;故第十三次安阳田野工作就开始了整翻的计划。但这一新计划,方进行了三个季节——正在我们有所收获时——抗战就开始了。抗战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没有机会恢复这一工作。

这本报告的基本材料,都采自第四次及第四次以后的发掘记录。石先生分析这项记录的结论,把发掘范围内所发现的夯土,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在北,最早;乙组居中,营造的时间最久;丙组在南,代表最后的一期。各组所占的面积,大小不等;乙组是最广,最长,显然是中心部分,为坛庙基址所在,命名为"乙一"的基址,为一黄土台基,南北长11.3公尺,东西宽11.8公尺[1]。这一基址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土质纯净,不杂任何他种质料,似经筛过后方取用的;第二是台基的形制几乎近方,南北线是顺着太阳的子午线定的。就这一基址所在地点及它与邻境基址之关系论,"乙一"显然居这一组建筑的核心,或者就是崇拜最高神的地点。这一神坛基址,较之两河流域同一时期所建的坛庙显着渺小,但在苏昧区域发现的最早的崇拜"恩济"(Enki)神的,只是每边3公尺长的一处方形坛址[2]。故小屯发现的这一基址,在早期文明留下来的神坛建筑丛

[1]　参阅:《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570页。我当时写的报告:"……另一纯净细黄土作成之高台,面积:东西,南北各12公尺,作正方形,黄土厚约半公尺至1公尺;中无夹杂物……"以后用平面仪复校所得尺寸如本报告(第59页)。

[2]　参阅V. Gordon Childe: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1954. p. 114。

中，虽不算大，也不是最小的。

我们发现这一处遗址，远在民国二十年的秋季，即安阳第五次的发掘时；那时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已感到这一基址的土质之纯净与定位之准确；但是它的真正的重要性，却是石璋如先生将全部的发现整理分析，并勾画出轮廓之后，才凸显出来。

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战起，到现在，已经又过了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是一个悠久的岁月。在这一时期，成打的，可以与石先生讨论殷商建筑问题的伙伴们，大半都已星散，成了东西南北之人了！但是石先生咧，他有机会就整理这一批记录：他自己的与他的伙伴们留下来的；那批失去了原主人的记录的整理，尤需要他的加倍的操劳。这二十二年中在闲时，他做这一工作；忙的时候他也偷空做；以至疾病时，流亡搬迁时，困穷到难以生活时，他仍是念念不忘这一工作。现在，他把这一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本报告内有 117 幅插图；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幅插图都代表作者的一片精神，或者说一团心血。每一图中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所在的位置都是经他审慎的检查过、细心地布置出来的。有些图完成后，因为发现了小的错误，就把它弃置了重绘；重绘的工作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复原出来的，殷商末年的宗庙宫室的遗迹，似乎比传说中夏禹的"卑宫室"高大不了很多！遗址范围的窄狭以及低矮，显然是受了建筑材料与营造方法的限制——也就是时代的限制。以我们所知道的，殷商时代仍在使用的原始治木工具——石斧、铜斧——及运输方法——牛车——就是头等的大匠，也奈何不了巨大的木材。没有大木，在中国这一系统的建筑中，就不会有高的宫殿了；夯土建筑所以在这时能发展，因为它只需用原始的工具。这一方法的建筑，只要有大量的人力，也可以表现一个大的场面。这一场面发展的最高峰，在殷商时代是"台"与"坛"的建筑，以及地下的"陵寝"。这些建筑使用的人力，实在有可以惊人的：若以一个工人每日移土方的能力计算，侯家庄大墓葬的营造，专就掘土移土一方面说，每一座所需要的人工，可以超过七千个单位。

在小屯的建筑遗址中，地基部分的夯土，有夯至十层以上的；好些地方，把夯过了的土毁了再夯。这一营造法式所得的成果，固然远赶不上两河流域砖石建筑的伟大，但是比较先殷时代的陶窫陶穴，也可以说是堂皇富丽了。可惜的是，除了若干柱础及柱烬外，没有找到其他有关屋架与屋顶的遗存。报告中没有可凭的资料藉以复原殷商时代屋宇的全貌。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报告中所描写的遗址，只是殷商末年都城的一个小的片段——是一个重要的片段。这一区域的东面临着洹河；这一河流每隔若干年就把滨河的土方冲毁若干。我们在殷墟发掘前后不及九年，已亲眼看过殷墟的东岸，为河水冲溃了一次；小量的塌陷，差不多每年都有。若以每十年崩塌一次计算，三千年来就可

以有三百次了,毁去了的殷墟面积,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发掘出来的部分,没有疑问地是极端重要的区域。这里有住宅,有仓库,有藏甲骨文的窖穴,有铸铜器的工厂;有宫殿,有太庙,有神坛,有祭祀用人用畜的牺牲坑,并有墓葬。专就地下的层次说,在夯土建筑以下,有密布的窖穴,有性质不明的沟渠网;夯土以上,有打破夯土的窖穴及时代不同的墓葬。这一错综复杂的现象,石璋如先生费了二十二年的工夫,把它们清理出来了;并写出来了这一部伟大的报告。这是读中国早期历史的人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的。这本报告的科学价值是极应重视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对于报告内所描写的现象,发生不同的解释;但是报告的中心工作是报道殷墟建筑的遗址。作者对于这些遗址发现的朴实的陈述与描写,以及各种插图说明之清新,有条理,是值得称赞的;这些表现,都是在中国最近出版的科学作品中,少有可以相比的。最后,我要说,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一部耐人寻味的著作。

1959年10月6日晨,在台北

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会际会议开会辞*

众位远道来的客人，以及台北的来宾：

我很高兴能代表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同仁，以最大的热忱欢迎由韩国、日本、美国来赴会的客人。我相信我的热忱同时也反映着在台北的学术界同样的情绪。我们遵照远客的意思，把平常开会的若干不必要的仪式，减少到没有了。

我们今天在此聚集，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想讨论如何以合作的方式，推进东亚学术的研究。我们相信，近代的学术，也与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需要群策群力，尤其是国际的合作。我们所悬的目标，是东亚学术的研究。这一命题，包含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最近所努力的重心，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所牵涉的范围，虽以远东地区为主，却不能以这一区域为限。举一个例说：譬如研究黄种人（学名：蒙古种）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这应该是东亚学术一个主要的课题；韩国、日本与中国的学术界所最关切的一种研究，要是把这一问题作一彻底的解决，我们就需要三国的学者安排一个节目出来，分别担任。也许要花一世纪的工夫，或者更长的时间，方能有解决的希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它包括到：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宗教、神话，以及若干其他自然科学的部门。

在座的来宾大概可以举出很多的类似这一课题，需要集体研究的题目，需要东亚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方能解决的研究的题目。

这一次的会议，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初次尝试；我们希望它能达到这一目的。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在今天这一会议上，算是最适用了。

孔子是致力学术最力的，在东亚区域最早的一位提倡“有教无类”乐于诲人不倦的圣人。他所认准的人生可乐的事件，只有很小的数目；但到现在仍是中国读书人所普遍接受的。我们本着他的精神，预先地庆祝在这一会议期间诸位远客的快乐，也庆祝我们自己的快乐。

---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1960年)。

《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在胡适之先生继朱骝先先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前，那时南港才开始兴建，我得到胡先生自纽约寄给我的一封信，信内最后的一段如下：

> 我近来有一个妄想，想请骝公与兄替我想想：
>
>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块小地，由我自己出钱建造一所有 modern 方便的小房子，可供我夫妇住，由我与院方订立契约，声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后，连屋与地一并收归院方所有。此办法有无法律上的障碍？此意有几层好处：
>
> (1) 可以开一例子，使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来在南港造成一排学人住宅。
>
> (2) 我觉得史语所的藏书最适于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长期用过)；又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助我(近来与严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处。举此一例，可见朋友襄助之大益)。
>
> (3) 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内为宜。
>
> 此计划是一种妄想，不但要骝兄与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转告思亮、子水诸友替我想想(我尚未告知他们)。

胡先生的这封信，很清楚地说明了他所以要到南港居住，是要利用史语所的藏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他去世以后，大家都想所以纪念他的方法，却得不到任何十分满意的结论。不过若把纪念胡先生的事分作两方面看，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若从永久性的纪念说，像胡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纪念的标志。换句话说，他留下来的工作成绩，就是纪念他最好的纪念品。历史上的人物，如韩愈、朱熹这一类的人，是用不着别人纪念他们的。另一方面看，若是为怀念他的人，受过他的影响的人们设想，他们与胡先生的关系自然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他们确实可以由这些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

---

* 本文原载《感旧录》第2版(1985年，台北)。

史语所同仁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所获到的益处,方面是很多的;但他留在南港最深刻的印象,仍是他那做学问的方法。就这一点说,研究所同仁各就本人的研究工作,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算是有意义的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论文集所载的论文,都是由与本所有关的人所撰著。

1962 年

《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序*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侯家庄西北冈的工作，开始于民国二十三年秋季；至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旬，才算告了一个段落。这一发掘，前后共进行了三次，所用的全部时间共为284天。若以每一人工作一天算一工作日，三次工作日的总数为7.72万个。

就考古组在抗战以前的田野工作说，这一发掘代表了一个最活跃旺盛的阶段；考古组的工作人员除了极少的少数在南京留守筹划后勤者外，可以说是全部被调到田野，参加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他们的名单如下：

工作人：梁思永（领队）

石璋如　李光宇　刘　燿　王　湘　祁延霈　李景聃　胡福林　高去寻

尹焕章　潘　悫

视察人：李　济　傅斯年　董作宾

临时工作人员与练习生：马元材　夏　鼐　王建勋　董培宪

负责正式发掘工作的11位，都是富有发掘经验的老手；他们的总领队梁思永先生又是其他10位所心悦诚服的老师，因此这三季工作的进行，至为顺利；所得的收获，直到现在——离这一工作的开始计划已经三十年了——仍为中国考古界最重要的一项成绩。

现在，在一个与发掘时代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把这一重要发掘所得的成绩勉强地印出来了一本。我们当前的选择，只是：印这样的报告，或者是不印；我们没有第三个选择。

这本报告虽说大半是根据梁思永先生的遗稿编成，但辑补的工作，却耗费了更大的气力。辑补人高去寻先生，在这本报告上所用的力量，不是这本印刷品所能完全表现的。本来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困难的程度，是无法计算的；凡是有这一经验的著作人，大约都体味到这一甘苦。这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报告的本文中看出来的；勿需在序文中介绍了。

* 本文原载《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第1～3页（1963年）。

序文中应该介绍的为侯家庄发掘所得对于中国上古史的几点重要贡献。这似乎是不能用数目字估计的一件事;以下排列的次序只能代表我们对于这一工作成绩各方面的认识之先后而已。就我个人的感想,侯家庄发掘的重要成绩,可以概括地列举如下:

(1) 版筑在殷商建筑所占的地位。

(2) 由一个"陵墓"的经营(如本报告描写的 HPKM 1001)所看出的殷商时代的埋葬制度及对于人工组织的力量。

(3) 杀人殉葬的真实性与它的规模。

(4) 物质文化之发展阶段及统治阶级之享受程度。

(5) 石雕的发现及装饰艺术的成就。

(6) 青铜业的代表产品。

在以上的种种成绩中,有些认识的开始虽说远在侯家庄发掘以前,但都是由于这一发掘才把这些新的知识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现在我们谈殷商时代的历史,对于那时文化的造诣,可以很肯定地由这批丰富的资料举出不少"令人向往"的例证。

关于这批宝贵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一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第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的了解!

史语所迁到台湾后,旧时的工作同志星散,抱残守缺跟随本所到南港的同人,曾参加侯家庄发掘者,不及当时的半数。在参加侯家庄发掘的十位青年考古学家中,以高去寻先生年纪较轻;大家感于流光易逝,共推了年纪较轻的高去寻先生,辑补梁思永先生的遗稿。除了若干年预备工作外,高先生集中他的精力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辑补西北冈一〇〇一号大墓原报告工作的使命。这部巨著的付印及出版的完成,更有赖于考古组全部技术工作人员以及汪和宗先生的协助,这也是应该由我在此加以说明的。

1963 年 4 月 16 日　南港

《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发刊辞

民国二十三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的报告时，目的只是要对学术界报告发掘的成果。三十年来，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所刊布的这一序列的报告已经出了十二本；这些都是考古的读者所知道的。关于这一类的报告，本所当然是要继续下去的；同时，我们室内工作的进展，使我们感觉到在古器物研究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另作一种刊布的方式；因为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一个遗址或一群墓葬上。换而言之，《中国考古报告集》原来的计划是以发掘的工作为单位的；所报告的内容，只限于描写每一个遗址或一个墓葬的发掘情形及出土遗物；这自然是记录原始资料最基本的方法，为一切进一步研究工作的起点。

本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研究也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其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就是古器物学这一门。由近代田野考古发展的古器物学，与传统的古器物学比，在研究的方法上展开了一层重要的分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古器物学”，是以发掘的资料为基础，再进而作比较及实验的研究；由此所得的成果就构成了上说的古器物学。凡是在这个范围以内的研究，我们预备在这一新编——即《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陆续刊布出来。新编报告中采用的资料不局限在一个区域或一个时代，也并不以田野资料为限，因为研究的主体是器物，而不是遗址或墓葬。我们的目的是想把各种古器物本身的历史——它的制造方法，它的形制及装饰的演变，它的功能等等——根据第一手的地下知识，能作一系统的陈述。这一研究所需要的比较材料及预备工作都是多方面的；除了田野的原始记录和文献上的记载外，更要依赖对若干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发现与发明的认识作参考，方能得到我们所希望的成绩。所以这一新刊物除了发表本所同仁的论文外，更希望各界抱有同一志趣的朋友们的赞助与合作。

李　济

1964年3月　台湾南港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会主席报告和谢辞*

主　席　报　告

王院长，傅太太，诸位来宾，诸位同仁：

今天十月二十二日是本所成立的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选择这一天做本所的生日，是经过一番考订的。事实上，在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前，本所经过了一段长期的筹备，这筹备期间约有半年，直到十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才在广州东山柏园为本所选择了所址，本所在那儿正式成立，跟外界开始有官方的交往。

从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今天，这四十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过十一次家。南港是本所的第十一个所址。我们换过两次所长，前两任所长都逝世在台湾，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同时在这四十年间，也有很多其他工作的同事亡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我们今天想做的第一件事，为请求各位来宾和我们研究所的同仁为我们的这些亡故的工作者敬悼一分钟(肃立默悼)。谢谢，请坐。

在逝世在岗位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研究所同仁认为有十位对本所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劳绩，所以在今天纪念本所四十岁的生日时，我们在举办的业绩展览中，特别辟了一个单位，除了展览本所四十年来的历史文件外，并表彰他们的业绩。由所务会议决定，将这十位对本所贡献最大的，亡故的工作人员的相片，悬挂在墙壁上。从此以后，我们将在本所适当的场所，把他们的相片永久高悬，以作纪念。这十位是：

第一位：蔡元培先生(1927—1940)，本院故院长，秉承国父遗教，规划本院科学研究，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第二位：朱家骅先生(1940—1957)，本院故院长，主持并发扬本院研究工作，抗战

*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期(1968年)。

期间,维护各所安全,渡过国难,并指导本所在台湾的重建工作。

第三位:胡适先生(1957—1962),本院故院长,赞助本所研究,并指导本所在台湾的重建工作。

第四位:丁文江先生(1931—1936),本所田野工作的总顾问。

第五位:傅斯年先生(1928—1950),本所故所长,创办本所,建立工作基础,制定研究方针,综理所务,前后二十三年。

第六位:董作宾先生(1928—1962),本所故所长,甲骨学的建设人。

第七位:梁思永先生(1930—1948),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队长,侯家庄发掘的导师。

第八位:李晋华先生(1933—1937),校勘《明实录》的第一位工作者。

第九位:吴金鼎先生(1930—1944),黑陶文化的发现者。

第十位:董同龢先生(1936—1963),新语言学的信徒,研究高山族语言的创始者。

我应该向诸位来宾报告的是:本所的一般情形,现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港已经安静的做了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了,有五座房子,其中一座是图书馆,有中文图书二十万册,西文图书二万余册,期刊合订本约三千册,微影胶卷二千五百卷,拓片约三万张,档案约三十万件。关于研究的实物和历年来搜集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档案之外,我们还替国家保存了许多古物。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物,是我们自己发掘出来的。此外,还保存若干他种学术的原始资料,如语言学方面的音档,这是赵元任先生领导下所做的田野工作的记录。还有采集的民族学许多标本;现在因为民族学研究所成立,这些标本已搬到民族学研究所陈列。这些学术资料都是本所研究人员自己搜集的第一手学术资料。第三报告的事项,有关现在在本所正式人员的数量。依"政府"给本院的名额,本所的工作人员是四十四位,若加上临时人员,总计实际做研究工作的在九十人以上。第四件事情,是有关本所研究出版品的报告,在创办人傅先生时代,本所出版品已经分为六大类,和若干小类。最要紧的刊物是本所的"集刊",每年出一本,每本分四分刊印。现在已将四分合为一本刊印,每年仍出一本。这刊物已编到第四十本。总计"集刊"已出版的字数在二千四百万字上下。另一系列不定期的刊物有《史料丛书》,也是本所的基本出版品,在本所创办初期,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即开始编印,现已编印到第九十本。每本印有十万字的史料。已经出版的,有一千二百万字左右。更一重要的编辑史料工作,为最近完成的《明实录附校勘记》。《明实录附校勘记》虽也属于史料整理校勘的性质,与《史料丛书》的编印比,却有它的独立性。我作过一次粗略的计算,这一刊物全部的字数总计近四千万。以上三种出版品代表较大规模的集体工作。此外另有小单位的,但研究性较多的出版品如"单刊"、"专刊"。"专刊"已经出了五十多种,"单刊"有三十种。这两种专题研究的报告,合起来也出版了一千万字以上。更专门的刊物,有《中国考古报告集》,这是专门报告由田野考古人员所发掘出来的资料及研究

工作,这一印刷品,图版甚多,不能以字计算,它的内容若单算印的文字,也在五百万字以上。《中国考古报告集》,现在已出有二十本,八开本。总算起来,四十年来史语所的全部出版品,如以字数计算,大概在九千余万字以上,接近于一万万的字数。以四十年平均算,每年出版的刊物,在二百万字以上。本所创办人傅孟真先生说,我们的刊物应该以供应可靠的史料为最优先。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依照自己寻找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供应史学界。以出货的价值论,货色是相当丰富而完备的。它们的内容是实质的。我们这边印有出版品的目录;诸位先生要的话,我们可以奉送。关于出版物的品质,我们不想估计,不过我可以作几项保证:我们的出版品没有偷关漏税,强不知以为知的作品;更没有抄袭他人的冒牌劣品;也没有发泄情绪的宣传品。我们可以保证,它们都是合乎科学标准的,忠于学术的报告。至于它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呢?这点,我想不属今天报告的范围。

最后的一件报告是:有关本所经费的事情。本所和其他研究所一样,在抗战前,每月有一万元的经常费。抗战结束后,迁到台湾,本所的经费经过了一段长期的不安定和不固定的阶段,到了现在每年已有百万元以上的预算数字了。本年度的预算为新台币二百三十四万三千元,就数目字来说比战前多了二十倍。大家都晓得,现在生活跟战前比,大概涨了三百倍。除"政府"给我们的经常费外,按照本所工作计划的需要,历年均得到许多中外的基金会以及其他学术机关的资助。帮助我们最多的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本所的田野工作,如考古发掘、民族调查、语言调查等等,很多是由这一基金会的补助,才能实行。此外"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很加重视。外国的,有洛氏基金会,东亚学会,亚洲协会等,常常支持我们的研究计划;这些帮助都曾给予本所工作人员很大的鼓励,本所对于这些机关,应该趁此机会,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今天是本所四十岁的生日,因为本所是个学术机关,所准备的最重要的庆祝节目,为请两位与本所有深切关系的前辈同事,作一次纪念性的学术演讲。此外,今天下午,本所预备有本所同仁的同乐会。另一最要紧的节目,为本所四十年来的业绩展览,会场中把本所四十年来的一般情形,及有关的重要文件,以及出版品等陈列在一室;另一室陈列第一组的成绩;第三室陈列语言学的资料和民族学搜集的标本。以上三陈列室连同原来考古馆陈列的古器物,全部展览共有五个单位。今天是预展,明天开始正式的展览。

报告完结,现在我们开始学术讲演。

谢　　辞

今天两位的学术讲演,一位把史学作了一个全盘的看法,赵先生把语言学分析的方法以及最近发展的符号学加以介绍。我记得数十年前赵先生已经对符号学在开始做他的工作了。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分析,使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所代表的功夫可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通俗。我想在座诸位都会感到很幸运,能得到这么一份最大的礼物。我代表研究所的同仁,向沈先生及本所创办人之一的赵先生道谢。今天的学术演讲会,有出乎意料之外多的来宾,使本所同仁感到荣幸。我们四十年日子已经过去了,都是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今天得到诸位的光临和鼓励,觉得这四十年没有白过。这四十年的日子,使我们感到很满足。谢谢诸位。

1968 年 10 月 22 日于台北南港

《中国上古史》编辑计划的缘起及其进行的过程*

一、缘　　起

五十余年来,地下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已经累积到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数量,发表的报告不断地透露了在远古的时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形成的消息。有些新发现,不但是先前的史学家未曾见过的,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些新史料的性质,大半都很庞杂;它们的真实价值一时尚难加以准确的估计。尤其是史前遗存,布满全国,有关它们的采集与研究工作已经构成了一门专业。这一组史前史的原始资料所表现的时代性质与演进阶段,展开了一幅甚为错综复杂的景象。

如何把这批史前的史料与中国文明的黎明期衔接起来,实为治中国上古史的同志们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国的史学开始就蕴藏着一派怀疑的传统,对于上古史的记录,向来保持一种(温和一点说)传信传疑的态度。这一传统到了民国初年,与近代科学渐渐地合了流,发展出来了近代的田野考古学,为中国新史学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新基础建置在两列支柱上。由传疑的传统所孕育的清代朴学积存的业绩——伪史料的清理工作——已经为新史学铺了路;近半世纪提倡的锄头考古学又为新史学开辟了建设的资源。

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时间,史学家可以凭藉校订比较完整的古籍与发掘出土的实物,把中国上古史再作一番整理了。

如何整理? 我们想尝试这一件工作。我们的目的是想编辑一部比较可信的中国上古史。我们无意再写一部偏重政治方面的专史,褒贬过去的帝王卿相, 评论每一朝

---

*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1本(1972年,台北)。

代的兴替。我们想把它的重心放置在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两组主题上。这一计划可以说完全是根据审查原始资料的性质而作的决定。

由史前到秦的统一,中国这一地区的人类曾经从四面八方接收不少别处人类的文化业绩,也曾经向四面八方放射出不少对别处人类的影响。可是更多的是中国民族在这一变动的环境中,所表现的创新、适应,与调节的各种努力而获致的丰硕的果实。中国人在这一段时期,解决了不少的人类聚居成群所发生的问题,创造了不少利用自然的手段,促进实际生活的繁荣;建立了不少适应时代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发现了不少表达人类感情的方法;也对宇宙间似乎矛盾的现象,提出了不少合理的疑问。这些节目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初期的全盘面目。同时中国民族本身在这一时期也吸收并融合了不少新的血液;形成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

由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化来说,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文化的演进和制度的创新及调节,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世界文化在这一区域有许多突出的成就、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们提出将近一百个"拟题":内容或是讨论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区域与四围的关系,或是讨论中心区域的扩展过程,或是讨论中心区域内的各种演进程序。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拟题"。

编辑这部书的发起人是蒋廷黻先生与本院前院长王雪艇先生;他们为这件事替我们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经济协助。历史语言研究所[1]同人,则在王院长的指示下,勉力负担编辑的工作。撰稿部分将敦请海内外硕学之士、专门名家,认题分撰。另外有一个计划委员会,系聘请各方专家组成,对于编辑工作提供意见,协助进行。

二、进行过程

自1963年开始,编辑委员会按照所拟的题目分别邀请各门专家担任此事。近八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此一工作却只完成了一半;初拟的百题,根据各方接洽所得的意见加以调整后,合并约为80题上下。以每题一章计算,现已完成39章;正在撰述中者16章。此外尚有允诺撰稿并与编辑会签约者15章。没有约请到适当撰稿人者尚有数章。像这样的合众工作,在中国学术界尚是第一次的尝试,参加编辑的人,确实遭遇了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但也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1] 就工作的性质说,这一计划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业务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仍有明确的界限。史语所创办之最大目的,就历史方面说,在为史学作基础工作;创办人傅斯年先生认为这才是研究所范围以内的事,也就是本所同人的主要业务。至于"通史"一类的工作,本所同人虽亦有偶尔尝试者,但只能算是行有余力的工作。

编辑会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缴卷的日子，不负各方热心支持这一计划的朋友们——包括此一计划的创始人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各位董事。

已经编辑完成的待定稿第一本，印行有期。特述其缘起及进行经过于此，以代序言。

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

1971年4月18日

附 《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

(1) 撰稿人请依照"缘起"阐明之宗旨为起稿原则；以文化的形成及演变和民族的成长与教养为撰述的重点。

(2) 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的资料，尤其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

(3) 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褊狭的地域成见。

(4) 以叙述史实为主，组织已成立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专题的考证或史料的排比。

(5) 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将学者研究的成果普及化，因此行文须深入浅出，不尚艰深。

(6) 每章自成首尾，为独立的单元，但各章之间须互相补充配合。编辑部须在写作过程中或稿件完成后，设法协助撰稿人，使其所撰部分不致在全书中发生矛盾及不必要的重复。

(7) 批评他人学说时，须以学术观点着眼，不涉及人身攻击。

(8) 初稿完成后，由编辑部油印，分发编辑部聘定的专家们征询意见，每章至少须有专家一人校阅。编辑部即依据专家意见，商请撰稿人酌量修改。必要时得商请撰稿人同意，由编辑部径行修订。

《安阳发掘》日文版序言*

安阳发掘开始于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九年，也就是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那一年，中央研究院决定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最初成立是在广州，附属于中山大学。筹备这一所的领导人为傅斯年先生；他曾在英国、德国留学很长的时期；不但旧学的根底很深，对于现代的人文科学也有极亲切的认识。所以当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就趁中央研究院在筹备的期间，说服他的老师蔡元培先生及其助手杨铨先生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中国历史与语言的资料。同时，傅先生也深刻认识到：要为历史研究收集新的资料，田野考古是必须大力推进的重要领域。

在民国十七年的初期，傅先生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选派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去调查甲骨文出土的地方。作者本人于是年冬路过广州的时候，应傅先生的邀请，接受了主持田野考古这门工作；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加设了一组考古的部门，名为考古组。

本书所谈的有关"安阳发掘"的内容，不仅限于小屯遗址发掘的范围；但最重要的遗址发掘初期集中在小屯，其后又增加了侯家庄。在这两个遗址里面，考古组前后工作了九年，工作季节共有十五次；这十五次发掘所得的成绩大部分都在《安阳发掘报告》、《田野考古报告》及《中国考古报告集》中发表了。

安阳发掘工作的重要性，可分两点来说。

第一，安阳的发掘工作可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工作。中国的传统学术向来注重"好古"，这可以说自孔子以来都是如此；但是，过去的所谓考古，尤其是自北宋以来，都是在文字上头跟书本上做功大；做考古学工作的人亲自跑到野外去收集材料，则完全是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尤其是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影响。安阳发掘也可以说就是这种影响所及的一个发展。

傅斯年先生对于这一点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之初，对新历史学资料的收集就注重了田野考古这一工作。他选择的第一个遗址就是出土龟

---

* 本文发表于1982年。

甲兽骨文字的安阳县小屯。小屯遗址的发掘,不仅充分达到了史语所创始人傅先生的愿望,并且更获得了很多其他的丰富的新资料,许多历史事实由此得以证实。例如:甲骨文确系殷商时代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留存下来的,而决不是如章太炎这些古文字家所说的"假古董"。有了这一个实证,对有关商代的过去记录,经各方学者的重新考订,使若干历史事实得到了重新认识。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出土资料充分证明了司马迁在两千年前所写的《殷本纪》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例如:司马迁记录的历代君主及其王室继承人的先后顺序,与甲骨文中所见的记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可以相互印证。《殷本纪》具有如此之高的可信度,也可以证明司马迁写《史记》所依据的史料是大体可信的。这是专就有文字的历史说。

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安阳的发掘在小屯、侯家庄一带,同时又出土了很多没有文字的"哑巴"资料;这些材料包括好些类,如陶器、石器、地下的建筑、青铜器、墓葬仪式、殉葬人骨兽骨等。凭借当今先进的科学方法,这些资料不仅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民族的种类,更可以帮助史学家追溯中国古代史的渊源。以陶器、石器这两大宗出土物说,它们都是见于史前遗址的普遍资料,但却都是不为先前的古物家所了解和承认的。现代的考古学家们却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追溯到史前一千年、一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以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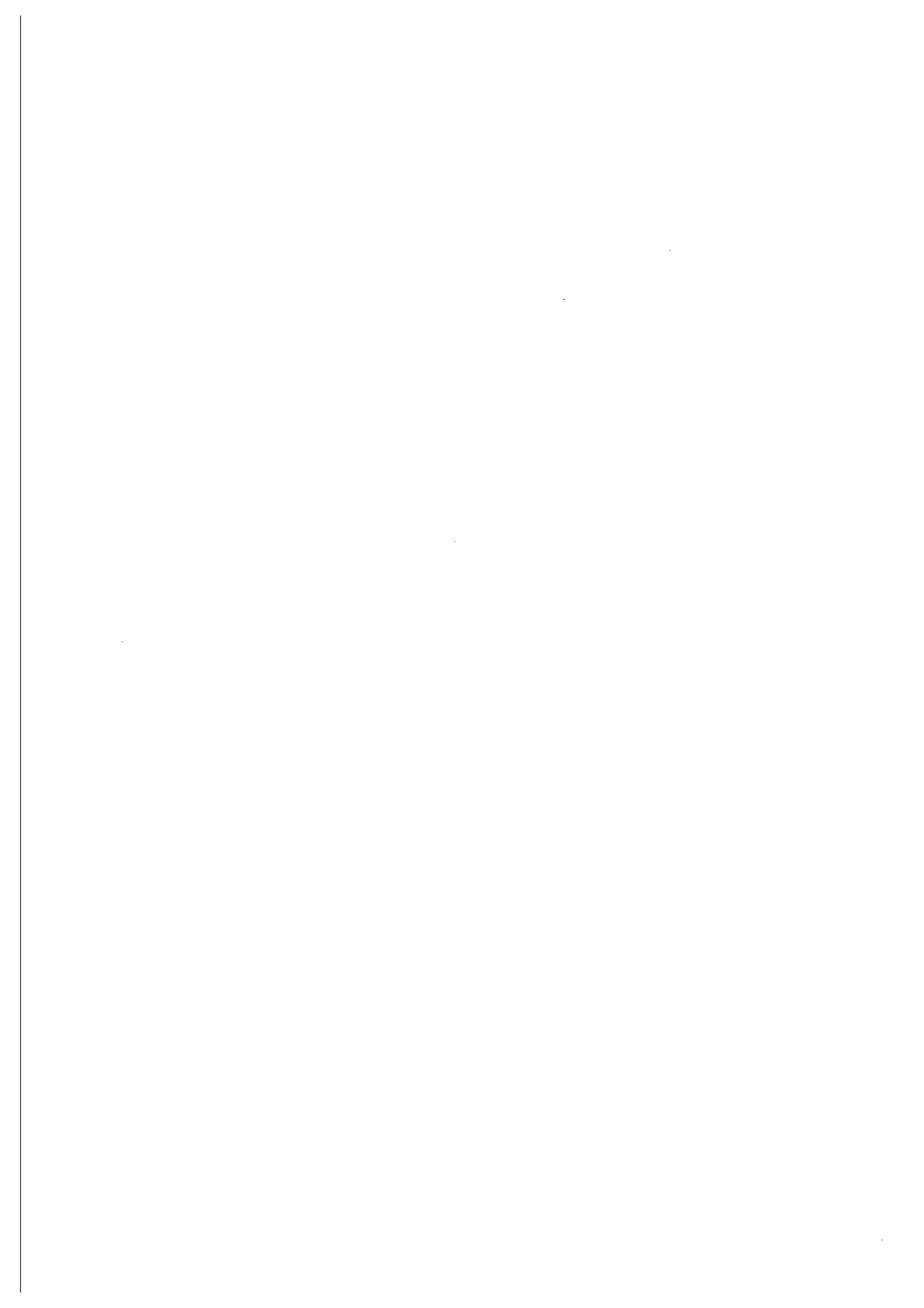
这些个别的研究课题如今都已经变成了专门的学问,我在此就不必赘述。不过,我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学术界方面这一发展是以安阳发掘为发端的。有了安阳的发掘、有了安阳发掘出土的器物,才能把中国的古史有文字的追溯到商代,把没有文字的历史一直追源到很长远的过去。

关于安阳发掘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就不再详细剖析了。

作为本书作者,我在这里只能把自己亲历的安阳发掘工作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笔者的原文为英文文稿,这个译本(日文版)译自英文原稿。英文原稿已于两年前写毕,现已送往美国出版。我希望本书英、日文版本可以同时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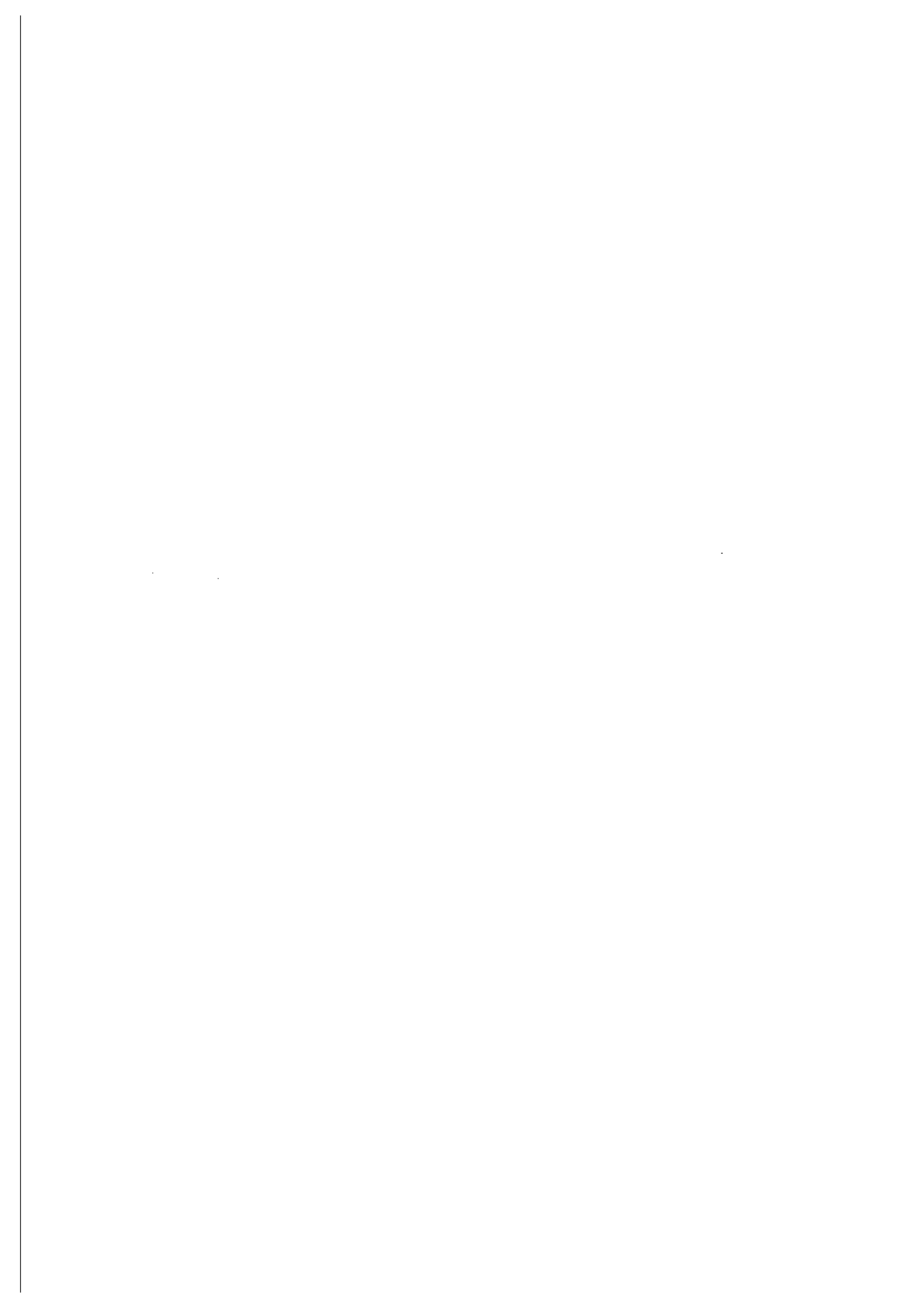
李 济

1977 年 9 月 2 日 序于台北(中文)



学事忆旧





怀丁在君*

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究竟他对于国家及社会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现在似乎尚不能说定。他的朋友谈到他，是撇不开情感的。百年后的史学家，要是研究这一期的历史，许会论定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但是我们这些后死的朋友固然不能——也不必——马上给他一个正当评价，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感想写出来，以便后来的史学家参考。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分时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固然严格的说起来他没有写很多的报告，他没发表很多的论文，关于这一类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比他成绩更好的人。但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他的提倡科学与一般的提倡，有点重要的分别。一般所谓提倡，往往都是设一个机关，位置几个"人"，发表几篇文章而已。他却倒转过来，先扎硬工夫，他办地质调查所，先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的，仍然不用他们。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能继续的发展下去。

在中国做科学工作的人，往往感觉到好几层避不了的困难，这种学问本不是单靠一个人的努力所能成就的。要推进科学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机关，有相当的设备，并且有些老少不等、经验不同的人合作，然后才干得下去，做得出来。凡是科学家的养成，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他离学校以后的四五年，在这时期，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给他们一个机会能运用他们才学会的种种研究工具；必须要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他们方向，给他们些问题，让他们慢慢的在科学界挣扎他们的地位；此后他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科

* 本文原载《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转载自《感旧录》1985年台北再版。

学家,就完全看他们的力量了;但是这一段的培养是绝对的不能少的。

中国有好些有志气的并且极有希望的青年科学家,往往因缺少这一段培植的时期,把科学的生活完全断送了。在大学才毕业出来,他们或者就膺了大命作一个学校的教授或主任,初期也许可以作得很好。但这一来,非特没有人指导他们,他们还要指导别人。在学生时间所积的有限的膏油,当然不久就烧完了。等到觉悟时,也许连他们所学的研究工具都忘了,一生的事业就因此告终。这种人力的浪费,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界近数十年来最大的惨剧,也许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代避不了的牺牲。如何补救这个局面,实在是迫不及待的问题。

以在君的才力及学力,要是生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线。这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的。但中国的社会却不让他尽全力于这个方向。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这个好的影响已开始传布到别的类似机关了。若是我们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险,中国的科学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很快的。现在是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他的一生最为社会所不十分了解的大约是他的政治意见。这是谈在君的生活比较难解释的一部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记得我有一次同他闲谈,说到一件科学工作计划受了政治影响而遭夭折的事。他慨然地说:“你们老问我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做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由此我们可推断,他的政治兴趣完全是被动的,这一类的事并不是他心中所最愿意做的。自从他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我们看见他最高兴的时候,总是谈到与研究有关的问题;若是发现了一个能干的助理员或研究生,他尤感觉兴奋。他虽不谢绝普通的应酬,然总带些勉强,有时并表示厌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的志趣。

认识他较久的朋友,总能发现他好些可爱的地方。受过他教的学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大家都知道他曾提倡过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也许只有少数知道他是一个科学人生观的实行者。他虽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他的接人待物处处都有他的一番道理,不以琐细的恩怨作枢纽。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但是他的肝胆照人处,不知道消灭了多少恩怨,成就了若干大事。他

对旧社会的恶习惯可谓嫉之如仇;但是他并不以过正的举动纠正之,处处他都想出一个合理的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均是近乎人情的。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好兄弟、好丈夫;在社会中,他是一个可敬的老师、可爱的朋友;在国家,他可以算是一个新中国的模范公民。

东西文化接触中,最难融合的一段,大约是伦理观念。大多数的人把两方面的坏处都学会了。有些找不出选择的标准,结果只做了习惯的奴隶。看在君的为人行事,不但能保守旧社会的美德,并尽量的采取了西方人的长处。由他的努力,我们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观,非特可以行得通,并且是甚合乎现代需要的。

1936年1月24日

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

要是把所有中国过去的名人及学者排在一起，请大家选几位最值得作现代中国青年人榜样的模范人物，我必定投傅孟真先生一票。我的理由如下：

他是一位最明白现代中国人在现世界所处的地位的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人，要在这世界过日子，应该晓得他的环境，也应该晓得他自己的应付能力；自己有什么？必须向别人学习些什么？若专靠自己的“本能”，不识不知地活下去，一定有活不了的时候。现在是什么环境？我们中国人的应付能力何如？自从他学成归国以来，他时时刻刻在想，并寻求一个答案。自然问这些问题的不止他一个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不限于一种。但是，他所选择的入手办法，就我个人看来，是最合理的。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来的长处及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

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的，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这固然有若干偶然的成分在内，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组织能力及对于现代学术的深切了解。他最知道，现代的学术，尤其是科学的工作，如现代的战争一样，是集团的，不是个人的。在他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从选拔人才及组织人手。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渡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 本文原载《自由中国》第4卷第1期(台北版)。转载自《感旧录》1985年台北再版。

他的确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这是一件非常的劳绩。他所以能完成这一使命,据我看来,不但是因为他具有过人的办事能力,基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具有下列的几种品德:

(1) 他的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子把这一群人带回去。这是矛盾吧? 这并不是矛盾。假如别人都有他同样的责任心,同样的热诚办各人所经营的事,天下事岂不都办好了吧!

(2) 极端的认真。寻求真理,固是他作学问的精神,办事认真更是他的天性。无论是作学问,或做事,他都是绝对的不苟且,那一种整齐严肃的气象,可以使懦夫们都挺身直立起来向前进。大家都知道他写作的天才,但是在他的专门著作里,他却能把他的才华完全收敛起来,作纯粹的考据文字。与他共事的朋友,都知道他要钱的本领很大,却是一文也不肯浪费。至于他的私人生活的质朴,可以说完全同蔡孑民先生一样。

(3) 没有偏见。他的没有固执的偏见,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在没有认识丁在君先生以前,他极反对丁先生的政治立场;曾公开地说过"此人可杀"一类的话。但是等到他们两人在北平见面以后,却成了莫逆。这件事,胡适之先生知道最清楚。他受丁在君先生的影响,把他早年的豪迈癖气改了不少。

孟真先生得天甚厚,也许有好些地方是一班人所赶不上的。但是他的爱国心,他的对于现代学术的见解,作学问的方法及作事作人的标准——这些都是极值得学的,并且是极需要的。对于中国前途抱悲观的人,见了孟真先生,往往可以改变他的观点。他手创的及毕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过去的工作成绩,已能使欧洲的汉学家再也不敢低视中国学人的工作能力。十余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曾告诉我说:你们中国有傅所长这种人,你们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爱慕傅先生的青年们,切莫要因为傅先生去世,使外国的观察家换一种说法。

1950 年 12 月 25 日晨

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7页)

这一段文字说明了二十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孟真先生才把握着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现在回想十七年的前后情形，我们可以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识形态是综合若干不同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在这些因素内，潜伏在知识界下意识内的不满与不服，都是重要成分。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前，北方的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呼声已发出了十余年，并曾得到快速的反应。北京大学的国学门，以及清华学校的研究院均是在这一号召下先后成立的。两机关的工作成绩都留有新鲜及深刻的印象于那时的教育界；不过真正了解这类工作意义的，却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这一个小圈子的同情，自是极可宝贵的，至少曾使实际的工作人感到一点奖励，但于实际工作之进行及推广，并没有大的帮助。

同时在北方进行的自然科学工作的发展，不但一步一步地推及到人类历史的边缘，并且伸入历史范围以内了。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

*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转载自《感旧录》，1985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

国的科学团体。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这些野心蓬勃的西洋科学家,万里长征跑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资料。

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设置,第一任务为实行科学研究;在开始筹备期间,很自然地,侧重在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方面;故最早成立的研究所,并无历史语言的项目。总办事处所发表的筹备经过有下列的一段:

> ……至三月底……复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46页)

这一简略的叙述,包括另一段未发表的重要经过,就是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说服中央研究院筹备人的两点:(1) 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2) 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更巧的,所选的这一所的筹备委员是以傅斯年先生领首。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的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的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期间第一次所拟的工作计划,正像二十年来见于政府各部门的建设计划,是极广泛的,列有九组:

(1) 文籍考订

(2) 史料征集

(3) 考古

(4) 人类及民物

(5) 比较艺术

(6) 汉语

(7) 西南语

(8) 中央亚细亚语

(9) 语言学

上项计划是民国十七年五月所订的;经过了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考虑,在十八年六月的时候,傅所长主持的所务会议乃把全所的工作范围,改为三组,即历史、语言与考古;通称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这一决议,较之原来的设计,不但是一件切合实情的改进,同时在理论上及组织上也是一大进步;二十余年来,三组工作之相辅相成,就是这一决议案合理的最大证据。由此也可以看出创办人刻意求进的精神及他的远见。

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能否建设起来,最后的考验自然是在工作的本身。好的工作计划,固然大有益于工作的进行,但并不保证工作的成功;计划只能划定工作的范围,科学的方面却另有其他的问题,有些是与工作的范围无涉的。譬如以"研究的材料"这一观念论,说来似乎简单易了,略加追求,就有许多麻烦。什么才能算作研究材料是不容易下一界说的。一块化石,一部佛经,一次日食,在有科学训练的人看来,都可以算作研究的材料;没有科学训练的却只把它们当作药吃,当作咒念,当作神求。更困难的是,同是有科学训练的科学家,因为着重点的不同或问题的不同,对于材料的观念可以轻重异趣;看得深的,可以在短时期解决若干基本问题;看不出轻重缓急分别的也许一辈子只能解决次要的问题,到不了基本问题的边缘。这一分别与科学训练的关系较少;大半起源于个别人的智慧。一个聪敏的领导人,在很短时间,就可以抓住一大批重要材料,解决若干基本问题。这一点,傅所长是作得十分精彩的。最初创办的时期,他以全力鼓吹并奖励在所的工作人员扩张研究的材料;他的两句脍炙人口的标语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标语,初看是漫无限制的,不知由何处开步,从何处着手;不过在很短的时间,他就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的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十年来的工作充分的证实了作这些决定的远见。

"安阳调查",在十七年度的报告内,即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向总办事处所作的第一次工作报告,列为甲项;其说明如下:

安阳之殷故虚,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

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是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安阳龟甲文字,近尚陆续出土;本所欲察其究竟,即托董君(通讯员董作宾)前往。董君于十七年八月至安阳,经探察后,始知罗振玉所称洹阳宝藏搜采一空者,实系虚语。……董君于十月间先作小试之发掘……所得结果——约言之,龟甲文字,虽大致未必可多得,而其他知识,必含甚多之材料。……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6页)

这可以算作安阳发掘的开场白,今日重读,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件。自民国十七年起至二十六年六月底(七七事变发生的前一周)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举行的发掘工作前后共十五次;但是推进这一长期田野工作所依据的基本观念,都在这第一次报告中简单地扼要地阐明了。这些观念虽只是一般的考古学常识;中国学术机关发挥这种科学常识,尚是第一次。恰巧所选的第一个遗址为安阳殷墟。

殷墟发掘在考古学的重要,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于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们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派的置疑,科学的历史家也不能把它当作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证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收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先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排出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以上几点是专由考古学的理论说殷墟发掘的重要;至于所得材料本身的价值不是在这一短篇内所能谈的。考古组的工作不以殷墟发掘为限,但殷墟发掘实为考古组工作的重心;其他古迹与古物的调查及发掘,大半都由殷墟的考古问题引导出来。

孟真先生与殷墟发掘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了领导的作用外,行政的交涉与经费的筹划,他担负了最大部分的责任。初期发掘时,这一工作曾遭少数人无理的阻挠,为这件事,他曾亲自跑到开封接洽,因以收到地方上合作的效果。他对于这事的关切,直到研究报告出版时才告一段落;考古组编辑的几种刊物,全是他命名的。他对于写科学报告,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在《城子崖》的序内,他说:

"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实物作推论时,尤当记着。把设定当作证明,把

涉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的事办成近若有关,把事实未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报告本当如此的。(《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序一》)

以这一标准衡量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报告,可以说很少是不合格的;作得尤其谨慎的是第一组编辑的史料。在北平的时代,史语所在室内推进的一种合众工作,为整理清代所藏内阁大库的档案;这批材料共重十二万余斤,是以一万八千元的代价由李木斋的手内购到的。档案的类别有:(1) 天启、崇祯两代案卷;(2) 清初旧档;(3) 顺治至乾隆四代档案;(4) 嘉庆以下至光绪档案。以上档案以揭帖为大宗,附有提奏、三法司案卷、移会,以及誊黄、贺表、各项簿册等等。“清内阁在雍、乾以前为国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后犹为制诰典册之府,所存档案,皆当日构成史迹者自身之叙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225页)这些原始史料,正是史语所寻求的工作对象,价值的珍贵自不待言。完全客观的看去,内阁大库档案可靠性的程度与敦煌卷子、长城汉简以及殷墟甲骨是相等的或竟超过;其内容的丰富又远在这三批材料以上。但这一宗档案最老的不过三百年上下,有点吃了年纪太轻的亏;故所得到的学术界的认识远不及敦煌卷子、长城汉简,以及殷墟甲骨。物以稀为贵,有科学训练的人亦难免有此感觉。记得有一次在北海静心斋与孟真先生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他颇有点失望的表示。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我听了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因再问他:“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他听了为之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这一对话虽有点两不对帐,但他最后的一笑,却把我们两人各个的意思接了线。那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价值愈高。就这一标准判断史语所刊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没有疑问的都占最高的地位。

语言与历史在本所是两个平等的重心。史学的发展,从田野考古入手已有了一个正常的途径。至于语言学,在现代科学的丛林内,所占的园地,虽无史学之开展,却经过了科学家更小心的培植与修整,已产生过更完整的果实。史语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自民国十七年起,直至七七事变的一年,复兴的中国语言学的进步,是一线直上的。在这一时代,史语所的第二组建设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标准,提出了并解决了若干中国语音学的基本问题,完成了不少的方言调查,同时并造就了不少的青年语言学家。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现的急追猛进的阵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

为之咋舌。这固然完全由于第二组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孟真先生的支持，实是这一灿烂运动的原动力。他虽没积极地参加语言学的研究，但对这一学业的认识是深邃的。毛子水先生在傅孟真先生传略中有一段叙述他的学生时代，说：

> ……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自由中国》，四卷一期，第16页)

孟真先生所以放弃章太炎学派的理由，已很翔实地在本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四页由他自己说明了；假如说他有所爱憎，为他所偏爱的就是"科学的语言学"，这一点倒是很显然的；他在中山大学初办研究所时，把语言放在历史前面，那时他的中心信仰大概是如毛先生所说的，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二十七年写《性命古训辨证》引语时，他的意见仍是：

> ……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性命古训辨证》上卷，第3页)

讲历史，归根总要讲到思想史；讲到思想史，原始的材料就是语言，这一中心观点不但解释了历史与语言的研究为什么分不开，由此也可以看出，蕴藏在他的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这一问题所牵涉的，除了历史学语言学，还有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

筹备期间的研究计划，本包括了若干民族调查的题目，并约有一位白俄的学者史禄国教授担任此事。后以社会科学研究所已有蔡故院长领导的民族学组，故北平改组时，史语所就决定不在本所重复这门研究。民国二十三年，复由总干事丁文江先生之建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组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列为第四组，并命名为人类学组；从此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更扩大了，包括人体测量及原始民族的研究。但这一组开始所担任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为整理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人骨。这一课题直到民国三十六年吴定良先生向中央研究院辞职时尚未缴卷，实在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遗憾。

假若没有七七事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现在发展到什么状况，是不易揣测的。历史不谈"假若"；七七事变终于发生了。发生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工作人员即开始迁徙生活；由南京而长沙，而昆明，而李庄，而南京，而杨梅——在西南绕了一圈再转

到东南的宝岛;到现在这流浪生涯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了。计自十七年在广州创办起至现在,二十三年内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共搬家九次,如下表:

开始年月	所在地点
一、十七年三月,开始筹备。	广东广州东山柏园。
二、十八年春,由广州迁北平。	北平北海静心斋。
三、二十二年四月,自北平迁上海。	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
四、二十三年十二月,自上海迁南京。	南京钦天山北极阁史语所大厦。
五、二十六年秋,自南京迁长沙。	长沙圣经学院。
六、二十七年春,自长沙经桂林迁昆明。	昆明拓东路六六三号又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
七、二十七年十月,自昆明城内迁郊外。	昆明龙泉镇棕皮营响应寺及宝台山弥陀殿。
八、二十九年冬,自昆明迁四川。	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
九、三十五年冬,自李庄返南京。	南京钦天山北极阁本所。
十、三十七年冬,自南京迁台湾杨梅。	台湾杨梅镇。

九次的迁移,都是傅先生经手的;前三次是建设时期,每动一次即发展一次;工作的计划一次比一次扩大,都是有理想的。自七七事变起,到三十五年复员南京止,九年的时间,在西南山地,带了一千一百三十二箱图书仪器档案标本绕了一个大圈子;这一时代的生活虽苦,精神却极振奋。计划的工作固然大半停顿;利用特别的机会,也作了不少的语言、民族的调查及考古的发掘。室内的研究,虽然不能顺利地进行,但成熟的著作亦渐有完成的:如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赵元任先生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都是抗战时代出版的巨著。但这一时代最艰难的任务却在如何保存从南京带出来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费尽辛苦收集的数百箱第一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原始资料。到了三十五年回南京时,似乎可以安居报命了;不意不到三年,又来一次大移动!现在,我们的创办人已"归骨于田横之岛"以身殉了他的职守;但是在他领导下,二十年来,他的信徒所搜集的这批宝贵的"学问的原料",仍有是否能够保存的问题!

孟真先生虽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守上,但是他的心,我坚决地相信,是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事业上。假如我们知道他的最后的一念,我更坚决地相信,那一念也必是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事业有关的。

1951年2月28日

赴　日　小　记*

由一位美国教授悬赏追寻“北京人”的消息，在中国报纸里又复活了一阵子。这使我想起六年前到日本去的一件“未完成的使命”。兹选有关数事记录于此。

李　济

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日本的领空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月三十一日。

飞机降落在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在下午六时的前后；三月最后的一日，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十天，下午六时前后仍是近黄昏的时候。奇怪的是在这一个大城的附近，并见不了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

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有三十余英里的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他们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地恢复了可以通车。这条路上(自横滨至东京)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炸光了；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都不见了；所见的只是破铁、乱板、残瓦、柱烬；东一堆，西一堆，堆在路旁。汽车虽走得慢，天黑了并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形，乘车所得的印象是隐隐约约的。不过这两小时汽车行程的经验，唤醒了若干回忆；同车的人虽在断断续续地谈话，车外的寂静，却静得好像半夜里在坟圈里乱窜时所接触的旷野似的。偶尔听见一阵子风吹得树叶子乱响；偶尔看见类似磷火的几盏路灯；偶尔也似乎有一两个人的影子在不远的地方摇摆。将近十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我那一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三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忆抗战初起时，余受命押送古物一百二十箱赴渝；船上遇蒋百里、胡适两位同行。蒋百里云：日本之兴，将六十年矣，而好战不已，此次其败乎？今百里先生已逝世数年而言犹在耳，令人不能不感慨系之也……

---

* 本文是1995年11月在李济先生留在台湾大学的遗稿中发现的。这是一份随笔性质的手稿，写于1952年，以往未见发表过。整理时只改正了少量文字讹误，未作任何其他更动。——文集编者

随着中国代表团到日本作一位顾问,在我多少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事后傅孟真先生曾怪我放着正事不作而出去跑江湖。这是一时的误解,略经说明马上就纠正过来了。其实,就是跑江湖,也可以增加生活经验。我并没发现任何错误。那时的团长,朱世明将军,对我很客气;又有一位会说日本话的朋友伴着一起作事,五个礼拜的光阴是很快地过去了。我的职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专门的责任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讲(订?)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的指定工作,并在行前已商得盟军总部同意的。

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很周到: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我接洽,但是我们却错过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去访他,他尚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我又去找他,他却已飞往上海了。在东京我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斯脱特司令,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他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是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话说得十分肯定;斯脱特司令显然相信这一答复是诚实可靠的。在他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中等身体,灰色眼,经常穿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最初他听说我们打听北京人的消息,似乎感觉一点惊讶;等到交谈以后,他也就了解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了。

史克门少校于四月八日才由上海返东京;四月九日我们才会面。由于他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我们的谈话就开展得很快。九日的会晤,他表示了七项意见:(1) 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2) 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的参考;(3) 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具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4) 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5) 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总保管,可以退还中国;(6) 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总代索;(7) 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总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上项意见有若干是对于问题的答复,有些代表盟总已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到京都视察,虽由他首先提出,同时也在我们自己的计划以内。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只是急就章,应付盟军的临时措施,所以在这里可以说没有看头。至于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很快地我们就决定了到京都去走一趟。

同到京都去的，除了史克门外，还有代表团的另外一位。在京都共住了七天，与史克门少校同住在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见面；同在一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所以与他尽量地交换了种种的意见。他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家，所以我们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我们也各有必须保留的部分，这些也彼此了解，可以心照不宣。一般地说来，他是同情我们的愿望的。我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他的意见：(1) 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2) 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3)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1) 从珍珠港事变算起；(2) 从七七事变算起；(3) 从“九一八”开始清算；(4) 算到甲午战争的那一年。讨论的结果，他认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与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原则上应无问题。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这些意见可以说大致符合我们的期望，不过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总部有一个高级的美国顾问鲍尔士(Gordon Bowles)在京都碰着我了；他还是一位旧相识，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过古，相见之下，我们很高兴。他知道我所遭遇的困难，很坦白地向我说道：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所以这些事最好就在盟总办，不要推到 Allied Council 去决定，那里是得不到很多结果的。

在我离开日本以前，盟总与中国代表团关于属文化项下的劫掠品的退还，已有三(?)项了解：即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我回到中国不久，这两批东西都陆续缴到。

附　(三十五年)五月九日日记：

关于文物之收复事，美国在原则上已确定，以自七七事变后，凡已流往日本之 readily identifiable objects 均应送回。在中国毁坏之物品，自应以实物赔偿，原则承认……(以下阙)

转载自李光谟编《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1996 年北京版

附　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

李　济

参　观　工　作

1. 东京

东京轰炸区域甚广。除皇宫附近较完整外,被毁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文化机关虽亦遭有损失(如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等),与工商业区相比,则幸免者较多。东京帝国大学、上野公园之帝室博物馆与图书馆,均完整无缺,惟轰炸期间,各机关之收藏品几已全部疏散。济等到东京后,第一次往帝室博物馆参观(四月七日),所陈列者全为宣传日本文化之品,如:能乐面具及衣饰、雏人形、帝王衣饰、屏风画、文房工具、浮世绘等。所陈佛像,皆仿制品。该馆所藏中国文物,一未陈列。二十日后(四月二十七日)与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又约往参观一次,指定参观中国画,原田教授虽往招待,但中国画卷仍未看到,据云是项藏品疏散后仍未收回也。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陈列者,有辽阳汉代瓦器、曲阜之宋代砖、甘肃彩陶、殷墟甲骨、易县陶器与铜器、临淄瓦器、旅顺一带所出之陶器与铜器、抚顺黑釉陶、阿城县铜镜、大同一带之铜器与瓦器、绥远包头一带之铜器与赤峰一带之石器,大半皆为研究资料。据驹井和爱氏谈,帝国大学经手发掘之出土品,均存北平翠花街三号东方文化协会。问其发掘次数,则未详云。

2. 京都

在京都参观收藏中国文物之公私各机关,有下列各处:

(1)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

(2) 东方文化研究所

(3) 泉层(住友春翠及住友友成氏之收藏)

(4) 有邻之馆(藤井善助氏收藏)

(5) 守屋孝藏氏收藏

(6) 三合定治郎氏收藏

京都帝国大学之考古工作,自滨田耕作去世后,现由梅原末治继任。梅原氏现正编辑在日本之中国铜器,以为《支那古铜器精华》之续。中国抗战期间梅原氏曾来中国数次,收集考古资料,其著作之勤、出版物之多,在日人中亦为罕见。八年以来,彼曾提倡在南满洲一带黑陶遗址之发掘及研究,所获甚多。文学部之考古陈列馆,大部虽沿袭滨田时之规模(详滨田氏所编之考古图录),但最近所加亦不少,尤以黑陶之一架为珍贵。在满洲一带所掘之壁画,亦有上等标本(如辽宋壁画一方),但所陈列者出土之区域,仍以日本及朝鲜为重要,中国标本以华北为较多。

---

* 本文是作者 1946 年赴日回国后所作工作报告的一部分。题目为整理者所加。

东方文化研究所向为日本研究汉学之一中心;战争期间,改隶大东亚省,对考古发掘大加努力,成一文化侵掠机构。所有日本在中国之考古发掘皆为大东亚省所支持,以学术掩饰其侵掠计划,主持者或自以为一大杰作。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二人,在大同一带不断工作,前后八年,以云冈为中心,东及阳高县万安,发掘汉墓十余座,并将云冈石佛个别摄影,已积五千余帧。问其在大同发掘品现存何处,水野答云均存各县县署,如阳高所掘者,则存阳高县衙门公署仓库,彼等只携照片归,及零碎标本云。水野氏作此语时,史克门少校亦在座,不甚置信也(后史少校告济云,见有邻目录内之漆器极似阳高所出之照片)。日人最近在华北发掘,尚有热河营城子、四平山及河南安阳等地。此皆就其谈话中偶尔漏出者所计,实际所作者,决不止此。出土品只见到若干照片及残件标本,现藏何处,尚待调查。

京都之私人收藏应以住友氏之铜器为最精粹。住友春翠氏生平只收中国铜器,不及其他,现已去世,其子友成继成其志,亦陆续有所增加,在住宅旁特构一楼陈列,颜曰泉屋,所出图录《泉屋清赏》,印刷之精,为铜器图录之上上品(《犹氏吉金录》更佳,但出版较晚),今已再版。其出名之件如:人面蟠龙雷纹鼓、乳虎卣、鸱尊、雀柱饕餮纹斝等,均在陈列柜中。济等往参观(四月十四日)之后数日,其住宅为美军征用,史克门少校告济已向军部呈请,将泉屋保留,仍由住友派人看守。

藤井善助氏之收藏,品类较杂:佛像、石经、刺绣、古泉、字画、印玺、剔红,陆离满目,陈列甚无秩序。但中有不少我国国宝,如天龙山石刻、熹平石经与三体石经、十全老人玉玺、陶斋原藏之秦权二件、辽代石刻、宋代雕塑等,所出目录《有邻大观》,已出至七集。

守屋孝藏处无陈列室。往访之日,只以铜镜十余面陈列,中有镶嵌之车马人物镜,日本列为国宝,似为秦以前物;另有高丽出土之居摄元年镜,梅原氏云,为有年号之最早者。守屋氏仍业律师,其所藏诸器,列为国宝者甚多,未出示人也。

三合定治郎氏,久居北平,中国语极流利,常为住友氏收买,鉴别力甚佳。四月十九日济与史克门少校赴三合氏茶会之约,席中氏以其所藏之鎏金隋佛像、金碗、金锁等及钧窑、龙泉各件以示宾客,皆极精之小品。史克门告济抗战期间三合氏并未作古董生意(但此话待考)

3. 大阪

共参观两处:

(1)白鹤美术馆中看到铜器七件,中有洛阳所出之臣辰彝(目录中题曰虺龙象纹尊),其余六件亦皆精品,编有《白鹤吉金集》。梅原氏云每次来此参观,嘉纳鹤堂氏均有新得之器出示。

(2)黑川福三郎氏以收藏中国玉器出名,往访时,告客人云:所藏古钱,数日前曾被盗窃;玉器品质甚杂,最佳之品为一金托玉带钩;又端方氏之秦权亦有八件在此处,皆罗振玉氏所转售者。

整理者附记 以上所录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于1946以专家身份,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在日本参观、调查中国文物后向有关部门作的报告书的一部分。原稿为家父徐森玉所藏。现将此稿公开发表。今年(1994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周年,后年(1996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披载此文也可以视为对作者的一点纪念。

整理者 徐文堪

1994年11月

转载自《学术集林》卷四,1995年 上海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

还是在美国当学生的时候，忽然看见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刊有一期在"扉页"的地位，印了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

我与丁在君先生的接触，在我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从那一次认识他的照片开始。民国十二年回国后，在天津教了两年书；那时他正在北票煤矿公司作总经理。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收藏家们大概还记得河南新郑县出过一大批铜器，就在这一时期，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要我去新郑作点发掘工作，并筹了两百块钱作工作费，调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先生帮助我。后来因为土匪攻城的谣言以及当地人的不合作，这工作并没完成。唯一的收获就是在出土铜器的坑中找到几块人骨。

以后他又直接地或间接地帮助我进行了几件别的研究。十四年的春天前后，有两件事情发生，决定了我的三十年来的工作方向：一件事情是清华学校成立清华研究院，

* 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1956年）。

约我作讲师;另一件事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我加入他们派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第二件事情的开始远在第一件事以前。我虽说是在美国作过五年学生,但与外国人没共过事。所以当我收到这一美国学术机关驻华代表来信谈此一事时,我很踌躇了些时;最后,我就决定请教“丁大哥”去。我很清楚地就两点疑问向他请教:(1) 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2) 如何与外国人合作。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都很直截了当。他说:教书固然是很好,研究更为重要。所以他主张我选研究工作;他并且举了几件很显豁的例,证明他如此看的理由。与外国人合作,他说:最好开始就把条件讲清楚;至于与他们如何相处,他的劝告是“直道而行”。他用了一个英文字“Straight”来说他的意思;我这一译法,我想是不错的。这一点,我三十年来每每回味,深感到的是:在君给我的这一箴言,不但是他的经验之谈,并且确实证明,他已认清楚了东西文化及人生观的基本分别。中国古圣人提倡的礼教,原是想培植一班人内心的谦德,结果大部分人只注意了虚伪的外表;把“求真”、“求直”的本能,抑制到下意识里最下层去了。两千年来的礼教,到现在只养成了一种超等的阿世取容的技术;对于真理与直道,都当着精神上的玩弄品,没有任何严肃尊敬的气象,或者根本不承认它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儒家与道家,就这一面看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我离开天津后,在君也随着从事政治工作,因此也没有常见面的机会,直到他从上海卸任,在大连住的时期,因为一家日本报馆在报纸上造谣,说他已在大连购了地皮,预备在那里建筑房子作寓公,我有点信不过,就写了一封信去问他。他很快地答复了我的信,绝对地否认有此类计划。那时正是北伐时期,河南成了战场,平汉路截成数段;我住在北平,因为想到陕西去做点调查工作,必须从海路绕道上海到汉口再往西北,因此坐了一条日本船由天津南行往上海。船停大连时,就便看了在君一次。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文治的太太)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

北伐将完成时,在君迁到北平去住家;十八年的春天,成立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由广州迁到北平。那时他与中央研究院没有什么正式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研究机关,却寄以极大的同情并予极大的注意;虽说是他最感关切的工作属于在南京成立的地质研究所,但历史语言研究所近在北平,而主持史语所工作的傅孟真先生与他在北平一见如故(他与傅孟真缔交,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所以他能对史语所的工作计划帮助的机会还多些。据我所经验的以及所知道的,他的影响,并不以工作的设计方面为限;连人事方面,孟真都常向他请教,并听他的劝告。史语所那时的工作,分为三组:我所负责的考古研究,在他的广泛兴趣中所占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他是最

先介绍我们到关外做田野工作的;梁思永十九年到齐齐哈尔与热河之行,就是他的建议;最初所筹备的本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计划,但因为九一八事变随即发生,这一成绩甚好的开始,就没有继续下去。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由于最近田野资料初步整理,东亚的细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很可能地在蒙古及满州一带有若干重要的中心。日本的鸟居与法国的桑志华以及德日进,美国的纳尔逊,瑞典的贝格满都在这一带作过工作,而思永在齐齐哈尔以及热河的成绩,与这些人相比,是有他特别的贡献的。在这一区域,我们若能继续下去,有好些悬而未决的中国古史问题,到现在也许不成问题了。

杨杏佛的暴死时,教育文化界一班的反应都认为继杏佛中央研究院的职守的人以在君为最适宜。嫉妒他的人,讥笑他是"超科学家";但是这些流言,对于他却没有丝毫的损害。支持他的,并不完全靠钦佩他的几位朋友;最实质的理由,是他留在社会的及教育文化界的若干成绩: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以及北京人的发现(他是新生代实验室的名誉监督),与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论战——都可使人相信,他不但是一位有成绩的科学家,并且是一位有理想的科学家;以他作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设计人,岂不是一种最适宜的安排吗?在君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已有朱骝先先生的记载。在这时间因为职务的关系,有几件事,我知道略为详细,想藉此作点补充说明。

在君死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一职务上。当他最初接到研究院的聘请时,他非常的踌躇;据他自己对人说,最使他迟疑的,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就到协和医院作了一次彻底的检查。他有点迷信遗传学的若干假设;他常自己计算他的寿命,说他不会活过五十岁;因为他的父系血统的上三代人,都没有超过这一大限。结果,他的预言,是不幸而中了。

但他任中央研究院的职虽是短短的一个时期,他却为科学工作者作了几件示范的工作:大的如创置评议会、改组总办事处及若干研究所——是大家周知的事,没有在此处重提的必要。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他坚守的几个作事的原则。

他是最相信分工合作这一原则的,他认为现代所谓"知识",只有科学的知识,才算是"真知识"。而科学知识的取得:(1)必须有一群受过实际训练的人作基础工作;(2)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组织,作一个神经中枢,负安排调度的责任。那时的中央研究院,对于他的寄望,虽不是条件全备,但至少也是具体而微了。他到了研究院后,初期努力的目标,为就原有的基础加强这两点。由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努力的方向所透出的精神:第一他是绝对地要避免浪费的;他常说中国是一个穷国家,无论根据什么理由,浪费金钱都是罪恶。他作总干事的最早的两件事,为将社会科学研究所与中基会所办的社会调查所合并,请社会调查所陶孟和到中央研究院来做所长。将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与研究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合并,请生物研究所的秉农山来中央研究院做动

物研究所所长。前一事他做成了,后一事他却失败了。不过两件事,都是根据他的避免浪费说发动的。他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不过他并没有悭吝的习惯,若是一个显然有价值的工作计划拿出来,得了他的同意,他可以全力以赴为此一目标筹款的。他为化学研究所筹款研究明矾,为工程研究所设置棉纺织染实验馆,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侯家庄,都是这一类的例。

关于侯家庄的发掘,丁在君的很大的贡献,外界知道的差不多没有。原来历史语言研究所虽设了一个考古组,但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是向来没有特别预算的,每年的经常费也只同别的工作单位一样。最初几年,田野考古工作经费,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但每季不过三五千圆。还要再东拼西凑一下,史语所方能把田野工作的经费打发下了。到了第十一次安阳发掘的一年——那时正是梁思永在侯家庄工作——,田野工作的经费到了必须增加的一次。思永作了一个预算,数目在二万元以上;比早期的要加多五倍至十倍。他说,不如此作,我们就等于毁了这一遗址;这责任可大了!据我的经验,思永说的句句是实话,而所要的钱又是从最经济处算;但同时,我更知道,除非总干事特别注意,钱是无法出的。我把思永的预算送给总干事看(那时傅孟真所长不在南京),他不加任何条件,就答应了。到现在中央研究院最为国际所欣羡的一部分成绩,就是思永用这笔款得到的结果。

在君的决定,却是有他自己的根据的;他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因此他知道得清楚田野工作的正当需要,他看见过考古组的成绩以及思永对于考古的贡献;他更知道思永的工作能力,所以他的这一决定,是一种科学的判断。以后得到的结果,可以说超过了他的期望。

但是这一笔款子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问题的答复,牵涉到在君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另一计划,而是没有完成就被日本侵犯所破坏的一件计划。

远在杨杏佛作总干事的时代,中央研究院就与英庚款会及教育部商量好了,中央博物院的筹备由中央研究院来担任;代表中央研究院作这件事的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孟真先生。他的名义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但是研究院与博物院具体的合作计划是在君到职后方才完成。合作的要点为:(1) 博物院不重复研究院的工作,研究院采集的科学标本(如生物、地质、考古等)研究完成后均交博物院保管及陈列;(2) 研究院尚未成立的学科之研究工作,博物院可独自或与研究院合作进行之;(3) 博

物院对于研究院进行中之采集工作得派人参加并补助其经费。中央研究院在侯家庄第二、第三两次发掘的经费,大半出自中央博物院的补助费。那时在君是中央博物院的理事,我继傅孟真之后为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处主任,所以这问题就得了这一种满意的解决。

归纳前后十余年与他接触的经验,我觉得在君所提倡的科学研究有几点值得记录下来:

(1) 他最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培植人才及选拔人才。他确具有量才使用的能力。他说:科学工作并不是天才人物的专利;大有大的工作,小有小的工作。但是作领导的人,就非头等人不可了。若是领导的人不适宜,这机关不但等于没有,并且是一种逆流的影响。他到中央研究院后,为坚持这一见解,就获罪了不少的朋友;但是他的立场,却没人能反驳他。

(2) 他认为一个机关的领导人,固然自己要做研究工作,尤其紧要的是延揽人才,并帮助下一代。他常责备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不留心争取头等物理学家。因此他的这位本家就感觉不安而萌了求去之意。大家都同意在君对西林的责备是很公道的,但同情丁西林的,也大有人在;要是在英美的社会,了解在君这一见解的人,或者可以更多了吧!

(3) 他是一位民族意识很敏锐的人;他要把中国研究工作的水准提高了与世界最高的标准相较;他是绝对地不甘心于第二等品质的。他欣赏朋友的与青年的成绩同自己的一样。他怜惜人的愚蠢,好像是自己的过错;他也不护自己的短;他认为一个科学家有了错误,应该自己承认。对于中国科学家的真贡献,更是极力的宣扬。他的骄傲——假如可以用此一词的话——是骄傲自己的民族与自己的文化。他提倡科学,正是要补中国文化的缺点。他最厌恶的,是一种假科学名义,开空头支票的人们。

1956年7月31日于台北

安阳发掘之回顾*

“安阳发掘之回顾”要点

科学的发掘在安阳开始于民国十七年的冬季，创议者为当时在广州方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热心提倡考古学，感于甲骨文对于古史研究之重要，故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即派董作宾先生赴安阳作初步之调查，试掘殷墟遗址所在之小屯，以后称为安阳发掘第一次，此次发掘，获得文字的甲骨数百片。

民国十八年春季起，由本人主持殷墟发掘工作，范围逐渐扩大。直至民国二十六年夏七七事变发生，田野工作方全部停止，前后共作十五次。安阳发掘之十五次工作，大半时间，以商朝晚期都址所在之小屯为中心；只有三次时间，田野工作集中于商代陵墓所在之侯家庄。

工作之收获，最重要者为各种遗物在地下之分布情形，遗物中除有字甲骨外，较重要者如，大批之人类骨骸、各种动物骨骸。此类资料前者可以供给研究殷商时代中国人之体质，而由于后者之大量出土，研究之结果更可以说明当时之经济与生活状况。当时之手工业，可以由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等，作详细之说明，在艺术方面，则有各种器物之装饰与留在地下之装饰痕记，作研究之资料。

安阳出土器物之可宝贵处，可以由三方面加以简单地说明：(1) 种类之繁多：其种类除上说者外，尚有建筑、陵墓，金属中有黄金、水银，此外还有各种骨刻、象牙、漆器等等。(2) 数量之多，如陶器一项，发掘有记录者，近二十五万片。(3) 最紧要者为时代之比较的肯定，大约在商代的晚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之三百年间。

中国古史之研究，以安阳发掘为基准，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旁及先秦经史之传说，为之注解，并作有力之证明，故此一考古工作，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建筑了一个坚强的据点。

---

* 本文系作者关于安阳发掘的讲演稿，原载《青年年会学术论文集》(1958 年，台北)。

问 答 部 分

问:目前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应该说是在哪里,台湾算不算一个。

答:这话很难说,傅斯年先生当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确有在中国建筑汉学中心的雄心,当时经各方学人的赞助,甚有成功希望,故从民国十八年起至二十六年这段时间,进展极快。这一情形如能再继续几十年,此一目的可以达到。但是现在世界汉学研究有无中心已成问题,在巴黎老一代学人多已凋谢,继起者亦无特别贡献。欧洲方面,研究汉学者甚多,但均不能成为一中心。在美研究汉学者亦多,范围亦广,但找一中心也不易。目前在台湾,研究汉学是我们本行,人才不少,惜多散处各地,如能将此等人才集中,在台湾建立一中心不是不可能的。

问:关于北京人的发掘经过,和它目前下落怎样。

答:北京人发现远在民国十二年就有线索,以后地质调查所正式发掘,是和北平协和医院合作,由美国洛氏基金会捐了一笔款子,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这件事一直工作到抗战开始还继续,在这期间的发掘是相当重要的,可是自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政府鉴于发掘品的重要,大家也感觉到日本人有抢劫这些发掘品的打算,所以当时决定把它送到美国去保管,但是不幸珍珠港事变发生了,据我所知道的,是当这些发掘运到秦皇岛的时候,就遗失了,以后的下落就不得而知。

问:从人类考古学的观点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如何。

答:最近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颇研究此类问题,就其进展之情形,可以知道,以前台南有日人发掘之彩陶器,研究之结果,断定与大陆有关。此外,在台湾尚有若干黑陶之发现,黑陶文化是在大陆东海岸分布甚广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辽东半岛至杭州湾,均有这一类的遗址,亦可证明与大陆有关。近来在圆山所发现之玉器、石器、陶器及人骨等,亦可证明与大陆有若干关系。现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将圆山所发掘之陶器、蚌贝、石器、陶器等,正在整理中。

问:我出土的甲骨现在台湾收藏情形如何。

答:现在台湾甲骨保存最完全的是“中央研究院”,其余的都散置各地,当然流散在大陆上的也有。“中央研究院”对于这些甲骨文的保管很好,因为都有专家负责整理,目前拓墨的工作大半完成。正在进一步将分开的骨片,计划拼拢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问:在甲骨文时代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文字?中国在秦朝有“书同文”,在秦朝以前又有哪几种文字。

答： 甲骨文时代在青铜器上也有发现同甲骨文相同的文字，我国研究甲骨文最高权威董作宾先生，认为若干青铜器上的文字字体比甲骨文还要早，可是因为证据不足，将来能不能证实，是个问题。以周朝的文字来说，各国习惯的文字字体与用法不同，所以它们是很复杂的。到了秦始皇时代，就把各国的文字废除了，使用了统一的文字，就是所谓"书同文"。至于秦始皇以前各国地方性的不同文字，就像现在山东、广东、陕西等地习惯上与俗用时有许多不同的字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地方性的。大致说起来形体上虽然有些分别，本质仍是相同的。

问： 洛阳发掘进行情形如何，有何重要发现。

答： 洛阳的文化遗迹很多，东周及东汉均在此建都，故为文化中心。惟多少年来，在此考古的人都是没有科学训练的，故发现虽多却没有记录，一切都没有规则，关于资料的说明亦颇不齐。洛阳古器物甚多，据说最近尚有人在发掘，至于详情不大清楚。

问： 殷墟文化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有什样影响。

答： 最近美国哥大教授 Goodrich 先生撰文，认为殷墟的发掘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五百年，事实上他说的"五百年"这一数字是相当保守的。据我们自己考据，至少可以推前一千年。以春秋战国的历史来说，是最靠得住的一部《春秋》，开始于公元前七二二年，而商朝的历史可以推溯到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

问： 有些外国历史家说是中国文化由西亚传来，这是否合理(因为我国彩陶的分布是沿华北河西走廊而至西方)。

答： 我们常听得有人这样说，但这种说法的根据并不一致，有时他们是根据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情而下论断。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化可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西方文化在若干时代也可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何况我们的祖先决不是抄袭的，中国文化是经了若干时间，集合了很多的成分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因此，说中国文化整个是由西亚传来，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能说有若干成分可能是从西方传来的。

问： 殉葬者是否就活生生的睡在墓里？

答： 怎样殉葬不大好说，不过就发掘的现象推测不是活埋的。我们发现有头骨与身体分葬两处的事实，这可以证明殉葬以前，人已经是死了。

问： 殉葬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 这关系大概不很简单，现在我们还没有直接的事实根据作答案，但我们可由后代的许多事迹推出若干答案。被牺牲者可能与死者有几种不同的关系，他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也可能是他的仆人或奴隶，也或许是最亲近的大臣。现在由安阳发掘的资料，可以发现至少有三四种不同的关系。如果将来能发掘出更多的材料，对于解答此

一问题,可能更有帮助。

问:从中国的发掘古物的殉葬衣物来看,我们的殉葬制度和埃及的殉葬制度是否相同?如果是相同,能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相互的影响呢?也就是说到底是中国影响了埃及,还是埃及影响了中国?

答:依我个人看,这个问题是不能成立的,最近研究小亚细亚和非洲文化历史的结果,许多权威学者认为最早埃及的历史是受过中亚细亚的影响。

如果要比较的话,以中国早期的历史关系与埃及相比,远不如和两河流域来相比了。至于殉葬的事实,最早的发现是在"苏昧",这是英国科学家乌莱爵士(Leonard Wolley)所发现的。

至于中国在商朝就有殉葬的制度了,如果与苏昧王朝来相比,要晚两千年。就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来说,我国的殉葬制度大概是受西方的影响。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中国的铜器时代一般的说来,比西方要晚了一千年至两千年。

问:人类发源的学说很多,是地域性的发展还是全世界发源于一地而向四方展呢?

答:这个问题我们比五十年以前知道的是多得多了,有一个时期,科学家们相信人类的发源,是在中央亚细亚,可是现在这个学说已成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最早的近乎人类的化石是出现在南非。谈到人类的发源,对于"人类"一词,我们应该有一个习用的界说。生物的演变是多方面的,究竟到了什么阶段,我们的祖宗方才得到人形?竟见不十分一致。现在的人类的体质大致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方有黄种、白种、黑种等等的区别,于是有人认为现代人类的始祖是不同的;这些表面的区别在很早就存在了。蒙古种、高加索种等很早就有区别;可是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有一个来源,这地方也许在亚洲;更可能是在非洲。

问:在甲骨文时代,中国是否还有其他文化。

答:有的,除商朝外,还有更早的。在以前没有文字的文化,考古家叫作黑陶文化,在中国北部至沿海达辽东半岛都有此一文化蔓延。

问: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发掘计划。

答:发掘计划是有的,台大考古学系每年都有发掘工作,但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为了训练同学们的考古经验。

在台湾有若干地方的遗址还值得发掘,尤其是在台南这类的遗址古物相当多,不过发掘计划限于人力、物力的问题很难大规模展开,因为考古发掘是要花很多钱的,台大每年所用于发掘的经费只有几千,教育厅的资助也很有限,所以是很难进行。像安阳发掘,就是筹的专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了不少钱,因此可以进行得很顺利。现在这一类的捐款是不多了,所以纵然有计划也难于实现。

问：现代人类对现代文化状况都加以保存，然则千万年后的考古家在发掘我们时，是否不需要作太困难的考据，抑或仍一样困难？

答：所问牵涉的方面甚多，很难作一简单的答复。现在考古的时代可以达至几十万年以前，那时尚无文字，考据至为困难，故只有根据器物遗品推断。

目前则有文字记录，自然文字记录也有真有假，但尚可根据有关的全部记录断定。

目前我人之生活，在几千年以后，因为有文字之遗留记载，故考古当不致太困难。不过现在文字记录在几千年以后，究竟能保存何种程度，则可以断定困难与否。

我的初学时代*

——留学前所受的教育

在我个人的回忆中，我的童年教育，完全是按照先父的一种构想进行的。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各为十六岁；生我的年代（公元1896年）他们两位各在——旧历算法——第二十九岁。

我的发蒙读书，并不是由父亲自己教的；因为那时他已是我们的县城内教大学生的最忙的老师了。但是我把《四书》读完后，却没按着传统的次序读《诗经》；跟着念下去的为《周礼》。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这完全是父亲一个人的主张。亲友们都感觉得这一变动的奇怪。但因为他是一县闻名的大秀才，拥有最大的学馆，也就没人责难他这一违背习惯的教育方法。后来的事情演变得很快；更激烈的改革，一件一件的紧跟着发生。关于读完《四书》就读《周礼》——这一不寻常的课程安排，在我童年的发育中，就与其他的学制改革混在一块儿囫囵地吞下去了。我在十岁以前，已经意识到：我不是科举时代的秀才候补人了，也没有萌芽过任何争取这一资格的志愿。

数年前，偶与俞大维先生聊天，他忽然把他的犀利的谈锋收敛起来，庄重而朴质地向我讲到他的童年时代的一段事；他说："我读完《四书》时，我的父亲要我读《公羊》；所以我的国文作文，始终没搞通。……"俞先生这种不加调味的幽默，尤其是那后半截——大概只在鼓励对话人继续说话的兴趣而已，我们且姑妄听之。但他所说的前半

---

* 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11卷第3期（1967年）。按原稿发表时间，本文应排在《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一文之后，但考虑读者阅读的方便，特破例将其置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一文前面。特此说明。——文集编者注

段，没有疑问地，象征了戊戌政变后，“废科举兴学堂”酝酿时代的教育趋势。我的读《周礼》也是这同一风气中发展的一面。

我读《周礼》没读完，就考进了县立的（湖北钟祥县）小学堂；父亲在这学堂似乎也担任了某一种职务，我记不清楚了。读《周礼》的课程是没完成，至于这一课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到现在作一回忆分析，我不禁与大维先生有些同感。因为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初学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九个字时，我的精神上的苦恼。不过，我不能像俞先生似的，把我在这方面落后状态的原因，完全追溯到提早读《周礼》这课程上去。

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

这自然与他的早期苦学和教馆有密切的关系。父亲对于教育青年子弟，有两则基本信条：(1) 他是孟子的信徒，笃信性善说。他同意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说法，所以他教育青年子弟，注重启发。在我的印象中，有父亲很多不同的面孔，但却没有威风凛凛的一面；就是那道貌岸然的气象，也很稀少。我所经常看见的，总是那刚正而温和的表现，可亲而不可犯的样子，所以他所希望达到的启发作用，不但他自己可以尽量地发挥，确实也收到了不少的效果。(2) 他对于教育子弟的第二信条，可以说是自第一条引申出来的，即：使每一个儿童发展他的善性；也就是充分地培植儿童固有的品质（反过来说：就是不要摧残儿童的天性）。他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教材，把上说的两项意思反复地、巧譬善喻地解说得淋漓尽致。

父亲对于教育上的进步思想，影响所及，范围是相当的宽广；受惠最深的自然是我。这一深厚的影响，概括地说来，是为我不断地开辟了新境界。若是具体的详述，又可以分成若干小方面，例如：(1) 远在科举时代他就教我朗诵诗歌，教我听高尚的七弦琴音乐。(2) 县立小学成立的初期，即将我送入，使我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3) 在宣统末年即毅然地让我考清华。现在讲这些事，似乎只是每一个作父亲为儿女必须尽的责任，但在光宣之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这些教育子弟的方法都需要具有进步思想的父兄，方肯如此地作。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

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这不能不谢谢一群先进的教育家——像蓝图设计人、工程师和包工的这一群人们一样,把我当着了一种有用的材料使用了。

父亲是选择我这块材料,并用力加工的第一个包工者。在初期到北京的时候,他常按一规定时间,在家中给我和几个亲戚的子弟补习《孟子》。他对于性善说,总是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详细的解说。这时,我们全家初到北京,我已经是十一岁了;温习《孟子》的时候,我已经能聚起精神听讲;大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自己也有想做圣人的宏愿。父亲注意启发,常常也奖励小学生发问。那时所问的问题,大半与字、句的个别意思有关。有一次,父亲讲到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这一章——而孟子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结束那"不忍人之心"的推展——这使我那幼小的心灵,感觉得有点奇怪。那时正是我看杂书最热烈的时候;颇以为孟子的"以羊易牛"这一说法,远赶不上佛教的戒杀生之合理;所以我就提出来向父亲辩难。父亲认我所说的为佛教异端,不能与圣贤之说并论。孔孟之言,他说,都是本乎人情的;所以看见了牛,而不忍其觳觫,就发了不忍之心。但是祭祀必须有太牢、少牢,也是先王之道。这是礼之大者;庖厨供膳馐亦是此意;故不可废去。所以远庖厨是一种合人情的安排。我的问,原是父亲奖励出来的;他的答案,在那个时期似乎就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不过,我总觉得,好像心中萌生了另外的、一种说不出的新感觉。我那时正在看《水浒传》、《济公传》等小说,对于佛教的教义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对于孟子的"仁心"的根据,也没触动更深一层的好奇心把它追问,和父亲继续辩下去。在父亲看来,我所发的问也不过是幼稚见解罢了。

他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光绪三十三四年)。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为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精神,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

我听《孟子》讲解时,虽有时提出了若干问题问难,听完时也不敢说能完全了解每字每句的意思,但大体说来:对于父亲的说法,经过了两年的训练,差不多是全部接受的了。

对于孟子的一部分学说,我的信仰的摇动开始于中学的时代;我的中学教育最早的一段,是位置在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学;但最大部分的时间,却在创办时代的清华学堂。这一时代的清华学堂,所给予学生的,是些什么?

一位英国的哲学家在民国十年前后访问中国时,对于清华,记录了这一种印象;

他说：

> 到了清华园，一个英国访问的人，立刻感觉到好像在美国一样，周围均可触及若干在这一古老国家碰不到或极少见的习惯和现象：如清洁、整齐、讲效率、守时刻等等；这学校的校长，也就像一位在美国小城镇的校长一样。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入了美国籍的中国留学生，读了这段话，作何感想，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课题。以我个人回忆来说，我对于这位哲学家的意见，认为是甚公平的；这并不是说，我默认了中国人原有习惯及环境，都和“清洁”、“整齐”、“效率”、“秩序”联系不到一块儿。但中国是泱泱大国，包括了种种不同的风俗和习惯。远在秦汉大一统以前，已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之说；而秦汉的大一统，实在是指政权而言，并不包括所有的风俗习惯。

试以清洁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此一文化成分，并没有一固定的准绳。经籍中的教训，注重祭祀时候的“斋戒沐浴”；这是读书人所习知的。至于日常生活中，最可注意的为古礼所说的结婚妇女的职责。中国妇女的教育，及婚后的工作，可以说大部分与清洁有关。直到现在，作文言文的作家，若要恭维一位当家的贤妇人，总要说她“操井臼之劳”，赞赏一位待嫁的女子，经常要夸她能“执箕帚”。

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地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

我到清华园作学生时，发现了园中泉水，可以取之不尽。母亲听了我的报道，真是高兴得很。清华学堂在开办时，建有特别设计的洗澡间。在民国初年的清华，斋务处(等于现在的训导处)的一种特别工作为强迫学生在固定时间洗澡，为此，斋务处印了票，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在每一周的固定时间到澡堂去缴票洗澡。奇怪的是，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嫌这一办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就串通了澡堂的管理员，缴票而不洗澡，逃避记过的惩罚。

不喜欢洗澡的同学，也有他们的一套人生哲学，理由是，身上出的汗，以及出汗部分分泌出来的积垢和刺鼻的异味，都是身上的元气，如身体发肤一样，不应随便放弃的。显然地，这是接近沙漠地带、华北干旱区所产生的一种人生哲学。这一说法，不但为现代化的青年中国人所不能接受，也是革命以前大多数鱼米之乡的中国老百姓所不接受的。

清华的清洁运动以及守时刻和讲效率的习惯，大致说来，并不是短期培养成的；但行到十年后，确在校内发生了若干具体的成效。所以大为哲学家如罗素等人所注意。

我是在这一训练风气中长成的;等到民国七年放洋到美国时,洗“莲蓬浴”、作“健身操”、“守时刻”,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个人习惯。

在清华近八年学习所得的,只有这些吧?当然不止。大致说来,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华北的青年对于政治的意识,除了几股潜流外,甚少公开发展的机会。少数的萌芽,马上就被袁世凯和他的党徒及时掐掉、扼杀了。清华的环境,与城市隔绝,来往的交通大半靠骑驴、坐骡车;人力车与自行车是最快的代步,火车每日停清华园的班次极少。城内的新闻纸,要下午方到,那时北京的报纸除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外,都是为当权的军阀宣传的。上海报总在发行日期一礼拜后方能到北京。城内、城外通电话是有限度的,我在清华园作了七年半学生,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理由极简单,我的家中固没有电话,学校内也没有让学生通电话的任何方便;有事时,只有写信通消息。

袁世凯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人物。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只能在有限制的几条地下组织传播;学生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政治的消息和议论,都是清一色的反孙的。东安市场可以买到的讲孙文学说的小册子,说得最客气的也只能像数年前台北流行的《胡适与国运》那种口吻。清华学堂的学生,关在水木清华的一个小天地内,学英文,作留美的预备,自然没有机会、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对政治发生好奇心了。

我在这时期没展开我的政治意识,尚有另外的缘故。父亲虽是奉信学而优则仕的格言,在光绪末年凭考试得到“七品小京官”的官衔;他却最怕做县知事。他常告诫我们说:知县官职位虽低,权力极大,且不分明;有操守的人做,往往尽不了责任;能干的人做,大半免不了贪污;所以知县实是最不可以做的官,这种衙门总是诱人藏垢纳污的场所,最容易做伤天害理的事。父亲有天赋的一种倔强的性格,他不愿他的子弟作患得患失的鄙夫。他认为大部分的县太爷都是这一类型的人物。这些理由——在我的青年时期听多了,就有了很深的印象;他的这些话,渐渐的养成了我对政治的一种偏见;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总以为:政治这项职业是一门肮脏下流的事业;这一类的证据,不幸地是实在太多了。

那时基督教在学生群中传教的方式,除了自办学校外,大致有两公式:一为青年会拉会员的方式,另一为办夏令营。两种方式采用的手段,都大致相同;即用小量物质诱惑开始,逐渐的深入;这方法颇有奇效。传教的人因此达到目的的甚多。我在读小学的时期,已有孟子性善的学说为我的精神生活垫了很厚的底,基督教的“原始罪恶”的说法——无论传道的人说得如何的巧妙——到了我的耳朵内都变成了异端邪说。所以我对于时髦的宗教,在那“志学之年”的时候,已有不动心的气概了。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想宗教问题,有发精神病的;也有因想政治问题而入了党社组织的。这些不同方向吹来的各种风,到了我的跟前,都轻轻地飘走了。热心传道及喜欢拉政治关系的同

学,大半认为我只是一块琢不动的顽石。那时我所想的,只是要学点“洋东西”,对于国家和社会,作点有价值的贡献。清华正是预备我们学这个“洋东西”的一种教育;要预备的功课中,最紧要的为学英文。其余的功课都是安排在以“学英文中心”一有计划的安排上。

英文所占的地位,既是如此的重要,国文的阅读就相形见绌了。课程上如此,教员的身份也就比例地有所排定。这一畸形发展到清华改制前后构成了校内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最感困惑的一件事。这一问题的本身,可以说直到现在,尚没有得到一种合理的解决。

照文学家的标准衡量,我的英文是始终没学成的;不过文学并不是我要学的。父亲在这一时期,常常地抓空为我讲解韩、柳、欧、苏各大家文章的奥妙。对于这些讲解,我始终听不进去,并且常抱了一种自卑感。虽说我也有些欣赏纯文学的能力,但把它当着一门职业,我不但不想学,也鼓不起很大的兴趣。我所要的,只是想透过英国语文,学点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东西。这目的,在民国七年放洋时,我以为可以达到了。

若是就观念说,我在清华的时代,却也另有所获。国文虽在清华的课程中占极不重要的地位,但教国文的先生中,常有饱学之士。我在清华高中时代,上国文课时,遇到了湖南籍的一位饶先生。他真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博学多能的老师。他教学生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我选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每周照他的指示,一篇一篇的读下去,并把心得作成了笔记,按期请饶先生批阅。这位老师,在讲堂上向不讲话,只写黑板;他批阅学生的课卷,却一字也不放松,看得非常仔细;并且每次都有详细的批语。有一次,他赏识了我的几则札记;批语中有,所见可与《困学纪闻》比拟的话,父亲看见了儿子的笔记如此为老师赞赏,颇为惊喜。自我进清华后,父亲总以为我已选了洋学堂,中文会逐渐忘记的。但荀子是孟子的对头,读多了,不免影响到性善说。他知道我看《荀子》,也就注意到这一进展;但他却没有意思为我对《荀子》作任何评介;他取了放任的态度。他的心中,如今回想起来,大概也只是让我作自己的抉择;尽量地发挥自己的理性;这是与他的教育法相符的。

在读《荀子》时,我最感到兴趣的,为《天论》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些话的明白晓畅,又合乎自然科学的发端思想;这可以说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样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端思想。这些话都能使我们那一时代的青年们,读后感觉到一种精神上满足,并在下意识中培植了一种民族的骄傲。我读《荀子》,尤其感到畅快的,为《天论》篇中所说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子,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些话语。民国初年,中国知识阶级所要的是,共和的政体和科学的思想。原来,有关这些思想的基本观念,在两千多年前,孟荀两大贤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这是当时的,以将来中国主人翁自居的青年们,一种特别发现。

不过这一快乐及骄傲的感觉,是极短暂的。因为跟着问的就是: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已经知道的原则,到现在中国尚没能实行?而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反落在一群野蛮的欧洲国家之后咧?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一切烦恼的开始。这一连串的烦恼苦闷的情绪之发展,就像经九曲的黄河,过三峡的江水似的。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后话;在清华的时代,这一发展尚没有这样尖锐。此时的心情,仍是没出川的江水;河套以西的黄河。

初期怀疑的对象,很自然地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孟子,童年时我所崇拜的一位圣贤。我回想到他的"远庖厨"学说之不合理;他的性善说,不完整,有漏洞。所说的尧、舜、文、武、周公这些圣人有些过分地神化。我对于"法先王"以及托古改制这些说法都发生了疑问。同时,只管荀子较缜密的议论,使我心折,尤其是他论"天"、论"群"、论"名"的几段。但是他的"礼"论之哲学根据,使我感觉玄虚,而不能完全了解。我也感觉到荀子有些替现实政治文饰的嫌疑。荀子在《礼论》篇及其相关各处所讲礼的节目,无形中为阶级制度作了一种学术的辩护。

不过这一怀疑的开始,只加重了我向国外求学的热望;所发生的副作用为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求奇方去!

1967年8月16日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一、乌斯特·克拉克大学时代(1918—1920)

我是民国七年到美国去的。在美国读了五年的大学,得了三个学位。民国十二年回国,在那里前后共住了整整的五年。

在这五年期间,除了有一个暑假,我以一种好奇的心理跑到一家工厂,做了一个月的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大学里。那个时候,清华学堂所给的官费,可以让我们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学术的工作上。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

自从民国元年起,清华学堂每年都把她的毕业班的学生送到美国去深造;所以清华的学生每届毕业的那年,都要作出洋的预备。这预备的工作包括两件重要的项目:第一是预备学甚么?第二是到哪个学校去学去?在我出洋的那一年,我们已经是第八班的毕业生了。就学校方面来说,对送派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譬如训练学生,尤其是在语言、礼貌及一切日常生活上的普通训练,差不多都有一定的规程;但是在择业方面,学校却予学生极大的自由。差不多每一个同学都可以随着他自己的兴趣做最后的决定,而这个兴趣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的。我在出洋的那一年,想专门学习的是心理学。如果问我为什么要选攻心理学,答案却很简单:因为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的时候,清华开了一门课程叫心理学,这门课是由特别从美国请来的一位先生担任的,那时我是最高年级的学生,所以有资格选这门课。当初我选这门课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有甚么真正的兴趣,而完全是由好奇心的驱使,但是读了半年,就渐渐地发生了一种先前所没感觉到的新趣味。譬如这位先生说:"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测

---

* 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1卷第5、6期(1962年)。

量人的智力就好像测量人的身高一样。"我们这些听的人都觉得怪好玩的,大家争先要他量量我们的智慧。所以IQ(智商)这个符号,我们这班同学知道得很早。以后又过了好些年,中国教育家才用这种方法测量中国儿童的智慧。就我个人说,清华学校最后的这门课程,却帮我做了到美国学业选择的最后决定。所以在清华毕业的最后半年,我只是打听那时候的美国大学,哪一个学校教心理学最为有名;访问的结果,就是在美国麻州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她是以心理学研究最为出名的。

我在乌斯特城先后共住了两年。第一年大半的功课都是选的心理学。在这一年的生活当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可以说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我没到美国以前,习惯上我们总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好像有一条通不过的界限。但是,住在他们的人群中,渐渐感觉到他们与人相处,也是非常合乎我们中国所谓的"人情"的。譬如:他们对外国学生特别地关切,而关切的真挚跟中国的老师对于他心爱的学生,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有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特别的、而实在不应该如此感觉的,就是:世界上的人性是相同的。有一次我与一位教社会学的老师随便谈天,讲到一本新出版的书。他很是惊异地问道:"这本书你都念过了吗?我答道:"我没有全看过,不过我把这书的序文全部看过了,这书的章回目录我也看过了。所以对于这本书,我已很可以了解得一个大概了。"我的这位老师又问我:"你这种读书的方法是在美国学的?还是早就知道了?"我就微笑了一下,答道:"我的父亲是个老教书的;他很早就教我,凡是读一本书,在开始以前,先把序文详细地阅读一遍;如此开始,大半就可以把这书的要点先领会到了;所以我读中国书就是这么读法。"我的这位老师听了我的这一次谈话,就大为钦佩。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之间,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重新估量了一下,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美国人对于你们中国的了解实在太浅陋了。不凭别的,就凭你这短短的几句话,不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是不会有这样的文化修养的。"在我听来,这不过是不虞之誉,因为我在那时只是随便谈天提了几句;而我的这位老师却是个细心的人,他在小的地方看到了大的问题。从此他对我非常照顾,并且极力奖励我学社会科学——他是教我统计学的一位先生。

我学心理学的成绩,大致地说还算不错。读了一年,我就得到一张文凭。不过很奇怪的,我并不想继续读下去。我在这一年之中,把心理学的各派都尝试领略了一下。我的感觉是:好像这门学问所用的研究方法,还不够我所想像的科学标准;因此我也就推论到,由这些不够标准的科学方法,所得到的心理学知识不一定靠得住。那时候在美国,梯琴勒氏(Titchener)所领导的"内观实验心理学(introspeotiv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华特生氏(Watson)所领导的"行为心理学(behavior psychology)",虽然惹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并没有得到学院的正式承认。而弗洛德氏(Freud)的"心理分析学(psycho-analysis)",虽说是风行一时,但大家仍把它当做医学的

旁支看待,算不得心理学的正宗。至于别行别系,真是百家齐鸣,莫衷一是。所以我学了一年,真有学然后知不足的感觉,当然更严重的顾虑是,好像这门学问在中国是找不到什么出路的。所以第二年我就决定向社会科学中去找一点新途径。这又是一种偶然的机会而做的这一决定,帮助我作这一决定的是我所说的社会学老师。这次我的目的倒是比较更具体一点:我所想研究的是人口问题,我想从社会学,尤其是经济与优生两方面去看人口问题。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克拉克大学所碰到的老师,留在我心中印象最深的,为那大长白胡子的校长基·斯坦奈·霍尔(G. Stanley Hall)先生。他是美国研究青年心理学著名的最高权威,学问的渊博就是哈佛大学已故的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也是佩服的。我初到克拉克时,常随别的同学到他班上听讲,老先生常对学生说话,启发我们的地方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实际上也是受到他影响最深的一点——为他教我们读书的方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必也不可以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你们的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随便地浏览,自由地阅读,好像啃青的牛在那儿啃草一样,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地翻,遇到高兴的就多看一点,遇着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再换本新的看。假如你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的真正的长处。”克拉克图书馆的一切布置,可以说是照霍尔先生的理想,为学生安排的。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有阅览证,他就可以到书库内看书;至于阅览室更不用说了。克拉克是一所小规模的大学校,学生不多,因此图书室里并不拥挤,用功的学生的确可以安静地享受读书的乐趣。我在克拉克第一年的时候,由于霍尔先生的暗示,因此就养成了广泛阅读的兴趣。我对于人口问题,就优生学而发生的兴趣,固然大部分受到这位社会学老师的影响,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由于我翻阅而养成的。第二年,我已经算是大学研究生了,选择的论文是世界人口质与量的演变。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但读了若干与优生学有关的书,同时也涉猎到人类学的书籍。人类学这门学问,在1920年的美国虽然还没有盛行,但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与世界各地接触的方面天天增加,人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与实际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极有希望的学问。那时候在美国只有几个学校教人类学。但是说也奇怪,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克拉克大学却没有人类学这门课程;但是在美国最早提倡它,而那时人类学的权威,原属德国籍的佛朗兹·鲍亚士(Franz Boas)教授却是最早在克拉克教书的一位先生,所以克拉克的图书馆有一个房间的书架上差不多全是人类学的书籍,这个房间也是我常到的地方。自从我第二年决定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后,我到这个房间的机会更多了。我在做人口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就渐渐地感觉到,这个大问题虽说是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考查,但是最基本的训练在于数学。我虽然对于统计学有点入门的知识,但在中学的时候并没注意数学这门功课;若想专

门走这条路,我必要重新学起才行,但是又怕时间赶不上了。这篇论文虽然勉强作完了,并且得到指导老师的赞赏,口试也容易地通过了,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满意,好像第一年一样,我又感到空虚;这时候我已经认真地想改到人类学这方面去。我想进哈佛大学!但我并不知道哈佛大学是否准我进去!我没有人为我介绍。我先跟我的社会学老师谈。他原是想我能跟他再进一步做博士论文的,听我想改学人类学,他衷心不免感到失望。但他表面的风度却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晓得我的决定是经过长久地考虑才做的;他帮了我很大的忙,说这是很好的发展,并且劝我先跟已经退休的霍尔校长谈谈。霍尔校长在我在克拉克第二年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却很喜欢跟年青人接触。听说我要跟他领教,他很高兴,尤其高兴的是我要学人类学,他认为我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的"本能"而做的决定。我们这群年青的中国学生向来都把霍尔先生当做老神仙看待,因为他的智慧实在太高深了;由于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我的信念更加强了,因此我就开始做选择学校的预备。那时候的东方大学教人类学的,以哥伦比亚大学最出名,因为她有最出名的教授在那儿,即佛朗兹·鲍亚士。但是克拉克的老师及若干同学们都劝我到哈佛去。我既然得到克拉克的两个学位,再转到哈佛研究院,就没有很大的困难了。所以在1920年的夏天,我就从乌斯特转到哈佛去学人类学了。

二、哈佛大学时代(1920—1923)

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年,校长是劳威尔(Lowell)先生。他是以研究英国政治出名的一位学者,他出身于波士顿一带的老世家,家中出过不少的读书人,可以算得上世代书香。当时前一任的老校长艾利欧(Elliot)先生还健在;他是以改革哈佛大学,使之现代化而出名的。哈佛大学的研究院就是由他开始办起。

至于1920年时候的哈佛大学,对于我是个什么印象呢?现在仅就我所能追忆的记述几点。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

哈佛所在的剑桥(Cambridge)与波士顿只有一水之隔,学校本身的建筑,除了一所教堂以外,就是有名的威顿纳(Widener)纪念图书馆。两座建筑物中间,有一块面积并不太大的校园。校园四周建筑紧凑,大半是文学院有关的讲堂,如有名的教哲学与心

理学的爱默生大楼(Emerson Hall)就在这儿。图书馆的后门为一条直通哈佛坊(Harvard Square)的大马路。哈佛坊是哈佛大学一带交通的中心点,不但学校的合作社设在此地,同时这里也是到波士顿去的地下铁道的起点。1920年的时候,这一带的建筑还不算太多。但是研究院的学生,因为他们所学不同,分散各地。差不多各系都有特别的建筑——有些离总区很远,如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就设在波士顿,植物园也远在波士顿。其他各部门,大致都散在剑桥的附近,有的离总区近,有的较远。人类学的课程都在一个博物馆的房子里上课。这座房子的建筑,是纪念一位彼包得(Peabody)先生的六层大楼,里面保有自然科学的陈列品。当时最有名的陈列品是植物部门的玻璃花(glass flowers)。若就科学的价值说,差不多每一层的陈列都有它的特别价值。这座大楼的大门在牛津街,紧靠大门的房间为植物、动物与矿物几门的陈列处所;关于人类学部门的所在地点,却由另外一条街出入,即与牛津街平行,博物馆后门所在的神道街(Divinity Avenue)。因为这条街上有神学院的建筑,所以叫做神道街。在剑桥的第一年,我就住在牛津街,与我的一位老同学张欣海先生合租了一间房子。他与我同时到美国,本来想学医,后来转学了英国文学。他上课的地方在校总区,我上课的地方在神道街,离住处只有一街之隔,所以感觉得很方便。

当我到人类学系注册的时候,我发现了我不但是研究所里唯一的外国学生,而且是唯一的研究生。我所接触的所有老师,以及职员们对我都很和善,并且愿意帮我的忙。他们告诉我,不久以后还有一个外国学生要从印度来,另有一个要从南非洲来,我是最早到的了,此外,我又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先前没有学过人类学的我,竟可以进了人类学研究所。老师们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已经有了一般的预备,你所学的心理学,与社会学都和人类学有关。"但是在我个人看来,无论如何我只是一个初入门的学生。所以我还是随班听讲好些可以免的一、二、三年级大学生所学的课。有几门专为高班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开的课,听讲的学生很少。记得有一班讲"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的半年课,只有我一个人注册听讲;教这门课的老师狄克生(Dixon)先生,始终按时上班下班,每课五十分钟,从头到尾好像是讲给一百个或一百五十个学生听一样。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令我肃然起敬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老师能比得上他这种不苟且的严肃态度。那时候最年轻的老师,就是后来享盛名的虎藤(Hooton)教授。他原是学古文字学的,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兴趣转变到人类学方面,并且做了若干考古的工作。当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做讲师;他所授的课最重要的一门为"体质人类学",这是有名的一种铁门槛;上课的学生必须要做若干实验工作;学生不但要学会认识人的骨骼,无论它破碎到什么程度;考试的时候,他往往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就给满分,认错了就给零分。他的功课虽严,但他的年纪轻,所以跟学生很合得来。他常常请学生到家里去喝茶吃饭。有一年暑假,他问我是不是有

计划到别处去,我说:“不打算到别处去,我想留在剑桥多读点书。”他问我是否想赚些外快,我说:“花时间不多的话,我愿意试试看。”他说:“这里有五百个埃及人头骨,还没有打开箱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天下午到这儿来,帮我把箱子打开,把骨头洗净。我按钟点给你钱;另外还有一个人同你一起做,你别害怕。”如此我消磨了大半个暑假。不过在处理这套人头骨的工作经验中,我也学到了不少方法。

那时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少,正式教课的老师也只有三位,此外有好些做田野工作的老师,有时也回来教书,我们也可以听讲。神学院有位埃及学的权威瑞斯纳(Reisner)教授,开了一门课,讲“埃及考古”,但是这位先生却有点儿江湖,在课堂上他的政治兴趣非常浓厚,常讲到政治问题,很少讲考古上的问题;所以听了几次,我就不再去了。我所选的课,在本系上课的不过半数,此外都是些自由选择的课。我那啃青草的习惯,并不因为到哈佛来而有所改变,所以在选课的时候,也还带点这种意味,除了与人类学有关的课,如希腊考古学、埃及学等课程外,我还选过几门哲学的课,也学过梵文,并且我仍不能忘情于我的心理学。

我对于心理学的兴趣,因为英国的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先生到了哈佛,而又重新鼓舞了起来。我听过他的讲习班,并且跟他作过一年的实验。麦独孤先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有一次,他劝我在他手下作博士论文。那时我已在哈佛大学过完了第二年,我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很多,不想回到心理学,因为我的时间不够用了,不过当时我跟他进行的心理学实验,却鼓起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实验方法是我创造的。题目是“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去”?方法是:在一个镔铁作成的长方形池子里,建造一个迷室,迷室里面放水,两端各设一跳板;用白老鼠作实验的动物,把它从迷室的一端放进水去。这老鼠必需要学会游水,也要学会认识迷室。这学习的过程:如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要记录下来。差不多大部分的白老鼠都学得会,如果有学不会的老鼠,就要把它拿出来,不让它学。白老鼠每三个月就可成熟,交配而产生另一代。当时的计划,是把这同样的实验施于每一代的新老鼠,看看上代的学习,与下代的学习是否有些关系。这个实验进行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把全部记录交给麦独孤先生;以后我没再问起这件事情。隔了很多年以后,有个学心理学的朋友向我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麦独孤先生曾经根据这批材料,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自己后来并没在哈佛待下去,他接受了另外一所新成立大学的聘请,到那里终老了。我对于心理学的兴趣,可以说由此也告了一个段落。

我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是由研究院的教务长柴士(Chase)先生所鼓起的。那时彼包得博物馆也教了不少考古学的课程;欧洲的考古部分,是虎藤先生开的课,所讲的大部分是史前考古学,讲到希腊、罗马的时候就短短地结束了。柴士教务长的希腊考古学是一个半年的课程,对我确有很多启发作用;不过这一点,在当时我并没感觉到。

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Fogg Musoum),专门陈列历史期间的艺术品。然而关于希腊、罗马部分的收集品并不多。要看这两类的实物就要到波士顿市立博物馆去。柴士先生的教法以看图片为主,哈佛大学收集的,有关于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相与图画,数量相当可观。我对于古希腊建筑与雕刻的历史得了一点清楚的认识,完全是因为上了这门课的关系。对于伊琴海文化的宝藏,如果没有这课,可以说连点入门的知识都没有。

不过真正说起来,我在哈佛大学住了三年,最珍贵的收获,并不完全在于这些零碎的知识上。这些知识固然不是年年都可以听到的,却是得到以后,并不是每一件都能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找到适当的安排;也许有一大部分可以在别的机会里很容易也就找到了！我个人最感珍贵,而且值得回忆的,是那做学问的境界;我在哈佛大学第一次领略到这一境界的有好几点:第一,我切实地感觉学问内容本身所谈的,并不是离日常生活很远的事件:凡是我们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它是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是没有先天的分别。第二,我所感觉到的,是做学术工作中,所谓方法论者,诚然是很要紧的项目,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一种常识的推广,绝不是与我们常识相矛盾的。它在各种学术上并无基本的差异,只有运用的不同。但我所最感深切及有兴味的一点是: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有意义的结果。

我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以后的经验,比在克拉克那两年的感觉稍为不同一点;在克拉克两年,每学年的年终,都像玩蛇的叫化子把蛇丢掉了一样,不知怎么办才好？哈佛大学的一年,使我了解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形,同时也发现了我要作的论文题目。我的兴趣渐渐有了一点寄托。那年暑假,我的同学张欣海先生离开了剑桥,我必须另外找房子,并且找伴;碰巧又有位老同学,学物理的叶企孙先生愿意跟我同住。因此我就搬了家,住在神学院一位老教授太太家里的三层楼上。这儿离校总区较远,我们必须坐电车来往,不过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一到学校就是一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去。房东教授太太寡居,因为她到过中国,所以愿意帮助中国学生,把她的楼上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住。她的生活是很优裕的,有一辆汽车,两个佣人。我在这个房子里一直住了两年,到回国时才离开。但是叶先生只住了一年;第二年跟我同住的是李熙谋先生。这两年大都分的时间,我都把它花在收集论文材料与写论文上面。这篇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印刷所印成书,叫《中国民族之形成》。但是当我写它的时候,这个书名字却没在我心中出现过,因为我写这论文的过程,实在是具有一些实验性质,我想利用我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测量在剑桥与波士顿一带的中国同学,以及中国华侨们;可能的话,也收集点别处的资料。在当时这种与中国部分有关的人体测量材料,是很少见的。彼包得博物馆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馆中有一种分类卡片,把散见于科学杂志,

与人类学有关的材料,都分类登记了出来;所以在找参考资料的时候,我只花了很短的时间,便把到那时候为止,所有世界上发表的测量中国人体质的材料都查了出来。根据这批资料,再加上我自己测量所得的材料,我就写成了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在那时候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创作,不过现在衡量起来,也不值得一提了。因为当时我一共也不过量了一百一十一个人;用那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作了。但是当我写完了这一章论文以后,我的指导老师,以及虎藤先生都很夸奖我,说:“你作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在他们说来,这是极诚意的;因为这批材料是新的;同时他们也有点想鼓励一个中国人去作这类事的意思。不过我的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呀!以后我怎么办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也想不出很好的主意来。当时在我心里却有一个想头,然而因为我有点儿胆怯,我怕他们笑话我,所以我不敢明说。我想的是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传统上所谓的中国与夷狄的分别,可以说完全是以文化为标准的;按着中国旧话说:够到某一种文化水准;即学到中国“礼义”的人,就是中国人;要是一个中国人放弃了“礼义”,他也就是夷狄了!在我那时所读过的民族学文献中,如萨莫纳(Sumner)一派,也认为有类似的意识存在别的民族中,萨莫纳叫这种意识作“我们这一群 We-gvoup 与你们那一群 You-group”的意识。如何用这个观念分析中国的历史材料?这是我最初向自己问的问题。那时候的哈佛大学,对中国的学问是没有地方问津的,不但没有哈佛燕京社远东系,连其他各系如政治、哲学系也很少讲到中国或远东的。但是在威顿纳图书馆的地窖子里,却藏着一批中国书。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大图书馆内大概有中国各省的地方志书;而每一部志书都有关于城墙建筑的记录。我心中一动,我想“城墙”算不算有礼义的中国文化的表现呢?这自然是有现代人类学眼光的人问的问题。我向自己问了好些遍,觉得颇有道理。于是我就去查,看那儿究竟有多少志书可用?结果我失败了,因为哈佛大学所藏的这些志书极不完备。但不久我却发现了一部外交部印的《图书集成》,这部中国百科全书有一段转载了全国各地的城墙(包括废弃的在内)建筑的记录。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似的!我感到我有题目可作了。于是我费了两个月以上的功夫,逐条查去,把各省、各县及各乡的城墙的时代都查了出来。查完了这批资料以后,问题跟着来了。我如何把这批材料处理得使人懂得我的意思?第一,我要说明在中国境内建筑的城墙,是代表“我们”中国这一群,即英文 we-group 的城墙;第二,这些城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代表这个文化的发展。经过相当时间地考虑,我把城墙的建筑时代分成若干期,再注明每一期在某一区域内,有多少新建的城,有多少废弃的城。这里面包括好些细工作;如分区的界限、地理名词的演变、所在地的确定、地方志书的错误,以及时代的考订等,都可以分条作许多小文章。但是我的目的是在于说明一个总的趋势,所以解决

的方法也只有从大处着想了。这批材料就构成了我论文的第二章,英文名字叫“*Evolution of the We-Group*”(《我群的演变》)。

当我写完第二章,送给狄克生教授看了以后,他很加赞誉。他认为我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他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我的说法。但是我的这篇论文还是不能交卷啊！这自然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把“我群”说了,对于“你群”怎样交待呢？中国书籍里所见的材料虽多,可是大半都不能用,因为这些材料所用的名词向来就不统一;同时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出现的时代大多数也都有问题。所以我想了很久,只得先从几部传教士的著录入手,因为至少他们在这几方面都要清楚些。从现在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分布,向过去推寻他们的沿革,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好些历史上的问题,是可以用现代的社会问题去互相印证。不过在我的论文里边,我只在讨论“你群”时用了这个方法;实际的目的仍只在于设法把你群的演变,与我群的演变连贯起来。在这全部论文完成以前,我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我想继续作下去。我的这个兴趣,当然是由作这篇论文而开始的。小时候我熟读过江统的《徙戎论》,但是只把它当作一篇古文读了过去;没想到在哈佛大学作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徙戎论》却供给了我若干有关中国民族移动的重要资料。由于城墙建筑及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所得到的几点结论,最扼要的推论为:汉族在历史时代两次南迁,构成了中国汉以后的民族与文化演变两件最可注意的事实:第一次是永嘉时代的大移动,第二次是靖康时代的大移动。由此我想到中国民族之形成及移动,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表现中的事实。我的论文虽说是终究结束了,但是我从此得了一种比较持久的研究兴趣。这兴趣的养成,除了从作论文的经验中,得到的若干丰富的光与热以外;大半还是靠着在哈佛大学三年,与人及环境的接触,无形中的若干启发而培养出来的。说到这里,我应该把我的生活方面稍为描写一下,作为这个说法的基础。

我在哈佛大学三年,身体的健康可以说有一个完整的记录。照大学的规定,每个学生每年要向学校缴五块钱的医药费,假如有任何病痛或必须住院疗治的严重疾病,都可以到学校的医院免费治疗,并可住院两个礼拜,连膳费都不要。我跟别的学生一样,每年照章缴费五元。但是住了三年却一次也没到过医院,我那位最要好的印度同学差不多每年都要在医院里至少住上两个礼拜;所以我常同他说笑话,说:“我每年得替你出医药费。”现在回想起来,在剑桥三年,跟我同时的朋友,差不多人人都生过病,我却没生过一次病;我觉得很奇怪,也许是当时的生活比较简单而有规律的缘故吧！每天除了正常三餐外,我是不吃零食的。不过我的抽烟习惯却是在那时开始。这件事说起来,也是值得作一个广告心理学的记录。民国七年,我们这群学生从中国坐船到美国,抵达旧金山的那一天,我看到一幅很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一巨幅和蔼可亲的白

胡老头儿像,满脸为雪茄烟的烟雾笼罩着;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大雪茄烟,旁边有一个字“Blakestone?”字后有一个问号。Blakestone 就是这烟的商标;旁边另有一个字“Sure!”是这老头儿嘴里吐出来的字。这幅广告图案一直印在我心中好些年,到了在美国第四年的时候发生了作用。1922 年的夏天,我在写论文;每天晚上我都要到饭馆里吃一顿;出来付账的地方,账桌上总放有出售的香烟和雪茄。其中有一盒烟的商标正是“Blakestone!”有一天我注意了它,心中动了一下,就跟那幅存在我心中的画像接了线;我何妨试试这雪茄烟呢? 于是我花了一毛钱卖了一支,最初一支烟我抽了三天,以后渐渐习惯了,每天可以抽上一支,而且很快就学会了抽烟斗。在当时大学生抽烟斗是很时髦的事,好像抽起烟来,我做大学生的资格就格外地充实了。思想似乎比以前来得快些,写文章也更来得起劲些。我写那部论文,开始的时候还不会抽烟,但是我却在很会抽烟斗的大学生派头下完成了它。

我对运动,虽然没有什么特长,不过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天天有不少的时候走路。我觉得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了。1922 年的暑假,学校里的中国同学,及我熟识的外国朋友,差不多都离开了剑桥,我一个人留在那儿写论文。每天下午我总要到附近的查尔斯河上,划一个钟头的船。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船,而是一种特别为比赛用、制造的又窄又长的船,需要相当的技术才能操纵它;不过划会了,便可在短时间内很轻快地划得很远。当时划船的人很多,有一次竟出一件事:我正向回划,在拐弯的地方,一个新来的学生不知道规矩,划错了路,跟我的船相撞,结果把他的船触破了一块。我们两个,一同回到船坞,向管船人报告出事的经过。船主听了,就指着那个新来的学生,并向我说:“错误在他,但是他刚来,不知道规矩,你们两个各负责赔偿一半好了。”我没有错,却要我赔,心中自然感到不高兴,于是就跟他吵:“既然我没有错,为何要我也赔偿一半?”船主还是帮那个新来学生的忙,总说:“他是个新来的么!”这场官司一直打到学校当局,我觉得他们不该欺侮一个外国学生。结果,这场官司终究让我打赢了。但是自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划船了。由于这件事的发生,我不免有所感触。在剑桥一带及哈佛大学里,表面上他们始终保有最高学府的尊严,并维护着法律与法理。但是在执行一些小事情的时候,仍旧带有一些歧视外国人的偏见,不过被歧视的人如能据理申辩,他们还是尊重法律的。我很注意这类小事情,所以我觉得跟美国人打交道,只要我的理由站得住,我必会直接跟他们争辩到底;假如我的理由不充分,顶好就接受法律的裁判。

到美国来的外国人及美国人自己,一向都认为剑桥这个地方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就是现在这地方的人们自己也还有这个感觉,总以为除了学术以外,在宗教、政治与道义上,他们也是全国的领袖。美国独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说法,哈佛大学的确是产生这些领袖的最高学府。所以除了他们的学术标准,远在其他大学水准线上以外,

就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观念方面,他们也是自命不凡的。然而他们的宗教与道德标准,说来说去还是不能超过英国带来的那一套传统,也许还挟带一点儿大陆的气息;只是这大陆的气息并不浓厚。美国东北几州统名为新英格兰。当时我还不曾到过英国,所以无法把新英格兰与旧英国作任何比较。在哈佛大学里所传播的宗教、文学、艺术及科学,很显然地都受了英国传统的影响,这传统里的精华也因为移植到美国来而更发展。不过总说起来,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哈佛大学里的英国传统已经改变了许多,所教的课程也随潮流变更了许多。譬如拉丁文已不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必修的课程,神学也渐渐衰微,这都是很显然的事实。在自由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上也发生好多挫折,这个挫折可以说都是由种族问题所带来的。在哈佛大学当一个外国学生,固然很少直接接触到这些大问题,而且种族问题在表面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实际问题发生;不过在学校里,偶尔也发生若干令人关怀的事件。例如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宿舍里,黑人是不是可以住进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中国学生在大学里所受的待遇,要看各个人自己的行为而有差别,因为每个人的行动,往往因志趣不同而有别;每个人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活动所接触的方面又各不相同。中国人以及许多东方人,在美国做学生,或者长期的居住,若是与美国人接触的话,是很快地就可以发现他们不能超越一种范围。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在戏院里和一般娱乐场中看出来;若是到美国南部去旅行,这种范围则更为清楚。这类事情是每一个亚洲来的外国学生都会感觉到的,不过各人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感觉很快很尖锐很深,有的人是可以马马虎虎过去的。感觉深的人,这类事情便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观,马马虎虎的人则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过日子。学人类学的人对种族问题是有一个比较多一点及深一点的了解,并且所了解的方面不限于现实的一方面,又要涉及很远的过去及未来。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的问题所持的见解是这样的。从现实的一面说,世界上都承认中国这一现象,她的将来是好?是坏?人人都关心;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关心得更亲切一点儿,因为我们要想知道她的将来命运,于是就设法从了解她的过去入手,所以这一点也是使我决心从事这一研究的理由。

我与外国同学的接触,除了切磋功课的朋友外,完全在社交上得到的朋友是不多的。有几次一些犹太学生想跟我谈谈,结果我们也很谈得来,犹太学生的聪明是有名的,他们学语言、音乐,以至于人类学,比别的美国学生都来得快些。当时出名的美国学者很多是犹太人。一般人对犹太人的印象,都认为他们喜欢占别人的小便宜;但是我的经验并不完全证实这一点,无论是在我学生时代接触的犹太同学,或者是后来认识的犹太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这类的习惯,大概这一类的事情,也总是物以类聚吧!我在哈佛大学的中国朋友中,确包括不少当代名人,但始终没离开学术岗位的却也没有多少。最使我怀念不忘的,是去世最早的一位姓杨的朋友。他是湖南人,他在

哈佛读了十年,回国后在长沙服务;因为带着病,在圣诞节的时候,帮助为别人服务,自己却丧了生。他是一位对现代医学最有研究兴趣的人。此外比我辈分高的人当然很多,这些不必由我在这儿开单子了。

我所接触的美国教授,除了本系的几位老师,及心理学系的麦独孤教授以外,有一位教法国文学的白璧德(Babbitt)教授,在我心中留下了若干不可忘的印象。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曾在社交场中和他接触过;只是因为中国同学的介绍,在图书馆跟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尤其是"卢梭学说"出名的;当时几位学文学的中国学生,如梅光迪、张欣海、楼光来,以及吴宓诸位先生,都在他的门下。他跟别的教授一样,每天总背着一绿绒书包的书,从家里到图书馆,由图书馆上课堂。他很注意孔子的学说,尤其是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为仁"这段话。他研究卢梭学说很彻底,所以也反对卢梭学说最厉害。他反对浪漫主义,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为害人群的一种运动,这自然是为当时的艺术家及好些文学家所不喜欢的。有一次我在威顿纳图书馆楼梯上碰见了他,那时他已认识我,并且听说我在学人类学,他很是奇怪,他向我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这类东西?"当时我不大了解他的问题意义,没直接答复他,只扯到别的事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他。以后我从别的同学口中,听到他认为人类学这门学问也是浪漫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不赞成。不过我抱歉,我始终没能跟他畅谈过一次。他虽反对卢梭学说,他所教的几位中国学生,也都很知道他的态度;不过事实的发展,据我所知道的,一个最佩服他的中国学生,后来的生活却是很浪漫的。但是白璧德教授,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深切的痕迹。

我的记忆中的梅月涵先生*

我最早认识梅先生，还是在清华学堂做学生的时候。我是他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

1918年，我到美国；所去的第一个学校，是在美国东部麻州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那时我选攻的是心理学。在同一城中有一个工业学校，也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有人告诉我，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这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

1923年，我回国服务的第一个机关，是在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也就是首创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而梅月涵先生是南开中学最早的一个学生。这也是我在当时很注意的一件事。此后我常有机会在社交上碰见梅先生；见面多了，渐渐把那最初所树的学生与先生间的一层间隔，化除了若干。我开始以一个年轻人对中年人的态度，观察梅先生的言谈举止。

梅先生说他原籍是南方，却寄居在北方有好几代了。我没有考证过这件事情，但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扬子江流域出生，而寄居在北方很久的人，所以生活习惯比较接近于北方人；因此我的下意识中总感觉着，梅先生是一个北方人。我也因为这个缘故，对于梅先生无形之中就感觉得比较亲切。

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的沉默寡言的习惯；这并不是说他不会说话，或者不能说话。他做校长的时候，凡是报告一件事，或是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的时候，他常能一言解纷。

我实际跟梅先生共事，是在最后，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时候；

---

* 本文原载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第2期(1962年)。

这件事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了不少的困难。如今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的共同领导,并且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是两样的,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个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

第一,他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对于钱财尤其是丝毫不苟。

第二,他是个有很高理想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不轻易唱高调,但是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

第三,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第四,他是一个负责任到底的人;他对于清华的事,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关怀。

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所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于这位早期的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

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

现在教育界与学术界共同提倡、奖励的文化事业，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但是就纯学术的观点说，绝大部分完全是输入品，在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出深厚的根基。唯有近代考古学可以说是少数的例外，融合了中西两个传统的科学事业。这也许就是近代考古学的业绩之所以为一般学术界欣赏的原因吧！讲到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在是近代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佳话。我所指的是：在民国初年，北平学术界与国际学人合作，发现并完成北京人发掘的一段故事。这件事跟我这篇文章所要谈的似乎不相干；但是就治学的风气说，它确实地说明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那一段的一种景象；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新文化运动已由提倡阶段进入了发扬阶段；近代考古学也在此时被列入了政府所提倡的研究工作之一部门。

但这只是表面的历史；更要紧的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界精神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情形，可以藉两个大家所尊敬的学者的治学方法与人生观做例证来说明。

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海宁王国维先生(号静安，学术界尊称为观堂先生)在北平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当时的全国学术界为之震动。义宁陈寅恪先生作王观堂先生挽词，词前有序，序中有下列的几句话：

>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我引寅恪先生的这一段话，目的是要说明两点：(1) 观堂先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民国初年的一位权威学者，对于经学、史学都有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将自北宋以来所提

---

* 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感旧录》。

倡的考古学推进了一大步。不过,他对近代考古学虽能了解它的重要,却感觉得与他自己研究的范围仍有些距离;所以他虽以利用新材料而对古文字学有若干极新颖的见解,对于古器物的处理,他以为这一类的著录仍应该奉《博古图》及《考古图》为准则。观堂先生最后在清华研究院授课的时候,我也在那儿当讲师。我记得很清楚,当我把西阴村发掘所得的陶片与石器等,在清华做一次公开展览讲演时,观堂先生也曾到场参观。他对西阴村出土的一块带流的残陶片感到甚大的兴趣,摩挲抚弄,详细地揣测并讨论它的可能用途,更与形式类似的铜器比较。他这一热烈的兴趣留在我心中的印象甚深。但是他所表现的,很不幸地就停止在这一阶段上。不久,他就投湖自尽了。这一点接触,使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在纯中国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头等学人,与近代科学研究的思想并没有精神上的隔离。不过观堂先生的内心里,似乎总感觉得碰到了一个不解的结;他虽能了解近代科学的思想,但似乎仍认为有一点不可越的距离。这感觉就是上段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文化所化"及"文化精神所凝聚"的境界,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人生观"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观堂先生在学术上的成绩,一直到现在仍为一般学术界所尊敬与珍惜的。这也说明了海宁王国维先生传授的中国传统中固有学术的一脉,确具有它自身的客观价值,近代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有若干重要成就,一大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有王先生传下来的这个固有凭藉。

(2) 由此我要讨论到第二点,就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与中国固有的人生观,并不是不能与现代科学思想融合的体系。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初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治学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是承袭并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那时的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常跟我说到,王国维先生死得太可惜了,国民政府所提倡的学术虽以自然科学为重心,但是科学并没有中西的分别,王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合乎近代科学的。他若不死,中央研究院一定聘请他做史语所的专任研究员(那时的专任研究员甚少,在研究员职位中占最高的地位。当时董作宾先生的名义只是一个编辑员)。这一意见也是创办史语所的傅孟真先生完全同意的。最能了解王国维先生治学方法的陈寅恪先生就是史语所所聘请的第一位研究历史的专任研究员。我们应该知道陈寅恪、杨杏佛及傅孟真三位先生的人生观各不相同,与王国维先生的更不一样,但是他们对治学的方法却有共同的认识。

现在我们可以举第二个例子,谈谈最近去世的南阳董作宾先生(字彦堂)。董先生在近代学术上的贡献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在古文字学方面。他晚年致力于年历学,也有不少的人知道他这一方面的成绩。这些我都不打算详谈。我想说的是他对于学术的看法,以及他的治学方法。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以说明中国之传统及人生观与现代学术的思想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关系。最近杨家骆先生把董作宾先生自订的年谱在《学粹杂志》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出来。从这个年谱里,我们可以看出董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前,三十四年间的生活经验。他时

而经商,时而教书,时而办报,时而求学,可以说完全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他这一时期的学术成绩一部分靠他的机会,大部分靠他的天才。

我第一次认识董先生,是在民国十七年的冬天,地点是在河南开封。这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傅孟真先生安排的。那时他正在写他的第一次试掘小屯的报告,并手抄《新获卜辞写本》。从那一年起,直到1963年的冬天,董先生在台北去世的时候,前后共三十五年,我们俩一直同在一个机关服务,始终没有分开过。所以我对他的治学方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的才华并不十分显露在他的外表,这也许与他早期的遭遇有关系。我最早对他的印象是,他接受近代学术观点的敏捷,他提出的学术问题所具的条件完全符合近代学术的要求。譬如他所完成的第一次试掘殷墟的报告和所附录的新获卜辞写本及后记,不但报告的体裁极为扼要(全文中可以说没有一句废话),最后所提出的问题:

> 今所见之甲骨文字,是否仅为武乙至帝乙时代之卜辞,而无商代上世之遗物?如其无之,则殷墟以外,其他圮于河患而迁徙之都邑,是否可有同样卜辞之存在?

为我们在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三十五年来,我看过不少的科学报告,但是能够像董先生这样寻问题寻得紧,抓题目抓得扼要,并想方法解决他所抓的问题的人并不多见。所以他不但是能找问题的人,他也是能想出种种聪明的方法以解决问题的人。现在我想举几件我所知道的事,说明他早期研究甲骨文的方法。因为要追溯龟卜和骨卜的历史及实际状况,他在北海静心斋的时候,常在药材铺收买龟版,试验钻灼的过程。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到了静心斋,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卜卦的'卜'的声音是怎么来的吗?"我说:"这是你的问题呀!你该告诉我。"他说:"我晓得的。"说着他就拿了一块已经钻凿好了的龟版,在钻痕的旁边点了一根香燋灼起来,渐渐地龟版就被烤热了,灼烧了,再过几分钟,旁观的我忽听得pa的一声爆炸,声音就像"卜"。他兴奋地问:"你听到这声音吗?"我说:"听到了。"再看龟版的背面,已出现了"卜"形的裂痕。他更进一步的,仔细地解释道:"至于'卜'字的原始字形,当然完全是摹写钻灼的兆象;早期的'卜'字,中间总是一直,但是向旁的一点可以在左,也可以在右,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完全视燋灼的部位不同而异。中间的一竖所以固定不变,乃是因为钻时中间的直槽刻得最深的缘故,被火一灼最薄的部分便最先破裂了。这个方法只有在商朝的卜骨才如此标准化。后来在比殷商时代早若干世纪的黑陶遗址中发现的卜骨,就没有这么整齐化的裂痕了!"

在这一时期,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实验工作。他把可以用放大镜看得清楚的刻辞之交叉地方,都用放大照相出来,检查那刻划的先后;由这一类的检查,他发现了每一刻辞笔划的前后次序,随着一种固定的习惯,也随着时代而有不同;有的先刻

直划,再刻横划;也有的先刻横划,再刻直划。这些习惯的转变,大可以帮助我们订定刻辞的时代,他更因为市面上仿造的甲骨文很多,就下了很大的功夫,耐性地和安阳的一位刻假甲骨文为业的艺术家交朋友,这个经验给他不少对伪甲骨文的认识。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不过是董先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表现的几个小的方面;这些小的方面都可以证明他选择问题的精审,解决方法设计的灵巧,以及推论的正确。但是最令他的朋友们钦佩的,是他对于基本问题的把握。他开始研究甲骨文,就抓住了断代的问题;民国二十年,他开始做甲骨文的断代研究,直到三十四年《殷历谱》出版,这一连串的贡献都是他能把握住考古学的基本观念——标订时代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也就因为他有这一基本观念,所以他对考古学的贡献能够如此地辉煌。

就我个人来说,我们最感到融洽的为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立场上。董先生、梁思永先生和我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法。我们三个人以及其他一块儿从事田野工作的同仁都认为近代考古学虽然应该接受不少的、过去的固有传统,但有一点我们是应该革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我们共同的认识是: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它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私人可以负荷保管它们的责任,所以一切都应该归公家保管。当我最初把这个意思告诉董先生,也就是我第一次与董先生见面商量时,我就得到他无条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与其他考古组工作同仁都极热烈支持这一立场。直到现在为止,除了离开史语所的极少数的一两个人外,凡是参加这一工作的同仁,可以说没有自己收藏过古物,这一立场与我们所从事的实际田野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最初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到田野开始发掘时,地方人士不但怀疑,并且反对;他们以为这群人都是盗卖古董的。因此工作的进行不免常遭阻碍。就是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考古工作队,在创始的一个阶段也得不到地方人士的支持,因为他们仍旧不相信这一工作与古董商人的盗卖古董有甚么分别。直到中央政府为此事特别颁布布告,而从事工作的人又确实没有自己私藏及买卖古物的行为,田野的发掘才能顺利地进行了若干季节。彦堂先生在这方面所表现的勇气,可以说是能使我们安阳考古工作维持一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我特别提出董先生支持这一立场的重要,第一,因为他是最早到安阳的;第二,因为他是一位河南学者;他的意见对河南省会的教育界及乡镇的人士们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及其他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是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所以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立场,作明确的具体的表示。为了实行这个表示,我们不但促成了古物保管法的颁布与

实施;在实行上,我们这些从事田野考古的人,藉安阳发掘这一工作,对于古物的所有权,即“国有”的观念,做了一次充分而强力的发挥。中央研究院对于这件事情的领导,及尊重这条法律的精神,可以说为这门新学术奠定了第一方基石。这当然不是一件短期就能收效的工作;一切有关的问题,均需要细心的研究及周详的办法方能解决。尤其是一般人的信心,必须个人的及团体的实际行为累积到相当程度,方能培植起来的。董作宾先生就是参加这一建设工作最重要的一员。

假如中日战争没有发生,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方面;战争爆发了,局势也改变了;但是那在抗战前所建立的近代考古学基础却已稳定了。

在这个大变局中,年纪轻的考古工作人员大半改了职业,流亡到内地去的只有一个少数。创办中央研究院的蔡孑民院长常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勉励研究院同仁。流亡到后方的学人都深深感觉到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专门学人如能固守他的岗位,继续他的专业,也就是他对国家的贡献。但是真正名副其实,发挥这一精神的后方工作者,董作宾先生要算是最有成绩的一位了。

民国三十四年,亦即抗战就将结束的一年,他亲手抄写在李庄石印的《殷历谱》出版了。傅孟真先生为之序;序的第一段是这么说的:

> 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手写太半,征序于余。余于古历法与夫甲骨文字皆未有入门之功,何敢置辞?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则当此名山之业,杀青可写,敢不献其赘辞,以志欣悦欤

(见董作宾著:《殷历谱》卷十四、《傅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孟真先生所说的“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史语所考古组同仁的一般意见。关于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已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不少讨论,我不打算在此引证。不过,有一件事实是确定的,即无论批评这本书的人是同意作者的见解,或反对他的见解,但都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至少他把问题提出来了,他也说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把他所提议的方法实行了。至于实行到了什么程度?这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一大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学术界的一般责任。彦堂先生运用他的智慧,把他所见到的材料都陆陆续续的写了出来,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这真是学术界的一件伟大的创举。

尤其可记录的一件事,为彦堂先生的学问并没有停止在这一阶段。十年后,他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一百次座谈会上讲演,题目为“殷历谱的自我检讨”。他承认他自

己有好些错误及遗漏的部门，并指明他所要改正与增补的地方。这个讲演很清楚地证明了他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是开明的，并且是进步的。在这同一检讨的会谈中，他提起了另外一件有关的事，反映出全中国学术界另外的一面。让我把原文抄录于下：

……最近看见澳国一位汉学家拜纳氏所携来的《奴隶制时代》，载有郭沫若在1950年所写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中间骂到我的《殷历谱》，说："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指殷代杀人殉葬而言)，或者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当然是指本人)，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他不懂我的《殷历谱》，这是当然的。记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给他一部《殷历谱》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惜尚未能过细拜读"，我想他不但那时没过细看，直到现在也不会看过，就是看了，也不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他只接受了"断代研究法"，只走过第一步。抗战期间，他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到此时我才明白：陈梦家为什么在四十年写《甲骨断代学》的时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谈历法。这样也好，算是给他一个藏拙的机会。(见《大陆杂志》第九卷第四期，页30，1954年8月31日)

现在离彦堂先生公开地自我检讨他的《殷历谱》又将近十年了，距郭沫若氏写那篇《蜥蜴的残梦》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虽说十四年的光阴转瞬间就消失了，人们的见解却也增加了不少。

董彦堂为读郭沫若的批评而大发肝火，实具有一套很复杂的理由和复杂的背景。在第三次安阳发掘的时候，史语所挖出来的大龟四版，是出土最早的、带有甚多文字的原始资料；它们都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又附有精确的出土记录；于是发现的新闻很快地就轰动了中日学术界。那时候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编他的《卜辞通纂》；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史语所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要求先看大龟四版的拓片，并希望史语所能将这拓片赠送他一全份。因为我是这大龟四版的发现人及田野工作的记录者，我们的所长傅孟真先生就问我的意见；当然更重要地他先已征求了董彦堂先生的意见。那时大家都同情这个流落在海外的穷书生，很快地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把这尚没有发表过的拓片检出一全份送给他作研究资料。实际上傅孟真的决定和我的赞助也是根据彦堂先生的态度而定的。假如他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示，大概这四张拓片是不会送给郭氏的。但是彦堂很慷慨，没有任何不愿意的表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意料之外。聪明的郭沫若得到了这四张拓片，就把它们作了断然的处理，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切都安排好，并且付印了，才写信告诉史语所他的这一计划。这件事弄得大家——尤其是傅孟真——感到甚为尴尬；不过最后我们认为学术是公共的事业，凡是能够利用

这项资料的人,我们就应该尽力协助他,我们不能根据纯法理的观点处理;所以也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抗战时期的董彦堂除了努力他的研究外,并有余力用来推广甲骨学的兴趣于那时后方的知识界,因此他常与郭沫若有所商讨。他们两个人在那一时代也可以算得上是有交情的朋友了;他们经常有交换著作的事。于是,在一种具有启发性灵感的心情中,这位因利用过“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所搞到的原始资料,而被列入甲骨学专家的郭沫若“大师”,觉得上帝已经交付了他一使命,要他告诉供给他研究甲骨文资料的这群“落伍的”蠢汉,说他们不过是一种没长骨头的小爬虫,根本就没有资格研究他们自己搞出来的材料。

董彦堂为此事大发肝火,说来也只是人情之常。董彦堂同意把大龟四版的拓片无条件地送给郭沫若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善意的,以纯学术的观点出发的一种理智的举动。郭沫若乃写《蜥蜴的残梦》报答他,是什么动机咧?此处姑且撇开善恶的观念不谈。他的学术立场——无论是什么假定下成立的——是否站得住脚呢?

大部分看见过这篇文章的人们,都以为这是篇纯政治性的文章,不包含任何学术的意味。所以在自由的学术空气中评论此事,颇有人觉得彦堂先生在联合国同志会所发的牢骚,实在没有必要,他有些把《蜥蜴的残梦》所说的若干话过分地当学术批评看待了。

完全就学术的观点,平心地讨论郭文中提出的论点,若说《殷历谱》的研究为“根据后来的历法推断”因而不能算研究,这与现代人,尤其是左倾的学人,根据“社会发展史”的现代知识推断“殷代为奴隶社会”有什么分别呢?在方法和见解上,也许研究《殷历谱》的态度还有些更近于学术性吧!不少的自命为前进的学者,对于考古资料的解释,所表现的卤莽、灭裂、粗浅与自欺的程度,简直是《笑林广记》的笑料。

由此我们再谈一谈彦堂学术思想的主流。抗战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推进历法的研究与《中国年历总谱》的编制。他这个中心兴趣的发展,实在是开始于大龟四版的考释。作大龟四版的考释时,他从第一等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对于时代考证的兴趣,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这研究中,他发现了“贞人”的存在。从此他凭藉了田野工作所供给的不断的新发现,扩大了他的研究范围。在这时期,他那“日日新”的做学问的勇气,固然发自他充沛的精力与天才;但是他所接触的环境也帮了他很大的忙;譬如:在资料收集方面,他参加的田野工作虽不是经常的,但是田野工作收获得来的甲骨材料,都由他做初步的整理。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多抬杠的朋友,即傅孟真先生在他的《殷历谱·序》中所说的若干“常无义而强与之辨,以破寂焉”的朋友,“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的朋友,以及“强作解人”的朋友。这些非职业性的自由的辩论对纯学术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得到所谓“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境界。我记得很清楚,他研究历法的基本观念,即"点、线、段"三原则,就是在这种抬杠式的自由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而贡献这基本观念的人却不止我一个。这一类的讨论,尤其是在田野工作进行的时候发展得最热闹;这些杠头话大部分都没有记录,如云烟过眼,说完就忘。不过也有不少的部分表现在实际工作所发表的报告上;彦老的"点、线、段"观念的形成就是一例。

这一情形很具体地证明了一件事,即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的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董彦堂先生对现代考古学不但做了若干领导工作,同时对于这基础的建设,所贡献的部分也是很大的。今年(编按:1964年)第二十六届东方学会在印度举行的时候,在日本学者榎一雄教授做主席的一次集会,到会的学人包括若干共产党的代表——经德国汉学家傅吾康(Franke)提议,对董先生的逝世静默一分钟,全场无异议的通过;这是国际学术界对他表示的一种最后的敬意。这件事与郭沫若漫骂的文章,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但是,抗战以后的董先生对学术的贡献,照他抗战前及抗战时期的标准说,实在可以更加大若干倍。然而他的工作环境改变了,这个环境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两方面。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有了对家庭及社会的必然责任感,他不能完全关在象牙之塔以内了;何况这个象牙之塔也是假的。他对社会上的一切变迁更是特别地敏感,因此也就影响了他的纯学术的研究工作。到了台湾以后,教育界与学术界全都属于逃难的阶级,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中央研究院"来台的若干人士,大部分被收容在台湾大学以内,台湾大学是一个教学机关,若要领一份薪水,就要教若干功课,自然研究的时间就要减少到了最少的程度。这时代的董先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以及应聘香港大学,以及在台湾大学教书,都不是他衷心想做的工作。但是他不能不如此做,所以这时期的研究都是忙中偷闲做的,决不是全力作的。这显示了一种应加解决的问题:即一个社会要培植出来像董彦堂先生这样的学者,固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让他充分地发展他的潜力,更需要适当的环境。当董先生正在成熟而能做最大贡献的时候,却遭受了挫折,环境的一切使他不能完成他所想作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最惋惜的一件事!董作宾先生不能集中他的全力做研究,与以往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显然是不同的两件事,但是从学术的意义说却颇有些类似。王静安自杀的一年刚过五十岁;董彦堂先生到台湾那一年为五十五岁,他到台湾以后,虽说是也作了若干通俗文字,宣传他过去的学术成就,并且在香港大学完成了他的《中国年历总谱》;但是严格说来都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最好的工作。就他的学力及天分说,他实在可以把中国的古文字学建置在一个更坚固的基础上。他实具有这个志愿,不过环境逼迫他不能实现这一志愿,却把他的精力浪费在很多不相干的地方。这是他的损

失，他的朋友的损失，中国的损失，更是全世界学术界的损失。想到这一点，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李济口述　吕承瑞笔记

1964年2月18日　台北

大龟四版的故事*

这是一段复兴中国学术很要紧的故事,值得现在一提。大龟四版的发现,在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出土的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地,殷墟遗址的中心所在:发掘人称为大连坑南段的长方坑。这个坑的东西长有3公尺,南北宽1.8公尺,是个很整齐的长方形地下坑。在这个坑中所发掘到的堆积,都是殷商时代的遗物。我们发掘到离地面5.6公尺的地方,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龟壳,四块很大的但并不完整的龟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从这一层再向下挖,还发现了很多其他殷商时代的遗物。

这四块带文字的龟版,就是现在学术界所知道的大龟四版。大龟四版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这是第一次殷墟大块甲骨文字,在地下埋藏的情形,得到一个清楚的记录。第二,这份资料在出土后,得到一种甚完善的处理,最彻底的研究,以及及时的公布。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不止于此。它为现在的中国考古学建置了一块很稳定的基石;它作育了一位中国近代最特出的古文字学家;他打倒了中国学术界的若干地方偏见。让我把这三方面的意义,作一点历史性的注解,作为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

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季,当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第三次的发掘刚开始的时候,田野工作人员忽然得到河南省政府的通知,令该团停止工作。原因是河南省政府的教育界,认为安阳地下所藏的古董,为河南省的财产。他们对于这一工作的学术意义,似乎没有任何了解,总以为中央研究院所派的人与一般的古董贩子一样,只是发掘“宝贝”而已;所以殷墟发掘团在这一季的工作,开始了两个礼拜就停止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感到此事的严重,一方面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转陈国民政府,说明了考古发掘的学术意义;又亲自到开封与河南的教育界领导阶层交换意见,并将考古学与研究古史之重要关系加以详细的说明。得到他们的谅解后,殷墟发掘团乃于当年十

---

* 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感旧录》。

一月十五日，重赴安阳复工，作了四周，到十二月十二日停工。大龟四版是停工的那一天出现的。

我现在要从一个发现大龟四版的当事人，说一说我们那时候田野工作人的心情。在开工时所受的地方政府的干涉，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团体，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并不因此灰心；因为我们的立场是纯学术性的，可以公开的，并且已经得到那时所有教育界的先进——包括很多河南的朋友——他们的支持。被迫停工后，我们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得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原因当然是很多；但最要紧的一种，我们认为是那时所流行的一种对于古物不正确的观念在作祟。这一观念就是士大夫阶级对于地下的古物，当作古董看待的习惯。因为它们是古董，它们的商业价值就高于学术价值。所以玩古董的人们只是要把它们的流通当做一票高尚的买卖；它们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因此，一般的人们都把地下的古物，当作“宝贝”看待。这一看法也是在一般知识阶级中最盛行的。现代考古学的出发点却完全是一种学术观点。一个考古学家对于一件地下器物的价值之衡量根据，是百分之百的学术性的。所以一块破骨头或者一片破陶器的发现，往往比一件完整的铜器更重要；一切要看这些器物对于学术的研究，是否可以增加些新的认识。

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团，在安阳考古的出发点，完全是学术性的。使我们最感到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立场经过傅所长在开封亲自解说后，就渐渐地得到河南省教育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所以我们的发掘工作在短期内也就恢复了。但是，这却加重了我们田野工作人精神上的负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田野工作中，于最短时间内证明并且发扬它的学术价值，方能对那时的教育界有一交待。所以那一季快到收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紧张；我们在那天寒地冻的时候，仍能振起精神做这一件事，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朋友及支持我们的全国教育界确实地信服：我们这一工作，是真地在发挥我们所持的学术立场。大龟四版在这个时候出现，加以董作宾先生的考释，可以说是完成了一种历史性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学术性的发掘，所得的宝贵知识，是有实证的，最准确的知识；不是一般古董商所能想像到的。

有了这一次发现，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就一步一步的从此建筑起来。在这一建筑工程中，董作宾先生所担任的部分，不但是紧要的，而且是繁重的；他由大龟四版的考释，发展了研究中国古代历法的兴趣。所以在纪念中央研究院创办人蔡孑民先生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撰述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篇论文，把甲骨文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再进一步，他在抗战期中，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殷历谱》。这一线的发展，照董先生自己的检讨，完全开始于民国十八年史语所在安阳发掘的四块龟版。这真正是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一种头等天分、头等方法与头等材料的结合。在这儿，我并不是要说《殷历谱》已经是十全十美的了；董作宾先生自己也不如此说！但是他所根

据的材料,是最可靠的;他所用的方法,是最合乎一般逻辑的。他的材料自然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是先天的缺陷,将来可以补足;他的方法也有不周到的地方,这是可以公开的讨论的。这些现象都是发展中的学术,自然的表现,正合乎现在科学工作发展的情形。后来的人,可以根据他已经做过的工作,更进一步的向前做去;一切科学建筑程序都有同样的经过。但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一类的科学工作,因为仍在开始的阶段,显然尚未得到它应得的估价。

当大龟四版发现时,郭沫若正流落在日本写他的《卜辞通纂考释》;在他的这本书的序中,他恭维董作宾先生如下:“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虚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怀疑甲骨者之口已被间执;即骨董刘、罗时代,亦早见超越矣。”

郭氏读了董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以后,又在他的《卜辞通纂考释》后记里写到:(二月八日夜补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即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

但到了 1950 年,郭沫若登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宝座,他就写了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文中批评《殷历谱》的话是这样的:“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董先生看了郭沫若的这段文章后说:“……抗战时期,他(指郭沫若)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董先生这句话是很公平的。

最近《“中央”日报》转载路透社北平电说:“……七十五岁的郭沫若四月十四日在‘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上演说时曾说:‘我想我已经写了几百万字,但是如果根据今天的标准予以评价时,我写的这些东西都应该烧掉’……”。

与郭沫若这一坦白成一个对照的,是董作宾先生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一百次座谈会自我检讨《殷历谱》的结语,他说:“……我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要我讲这个题目的好意,我可以趁此机会把旧稿子再整理一遍。这虽然在我看来不过是甲骨文研究法的一个小小尝试,所用材料,在全部甲骨学中占着很小的部分,但是在今天建设性的中国古史研究上,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现在董先生逝世已经三年了,若是我们把他对于学术的贡献,作一个总估计,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董先生处理新材料的方法。他不但能认识每一件材料的真实科学价值,同时,更要紧地,他也认识每一件材料可用的范围。他能作最大胆的假设;但他很少让他的丰富的想像力把他领入歧途——作那些超乎这些材料性质以外的推论。第一种能力也是郭沫若所有的;但是董先生的第二种本领——这实在是学术界的一种自约精神——却是郭沫若氏没学到的一种科学训练。所以董先生在他的晚年自

我检讨的时候,可以信得过他的殷历研究,是一种建设性的中国古史研究。郭沫若咧?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却要把他所有的著作烧掉!他没有这种自信,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董先生的那种自律的修养!

1966年11月24日

融会中西学术的大师

——李济博士谈蔡元培的学术贡献*

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使人不朽，假如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蔡元培先生，他的确是一名不朽的人物！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博士，昨天满怀感伤的心情，谈着这位首任院长的为学与做人。他说，元培先生是我们读书人的最好模范！

李济说：元培先生是一个力行三民主义道道地地主持教育大计的读书人，但他的爱国心非常强烈，所以他看到了当时清政府腐败的政治，内心非常愤慨，在光绪二十八年时候，就筹组中国教育会为秘密革命团体，稍后并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校，培养革命武力，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更加入光复会与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冒险从事革命工作。

革命成功后，元培先生担任过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民国十六七年担任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现在“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就是在他手里打下的基础。

李济说：元培先生是一个爱国者，所以他信仰三民主义，力行三民主义比谁都彻底，他先后担任了学术文化机关许多重要职务，在这些职务中，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以奉行国父的三民主义为依据的。元培先生非常推崇三民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具有中和性。所谓中和，也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的意思。三民主义不走任何一极端，而是选取了两端的好处，使互相调和。

李济说：元培先生眼光很远大，在民国初年他负责教育学术机关重任的时候，就一再强调文科和理科并重发展，以免发生失调和偏颇的弊病。尤其值得重视的，他极力提倡推广科学方法，将它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

元培先生说：“精神科学如心理、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盖科学方

---

* 本文原载台北《中华日报》(1967年1月11日)。

法非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李济说：元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重视推广科学方法的人，历史证明，他的眼光是非常正确的。

元培先生的学问之好，是没有人不表佩服的。李济说：在我们国家里，精研国学的人很多，精通西洋科学的人也同样的不少，但要承东西道统，集中外精华，把中西学术融会于一心的，这种人可就不那样容易找了。而元培先生正是融会中西学术于一心的文化大师。

李济说：元培先生在清朝时做到翰林的官，国学根基之好，自然不必提了。而且又到欧洲德、法等国留学，对于西方的科学和学术大势，了如指掌，中西学术的造诣，使他的学问既博大、又精深。对于致力文化复兴运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元培先生是极力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人，所以他对于复兴中国文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这个信心和希望一直到他去世时为止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但是他提倡文艺复兴，并不是复古，更不是排外。他是主张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将外国文化——曾经一度被喻为“洪水”——这些支流，也汇入我国的主流中，使我国这条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流，更有活力，以县延无穷的生命！

李济说：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他担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这些表现之外，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逝去为止，他从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

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

在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

李济说：元培先生平常很少说话，显得有点沉默，但就在沉默之中，好像散发着一种坚毅，沉雄的神色，使人敬而生畏。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每句话都包含了无穷的道理在里头！元培先生说过的话中，给人印象最深，感动最大的就是他常常拿来勉励人的二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要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要秉持我们的一贯人格，固守岗位，贯彻始终，绝不可以见异思迁或随波逐流，他要人做一个独立特行，有操守、有志节的君子。

李济说：可贵的并不仅这句话，而是元培先生能够率先垂范，以身教代言教，在重重国难中，元培先生为国奔走，他的言行那样质朴、坚毅、沉雄，处处显露了兀傲的风骨，使后来者向往不已。

元培先生的清廉,是大家所共知的,他从不为一己打算,甚至于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他的学生们看了很不安心,所以就打算以祝寿为由,捐点礼金好为他买一幢房子,但这个好意一直为元培先生断然否决。

李济说: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应酬较繁,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元培先生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所以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二百元。元培先生领到薪水后一算,怎么多出二百多元来了?就问主管发薪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就当场把多的钱退回去,并告诉发薪的,一切要按规定办理,生活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元培先生不只以做到独善其身为已足,而且更要做到兼善天下的境界。所以他除了自立以外,还要立人。他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在国家需要他时,他从不放弃书生报国的责任。李济说:元培先生虽然学问那样渊博,在清朝时,官做到翰林那么大,可是当他认清时世,当他认清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工作是顺天应人,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时,他把翰林的官弃之如敝屣,而献身革命工作,重新做起,这种见义勇为的伟大精神。要不是具有真正的学养,是做不到的。元培先生常常勉励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句话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央研究院"同仁得受元培先生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在"国家"动荡的时候,都是追随"政府",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学术研究,为"国家"贡献一己所能尽的最大力量。

李济说:元培先生从民国二十九年离开人世后,匆匆二十几年已过去了。尽管他的形骸消灭,而他的精神却永远活着,典型永远在着。学术界人士每年都有举办讲演会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化导师的逝去,我们要发扬他的精神,这样才能日新其德,永垂不朽。

李济口述　陈德仁记

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

蒋廷黻先生在政治上的成绩，我没有资格估计；我与他的接触，实际上的时间，并不算长；而最长的一段，是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这两年，我们同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教书，住得很近，所以接触的机会甚多。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到三十岁，各人都在计划自己的前程；但因为同是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所以我们对学术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若干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想在大学教育上，做点儿有意义的工作；并认为，第一重要的是要把书教好。南开大学那时成立未久，富有朝气；校长张伯苓先生办事认真；因此，同事们相处得都很好。

民国十三年夏天，我们两人同时接到西北大学暑期讲习班的邀请，一起到西安西北大学去讲学。听讲的学生是陕西各县调来的中学教员和教育行政人员，讲书的人大半是由北平请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由天津选聘去的。这一次的同行无形中使我们感觉得更亲密了些。我们同登了西岳华山的西峰；爬山的成绩，超过了全队二十余人；这更使我们感到我们的体力相等，有点同感自豪。这次的旅行也在我们两人的心中，发生了若干其他更重要的影响。1924 年，西安的教育、文化与社会一般的情形，实在是使一个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人，不容易接受的。那时西北一带，吸鸦片烟的习惯极为普遍；拜会朋友，照例有鸦片烟招待。若客人拒绝吸烟，主人就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有一次我们两人在晚饭后出门散步，到了一处古庙；庙内有一座荒废的戏台；谁也没想到在戏台上所见的，是三对并躺在一块儿抽鸦片烟的叫花子！这一景象在我们心中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暑期学校完毕后，有位同往西安讲学，师大的历史学教授王桐龄老先生，在刘雪亚将军饯别宴上当面要求刘督军招待我们免费游历华山。这差事就由省政府交到华阴县政府；但实际上，县政府就硬派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跟着就是拉夫，强迫很多壮丁

---

* 本文原载《感旧集》1985 年台北第 2 版。

办这些差事。由此我们对于“实际的行政”都有些了解了。登华山虽然算得壮游;但受这种招待,实在令人感到一种永久的不安。在这些方面我们两人的反应,是完全一样的。

民国十四年,我有一个机会去做考古工作,就离开了南开,廷黻仍留在八里台执教。我的工作中心转在北平,所以我们两人相见的机会还是很多,因为天津到北平的交通很方便,两地方的学术界自民国初年起,早已打成一片;很多在北平做事的,把家留在天津。也有在天津教书的人,家住在北平。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做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这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北方学术界的一般状况。

等到北伐完成以后,学术界的气象更为之一新。廷黻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大部分的精力用在研究工作上,并有了令人注意的成绩了。他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以及近代史研究的计划和实际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时候所建立的基础。在这一时期,他由南开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去任教,得到了较多的机会与若干原始的外交资料接触。由于他朝夕不断的努力,所得的成果是极辉煌的,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譬如他说:甲午以前,中国的外交,尚有若干自主的成分;谈中国外交史以中国的记录为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是当然的,也没有什么问题的。甲午以后,我们的外交多不能自主,与人谈判,作最后决定的,往往是外国人;所以要追溯、研究这一期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兼顾到外国的资料。实际上说:凡是外交,至少都是双方的事;很多更是多方面的事。所以写一部外交史,不但要了解自己的国情;同等重要的,也要了解相与国的国情。中国近代的外交史,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部分;写中国近代史,不但需要看中国的档案,更要看所有外国的有关的资料。看外国档案,又不能以一国为限——如英国的《蓝皮书》——我们应该兼顾到所有有关国家的有关档案。他有了这个找原始资料的基本观念,所以训练学生时,也就特别注重这一点。他教他的学生去日本念日本史;去俄国念俄国史;和去其他各国念亚洲、中亚以及其他相与国家的历史。这些都是由上述的一个基本观念出发,而变成他所提倡的留学政策。

在他从政以后,他对文化教育特别关心,尤其是与现代化有关的文化教育事业。不过他做了驻苏联大使以后,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差不多就没有了。抗战期间,在重庆

偶尔见到他的时候，他似乎不像教书时代的昂扬了，不像从前那么喜欢聊天了！他已经收敛起来了！我不记得在这时期与他有任何长谈的经过……他回台北的时候，有时也抽空看看像我这类的老友。我到美国访问过几次，过纽约时，也去访他叙旧，但却没有办法恢复八里台时代畅谈的机会。到了今年春天，我才碰到一个机会又同他作了多次的谈话。这是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学术会议的时候。他听说我被派参加这一会议，就函约我在开会时期住双橡园内。我到了华京看见他后的第一个印象暗想：廷黻已经老了。在双橡园里，我们确实谈了不少的次数；大半是有关过去的或他的退休计划；也有些现实的问题。最使我感动的是：我到双橡园的第一天，他同我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就问我这句话说："济之，史语所有困难，你为什么不找我？"这一问，证明他关心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途是没有间断过的。为这件事，我们前后谈了三次；不过我们共同地也发现了，就是以他的地位，他所能帮助的，也是很有限度的。我们谈话的内容相当庞杂；很多牵涉到个人人生观的问题。有一次，我们两人并坐在一张大沙发椅上看电视：他突然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TF 所以能有现在的些许成就，完全是由于苦干得来的呀！"这句话说得声音很低，更是很突然；没有头，也没有尾。他说完后，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我在旁边看他的样子，显然是在默想若干过去的事；他似乎是在自白要说明他现在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的工作成绩挣来的。他虽说是和我坐在一起；但这句话，却不像是专门对我说的。这句话说完了，他沉默了很久，没有再说别的话。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也许可以推测出他那时的下意识的心理过程！我当时的反应，只觉得他所说的就是他的朋友所知道的事！但我没插口；他的沉默也导致了我的沉默。

有一次，我们闲谈到一般学术上的问题，我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复。他却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他这个反问，我觉得很聪明，因为"知道"和"不知道"是后来人的事，很显然的与司马迁或张骞本人并不相干。为了避免正面答复我的问题，他用了这聪明的方法，把问题轻易地带了过去，这也许是由他的外交经验得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以他那时的心情，他确实是对我的问题，难作一套正面的答复。

2 月 24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正式邀请参加第二次科学合作会议的代表到国际俱乐部晚餐……那天晚上的餐后讲词，廷黻所讲的，不但词令美妙动听，内容也是最扼要的，代表了他对现代学术一个总估计。他的大意是："现代学术的门类虽多，但实际上真正的知识是一致的：我们往往因为时代的需要，而着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对各门科学加以轩轾；这并不能证明某种科学比其他的科学更为重要。以现在说似乎是数理、工程科学最合时代需要，最时髦的了，但是，谁能保证过了二十年，或十年，或五年后，风气不转过来，而注重到人文社会科学和历史上去咧！就一个研究人类历史的人来说，

这些转变都不能改变学术的一致性的！这点，我相信国家科学院的先生们，和今天各位贵宾，都不会不同意吧！”这些庄重的意思，用极高雅幽默的词句和简明的词汇很流利地表达出来，实在代表一种炉火纯青的修养。餐后听此，感觉轻松愉快，更感觉其深刻难忘。赴会的中国客人不自觉地有点感觉骄傲！那一晚他所透露的光芒和智慧，也许是他在公共场合中最后的一次了。

有一次，我们谈到汉朝历史所载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他感慨地说欧洲人学中国历史总算是会学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近代有若干外交家，从中国历史的以夷制夷，学会了以华制华，而我们似乎还不十分清楚地知道呢！我说：并不是没有人知道吧！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华”的观念弄清楚罢了。他笑道：这应该是在学校讲中国史的诸位先生的责任了。他近几年热心提倡写中国通史，也许是基于这一个理由吧。

我于2月18日到华盛顿，3月1日离华京赴普林斯顿大学，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廷黻用他自己的车，把我一直送到普林斯顿大学……那时，我们两人都相信，不久就可以在台北见面。我对他最后的印象是，他的身体虽然有衰老的象征，但他自己丝毫没感觉到有什么严重的病。他曾对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预备在华盛顿再留一年。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充满了一种自信。他同胡适之先生一样，在这方面，都是自信甚深的。这可能就是他们两人在事业上所以有大成就的缘故罢！

1965年12月10日　台北寓中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

二十五年前，中央研究院同别的政府机关一样，都在抗战中过日子。中央研究院在抗战初期，就随着政府迁行；但因实际需要，各所所迁往的地方并不集中。有的迁往广西，有的迁往昆明，有的随政府迁往战时首都——重庆。布置这件事的负责人，为当时的总干事朱家骅先生。民国二十七年夏天，朱总干事辞了他的职务，蔡院长就聘了任鸿隽先生继任。任先生办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多年，常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对中央研究院的事务早已有所认识。他接任后，并兼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任内，最重要的两件事为：把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阳朔再迁到昆明（所长为陶孟和先生），把气象研究所从重庆迁到北碚（所长为竺可桢先生）。但他任职不到两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蔡孑民先生在香港去世了（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五日）。照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举规程，本院院长候补人之选举，由评议会推选之。所以蔡院长去世后，评议会就在重庆集会，选出朱家骅、翁文灏、胡适三人为院长候补人。九月十八日奉国府令，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

大家都记得二十九年前后，正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迁到后方的各所，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安定能继续工作的地址。所以在当时，迁徙的问题仍是继续不断地发生。朱代院长任职后不久，任鸿隽先生便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他就聘定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暂时兼任了这件烦难的工作。那时各研究所的重心集中于昆明。因为抗战的困难，各所的所长也有不少辞职的。任总干事辞了职，化学研究所所长也出了缺，由吴学周先生受聘继任。不久，天文研究所的所长余青松先生也辞了职，继任的为张钰哲先生。在这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都由昆明迁到四川叙府南溪的李庄，动植物研究所也由阳朔迁到北碚。三十年九月，傅斯年辞去总干事兼职，朱院长聘请西南联合大学的叶企孙教授继任。在叶先生做总干事的时代，各所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也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工作。不过叶先生在就职之初只

---

* 本文原载《星岛日报创刊二十五周年论文集》(1966年，香港)。

答应做两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教授,西南联大少不了他,所以在三十二年秋天,他就辞职了。朱代院长又聘请李书华先生继任。

李总干事任这个职务是在抗战的后半期,正是军事吃紧、军事第一的时候。但是研究院的业务却颇有发展,发展的方向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各所本身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是研究院全部的活动范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本院只有十个所;战事发生后,奔波流离,各所所遭遇的困难是很多的,不但业务上的发展有困难,维持原有的工作也常常成了问题;又因人事的变迁,若干有训练、有工作经验的人都辞去了职务。所以在抗战的第一个四年,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可以很确切地用“不安定”三个字来描写。但是在第二个四年,各所都已安定了,研究工作也有所发展。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时候,把抗战前收集的资料整理出了极有永恒价值的成绩;当时因为印刷的困难,这些完成的科学成绩甚难流传,多没有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不过,在战后,国际学术界也渐渐认识它们的重要,而给予甚高的评价,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与考古学报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各所如地质与气象研究所都在抗战期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不但如此,这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又增设了几个新的研究所,民国三十年设立数学研究所,聘请数学界的老前辈姜立夫先生为筹备主任;民国三十三年医学研究所成立,由驰名全国的林可胜先生担任筹备主任;同年,植物研究所也成立了,罗宗洛先生被聘为所长,这些都是抗战后期的几件具体成绩。

用历史的眼光评定此事,在这时期,中央研究院的业务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合理的发展,可以归由两个原因:一个为朱家骅院长对研究院事务的亲切认识和迫切的责任感,所以各所能在这个极艰巨的时代将工作展开。第二为政府对研究院工作的重视,所以能在国家与敌人作殊死战的时候,仍能合理地把这类事业予以奖励。因此,到了抗战末期,国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抱了很大的信心。

抗战胜利那一年(民国三十四年)劳苦功高的李书华先生因年岁已高,便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研究院就敦聘了有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先生继任。复员后,各所大部分都迁回南京及上海工作。上海的工作,以原来的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旧址为中心,并接收了敌伪时代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把理工实验馆改称杨铨纪念馆,把自然科学研究所命名为丁文江纪念馆,分别纪念这两位对研究院有功绩的总干事。那时,萨总干事计划建立一个数理化研究中心,遂在南京九华山山脚一带,购了一块土地,开始建筑数学、物理、化学三所所需用的房子。萨先生是一位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认识得很清楚,同时这一研究也与国防及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又有筹备近代物理学研究所之意。但是就当时的标准说,要单独设立一个近代物理学中心,所需经费也是很大的,虽然各单位曾给予不少的同情与合作,但是由于本院经

费所限,仍不能照萨先生的意思执行。同时原任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先生辞职,朱院长决定请萨总干事兼任,并请他负责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切筹备事宜。他打算把当时在国外研究颇有成就的吴大猷、钱三强及吴健雄三位物理学家聘请回国进行此事。这计划虽然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萨总干事的热诚与信心,确实感动了不少的科学家;所以在百般困难中,这件事仍然可以进行。不幸,萨先生因为体力衰弱,他虽想勉强地支持下去,但是他终于在此计划未完成前不得不入院治疗。

在萨总干事任内,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为院士制度的完成。远在抗战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对研究院基本任务的实施方法,已有所筹划。在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内,规定的任务有两项:(1)从事科学研究。(2)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第一项任务的实施,所属各所的研究工作可以代表。在科学研究事业的职务上说,中央研究院可以说已经有了具体的方针。但是第二项任务,即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若无一机构负责推进,就会变成空话,予公众一种坐谈而不实行的印象,对本院的院务说,也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评议会的委员关心此事的重要,在长期交换意见后,决定推行这个院士制度。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七条,在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中,通过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规程。

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七条,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之制定,在过去都有很长的酝酿时期,详细情形见于这一条的组织法的改变过程。现在公布的一条只代表一个观念的演变,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具体说法。兹将现在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七条抄录于下:

> 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选举,应先经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著有成绩之专门学会,研究机关,或院士,或评议员各五人以上之提名,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审定为候选人,并公告之。

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八、九、十,三条都是与院士有关的法则,最要紧的为规定院士职务的第九条,如下:

(1)选举院士及名誉院士。

(2)选举评议员。

(3)议定国家学术之方针。

(4)受政府之委托,办理学术设计、调查、审查,及研究事项。

以上第三条及第四条的职权,可以说是为执行中央研究院第二项任务而设计的。组织法的第八条,特别规定院士为终身名誉职。中央研究院院士历来的选举,均极受学术界的重视。直到现在,在中国学术界中,为最高的名誉。此事自萨总干事起,对于每一步骤的进行,均极端慎重。因此现在国内外的学人对这一荣誉尚能予以适当的估价。现代的青年学术界大部分都留在国外,说到国内的其他荣誉,他们似乎都漠不关

心,但是对于院士的选举,以及选举的成果,他们不但感觉到关心,并且有不少的人能予以很大的重视。这一点心理上的考验,应该是关心国家学术前途的人们,以及负责教育的人们应当尽力支持的。

萨总干事完成第一任院士选举后不久,也就因病请假赴美治疗。在这时,复员后元气尚未恢复的中央研究院,又遭遇到一次迁徙。这一次的迁徙却与抗战初期的迁徙性质大不相同。所幸院长朱家骅先生能以全力筹划此事,在困难百倍于抗战初期的情形下,仍能把一部分研究所迁到台湾。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至中绝。

在由大陆迁到台湾的这一时期,一切的变迁都是迅速而且剧烈的。劳苦功高,计划复兴中央研究院的萨总干事,也就在这个时候病逝于美国的医院。在这时期,实际负责任,尤其是应付迁徙大事的负责人,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先生。他不但是朱院长的老朋友,而且在中央研究院创办以来,他对全院的经营、贡献也最大。迁台之举,他也表示了最坚决的意见与主张,所以在抗战后的十几个研究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搬家到台湾搬得最彻底的。所有的图书、仪器、历年所收集的科学标本,以及大部分人员,都随他到了台湾。此外,搬来台湾的尚有数学研究所。其他各所多因实际的困难,或者人事的变动,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没有移动。在这一段时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问题,未能像早期对于这一重要职位的决定手续,即遵循各所所长的同意,然后选择;这一次的选择只能完全由院长裁定。朱院长最后的选择是曾在英国留学的数学家周鸿经先生。周总干事在研究院最危难的时候担任了这个职务,院务的进行仅以维持来台人员的生活为限。迁到台湾来的“中央研究院”人员虽然不多,但是要维持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在这时,“政府”确没有照顾研究院这类机关的力量;幸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应了“政府”的征调,担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务。那时的台湾大学,在日本教授撤退后,正缺乏教书的人员;因此傅校长就把所有来台的研究及教育界人员,延聘分任台大讲习课程的任务。这一安排可以说是起了很大的安定作用:一方面为没有教授的大学找着了一大批不但是能教书的,而且是有名的学者;另一方面也为这群学者找到了一个出路。“中央研究院”的这部分研究人员的生活问题,也在这个计划中解决了一大部分。至于研究工作,只有暂为搁置了。

若就各所的实际情况说,实在达到了危机万分的地步,上述的安排只是就个人生计的得以解决而说的。若是就研究院的职务说,自然只是一个苟安的办法。历史语言研究所带到台湾来的大批图书、仪器及古器物标本等,只能安置在一个铁路火车站的破旧库房里。看守这批宝贵图书与史料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与一般难民相比,实在相差不远。他们往往有四、五口眷属,但是只能困居在一间小屋子里过日子。有的找不到适当的房子,甚至在人家猪圈上头商量一席之地,作为安身之所。这些情形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央研究院”在当时所经历过的实际状况。朱院长对此事是很敏感的,但是

他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也只有劝说同仁们耐心等待，希望稍微安定时予同仁生活加以改善。很不幸地，他的最得力的助手，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在迁台后不久，因为用脑过度，突然逝世了。当时，朝野上下对傅先生的去世都感到了一种重大的损失，而"中央研究院"对于这一损失的感觉尤为深巨。

在傅先生逝世前些时候，伴史语所迁台的数学研究所所长姜立夫先生，因感于台湾研究工作的前途甚为渺茫，便离开台湾他去了。所以实际上一直留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所。数学研究所原来的同仁，除了姜所长离台外，其余的也陆续到美国讲学或深造去了。史语所同仁却苦守在杨梅，他们大部分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职务。傅先生去世后，朱院长选定了董作宾先生为史语所所长。一般来说，这时同仁们对于他们艰苦的生活却也习惯了。但工作的精神未免也被随遇而安的观念所融化，各人虽有了他的研究计划，但是因为收入甚少，开支不敷，不免要利用若干时间，做点应时的文章，以卖稿补足家用。至于在这方面耗费了多少时间，各人是不相等的。从全部的社会教育说，这一发展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这些专家为时势所迫，不能不把他们的知识用点通俗的文字表达，目的是赚点稿费，但却也把他们的专门知识通俗化了，无形中对于社会教育加了些推进的力量。应运而生的刊物，在台湾以《大陆杂志》为最成功，这一期刊所登载的文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短篇报道，十余年来，已有一千数百万字。文章的品质虽不大一致，但是就宣传近代科学知识说，它的效率是很大的。美国汉学家对此刊物甚为重视；他们认为在这里边，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若干趋势。不过这种意外的发展，以学院的标准衡量说，实在是功过不等的。因为这些写作把一些年富力强、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人的正常研究时间耽误了不少。有不少学者对这件事情甚为关心，胡适之先生就是关心此事最切的一个人。

董作宾先生继傅斯年先生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对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常想恢复一部分。那时研究院最需要的，自然是如何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把史语所收藏的标本、图书及仪器展出，供同仁们研究之用。对于找房子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中央研究院"租用台湾铁路局的仓库，每年所付的租金虽不算太大，但开支的数目已超过它的经济能力了。假如要筹备新的建筑，财源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作者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董先生来到我寓中，谈论此事，我就建议于他，写信到美国去，向胡适之先生求教。胡先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同时自研究院创办以来，对于院务，帮忙甚多。他对傅斯年先生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尤为关心。迁台时，他到过台湾，并到过杨梅。他非常清楚同仁们的一般生活情形。所以当他收到董先生的信后，就毅然地接受了代为设计的请求。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及洛氏基金会两面磋商，均得了部分的成功。同时，朱院长也感于研究院的需求，多方筹划，决定在南港购置地皮，建筑新址。在南港所建的第一幢房

子用款,除了政府的拨款外,就是胡适之先生所募到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洛氏基金共捐的一万五千块美金。当时我们设计这所房子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构想是除了必需的宿舍外,就在这一所房子内,把图书室、研究室与储藏室三种不同的功能合并在一起。这是南港建筑中最老的一栋,也许还是最坚固的一栋:就在这栋房子内,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带到台湾来的全部图书第一次全部开了箱。

有了这个开始,同时也因为政府迁台以后,经济上有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对研究院的工作也就拨支了若干必需的款项。这时"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史语所的工作陆续建了几栋新的房子,同时并计划筹备几个新的研究所,如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及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也得到了一栋独立的房子,作为他们工作的地方。这一发展为"中央研究院"迁台湾以后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但是,在这新的环境下,"中央研究院"对它的任务,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实施呢?显然这不是留在台湾的几个人所能单独决定的。所以朱院长就在1954年,召集在台湾的院士开了一次谈话会,并请胡适之先生于1955年,在美国约集留美的院士,也开了一次谈话会。经过两处院士的谈话后,方才决定了一个新的院士会议章程。这个章程中最重要的一点,为以在台湾报到的院士代表全体院士。这项新决议于1956年5月,经"国民政府"核准实行。同年7月,"中央研究院"就在台湾、香港登出公告,结果登记报到的院士共有十九人。根据这个人数,研究院于1957年4月,在台北召开了第二次院士会议,议决了新的院士选举法,并加强了评议会的组织。有了这些根据,"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及院士会,即可依法召集,进行他们的业务,而整个的院务也可以更合法地顺利进行了。

南港新址建筑后不久,一切的工作稍为上了轨道,朱代院长就辞去了职务。这时的总干事为杨树人先生。杨先生为继周鸿经先生的任,周先生于1960年10月赴美讲学,请杨先生代理,不幸在次年5月,周先生在美病故,杨先生就一直代理下来。朱院长辞职的时候,照"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总干事应召集评议会,选出三位候选人,呈请"总统"选派。杨树人先生很顺利地办了这件要事,结果"总统"选了胡适之先生继朱先生的职务。

胡先生于1958年4月8日回台,10日正式视事;在他做院长的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的工作,又渐渐恢复到创办时的活跃状态。

胡院长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前后不到四年,但是他的成就,在表面上已经是很可观的了。他在南港,为数理及生物科学建筑了两个中心。他举行了一次院士会议,他说服了"政府",创办了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的新组织。在他的任期内,有好多有经验的研究人员都回到院里来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在院的若干工作人员,也完成了不少的研究计划。在院士选举中,由于他的主持,完成了规模可观的新选举。他的这

些努力,促使了国际的注意,使一般的学术界开始认识了台湾的学术工作。在台湾学术界工作的人们,由于他的领导,大部分都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他死了以后,蒋梦麟先生说:“胡适之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听了这话的人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同时,蒋先生的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来说,也有点警惕的意思。因为“中央研究院”原是法定的“学术研究的最高机关”,它的法定地位,是不能再提高了。蒋先生所指的,大概是说,参加研究院工作的人们,不要在胡适之先生去世后,忘记了他们的地位吧!

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

（在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认识傅先生时傅先生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傅先生跟我同年，但是在学术上面，我认为他是我的前辈。他那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我刚从欧洲回来，路经香港，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哦！我真大吃一惊，因为我过去虽说很羡慕孟真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办《新潮》的成就，不过也仅是羡慕而已，因为那时我正在美国。不过我在美国碰见过罗家伦先生，他常常提到一些孟真先生的事情。我说：孟真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你到那儿去就知道了。于是庄泽宣先生就领我去见傅先生。他一见面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我在他那儿住。而我是乘坐 P&O 的船从印度加尔各答转过来的，船在香港只停泊三天。我说：不行啊，我不能在这里待这么久，我的船期后天就到了，今天就得走。他说：不行，你的船可以延期。他马上就陪我到香港去办交涉，延期一个礼拜。这次，他跟我谈的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究竟有多少事情可做呢？我知道当时从事考古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尝过那种味道，地方上的势力，古董商的势力，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势力，都不容易公开从事发掘，所谓掘人祖先灵墓的工作，这种事情并不简单。他说，他要从事新式的田野考古工作。这事当然经过许多商量，他告诉我，史语所将来怎么组织，在此以前，他在中山大学办了一个语言历

* 本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 28 卷第 1 期（1975 年 12 月）。

史研究所，现在他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这有他的道理。我对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仁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这是我结识傅先生的经过。他的计划是想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平，不过当时的局面不十分安定，国民革命军刚刚克复北平。

从此以后我一直在傅先生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1928—1975)，将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那里待下去，甚至在他去世之后，我继续了他的职务，所以对于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旨趣，我稍微有一点认识，不过对于傅先生的整个学术，我不敢说有全面的认识，因为傅先生是一个多方面的人。

* * *

诸位刚才讲他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和他在政治方面的一些事情，大家都认为是一些很了不得的见解与成就。我也有和诸位同样的感觉。孟真先生可说是一个知道国家需要的人，他是一个现实的人，是一个 political realist！他讲究的是现实的需要，他不醉心于某一种理想。他做学问是如此，他从事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当然，他在政治方面的见解，我并不懂多少，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抗战期间，他曾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也不说什么。他偶尔也谈过一些青年的教育问题，他也觉得这个问题严重，要我们提供意见，参考帮忙，此外他不跟我们谈实际的政治问题。

* * *

但是讲到办史语所的事情，我记得傅先生过世之后，我写过一篇《傅孟真先生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我在其中的几点意见都说得很清楚，在傅先生过世之后发表的纪念刊物上。我自己个人的印象，孟真先生做学问，我想他的背景，不但有很深厚的中国的学术基础，对西洋现代科学的知识也有很深切的了解，像他这么对现代科学有清楚认识的人，虽也不少，像毛子水先生和俞大维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认识。孟真先生觉得中国学术方面，毛病在什么地方，短处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而西洋方面我们必须要学的又在什么地方，这

些他都有很深切之了解。所以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够在很短期间集中人才，都能照他的方法，照他的理想和计划去做。这都是因为他有这一种令人佩服的见解。他对学术的见解，因他受过很多年的心理学的训练，他认为思与心，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要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再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例如他讲考古，他不做纸上的考古，而要做田野工作；他对于语言学，即元任先生和方桂先生领导下的语言学，他也是从调查方言、调查语音学着手。他尽管过去佩服过章太炎，但绝不从书本上去研究语言学，当然书本上材料他并不忽视，但必须要有新材料才能解释旧的书籍。后来他对民族学也相当的注意。就算历史的入手与方法吧，最初不止历史、语言、考古三组，最初包括所有的新的资料，像敦煌、内阁大库的档案，这些都是他一手创立的。雪屏先生刚才说他要材料，要东西的能力，那的的确确是行政上的一个天才。比方就我这考古方面来说，最初我们到安阳发掘之时，地方政府认为我们是挖河南的宝贝，中央把河南的宝贝给抢走了，河南省政府有一群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反对我们发掘，而自行组织一队也在安阳发掘，于是在安阳就有两队考古队伍，一是奉中央研究院之命，一是奉河南省政府之命，这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不能工作，停了工。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在安阳，先后九年，我们一共做了十五次田野考古工作。他很关心这件事，就因为他始终注意，我们考古组的同仁全体的努力，安阳的发掘找到了若干紧要的殷商的文化遗存，一直到现在，仍然为世界所重视，认为是国民政府最大的科学成绩。

我个人认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许就中断了,我所以终身安心从事考古的工作,的确是因为碰到了这位又是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司,这是我认为我最幸运的一件事。

* * *

至于他的学术见解,历史见解,当然我常常听到他的议论,我就有一印象,他对整个学术上的见解,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他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发现这真理的人,不管他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譬如他最佩服的人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他们虽然是西方人,他们所做的学问,我们当然应该一样的接受一样的去追求。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今天在座的像屈万里先生,都知道的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说。我个人这些年来病足,行动不便,特地跑出

来参加，我想我也算表示对傅先生的怀念。

（本文系李济之先生出席座谈会之谈话记录，未及送请其亲自过目，如有错漏当由编者负责。——《传记文学》编者注）

胡适先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与影响*

我对胡先生的认识比较晚，因为胡先生从美国学成回北大讲学之时，我正要出国，以后在美国一住若干年，所以初期我对胡先生只晓得他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没有其他的认识。回国后，在抗战以前，因为丁在君、傅孟真先生的介绍，我跟胡先生时常见面。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在野外工作，不常在北平，所以对他也没有进一步的交往。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逃难到台湾来，我才有机会对胡先生有一个比较亲切的认识。这时我仍在“中央研究院”服务。

“中央研究院”初来台湾的艰困情形

当“中央研究院”搬到台湾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半的研究所，那就是傅孟真先生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另半个所是数学研究所。主持数研所的姜立夫先生，曾来台湾，后来又因别事回大陆，一直没能再出来。初来台湾时，环境极为艰困，而傅孟真先生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也不能全力照顾“中央研究院”。一年半后，孟真先生又遽尔谢世，“中央研究院”就只剩下一个史语所了。

请胡先生帮忙才建造第一所房子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朱家骅（骝先）先生。当时最大的困难，第一是没有一个固定地方做工，第二是没有固定的经费。而在傅孟真先生去世之后，董作宾（彦堂）先生继任史语所所长，那时史语所仍在杨梅。董先生也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人，但那时实在是穷得没有办法，甚至有时连住房子、吃饭都成了问题，他自己一家人口比较多

* 本文系作者于1976年4月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座谈会上的专题发言，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自然更闹穷。他就常常跟我们这班老人商量救急的办法。所中同来的人有一部分在台大兼课,但大部分住在杨梅。我就对他说,这个时候能够帮忙的,恐怕只有去找美国的朋友了,而能够有热情帮助"中央研究院"的,大概只有胡适之先生了。胡先生那时已卸了驻美大使的职位,住在纽约。于是董先生就写信跟胡先生诉苦。胡先生很快的回了一封信,并且想法子找洛氏基金会的 Mr. Fahs 商量,至少请他帮忙弄点钱在台湾找一个地方起一座房子。以胡先生当时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也并不太容易。不过 Mr. Fahs 与胡先生因系素识,最后他终于帮忙从洛氏基金会捐了一笔钱,条件是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捐同样的数——这些都由胡先生办到了。后来"政府"因外国的财团既已捐款相助,也拨了一笔钱给"中央研究院",于是才开始破土建造现在南港的第一所房子。等这座房子落成之后,才把史语所存放在杨梅车站的仓库里的图书、仪器、标本,和出土的古物搬到南港的新房子来。史语所也就开始在南港工作。我记得南港这座第一所房子,在建造的时候,胡先生恰在台湾,我曾经陪他到工地去看过,那天还下着雨。这是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后,第一次实际的帮助这一最高学术机关。

胡先生有信来要回台定居

以后董作宾先生因为家庭生活问题转到香港大学教书去了。朱骝先先生要我负责史语所的工作,我没法子推卸,就勉强担负了这一责任。那时我正在主持台大文学院的考古人类学系的主任职务。有一天,我忽然收到胡先生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表示有意回台居住。信中说:他在纽约写作时,要查中文图书,必须到哥伦比亚等大学去找,或到处去借,地方又远,非常不方便。而且许多他想用的书,美国都没有。想来想去最适合他用的图书,是史语所的图书馆——这些书他以前在国内时,曾经常常地利用,现在他想回来完成几部著作,可就近利用史语所的藏书。他并且说,由他自己出钱,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块地,建筑一座自己住的小房子。将来过了若干年后,就把这座房子捐给"中央研究院"。在信中胡先生并指定我同朱先生、毛子水、钱思亮等诸位先生商量。

想住在乡下完成几部著作

胡先生在信中告诉我想回来台湾居住,这当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许多他的老朋

友听到了,都感到很兴奋。以后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房子也盖起来了。就是现在南港的胡适纪念馆。起初朱骝先先生知道胡先生要回来,感到很高兴,就想把建在小山上原定院长的住址给胡先生,后来听说胡先生有心脏病,住在山上不方便,还是找一块平地为宜,所以就盖了现在考古馆的邻近,即现在的这座胡适纪念馆。这是开始的一段。

胡先生在信中告知我要回来台北居住,并且不愿意住在城里而住在南港的乡下,最重要的原因,只是想过几年安静的生活,利用史语所的藏书来完成他的几本著作。不过他并没有告诉我是哪几本著作,《水经注》考证?中国思想史?或白话文学史?他在给我的信中没有提起。

对长期发展科学会的推动

至于胡先生回来以后的事情,刚才雪屏先生的报告很详细,在这里我不必多说,不过我想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关于长期发展科学会的事情。陈先生说,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计划,在胡先生回来以前就有了,我不知我是否听对了?据我的了解,这件事好像是在胡先生回来以后才有的。至于发展的原始,雪屏先生当然知道得比我详细。我只记得胡先生回来之后有一次出访,在纽约写信给我,说:听说有一个长期发展科学的计划,而他尤其欣赏"长期"两个字。则这件事好像不是胡先生的主意,而是出自"行政院"。究竟是陈辞修先生的意思还是蒋先生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在档案中还可以查得出来。据我的记忆——吴大猷先生写一篇发展科学的文章也是在胡先生回来以后的事。

主张分层负责重视选举新院士

胡先生回来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他原来是想回来安静的著书,因为他在纽约著述不方便。可是事情的发展,事与愿违,他想做的事不能做,而他不愿意做的事又推不掉,这些事情,不必多说;我只谈谈他在院长任内的几件事。

胡先生做"中研院"院长,他绝不管各所里面琐细的小事,他慎重的选择所长,各所里面的事务都由所长自行处理。他绝不加过问。而在他任内,也并没特别扩充研究院的范围。只增加一个植物研究所,找李先闻先生回院做所长。其余"中研院"的各所,都是前任所留下的规模。第二是关于院士的选举。胡先生对于选举新院士,非常慎

重,资格著作的审查很严。许多著名的数理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家的新院士,差不多都是在胡先生任内选出来的。

长科会成立后,胡先生并出任长科会的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梅贻琦(月涵)先生做副主任委员,他们两人合作得很好。胡先生也把他的大部分精神和时间用在这上面,并有杨树人先生帮他的忙,所以长科会初期甚具规模。

认为应该为孔子过寿

还有一件事可补充的,那就是胡先生对孔子的态度。我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有一年(民国三十七年)正好是孔子诞生 2500 周年,胡先生说,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这话胡先生只对少数的朋友说,当时恰好我也在座。以后到台湾,胡先生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我想胡先生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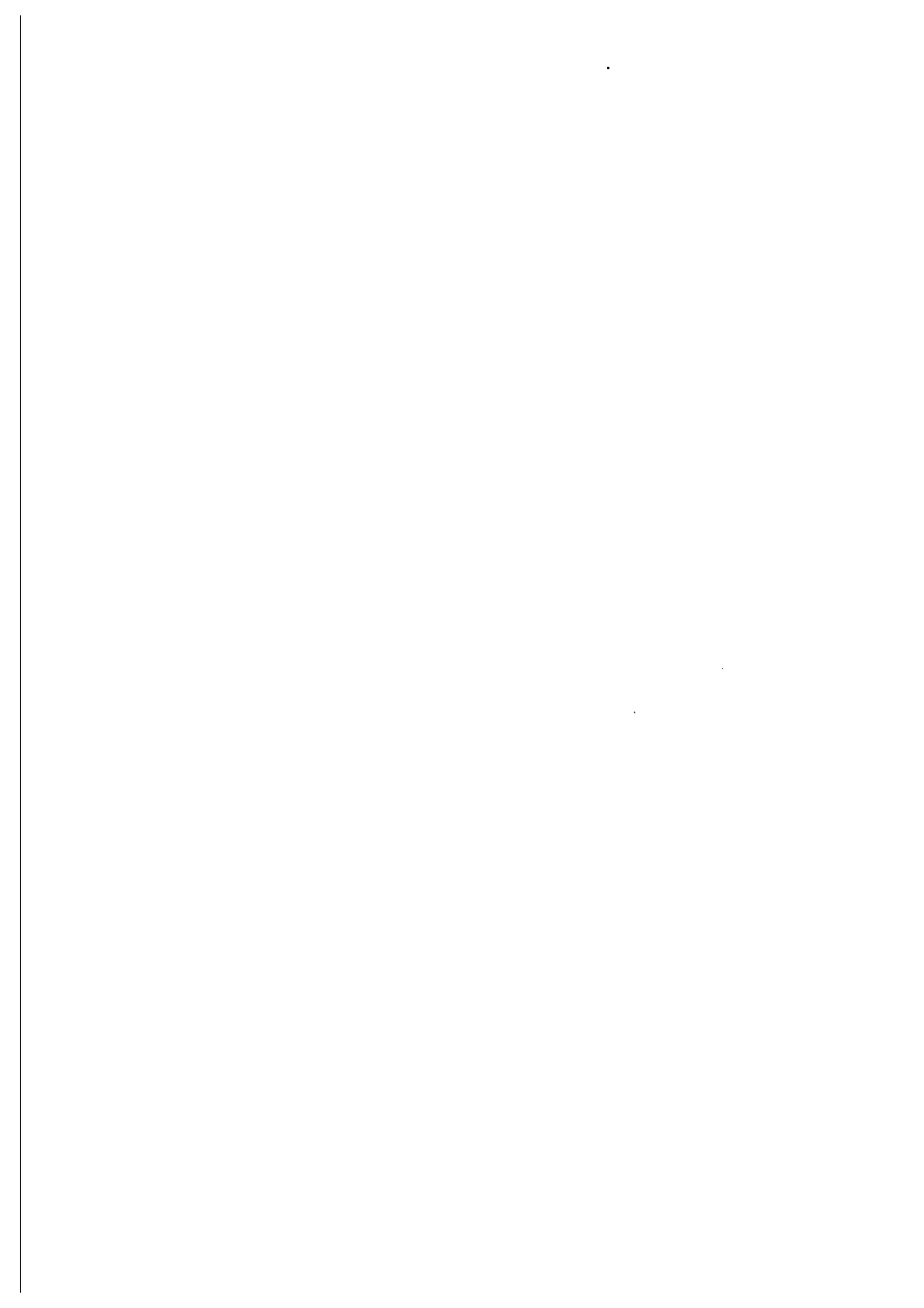
中国人跪坐的发现与考证

至于胡先生做学问的地方,就我个人的接触,我只举一个例子,足以见胡先生之渊博和亲切细心,真叫人五体投地的佩服。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 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跪坐蹲居与箕踞》,刊于 1953 年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讲跪坐的原始。我们中国的跪坐从商朝起,一直跪坐到汉朝的末年,以后才有椅子、凳子;后来传到朝鲜,又传到日本。我曾问过一位日本考古学的同事,他查清楚后告诉我,日本大概在十五六世纪才有跪坐。这真是礼失而求诸野了。至于商朝以前跪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则我就不知道了。我提这件事,可见胡先生读书做学问,真是了不起的认真,且记性惊人。普通读《朱文公集》的人很多,哪里能像胡先生记得这些事,这是胡先生的细心处。他这一方面不下于任何老辈的读书人。

胡先生做院长后,史语所的同人受他的指示教导很多,史语所的集刊和其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他许多指示和支持。我所知道的胡先生,是谈谈我亲耳听到的话亲眼见到的事;但是胡先生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不仅限于学术文化,其他方面就不必我来多说了。

书文评介





介绍《历史圈外》英译本——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假如我说,步日耶(Henri Breuil)教授在现代先史学的地位,有点像爱因斯坦教授在现代物理学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出来争辩吧!但是,爱因斯坦教授不能(也不会)写本书出来使小孩子们都欣赏得疯狂起来,步日耶教授却做得到。爱因斯坦领导的精神世界——如原子物理的研究——使一般的人们愈想愈悲观,步日耶的先史学却是另一个世界:看了这一个世界,可以把身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斯末资将军,从悲观的深渊内拯拔出来,变成一个乐观家。

说这是一本小人书,完全是根据作者的本意。在他的导言内,步日耶有一次说:"这本书,我贡献给小孩子们,以及将成年的青年们。"同时他也希望,大人们也可以在这本书内找些快乐。我相信,假如所说的大人们,没有把他们的赤子之心折磨尽,他们一定可以在这本书内,找出不少的快乐。

我个人发现这本书的经过是如此的:本年"双十节"前,住在杨梅的同仁,寄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新收到的外国书目录三纸,目录内列有步日耶教授的这本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书的内容何似,但深信,出于这位先生手笔的著作,绝对不会平凡;在台北此时能读到出版未及两年的专门著作,更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那时心中的喜悦,好像过八月节收到一大篓子苹果一样。过了几天,就自已跑到杨梅去借这一本书,但已经不在图书馆了!高晓梅先生正在看,跑来向我说:这是一本薄薄的不到一百页的通俗读本,以画为主的一本小书。猛然听到这话,确实使我有点失望,因为几天中所意想的,以为是一本有系统的先史学长编。但是这失望只是暂时的。让我先谈谈这本书写作的经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占了巴黎以后,步日耶教授没有像他的一部分朋友们似的,与敌人妥协。他决定离开法国,过流亡生活,最初逃往里斯本,随后就到了南非洲:两处他都得到热诚的招待。为酬答这些招待他的主人的厚谊,这个流亡的科学家,没有物质的谢礼,就从记忆中把他毕生致力研究的先史时代人类生活故事描绘出来,送

* 本文原载台北《大陆杂志》第1卷第8期(1950年)。

给这些朋友作纪念。最初只在酒后茶余,随兴所至,在菜单上、请客帖上,以及发纸上随便画;画出来的,都被人抢去;有时他自己也觉得画得不错。原来他有四十余年描绘史前壁画的经验,他常自己说,从化石人学会了一种本领:能就记忆中的印象,把要画的人形与动物形画得丝毫不爽,不需任何改正。这是他的真才实学,没有一点的夸张;凡是读过关于法国南部及西班牙一带洞穴艺术各种巨著的读者,都可以信得过:步日耶教授具有这种天才。

1944年的夏天,他仍在南非洲;因为早晚可以利用作画的时间较多,他的作品就增多了。有一张送给他的朋友邓特夫人的,描写一群受困的野牛死斗的图像,曾使两个小孩子爬到沙发椅上看之不休。“这是一个大画家画的!你说是不是?这野牛害怕极了;我能在它的眼中看出它的害怕来。”这两个没有偏见的孩子的赞扬,感动了这位先史学大师的内心。从此以后他就遵从他的朋友的劝告,预备些较好的、大张的纸,并计划了一下,把化石人类生活及他们的文化,一幕一幕地,按照一个秩序,画在预备好的纸上。

希特勒败亡后,巴黎又成为若干国际会议的中心;1946年,讨论对意大利和约的英国代表中,有斯末资将军;他是步日耶教授在南非逃亡时的居停。巴黎重会时,斯末资将军看到步日耶教授的南非画稿,就极力劝他付印;结果就是:《超过了历史的界线》这本书(本文又译为《历史圈外》)。书前有斯末资将军一序,及作者的导言二十一页;正文为三十一幅旧石器时代彩色图景及说明。图目如下:

第一景　北京人猎罢归来
第二景　西北欧旧石器时代打制燧石
第三景　法阿尔河畔(南非洲)的石器工业
第四景　牝熊洞中被攻
第五景　围猎野牛
第六景　猎扁角鹿
第七景　多尔当河流域旧石器时代追猎猛犸
第八景　狮子袭击野马
第九景　猛犸走访马格期石洞
第十景　旧石器时代上期打制燧石
第十一景　马格期的骨器作与角器作
第十二景　制皮
第十三景　马格时代的天然马戏
第十四景　鲑鱼竞游
第十五景　驯鹿的秋天行程
第十六景　猎大兽产生了大艺术

第十七景 驯鹿时代的登山游戏

第十八景 “白帽”山石洞内雕刻师工作

第十九景 马格期的送死典礼

第二十景 野牛涉广川

第二十一景 奥律期的模特儿为雕刻师作样

第二十二景 装饰贝壳的贸易

第二十三景 马格期人的伪装射猎及野外写生

第二十四景 磨制赭土及石壁写生

第二十五景 三兄弟堂圣殿中的神像与舞蹈

第二十六景 西班牙东部旧石器时代画石头的人

第二十七景 海滨吃介贝的人们

第二十八景 绘石子的阿齐人

第二十九景 中石器时代射猎红鹿

第三十景 中石器时代斯堪的那维亚南部射猎麋鹿

第三十一景 退如河口(葡萄牙)中石器时代的居留地

图景的资料皆是极翔实的科学事实,可以说没有一笔虚构;它们的排列及运用,自然都是出于作者的匠心。若干为想像力补充的部分,也是由纯粹的科学结论推纳出来的。譬如第一景中所绘北京人擦木取火的一段,显然是一推论;但是这一推论的根据都是最可靠的考古发掘的事实;推到的结论,若不是必然的,至少亦是可能的。这在所附的说明中均有详细的解释。

三十一幅图景实际所描写的只是一个故事:五十万年人类前进的历史。在这些图内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祖先如何与猛兽竞赛,争取生存;如何利用环境,制造工具;如何互助,改良生活方式;如何送死,发现自已的灵魂;如何追逐大的动物群,发展了艺术——这些用数十万字至数百万字说不清楚的事体,在三十一幅图像中却说得明明白白。这固然是由于制图技术的巧妙,但这却是偶尔的,好像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时的刀声似的。实际上这些图像所以动人的基本原因,还是由于作图人对于人类的前途,怀有一股热烈的信心所致。这信心又是由半世纪不断的科学考古工作培植出来的。

附译文 北京人猎罢归来图说明(文集编者注:台北《大陆杂志》卷1期8[1950年]刊登本篇书评时曾在封面附有一张此图的单色翻印件,并在文中附载此图说明的译文。杂志原件已缺佚多年,现仅将所附译文照原样刊出。)

周口店,在北京南约六十英里,位置于蒙古高原边缘的一个峡口上;从这峡口,有一道河,流向北京大平原。志留期作成的白垩山中,有一由来回逆斜石层构成的大石

穴;在这石穴内,与爪哇猿人最近似的一种人类,北京人,代代相承地住下去,住了若干万年。

图中描写的是北京人中一个家族;在石洞内,各个人均在忙他的工作。三个猎人猎罢回洞,一个肩荷一只鹿,另一个扛着大赤鹿的两条角;走在前面的是他们的头目,他只带着他的武器——一条木棍、一根瞪羚角、一把小牡鹿角作的短刀;他的两个伙伴,没有这种短刀。洞门口,猎人们遇见头目的太太携着小孩来迎接他们。

洞内靠右的一个妇人,右手高举,握一石硾,用"两极撞击法" 打裂一方石英石;石英石放在石砧上;石砧旁边堆有打裂的石片及中凹的石子,石子的中凹,都是撞击出来的。妇人的右边(就妇人说),一个男人正在修制石片,所用的一部分方法,也是"两极技术",预备把它们作成端刃刨器、尖器、小刀,或凿子等。在他的后边,略向左(就读者说,下同)另一北京人,正用一具锋利的石刀割裂鹿角。割碎的鹿角块,都有它们的用处:角尖可以作短刀,厚的部分可以作硾,或器柄。

图下最左方,有些自洞前河水上游检来的、储存了已久的鹅卵石,排成大小两圈;圈内有好些分裂过的骨块 (有些已用撞击法修制过),长骨的两端,有的已经削成尖器,或成凿形,此外还有鹿的角块制成的棒与短刀。圈内也有瞪羚角所作的匕首,野猪或鹿的下巴骨所作的各种用处不同的器具。由石圈向右放有没用过的较大的鹿角,及成堆的瞪羚角。再向右,有去了旁枝的鹿角幹及木杙;北京人的洞穴内,虽没有木质的遗存,但那时已有木料作的器物,是没有疑问的。

洞内这群人中最左的一对,正在生火。男的首先用磨擦法擦木起火花,妇人拿着一圈干草树叶引火,点燃后,就送到围在他们两人中间的石子圈内的木柴中:这个石子圈就是那时候的炉灶。在他们的后面,另有一火燃烧得正旺,烤着一条悬在三角架上的野猪腿;一个妇人在旁边加柴,她的伴侣及一个小孩,站在旁边取暖:靠近有一堆作柴火用的树枝。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大量的柴灰证明,没有疑问地,北京人已有控制火的能力,并曾积极地用火;但是我们尚不能说,他们是否已有随时生火的能力。

洞内的最深角落里,有三个北京人的头骨;围绕着这家传的遗骸,作供品用的,为各种不同的兽头及叉角:熊头、剑齿虎头、大的猛兽头、野猪头、鹿及扁角鹿的角。石洞外左角旁有几株紫荆属的朴树,周口店洞内,曾发现很多的朴树子。

离洞口不远,在能够窥伺这些穴居人的动静的距离以内,有些狼及鬣狗,正在等着拾他们吃剩下的残余。河对岸的草原上,有些瞪羚、羚羊,正在啃青:又有鸵鸟、鹿及扁角鹿、野驴、一头像猛犸的象、一头犀牛,在那里跑来跑去。一头猫属的动物正预备偷袭一只羊。在空中飞的与在水边栖息的有燕、一种鸦属的飞鸟、兀鹰、苍鹭及野鸭。

左边对面山坡树林内,远在草原的那边,有另外一家北京人的穴居,洞门口一行上升的直烟,可以很清楚地在远处辨别出来。

评介《亚洲与北美间的跨太平洋接触》
(*Asia & North America transpacific contacts*)*

这是1951年美国科学协进会在费城举行的年会,第八班(Section H)人类学组,于12月27至30日宣读的论文选辑。总题为《亚洲与北美间的跨太平洋接触》。所选的论文十四篇,分题如下:

(1) 亚洲考古学的几个问题:引言

(2) 近东区域内所见培植的小麦与大麦之考古学证据

(3) 日本史前文化大纲

(4) 关于划分亚洲文化区的问题

(5) 亚洲腹部的游牧及其文化区之臆测

(6) 阿留申考古学之现状

(7) 多尔赛文化区研究之最近发展

(8) 阿拉斯加顿拜角出土陶器之初步报告

(9) 阿拉斯加内地最近考古学发现之意义

(10) 内地克林几族

(11) 克林几考古学与克林几民族学之关系问题

(12) 北太平洋沿岸半族制的结构之发生关系的可能性

(13) 横渡太平洋之植物

(14) 中部美洲晚期的经典文化所受亚洲影响一个可能的集中点

十四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与资料差不多每篇都与远东考古学有密切的关系。第一篇引言,由哈佛大学的瓦德教授执笔;他所提出的亚洲考古学的问题共六组,为:(1)旧石器时代,亚洲西部的石斧及勒伐技术制就的石片,与亚洲东部所发现的砍器有一基本区别;这一区别是否仅为一制造技术的区别,或更代表人种的不同?(2)为什么在

---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期(1953年),转载自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版《历史圈外》。

旧石器时代晚期,奥律式以及里海式的石瓣文化,遍及非洲,欧洲,西亚,蒙古与西伯利亚,却没达到更东与更南的中国与印度?(3)先前设想的,在中洪积统时代,人口自南亚西走非洲,或自非洲东走马来及美拉尼西亚的流动,由最近在东南亚及南非所发现的早期石子文化,加了若干证实,提高了这一假设的重要性;这一问题需要若干专家的合作来解决。(4)新石器文化的各阶段,由西亚传到欧洲与非洲,已渐渐地清楚了;但是农业与畜牧,磨光的石器与陶业,是否同样地也是由西亚传到东亚,仍是一个问题。(5)中国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西方传来的?即,中国人的农业、畜牧、冶金、驾车、文字,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从西方学来的?(6)蒙古种的体型似乎原始于帕米尔,喜马拉雅山与天山以东的区域;这一种族向西发展又似乎是公元以后的事;这一膨胀真正地开始得如此晚吗?膨胀的原因何在?

瓦德氏所提出的六组问题,不仅第五组显然是中国历史家与考古家的问题;其他五组都是我们的亲切问题,却都不是我们所能单独解决的。评者绝对的同意瓦德教授的见解,要满意地为这些问题寻答案,需要若干科学家的合作。

第四篇贝根(Elizabeth E. Bacon)女士所提关于划分亚洲文化区的问题,性质的重要,就研究方法说,是每一个注意亚洲文化之原始与演变的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与史学家应该加以特别注意的。她开始研究这一问题远在1945年;在194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人类学西南杂志,她发表了划分亚洲文化区的初步计划,中经克罗洎氏(A. L. Kroeber)、纳罗尔氏(Raovl S. Naroll)等的修正,本文大概代表她的最近的意见。在这一论文内,她把亚洲分为四大文化区,即北亚——西伯利亚区;中亚——西自里海,东及西藏以东,直达太行山边界,均在她的亚洲中部的大草原区;南亚——缅甸以西直到地中海、红海;以及远东——缅甸及中南半岛,中国的西南、东南以及东北,日本也在这一区域范围以内。她所举的四大区域的文化特点如下:

(1) 北亚区,渔猎经济,有的以畜牧驯鹿代替狩猎;住房为tipi帐篷与半地下室。运输工具有狗拖冰车;衣皆剪裝,以皮货为主。所有西伯利亚的土著,均能画、能刻、能雕。熊的故事与熊的崇拜,在这一区甚普遍。

(2) 中亚区,是一文化的十字走廊,为东西南北交汇的地带;由这些文化的交流,而产生了若干混合的文化丛。

(3) 南亚区,经济制度远较上两区复杂,约与东亚区相等。在那一区,牛奶以及牛的重要是特别显著的;虽说在美索不达米亚,它的宗教意义已经消失,但在其他地域,"洁"与"不洁"的观念仍保存得很紧密,无论是印度回教或犹太教。这一观念在阿拉伯族里发展成了很严格的内婚制度。这一点可以说是南亚文化的最基本的一个成分。

(4) 远东区,抗拒牛奶最顽钝的地方;南亚认为不洁的豚,却是这一区的主要食料之一;狗的地位也高:或供牺牲,或作图腾。这些习惯恰与南亚成一鲜明的对比。醴酒

在这一区域是一切仪式的重要成分。这一区域的人们大致都崇拜祖先与社火;并且有重视四方的意念。

每一大区又分若干小区,如在远东区的缅甸、中南半岛、高丽、日本等,皆各具若干不同的文化内容;从研究的方面说,自然应该看清它们的差异与它们的个性及其形成之远因与近果。

以地域为据点而研究人文的动态在中国是有很长的渊源的,并有过若干光荣的成就。中国修地方志的风气,可以说完全由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到现在,已有若干远见的人士,将若干科学的报告采入地方志的编辑;更进步的,并且完全聘任科学家董理其事。如最近在江西、在河南与台湾编纂志书的工作,都表现这一趋向。在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内,最早采用这一方法的,是在美国;维斯纳教授研究北美印地安人,作得最成功;后来克罗泊、赫斯柯维兹以及墨都克等群起效法,用之研究其他区域的人种与民族的变迁,也收了丰富的效果。故贝根女士的分划亚洲文化区,也是这同一风气熏陶出来的观念。中国的学者尤特别欢迎这一发展,因为我们的史学家,不但早已具有这个意识,且已尝试过很久,具有若干成就;同时,在以人类文化作比较研究的若干方法中,这是最客观的,也可以说最近于科学的。我们要对于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原始及形成有一清楚的认识,这一方法的推广运用,确可以给予很大的帮助。

所选其他各篇论文,有的撮叙新材料,有的提出新问题,大半都富有启发性,值得一读。第十三篇卡得尔氏(Ceorge F. Carter)的,横渡太平洋之植物立论的出发点及论证的安排,尤能使环太平洋的民族学家与史学家感觉振奋。全篇的论文是如此开始的:

> 植物的证据价值已经常被提到了。人不发明(invent)植物。哥伦布以前的时候,同一植物,在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培养就“足以证明”这两个文化世界之间已经有了航行往来。……“足以证明”,因为将讨论的这些植物,由自然界的力量运到或运出美洲的机会,是稀微得很的;若说由平行的演化而达到如此巧合的种类,更少可能了(第62页)。

具体讨论到的三种植物为:葫芦、椰子与甘薯。关于这三种有益人生的植物,作者都引用最近考古学的发现及民族学的资料,证明在哥伦布以前,已为新旧两世界的人类种植;若干实际的试验证明由海洋传播这三种植物种子都不可能。作者在一处说到:“所以我们有三种植物,就是反对太平洋文化传播说最剧烈的人们,也承认是由人工在亚美之间输送的。输送的时间,由 Huaca Priesta 的放射碳素资料,可以定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后……”他的结论是:旧世界与新世界农业各自发展的说法是不能维持了。

评莱特编英文本《中国思想之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美国人类学会创刊的《文化与文明之比较研究》丛刊,第一辑讲中国思想的一本已于1953年12月发行了。除了总编辑外,执笔的九人都是对于中国思想有若干体验及见解的,并且大多数都能读中文。该辑所刊布的专题论文共九篇,如下:

(1) 中国哲学里"和谐"与"冲突":Derk Bodde

(2) 新孔教的再评价:W. Theodore de Bary

(3) 王阳明以后中国思想里"知"与"行"的问题:David S. Nivison

(4) "历史"与"价值":现代中国精神选择的紧张局面:J R. Levenson

(5) 中国艺术里符号之类型:Schuyler Camman

(6) 解释工作的几个问题:Arnold Isenberg

(7) 试拟一个翻译学说:I. A. Richards

(8) 对于翻译困难的几种反想:Achilles Fang

(9) 中国文字与外国观念:Arthur F. Wright

以上各题目的讨论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专刊内,比发表在任何其他刊物里,意义是有点不同的。不同点为编辑人的一种假定;他所假定的是这些作者们都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处理这一大串富有刺激感情的材料。观点当然并不算特别新鲜,但实行起来,总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今试从这一假定的立场衡量这一辑论文尝试的成绩,各文给予我们的印象是不十分一致的。

很显然地,各论文的真实价值大半可以由执笔者对于中国文字的认识程度加以推定;但是也不尽然,因为不同的题目,以及处理题材的方式所需要的中国文字的认识程度,并不完全相等。第七篇讲翻译理论的理查兹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的Fellow,曾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任教)饱尝过翻译的甘苦,对于此道,尤其是由中文翻英文,确有超越的见解。他计划的译事七目(253页)虽并不是专指由中文翻英文而说,但中心目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3期(1954年)。

标确是在此;这七个节目虽极尽分析之能事,仍以"了解"为主要的意思。第八篇研究翻译困难的方先生(韩籍文学家;曾在辅仁大学工作),也说到,翻译的一切困难皆起源于译者对于原文了解之不足,他所举的例,大半属于此项过失。

研究中国思想的体系,是否可以完全靠译本?要维持研究的客观立场,是否以离开中国文字的魔力为较易着手?虽说在不少的地方,可以看见对于文字与思想的关系有热烈的讨论,对于这两个问题,在这一论辑内都找不到适当的答案。假如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所谓熟悉中国文字者,应该包括能用中国文字作思想工具的一般能力;这一标准也许有人认为不必要,或者多余;因为陷入中国文字的魔力后,就不容易保持客观的态度了。固然没有人如此明说,但以研究中国思想为题的一本大报告,没有把流转思想的基本工具——中国文字——作一专题讨论,就等于说明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字的态度。

第一篇的作者,Derk Bodde,曾翻译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以他讲中国哲学,像冯氏一样,把从文字学入手解释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视为是无关系的;譬如他讨论性善性恶这种大题目时,似乎并不知道有《性命古训》这本书。第二篇的作者,评论新孔学,不知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自己说的,还是引用古人的。这些都可以证明,若干作者虽懂中文,但并没修养到真正熟悉的程度。他们引用的资料,主要仍靠译本。

问题的中心是:思想既是由文字表达出来的,对于文字的性能,熟悉得没到彻底的程度的人们,对于文字所代表的思想是否能得到一种彻底的认识?评者个人的见解,可以分三层说:(1) 凡是讲天道、讲性命、讲观念、讲意思,以及讲思想习惯的种种问题,都是不能离开原作者所用文字本身的知识而作抽象讨论的;因为离开了原来的文字,这些问题就没有着落了。自然,好的译本,也可以帮助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但是成功的翻译,大半都是妥协的作品(Richards,260 页),对于原来的体系仍隔了一层。(2) 有些思想的表现,可以离开文字自成一个系统,如若干纯艺术性的作品以及物质文化的成绩;寄托在这些作品与成绩上,有不少丰富的感情与理想;由这些艺术品与工业品,寻求创造者内心的感情与理想,虽得不到第一手的认识,但它们的符号价值,至少是与文字相等的。所以讨论这一类的材料,文字的限制可以说没有了。(3) 现代科学的进展完全是靠客观标准的建立;它的显著的成功大半由于研究的材料为自然界的现象,与文字的关系较少。若是把这对象扩张到文字的本身所代表的思想,这里就发生了一种微妙的问题;这问题类似内观派的心理学家自己察自己心理状态时所遭遇的困惑;这是一种难解的九连环,所以行为派就把这条路根本放弃了。自然,文化人类学的路径要宽些:由一种高度的翻译技术训练入手,训练些能用两种文字同样地、纯熟地、作思想工具的学者来讨论各民族思想的科学问题,建立若干客观的标准,作判断的依

据;这自然是值得尝试的一条路。不过要尽量地发挥这一技术于客观的基础上,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人类文化的观念;即认识人类文化的全体性与不可分性;所有强调地方性的文化观念,我们应该知道,都没有深厚的基础。

基于上说三层见解,评者认为这一辑讨论中国思想的各论文,虽是极力在想辟一条新的路径,也有不少新颖的见解,然仍没有达到一种客观的标准,也未能免除文字的偏见。这些缺点,只要作者不固执,是可以渐渐地矫正的。一个中国的读者对于此辑的出版应该有所警惕:中国学者至少应学学外国科学家研究中国的思想所采取的方法与态度,来把欧洲与美洲的思想作若干同样的研究。

1954 年 5 月 15 日

评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英文本)(*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I)*

这是作者所计划的七个本头的一部书的第一本;所讲述的只算是开宗明义第一章,尚没谈到科学技术的本身。但是全部书的宗旨,在这一本书内,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要讲解中国人对于科学及科学思想的贡献(p.3)。他开始提出的问题,有下列的几种:(1) 在上古与中古的历史期间,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贡献了些什么?(2)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总是滞留在——一般地说来——经验的阶段,理论部分没超出原始的及中世纪的类型?(3) 不过,在若干很重要的事件,中国的科学及技术的发现却抢在"希腊奇迹"的前面,可与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且在公元第三世纪至第十世纪前后一千年内,保持了为西方人企望不及的一种科学知识的水准;这又是怎么讲咧?中国既是在理论上与几何系统论上很脆弱,这些弱点为什么并没为若干科学的发现与发明的障碍,而这些发现与发明且超过同时的欧洲的成就——尤其是十五世纪的?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内容里,什么成分阻止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在上古与中古的中国社会,又是什么成分促进了中国的科学知识的卓越表现及其运用?这些问题显然只有懂得现代科学的人,才能提得出,也只有懂得中国文化与同情中国文化的人方肯如此提。作者自己说,要写这样计划的一部书,写的人必须具有六种资格:(1) 他必须有科学的训练,并且作过有成绩的科学的研究,也发表过论文;(2) 他必须知道欧洲的科学史,也作过有关的研究;(3) 他必须对于欧洲史中关于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背景各阶段有兴趣;(4) 他必须参加过中国人的生活,有自己的中国经验,并且有机会——不是外交官的,或传教师的——游历中国的各地方;(5) 他应该知道中国语言、文字,至少到能阅读,并了解科学及技术有关的中国书的程度;(6) 他应该有那种幸运得到中国各方面的科学家及学者的指导。

作者自己认为他是具有这些资格的,并且说他若不牺牲些时间写此一书,要等候再有像他似的,这些资格全备的人来写,那就不知道再要等多少时间了(p.6)。

---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6期(1955年)。

他的写作方法,除了头两段的引言及讲中国文字外,是按着这样的一个秩序:

(3) 参考书录:及目录之编制。

(4) 地理叙说。

(5) 中国历史导论:秦以前。

(6) 中国历史导论:秦以后。

(7) 科学观念与技术在中国与欧洲来往的实情。

他的参考书目排列成三大类:A. 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书共一百七十四种;B. 十八世纪以后的中文与日文的书及论文共八十四种;C. 西文书及杂志论文共九百八十五种。这些书及论文,照他说,只包括第一本书所参考的,将来全书完成时将有一个综合目录。

全书致力最多的部分为第五第六之历史叙论,以及第七章:这三章共占了全书约十分之七的篇幅:要用大学的术语来描写它的内容,它包括中国通史材料并中国交通史的材料。

但是他的着重点,是在交通的有关的问题。这一问题中心为:与人类文明有基本关系的科学观念,及若干技术的发明。这些观念的形成与技术的发明究竟是中国在前,还是欧洲在前? 近三百年来,欧洲的历史家、科学家,以及一般的知识阶级,差不多都相信,科学是欧洲的特产:东方人没有值得称述的贡献。假如历史的记录与这一信仰不符,他们总以为记录是错了,他们的信念是不错的。这里自然也有若干例外,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有深切认识,而能摒除先天的偏见的若干人士:他们有胆量正视若干历史事实,不为他们自孩童时期起就为地方偏见所养成的观点,蒙蔽了他们的正确的判断能力。

作者读中国历史,根据他所了解的这些事实,得到了欧洲一般的科学家所梦想不到的若干结论:他说,从第一世纪起到第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中国辗转传到欧洲的重要的技术发明,可以很清楚地列举的,在两打以上。其中在中国发明并习用了一千年以上方传到欧洲的有龙骨车、碾子、冶金吹风机、活塞风箱、风筝、铸铁、淘深井、指南针、磁器等;在中国习用了五百年以上方传到欧洲的有水碾、独轮车、弩、拱桥、铁链吊桥、运河水闸、火药、纸、印刷、治丝机等;用过了一百年以后方传到欧洲的机械发明有活字排印、船尾舵、指南针、航海指南器、火药武器等等(242 页,表八)。更有若干中国发明永远也没传到欧洲,如指南车、连环弩。

但在同一时间,欧洲的机械发明传播到中国的,可以明确指出的只有四件,即螺丝钉、抽水机、曲柄轴与钟;头两件,在欧洲用了一千余年后,才传到中国;第三、四两件,也是发明了一百年以后方到东方的。这一面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引起了作者对于一种问题的兴趣:他说,一种新的机械的发明,其价值虽为发明地点的社会所了解,但换到另一社会未必即时得到同等的欣赏,因此发明物虽可传播到,却未必被采用。作者举

了三个例说明此点,他说,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欧洲已知道中国烧煤、用纸币,并且用不透水的隔断单位的造船法,这些知识至少在马可·波罗时已经传到欧洲了,但欧洲人却并没马上就仿效;因为这些发明,照作者的解释,不能适合欧洲那时的"国情"或者说那时社会的型样(243页)。这一点确是很重要;评者的意见,以为应该是讲文化传播的史学家所特别注意的。

要判断这本书的价值,我们自然应该注意两点:(1)所引用的原始资料,与(2)对于该项资料之解释。作者显然对于这两点都很小心,并且尽了很大的努力,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资料,作了不带偏见的解释。从这方面说,有好些地方要超过了好些不懂中国文字的科学史家。而以他的科学修养从事此一工作,所得的成就,更是若干汉学家也追不上的。但这只是就这书的全局的布置以及初步的安排说;若仔细地读这书,他解释材料处是有很多错误的;有些已经为别的评价人指出来了。单就他讲中国上古史这一段看,他说:

(1) 仰韶彩陶文化区包括有山东省(p.80)

(2) 山西同河南一样有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p.83)

(3) 以龟背甲为龟卜所用的代表资料(p.84)

(4) 以董作宾同Dubs一样,认为周伐纣年在公元前第十一世纪的晚期(p.90)

(5) 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领土包括四川的东部、湖南与江西,却没有湖北(p.96)

这些也许只是"忙里错";但这只是不到二十页内错误的抽样。这些错误证明,作者不但没把原始资料弄清楚,连中国史的基本训练尚有不够的地方。这一类的错误积多了,不但构成严重的缺点,并可以妨碍全书的立场,因为作者自己所悬的标准是很高的。不过就全书说,这些错误应该是随时皆可改正的。一个中国的读者,因为一位英国的科学家,牺牲了他的专门工作来发掘中国人的先圣先贤的潜德幽光,表扬中国民族的科学能力,自然感觉到特别的兴趣,这书里有若干见解应该促进中国学者的深省。假如我们祖宗向来没表现过科学的能力,现在还可以把我们的落后情形推到我们的遗传因子上去。但是,照李约瑟的看法,我们的先圣先贤在这方面有过一千年以上的卓越表现;现在的堕落,自然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罪孽了。若因此而甘心作一个破落户,不自振作,只引祖宗的成就以自豪,那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祖宗虽圣,曷能救子孙之童昏哉"!

关于近三百年来,中国未能发展科学,李约瑟将有一套说法,这在他的目录内已经排列出来的,说法如何,我们现在自然不能预料;就这一本所提出若干问题看来,一个中国的读者认为是甚扼要的。但评者的印象,作者对于中文材料的了解,显然尚没到熟悉的程度;不过这也就很难得了。

评介 Max Loehr 著《中国铜器时代古兵: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英文本)(*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查不出这位作者的中国名字叫什么,他应该有一个。此书的中国名称的题签是作者的手笔;一位能为中国字的西洋人,大概总不能抗拒取一个中国名字的诱惑。书中叙述的这批资料,原属于一位德国籍的欧洲人,中国名字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在中国与日本作生死斗争的时期,杨宁史以德国人的资格,居住于日本劫夺的中国领土内,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搜集了不少的中国古董——包括这一图录内记载的兵器。资料的来源,书中并没指出;有些显然是由旧收藏家转让出来的(如73号):大多数的大概是在抗战期间,古董商联合乡下老百姓盗掘出来的(如77,45等)。书中所指的安阳、浚县、辉县等地都是在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田野工作未完成的区域。但是图中摄照的一百二十三件美丽的相片,均缺乏任何关于它们的"身份"的记录。它们在何种情形下出土的,以及出土的区域,作者所能供给的报道,尚赶不上北宋时代出版的《考古图》。但是,作者既化了不少的时间,把这批资料系统地整理、排列;并得了各方面的资助,不惜工本,把这些图片,用上等的影印术、上等的铅字、上等的纸张、上等的印工、上等的装订出版了;这些,都值得每一个博物馆的工作者,以及每一个读者深深的感谢。

这本书的内容不以图录及说明为限;这些资料供应了作者有关中国青铜时代若干问题的讨论;讨论的顺序,按材料的性质分成五章:(1) 斧钺(Axes);(2) 矛头(Spearheads);(3) 句兵 (Dagger axes);(4) 刀与匕首(Knives and Daggers);(5) 剑(Swords)。图版中所列的,除了少数的杂件外,大半都可归入以上五组。作者的目标,为把每一种兵器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以及演变的来踪去迹都追寻出来,所以他引用的比较资料,范围是相当的广泛;但他所采

---

* 本文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7期(1956年)。

取的方法——(或者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只限于器物形制的比较。

以形制演变的研究为目标,作为断定器物年代的根据,虽有一甚长的历史背景,在最近发展的考古学的范围内,并已到甚完备的阶段;但同时这一方法的运用有它自然的限制,也是大家所承认的。若器物是古董市场的标本,没有出土的详细记录跟随着,则无论器物的本身为如何的完整,或备具美术上的价值,却带了一种先天不足的毛病——它的科学价值就受了严格的限制了。

但作者却是不甘心受这种方法及材料性质所束缚的。他根据这批精致的古玩所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不少的问题,也完成了不少的意见与结论。该书第六章讨论"西伯利亚在青铜时代的早期"是如此开始的:

> 将在中国地方找到各种形制的青铜武器整理后,我不只一次地觉察到那"原始形制"的欠缺;由此引起的问题,就是这些"原始形制"是否可以在中国以外去寻找。把中国早期兵器的形制与远西各国类似材料所制的武器相比,我却得不到一种界线分明的与可以一般运用的结论。这几种重要的武器,暗示着若干不同的来源,土著的或非土著的,如下:

形制	或然的原始
(1) 以銎受柄的斧钺(Shaft hole axes)	北方的,可以追到两河流域
(2) 即以内安柄的斧钺(Tanged axes)	中国,石制原型的肩斧
(3) 空头斧(Socketed celts)	俄国,西伯利亚
(4) 矛头(Spearheads)	俄国,西伯利亚? (没有可以认出的北方成分)
(5) 以内安柲的句兵(Tanged dagger axes)	中国
(6) 以銎安柲的句兵(Socketed dagger axes)	中国,銎来自北方
(7) 刀(Knives)	北方形制及中国形制
(8) 匕首(Tanged daggers)	中国(周早期?)
(9) 有茎匕首(Hilted daggers)	早期形制属北方; 周代形制中国独立发明
(10) 剑(Swords)	中国,原始于(8)

(以上译自原著第83页)

以上自然是很有趣的说法,也似乎是很谨慎的说法。不过因为所根据的材料本身的限制,而由此限制的原始资料取得的意见与结论就使稍为有些考古经验的读者,读了有点悬在半空中的感觉!譬如作者习用的若干名词如:"Typical Shang decoration"、"Ordos form"、"Northern Elements"等等的准确意义是很难捉摸的!让我们把这批材料的性质再分析一次,说明这一意义: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在古董市场上出现的古物,是经过一长串的淘汰手续的适存品;因为古董生意原是一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买卖;所以他们经手的货物有一特别的标准。在中国境内,这一风雅贸易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经营这一业务的商人都是生意经很精的人;劣货不要是不用说了;不能索高价的物品也入不了他们的眼。到了能命高价的货物,当然是精而又精的选品了。

第二,精品的品质之一,为必须带有浓厚的神秘的气息;时间不确定,出土地更不确定;这些“不定”似乎是用以索高价的一种最强烈的理由。根据这些不定的品质,来断定它们的时代与地域,岂是可能的?没有准确的时代与出土地的资料,又岂能判定这些材料的历史意义?

要是我们认清楚了古董商场得来的古物的性质,我们就应该时时刻刻记着,每一件出售的古董精品,要代表十件、百件或千件的次精品以及劣品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在商场被淘汰的次等货:它们是弱小古董,不值钱,除了有现代考古学眼光的人们以外,它们是没人要的货物。所以它们就被弃置了,以至毁灭了。但是这些次等的、劣等的货品或者就可以供给研究形制的古器物学家若干形态演变的资料,可以用着解释若干精品的族属以及原始。

举一个例证来解释上段的话。中央研究院在侯家庄的发掘,于殉葬坑内得了很多的小铜刀子与铜斧;质料脆薄,弱小得可怜,若是本地农人自己掘土得到这些器物,他们是不会动心的;更不会把它们送给古董商卖钱,十有八九,他们要把这些弱小古董当废铜处理或丢掉。但是,它们却是考古家的“创获”。

这些小铜刀子不但说明了若干安阳出土的精品形制之来源及演变的痕记;并且对于铸造的方法,也供应了不少的研究资料(看《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7年出版;《文史哲学报》第四期,1952年出版,均登有此文,可见演变图形)。

此书讨论青铜刀的问题,所据的基本材料为杨宁史的十一件(32-42号)。十一件中作者认为确是商朝的有四件(32、33、34、40号),商或周初的两件(41、42号);周朝第一期的两件(35、38号);可属此期而有问题的一件(36号);属于周朝第一期至第二期的一件(39号);可属此期而有问题的一件(37号)。至于为何如此分期,作者并没有清楚的说法。他在讨论这些材料的地方却发表若干不十分肯定的议论。他说“一切上说的从安阳得来的标本(即铜刀的一组)——插图47:A与标本32两礼器除外——在鄂尔多斯、绥远、内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中部,都可以找出类似的形制出来。若是没有来自安阳的报告,我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中国北方或西北方的草原文化以内去……”(p.68)。换句话说,要不是古董商告诉他,这些“古董”是安阳出土的,作者也就不会相信,商代的安阳可以有凸背的、曲背的、柄身带中缝的,柄身有几何文饰的,柄端带环的,以及兽头的,各种形制的铜刀了!至于这些“北方艺术”,为何出现在“安阳式的装饰品中”,却引起了作者的“这些几何文饰的铜刀,是商朝的发明还是北方民族的发明”这一问题。最后他又说到,要讨论这一问题需要北方铜刀形制演

变的资料;但是这项资料,现代却尚没有(p.69)。

看来此书作者这一类的思考起于两种不同的处理资料的态度:把北方的问题看得过分地想像,把商朝的问题看得过分地简单;前一态度可以把设想认成事实,后一态度可以用传闻淆乱真实。两种态度都是科学研究的大妨碍。

评者举此一例所要证明的一点,只是:根据古董商的古玩,要建立一理论完备的古器物学,是不可能的:科学的古器物学必须建筑在现代考古学的知识上。

关于比较年代学方面,此书作者亦颇有讨论。他承认,在西伯利亚是否有一早于安阳的青铜时代尚是一问题;但是他随着就说,安陀罗佛(Andronovo)的文化为传播青铜文化到东方的重要的媒介。但这一重要文化自身却缺乏标定时代的工具;所有西伯利亚及俄国中期文化的年代都以南俄的年代为标尺,但是"更坏的是"南俄也没有标定时代的独立工具;它又转靠欧洲、爱琴海,以及两河流域了。归根大概总要追溯到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去!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学又准确到什么程度咧?克拉克教授(Grahame Clarke:*Archaeology and Society*,1947.p.147)说:两河流域的年代学在公元前七四七(747B.C)以前都到不了肯定的程度。这一限度比大家承认的周共和元年(841B.C)以前还要晚到九十余年。我们可以想到,转了两个弯比拟的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年代有什么准确性吧!

作者阅读汉文的能力何如,甚难估计;但他在第四十二页及四十八页引用李济教授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时把原文都没看懂;这是很可惊的!第一百三十六页,把徐州(Hsü-chou)括入安徽境内;第一百五十三页把保定(Pao-ting)括入河南境内(Honan);第一百六十一页把阳高县(Yang-kao-hsien)括入内蒙古(Inner Mongolia)境内;不知道是根据那一时代的地理?

(笔名:倚松)

人之初——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英文本)*

收到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已经两个月了,读了不到一半,忽然伤足,卧病月余,时读时辍,想作一篇评介,至今未能执笔。“学人”催稿,特先就已读部分所感到之问题,择一作一检讨。

作者在这一册的开始所标的题旨,为讨论中国的“哲学”对于科学思想的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开始的一章除外(接第1册排,为全书之第8章),由第9章到第12章分别讨论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各学派对于科学的贡献。

讨论儒家的一章,讲到人性善恶的问题,他引了宋人戴埴的话:

> 世之论性者二,善恶而已。人往往取孟而辟荀;予合二书观之:孟子自天性见,所谓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养之功,《大学》诚其意之谓也。荀卿自气性见,所谓恶必指其谬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强哉矫之谓也……然则孟子之学,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学,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补于后觉则一(所引英译文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5页;原文见《鼠璞》,照旷阁本,卷下21至22页;《学津讨原》有此书)。

李约瑟总括儒家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说道:除了“时间”成分外,戴埴的议论所包括的方面,没有什么缺少的了。“时间”观念只有生物进化的学说能供给;中国文化里虽也有这类知识的朕兆,却并没有独立地演进到把它完成一种科学知识的程度(原文25页)。

我读了此段,甚感到这几句话的大量压力。同时又联想到另外的一串问题。但我并不想讨论所引李约瑟的话准确程度,也不想讨论中国文化里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件事。此处我预备提出来的一个议题,是:假如我们的思想界有接受生物进化学说的诚意,我们对于“人性”这一概念,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表面上中国的思想界接受了天演论的学说已有了一个长的时间了;试看大学、中学以及小学讲生物学的教科书,无不把达尔文奉为祖师,尊若神灵。论政治、讲学术、社交谈话、

* 本文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6年12月18日第6版“学人”栏。

文章游戏,所用的与进化论有关的名词,触目皆是。但是中国的风雅传统有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看到若干与"人"本身有关的议论文字,我有时未免纳闷地想:半世纪来,我们所谈的进化论学说,也许只是一种礼貌上的接受吧!记得小时初读严幾道所译的《天演论》,最欣赏的是译文的声调铿锵;同时另外的一个追忆,为我读此书的第一遍反应很可代表那时的时代精神。至于内容的详细节目咧?

进化论的详细节目,最紧要的一段自然是"人"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国思想史里没有人为上帝特别制造出来的这一信念;同时对于他的原始,中国思想家向来也没紧紧地追问过。不过也并不是完全不过问,只是问得有点稀松,因此也就没逼出任何有系统的答案。而孟荀两大师高谈人性,判定善恶,却百分之百的小视了这一大前提。这是难怪的;在两千余年以前能把这一个题目提出,就人类思想的发展说,我们应该视为一种正当的开始。可怪的是到了第二十世纪的中期,在生物进化论的发表已有将近百年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内仍有一部分把"人"当作一种静止的对象看待;无论是歌颂他、赞美他,或是诅咒他、讨伐他,总以为人性不是善,便是恶,是固定不移的……但人们至少有一种权利反问:"人"的界说是什么?

现在一般的答案显然还是沿袭孟荀而来的。孟子詈杨墨为禽兽,因为他们的学说忽视了君父的地位:是一种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见解,不包含任何客观事实的根据。分析得稍为抽象一点应该是他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一条,但照赵氏注解,以"几希"为"知义"与"不知义"之间,所说的分别,仍是一种主观的见解。荀子说得要明白些,他在《王制》篇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一观察远比孟子的明确;但是他以"义"为人所独有,这与孟子所说相比,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的性恶之说,看来并不能建立在这一条观察上。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讨论这段公案处,插入了下一段评语:

> 最代表人的特点,在中国的思想系统内为"正义"的感觉(Sense of Justice),而不是"推理"的力量(Power of reasoning)(《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23页)。

这确是可以注意的中西文化的一种分别。究竟中国思想系统内是否完全忽略了人所禀赋的推理的力量咧?认为人性恶的荀子另有一节讲人的特质;《非相》篇说:

> 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这几句话似乎暗示着那时代有一种流行的意见,以二足无毛为"人"的定义,他因为不满意这一定义,乃加上"有辨"两字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者的特色。荀子有一大段解释"有辨"的文章,最后的结语说人能"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在这三句的解释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出,荀子所指是"推理的力量"。这与现代生物分类家所安排的人在动物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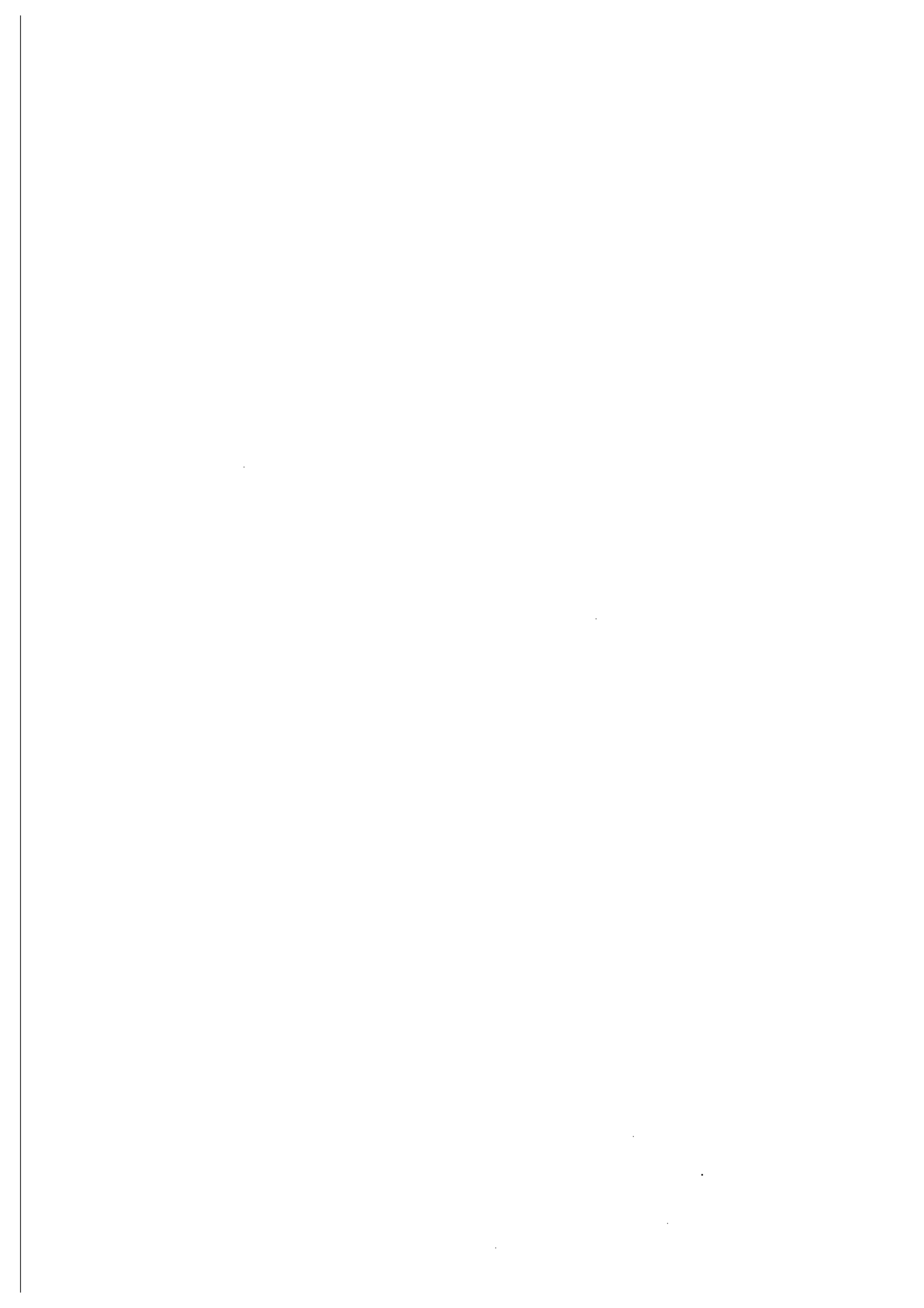
位置,是非常类似的。分类家给予现代人类的学名为“荷谟莎卞”(Homo sapiens);“荷谟”为属别,“莎卞”为种别。“莎卞”的意思为智慧、聪明;故近代科学,依据形态的比较,归纳的结果自与荀子所论似乎并无特异之处;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及立论根据疏密的程度却大有分别。

由形态学入手寻找现代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开始于约两百年前;瑞典的分类学者林里雅斯(又译作林奈。——编者)如此安置了人类,同时也为进化论立了一块基石。二百年来,由于多种科学的合作,已聚积了大量的关于人类演化时代的准确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欧美的社会已由专家的秘笈化成街谈巷议的常识了。照形态分类所根据的论证说,动物之初得人形——以两足直立形态的最早阶段论——开始于地质学家所说的中新统,离现在将近三千万年了;但是他的大脑的发育,到了最近的五十万年才到了“莎卞”的这一等级;这一等级也就等于欧洲科学家所说的智慧,或者东方儒家所说的“正义”的阶段。不过这里有为东西哲学家先前所不知道的一种新的提示:“莎卞”的形成,同人的身体一样,是逐渐得来的,决不是突然降生的。古生物学家已搜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现代人种的平均1350立方公分的脑量,是由他的祖先所具有的600立方公分,渐渐地长大的;由600到700、到800——直到现在;愈向远古追,脑量愈缩小。

所以现在我们重读先前的发蒙课本《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有两个意思必须先弄清楚:(1)若是“人”字所指的是个别的人,指他初出娘胎的那一刹那时间,这个善字是没有意义的。这时人方开始与社会接触;善与恶应该是与社会接触以后的表现。(2)若是指人的全体,三千万年以前初得人形的人类祖先所过的生活,也许尚比不上现代尚生存的猿猴。这当然不会是王伯厚的想法;更不是孟荀两位的意义;但应该是喜欢谈“人性”的学人们不可不知的。

说人“生而有义”这一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伟大的作用;尤其是孟子的那种庄严的说法——舍生取义的教训——贯注到了匹夫匹妇的精神生活里前后两千余年,把中国民族的生命也维持了两千余年。但是这一观念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呈现了偏枯的症象,偏重了人性一部分的发展。人所特别禀赋的另一方面,他的求知的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没得到它应得的帮助,没用一种历史的力量推动它的发育。李约瑟在他书中所指出的这一点,应该使我国彻底的觉悟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缺点。

未译论著



A Study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Chapter 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Causes

Historically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shows three successive stages: — the economical, the biological and the eugenic. Thomas Robert Malthus represents the first(13, 80, 125), Herbert Spencer, the second (121), and Sir Francis Galton, the third (66, etc.). In the light of modern sociology, an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is, therefore, a threefold process;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food. It is the first aspect that we propose to examine in this thesis. We shall see how individual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what are the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rough these differences how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take place; and finally how these changes affect the established condition of society.

Part 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e is a Japanese, a Chinese, an Englishman, an American, a negro more by his physical appearances than anything else; he is tall, short or medium; fat or thin; black-haired, brown-haired, etc., etc. Anthropometrical measurement can signalize definitely at least five hundred traits. Bertillonage consists of eleven precise measurements besides

the record of the chromatic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That men are physically different is hence easily seen. In regard to mental qualities, however, we have been more at sea.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has been and is still a prevailing notion. Even Charles Darwin used to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human endowments are about equal before he read Galton's celebrated work on "Heredity genius". Bu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fallacy of this notion has been proved beyond doubt. Psychologists nowadays hav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the original natures of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re not exact duplicates, that men learn differently and improvements differ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Man is therefore individual through and through, mentally, mor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The f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has been established.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thus begins with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that men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t is through these differences that changes of human quality are possible.

In the eugenic and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character" and "trait"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to designate different aspects of human quality. Human quality is therefore a composite of many traits. Traits as such are only a working concept, a logical product; they have a genetic background and bear a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y are measurable on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expressible, and expressible only when they are functional. Scientific analysis has revealed the almost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y in separat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traits from their structural aspects. The best way to get out of this difficulty is devised by Thorndike who defined trait as "one whose varying conditions in man can be measured on one scale." Perhaps this definition leaves out of account the potentiality dorman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raits, but this is as far as inductive methods can carry us. We are certainly warranted in inferring the nature of one's potentiality from its efficacy and one's capacity from one's achievement, inasmuch as they only are measurable. Our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calculus of mental science has been perfected to such a degree as to render it capable of gauging all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traits in existence, thus determining man's individuality and his place in nature.

So far as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concerned, it is a rule that among individuals, traits alike in kind show very unlike distribution in degree. Those who are mathematically inclined look fo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not only in kind, but also in degree, thus giving rise to a system of mental measurements. Subjected to measurement the traits not only become more pronounced, but also give concrete evid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scale of precision, anthropometrical measurements certainly come first. Mental measurements are less accurate and more arbitrary for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dealing with something infinitely more abstract than physical structures. Yet through the ingenious effort of Binet and his follow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tatistical theory on the other, human capacity can be measured with a degree of precision which is already astonishing. Traits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are all now subject to quantitative treatment; we measure not only memory, courage, efficiency, quickness, inventiveness, but even those phenomena which elude altogether direct measurement in terms of amount, such as wickedness, piety, faithfulness, and what not. It may be safely predict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psychological tests may be developed to such a degree of perfection as to cover the entire range of human nature in so far as it bears a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however, that all methods of mental tests, the most universal of which are the Binet and the Point Scale, are as yet extremely crude; they indicate the degre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nly in a rough way. But comparing the initial effort of Galton and his predecessors with the present methods, the progress made in thi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is already a marvel and gives every indication of further improvement. (153)

It remains for us to give some concrete evidenc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eneral,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es have furnished the most instructive and illuminating examples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mental traits. The study in this field was primarily a quest for a norm of the intelligence of school children, but has since split into channel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until at present there are specializations within specialization, of which some are of the minutest detail that one can hardly see their general bearing to the central theme, So far as the pedagogical results are concerned, however, three distinct branches can be recognize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in general, the study of the exceptionally bright children, and that of the subnormals, While none of these forms a separate entity, yet each has its own technique and mode of research. Their results though sup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s a whole, are significant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investigators.

The survey of the school children's intelligence in general shows that its distribution take a bell-shape(124 p. 78). Groszmaun whose study on the exceptional child is still the best of its kind has a different estimation (47 p. 8). He pointed out that of all the children

of school 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bout 75 to 90 percent suffering some defect or ailment, 50 percent pseudo-atypical, 18 percent atypical, 5 percent subnormal and 2 percent abnormal. Otherstudies by Yerkes, Goddard, Holmes and a host of others in France and England have shown more or less similar results. In fine, no matter what trait of the individual be chosen and measured, the f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s always shown in the result. If one takes the simplest traits, to eliminate the most chances for confusion, one finds the condition every time. Whether it be speed of tapping, or marking off A's on a printed sheet of capitals, or in giving a reaction to some stimulus, or in making association between ideas, or memorizing various things, or drawing figures, or naming the opposite words, or discrimination of lifted weights, or success in any of hundreds of other mental tests, the conclusion always is the same.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raits in one pers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e trait among the mass, however, have not been definitely worked out. Since the time of Quetelet, we have been acquainted with the conception of the "average man" (51) from which we derived the notion that most measurable traits like the height of Scottish soldiers distribute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integral probability. Thorndike, however, in his educational work measured nearly one hundred traits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have a different way of distribution (128). Some are mono-modal, some bimodal, and others multi-modal. The curves plotted sometimes look like the Mt. Fuchiyama, sometimes like a range of the Western Rockies, sometimes like a Thibetan tableland. Skews of various kinds and degrees are found and they differed in every imaginable way. But even that can hardly prove that the law of probability is not working, for the cases he measured are of ten not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the number of trait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s comparatively few; the divergence of results is then due more to the paucity of data, than the aberration of the law of probability at work, Ignoring the much talked about "types", if we consider the world population as a whole and all the human traits—which are certainly many times more than 2500—in totalit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of traits among the mass will be very likely in the form of a Gaussian curve, although it needs further proof.

Part Ⅱ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perplexing problem in regard to the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has been ap-

proach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investigators. Some go on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hereditary forces alone are responsible for one's success or failure in life. Others think that environments count a great deal for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strata. Then there are those who stand in the middle. Oddly enough irreconciliables and compromisers make their appearances eve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yet most of them can find a sufficient amount of data to defend the position which they happen to take. What is then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nature and nurture? A cursory review of some of the investigations will reveal where lies the adumbration of truth.

The matter of terminology, however, deserves some attention before our review begins. It seems that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he field of eugenic literature to avoid the term "nature and nurture" and use the more familiar words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its place. Frederick Adam Woods has defined "heredity" as "all that is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 fertilized cell from which all subsequent cells are by cell-divisions produced," which is perhaps one of the best definitions for this word. Environment naturally means all those non-hereditary influences. (152)

To separate hereditary influence from environmental and vice versa in order to weigh the importance of each has perhaps drained off one best part of human ingenuit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ne method is to compare the mentality of different races. Its logical background is plain enough. Although anthropologists do not agree as to which is the best criterion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n, yet there are lines of demarcation which most scientists have taken for granted. The fact that the black is darker than the white and the white is paler than the yellow is sufficient for race distinctions. Hence if one of them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 in one respect, superior in another, and perhaps equal in a third, the reason for these differences will be more likely generic rather than temporal. The intensity of the differnces thereby found will measure the influence of heredity with a degree of approximate accuracy. It is therefore only natural to find mental testers nowadays busying themselves in balancing the weight of one racial mentality against that of another. Owing to the geographical propinquity of the black and the white in Ame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se two races have been more often than any others of a similar nature. From the time of Galton, the data have been accumulated year after year. Modern investigators like Thorndike, Woodworth, Mayo, Bache, Smith. Stetson, MacDonald, Ferguson, Pyle, and a number of other psychologists as well as anthropologists have ma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36). The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white is superior to the black

in higher mental process but inferior in sensory acuity. The merit ofthese investigations needs no discussion her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pure color line is probably a caus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 very fact that one belongs to a certain race would set up a limit upon his maximum and minimum achievement.

Another way to measure the hereditary force is to correlate the traits of the parents with those of children, and those between siblings or twins. Here, we have literarily thousands of investigations ranging from anatomist to applied psychologist. Their results are divergent both in kind and degree; the explanations for them are sometime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se studies, however, are altogether summarized in Galton's two laws: the Law of Filial Regression and the Law of Ancestral Inheritance (41). These two laws have been corrected and confirmed by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of the Biometrican school as well as other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100),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at which they have arrived is that human characters whether mental or physical are transmissible,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ywhere between .25 and .50. The obvious corollary here to be drawn is then that every individual's achievement i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limited by what his parents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Hence the son of an eminent man has a greater chance to be eminent than the average man of his ra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n of a submediocrite is more likely to be a submediocrite too, unless he is a sport which is statistically exceptional.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have been less systematic, although the data are just as abundant, due perhaps to the intricacy, the complexity and hence the immeasurability of some of the environmental forces. Two lines of research, however, which have already yield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markable results, promise definitely to bear evidence to the wieght of environmental forces. They are related to climatology and dietetics.

The condition of the air in which one live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factor in efficiency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especially has exploited this question in a very thorough manner. One of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investigators, G. E. Dexter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effect of seasonal changes on mental functions (27). Recently, Huntington (57, 58), Hollingworth (55) and other applied psychologists (55) have all found that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atmospheric mo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iciency of mental work. The conclusion accordingly is that given the same heredity, only those who are surrounded with the best atmospheric conditions

have a chance to realize their maximum capacity.

The dietetic influence on human efficiency is evidently just as great as the climatic, if not more. Recent publications by Professor F. G. Behedict (6a) are worth mentioning here. They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mental functions is reduced to a remarkable extent under restricted nutrition, hence argue weightily for the fact that dietetic condition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ifferences of individual achievements.

Thus far it must have been made clear that both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have their spheres of activity in making up what an individual is. The one determines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 of one's achievement, the other determines at what point one is to adjust himself within these limits. The best environment can not call forth any achievement from an individual beyond his upper limit, and the best heredity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one's maximum capacity can always be realized. The combined action of hereditary and environmental forces mak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uch greater than if there were only one of them. Given equal hereditary endowments two men are bound t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are bound to be brought up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s they cannot occupy the sam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we could transform the variegate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to a unified artifici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ould still persist because parents and ancestor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dividuality therefore is a resultant of its possessor's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Measured on a social scale,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result of four or five different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se two forces. The best endowed with the best environment will naturally yield the greatest amount of achievement, while the worst endowed with the worst environment will have the poorest show. Then we might have a well-endowed, handicapped by an extreme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the best he could do under that circumstances would be only the expression of his endowment on the lowest level, although comparatively he might still be the champion of his crowd.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st endowed might be born in extremely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he would then have a chance to realize whatever is within him, and he less of a handicap to society, than were he put in a worse environment. Extreme cases like these may be exceedingly few, yet they serve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two forces work with or against each other.

Artificial environments are combinations and mixtures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forces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Whatever arguments the ultra-eugenists may advance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ereity, it is evident that unless our artificial en-

vironment is regu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equally favorable to everybody, not every one can do his best. As long as not everybody can be at the tip-top of his condition, soceity cannot afford to stop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forces. In apprai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such as we have today, always tends to maximize instead of minimiz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o far as absolute achievement is concerned, heredity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e study on twins by Galton (40), Thorndike (131), and recently by the 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 (35, 141, etc.) have all shown the predominance of hereditary force.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in all these cases, the differences are measured in terms of capacity, not in terms of achievement. Absolute achieve ment is the realization of one's maximum capacity, which rarely happens under the present social system.

Most investigators on "Nature vs Nurture" have failed to differentiate absolute achievement from relative achieve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from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on the other. Yet they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method and unit of measurement if the results are to be taken to show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dentical twins may have been proved to have the same upper limit so far as their capacity is concerned; but in terms of relative achievement one might double that of the other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they had. The non – identical twins may b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any other two individuals, still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ir achievement may be about the same owing to the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t is therefore simply silly to argue that environment plays no part in shaping one's achievement such as the Biometrical school has so dogmatically insisted. They fail entirely to notice the above differences.

Chapter Ⅱ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Part I Some a priori Principles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must be at any time either improving or stationary or deteriorating. Granting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o far proved and taking hypothetioally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Ganssion curve for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of man we can derive the following formula for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population (78).

Clearly man may be qualitative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A, the supermediocrites representing the upper 25 percent on the intelligence scale; B, the mediocrites representing the middle 50 percent; and C, the submediocrites representing the lower 25 percent.

Then assuming that quantitatively those three classes remain in the same ratio, we may conceive that:

1. there is a hereditary tendency for the race to improve, or

2. through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the quality of man is made to improve; or

3.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a hereditary tendency for the human quality to degenerate, or

4. through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the quality is made to degenerate; and

5. thirdly there is a hereditary tendency for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r

6. lastly, changes of quality due to hereditary force are counterbalanced by a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so that the quality is made the sam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hence (78 pp. 61－72).

1. ←A ←B ←C through heredity

2.	←A	←B	←C	through environmen
3.	A→	B→	C→	through heredity
4.	A→	B→	C→	through environmen
5.	A	B	C	
6.	←A→	←B→	←C→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counterbalancing each other

Assuming again that qualitatively the different classes remain the sam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we may conceive that:

7.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may be improved by a faster multiplication of the upper class; or

8. a slower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wer class; or

9. contrariwise,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may be degenerated through a slower multiplication of the upper class; or

10. a faster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wer class; and

11. thirdly,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remains unaffected since only the mediocrites multiply more quickly; or

12. slowly; hence: –

7.	A	B	C
	3A	2B	1C
8.	A	B	C
	1A	1B	$\frac{1}{2}$C
9.	A	B	C
	$\frac{1}{2}$A	1B	1C
10.	A	B	C
	1A	2B	3C
11.	A	B	C
	1A	2B	1C
12.	A	B	C
	1A	$\frac{1}{2}$B	1C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ormula, it is evident, then, that mere numerical change of

popu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a corresponding qualitative change; and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may affect its quality in both directions, or not at all.

It is also manifest that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of a certain portion of population may or may not affect the quality of man unless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general in relation to that particular portion has been definitely determin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tendency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welve principle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hereditary tendency,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 on the human quality and the rate of multiplication of different classes.

As our knowledge about heredity is still too much limited to throw any light on the inherent tendency of evolution, so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social evolution will be accompanied by social progress; consequently we have to leave principles 1, 3, 5 and 6 in doub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tudy on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not all individuals at the present generation are placed in such an environment that they can do their best; so it is reasonable for us to surmise that by a re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al forces, so that every individual human being on the globe can utilize their endowments at their best, the efficiency of achievement of population would then be made to improve. But this will involve a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hence much conjecture and speculation; for our immediate concern, we have again to leave principles 2 and 4 to a later chapter.

This leads us to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ial death rate and differential birth rate on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to which we shall now address ourselves.

Part II Tendency of Qualitative Change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the Biometrician shool which Karl Pearson cherishes is that it has successfully prove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is till going on among mankind. The problem coucerning us here is then whether this selective tendency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or in other words, whether human quality is improved or degenerated or unaffected by this selection. The direction of this tendency may be tested by a twofold process.

1. Of all those who are born what are the traits and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those

who have a chance to reach maturity?

2. Of all those who reach maturity what are the traits and relative numbers of those who marry and reproduce themselves?

The first test will tell us what has been the tendency, and the second test will tell us what will be the tendency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tendency is not fixed; it can be made to change at every turn. It is here that the hope of eugeniets lies.

Test I. Of all those who are born what are the traits and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those who have a chance to reach maturity?

> Rule Ⅰ. Supplosing that the birth rate is eve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 will be true: those classes which suffer most from infant mortality will have less chance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consequently, if the average quality of those classes belongs to "A", it shows a negative tendency (Principle 9 or 10); if "B", the quality is unaffected (Principle 12); and if "C", the tendency will be positive (Principle 7 or 8).

Early in 1895 Professor Pearson demonstrated the law of chances of death and determined that of 1000 births, the mortality of infancy is 246 centering about the third month of the baby's post-natal life the mortality of childhood is 46 centering about the sixth year and the mortality of youth 51 centering about 22 years. In other words, out of 1000 births in the population, from 292 to 343 will not reach maturity, the immature mortality is hence relatively fixed, a heavier immature mortality of one group or class will mean a lighter immature mortality of other groups (85).

Six years later in cooperation with Miss Mary Berton, Pearson published his first paper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uration of Life and on the Intensity of Natural Selection" (100, Vol. I, pp. 50－90). In this paper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life between parent and offspring is found statistically to be about one-third of the average inheritance of physical characters in Man". While attributing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deaths to enviromental forces, Berton and Pearson set 50－80 percent of the deaths as due to some inborn constitutional weakness which the victims inherited from their parents. The natural inference here is then that about 50－80 percent immature mortiality is due to inherent weakness.

Still later, examining a series of data of infant mortality tn Preston, Rochdale,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ngland, Pearson reached the definite conclusion that parental health is fifty percent more important than parental occupation or breast feeding, and that all four

(maternal health, paternal health, parental occupation and breast feeding) are immense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87). By a series of regression tables, he illustrated:

1. Increasing delicacy of mother marks increasing delicacy of daughter;
2. Delicate fathers have more dead sons.

And finally, by a new mathematical method, which he called "Variate Difference Correlation Method" he treated the data of registered births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demonstrated that for both sexes a heavy death-rate in one year of life means a markedly lower death rate in the same group in the following year of life, and that "a heavy mortality leaves behind a stronger population"(100, Vol. X, pp. 488 - 506).

Three propositions may be inferred from this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1. A certain portion of those who have been born must die before maturity.
2. Those who survive are in general stronger than those who die.
3. A heavy infant mort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delicate parental health.

It is surprising however to contrast these conclusions with Dr. Newsholmes (145) report on infant mortality in which he found twelve influences affecting infant mortality, only two of them biological, namely: (1) the age of mother at marraiage and (2) the number of still births; among the seven definite causes of infant mortality which he set out, none of them is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the parents. Another statistician, Dr. Reid, thinks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infant mortality are the ignorance of mother and bad housing conditions; these conclusion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an American authority who declare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infants deaths could be prevented by adequate measures of relief, a result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e numerical value of Pearson's selective death rate, which according to his later calculation is 60 percent and hence also more than half (145, 90).

While this discrepancy made our analysis more difficult, it also furnishes a clue for our attention to another factor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premature death, especially infant mortality: that is, the economical status.

George Newman has show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tenement and the rate of infant mortality in a carefully compiled tabl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smaller the tenement, namely, the more overcrowded the family, the higher is the death rate from all causes .... "(79a, p. 183).

G. S. Smith and J. E. Purvis later on drew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the more peo-

ple there are to the acre, the higher the death rate among infants. Thus Dr. Reid is at least partially right, that bad housing condition is, if not the ultimate cuase of infant mortality, a constant associated factor with it. Among various other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Biometrician school though discordant with each other as to the ultimate causes of infant mortality, there is a general agreement that infant mortality is higher among the poor than among the well-to-do.

So we have two constant factors attending infant mortality; that is, the physically delicate and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classes suffer most from infant mortality. Our next question is then how is the quality of these class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average population?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weak may be intellectually strong and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may be qualitatively superior. In the popular mind, a gentleman is more delicate than a lower class workman, and genius does not run in families. Here we are right at the heart of th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eugenists and euthenists. Shall we maintain the theory of "Irrepressible Genius" or shall we support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Egalitarianism"? Or, to quote Pearson, "Do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ferior get lower wages and tend to drift toward the cheaper and dirtier type of house, or does the house make the occupants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ferior hence suffer a heavier infant mortality?" (87) As this question is so tremendously important and is the key to the solution of many social problems, therefore it deserves treatment at length.

Up to this time we have had dozens of investigations along this line (70, 154, etc.). The results obtained justify a further and more elaborate research. There is every indication that social workers are advancing in this direction. Some of the important results are:

1. F. Umberto Safiotti, of Milan, on 378 pupils of four elementary schools divided into (a) Professional,(b) Upper Commercial, (c) Lower Commercial, (d) Trades people, (e) Artisan, (f) Servants.

2. Decroly and Degend on the pupils of a school in Brussels;

3. Merle on 30 children from one of the poorest and an equal number from a wealthy school in Paris.

4. Teacher's in Breslan on pupils in the Volkschule and in the Vorschule.

5. Y. and R. Weintrole on about 210 children of several nationalities.

6. Miss A.C. Strong on school of Columbus, S.C.

7. Yerkes and Anderson on 108 school children in Cambridge (Mass.) .

8. Bridge and Cole on 301 children attending two schools, one is a good residential

and the other in a poor factory district of Columbus, Ohio.

9. A. W. Kornhauser on the economic standing of parents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their children, wealth being measured by the possession of telephone.

The results agree in showing that the upper class children are the most intelligent.. Thus according to Safiotti, the indices of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 of the upper three classes average 49, while the average of the lower three classes is 41. In the Brussel investigation, the children at a school attended by the children of the rich "were on the average a year and a half superior to thestandard of their age in intelligence"; in the Breslau investigation" ten year old boys in a poorer school were equal only to nine year old in the rich school"; in the Columbus investigation the offspring of the professional class were found to be nearly half a year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to the children of travelling salesmen. The children of managers of business enterprizes were six months older intellectually than the children of the clerks; the children of skilled laborers were nine months older intellectually than those of unskilled laborers. Miss Strong found that none of the Mill children was above his age level, but 10 percent of the city children were; and less than 6 percent of the city children, but 18 percent of the Mill children, were retarded at least one year. Yerkes and Anders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t and above the age of six years, the "favored" children did from a quarter to a third better in the tests than the "unfavored". children. And finally, A. W. Kornhauser correlated the intelligence of school children with the possession of telephone by their parents and he fou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be.6. (154, 70)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these results much depends upon the nature of the tests, and as we have pointed out in other connections that all the methods of psychological tests are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crude; the Binet test, which is used by almost every one of the above investigato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Yerkes and Anderson, is especially defective in that it does not employ any norm and hence the problem of comparability such as Yerkes insisted on is entirely neglected. But with due allowance for the personal equation, careless observations, inaccurate methodology and other sources of error, it is still inconveivable that all these results should have been so biased as to contradict actual conditions, We are forced to conclude, though only tentatrvely, that there are very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 depending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ir parents. This,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intelligence of one class and that of another; for the curves of

distribution overlap. Nor would these differences be so great,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fact that the children of those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classes, in addition to their feebler inheritance, have to work in bad atmospheric conditions, dirty air and ill-regulated temperature, and are not so well-fed as the children of the other classes.

For all these and taking conditions as such, our first test is now half through. We have found that the immature mortality is heavier among those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and physically weaker classes, and these classes have been proved also intellectually inferior and therefore belong to our "c" group. The selective tendency is therefore positive so far as the infant mortality is concerned.

The above analysis however is true only insofar as the birth rate is eve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As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tial birth rate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tial death rate, Rule I will not hold true more than theoretically, and for actual consideration we have to devise another rule to test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 Rule II. If there are differential birth rates as well as differential death rates, then the net fertility of a class will determine the chances of its reproduction. If the superfertile class belongs to A, it shows a positive tendency; if C, negative; if B,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unaffected. (Same principles as Rule I).

In the French war budget of 1911 (66), it was found that from 1000 wo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50,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Paris, the number of yearly births was as follows (66, p. 139):

Very poor	108
Poor	99
Well-to-do	72
Very prosperous	65
Rich	53
Very rich	35

J. Bertillon has brought together in a similar way data from a number of cities, showing the following birth rate (66 p. 140):

	Berlin	Vienna	London
Very poor	157	200	147
Poor	129	164	140

Comfortable quarters	114	155	107
Very comfortable	96	153	107
Rich	63	107	87
Very rich	47	81	63

A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by David Heron on the relation of fertility in man to his social status, and on the changes in that relation which have taken place shows similar results. He measured wealth by the possession of servants and found (54):

						Birth rate
10	domestic	servants	for	100	families	34.97
10 - 20	"	"	"	"	"	38.32
20 - 30	"	"	"	"	"	25.99
30 - 40	"	"	"	"	"	25.83
40 - 60	"	"	"	"	"	25.11
Over 60	"	"	"	"	"	18.24

Clearly then, the lower classes are reproducing themselves faster than the higher classes, so far as the birth rate is concerned. But how far are these differential birth rates counterbalanced by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s it has been an established fact that the larger the size of the family, the heavier the infant mortality?

Recasting Heron's data, Pearson found the net increase of each class to be: (66 p. 142)

1 .... 16.56
2 .... 13.89
3 .... 11.43
4 .... 13.81
5 .... 10.29
6 .... 5.79

and concluded that in Lond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oorest quarters—over a million in number — are reproducing themselves at a much greater rate than the more well-to-do." (106)

The net fertility of different classes has also been calculated by A. O. Powys and the results are:

	Net fertility
Industrial Class	5.502
Professional Class	3.862
Commercial Class	3.784
Pastoral, Agricultural and Mining	3.142
Domestic	1.945

Powys has also considered his data from a different angle. After Pearson's law of the selective death rate, he tried to find the percentage of married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that have a chance to produce half the childre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esults are:

	Percentage
Professional	22.58
Domestic	23.12
Commercial	23.30
Industrial	25.11
Agricultural, Pastoral and Mining	27.37
All	25.07

Hence the net increase of the professional is not so fast as the other classes. If this class can be taken as intellectually above the average, the selective tendency, so far as those places where the data are taken are concerned, is negative. (Principle 9 or 10)

A still grimmer conclusion is that reached by David Heron who, in the concluding paragraph of hi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Fertility in Man to Social Status" said: "A higher fertility is shown under at any rate the present social condition of a large city to be very markedly correlated with most undesirable social factors." (54)

Test II. Of all those who reach maturity, what are the traits and the relative numbers of those who marry and reproduce themselves?

Our first test has led us to the tentative conclusion that judging from the statistics of past years, there are more mature persons recruited from the economically unfavorable classes nowadays in spite of a heavier infant mortality in these classes, and there is every indication that the descendents of these classes are qualitatively inferior to the average population. But as we have pointed out above that the selective tendency is by no means fixed and that it can be controlled at every turn, so a negative tendency at present does not nec-

essarily involve the same tendency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possible directions to which this tendency may turn. They are:

1. That, though the present generation is recruited more from the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nly the abler part of these recruits get a chance to marry and reproduce themselves,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m owing to their economical incompetency are unable to marry, hence will die childless.

2. That those descendents from the more competent part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all get married and reproduce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3. That the above two cases are exactly reversed.

Actual conditions of course seldom follow any rigid theoretical formula; they are in most cases an incongruous combination of two or three possibilities. But from them we can derive a third rule to test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opulation.

> Rule III The marriage rate determines for each class the chance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f it were preponderant in Class A, it would show a positive tendency; if C, a negative tendency; if in B, the quality in general would be unaffected. (Principles 7, 8, 9, 10, 11, 12)

"The first effect of the recent feministic movement" says Mr. John Martin, "is that half the college women graduates do not marry at all."(75, p. 124)

We have at least a dozen statistical proofs to support this statement. The status of Wellesley graduates in 1912 indicated that 49 percent of the graduating members in the class of 1879 – 1888 got married. Mt. Holyoke's figure of married graduates continually decreases from 85 percent to 50.0 percent within fifty years (1842 – 1892). Bryn Mawr College, between 1888 and 1900 graduated 376 girls, of whom only 165 or 43.9 percent had married up to January 1, 1913. Robert J. Sprague found that 47 percent of the Vassar College graduates between 1867 and 1892 remained celibate. The marriages of Iowa State College women graduates decreased from 95.8 between 1871 – 1881 to 69 percent between 1902 – 1906. H. J. Bankes found in the Syracuse alumni recor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married women graduates decreased steadily in the last decade, while Wisconsin census return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marriage rate of its women graduates was not more than 45 percent. (66, 8, 12, 63).

The figure of the marriage rate on the male side shows the same tendency, although it is not as bad as for the other sex. C. B. Davenport, looking at the record of his own classmates at Harvard, found in 1909 that among 328 original members, there were 287

surviving of whom nearly a third had never married (66, p.246). H.J, Bankers figure of Syracuse men graduates also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married was only 73(4). The class lists of Harvard and Yale have recently been studied by J. E. Phillips (107) who finds that in the period 1851 – 1890 74 percent of the Harvard graduates and 74 percent of the Yale graduates had been married.

But as there is always a portion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which remains single, hence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for the public to get alarmed at the declining marriage rate of the highly educated class, if it were only following the current tendency. According to W. B. Bailey (3) the percentage of persons 15 years of age or over of continental U.S.A. who remained single was as indicated below:

Single Per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ges and Sex

Ages 15 and Over

	Male	Female
1890	41.7 percent	31.8 percent
1900	40.2 "	31.2 "
1910	38.7 "	29.7 "

The above table show several tendencies; but on the whole, the general tendency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to remain single is decreasing.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table, therefore, the marriage rate of college women is running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tendency. According to Miss M. R. Smith's calculation (119) the average age at which college women marry is 26.3. The celibacy of woman in general at this age, according to Bailey, is between 20.7 percent and 22.6 percent, while that of college woman graduates,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investigations cited above, is between 30 percent. and 50 percent The contrast is brought out still more clearly by Thorndike who found that "45 percent of college women marry before the age of 40", but "90 percent of all U.S.A. women marry before 40". (63, p. 106)

These figures, however, cannot be taken too seriously; nor are they so appalling as to Justify the dry of eugenistic and ultra-nationalistic riters, when we analyze them a step further. In 1910 the collegiate women population was only 22 per cent of the total wom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nce they constitute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A class on our intelligence scale; and certainly the change of composition within this one percent though significant enough to challange our attention, should not be taken a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class, Miss M.R. Smith has compared the average marriage age of collegiate

and non－collegiate women and she found the following: (119):

	Average Age of Marriage
College women	26.3
Their sisters	24.2
Their cousins	24.7
Their friends	24.2

It is clear the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 Class woman — for we assume that the sisters, cousins and friends of the college woman are in the same class as the college women — marry about two years earlier. Naturally and concurrently the percentage of celibates will also be not so great as among the college women.

Recent investigations seem to show, too, that the celibacy of the college women graduates is only a matter of course, or in other words, an opera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following incident serve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A young woman of Wisconsin was asked why college women graduates do not marry; the following was her answer: (147):

"You ask me why half of the Wisconsin girls don't marry.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y never could have married, educated or not educated,... a lot of the most attractive girls don't get to the seniors. The freshmen class always has the prettiest girls."What is implied here is evident and certainly needs no exposition.

While the marriage rates of women are not of such a suicidal character as deserving the sensational discussion prevailing nowadays, those of the other sex are in almost the same condition, The maximum unmarried rate among the male college graduates, so far as we know, is 33.3 percent, but the general percentage of single males is 38.7 percent up to 1910. It is true that the age distribu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here and the single males between 15 and 30 years of age should not be included for comparison with the college graduates, nevertheless it shows on the whole that the extent of the celibated intellectual male class could not be very much larger than the average. Besides, there is another side of the question, that is, the male college attend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1910 were only. 46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us constituting hardly two percent of the A class on our intelligence scale. So here again what is typical of a part should not be taken to characterize the whole. A. O. Powys has computed the marriage rate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N. S. Wales which are as the following:

	Marriages per 1000 Adults
Professional	32.81
Domestic	15.72
Commercial	29.46
Industrial	40.46
Agricultural and Mining	18.18

The marriage rates of the professional class as shown here then are just about the average. According to our third rule, therefore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re not towards a decidedly negative direction.

However, when the question of marriage rate i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that of fertility, we are liable to feel lost once more. For although there is about an average number of marriages taking place among the intellectual class, it is at the same time true that their marriage takes place considerably later than that among the other classes. As late marriage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subfertility, the equal chance for this class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is evidently thus overbalanced. Here is then a pragmatic question which deserves the foremost attention of every sociologist right now: if the age differences of marriage tends to upset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riage rate and the reproductive rat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ubmediocrites have a greater chance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n what way shall we direct our social control in order to minimize this effect to a negligible degree? This obviously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wo different measures: (1) To urge the upper class to marry earlier so as to compete with the other classes for the fertility of reproduction; (2) To check the reproductive rate of the lower classes, or if possible, eliminate altogether those in the lowest strata by segregation. Which of these is more conductive to the weal and welfare of society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next chapter.

It needs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analysis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opulation in this whole chapter is exceedingly partial. The paucity of data prevent any broad generalization, and inconsistency of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in every case makes even this partial analysis hardly satisfactory. The question of qualitative change of population in general, therefore, has not been definitely answered. But the way to answer it has been laid out. What we need is a more refined method of taking the census, and a general survey of human intelligence by the most up-to-date mental tests.

Chapter III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ifferential birth rate, and differential death rate are the bases of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 We are naturally led to contemplate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olling these changes, or combating the natural tendency if it were detrimental to the existence of society. The value of this attempt has never been denied; but practical measures to be taken have encountered divergent opinions.

In the first place we ha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Eugenics and Negative Eugenics. Negative Eugenics relates to the problem of preventing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defectives from perpetuating their defects through propagation. Positive Eugenics relates to the problem of improving the mass of mankind by the selection of the superior in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In regard to the prosecution of Negative Eugenics there is already a consensus of opinion, except that the scope of the dysgenic class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But whatever the scope is, the feebleminded, the lunatics, the paupers, the criminals, the epileptics, and other mental and physical defectives must go. The world is already too much crowded with population, the food quest is more and more pressing; thus if a por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bound to be weeded out, it is they. Formerly this "weeding-out" process was prosecuted by what Malthus called "positive checks", potty warfare, pestilence, famine, infant mortality, etc., etc. But the world is now too civilized to allow this old "ape-and-tiger" evolutionary way of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o operate any longer; it demands a positive intelligent measure to regulate the cosmic process, so that only the qualitatively superior, not a certain nation, nor a certain race, will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The justice of Negative Eugenics would be, perhaps more appreciated, if it were considered from still a different angle. The dysgenic class not only reproduces their kinds, but

also multiplies themselves faster than the average class. With the exception of idiots, all of them possess a normal amount of sexual instinct; and to the alarm of the whole world, it was found that pauperism is associated with superfertility. The family of Jukes is a typical example (28). In barely 145 years (1740 – 1875) a "jolly hunter and fisher and hard drinker" furnished no less than 1200 descendents to society, of which at least 233 were criminals excluding harlots and prostitutes. The families like Jues are many. The Narns, Zeroes, Dack, Ishmael, Sixties, Hickories, Hill folks are only those which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f they were free to multiply, the veneer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s certainly too thin to cover this hideous aspect of human deterior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 the methods to restrict these classes are no longer impossible. Of course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rid of all these classes which constitute no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for even though we can segregate all of them now, yet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the Law of Filial Regression,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portion of the dysgenic class recruited from the sound classes.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if the rate of multiplicstion of this class were decreasing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would be signally improving and that is all we can possibly desire at the present moment. (Chap. II, Princinles 9 and 10).

Aside from the segregation of the unfit, the policy to further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quality has met with the entithesis between the strict eugenis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trict euthenists on the other. The contention of these two schools began with Galton's publication of Hereditary Genius (39) and culminated at Ward's presentation of his "Applied Sociology" (138). The one held that genius not only runs in families but is also irrepressible, that the quantity of genius is elastic, viewing the fact that its number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at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human quality is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multiplication of this class; While the other maintains just the opposite point of view; that is, genius does not run in families; the quantity of genius at any time is fixed, and most of them have been held in check by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and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human quality is to plow the "neglected spot" and create a demand for geniuses, then they will come to market immediately, Thus Galton, apologizing for the social system, thought that no genius could be possibly thwarted by poverty or lack of opportunity. "For," says Galton, "if a man is gifted with vast intellectual ability, eagerness to work and power of working. I cannot comprehend how such a man should be repressed." With equal certainty, Ward defended his theory of "*Intellectual Equalitarian-*

ism" and he believed that by way of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y, the number of geniuses may be increased two hundred fold in a very short period.

Logically considered, both of these theories contain a partial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sufficiently proved that mental qualities are transmissible; and that much, even Ward admitted.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Galton's main thesis, that is, genius tends to be hereditary, But the second contention that is, genius is irrepressible which Galton tried to prove is certainly unproved all through. He first of all excluded all the repressed geniuses from his category of eminent men, and then proceeded to prove that there were no potential geniuses among the poverty class—furnishing a typical, example of drawing a negative conclusion from two positive premises. The instances which he took to support this proposition are still more fallacious. One of them is that "countries where there are fewer hindrances than in England, to a poor man rising in life, produce a much larger proportion of persons of culture, but not of what I call eminent man... " and the fact is, that in America before the year 1869 there had not been as many men in science, art and literature as in England. Genius at this time, of course, meant for Galton only scientists, artists and men of letters! It seems rather perplexing why Galton should insist on this point, as it is not at all essential to his main thesis; and the way he proved it is nothing less than a complete failure.

Ward's plea for equal opportunity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is sociologically necessary as well as fundamentally sound; for it is the only way to give every one a chance to do his be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 maximum capacity of all the social constituents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volume of social achievement, but also mitigate much unnecessary social misery, typical of an industrial, aristocratic society. The doctrine that education can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genius two hundred times is, however, problematical; and his theory of "Intellectual Equalitarianism" is no more substantiated than Galton's "Irrepressibility of Genius". All one can conclude from Odin's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on French men of letters which Ward quoted so much at length, is that there is an associated relation between the fertility of a community in men of letters on the one hand and city life,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and economical success on the other; but instead of an associated relation Ward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causal relation. Consequently an increasing opportunity,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al, would mean for him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of the quantity of geniu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we quoted more than half a dozen investigations on the intelli-

gence of children correlated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status of their parents, all of which show that the average intelligence of the children of those economically unsuccessful is inferior to the children of those more successful. These are at least a direct negation of "Intellectual Equalitarianism".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Ward to advance such a fanciful theory in order to justify his plea for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reason which we have once and again pointed out. Why Ward did so is perhaps more due to professional pride than scientific interest.

As for the furtherance of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by urging the talented men to marry early and rear more children, a thorough student will be skeptical about its final outcomes; for not only is the psychological attitude hard to alter and economical status difficult to break, but for the sake of quality, biological laws tell heavily against early marriage and superfertility. Ultimately he is at a loss to know why the decline of birth rates is a menace to civilization, since it ten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since by means of Negative Eugenics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could not be possibly negatively affected.

Of course, there are the race questions —the Anglo, Saxon superiority, the yellow peril — but here sentimentalists come in, and scientific students leave off for lack of reliable data.

To sum up: In this thesis, it is maintained that the fundamental study of social progress i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that individual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that the caus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partly hereditary and partly environmental, the former being slight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atter; that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changes through differential birth rates, differential death rates, and differential marriage rates; and finally that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may be realized by segregation of the unfit, equalizatl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but not necessarily an increasing rate of multiplication in general.

Bibliography

1. Adams, J.B., Zola's Study of Heredity. Jour. of Mental Science. 1916. 62, pp. 530–556.
2. Adler, M. Mental Tests Used as a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hool Children. Jour. of Educ. Psy. 1914. 5, pp. 22–28.
3. Bailey, William B. Some Recent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Pubs. of the Am. Stat. Assns. 1912–1913. 13, pp. 379–392.
4. Banker, H.J. Coeducation and Eugenics.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p. 208–214.
5. Beale, O.C. Racial Decay. Lond. A.C. Fifield, etc. 1911. 440 p.
6. Bell, A.G. How to Improve the Race.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1–8.

6a. Benedict, F.G. Human Vitality and Efficiency under Prolonged Restricted Diet.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9. 701 p.

7. Benington, R.C, Study of the Negro Skul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ngo and Gaboon Crania. Biom.. 8, 292 et. seq.
8. Bertillon, A. Signalistic Instruction Including 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nthropometrical Identification. English trans. Werner. Chicago. 1896. p. 260.
9. Billings, W.C. Oriental Immigration.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462–468.
10. Blagg, H.M.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nfant Mortality and Its Cau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 King. 1910, 44 p.
11. Blanton, S. Retarded School Children in Madison, Wisconsin. Psy. Clinic. 1917. 10, pp. 250–263.
12. Blumer, J.C. Marriage Rate of Iowa State College for Women. Jour.. of He-

redity. 1917. 8, p. 217.

12a. Boas, Franz.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New York. Macm. 1913. 296 p.

13. Bonar, James. Maltus and His Work. Lond. Macm. 1885. 432 p.

14. Bridge, J. W. and Coler, L. E. The Relation of Intelligence to Social Status. The Psy. Rev. 1917. 24, pp. 1-31.

15. Brown, William. An Objective Study of Mathematical Inheritance. Biom. 7, p. 352 et seq.

16. Burbank, Luther. The Training of the Human Plant. N,Y, The Century Co. 1907. 99 p.

17. Castle, C. S. A Statistical Study of Eminent Women. Pop. Sci. Mo. 1913. 82, pp. 593-611.

18. Chapple, W. A. The Fecundity of the Unfit. Whitcombe and Tombs ltd. Melbourne. 1903. 127 p.

19. Chase, J. H. Weakness of Eldest Son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209-212.

19a. Clarke, E. L. American Men of Letters. N. Y. Columbia Univ. 1916. 169 p.

20. Conklin, E. G.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17 550 p.

21. Conklin ,E. G. Value of Negative Eugenics.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538-541.

22. Constable, F. C. Poverty and Hereditary Genius. Lond. Fifield. 1905. 149 p.

23. Cook, O. F. Eugenics and Breeding.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30-34.

24. Danforth, C. H. Is Twining Hereditary? Jour. of Heredity. 1916. 7, pp. 195-202.

24a. Danforth, C. H. Resemblance and Differences in Twins. Jour. of Heredity. 1919, pp. 399-410.

25. Davenport, C. D. Heredity and Albinism. Jour. of Heredity. 1916. 7, pp. 221-224.

26. Davenport, C. D.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N. Y. Henry Holt. 297 p.

27. Dexter, G. E. Weather Influences. N. Y. Lond. Macm. 1904. 286 p.

28. Dugdale, Robert L. The Jukes. 4th ed. G. E. Putnams N. Y. Lond. 1910. 120 p.

29. Elderton, E. M. On the Marriage of the First Cousins. 1911. Lond. Dolan &

Co. 39 p.

30. Elderton, E.M. On the Relation of Stature and Weight to Pigmentation. Biom. 8, pp. 340－354.

31. Elderton, E.M.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Nurture and Nature. 1909. Dulan & Co. 40 p.

32. Ellis, Haveloak. The Problem of Race Regeneration. N.Y. Cassell & Co. 70 p.

33. Ellis, H. The Sterilization of the Unfit. Eug. Rev.1910. 1, pp. 203－206.

34. Estabrook, A.H. Heredity vs. Environment.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p. 41－42.

35. Fairchild, D. Twins. Jour. of Heredity. 1919. 10, pp. 387－399.

36. Ferguson, G.O. The Psychology of the Negro. Arch. of Psy. No. 36, p. 138.

37. Galton, Francis. English Men of Science; Their Nature and Nurture. Lond, Macm. 1874. 270 p.

38. Galton,F. Finger Prints. F.Y. Macm. 1892. 216 p.

39. Galton,F. Hereditary Genius. Lond. Macm. 1892. 379 p.

40. Galton,F. Inquiry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 Macm. 1883. 387 p.

41. Galton,F. Natural Inheritance. Lond. and N.Y.Macm. 1889. 259p.

42. Galton,F.Noteworthy Families. Lond. Murray.1906. 96 p.

42a. Gates, R.R. Heredity and Eugenics. Eng. Rev.V. Ⅱ, No.4, pp. 193－201.

43. Gini, Corrado. Superiority of the Eldest.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37－39.

44. Goddard, H.H.The Kallikak Family. N.Y. Macm. 1912. 117 p.

45. Goddard, H. H. Feeblemindedness: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 Y. Macm. 1914.559p.

46. Griffith, G.B. Measurements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Criminals. Biom,. 1904. 3, pp. 60－62.

47. Grossmann, M. P. E. The Exceptional Child. Chas Scribner's Sons. N.Y. 1917. 764 p.

48. Hamilton,A.E. Putting Over Eugenics.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280－290.

49. Hamilton, What to Say About Marriage. Jour. of Heredity. 1916. 7, pp. 77-81.

50. Hankins, F.H.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361-367.

51. Hankins, F. H. Adolf. Quetelet as Statistician. H. Y.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8. 134 p.

52. Hansen, Soren. The Inferiority of the First Born Children. Eug. Rev. 5, p. 252.

53. Heron, David. Inheritance Factor in Heredity. Biom... 10. p. 356.

54. Heron, David. On the Relation of Fertility in Man to Social Status, and on the Changes in this Relation that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Lond. Dolan & Co. 1906. 22 p.

55. Hollingworth, H. L. and Poffenberger, A. T, Applied Psychology. D. Appleton & Co., 1918. 337 p.

56. Hodlicka, A. Study of Old American.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 509.

57. Huntington, E.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15. 333 p.

58. Huntington, E. World Power and 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19. 287 p.

59. Ireland, A. Democracy and Accepted Facts of Heredity. Jour. of Heredity. 1918. 9, pp. 345-348.

60. Jastrow, J. 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N. Y. and Lond. D. Appleton & Co. 1915. 596 p.

61. Jastrow, J. Heredity and Mental Traits. Science. 1914. 40, pp. 555-556.

62. Johnson, R. H. Eugenic Aspect of Sexual Immorality.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p. 121-123.

63. Johnson, R. H. Marriage and Selection.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102-110.

64. Johnson, R. H. Selected Army Aviators by Tests; Not by Education.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p. 425-426.

65. Johnson, R. H. and Stutzmann, B. J. Wellesley's Birth Rate.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250-253.

66. Johnson, R. H. and Papenoe, P. Applied Eugenics. N. Y. Miaem. 1918.

443p.

67. Jordan, D.S. Prenatale Influence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38–40.

68. Kellog, V.L. Faces and Race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 249.

69. Knox, H.A. Tests of Mental Defect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122–131.

70. Kornhauser, A.W. The Economical Standing of Parents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 Jour. of Edu. Psy. 1918. pp. 159–164.

71. Laski, H.J. A Mendelian View of Racial Heredity. Biotm. 8, pp. 424–430.

72. Lewenz, M.A. and Pearson, K.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l Capacity and Craninl Circumference. Biom. 3, pp. 366–398.

73. McDonald. Mental Ability in Relation to Head Circumference, Cephalic Index, Sociological Condition, Sex, Age and Nationality. Quarterly Pubs. Am. Stat. Assn, 1911. pp. 798–806.

74. McComas. The Heredity of Mental Abilities. Pay.Bull. 1914. 11, pp. 379–383.

75. Marttn, Mr. and Mrs. John. Feminism. N.Y. Dodd, Mead & Co. 1916. 359p.

76. Mead, D.C. Height and Weight of Children in Relation to General Intelligence. Ped. Sem. 1914.21, pp. 394–406.

77. Miller, H.A. Psychological Limits of Eugenides. Pop. Sci. Mo. 1914. 392 p.

78. Morgan, C.L. Eugen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Lond. Ball. 1919. 82p.

79. Mott, F.W. Heredity and Engenics in Relation to Insanity. Lond, Prob. in Eugenics; Eugenic Educ. Soc. 1912. 1, pp. 400–428.

79a. Newman, George. Infant Mortaltty. Lond. Methuen & Co. 356 p.

80. Nitti, F. S. Popula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Lond. Sonnenscheirs & Co. N. Y. Chas. Scribner's Sons. 1894.

81. Paddon, M.E. A Study of Fifty Feebleminded Prostitutes. Jour. of Del. 1918. 3, pp. 1–12.

82. Pearl, R. Genetics and Eugenic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 388.

83. Pearl, R. Study on Man: Variation and Correlation in Brain Weight. Biom. 4, pp. 13–105.

84. Pearson, K. The Academic Aspect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Eugenics. Lond. Dulan & Co., ltd. 1911. 27 p.

85. Pearson. K.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pl. Lond. Arnold. 1897 2v.

86. Pearson, K. Darwinism, Medical Procuress and Eugenics. Lond. Dulan & Co., ltd. 1912. 29 p.

87. Pearson, K. Eugenics and Public Health. Lond. Dulan & Co., ltd. 1912. 34p.

88. Pearson, K. The Fight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the Death Rate from Phthests. Lond. Dulan & Co., ltd. 1911. p. 35.

89. Pearson, K.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in the Modern State. 2nd. ed. Cambridge Univ. Press. 1919. 97 p.

90. Pearson, K. The Groundwork of Eugenics. Lond, Dulan & Co. ltd. 1909. 39p.

91. Pearson, K.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Alcoholism on the Physique and Ability of the Offspring. Lond. Dulan & Co., ltd. 1910. 26 p.

92. Pearson, K. The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 Cambridge Press, 1914.

93. Pearson , K. Mendelism and the Problem of Mental Defect. Lond. Dulan & Co., ltd. 1913 - 14.

94. Pesrson, K.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Lond. A. and C. Black. 1901. 62 p.

95. Pearson, K. Nature and Nurture; the Problem of the Future. Lond. Dulan & Co. ltd. 1910. 31 p.

96. Pearson, K. On the Handicapping of the First Born. Lond. Dulan & Co., ltd. 1914. 68 p.

97. Pearson. K. The Problem of Practical Eugenics. Lond. Dulan & Co., ltd. 1909. 38 p.

98. Pearson, K. Social Problems: Their Treatment, Ps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 Dulan & Co., ltd. 1912. 40 p.

99. Pearson, K. Tuberculosis,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Lond. Dulan & Co., ltd. 1912. 46 p.

100. Pearson, K. Other Articles Appeared in Biom. V. 10.

101. Perrin, Emily. On the Contingency between Occupatlon in the Case of Father and Sons. Biom. 3, pp. 467 - 469.

102. Perring, L. F. A Study of the Comparative Retardation of Negro and White Pupils in Philadelphia Public School. Psy. Clinic. 1915. 9, pp. 87 - 93.

103. Phelps, E. B. A Statlstical Study of Infant Mortallty Quarterly Pubs. Amer. Stat. Assn. 1908. pp. 286 – 268.

104. Ploetz, A. The First and Last Child. Jour. of Heredity. 1914. 4, pp. 268 – 269.

105. Popenoe, P. Standford's Marriage Rate. Jour. of Heredity. 8, pp. 170 – 173.

106. Powys, A. O. Data for the Problem of Fvolution in Man. On Fertility, Duration of Life and Reproductive Selection. Btom. 4, pp. 233 – 286.

107. Phillips, J. C. Harvard and Yale Birth Rates. Jour. of Heredity. 1916. 7, pp. 565 – 569.

108. Pyle, W. H. The Mind of the Negro Children. School and Society. 1915. pp. 357 – 360.

109. Redfield, C. L. Great men and how they are Produced. Jour. of Heredity. 1915. 6, pp. 249 – 250.

110. Redfield, Results of Early Marriage.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 318.

111. Reinsch, P. S. The Negro Race and European Civilization. Am. Jour. of Soc. 11, pp. 145 et seq.

112. Reuters, E. B.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ulatto. Am. Jr. of Soc. 23, pp, 83 – 106.

113. Richards, E. H. Euthenics. Boston. Whitcomb and Barrows. 1910. 162 p.

114. Rowe, E. C. Five hundred forty – seven White and Two hundred Sixty – eight Indian Children. Tested by the Binet-Simon Test. Ped. Sem. 1914. 21, pp. 454 – 468.

115. Saleeby, C. W. Eugenics and Genius.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544 – 546.

116. Saunders, C. Pigmentation in Relation to Selection and Anthropometric Characters. Biom. 8, pp. 354 – 385.

117. Schuster, E. First Results from the Oxford Anthropometric Laboratory. Biom. 8, pp. 40 – 51.

118. Schuster, Methods and Results of the Galton Laboratory for National Eugenics. Eng. Rev. 3, p. 10.

119. Smith, M. R. Statistics of College and Non – College Women. Quarterly Pubs. of the Am. Stat. Assn. 1900. 7, p. 1 ff.

120. Snow, E.C. On the Intensity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Man. Biom. 9. pp. 58 - 69.
121. Spencer, H. The Principle of Biology. N.Y. D. Appleton. 1882.
122. Starch, D. The Similaritie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ental Traits. Psy. Rev. 1917. 24, pp. 235 - 238.
123. Terman, L.M., Lyman, G., and others. The Stanford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Binet Simon Scale for Measuring Intelligence. Baltimore. Warwick and York, Inc. 1917. 179 p.
124. Terman, L. M.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Houghton, Mifflin Co. 1916. 362 p.
125. Thompson, W.S. Population: A Study of Malthusianism. 1915. N.Y. Longmans, Green & Co. 216 p.
126. Thomson, J.A. Heredity. Lond. Murray. 1919.
127. Thomson, N.H. Environment and Efficiency. N.Y, Longmans, Green & Co., 100 p.
128. Thorndike, E. 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 1913 - 14. 3v.
129. Thorndike, E. L. Emperical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Measurement. N.Y. The Science Press. 45 p.
130. Thorndike, E. 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ental and Social Measurements. N.Y. The Science Press. 1904. 212 p.
131. Thorndike, E. L. Measurements of Twins. N.Y. The Science Press. 1905. 64 p.
132. Thorndike, E.L. Ventilation in Relation to Mental Work.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 1916. 83 p.
133. Thorndike, E. L. Heredity, Correlation and Sex Differences in School Abilities. N.Y. Macmillan Co. Berlin, Mayer and Huller. 1903.
134. Titchener, E. B. Anthropometry an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Phil, Rev. 1893. 2, pp. 187 - 192.
135. Titchener, E.B. Psychophysics of Climate. Am. Jour. of Psy. 1909. 20, pp. 1 - 14.
136. Uchida, Ginzo.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Color of Hair and Eyes in Man. Biom. 3, 467 ff.

137. Ward, Lester F. Applied Sociology. Boston. N.Y. Ginn & Co. 1906. 384 p.
138. Ward, Lester F. Glimpse of. the Cosmos.. N.Y. Lond. G. P. Putnams. 1913－1918. 6v.
139. Weidensall, J. The Mentality of the Criminal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riminal Women in a Series of Mental and Physical Tests. Educ. Psy. Mono. No. 14. Baltimore. 1916. 332 p.
140. Welden, W.F. R. Mr. Bateson's Revision of Nendel's Theory of Heredity. Biom. pp. 286－299.
141. Whipple, G.M. Manual of Mental Tests. Warwick and York. U.S.A. 1914. 2v.
142. Wilcox, W.F. Differential Fecundity. Jour. of Heredity. 1914. 5, pp. 141－148.
143. Wilder, H.H. Physical Correspondence in Two Sets of Duplicate Twins. Jour. of Heredity. 1919. 10, pp. 410－422.
144. Williams, J.H. A Study of One Hundred Fifty Delinquent Boys. Research Lab., Buckel Foundation. Stanford Univ. 1915. 1, pp. 3－15.
145. Wolfe, A.B. Readings on Social Problems.
146. Woods, F.A.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Heredity. Science, N.S. 30, pp. 205－210.
147. Annon, Coeducation and Marriage.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p. 44－45.
147a. Woods, F.A. The Birth Place of Leading Americans and the Question of Heredity. Ibid. pp. 17－21.
148. Woods, F.A. Law of Diminishing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Pop. Sci. Mo. 77, pp. 313－316.
149. Woods, F.A. 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 N.Y. Holt & Co. 1906. 312 p.
150. Woods, F.A. Significant Evidence for Mental Heredity. Jour. of Heredity. 1917. 8, p. 105.
151. Woods, F.A. Twins Prove the Importance of Chromosomes. Jour. of Heredity. 1919. 10, pp. 423－426.
152. Woods, F.A. Definition of Heredity. "Nature vs. Nurture". Not a good Expression. Ibid. p. 426 ff.
153. Yerkes, R.M. The Binet vs. the Point Scale of Measuring Intelligence. Jour.

of Applied Psy. V. l. pp. 111－112.

154. Yerkes, R.M. and Anderson, H.M.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tatus as Indicated by the Rresults of Measuring Mental Capacity. Jour. of Eduo. Psy. 1915. 6, pp. 137－150.

155. Yule, G. Udn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tatistics. Lond. Chas. Grtffin & Co. 1916. 382 p.

156. Thir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 of Great Britain. Supplement on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原作打字稿存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档案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It is easier to speak with definiteness on problems concerning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ethnolog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an those concerning anthropology. The reason is not far to seek. Anthropology as a science, if it has long been conceived, is not yet born. It may never become a science. It has a greater chance to become a system of philosophy. But it is a good term to retain and useful for more than one purpose, since in the family of scientific vocabulary, it alone comprehends all the phases of humanistic study. One of its many definitions that has been banded down to us since its inception as a branch of scientific inquiry is: it aims to study man and his products. Ignoring the metaphysical dilemma upon which this definition rests, an anthropologist may enthusiastically go on working out his problem with a perfect good conscience that he is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is great study of humanity. He is justified to do so. But his results will be either archaeological, ethnological or linguistic, or any other of a sub-anthropological nature rather than anthropological in the strictest sense. They can be valuable only discreetly.

Anthropology conceived as a concourse of all humanistic studies has an inherent difficulty to tackle with. It all depends whether man can study himself in a really scientific sense, whether as William James once so curtly put in his discussion on introspection as a scientific method, one can see the form and color of his own eyes by turning his eyes rapidly. The European answer to it is of course not to answer on the very sensible ground that it has never been answerable. One may almost say to himself with a feeling of relier that since there are definite groups of phenomena known by the term; Man, and others. His products, why not study them as they are inductively with the recognized biological principle of evolution as the guidance! This has been the course generally pursued, and speaking at large , the posi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ean anthropologists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at is probably the only course from an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int of view. But a Chinaman is not necessarily bound to take it, even he wants to study anthropology. Nor does he have the right to, as he lacks that great history of scientific scholarship as his background which is at once the pride and burden of all Europeans. An Easterner is to be benefited by a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negative. For failures are always to be avoided, while achievements shift their valu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us need constant reexamination. To this rule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forms no exception.

In the long list of eminent scientis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re is perhaps no abler biological thinker than Darwin whose discourse on evolution culminates all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lmost divine attempt of Herbert Spencer to fit all natural phenomena into his conceived and conceivable pattern of evolution has never been challenged in regard to its fundamental premise. Today the one thing that a school teacher is sure to know is that man is descended from a kind of monkey. He will tell you that in the course of time, Baboon begets Gibbon, Gibbon begets Chimpanzee, Chimpanzee begets Gorilla, Gorilla begets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and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begets Man – strangely reminiscent of the Chapters on Genesis except the garment has changed its shape.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 is literally saturated with Darwinism. Only lately, one eminent anthropologist has made this remark: anthropology is essentially a Darwinian science, accept Darwinism or reject anthropology. One discerns immediately that the Zeitgeist with which more than 10 000 articles on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have been produced is still having its palmy days and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Rhodesiansis is likely to produce another scientific storm sweeping over five continents.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any one to renew the Agassizian controversy over Darwinism just now. Yet it does not take one long to find that the Darwinian tyranny, enlightened as it is, is irritating in many respects to those who ar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humanistic study. One finds too that some of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its meaning are extremely hollow.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only one of many examples that one can cite. Nor has there been a single successful experiment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heredity on which the whole Darwinian formula hangs. The net result is that there are as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Darwinism as the number of interpreters. Thus it rivals the Concept of God as a topic for speculation.

But Darwinism has stimulated research. As an working hypothesis it still offers an immense potentiality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danger spot of the whole theory, which one apprehends, lies in its ossification with age into a rigid dogma which would deaden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at has been originally stimulated by it, and that unfortunately seems to be the present tentheory in regard to the increasing zest shown by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for anthropological study; it points out that this zest is impelled by their curiosity to prove how civilized they are rather than a real scientific interest. This may also serve to explain the ponderous faith of Europeans in human progress and incidentall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Greco－Roman Mania. Whatever one may say, Europe is on the tip－top of civilization, and will always be so as long as there are heaven and earth. All anthropologists, therefore, must do their homage to the classical scholars from an European point of view. If any European dares to break this tradition, he will be ostracized and considered as an outlaw to his class defying their ancestral God: which is the greatest triumph of Darwinian dogma.

Of course, no seriously minded person would belittle the tradition of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or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s a pure hypothesis. It is altogether a different argument than self－pooled esteem that should lead an Easterner to start his scientific inquiry with thorough skepticism. Nothing harms one's mental habit so much as the acceptance of other's conclusion without first of all living through with their premises. The Chinese as a race is just beginning its serious scientific career; the first item on its programme, if it works, ought to be an examination of all the Western scientific dogmas by studying their details. Moreover, his task is not only to de-Europeanize science, but also denationalize himself as far as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object of his study is concerned.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hose whose course of scientific pursutit is more of a humanistic nature in which the *ego* has a greater part to play.

The arguments advanced so far are intended to show that th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are more than a purely technical question.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to solve. We need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anthropometrical survey, an ethnographical survey and a linquistic survey, all of which require a vast amount of energy and great ingenuity for solution. Their immediate solution is the mo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dispel some of the commoner misconceptions about China entertained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creat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by the pseudo－scientific attempt of some over-enthusiastic and self-appointed authorites of the Far East. But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ese problems, while difficult, are not baffling. Given time and money, they are capable of being solved within a fixed period. Looking from a different angle into this field, a Chinese anthropologist would feel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transcending his national boundary. There are general problems which he alone, by virtue of the peculiar position that he occupies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can solve and from which responsibility he has no reason to evade. This brings us to th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of China in its truest sense.

Certain premises have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before these problems could be brought out in the right perspective. They are time and changes. All genetic studies have time as their background. Anthropology if rightly studied is essentially a genetic science and depends mainly for its results o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method. It is in this sense only that anthropology may be considered as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for the only logical meaning of evolution is also the simplest, namely, time accompanied by change. As such, it does take a Hackle to speak of its final works, for the ancient Greeks have defined it for us long ago. When Herbert Spencer elaborated it in term of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he not only smothered the soul of this term but also betrayed a refreshing ignorance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unconsciously led his younger contemporaries astray. It is he together with Huxley who are more responsible for the hunting expedition of all European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for Man in "his bodily frame the indelible stamp of his lowly origin" than Darwin's own word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this, so far as it serves only as an impetus for further research: but it resulted in a distorted proportion of our knowledge about ourselves. Now we know a great deal more about our bones and muscles thus, linking our stock with the Simian family with a great deal of pride, than our own mind. The reason is that evolution in the Spencerian sense finds more confirmation in one's body than in one's soul.

Yet it is commonly admitted that the study of man must begin with that on his very self as a separate entity, rather than through the sounds that he could utter, the metals that he could shape or the institutions that he could build. This forces us back to face the metaphysical dilemma to which we have a moment ago referred. In the light of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it is altogether too early to give an adequa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man can study his self. But the peculiar position of a Chinese who has acquired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as an organ of thinking in addition to his own native tongue suggests at least a possibility of avoiding this metaphysical dilemma.

For it may be argued, much of the difficulty arising out of the study of our own mental constitution is due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rendering an impartial account of it by the very language with which the mental habit is formed. The Chinese linguists, and the European orientalists too should they acquire it as a part of their mental equipment rather than as a fulfillment of their simple curiosity, have obtained a mirror. If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does effect the mode of thinking, the knowledge of a second tongu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would give him a clear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al mode.

It is the writte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spoken language that are meant here. Language has been traditionally treated by European scientists as a collection of sounds instead of an expression of something inner and deeper than the vocal apparatus as it should be. The accumulative effect of language-symbols upon one's mental formulation is still an unexploited field. Dividing the world culture of the living races on this basis, one perceive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of its types between the alphabetical users and the hieroglyphic users,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virtues and vices. New with all respects to alphabetical civilization, it must be frankly stated that it has a grave and inherent defect in its lack of solidity. The most civilized portion under the alphabetical culture is also in habited by the most fickled people.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and repeats the same story over and over again. Thus up and down with the Greeks; up and down with Rome; up and down with the Arabs. The ancientic Semitic and Hametic peoples are essentially alphabetic users, and their civilizations show the same lack of solidity as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Certainly this phenomena can be partially explained by the extra-fluidity of the alphabetical language which can not be depended upon as a suitable organ to conserve any solid idea. Intellectual contents of these people may be likened to waterfalls and cataracts, rather than seas and oceans. No other people is richer in ideas than they; but no people would give up their valuable ideas as quickly as they do. Westerners have called their civilization dynamic which is essentially true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nature of their language. But its mobile part is that of Tennyson's man rather than that of his brook, for it apprehends its coming by going and never stays. "Nothing is new under the sun" is an European proverb; yet every European tries to get something new everyday, and also gives it away as soon as they have got it - a defect inherent in their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by all means the counterpart of the alphabetic stock. It lacks most of the virtues that are found in the alphabetic language; but as an embodiment of simple and final truth, it is invulnerable to storm and stress. It has already protecte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forty centuries. It is solid, square, and beautiful exactly as the spirit of it represents. Whether it is the spirit that has produced this language or whether this language has in turn accentuated the spirit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The proposition laid out here is not for moralizing but for experimentalization. It is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of China. The science of psychology has already reached a stage of development at which an anthropologist may utilize its result to his advantage. The influence of lines and forms exerted on the mental content of a psychological observer has long been reckoned with. Certainly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an intricat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 of a written languag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origin, growth, formulation and mobility of ideas on the other, which could be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If in term of an alphabetical language, one can describe the influence of hieroglyphic writings on his thinking mode, and then reverse the process to identify the result, it would not be too much to expect that man has finally achieved a method to study his most supreme self in the most objective way.

To study linguistics on a psychological basis as an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is by no means a radical idea. It is the only logical outcom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for the study of man. To correlate language, culture and race with each other has already became an obsolete anthropological game. Classification of mankind on different anatomical basis could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as the final goal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 just as 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organism can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 of biological study.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anthropological problem at all; or granting that it is still of some use, whether it should rest on an anatomical basis. But at any rate, it could be considered only as a means for further end. The most waywar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thropological study is the gross assumption by anthropologists of a concomittant variation between body and mind. This is due more to the lack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han any other single cause. The only remedy for it is a genetive study of mind for which the hieroglyphic alphabetic method has been proposed.

To study mind on its own account and ascertain its different types and laws in order to give a more vital stimulus to anthropological study as well as a liv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isting anthropological data must be based on a broadly defined principle of evolution rather than by restrained Darwinian formulae which necessitates the assumption of a monotypical nature and hampers the range of investigation. The two types of language, for instance, which we have considered can not be possibly explained on the old-fashioned ev-

olutionary basis. This bilineal development suggests plainly other cultured phases of a similar nature, and sufficiently warrants us to take departure from the orthodox anthropological method.

If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are of logical possibilitie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other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are to be deduced therefrom. Of course, everybody is interested i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other races. In the light of our present knowledge, which is extremely limited, it is to be said that the Chinese are extremely heterogeneous and their origin is quite obscure. Thus it justifies a thorough anatom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urvey not noly of the Chinese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Aborigines foun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he Tibetans, Mongolians, and the Siberians, all of whom have contributed their quota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To this must be added the linguistic study by means of phonology, which, however, can be of use only as an accessory to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 As for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material culture, they are closely dependent for their interpretation upon a revelation of the Chinese type of mind which I consider a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 alphabetical races. Facts are what we need to prove this thesis. The duty of a Chinese anthropologist at present is to collect facts.

原载美国巴尔的摩《中国留学生月刊》(英文)第 17 卷第 4 期(1922 年 2 月)

Archaeology

Antiquarian studies in China began to develop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ung Dynasty (A.D 960 to 1126). They enjoyed a glorious perio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during which a solid foundation was laid for later development. The classical revival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cluded a very strong current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which has been rightly consider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Sung scholarship. Western science began to affect China seriously,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 the concept of modern archaeology in China may be said to be developed from two entirely different, but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radi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is related to that special branch of classical learning known as the *Study of Metals and Stones*; and on the other, to the field explorations and excavations, which were first developed in the science of geology and biology, and from which archaeology in the West has been gradually evolved. Such being the case, archaeology, therefore, unlike most other natural sciences which have come to China unprecedented, serves best to link together modern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n order to make a proper estimate of what is being done at present and what can be achieved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hat something should be known of China's antiquarian past.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a paper publish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Wang Kwo-wei(王国维) on *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 [1] he pointed out the distinct achievements bv Sung scholars in archaeology, in seveal different fields. The more important of these are collecting, recording, and

[1] The China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VI., No. 3, pp. 222 – 231.

identifying. In all these their merits rank very high; some remain unsurpassed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is is only part of the result of a broad intellectual movement of the Sung Dynasty, which yielded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many different spheres. The whole move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a great deal of constructive effort; many of the monumentai works on history, treasures of Chinese spiritual possessions, date from this period. While the interest in antiquits was no doubt a phase of the historical mentality of the time, it attained a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very beginning. Works on this subject left to us from this period are strangely modern in many of their ideas. It is true that there was neither historical nor comparative method, nor any attempt at a comprehensive system, but the effort aimed at accurate presenta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many of their identifications are quite praiseworthy. *K'ao Ku T'ou* (考古图) and *Po Ku T'ou* (博古图) published betwee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A. D. are more than a collector's handbook. In them a system was created for recording and reproducing antiquities, which, except for minor details due to improvements in modern printing, has been taken as a model of all treatises on antiques till the present day.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test the accuracy of their measurements or reproductions, but their aims at being accurate are more than obvious; and the ingenuity and correcmess of most of their identification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modern criticism. As printing was at that time already invented, so the vogue of collecting spread fast. What is more remarkable is that the fashion of collecting was created and maintained chiefly by private individual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well-known collection is an Imperial one. Thus Professor Wang says in his paper on "Archaeology in the Sung Dynasty":

"Remarkable as was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the fashion of collecting ancient objects, however, was created by private individuals. History records that Liu Ch'ang (刘敞), when governor of Yung Hsing, (永兴 present Hsianfu in Shensi), secured eleven objects of pre-Ch'in periods; and that Li Kung-lin(李公麟), having a wide acquaintance with objects of antiquity and being skilful in judging them, showed such enthusiasm, that whenever he heard of an object of value, he would not hesitate in the least to pay a price of a thousand taels. Books such as Lu Ta-lin's (吕大临) *K'ao Ku T'ou* (考古图), *Hsu K'ao Ku T'ou* (续考古图) by an unknown author, Wang Fu-chai's (王复斋), *Chung Ting K'uan Shih* (钟鼎款识), and the appendices (跋尾) of the *Tsih Ku Lu* (集古录) and *Chin Shih Lu* (金石录), very frequently record the names of the collectors underneath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objects. The collectors thus recorded numbered no less than several

scores . . . . "(p.223).

The scope of those collections included mainly bronzes and jades, but coins and some kinds of stone work were sometimes also included. Although they concentrared most of their interest on inscriptions, it is the merit of the Sung archaeologists that they were able to see, in the antiques which they were collecting,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ancient institutions, It was the common belief of the Sung antiquarians that it nedeed men versed in rituals to know the usage of antiques. Thus they made two great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gradual building up of an antiquarian science in China: namely epigraphical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 of forms, besides their persistent effort in collecting, re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I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or so, they created a new science and perfected a new technique.

This new science, founded by a group of Northern Sung scholars, was ably continued even after the disastrous event of the Tsing K'ang (靖康) era when the Golden Tartars raided the capital city at K'aifeng and made it a ruin. In fact it continued to the very end of the Sung Dynasty. Many notable treatises on antiques were produced in the later period.

Owing to this continued activ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science was laid firmly; so even after a total lapse of almost five hundred years, it still retained enough vitality to give new strength to the classical revival in the Manchu Dynasty. "During the 150 years, from the middle of Chien Lung's reign to the present, marvell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 . . "says Liang Chi Chao in an address in honor of the visit of the Crown Prince of Sweden to China. "The number of books on archaeology is truly astonishing. I am familiar with at least 400 books which I consider a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is subject,"[1] he continued. The works of this period, however, deviate very little from their Sung prototype; but they have attained greater accuracy, and are worked in greater detail. They are on the whole better epigraphists. Owing to the intensive interest in textual criticism of this period, antiquarian studies were much encouraged, as they offered so much new material, and were evidently helpful in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Yüan Yüan(阮元), who edited the famous *Huang Ch'ing Chin Chieh* (皇清经解), is also the author of *Chi Ku Chai Chung Ting I Ch'i K'uan Shih*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one of the first treatises on bronze inscriptions written in this period. From

[1] Reprinted in the Smithsonian Report for 1927, pp.453－466.

Yüan Yüan's time on, a long list of scholarly antiquarians has followed, until it gradually merges into an intermediate stage when Western influence began to penetrate. The result of the contact of this influence with the old tradition is the birth of a new archaeology in modern China.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is period is the advancement of epigraphical studies, of which the Sung antiquarians made oniy a start. They also showed a more diversified interest, and produced special treatises on bricks, tiles, seals, and other antiques of a given locality. It is only fair to say tha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ditional antiquarian science had already developed to such a stage that it was only a step from the standard of Modern Archaeology. Wu Ta-chêng's (吴大澂) treatise on jade, and his study of early inscriptions, for instance, can stand comparison with any modern scientific treatise of a similar nature. It is an even bet whether or not traditional archaeology in China would have advanced to the modern stage even without Western influence! It is at any rate obvious that without such a background archaeology would not hav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An Intermediate Stage

Before we discuss recent works, it is worth while to note how Western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antiques have reacted upon the classical school of China. In this connection, two great events need special mentioning: one is the discoveries of the Tun Huang (敦煌) Manuscripts, and the other is the activity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I have no space here to relate in any detail the story leading to the discover of the Tun Huang treasury.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may be referred to the publications of Aurel Stein[1] and Paul Pelliot.[2] This discovery has influenced the classical school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most profoundly, and it proves convincingly to the conservative Chinese learned world how much more fruitful is field exploration than mere book pursuit, even in classical study. This stage of reaction was brought forth by a very fortunate circumstance; that is, the Tun Huang manuscripts are both rich and variegated, and relate to a period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1]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Chapter XIV, pp. 491 – 511. *Serindia*, Vol. II. Chapter XXI – XXII, pp. 791 – 830. Innermost Asia: Chapter X, pp. 343 – 370.

[2] Paul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nag*. Paris 1922 – 24.

ag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books. Some of the best minds of the last generation were occupied with the study of this new discovery; the results are almost revolutionary. A perusal of the works of Lo Chén-Yü (罗振玉) and Wang Kuo-wei, two of thc most eminent schoiars, whose acrivity may be properly assigned to this stage, show, that what makes their achievements enduring is their opportunity to studv these new materiais.

Meanwhile some energeric minds began working along a different line, which was bound to exercise a healthful influ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quicken the birth of a modern archaeoiogy in China. I mean to refer to the activity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The survey was estabiished for a derinite purpose, which is being successfully fulfilled; besides, the have found enough energy to pay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the psychozoic period. This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archaeological works culminating in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But the works that have a more immediate bearing on archaeology are those undertaken by J. G. Andersson, Swedish advisor to the Survey, in Manchuria, Honan, and Kansu, where he found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totally unknown before, and whose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roused a great deal of speculation. [1] An intense intere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stimulated by these discoveries.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finally and totally convinced of the great possibilitie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nons; plans for such activity have begun to mature.

Recent Works

The confluence of traditional antiquarian studies and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 has necessitated a readjustment of viewpoints, and brought forth not only an improvement of technique, but also a complete review of all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It must be said that such a process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complete; what is being done at present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From a purely archaeological viewpoint, 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arly antiquarians,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never thought worth consideration b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which have gained their importanc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When China is now viewed not as an isolated unit by itself, but merely a fragment of the total

[1] See the various works of J. G. Andersson published by the Geological Suryey: the more important of these are: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23; *The Cave Deposits of Sha-Kou-T' un in Fengtien*, 1923;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1923.

humanity, one finds that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s, totally disregarded by early antiquarians, become extremely informative and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China is an extremely rich field which has just begun to be explored.

Man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like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 the Historical Museum, and the Tsing Hua Research Institute began to take up these new problems, and became interest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last decade. Althoug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carry out all the plans, sporadic work has been done from time to time, and some of it has been done meritoriously. However it remains fo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o be the first sponsor of seriou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The recent work undertaken by the Institute in Anyang[1] (安阳) deserves special mention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t is thoroughly modern in its planning; it is one of the key-sites of North China; it has yielded abundant results; and above all, it has been of interest to both the early antiquarians and the modern archaeologists. So it may be taken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recent work done in this field.

This site first became known to the antiquarians in 1899, when some curio dealers brought some inscribed bones from this site to Peking,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Wang I-yung (王懿荣), a great scholar and statesman who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eir importance and began to collect them. He died in the Boxer's time, the year following. His collection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Liu Tieh-yün (刘铁云), who was the first to make rubbings on these inscribed bones, and publish them in book form. Then it vats followed by some periodical bonerushes among the curiodealers, a great deal of serious work, and some very interesting episodes when these new materials were struggling for recognition. During this period serious studies were made chiefly by Lo Chên-Yü, and Wang Kuo-wei, who deciphered about half of these newly discovered characters,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is new branch of palaeography.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work were carried on with a great deal of opposition from other quarters. Chang Ping-lin (章炳麟) for instance, one of th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time, who is in certain sense radical in his political thought, but conservative in his literary ideas, considered these materials as forgeries. Nevertheless, studies were carried on and new inscrilbed bones were added to the market

[1]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ititurion, has been for many years, actively interested in archaeological works in China. The expense for the Anyang excavation for the year 1929 was equally shared by the Institute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ith which the author was connected for five years, and to which he is glad to be able to acknowledge his indebtedness.

every day. The actual site was eventually ascertained. Lo Chên-Yü had the originality of visiting it himself but at that time he considered the site, so far as the inscribed bones were concerned, as already exhausted. All the while it never occutred to anybody that excavations might be fruitful.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was organized in 1928. In the very beginning, arehaeological excavation has been taken as one of its regular enterprises. Anyang was chosen as the first site for work. In less than two years time three seasons' diggings have been done. 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ce the results achieved have received attention all the world over. It may be truly said that since this work started, modem archgeology has made a beginning in China.

Previous to the excav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ur knowledge of the Anyang site was confined to the inscribed bones. It was also known that it was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Shang Dynasty (商朝), and that many other things were found together with these bones. But the knowledge of the latter was so imperfect that scientifically speaking it was almost worthless. Meanwhile, the site was badly destroyed by the reckless plundering of curio-dealers for almost thirty years. When the Institute first began to work, many thought it already too late. But through careful planning, methodical procedure, and detailed observations, the field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extraordinary success.

Among the many discoveries that have been made, some are of such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hat they deserve more detailed treatment. Through strarigraphical studies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determine definitely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various associated finds.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the condidons that led to the final abandon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fter the abandonment have all become observed knowledge. It can now be categorically laid down that Hsiao-t'un Ts'un (小屯村), where the digging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ree seasons, was once part of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Shang Dynasty, sometime between 1400 and 1200 B.C., but it was deserted during the final collapse of the Dynasty. The place has never again been occupied as a city site.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 of artifacts that have been taken out from the buried city are inscribed plastrons and scapuiars that wer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divination. On them are inscribed the queries made and answers given in consuitation, in archaic characters, which are more primitive than the oldest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previously known. They represent undoubtedly one of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riting, trom which the later ones have graduallybeen evolved. It has been possible after many

years of patient work to trace, gradually, such development.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of these characters, about half of the total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can be definitely deciphered. The contents of these inscriptions are therefore quite readable and prove to be very rich.

The royal house of the Shang Dynasty were faithful observants of oracles. Judging by the great abundance of these bone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inscriptions, it is quite definite that oracles regulated even the minute details of the conduct of the king. Whether it was an act of performing a sacrifice, or taking a trip, going out hunting or fishing, inquiring about the weather, or sending out an expedition, the cracks of the bones must be consulted; answers were found in the signs of these cracks, which the king evidently had to obey.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inscribed bones have been found in such great abundance and with content so rich that from them a great deal of the lost history of that period,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can be reconstructed.

Important as these inscribed bones are, the associated finds are no less so. Inasmuch as the time can be approximately defined, the material culture, as revealed in the artifact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is period, con both substantiate the verbal statements on the bones and, to an even greater extent, supplement them. A great deal of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culture of this period depends almost entirelv on such finds. For instanc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ind out from the inscriptions whether the Shang people of this period were still in the stone age or had already begun to use metals; if they used metals, to what extent. The stone or metal objects themselves furnish the exact data. By means of careful stratigraphical study we know for certain now that the Shang people of this period had already mastered to a very advanced degree the secret of casting bronze. They made weapons, ceremonial vessels, and many ornaments of this metal, and developed an extensive bronze industrv right on the spot, as proved by the remains of moulds, bronze ore, and slags attached by copper rus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pper and tin supply must have been somewhat limited, so a great number of urensils were still made both of bronze and stones, such as axes and knives, etc.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how and prove that in this period people were using both stone and metals, is, I believe, a great conttibu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furnishes new materials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migrations of early cultures.

Ceramics, which are basic archaeologieal materials, have been found in great quantity. They consist of many fundamentaily different types, easily proven to be an aggrega-

tion of different local productions, as is to be expected of a metropolitan culture. In spite of its aggregative character, the ceramics on the whole share certain individual traits typical of this period. For instance they are all monochrome and decorated by incised line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aeneolithic Yang-shao (仰韶) ceramics, which are polychrome and decorated by paintings. Survivals of Yang-shao wares were discovered on this site. This discovery is of some importance because it helps to determine the lower limit of the age of Yang-shao which has never been definitely fixed.

The finds also contain many decorative works of shell, stone, and bone, illustrating profusely the art of the period.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on the whole are quite consonant with the traditional ideas relating to the art of the period, only proving to be more luxurious. When they are worked ou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rious surrounding centres that were contemporaneous with this culture.

There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finds from this site; many are still in the hands of specialists whose opinions are being awaited as to their real significance. Even these few are suffcient to show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contents and the importance that may be attached to them. From an archaeological viewpoint it is most fortunate that this site should have been chosen for the first serious work. When the materials are thoroughly studied they will help to clarify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and serve as standard of definite value by which others may be compared and judged. In other words we have got a key site in North China, gradually worked out and found a guide to direct our search in the archeaologicai maze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Future Prospect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has already created a widespread interest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China. To follow up this work many plans have been made by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museums to excavate early remains. It can be safely predicted therefore that as soon as the country is polirically settled there will be a flourishing period of archaeological diggings. But from practical extperience can we say anything about the archaeological prospects of this country?

I have been told that when Sir Flinders Petrie first went to Egypt in 1880 he was not at all encouraged by any of his senior workers; the fact was that Egypt seemed to many

experts at that time to have been archaeologically exhausted. Fifty years have now passed since his first triangulation of the Pyramids in Gizeh, and many undreamed of discoveries have been made, one after another in this period; yet, to this day, Egyptology seems to be a field for young archaeologists just as alluring as it was fifty years ago. China possesses an ancient tradition and is just beginning to be explored. Results of the recent works prove most substantially that the spade can work just as many wonders here as it did in other old countries.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China will certainly be written on materials to be recovered from this source, as has been the case with Mesopotamia, Egypt, Greece, and Rome.

原载陈衡哲主编的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论丛》,为其第十一章,1931 年版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The following abstract is based on a larger work in Chinese, compiled by Messrs. Fu Ssû-nien, Hsü Chung-shu,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Fang Chuang-yu, Fellow of the Normal College of Peiping. All Available sources of materials have been examined, comprising of Archives, Dynastic Histories and modem research works.

Manchuria in history is, of course, only part of Chinese history. Definite mention of this terri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welfth century B. C.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Out of the large mass of such historical data,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may be said to be their broad features:

1. As early as the aeneolithic time, both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South Manchuria belonged to the same area as North China.

2. Since the later part of the twelfth century B. C., both Korea and part of South Manchuria were ruled by a princely house of Chinese origin.

3. Activ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ver this area began about the fourth century B. C. and was intensified in the Han dynasty after Emperor Wu's conquest in 109 B. C. Many Chinese from interior settled in Liaotung in this period, and the rudi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were more and more adopted by the Non-Chinese tribes. Fo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South Manchuria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4.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fourth century A. D., the Non-Chinese tribes one after another asserted itself, but in each case the process was about the same; (a) learning som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b) self-assertion and declaring independence, (c) greater Sinicization, and free mixing with Hanjen, or Chinese from the interior, and (d) complete absorption by the Chinese.

5.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at is about 1372 A. D., Manchuria was

again governed within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is laste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nterrupted for a short period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uring the dynastic change.

6. The center of Chinese influence in Manchuria had always been along the Liao River Valley and the Liaotung Peninsula where the Chinese settlement began from the time immemorial and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Non-Chinese tribes in the North and in the East, one after another, came under this influence, thereby acquiring both the art of war and the art of peace. The socalled "Manchus" or the "Bannermen" who gave rise to the Ch'ing Dynasty to China were originally composed of Nüchêns, Mongol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Liaotung. It does not represent any "race" in an ethnical sense, as many seem to believe.

7. The ancestors of the Ch'ing Dynasty "served the Ming Empire very loyally for many generations."[1] When they succeeded Ming in 1644 A.D., they had already acquired all the Chinese ideas about government, morals and education. Thus their occupation of Peking represented only a dynastic change, which happened so frequently in China in the past. They made no attempt to change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either in Manchuria or elsewhere.

8. Till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witnessed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a gradu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Manchuria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recent period however must be left to other experts.

Part Ⅰ Proto-Historical Phase

Manchuria or "Manchou" as a geographical name appeared very late. Modern historical researches have proved that it was an intentional substitution of the older term "Chienchou" (建州), which was used to denote a part of modern Manchuria at least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and through all the successive periods, Liao, Chin, Yuan and Ming, was continuously so employ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rm Manchuria was not known even in the time of Nurhachi, the founder of the Ch'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he called himself Khan of Chienchou and was in charge of a minor principality in the frontier region

[1] Quoted from a declaration by Nurhachi's successor against the Ming in 1629 A.D.

of the Ming Empire. Having gained some political power, the son of Nurhachi tried to build a halo on their humble origin, and substituted for Chienchou the term "Manchou", meaning "oriental brightness"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an honorific title presented to the sons of Nurhachi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Mongol lamas. But as a matter of historical truth, the early ancestor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Ch'ing Dynasty were only tribal chiefs of Chienchou, receiving official appointments from the court of Ming.

Although the geographical area denoted by the modern term Manchuria had passed through a great deal of political changes, it had been essentially a part of North China from very early times, not only in a political sense, but also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This has been true at least as early as the aeneolithic time, the earliest period about which scientific data are available.

A.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J. G. Andersson excavated a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near Fengtien in 1921, which he described in a monograph published by the Geological Survey in 1923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Vol. 1, Fascicle 1). According to this report, the deposit contains cultural remains of aeneolithic age which are strikingly similar to what was found by him in N.W. Honan at Yang Shao Ts'un.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study, he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Yang Shao site in Honan he found mussel rings which occurred in "astounding frequency" in the Fengtien cave deposit, and in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Fengtien deposit were also found fragments of the painted pottery "which forms on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constituents of the furniture in the Honan site" (p. 42). These two points are of such high significance that Dr. Andersson is inclined to believe, to quote his own words, "that the Fengtien cave deposit and the Honan site are not only approximately contemporaneous, but also belonging to the same ethnological cultural group which I have named *The Yang Shao Culture*."

The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se two sites have been studied by Prof. Davidson Black. His conclusion also shows that the aeneolithic settlers of these two localities are essentially homogeneous. Thus he says: "It becomes difficult therefore to avoi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ha Kuo T'un and Yang Shao Peoples conformed to a type essentially similar to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present day Northern Chinese with whom comparison has been made" (Davidson Black: The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Ma-

terials.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Vol. 1, Fascicle 3. p.98).

Both Andersson and Black are great author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he conclusions they have reached certainly carry great weight. It is therefore more than obvious that Manchuria has been both ethnically and culturally a part of China as early as the prehistorical periods.

These conclusions by two scholars, one European and the other Canadian,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are also confirmed by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savants. Dr. Kosaku Hamada, in his report on the finds from P'i-tzu-wo,[1] have found almost a similar result. He says:

> "History suggests to u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Tunguse tribes distributed in these parts of China in those time, as they were known in an earlier day as the Su-shên (肃慎), or in a later time as the I-lou (挹娄) or Wu-zhi (勿吉). Dr. Torii has elaborated his theory some years ago, that the neolithic relics in South Manchuria is to be ascribed to the Tunguse tribes, represented by the Su-shên in the Shin-shu (晋书), etc., who lived before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the Han period, but the brick-chambered tombs, etc.,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settled after the Han Emperor Wu-ti. Though this seems one of explanations of this question, who knows in fact their occupying South Manchuria in that early period of the Chou or the Han dynasties? Moreover, who can deny that racial expansions had taken place once and again before the Wu-ti's time in the 1st century B.C.? W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Han time was a repetition of their expansions before that historical period, and Wu-ti's success could be only due to the foundations already laid racially in certain extent.
>
> We think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oins and li-and yen-shaped pottery from the sit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results of the racial expansion or expansions of the Chinese before the Han dynasty, and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a mere superficial importation of civilization. If these sites near P'i-tzu-wo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unguse tribes in some degree, we dare say that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sites would be more Chinese, in their cultural aspect as well as in their racial. This, we believe, is the most natural conclusion to be draw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of the skeletal remains as well a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lics obtained from the sites" ... (P'i-tzu-wo, p. 23-24).

[1] Archaeologia Orientalis. Vol. I. P'i-tzu-wo.

The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is site have been studied by Prof. Kenji Kiyomo and his associates. Their conclusion are no less striking and even more definite.

"Zusammenfassend laesst sich sagen, dass der P'i-tzu-wo-Mensch in vielen Punkten dem rezenten Chinesen und dem rezenten Koreaner fern und dagegen dem steinzeitlichen Menschen aus Sha-kuo-t'un, und dem aus Yan-shao-ts'un naeher steht. Fasst man aber die Koerperliche Verwandtschaft zwischen dem P'i-tzu-wo-Menschen und den rezenten Menschenrassen ins Auge, so daft man behaupten, dass der P'i-tzu-wo-Mensch vielen Skeletteigenschaften nach unter den rezenten Rassen dem Chinesen am naechsten steht, und es ist hoechst wahrscheinlich, dass dieser steinzeitliche Mensch aus P'i-tzu-wo mit zu einem der Vorfahren des rezenten Chinesen raehlt"... (Ibid: p.4).

[Translation: —By putting these facts together, it may be asserted that the Pi-tsu-wo man in many respect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recent Chinese and the recent Korean but similar to the Sha-kuo-tun man and Yang-shao man. It we take however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tsu-wo man and the recent human races in consideration, we are entitled to say that the P'i-tsu-wo man in hi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tands nearest to the recent races of Chinese and it is most probable that this stone-age man of P'i-tsu-wo formed one of the forefathers of the recent Chinese.]

Recent anthropometrical studies on living inhabitants are gradually revealing the fact the so-called Tunguse tribes are physically quite similar to a portion of the North China inhabitants. Some anthropologists have even advanced the theory that the Tungese tribes of Manchuria were originally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of North China; they migrated northeastward only in later times.

B. Earliest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archaeological results are highly illuminat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arly historical records, which closely corroborate them. Reliable historical account in China began with the Yin-Shang period (circa 1400-1100. B.C.) when modern Manchuria was known as Sushêh, and Korea as Ch'aosien (朝鲜). Frequent mentions were made in all classical literature such as Tso-ch'uan (左传), Kuo-yü (国语), Chou-shu(周书), Shu-hsü (书序), Shih-chi(史记) and Han-shu (汉书) about big stone arrow-heads as the typical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Sushên and sent to the Court of the Chou Dynasty as their main

tribute, and that Korea was colonized by the people of the Shang.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Shang Dynasty, Chi-tzu (箕子), the elder brother of King Chou (纣王), the last of the Shang rulers, was appointed by the House of Chou as the feudal lord of Korea in 1134 B. C. Thus it is quite clear that as early as 1 1 0 0 B. C., at the latest, Manchuria was a state within the civilized domain of early China; while Korea was actually a Chinese colony.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early China and its northeastern neighbors is also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early Chinese cherished a very kindly feeling towards these neighbors. Chinese historians were apt to dab the borderland tribes with contemptious names; but towards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region, a striking exception was made. They were known as Yi (夷), which the Sho-wen (说文) dictionary of the second century A.D. interpreted as a "generous man." The place was also known as "a country of gentlemen and immortality" in Hou-han-shu(后汉书) Such kindred feeling was no doubt based on some close racial and cultural affinities. According to 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s, these people were sedentary, raising pigs, squatting, keeping three years' mourning for the deceased parents, practicing witchcraft, using bow and arrow as their main offensive weapons and living in underground cellars. All these were fundamental cultural traits of early China.

The "Origin Myth"

A third group of data that serves to show the cultural unity of Manchuria, Korea and North China is found in their possession of a common "origin myth." There are a number of versions regarding this myth. The essential episodes are the following:

1. The egg of a bird.

2. A virgin became pregnant after swallowing the egg.

3. A son was born of this virgin and abandoned.

4. The abandoned son was taken good care of by various animals and finally survived.

5. when grown up, the son was noted for his military prowess.

6. Persecuted by the tribal chief he became a refugee.

7. In the course of escape, crossed a river on the back of a fish and a tortoise, which disappeared after his crossing, thus stopping the pursuit and saved his life.

8. Finally became a tribal chief.

The arrangements of these different episodes in various versions vary a great deal;

some are highly elaborated, others are brief. In certain cases, some of the episodes are substituted by others. But they are all essentially of the same theme, and spread widely in Manchuria and Korea.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version appeared in Luen-heng (论衡) of the Han dynasty; and was related to a tribe known as Fuyü (扶馀) of Kirin province. We find the same myth about the origin of Kaokouli (高句丽)Kaoli (高丽), and finally the House of Aisin-Chüehlo(爱新觉罗) of the Ch'ing Dynasty.

But most surprizlng of all is probably the fact that the origin of the house that gave rise to the Shang dynasty (circa 1766 B.C. – 1122 B.C.), was recorded in early literature in a myth containing episodes that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given above. In the Book of Odes, we find the version that "Heaven ordained the black bird to descend and give birth to the Shang."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The story is that the egg of the black bird was swallowed by the daughter of Youjung (有娀), who later gave birth to the founder of the House of Shang, or Ch'i (契).

From the oracle bone records, which are the remains from a Shang capital in North Honan and were recently uncovered with great scientific car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a special fire sacrifice was performed by the rulers of the Shang to a female ancestor known as Pi-yi (妣乙) or Mother Yi. There are two distinct features in this ceremony: one is that, unlike other female ancesters, Pi-yi had no consort; secondly, the use of fire as a sacrificial performance was always restricted to the most illustrious forefathers of the house. That Pi-yi was the only woman so worshiped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very eminent position she occupied in the ancestral roll. The only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given to this ceremonial performance is that Pi-yi was no other than the Black Bird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Odes. This interpretation can be also supported on philological ground: the Showen dictionary difinitely defined the Term "乙(yi)" as a black bird, or even more definitely, a swallow.

The evidences gathered here serve to show that not only Manchuria and Korea share this important myth; their earliest version can be actually traced back to Northern Honan where the Shang dynasty had its capital. Such distribution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myth in Korea,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must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regions belonged to the same cultural area.

Part II. The First Chinese Administration (Circa 1134 B.C.—352 A.D.)

Summary.— Authentic Chinese history began about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hang Dynasty (Circa 1400 - 1100 B. C.), during which Manchuria and Korea were already mentioned. There are reliabl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wa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Chinese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After the State Yēn annexed South Manchuria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C. it was administrated under the same political system as interior China. The "First Emperor" made three provinces (222 B. C.) out of this region and governed them in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other thirty-seven. Then a short period of local semi-independence followed, the leaders being still Chines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brought this region once more into the Chinese union, dividing the new territories of South Manchuria and Korea into four provinces which were later combined into two. Following the conquest of Emperor Wu, these territories remaine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This was the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third century A. D. when civil wars were ravaging interior China,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region was more or less in the hands of Chinese adventurers who shew remarkable capacity for government. Native tribes, who had acquired Chinese method of organization, grew in influence. When the Muyung tribes first became a dominant power in this region, they still recognized Chinese sovereignty. Thei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352 A. D. marked the end of the first Chinese administration and led to a series of uprisings of the native tribes culminating in the Mongol conquest.

A. The Conquest of Ch'aosien by the State Yen

It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above tha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Chou Kingdom over the ruling dynasty Shang, a prince of the vanquished royal house, Chi-tzû or Baron of Chi, fled across the Yalu River and founded a principality there under the name Ch'aosien (朝鲜). Nothing is known about this principality till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years later, when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C. , the prince of Ch'aosien, in imitation of his neighbor, the ruling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Yēn, (modern North Chihli and West Fengtien),

crowned himself as a king. It is said that this first King of Ch'aosien once suggested to the King of Yên the idea of forming a Pan-Chinese League and organizing a joint military force to maintain the falling dynasty Chou. The idea was not carried out because his minister Li (礼), was opposed to it. But Ch'aosien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Yên. After his death, his successors proved to be an unworthy lot, showing false pride and utterly incompetent of administrati. The Kingdom of Yên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invade. Under the command of Ts'in Kai (秦开) the aggressive expedition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large tract of land, over two thousand li in distance, was annexed by Yên from Ch'aosien.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Liaotung province (辽东郡), which remaine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down to the fourth century A.D. The conquest of Ch'aosien by Yên went further; it virtually became a vassal state of Yên, the administration being supervised by Yên officials. Its neighbor Chenfan (真番) suffered the same fate. So South Manchuria just as North-east China was under the sam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s early as the fourth century B.C.

B. In the Time of the "First Emperor"

Then came the unification of all China under Ts'in Shih Hwangti or the "First Emperor" in 230 – 221 B.C., and Yên shared the same fate of the other kingdoms. After the crashing defeat of Yên at her capital Yi (易), the defeated King went with his remaining followers beyond the Liao River and made himself king of that territory. This did not last long. In 222 B.C. Wang Pen (王贲), a general of the First Emperor, captured the unfortunate king. Both South Manchuria and a large part of Korea which had formed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vanquished Yên Kingdom, came into the provin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First Emperor.

The First Emperor lost no time in consolidating the position of his empire. Three provinces embracing South Manchuria and Jehol were instituted, namely: You Peiping(右北平), now Jehol; Liaosi (辽西), now eastern corner of Chihli and Fengtien west of the Liao; and Liao-tung (辽东), now Central and East Fengtien[1]. Ch'aosien and other tribes were brought under the "extra-provincial jurisdiction of Liaotang" (辽东外徼) after the model of the Yên Kingdom. The Great Wall[2] of China was built, running through

[1] These provinces were Yên's former establishments.

[2] Foreigners often confuse this Great Wall of the First Emperor with the present one, most of which were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First Emperor's wall lied further north,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westernmost section.

the mountains south of the Gobi, with the west terminus at Lintiao (临洮) and the east at Liaotung.

C. The Regime of Wei Man and His Descendants

With the fall of the Ts'in dynasty in 207 B. C. and the succession of the Han dynasty in 202 B. C., the provincial system in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Chinese Empire underwent no change, except that the Han court abandoned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extraprovincial territory of Liaotung" in its early days, because of the exhaustion of military power after the sanguinary civil wars. This transition caused also a dynastic change in Ch'aosien; Chinese refugees migrated to Ch'aosien en masse which hurried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region. Emperor Kao-chu (高祖), appointed Lu Kuan (卢绾) as prince of Yên, who revolted soon afterwards. One of Lu Kuan's followers, Wei Man(卫满), fled with his associates to Ch'ao-sien, and entreated the reigning prince there, a descendent of the Baron of Chi, to let them stay. The prince complied with his request and stationed them on the western border of his kingdom. Wei Man soon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his talents and won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urt. Exploiting this opportunity, he gathered around him a band of Chinese refugees, who eventually helped him to overthrow the ruling house of Ch'aosien , and put him on the throne.

Wei Man adopted a policy of sinicizing Ch'aosien by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settlers from China. In the meantime he was submissive to the Han Empire and recognized China's suzerainty. He came to the following terms with Emperess Dowager Lü (吕后, reigned 187 – 180 B. C.); (1) vassalage to the Han Court, (2) guarding the borders of China in the extreme north-east from attacks by barbarian, and (3) offering no hinderance to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eastern tribes.

The dynasty of Wei Man flourished in Ch'aosien for four gererations until Yuchü (右渠), Wei Man's grandson, came to a clash with Emperor Wu (武帝, reigned 140 – 87 B. C.), the Chinese Julius Caesar. In 125 B. C., sixteen years before the conquest of Ch'aosien, the Sui (涉) tribes, inhabiting part of South Manchuria and Northeast Korea, under their chieftain Nanlü (南闾), voluntarily offered to join the Empire. Yuchü, who had only half-heartedly submit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naturally found this a cause of apprehension. In sending out the punitive expedition Emperor Wu charged him with the following crimes: (1) failure to appear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us showing disobedience and disloyalty, (2) sheltering offenders of China, (3) interrupting the journey of the chieftains

of the east on their way to the imperial court, and (4) the murdering of the Liaotung garrison commander. The punitive expedition consisted of both land and naval forces. In 109 B.C., his kingdom was annexed to Emperor Wu's dominions.

D. After Han Wu-Ti's Conquest

After the conquest of Emperor Wu, Manchuria and Korea remained a part of China's political entity for several centuries till 352 A.D., thirty-five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imperial metropolitan area to barbarian invasions, when the sinicized Muyung family severed allegiance from the East Tsin dynasty.

The rapid military success of Emperor Wu and the long duration of Manchuria and Korea's remaining in the Chinese provincial system can o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union, South Manchuria and West Korea were already Chinese, cutturaly as well as politically, and even in population, at least predominately so. The fact that the population of Liaotung and West Korea spoke a Chinese dialect before Emperor Wu's time was recorded in Fang-yen (方言) a book on Chinese dialects written 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according to Ying Shao (应劭) contained dialectical materials of the Chou and Ts'in dynasties. In this treatise peoples of North Yên (now North Chihli, Jehol and Fengtien) and Ch'aosien (now Korea) up to the Lié River (now Han River) spoke one and the same dialect of the Chinese tongue. This form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s of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racial problems of South Manchuria and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

E. Administration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Han, Wei and Tsin Dynasties

After the surrender of the Sui Tribes and the conquest of Ch'aosien by Emperor Wu, four provinces were established, namely:

1. Porvince of Hsuent'u (玄菟) or "Province of Black Rabbit", including eastern Fengtien, North-eastern Korea, South-eastern Kirin, and the Russian territory around Vladivostok.

2. Province of Chenfan (真番), including part of Kirin.

3. Province of Lolang (乐浪) covering Korea west of the Kaima Range.

4. Province of Lint'un (临屯)covering, Korea east of the Kaima Range.

These four provinces were combined into two by annexing Chenfan to Hsüent'u and

Lint'un to Lolang in 82 B.C., in order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ogether with the ancient provinces on the bank of the River Liao; i.e., Liaotung and Liaosi,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se provinces, Hsüent'u and Lolang, remained unchanged for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fill the middle of the fourth century. Most of these years witnessed peace and prosperity, except during the short periods when dynas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central China.

At the head of each of these provinces there was a *t'aishou* (太守) or high commissioner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ssisted by one or more *tuwei* (都尉), or chief lieutenants. In case of war or suppressing rebellions, *a chiangchün* (将军) or general was appointed with a special title designating his particular duty. One province consisted of several, sometimes up to thirty, *hsien* (县), governed each by a magistrate. This was the regular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Empire, including Manchuria, was thus governed by the same system.

F. The Native Tribes

The officials of these provinces not only took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subjects, but also supervising the native tribes and tributary dominions. Each tributary dominion was governed by its own hereditary chieftain who received the official seal, costumes, hats, silk, musical bands and other articles of culture from the emperor through the hand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These tributary tribes were required to keep the fronti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rade intercourse with the provinces, to pay homage to the emperor and to obey orders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these tributary tribes, the following were recorded by Chinese historians as important Non-Chinese peoples inhabiting Manchuria and Korea.

1. Fuyü (扶馀). Fuyü, an agricultural people inhabiting the Kirin and Taonan Plains, was subject to the supervision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f Hsüent'u. This people was rich and powerful. Though sometimes they revolte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on the whole were close and friendly. In response to their loyalty, the Chinese protected them from attack by the western barbarians. Once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actually helped them to restore the chief to his post, after having been overthrown by a Sienpi (鲜卑) tribe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Fuyü had also its own tributary tribe, the Yilou (挹娄) or Sushên (肃慎), a people of East Kirin and Russian Usuri, which was culturally even more primitive.

2. Kaokouli (高句丽). Kaokouli, of the same origin as Fuyü, were a warlike people; their town formed one *hsien* in the province of Hsuent'u during the First Han dynasty. They were employed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notorious Chinese usurper Wang Mang (王莽), but they fought very poorly. They became gradually powerful during the Second Han Dynasty by conquering their eastern neighbor, Suimai (涉貊). They revolted more often than Fuyü:, but the conquests of Kungsun Tu (公孙度) and Wuchiu Chien (毌丘俭) continued to keep them under Chinese control. A branch of them became a great power after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of China during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3. East Wochu. The territory of East Wochu (沃沮) was originally located in the province of Hsuent'u during Emperor Wu's time. Later on the tribe moved north-westward, and were amalgamated with Kaokouli.

4. Sui or Sui-mai. The Sui or Sui-mai were a tribe inhabiting that part of Korea east of the Kaima Range; they spoke a dialect allied to the Kaokouli. They were subject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eastem garrison commander of the Province Lolang during the First Han Dynasty, but obtained autonomy in the Second Han.

G. Manchuria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A.D

During the dynastic wars of China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to the middle of the third century A.D., Manchuria was under the rule of Kungsun Tu and his descendants. He was a native Chinese of Hsiang-p'ing (襄平), now Liaoyang, capital of the Liaotung province, and served at first as a clerk i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Later he was appointed high inspector and finally promoted to the rankof governor of Liaotung. He consolidated his position by annexing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when China was in revolution, and entered info alliance with Ts'ao Ts'ao' (曹操), the founder of the Wei Dynasty. His son and grandson, by conquering the surrounding tribes, held Manchuria and Korea in powerful sway and were virtually independent of the Empire. His grandson clashed with the imperial forces under Ssûma-yi (司马懿) in 238 A.D,; his force was totally annihilated. Thus ended the local independence of the House of Kungsun. Manchuria came again under the dire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We can not pass on without mentioning Ts'ao Ts'ao's influence on Chinese Manchuria. By his successful compaign against the warlike tribes of Wuhuan (乌桓) in Jehol in 207 A.D., he uprooted fhe immediate danger threatening Chinese control in Manchuria. This campaign also served to retard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of China" for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overthrow of the rule of Kungsun's house, Wuchiu Chien, garrison commander of the imperial forces, sent an expedition to subjugate Kaokouli which surrendered at last in 245 A.D. A fragment of one of his stone monuments celebrating this conquest was recently discovered; Plate I is a reproduction of a rubbing of it.

But the inevitable "Barbarian Invasions" came at last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fourth century, with the imperial capitals of Ch'angan and Loyang sacked. Muyung Kuei (幕容廆), a sincised Sienpi chieftain, took hold of Liaotung and established a mighty state by subjugating the Kaokouli people and the northern tribes of Heilungkiang. He and his descendants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 service of the Chinese refugees from the interior who helped to systematiz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it a great success. Thus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state in Manchuria remained Chinese, although militarily it was dominated by the Sienpi. Muyung Kuei considered himself as a loyal Chinese citizen and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the imperial Chinese who fled to Nanking in 317 A.D. His son followed his example. The imperial court at Nanking appointed them successively governor-general of the Liaotung and Lolang provinces with the hereditary title of a prince. It was only in 352 A.D. when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powerful enough to become independent, that Muyung Chün (慕容儁), grandson of Muyung Kuei, proclaimed himself emperor, after having seized a great part of central China from the hands of the other "barbarians".

Muyung Chün's success was however quite ephemeral, after his severence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at Nanking. His dominions soon passed to the hands of other "barbarians." The rise of Kaokouli was then inevitable. During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at part west of the Liao River still remaining Chinese territory, South Manchuria belonged to Kaokouli. Nominally this tribe recognized the suzerainty of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Empire.

Part III The Uprisings of the Native Tribes and the Interim Periods (352 – 1372 A.D.)

Summary. —From the year 352 A.D. when the Muyung declared independenc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Manchuria and Korea were for the most time ruled by Non-Chinese tribes. The Antung Protectorate of the T'ang Dynasty (668 – 758 A.

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xception, when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was again extended to this area. But the so-called native rules of this period were intensely influenced and largely achieved by the Chinese; the Muyungs, the Kaokoulis, the Mohos, the Khitans and the Nüchêns had been all depending on Chinese support and utilizing expert Chinese service. They were irresistibly attracte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mixed with the Chinese freely until they were completely absorbed.

A. The Rise and Fall of Kaokouli

The original home of Kaokouli was located north of Fengtien and formed a *hsien* (district) of the Hsüent'u province, bounded on the north by Fuyü (Kirin) and on the west by Liaotung.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Kaokouli frequently invaded Liaotung, and was frequently repelled. These military contacts gradually led to cultural penetration. When Wuchiu Chien accomplished successfully his punitive expedition to Kaolouli in 246 A.D., he taught the natives of Kaokouli the method of irrigation. This new method of agriculture started an era of prosperit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its later succes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Kaokouli gradually became powerful. The Muyung house was on its decline, and Liaosi was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Kaokoul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its power northwestward: annexing Liaotung and conquering Fuyü. The territory increased about three times; such was the observation made by a Chinese envoy in 437 A.D. At the height of its power, the territory of Kaokouli included two thirds of Korea, and a large part of South Manchuria east of the Liao River.

The territorial ambition of a successful state, of course, never could have any limit. After the incorporation of Liaotung, Kaokouli began to invade Liaosi. But at this time, China was once more unified under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Sui Emperors began to tackle with the problem of Kaokouli seriously. Four punitive expeditions were sent to Kaokouli (598, 611, 613, 614, A.D.) by the Sui Emperors, but they all ended unsuccessfully. The task was left to the T'ang Emperors to accomplish. Emperor T'ai-tsung of T'ang personally conducted an expedition to punish Kaokouli in 644 A.D.; he conquered almost half of its territory. His son, Kao-tsung, finished the task in 667 A.D. and established the Antung Protectorate.

B. The Antung Protectorate

After the fall of Kaokouli and annexation of Sinlo and Pechi. the territory of whole

Korea and Manchuria came entir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It was governed entirely after Chinese fashion. The whole territory east of the Liao River with 176 cities, 690 000 households, was divided into 9 *tufu* (都府), 42 *chou* (州) and 100 *hsien* (县). A governor-general was appointed at the h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capital of this Protectorate was in Phong-yang (平壤). A great deal of autonomy was allowed; natives were appointed to all important offices. The administration was a very benevolent one. The History of T'ang (旧唐书) thus describes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 Great care was taken of the old and the orphanage; capable men were appointed to office.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faithfulness, we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hus all the educated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culture of the Empire ..."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the Japanese began to receive Chinese culture, partly through this channel.

There were of course Still many unruly elements who constantly tried to rebel. About 38 000 of these rebels were taken to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River Valley in 669 A.D.

Meanwhile the Empire was in trouble with the Tibetans from the Northwest; a part of the military forces in Antung was diverted westward. In order to pacify the remaining unruly elements among the Kaokouli, a greater amount of autonomy was granted, and in 676 A.D. the capital of the Protectorate was moved to Liaotung. From this time on,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main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Empire upon this territory was cultural; the natives enjoyed free political autonomy. Later on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was entirely amalgamated with one of the chief-commanders of the garrison forces in the N.E. frontier. Thu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otectorate lasted 99 years (668 - 758 A.D.).

C. The Moho Tribes

The Moho (靺鞨) tribes were descended from the Wochu of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Moho tribes aspired to form a tributary state of China; they paid homage frequently to the Chinese Court. In their struggle with Kaolouli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the fourth century, they cautiously approached the court of northern Wei for approval, which no doubt served as a great moral force in their period of growth. Since that time, regular tributes were sent to the court in North China; and in return, they also obtained a great deal of royal favour, both spiritually and materially. The Sui Dynasty patronized them almost paternally. In a message to the tribal envoy, the Sui Emperor actu-

ally said, "As I consider you as my children, you ought to consider me as your father" (History of Sui, Chap. 84).

Such close contact led inevitably to the adoption of the rudim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these tribes. While the Mohos sent horses and arrow-heads to China, the Chinese taught them manners and gave them silk.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y were gradually consolidated into a state.

The real rise to power of these Moho tribes began only after the conquest of Kaokouli. In the reign of the Empress Wuhou (武后,685 – 704 A.D.), there was a clash between the force of Khitan and the Chinese garrison of Yingchou (营州). Ta Chuyung (大祚荣), a sub-officer of the Chinese army and a native of Sumo division of the Moho tribes, fled to his native country and there established a state. The imperial court of T'ang appointed him 'Marshal of the Left Cavalry Guard, Prince of Pohao and Governor of Hukhan Province', who later consolidated the old territory of Fuyü, Su-shên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into a state. They continu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all through the T'ang and its succeeding dynasties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The state was entirely organized after the Chinese model; students were sent to the capital of China to study Chinese institution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y became a great power in the North-eas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ang (Chap. 219).

They were conquered and annexed by the Khitans in 927 A.D.

D. The Khitans

While Pohai was evolving from a tribe to a state in Kirin and its neighbourhood, another group of nomads, the Khitans, also gradually rose to power near the southern part of Jehol and West Fengtien. Like the Pohai division of the Moho tribes, the Khitans began to appear in the fourth century. In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a small tribe, occuping a restricted region in modern Chaoyang (朝阳). In the T'ang Dynasty, its territory was gradually extended both westward and eastward, covering an area no less than 2000 square li.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906 – 959 A.D.), its territory increased still more; there were eight administrative areas and fourty-one district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Yalü Apochi (耶律阿保机), made still more conquests, and finally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916 A.D. His son, Yalü Tekuang (德光), extended the power of the Khitans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hli and Shansi. At this time the territory covered an area from the Ordos in the west to Ninguta on the Usuri, and from Peking to the Sun-

gari. A new state was proclaimed with the name Liao, which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formidable rival of the Northern Sung.

The secret of their succes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patiently learned all the art of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T'ang Empire. All through the t'ang Dynasty they served as a vassal state, and frequently intermarried with the imperial house. Their title was conferred by the Emperors of T'ang and official posts were in many cases held by the Chinese. They sent tribute to the court of T'ang regularly, and at times they even went so far as to adopt the very surname of the imperial house, namely, Li, as a symptom of their loyalty.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they were wholly a dependent state receiving title, honor, seal and surname from the T'ang Empire.

Another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their success is that they made liberal use of the service of the Chinese.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empire was beginning to break up and China Proper was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many Chinese citizens escaped to Khitan and helped them to organize various institutions. The following is an extract from Yeh Lungli's Khitan Kuochih (契丹国志):

>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eight tribes of Khitan, the largest was Taho (大贺氏), which later was divided into eight divisions. The chief of each division was called Tajen, one of the Tajen was chosen as the King, given a flag and a drum to govern all the eight divisions. The ordinary term of service of the King was three years; the Tajen of different divisions served alternatively. If there should be pestilence or a decline of the number of cattl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eight divisions, the King could be changed, even before the term. should expire. As this was the contract, nobody could dispute. At the time of Apochi, however, he claimed that in China there was no such practice as changing the King. He held the post of Kingship for nine years by force, and still refused to give it up. The different divisions, however, began to show signs of discontent. He was compelled to hand out the flag and the drum, the emblems of power. But he said to the different division: 'I have ruled nine years and had under me many Hanjen (Chinese). Let me have a special division of Hanjen and governor it.' This was consented to by all. The city of Hanjen was located on the Luan River (滦水), producing iron and salt, and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Apochi led all Hanjen to settle at this place, cultivated the land, built cities and houses exactly like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emigrants were quite satisfied and did not wish to return home

any more. Thus Apochl gained their support..."

His son went further in the way of Sinicization. He adopted all the institutions, laws, custom, calender, music and writing. The tribesmen freely intermarried with Han-jen;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y shew no appreciable difference from the indigenous Chinese. This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no doubt helped them immediately in the creation of an empire. When Marco Polo travelled in China during the Mongol time, he still called the Northern Chinese Khitan.

E. The Nuchens

The Nüchêns or Golden Tartars were originally one of the Moho tribes; they were known as the Black River Moho. Their original home was somewhere in Heilungkiang. They served alternatively as a vassal state under the Pohal Moho and the Khitans, but they also sent tribute to the Chinese Court in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they began to be known as Nüchêns. They were rapidly sinicized as soon as they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fter they conquered North China, they intermarried with the Chinese freely. The case is again like the previous ones. Being rude barbarians, they naturally copied the technique that was nearest available, namely from the Chinese,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ing a large territory.

The following two pass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 (金史), show how they adopted Chinese culture and were absorbed by the Chinese.

> "When Hsieye Tsungkan (斜也宗翰) was in power, he advised Emperor T'ai-sung to reorganize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herited from the tribal time of Nüchên, and adopt the Chinese system. In the fourth year of Tienhui (1126 A.D.),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was for the first time fixed. The Board of Shangshu with all the subordinate offices was established to take charge of all civil administrations. In the twelfth year (1134 A.D.)Han Ch'isien (韩企先),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the Board. He was a very learned man, well-vetsed in ancient classics, history and early institutions. He was keen to choose the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office, and ran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in the most orderly and enlightened manner..."(History of Chin, Chap. 78).

Han Ch'isien was a Chinese native of Chihli.

Again, in the account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Chin (Chap. 44):

"...After the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the Chins (Nüchêns) realized that their people were few in number. Thus they adopted a liberal policy and gave every opportunity to the Chinese and enlisted their help. Further they encouraged the native tribes Muan (穆安) and Muko (谋克), to mix freely with the indigenous Chinese..."

The Nüchên tribes revolted against Liao in 1114 A.D: in the year following an empire with the title Chin was proclaimed. The State of Liao was rapidly Conquered by Chin in 1123 A.D. Four years later, the army of Chin marched into the city of K'aifeng, ending the reign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Since that time North China including Manchuria was under the rule of Chin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till 1234 A.D. when the irresistible Mongols overthrew them.

F. The Mongols

The Mongols who conquered the whole of Asia, part of Europe, and created a dynasty in China, were also originated in Northwestern Manchuria, near the Khingan Mountains. They were originally a petty tribe on the Manchurian border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y frequently sent tribute to China.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to go into the details about the rise of Mongols to power, which had a world-wide importanc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in the time of Jenghis Khan, the center of influence was still in North-eastern Mongolia. After it had subjugated the Nüchên of North China in 1234 A.D., it copied all the paraphenalia of the art of government from the Nüchên and the Sung. Manchuria was governed in exactly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Khitans and the Nüchêns did previously. The Mongol conquest therefore produced no material or spiritual change in Manchuria except among the Mongols themselves.

Part IV. Back to the Empire – A Reunion. (From 1372 A. D.)

Summary.—China began to revolt against the Mongol rule in 1341 A.D. Twenty-seven years later (1368 A.D.) the Mongol Dynasty was overthrown, and their people were driven out of the Great Wall. The first of the Ming Emperor, Hungwu, continued

his drive into South Manchuria in 1371 – 2, where he established many military posts. His son, Yunglo, carried on his work, and conquered most of Mongolia, North Manchuria and a part of Siberia.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D.) this territory was partly under the dire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and partly governed by native chiefs, officially appoin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Both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Ch'ing Dynasty represehted on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Ming. The founders of the House Aisin-chüehlo were official appointees by the Ming Empire. While they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new dynasty after their revolt, it is hardly a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as they hardly introduced any political or economic change. Manchuria continued to be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just as in the Ming period.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Manchuria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history that led to this turn of events must be left to other experis.

A. Chinese Settlement in Liaotoung

Since the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for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the territory of Manchuria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barbarian" tribes, who sometimes recognized Chinese suzerainty and sometimes revolted;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ere were in a very unfavorable condition. But as neither the Nüchêns nor the Khitans—who were both few in number—could develope this extensive area, many Chinese were induced to settle in this region even under their rule. In this way the Liao Valley and the Liaotung Peninsula remained always Chinese in population. These Chinese served in their army, and were encouraged to intermarry with the native tribes. In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the History of Chin, we find frequent mentions of mass migration of inland Chinese to Liaotung. In the Mongol Dynasty such migration continued, so that the Liaotung area became almost entirely settled by the Chinese. The migration was haste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navigation at that time. With the wind, the people of Shantung could reach Liaotung in twenty-four hours.

B.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South Manchuria including Fengtlen, part of Kirin and Jehol, was governed together with Shantung under the sam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Candidates fo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om this region had to go to Shantung by crossing the sea or passing through North Chihli.

As all historians know,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dual in character; the population was divided into a military and a civilian class.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class had to serve in the army when called for, and those of the civilian paid a heavier tax.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was governed by *fu* (prefecture) and *hsien* (district) magistrates, while the military by *wei* (卫 garrison) and *shuo* (千户所 post) captains. This dualism existed in every province. In the frontier and strategic districts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ccupied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Manchuria, forming the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Shantung beyond the sea, served as an example of this rule. It was divided into twenty-five *wei* and a number of *shuo*, all under one military commander, with the title of Tussû of Liaotung (辽东都司), who also took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pository of Ming, the power of the Empire reached Heilungkiang as far as Nurgan (奴儿干), at the mouth of the Amur on the Strait of Tartary, in the seventh year of Yünglo (1409 A.D.). There they established another Tussû, namely the Tussû of Nurgan. An army of 95 000 strong was the regular number maintained in these N.E. territories.

C. The Tussu of Nurg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ussu at Nurgan deserves special mention. W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in its most powerful days, the influence of the Ming Empire reached far beyond the modern boundary of North Manchuria. Nurgan, which was conquered by a eunuch in 1411 A.D., included the Maritime coasts and a great part of the Amur province of Siberia and the Kurile Islands. In the Museum of Vladivostok are exhibited two stone tablets found in this region, testifying Chinese control of these lands, (Plate III).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archaeologist Torrii, Chinese potte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have been frequently found from the Amur province. The Japanese Sinologist Naido Kojiro (内籐虎), in his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North-east territory of the Ming Empire, has fully confirmed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data he shew that Nurgan, the frontier region, reached actually to the coasts of the strait of Tartary.

D. Native Wei

In addition to the Tussû of Liaotung and the Tussû of Nurgan, a large number of na-

tive *wei* were established. The Ta-Ming Huitien, or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Great Ming", gives a list of such *wei* or garrisons to the number of 384, together with 24 *shuo* or posts. The majority of these places, scattered all over Noah and East Mancturia including the Maritime and Amur provinces of Siberia,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garrisons was left to native chieftains with hereditary rights. The highest title of these chieftains was *tutu* or commander, but most of them ha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term *tutu chienshih* or chief－officer.

It may be interesting to inquire whether the control exercised by the Ming over these native *wei* was effective. Modern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it varied greatly in individual cases and in different times. In the most powerful period of the Ming Empire, even those distant *wei* to the north of the Amur had to obey orders of the Chinese commander; bu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dynasty, whilst those of Kirin and South-east Heilungkiang we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g officials, others were only paying tributes. Previous to the revolt of Chienchou, the Nüchêns of Haisi and Chienchou in Kirin, East Fengtien and South-eastern Heilungkiang, were alway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ing. Their chiefs were appoin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If they should become disobedient, the appointment might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family at any moment. The history of Chienchou shew clearly how effective the Ming rule was; the chiefs were always proud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obedient Ming subjects.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 had a very positive motive in trying to obliterate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Ming, as the Manchu Emperor did not wish to have it known that their ancestors were subjected to the rule of the Ming Empire.

E. Vassal of Chienchou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A great deal has been recorded about the Nüchêns of Chienchou in the Repository of Ming History (大明实录), and also in Ch'aosicn Shihlu (朝鲜实录), or Korean Recorder. To these Nüchêns of Chienchou, the ancestors of the Ch'ing Dynasty are traceabl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ongol Dynasty, the Nüchêns of Chienchou settled for the most part near Sansing Ch'êng (三姓城) in Kirin. In 1403 A.D., the tribal chief of Nüchên, Ahach'u (阿哈出),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head of the *wei* of Chienchou. A great deal of imperial favour was shown to him. His daughter was taken to the court of Ming 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erial consorts. The family was permitted to use a Chinese surname.

In 1411 A.D., another tribal and military unit was created for Chienchou, known as the Left Guard of Chienchou (建州左卫); Munko Timur (猛哥帖木耳), was appointed its Chief. He was also known as Tung Munko Timur (佟猛哥帖木耳). Nurhachi, the founder of the House of Aisin-Chüehlo, the ruling house of the Ch'ing Dynasty, employed the same as his surname. In his report to the Ming Emperor, he used to sign: Tung Nurhachi.

The history of Chienchou was an eventful one. It was constantly pressed by the barbarians from within and the Korean bandits from without. At one time the military chief of Chienchou decided to disobey the Ming Empire. This was quickly suppressed by the punitive forces of the Ming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military power of Chienchou declined, and the Ming Empire decided upon a change of its colonial policy. The Hulên (呼伦) tribe, of which there were four divisions, namely Wula (乌拉), Hada (哈达), Yeho (叶赫) and Huifa (辉发), were indigenous tribes of Heilungkiang, and later occupied Kirin. When the Nuchens of Chienchou became disobedient, the Hulêns were greatly patronized by the Ming in order they might keep a watch on Chienchou. This policy produced its desirecl effect. In 1583 A. D. the Nüchêns of Chienchou dwindled almost to insignificance.

Meanwhile, the Hulên tribes also developed quarrels among themselves, and were gradually broken up. This gave the Nüchêns of Chienchou an opportunity to revive. They found in Nurhachi a capable leader.

Nurhachi left his father when he was nineteen to trade in *Jensen* (人参). At Fushun, where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many Hanjen, and obtained an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s, Sankuo-chih (三国志) and Shuihu (水浒), from which, according to tradition, he learned his military tactics. He served also in the army of Li Ch'êng-liang (李城梁), garrison commander of Ming, as his body guard, and was greatly patronized by the latter.

In the year 1583 A.D. when the status of Chienchou was at its lewest ebb, Nurhachi, a young man of 25, started his famous career which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He began by inflicting retribution on the Nikanwailan (尼堪外阑) tribe, who murdered both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In three years' time the mission was fulfilled. In 1588 A.D. he already gathered a force of more than 10 000 strong. From this time on he gradually unified all the scattered tribes in the North-east territory. Meanwhile, he was very obedient to the Ming Empire. In recognition thereof, the Ming Emperor bestowed upon him the title of Commander of Chienchou. Nurhachi went personally to Peking to pay

homage to his sovereign in 1590, 1593 and 1608 A.D. By 1608, he had already consolidated his position in what is now South Manchuria and was pushing northward to Heilungkiang. In 1612, his military forces were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60 000 men. In 1616, he became virtually independent, but nominally he still acknowledged the suzerainty of the Ming Empire. Two years later, he attacked the imperial forces and fought a series of battles against them before he died in 1626. He would have been pacified, if the Ming Empire had raised his rank to that of a prince.

F. The Close-up of Manchuria in the Ch'ing Dynasty

After the House Aisin-chüiehlo had occupied Peking and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China, the Manchus migrated southwestward to China Proper in great mass, and settled inside the Wall as officials and "bannermen." By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ld Chinese settlement in Liaotung which continued to flourish, became largely depopulated.

The situation thus created was a serious one, and the ruling Manchus soon realized its danger. In 1665 a mandate was issued to encourage settlement in Manchuria. The emigrants were given free land, free seeds, and free oxen, as well as free food till the first harvest. This however did not meet with any success, because, owing to the continued civil war for many years,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Proper was greatly reduced. In 1663 A.D. it was decided to withdraw the original mandate, and close up Manchuria. The Hanjen were forbidden to settle beyond Mukden and the Mongols were stopped at the Outer Fengtien Wall. The Koreans were likewise forbidden to cross the Manchurian border.

The causes of this change of policy are complex. Firstly, the imperial house desired to have a monoply of the Manchurian trade in fur, jensen and pearl for the natives. The history of jensen trad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t may be remembered that Nurhachi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trader in jensen in Fushun. This tradition was dearly cherished by his descendents. The Chinese were great consumers of jensen, which always commanded a high price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as only to be found in Manchuria. To safeguard this monopoly, Manchuria was closed against all strangers — Koreans, Mongols, as well as Chinese. The income of the imperial house from this source was however not much more than 150 000 taels a year.

Secondly, the Manchus began to believe in the Chinese superstition of "Fengshui", or geomancy. The native land of the Imperial House must preserve its surface features un-

changed. As the great disturbers of the soil were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settlers, they must be rigorously excluded.

Thirdly, the early Emperors wanted to keep the ruling race pure. In reality, however, even in these days the Manchus were "pure" neither in race nor in culture. Nurhachi, the founder of the dynasty, was himself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ideas and spoke Chinese as well as Manchu, which contained an extensive Chinese and Mongol vocabulary. The so-called "Manchu Bannermen" were in many cases Chinese in origin. The Chinese adventurers who joined Nurhachi in the beginning were given Nüchên names and treated as such. No less than three emperors—K'anghsi, Chiaching and Taokuang — were born of mothers traceable to old Chinese families. It was this initial in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blood that made the subsequent absorption of the Manchus unusually rapid. By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ew Manchus could speak their native tongue.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ven Manchus in Manchuria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Chinese settlers. [1]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policy of excluding Chinese from Manchuria was confined to the area north of Mukden to which the Chinese had always free access, and the country south of Mukden remained all the time predominantly Chinese in population.

G. Government of Manchuria in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Ch'ing Dynasty, Manchuria was governed in very much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Ming; it was a sort of military government. But as it is the native place of the Imperial House, some nominal change was introduced. Mukden was the second capital of the Empire, which the emperor frequently visited. To facilitate service demanded on such occassions, five Boar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duplicated there. [2] The official description of the territory was Shengkingsheng, Province of the Glorious Capital. This was in fact an exact imitation of the way the Ming Emperors treated Nanking which was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Ming Empire.

---

[1] It is really an irony of fate that Emperors Yungchêng and Chienlung who made great effort not only in trying to creat the fiction of a Manchu race which did not exist, but also in trying to destroy all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eir early origins, should have laid the very foundation for the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the Dynasty in 1911. The motivating force of this revolution was race consiousness, and it is the fiction created by Yungchêng and Ch'ienlung mainly responsible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attempt to obliterate their origin has been equally unsuccessful. Many of the literature survived their destruction. Modern researches have re-established all the tr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tecedent to their rise to an empire, which they wished the world to forget.

[2] This was only a ceremonial institution, as the five Boards hadvery little business to do.

But there was very littl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is area, as the population was small. In the early days Heilungkiang and part of Kirin were kept as royal parks, where people were forbidden to go. Fengtien was however divided into several districts to take care of the old Chinese settlers. In 1791 A.D. the western part of Kirin was for the first time opened to settlers. Later on Northern Manchuria gradually followed suit.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opening of Kirin, more han 260 000 *mu* of land were brought under cultivation. This gives some idea of the number of settlers that migrated there in this period. These settlers were Chinese; the "bannermen" were unwilling to go back, because they could no longer stand the bitter cold of the North.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settlers towards this region gained momentum. When the Russian menace began to be felt, emigration to Heilungkiang was greatly encouraged with the idea of strengthening the border defence. Most of these settlers are natives of Shantung. By 1907 Chinese farmers were to be found everywhere in Manchuria and a more systematic civil administration became necessary. Manchuria was then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administrative units, the "Eastern Three Provinces", which have been governed exactl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Proper ever since.

The above sketch is a briefest outline of event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centuries.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the story coherent,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relate the history of Manchuria by itself. Events in Manchuria are but reflections of the happenings in China Proper: the Chinese domination in the North-east, the nomadic invasions, the uprising and downfall of the various tribes, are all phases of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One fact however emerges very clearly from this story. The Liao River valley was settled by the Chinese from oldest times. Subsequent migratory movements have brought various alien peoples into contact, and often conflict with these settlements, but in spite of successive barbarian dominations, Chinese influence remained predominant. Different tribes came and went—to China Proper, to Korea, or back to their original homes. The residue of their horde left over invariably became thoroughly Chinese. The latter alone have been the constant factor that has given this region civiliza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 settled population throughout all ag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y, it is also a mistake to regard Manchuria as a single unit. The province of Heilungkiang, although came under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flu-

ence of China in the Han and Tang times, was only amalgamated into the Empi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South Manchuria, especially the valley of the Liao River and the Liaotung peninsula, has been since the earliest times a part of China not different from Shantung or Chihli.

《东北史纲英文节略》1932年北平协和书店英文版

Errata

Through the booklet, for *Chili* read *Chihli* Map I, for 沃阻 read 沃沮

Description of the Plates

Plate I. A fragment of a monument erected by Wuchiu Chien in celebration of his campaigns against Kaokouli in 240 – 248 A. D. Recently found in Chi-an-hsien (辑安县) on the bank of the Yulu River.

Plate II. A stone tablet erected by the ambassador Ts'ui Hsin (崔忻) who brought to the Mohos the imperial message appointing Ta Chuyung Prince of Pohai in 713 A. D. This tablet was erect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on his return journey via Port Arthur.

Plate III. A stone tablet erected by the Chinese Tussû of Nurgan in the year 1413 A. D. Now exhibited in the Muscum of Vladivostok.

Plate IV. Two pages of a "Bulletin of the Tartary Office" containing a petition to the Ming Emperor from the chief of the Garrison (*wei*) of Chienchou (ancester of the Ch'ing Dynasty), begging the Emperor to bestow favors upon him.

Plate Ⅰ 毌丘俭伐高句丽记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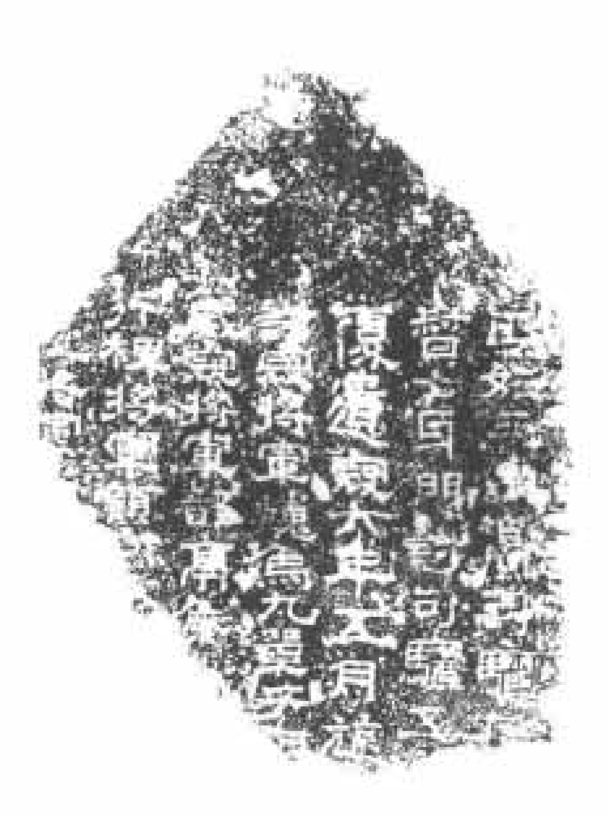


Plate Ⅱ 唐宣劳靺鞨使崔忻井题字
在旅顺黄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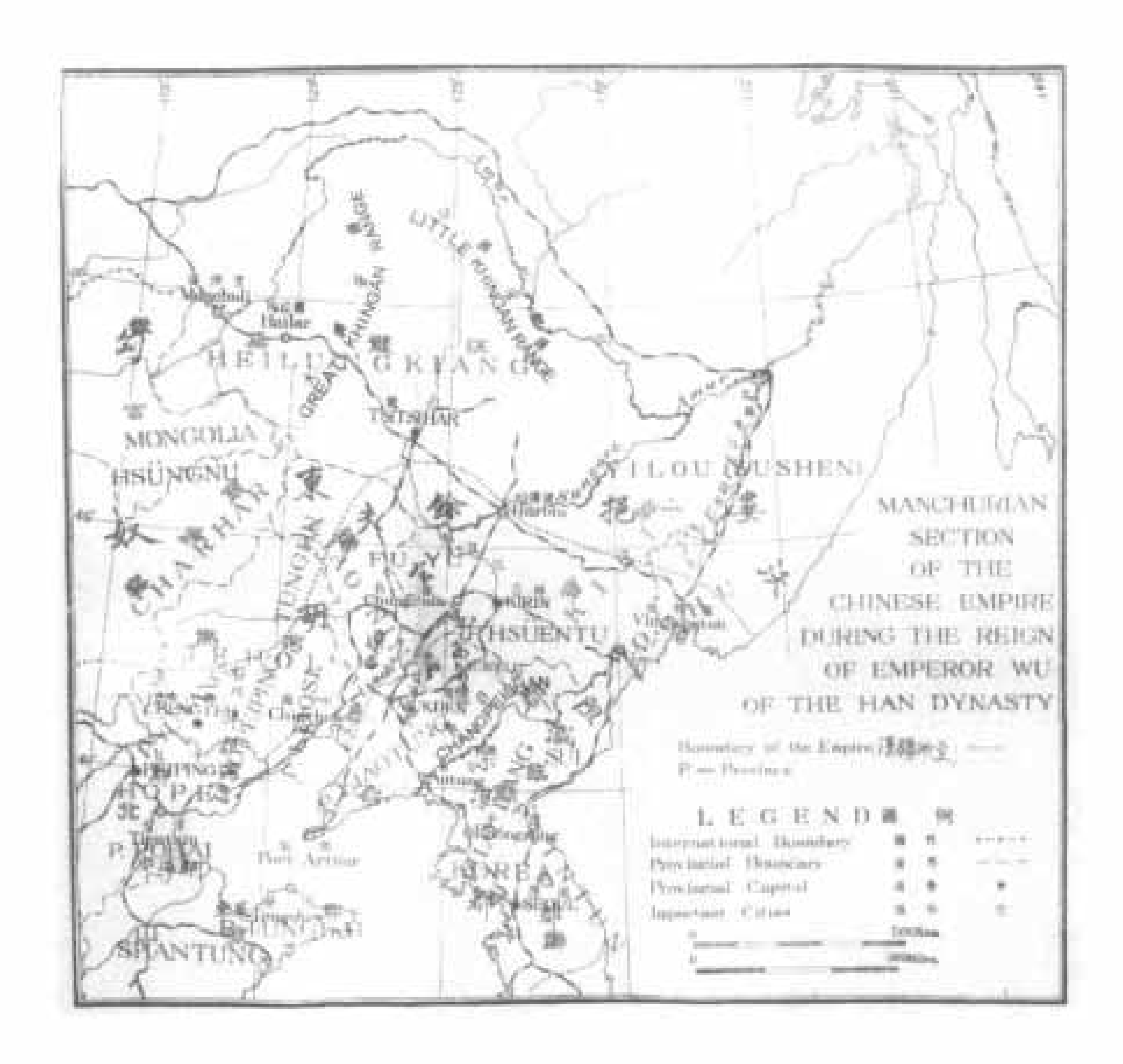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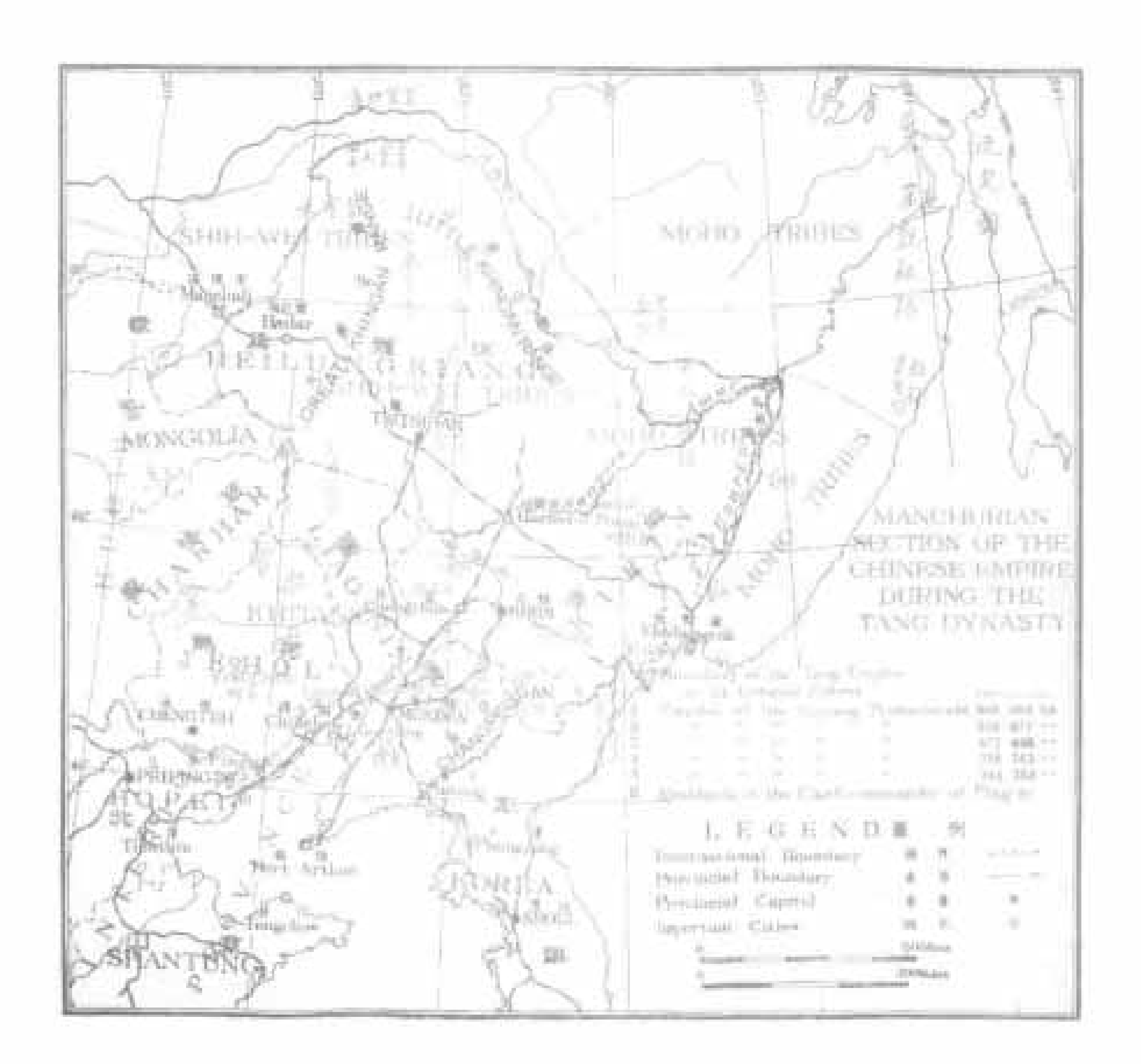
Plate Ⅲ 明永乐十一年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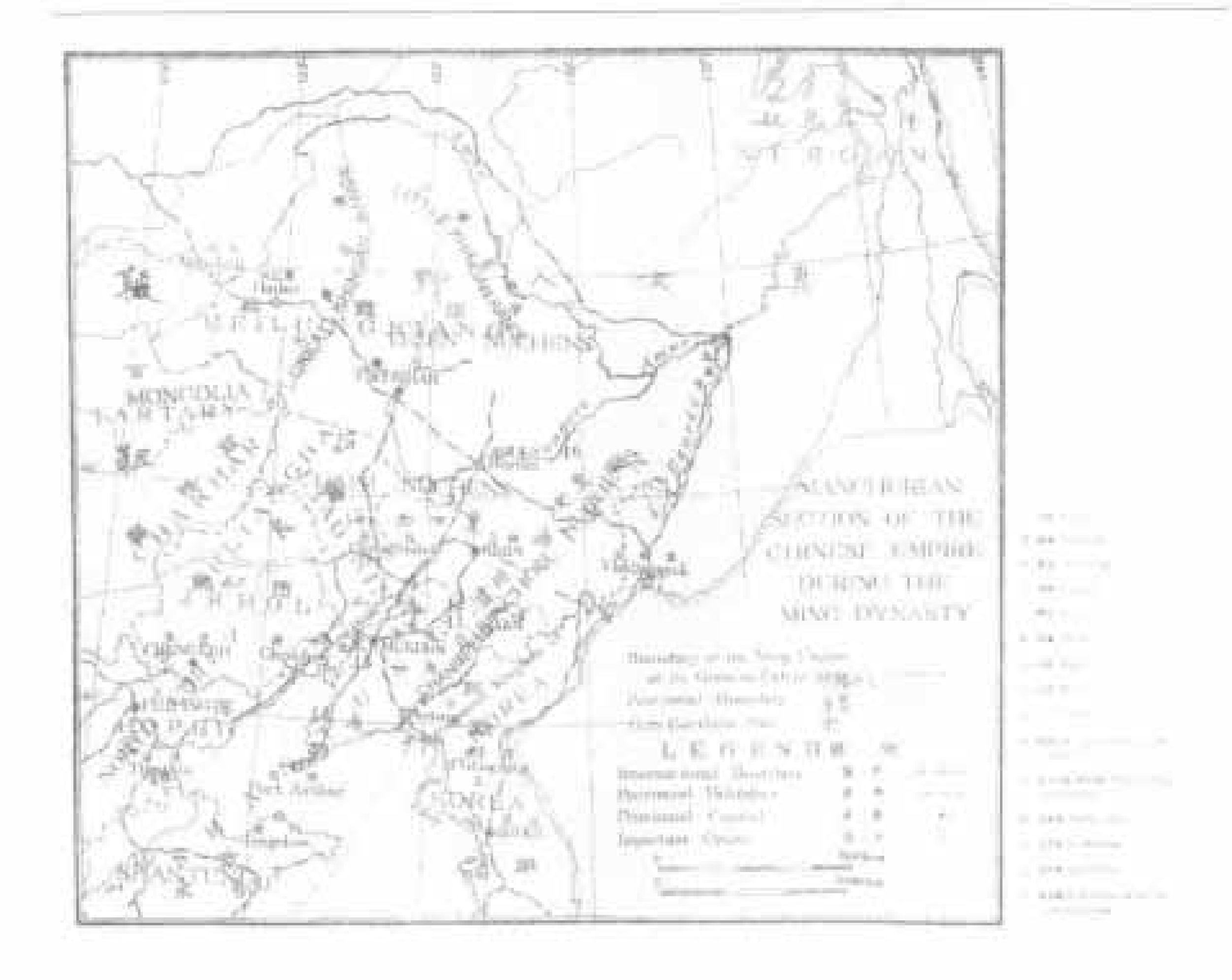


Plate Ⅳ 明"鞑靼馆来文"之二半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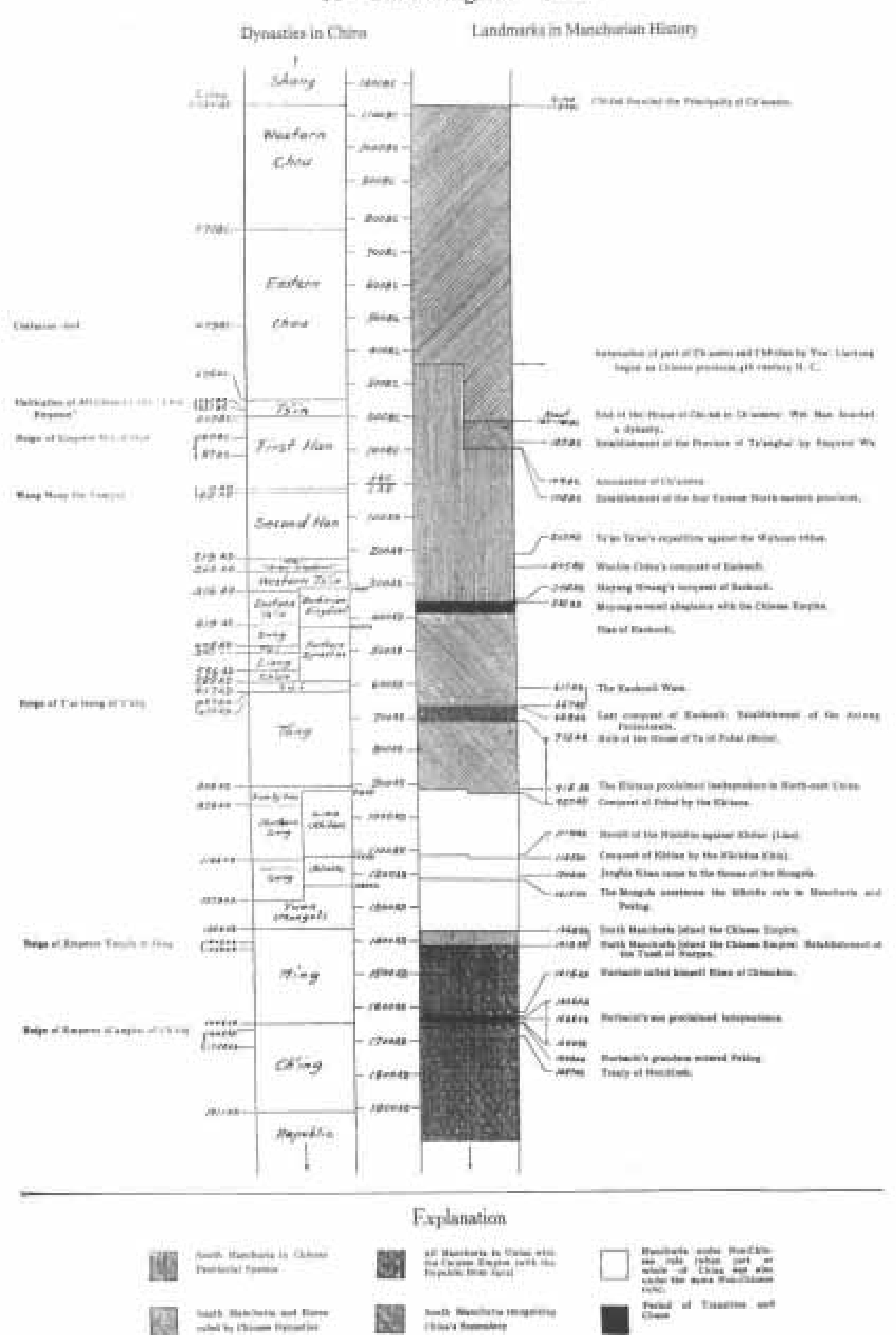



MANCHURIAN SEC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LEGEND
International Boundary
Provincial Boundary
Provincial Capital
Important Cities
HEILUNGKIANG
MONGOLIA
HSUNGNU
CHAHAR
FUYU
HSUENTU
KOREA
SHANTUNG
Tsitsihar
Harbin
Hailar
Port Arthur
LITTLE KHINGAN RANGE
GREAT KHINGAN RANGE


MANCHURIAN
SEC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MOHO TRIBES
MONGOLIA
Hailar
Port Arthur
KOREA
LEGEND


SECTION OF TH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EGEND
Port Arthur
KOREA

A Chronological Table



Summary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Peihai, Peiping, China

The Chinese have always shown a great interest in their past. This interest has been manifested not only in the many works ou history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but also in a very early development of antiquarian science, which can trace its beginning back to the 11th century A. D. But archaeology in the modern sense was not known to China till about ten years ago, when the famous discovery of Dr. J. G, Andersson at Yang-shao was made. The author has written elsewhere about this development.[1] Since the works of Dr. Anderson are already well known to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ientists through his various publications, this summary will be limited to the most recent excavations, namely the work that was carried out from 1928 to 1931,

Previous to 1928, them was no offi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that made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ts special function. Although various universities, museums, and learned societies wer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such work, the execution of their plans was handicapped by lack of regular funds or of proper authorization. Systematic excava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as difficult, The work of Dr. Andersson owes its success to a happy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it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and backed financially by a special Research Committee in Sweden. In 1928, the first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a (Academia Sinica) was inaugurated; a special section on archaeology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his academy. The rapid advance made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is mainly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is institute, in which not only has a regular staff of paid experts been maintained but also a special budget has been provided for this purpose. As an

[1]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Edit. by Sophia H. Chen Zen, pub. by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p. 215-26, Shanghai, 1931.

official organization, it has also been in a position to obtain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hich has added greatly to the strength of the working force.

1. Excavations at Yin-Hsü

The first site chosen by the institute for systematic work was Yin-hsü, near the village Hsiao－t'un, located a little less than two miles north-west of the city of An-yang hsien. The city lies approximately in latitude 36°6′N. and longitude 114°20′E., and within the Kin-han railway zone. Topographically, it is situated near the western limit of the north-eastern alluvium plain of China proper, and is less than 100 metres above the sea-level. Towards the west, the land rises abruptly forming the Tai-hong Range which further west passes on into the Shan-si Plateau. The Huan River that waters this region finds its way to the sea at Tien-tsin. Although the railway almost monopolizes transportstation in this region, some native products are still shipped to the seaport direct. As cotton and wheat are the main products, so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and flour are the modern industries of this district.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there are rich coal mines and a porcelain factory that boast of great antiquity. Although the city ia part of Honan Province, it is actually located more than 100 miles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ite was discovered a little over 30 years ago. In 1899, a curio dealer from Shantung first offered for sale in Peking some specimens of the oracle bones from this site, inscribed with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scholar and statesman, I-yung Wang, was immediately attracted to them, and their importance was quickly recognized. He became the first serious collector of these bones, but he died shortly after the start of this important undertaking. His collection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ieh-yün Liu, a worthy and energetic successor to the founder of this new science, who added a great deal to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and published the rubbings of the original in 1903.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rubbings was revolutionary, in its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Many talented minds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furtherance of this work. Not only was collecting continued, but serious efforts were made to decipher these newly discovered,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ask proved to be arduous, but by no means baffling. Centuries of cultivation of an interest in antiquity and palaeography had

fully prepared Chinese scholarship for the undertaking. Among the little group of enthusiastic devotees to this new science, Chên-yü Lo and Kuo-wei Wang stand out most prominently. In about ten years' time, they succeeded in deciphering about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se archaic characters, namely about 800. Lo's monumental work began to appear in 1911; it has been continued at intervals for many years.

One of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work has bee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site as the remai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which had its capital at this place some time between 1400 B. C. and 1200 B. C. This conclusion is obviously of great importance. Hitherto none of the existing written records earlier than those of the 8th century B. C. could be proved reliable, although traditions abounded. It is sufficient to recall that Confucius himself, living more than 2 400 years ago, lamented the lack of preci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Yin-Shang dynasty. This discovery, therefore, afforded a real thrill to those who realized its momentous importance. It has often been regremtted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early investigators, should have been limited to a single aspect, and tha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should have been deferred till the destruction of this site by reckless curio dealers had proceed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ut this seems to be the fault of no particular individual and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regrettable incidents connected with the modern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Academia Sinica in 1928, a rigid scheme of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was immediately planned. The choice of the first site and of the first man to have charge of the field-work was happily made at the very beginning. Mr. Tso-ping Tung, who has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succ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f the Institute than most others, was first ask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Yin-hsü site, so as to ascertain whether it was worth serious excavation. This mission was most ably fulfilled by Mr. Tung.

Mr. Tung arrived at An-yang on the 12th of August, 1928, and spent several days in making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is site, He found, contrary to the opinion held in many important circles, that the oracle-bone digging was. still unfinished and it was quite worth while to start systematic digging. A full report was immediately sen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Director Sze－nien Fu quickly recognized the urgent need for prompt action and decided to start the work at once. The necessary permit was soon secured and funds provided for Mr. Tung to carry on the work. With a staff of six members, the preliminary digging at this site was started

on the 17th of October, 1928.

First Season in An-yang

The digging lasted 18 days. As it was primarily experimental in nature, the method of trenching, chiefly, was followed. The results obtained were much beyond the original expectation for there were found not only large numbers of oracle bones, but also many associated artifacts; many underground observations were also made.

The collection from the first digging included 555 fragments of inscribed plastrons of tortoise and 229 fragments of inscribed scapulae. Bone implements, coweries, and shell ornaments figured abundantly among the associated finds. Stone axes and bronze arrowheads were found co-existing in the same stratum.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of this preliminary digging is to have proved definitely that the site still contains many buried treasures of historical value, although destruction of this site had been going on for almost 30 yeas. Ev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ditional antiquarians, the recovery of the several hundred fragments of oracle bones inscribed with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is a momentous event. Thus a consensus of opinion was reached that systematic excavati on at this site should be started.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oracle bones from this site, to which several reference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Ethnologists have long been interested in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the art of divination by a shoulder blade, technically known as scapulimancy or omoplatoscopy. The origin of this practice has been traced back to eastern Asia and is considered by a number of ethnologists 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practice of scorching tortoise-shells for purposes of divination. However, this early Chinese practice was known only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ill the discovery made at Yin-hsü, which not only confirmed the ancient tradition, but also revealed the fact that scapulae were used as well as tortoise-shells.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scapulimancy, the word "plastronmancy" has been coined to designate the practice of divining by the undershell of the tortoise. Recentl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arapace of the tortoise was occasionally used, but so rarely that it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an 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rule.

What is peculiar in respect to the scorched shoulder blades and tortoise-shells of Yin-

hsü i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many cases inscribed with queries and answers regarding parlicutar avents chosen for divination. The majority of these bones, however, are not inscribed. But it is the inscribed bones that make this site unique an its importance. From the inscriptions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can be gathered regarding religious practice, economic lif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ir importance to philologists is, of course, even greater.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y are the most reliable data to serve as aorchaeological basis, by means of which the value of other associated finds can be judged. Wha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they have survived in numbers sufficient for a thorough study.

Spring Season of 1929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joined the Academia Sinica in November, 1928, while concurrently holding the post of a staff member of the field part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For years, it had been the policy of the Freer Gallery to do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 in co-operation with some Chinese institution;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was the third one with which the experiment was tried. The author was entrusted to carry on the work, and the Academia Sinica generously allowed him to organize a field party to start systematic excavation at An-ya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expense involved both in the field and the laboratory was to be shared by both organizations.

The excavation was commenced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929. In making plans for the season's work, four general problems were considered a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1) the surface features of the sit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rrounding topography; (2)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3) the extension of the site; (4) the nature of the remains that could be definitely dated back to the Yin-Shang period.

Systematic trenches were cut in the southern portion near and around the village where Mr. Tso-ping Tung made has discovery of oracle bones in the first season. The work had continued for two months, when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untoward development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necessitated a sudden halt in the field oper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observations made in this season were in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It was definitely concluded as a result of this season's work that the main un-

derground deposits of this site are the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Yin-Shang period: into this are intruded a number of burial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In some parts, the superficial layer is made up of modern debris; but this is comparatively unimportant.

Again, a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s was among the more important new finds.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made on the ceramics, both complete and fragmentary, which were defini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racle bones in undisturbed strata. These proved to comprise quite a rich variety; the coarser group are string-impressed, or plain, and comprise both hand-made and wheel-made, as do the finer group, which are grey, black, or white. Decoration on them was executed by incision. In contrast to the Neolithic potteries discovered by Dr. Andersson, there is no painted pottery.

Leg-bones of oxen and deer horns were the principal remains of animals, and arrowheads, the chief bronze articles. Bone implements were comparatively abundant; of these the most interesting group was the hair pins with the top part carved into a conventionalized type of cock like some of the prehistorical Egyptian hair pins. There were also bone awls and bone arrowheads. The latter showed a greater variety of types than those made of bronze. Fragmentary parts of shell ornaments were numerou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re the clay moulds which were evidently used for casting bronze and which indicated an extensive bronz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stone adzes and knives as well as stone arrowheads were also found.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contents tends to show that while an advanced bronze industry was already developed in this period, stone was still used to make tools that were later made of metals.

In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field staff all returned to Peiping. The Institute decided to publish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is excavation in periodical form. The first number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articles:

1. Report of the trial diggings at Hsiao-t'un in 1928.—Tso-ping Tung.
2.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deposit at Hsiao-t'un.—Chi Li.
3.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otteries from the Yin-Shang period.—Chi Li.
4. A study of plastronmancy.—Tso-ping Tung.
5. Copies of the newly-discovered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with notes and comments.—Tso-ping Tung.

Fall Season of 1929

Excavation was resumed in the fall. The field of operation was changed to the north-

ern section of the site where bronze mould was discovered in the last season. Trenching was employed on a larger scale. It was started in October and continued till the middle of December. Sectional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main cultural remains, if undisturbed by later intrusion, are usually covered by a protective layer. The discoveries of this season were both rich and diversified. A number of rectangular and circular pits were uncovered, some of which had very rich contents. The nature of these pits has been quite a puzzling problem as their size varies a great deal and their contents are sharp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For instance, the depth of several of them reached beyond the water-level at the 12th metre and they contained mainly animal bones and potsherds. Some showed complete skeletal remains; others proved to be the cache of oracle bones.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to say whether all these pits were used for only one purpose.

More than 3 000 fragments of inscribed bones were found during this season's excavation. Among these were four inscribed plastrons, which were half or more than half complete, and one bore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character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important documents has thrown 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plastronmancy. They have also furnished the fundamental data for a structural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A large collection of potsherds was made, among which were represented many fragments of white pottery for which this site had long been famou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among the ceramics was a group of hard-baked potsherds with a thin splash of satt glaze on the outside, evidentty of artificial origin. These were found in the previous season, but their stratified position was determined only in the fall excavation. What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was the discovery of a single fragment of painted pottery of the Yang-shao type from an undisturbed oracle-bone stratum. The fragment of Yang-shao painted pottery was so foreign to the whole ceramic contents of this site that it may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an article of trade or an ancient survival.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whole cultural contents of both Yin-hsü and Yang-shao cultures must be at least as early as the Yin-Shang period, and quite possibly much earlier. For the first time a definite landmark had been found for discussing the chronological problem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Mixed with the myriads of potsherds, animal bones, inscribed plastrons, and scapulae, were various bronzes and bronze moulds, stone implements and stone works of art, shell ornaments and bone ornaments. The deepest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general pub-

lic was arous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 under piece of a stone torso in a squatting position. This portion was originally found in four broken pieces, and was restored in the laboratory. Both the arms and the legs are fully decorated by incisions in patterns typical of this period. Many theories have been advanced to explain its possible use.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architectural ornament, used probably to support a sacred post like that used in the sacred house of the New Zealanders. The back part of this torso shows a trough, still retaining traces of lime. This might be an indication of the fact that it was originally inserted into a wall. The feet were movable, but were not recovered. The incisions on the arms and legs obviously represent tattooing. The measurements of this fragment are: Maximum height, 22. 8 centimetres; maximum width, 26. 5 centimetres; maximum depth, 21.3 centimetres. Other work, of art consist of articles made of bone, shell, and ivory. Some incised works inlaid with turquoise are still well preserved. Most motifs show a number of variations that can be arranged in a serial order. On the whole they confirm the traditional idea about the art type of this period.

In the spring of 1930, the field work was diacontinued for a season. Meanwhile,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hich had co-operated with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for the two seasons, in 1929 found it expedient to permit the author to resign.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ounded and endowed a Research Professorship in Archaeology in the Institute, and the author was appointed as the first occupant of this position for a term of five years (1930–5).

This year the second number of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An-yang Excav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It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articles:

1. Excavation at Yin-hsü in the autumn season of 1929 and some of the important discoveries. —Chi Li.
2. A study of the stratifications of Yin-hsü. —Wei-jan Chang.
3. On the inscriptiona of an ox head. —Tso-ping Tung.
4. Hsiao-t'un and Yang-shao. —Chi Li.

Spring Season of 1931

Excavation was resumed in the spring of 1931 with a larger staff and an increased scope of activity. Excavation was carried out not only in the Yin-hsü site itself but also in

two neighbouring mounds which showed signs of great antiquity. As in previous seasons, two months were spent in digging; a great deal of fresh material was collected that bears a relation to important problems. The most significant group of these new discoveries is the bronze tools and weapons. Hitherto only minor bronze articles had been found, but this season's work brought forth a number of large bronze obiects, among which, were spear-heads socketed celts and a decorative piece which was hidden in a cache. Photomicrographic examinations of these, specimens, undertaken by Sir Harold H. C. Carpenter of the Royal School of Mines, show that most of them contain from 15 to 20 percent of tin. Unfortunately corrosion has gone so deeply into the material that a chemical analysis is impossible. It is, however, quite sade to conclude that the technique of casting bronze was completely mastered by the Chinese of this period.

No less important are the further discoveries of pit foundations some of which must have been used for dwellings. The existence of an extensive area of stamped eart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y must be house foundations, the superstructures of which had long before disappeared.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e of dwellings is so importa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it by further excavation is so great, that it has been made the central problem of this season's work in An-ya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spring season of 1931 included, of course, many other artifacts such as additional specimens of oracle bones, ivories, etc. Special interest was aroused by the uncovering of a complete under jaw of an Elephas (indicus?) and the shoulder blade of a whale. The presence of the remains of elephants in this site was, however, an old story. Not only had many articles of ivory been recovered from this site previously, but the pictorial character "elephant" or Hsiang is often met with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 Chung-shu Hsü,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collected all historical data referring to this problem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and concluded that elephants were actually roaming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the Yin-Shang period.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was very gradual and it was not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they becamc extinct in China. Thu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remains from this site fully confirmed the historical data.

The third number of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is excava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summer of this year with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articies:

1. Notes on four inscribed plastrons, —Tso-ping Tung.
2. Testudo anyangensls. —Chih Ping.

3. Face-down burials. —Chi Li.

4. Time-reckoning of the Yin-Shang period. —Tso-ping Tung.

5.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siao-t'un and Yang-shao, —Chung-shu Hsü.

It is impossible to exagge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ite, and the Archaeological Section of this Institute has decided to carry on the excavation toward completion.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of the foregoing excavation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main cultural stratum of this site represents remains from a period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Chou dynasty (1122 – 314 B.C.), namely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hang dynasty, when it was occupied as the capital.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mainly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oracle bones.

(2) The name of kings mentioned in the oracle hones are fundamental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list given in Szc-ma Ch'ien's Shi-chi, one of the oldest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Chinese.

(3) The technique of casting bronze was well known to the people of this period. Many weapons and some tools were made of this alloy, e.g. spearheads, arrowheads, socketed celts, and knives.

(4) Stone and bone were still extensively used to make tools and articles of daily use. Many stone knives and stone adzes were found; also many bone hair pins and awls.

(5) Dwellings were constructed on stamped earth; neither tile, nor brick, nor large stones were used for this purpose. Some pits seem to have been house foundations.

(6) Several types of ceramics can be differentiated. Those in the coarser group often bear string impressions, and are mostly hand-made; they usually vary from light grey to black, but some are brick-red. The finer ones have a smooth appearance, more often with simplc incised decorations, and are wheel – made. The more elaborately decorated group are the white potteries, which are both hand-made and wheel-made. A fourth group are hard – baked, with a splash of salt glaze on the outside. The forms are very rich; the handle piece is absent.

(7) The daily life, of the king at least, was evidently very rigidly regulated by scapulimancy and plastronmancy, This is proved by the great abundance of oracle bone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inscnpticms on them.

(8) Art works were executed on pottery, shell, bone, bronze, stone, and ivory. Incision and inlaying were the main techniques. Motifs included both geometrical patterns

and conventionalized animal forms.

(9) Characters were largely pictorial, but many had already developed beyond this stage and become symbolic, and in a few cases even phonetic.

(10)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oracle bones recorded mainly the following events: sacrificial offering, hunting, military expeditions, king's tours, weather, crops.

2. Excavations at Ch'êng-tze-ai

While the Yin-hsü excavation was interrupted in 1930, the Archa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started new explorations both in Shantung and Manchuria. The work in Shantung was carried on by Mr. Ging-ding Wu, an assistant of the Institute. A number of new sites were discovered as a result of his trip. In the autumn the majority of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ection were sent to Shantung and a site near Tsi-nan (the capital of Shantung), known as Ch'eng-tze-ai was chosen for excavation. The choice was based on Wu's discovery at this site, of a new type of ceramics which was qutte unknown before. Furthermore, these ceramic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stone artifacts.

Digging w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November and lasted for a whole month. It resulted in the uncovering of two superimposed cultural layers. The upper stratum revealed a culture that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Bronze age. Bronze arrowheads of the Yin-hsü type were found; one of them was recovered from the bosom of a dead soldier near the foundation of a wall made of stamped earth. The ceramics from the upper layer are almost uniformly grey, often bearing impressed marks. Scapulae were used for divination purposes, just as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but they bear no inscriptions, and plastrons for this purpose were never found.

It is, however, the cultural contents of the lower stratum that make this site unique in its importance. These represent fully a pre-metallic culture with many types of stone artifacts: axe, adze, knife, arrowhead, and semilunar rectangular knife. These stone impl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a group of black ware, beautifully polished, and in a variety of elegant forms.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thin, the thinnest being comparable to egg shells. Bowls, jars, pots, and tripods are the main shapes. The coarser wares are grey and dark; they are more abundant and, like ceramics from other ancient Chinese sites, Li-tripods predominate. Among other associated finds, implements made of bone and shell

may be mentioned. Awls, pins, hair pins, and chisels are made of bone, while shells were utilized to make knives, probably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What age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se cultures? It must be said that no evidence has been secured for a definite solution of this question. Nevertheless some observations may be made concerning a chr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re is little doubt, for instance, that the lower stratum represents an entirely Stone-age culture, while the contents of the upper stratum show evidence of affiliation with Yin-hsü. The type of bronze arrowheads, and scapulimancy, to nam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 very similar in both sites. Some have tried to identify the culture of the upper stratum with the dukedom of T'an, mentioned in the Confucian annals. This identification is probable enough, and although it does not rest on any secure foundation, it indicates approximately the period to which one may assign this culture, namely some time near the early part of the first millenium B. C., possibly even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Yin-Shang period.

The Stone-age culture that occupies the lower stratum is no doubt earlier than the upper one. Its manifold relations with Yin-hsü and Yang-shao form a source of interesting speculat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Yang-shao type of chalcolithic culture,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north China, has never been discovered in the Shantung Peninsula and adjacent regions. It is therefore interesting to inquire whether this newly discovered Stone-age culture near Tsi-nan with its beautiful black potteries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Yang-shao culture of painted ceramics. Both its contents and its stratified position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is might be the case. If so, it would mean that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 of north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wo definite areas: the eastern area represented by the Ch'êng-tze-ai culture with its black potteries and the western represented by Yang-shao and its related sites. From the contact of these two Neohthic cultures,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Chinese culture gradually emerged, such as is represented in Yin－hsü in its advanced stage. It is important to record here that the latest excavation at Yin－hsü has revealed the survival of both painted and black pottery, substantially confirming the above theory.

3. Other Work

The above is a summary of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which the author has partici-

pated. Other archaeological work has also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Unfortunately up to the present time no authentic publications on these works are available, so only a brief mention of them can be made.

Of thes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archaeological trip taken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e by Mr. Su-yung Liang to Tsitsihar in north Manchuria in October, 1930, where he excavated a grave of Neolithic age. The burial goods consisted of stone axe, incised pottery, harpoon, and other articles made of bone. The skeletal remains are in a somewhat dilapidated condition. This excavation will be described by Mr. Liang and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n his return trip from this excavation he went to Lin-si, Je-hol, where he made a surface collection of stone artifacts, which he expects to study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collections previously made by various French and Russian archaeologists.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eiping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sent 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n the spring of 1930 to I－hsien Hopei, where systematic excavations were carried on at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Kingdom of Yen. It is said that a rich collection of architectural remains was made from this site, which is still being studied.

The archaeologists attached to Sven Hedln's Expedition to Chinese Turkestan have made many important discoveries both in Turkestan and Kansu.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is probably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the Han documents written on splints of wood. However, no authentic publication regarding these discoveries is now available.

The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for Wome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Shan-si Provincial Library sent a joint expedition to Chin T'sun, Wan-chüan hsien in the Province of Shan-si in April, 1931, where a Neolithic site of the Yang-shao type was excavated. The site is said to have yielded painted potteries, stone artifacts, and to show foundations of pit-dwelling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various discoveries at present, as the author has had no chance to examine the artifacts from any of the above discove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Mr. Liang's collection. There is little doubt, however, that they are all quite important and will throw a flood of new light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a whe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properly published.

原载《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会议录》第4卷,英文版,1934年

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pecimens of Anyang

In the corpus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white pottery from Hsiao-t' un and Hou-chia-chuang, patterns 23, 24, and 25 arranged together show three definite stages of the dissolution of a pattern from a relatively well-organized unit to a loosely assembled jumble , (Fig. I: a, b, c)[1]. This discovery rather intrigued me and induced me to look for further examples of this kind, that may indicate a securely based time sequence; for as two of the white pottery examples mentioned above, taken from Professor Umehara's books[2], had unknown provenances, they are consequently without precise dating value.

The result of my study of the hairpins excavated from Hsiao-t' un and Hou-chia-chuang more than fulfilled this expectation. I have, in a Chinese article[3], described somewhat in detail these 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but as they are not easily available to a non-Chinese reading public,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reproduce some of the material evidence her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main point of the present thesis.

In Figure 2 are shown five bone hairpins, which obviously form a definite series, unfolding clearly five stages of dissolution of a pattern, carved as a roos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ies (Fig. 2: a), but ending in a purely geometrical shape (Fig. 2: e), which, if isolated from the series, might be susceptible to all sorts of uncertain interpretations.

---

[1] Plate VI, Li Chi, "Evolution of the white Pottery of the Yin Dynasty",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cademia Sinica, Vol. XXVIII, pp. 853-876.

[2] Sueji Umehara, Etude sur la Raine de l'ancienne Capitale des Yin, Kyōto, 1932 Plate XXIII. Also, Studies of Anyang Remains, 1941, Kyōto, Plate XIII.

[3] Li Chi, "Chrono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metery Site at Hou-chia-chuang and the Dwelling Site at Hsiao-t' un as evid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airpin Patterns", *BIHP*. Vol. XXIX, pp. 809-816.

Each of the middle three stages in this series is represented by more than one specimen, found both in the cemetery site of Hou-chia-chuang and the dwelling site of Hsiao-t'un. The Hou-chia-chuang specimens were discovered from a number of tombs showing definite stratified sequence, so it is possible to give them relative dates, for instance:

One specimen carved in the style of stage 2 (Fig. 2: b) was found in HPKM 1001, the earliest large tomb in this area, excavat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Another specimen carved in the style of stage 3 (Fig. 2: c) was discovered in HPKM 1002, whose approach cut across Tomb HPKM 1004; and HPKM 1004 in turn was superimposed on HPKM 1001. So HPKM 1002 is at least two generations later than HPKM 1001. It is obvious that it took at least a similar interval of time for stage 3 of this series of hairpins to be evolved from stage 2.

Examples illustrating stage 2 and stage 3 were both found in Hsiao-t'un, the dwelling site; and wha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to find is that hairpins carved in the style of stage 1, a more or less realistic modelling of a rooster on a pole (Fig. 2: a) which never appeared in the cemetery site of Hou-chia-chuang, are represented by no less than three specimens in the Yin dynasty remains of Hsiao-t'un. Two of these specimens were found from the very bottom of some deep- sunken storage pits (H195, H201) excavated at Hsiao-t'un, and the third one came from an early layer of a well stratified deposits (E7). These discoveries serve to show, that the large tombs at the Hou-chia-chuang cemetery started with HPKM 1001, were built comparatively late, as compared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capital site by the Yin people at Hsiao-t'un.

Hairpins at the stage 4 development (Fig. 2: d) were also found both at Hsiao-t'un and Hou-chia-chuang; but the find representing the last stage of this series (Fig. 2: e) is a solitary example, surviving only at Hsiao-t'un.

From the two sites, seventeen specimens composing this series were dicovered, their distributions in the five stages, are as the following:

Stage	Total Number of Specimens	Distributions	Illustrations
1	3	All from Hsiao-t'un	Figure 2: a
2	6	5 from Hsiao-t'un 1 from Hou-chia-chuang	Figure 2: b
3	5	4 from Hsiao-t'un 1 from Hou-chia-chuang	Figure 2:c
4	2	1 from Hsiao-t'un 1 from Hou-chia-chuang	Figure 2: d
5	1	Hsiao-t'un	Figure 2: e

The above table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is particular pattern of hairpins, —the flat topped bird group-is shorter at the cemetery site than at Hsiao-t'un. In Hou-chia-chuang, neither the beginning nor the end of this series was represented.

Hou-chia-chuang's specimens, however, have furnished valuable dating criteria. The relative sequence of stage 2 and stage 3 determined by the stratigraphical records from this site is of basic importance, as in this sequence, time interval is definitely correlated with stages of dissolution. I say "dissolution" because specimens representive of stage 2 still retain the bird's shape, while at stage 3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figure of a living bird is al-most endrely lost in all the specimens. From this determination, stages 4 and 5 follow as a matter of course; and the three specimens from Hsiao-t'un constituting stage 1, not only typologically are the obvious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stage 2, but their provenances shown by the digging records also prove that they came from the early strata of some intact deposits of the Yin cultural horizon.

It remains to inquire whether this tendency to dissolution was always a gradual replacement of animal patterns by geometrical representations. This is obviously not the case;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is period, the dissolving process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manifested itself in manifold ways, depending upon the field of decoration, the shape and the material to be decorated as well as the technique of its execution; and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inspiration of the decorative artist at the moment of his work. Two more examples may be cited to illustrate what is meant.

In Figure three (Fig. 3) are given illustrations of three hairpins, all carved of spodumene, which show quite clearly the dissolution of a human face. The earliest stage of this series is missing. But the first of the three figures (Fig. 3: a) still keeps a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 human countenance, while the under jaw is already dissolved. In Fig. 3: b,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riginal pattern representing the human face is nearly complet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any trace in this particular pattern, when examined by it self, of human representation except the eye. But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type of eye are shared by many other animals in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is period. What the stone carver really meant to express by this hairpin may forever remain a matter of guess. But it is obvious 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particular design is derived from the half-dissolved human face as shown in Figure 3: a. The quarter-turned position of the eye in this specimen may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but its retention, together with that of the curved crest at the top, serves as an unmistakable genetic link with the specimen illustrated in Figure 3: a. Specimenc of the same figure (Fig. 3: c) is a copy of specimen b (Fig. 3: b) with the addition of a punctuated round hole. It shows quite clearly that from this stage on, the "eye" element became gradually isolated from its original background, and followed an independent line of development down to the succeeding Chou dynasty.

Franz Boas observed in his study of the art of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 that one of the methods of representation adopted by the native artists is to cut the animals in two equal halves so that: "the profiles are joined in the middle, or a front view of the head is shown with two adjoining profiles of the body."[1] It might be pointed out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is particular 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mentioned by Boas was practised in the Yin-Shang Period in China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years earlier. Figure 4 gives four examples of this kind, all taken from decorative pieces attached to chariots and cast on bronze. They were all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ang. From the same site, animal figures cast or carved in plastic forms, which may serve as the prototypes of these split profiles, were also discovered. It is there fore a matter of simple deduction that this symmetrical arrangement resulting from the bisection of an animal body is also one of the dissolving processes which followed the period of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imal art. It is perhaps this particular branch which inherited the major part of the classical Yin-Shang tradition, and revived the animal style in a later period.

I have collected these few examples here just to show once more that every decorative pattern has a life history of its own; and ea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In the Yin-

[1] Franz Boss, Primitive Art. Oslo, 1927, p.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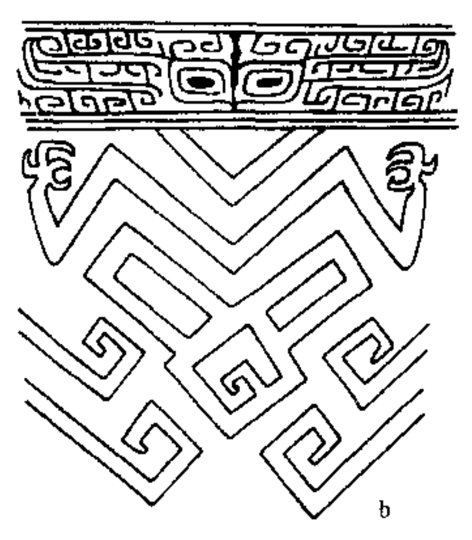
Shang dynasty, the animal style no doubt dominated the field of decorative art for quite a time. Then followed a period of dissolution, during which each individual pattern disintegrated after its own fashion. Some of these patterns degenerated into unrecognizable shapes, others were dissected into individual bodily parts, some of which might acquire a new growth in the course of time and become combined with other elements to give birth to new patterns. Still others were systematically bisected and rearranged into composite animals. The above examples show clearly what really happened.

原载纽约《亚洲艺术》(英文版)第22卷,第1-2期,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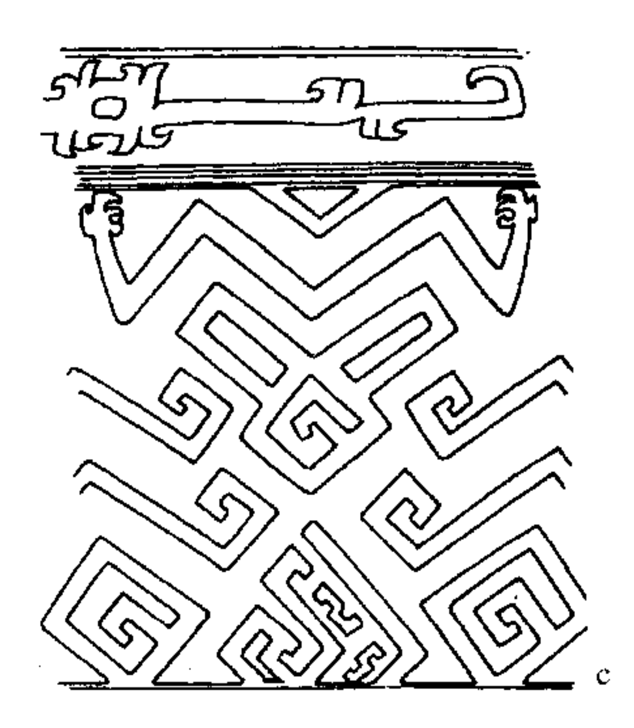
Fig. 1. Three Examples of a Decorative Pattern from White Potteries



a



b



c

Fig. 2. Evolution of the Flat-topped, Bird-headed Hair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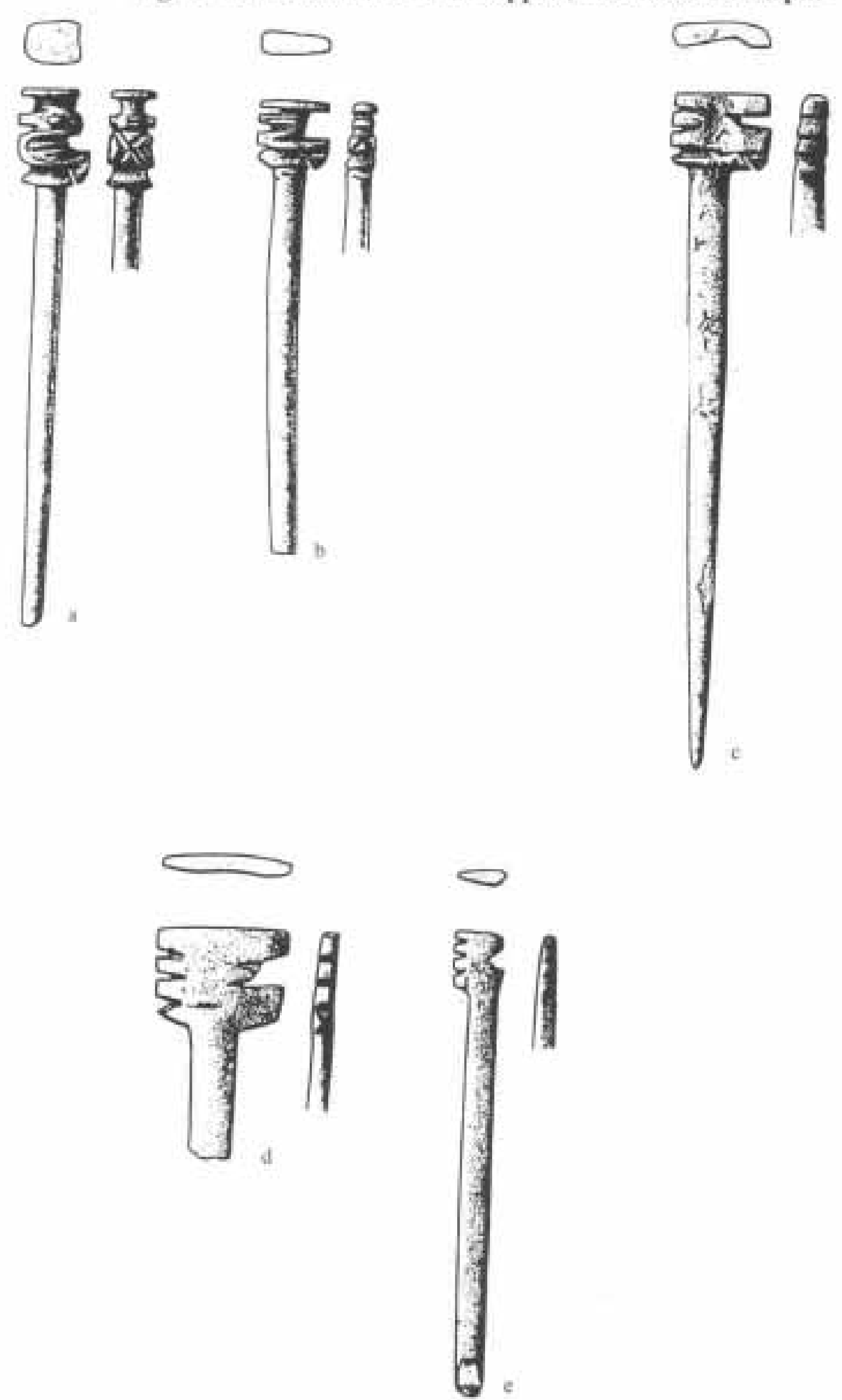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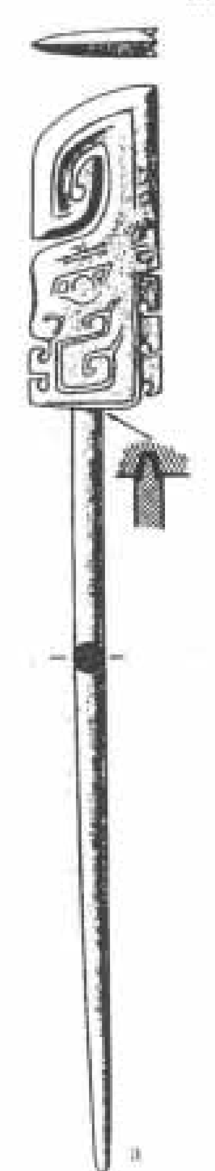


Fig. 3. Human Face and its Derivatives Adorning the Top of Hairpins Carved of Precious St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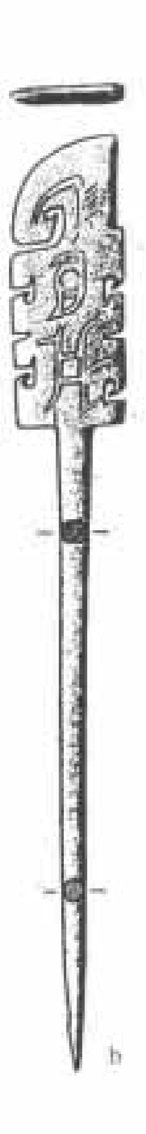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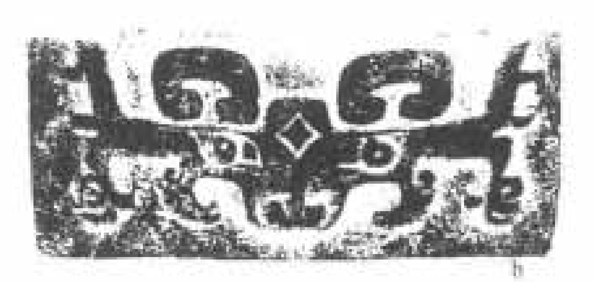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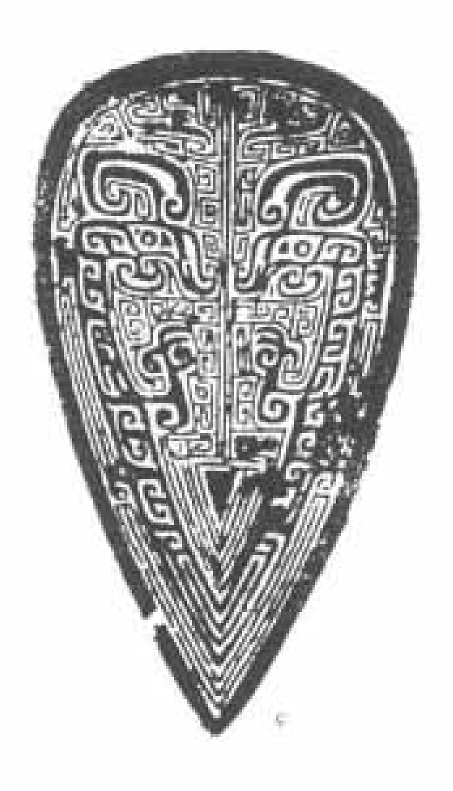




Fig. 4. Four Examples of Decorative Bronzes


a


b


c


d

Chinese People *

1. On the Mongoloid Race

I have been assigned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subject "Chinese People". Now, Gentlemen, this is certainly a tall order. Ordinarily, when you ask somebody to say something about a certain people, what you have in mind are prob ably these:—What do these people look like? What kind of language they talk? And finally, how do they behave themselves in everyday life? If we put these questions in a more technical language; the first question, concerns what we call physical anthropology; the second one,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and the third one, has to be assigned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Following these generally accepted ideas, I imagine, I am supposed to tell you, today, within the limit of sixty minutes about all of these. Namely,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in an anthropological sense; the kind of language they talk; and how they behave themselves both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But as I looked at your general program, I find out that you will have plenty of people to tell you how the Chinese behave themselves, and also the kind of language they talk. So the only thing reserved for me evidently, is to give you some idea about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So much about generalities.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has been pursued in the last half a century rather sporadically. There have been in this period, no thorough going investigations of the physical traits of Chinese people from one region to another systematically planned before hand by any responsible learning body. But there is a

---

* Delivered before the Summer Institut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t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on July 6, 1962.*

number of small investigations which have yielded results that are more or less significant. And upon these results, anthropologis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general aspect of human biology, especially of the modern period, rely chiefly for their information. I have no time to go, as you can easily see, into any detail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so I shall deal only in a general way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results which have come to our attention.

To start with, it may be said that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scientists tried to classify mankind on a biological basis, say, since the time of Blumenbach,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Mongoloid race. There have been, of course,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the exact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scheme of this racial classification. But from the time of Blumenbach down to Professor William Howells who made his latest pronouncement in 1961,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is biological arrangement, has not much changed. In other words, the Chinese people has been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classified by anthropologists as a branch of the Mongoloid race. So in order to go into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it may be pertinen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Mongoloid race first. But this, unfortunately, is rather a difficult task. What I mean is that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at present, by no means know much abou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Mongoloid race, although different anthropologists may have different theories, to interpret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is particular branch of modern mankind. It has been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hysical traits of a Mongoloid are found on his face. The modern Mongoloid people, it is often said, carries his characteristics on his face more expressively than on other parts of his body. And these traits consist of the almond eye, the flattish forehead, the more or less depressed nasal root, the broad, heavily patted cheek bone. In other words, the Mongoloid face as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Caucasoid or the Negroidpeople, looks flat.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regarding this cluster of typical Mongoloid traits, the best known theory to explain their orgin and formation, is the climatic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most ably expounded by Professor Carleton Coon and supported very widely by his pupils and Harvard friends. The theory is that the particular facial appearance of the Mongoloid people had its origin in the necessity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bitterly cold weather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age, when a group of early Mongoloid were trapped in a dry cold region somewhere east of the Ural Mountains in northeastern Siberia.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people at that time had already invented shelter and clothing which were sufficient to protect the other part of their body. But the facial part of it was by ne-

cessity exposed. So this severe cold climate wiped out the unfit by pneumonia and sinus infection. But those who happen to be protected in the sinus region and the eye region by a heavily patted layer of fat, and small nasal apertures, were more qualified and had a better chance to survive in this kind of cold weather than their fellow creatures. The result of this kind of severe struggle, as one sees,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oid face.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oid face could not have taken place very early. It must have started only after the New World were already settled down by the first migration of Homo sapiens. Professor Howells, suggested that the Mongoloid face was probably originated sometime between twenty five thousand and ten thousand B. C. ; he is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about six hundreda generations were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articular racial trait. This, of course, still leaves the origin of early Mongoloid in a myth. In other words, while one can satisfy oneself b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what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most typical Mongoloid features, there still remain a number of other bodily character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Mongoloid people, such as their pigmentation, hair structure and the peculiar anatomy of their teeth, etc. whose ontogeny is still a matter of speculation.

2. The Raci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 much about Mongoloid race in general. Let us turn our attention now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is supposed to be an offshoot of the Mongoloid race. One of the best papers on the anthropometry of the Chinese, is by Professor Paul H. Stevenson who measured more than one thousand Chinese soldiers recruited mainly from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by Academia Sinica in 1938. There are 66 direct measurements made on the body of these soldiers. In addition, Stevenson also made quite a number of what the anthropologists call the non-metrical observations: such as the skin color, the hair structure, the nasal form, etc. In this paper, one may find some of the most reliable data about the bodily character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With this group of data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one finds, in comparing the various physical measurements pu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by various investigator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y no means uniform or homogenous in their bodily constitution. To take a few examples, the stature of the Chinese varies considerably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he northern Chi-

nese for instance, are taller than the southern Chinese by an average sometime as great as almost 9 cm., depending, of course, upon the samples taken. Another physical character usually studied by anthropologists is the cephalic index. In this respect, the Chinese also differ some what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one finds both in Shantung and Kansu, for example, the concentration of some comparatively long-headed people (Dolichocephalic), while in Central China, such as Hunan and Southern Hupei, or certain parts of Fukien, the local population is quite broad headed (Brachycephalic), the average index may be above 85. But in general the average cephalic index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is usually given as a little below 80, while in the north, the published figure for the C. L average is over 81.

In the case of nasal index,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ccording to some statistics, is even greater. The northern average given by Stevenson is 68.66, while the southern average according to Shirokogoroff may be as high as 93.19.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physical traits are of some popular interest, and are usually 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ly significant. Unfortunately, so far as the Chinese area is concernod, the qualifies of these works are in my opinion of unequal value. Besides, none of these three measurements represents any typical Mongoloid character. The Mongoloid characters which are more or less investigated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re two. First, the almond ey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structurel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ongoloid fold. It has been also studied with regard to the general pcsition and its orientation. The second typical Mongoloid feature is the high cheek bon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by anthropologists with reference to its angle formntion and bi-zigomatic width. Now, I propos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se two typical Mongoloid traits as foun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irst, let us take up the so-called almond eye, about which Stevenson has given these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Mongoloid fold, Stevenson found out, that out of the 921 observations he made, only 30.7 percent as distinctly marked, and 8.9 percent totally absent; while the remaining over 60 percent are intermediate cases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Regar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eye-slits, there are 906 cases recorded. Of these, 14 percent are recorded as horizontal, only 5.1 percent as markedly slopping. The other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possessed a direction recorded as only slightly or moderately slopping.

The 2nd feature of the characteristic Mongoloid face, namely the cheek bone, is more capable of some direct measurement in what the anthropometrician calls the "bi-zy-

gomatic breadth", this measurement appears in most studies of human skull, where the facial bones are preserved.

In 1932, *Biometrika* published 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Asiatic Races based on cranial measurements; in which twenty six series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 Out of these 26 series, no less than 18 of them are studies of skulls of the oriental or Mongoloid peopl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 Woo & Mortant—divided these Orientals into three sub-groups: Namely the Northern Mongolians, the Chinese & Japanese, and lastly what they call: the other Orientals, including such people as Tibetan, Javanese, Dayak, Tagal, etc. This tripartite division is mainly based on what they call the "Co – efficient of Racial Likeness".

I don't believe its worth your while to be bothered with the complicated mathematical formula used by the biometricians. But I want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one particular measurement which seems to me significant in connection with our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i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Jochbogenbreite" or the bi-zygomatic width, in our daily language we'd say the maximum breadth of the face.

According to these authors, the average value of bi-zygomatic breadth for the six series of N. Mongols range from 139.8 mm. to 144.0 mm.; for the five series of Chinese & Japanese range from 132.2 mm. to 134.7 mm.; and for the seven series of other Orientals range from 131.0 mm. to 134.7 mm.; whereas the average of the same measurement for the five Indian series studied in the same paper fall down to the max-min, range of 127.8 – 124.3 mm. respectively. The sharp contrast of the same measurement, as you have already observed, appears not only between the Orientals and non-Orientals, but also among the three sub-groups of the Orientals which are even more striking. The excessively large value of the average facial width of the Northern Mongols constitutes without doubt a truly characteristic physical feature of the Mongoloid people; but they are mainly located at present in outer Mongolia and southern Siberia with the centers of distribu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Lake Baikal, Mt. Altai, and the City of Urga: all north of the Gobi desert.

Broadly speaking the average of the facial width of the Mongoloid people a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dropped more than 1/2 a cm. as compared with the N. Mongols. Whether the sudden decrease of the absolute measurement of the facial width south of the Gobi desert is due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r racial mixture or both,

it is not easy to say. I have collected some historical data that may be also referred to in this connection. The measurements of bi-zygomatic breadth of the Chinese in various periods:

(1) Old man of Choukoutien Upper Cave (1)	143.0 mm.	(10 000 B.C.)
(2) The Aeneolithic Series (19)	130.7 mm.	(3000 – 2000 B.C.)
(3) Pooled Prehistorical Series (32)	132.2 mm.	(3000 – 1000 B.C.)
(4) Yin Dynasty Series (20)	136.9 mm.	(1400 – 1100 B.C.)
(5) 7th Century Series (2)	133.6 mm.	(700 A.D.)
(6) Modern North China Series (83)	132.7 mm.	

It would be dangerous to make too much out of these figures; nevertheless it is important to observe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t remained stable in the historical time even in this typical Mongoloid physical character.

3. People Who Are Related to the Chinese

These lead me to the core of today's problem: namely,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 It may be laid down as a matter of general observation that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the physic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quite faithfully reflected in the present day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as recorded, although imperfectly, by anthropometricians and craniologists. Let me refer once more to Woo and Morant's paper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Asiatic races.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four Chinese series of cranial measurements. The first Chinese series was taken from Goldon Harrower: it consists of 31 male skulls of Fukien origin. The second series was taken from the study by the Japanese anthropologist Dr. Koganei: it consists of 70 skulls of the Chinese soldiers, collected in Shantung, Chihli and south Manchuria. The third series was taken from Davidson Black: it consists of 86 male skulls from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And lastly, the prehistoric series taken from Davidson Black's study, this series was composed of 64 male skulls of Late Ne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nd Copper age, excavated in Kansu and Honan. Of these four series, we know more or less definitely, the provenances of three series, namely: Harrower's series and Davidson Black's two series. Regarding the provenance of Koganei's material, it is rather uncertain; it is possible that those soldiers studied by Koganei were recruited from many parts of China. Some of them may be even of Manchu-

rian and Mongolian origin.

Now, using the formula of C. R. L., Woo & Morant found among the four Chinese series, Koganei's group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Harrower's Fukien collection. The C. R.L. between thee two series is 2.86; while Black's series of modern Chinese skulls show only a moderate association with Koganei's: —the C. R. L. between these two series is 5.6, much larger than the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Japanese seried and the Harrower's, which is only 3.73. The prehistorical Chinese series, studied in this paper, shows only a slight association with all the other three modern series: the C. R. L. in every case is between 9 and 10.

Table I　　C.R.L. between the Chinese Sertes

	Koganei's Series	Black's Modern Series	Harrower's Fukien Series
Black's Modern Series	5.60		
Harrower's Fukien Series	2.86	5.16	
Black's Prehistorical Series	9.61	9.64	9.56

If we take these Chinese series and compare some of them with the other Oriental andnon-Oriental Asiatic races, we get some very curious results. First, let us take Black's North China series, we found that their cranial measurement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Oriental"; next in order, are five Indian serie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six Mongolian series show the greatest divergence from all the Chinese series. If we take Harrower's Fukien series in turn, we found the same order of relationship: the southern Orientals followed by the Indian Group; the northern Mongols being the most remote. The same order holds true also with Black's prehistorical skulls.

But do not let us be misled. There are certain variations in these group comparisons. The difference as shown in the small details are to my mind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general picture. I have tried, using the C. R. L. figures to make a list of the ten most closely related non-Chinese series for each of the four Chinese series (see Table II). These four lists show several remarkable features. Although the names of various series composing these list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 orders in which they appear show important differences. These different sequences evidently signify a change of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rious non-Chinese cranial series with which the Chinese series are compared. It is also the most interesting to find that the five topranking non-Chinese groups in these four lists the Japa-

nese, the Tagal, the Chukchi, the Tibetan and the Dayak: are located respectively in the Eastern Sea, on the extreme N. E. corner of Asia, in Philippine Islands, on the borderland of Himalaya Mountain, and in the Island of Borneo. These wide spread localities of these non-Chinese series which show a comparatively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varfous groups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past and present is a sure indication of the many side contac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had in their formative period.

But there is a strange exception: the Northern Mongols who gave the World Jengis Khan and China a ruling Dynasty, seem to have left no noticeable somatic impression on the Chinese populace inspire of their free philandering activities in the Chinese territory for almcst one hundred years. They have shown in the six cranial series studicd by Woo and Morant, a set of biometrical characters so independent of the Chinese group, that their C. R. L. with the Chinese series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 C. R. L. between the Indian series and the Chinese. None of the six Northern Mongol tribes appears in any of the lists of Table II; the Chukchi, being a specialized group, is not included among tne Northern Mongols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also quite obvious than the C. R. L. values on the four lists very considerably even far thoes which appear on the same rank.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ention that the usual practice of the biometricians is to interpret the C. R. L. values in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When the value is less than 13, it fall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Association; when it is greater than 13 but less than 31, it is given the name of Divergence. Divergence still signifies certain degree of relationship; it is a kind of differentiation in an evolutionary sense. One might with some justification say that, when divergence starts, it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heno-type. When the C. R. L. reaches the value of 31, it means, that a new pheno-type is established. But this is all by the way.

To come back to the ranking lists, it is obvious too, if we apply thes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ation,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Japanese, none of the non-Chinese series show any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series. In the category of divergent relationship, the numbers differ considerably with different lists: there are 3 for Koganei's series, 5 for Black's prehistorical series, 7 for his modern north China series, and 7 for Harrower's Fukien series.

Table II List of Ten Closely Related Non-Chinese Cranial Series for Each of the Four Chinese Cranial Seri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Co-Efficients of Racial Likeness+

Chinese Series / Non-Chinese Ser. / Ranks	Koganei's Series		Black's Modern		Harrower's Series		Black's Prehistorical	
	Series	CRL	Series	CRL	Series	CRL	Series	CRL
Ⅰ	Japanese	3.73	Japanese	12.86	Japanese	5.41	Tagal	12.02
Ⅱ	Chukchi	23.14	Chukchi	18.27	Tagal	17.47	Japanese	13.51
Ⅲ	Tagal	23.68	Tibetan B	22.01	Dayak	17.72	Dayak	18.83
Ⅳ	Tibetan B	27.06	Tagal	22.94	Javanese M. &. E*	19.38	Chukchi	21.24
Ⅴ	Aino	32.23	Dayak	26.72	Burmese A	19.53	Tibetan A	30.07
Ⅵ	Burmese A	32.35	Tibetan A	28.58	Tibetan A	20.20	Tibetan B	31.19
Ⅶ	Javanese M. &. E.	33.72	Javanese M. &. E.	29.32	Chukchi	22.81	Javanese M. &. E.	32.80
Ⅷ	Dayak	34.28	Aino	35.61	Tibetan B	28.73	Nepalese	33.85
Ⅸ	Tibetan A	47.30	Burmese A	37.00	Aino	32.09	Burmese A	39.23
Ⅹ	Aetas	52.99	Javanese B. &. B. **	42.43	Aetas	33.63	Tamil	40.62

* Middle and Eastern

* * Bantan and Batavia

\+ Based on Woo and Morant's paper: *Biormetrika* VoL XXIV; pp. 108－134, 1932.

Now we come to the problem: what is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all these various details which have been described? By giving you some of these scientific observations, my aim is just to point out to you, that these variations imply not only a biological process, but also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other words, the Chinese people is deffinitely a biological unit; at least a definite pheno-type, though, at present, only vaguely understood. It is still undergoing constant and continous change; but it is craniometrically demonstrable.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hysical type including the Japanese, is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all the Northern Mongols, the only exception being the Chukchi, which is a specialized group.

But, with the other groups of oriental peoples, the Chinese relationship is of a mixed

character. On the historical side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richly documented both in written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these sources, one may lear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born nearly five thousands years ago, in the late neolithic China, are still in the making.

4. Some Historical Notes

Let me utilize the remaining few minutes, give you some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Franz Weidenreich, after making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skeletal materials of what he called "the Earliest Modern in East Asia", namely, the Old Man in the Upper Cave of Choukoutien and the associated finds, concluded that this Old Man represents not only a very primitive form of modern man, but also a type of primitive Mongolian. He said further that the recent Northern Chinese, while more advanced in their physical development, are in fact traceable to ancestors like those represented by the old man in the Upper Cave.

The conclusion arrived at by this eminent anthropologist, had given arise much discussion. Recently, both Soviet archaeologists and China have claimed discoveries of skeletal remains identifiable as Mongoloid earlier than the dating of the Choukoutien Upper Cave. But more detailed evidences are needed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se conclusions. Next to Weidenreich's study, Davidson Black's prehistorical series recovered from north China, should be considered. Black remarked at the conclusion of his investigation that the neolithic Chinese show a group of physical characters differing very little from the modem inhabitant of North China. He even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neolithic Chinese were the prototype of the modern inhabitants of North China.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cranial series was collected at Anyang of the Shang Dynastry (ca. 1400 - 1100 B.C.). Their anthropometrical characters show a rather wide range of variations, indicating most probably the non-homogenous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at period. The remarkable physical traits of the Shang people, are shown in three groups of measurements: the bi-zygomatic breadth, the basion bregma height, and the cephalic index. I have alerady referred to you the first character previously; regarding the cranial height, the Anyang collection appears to show a higher figure than that of all prehistorical Chinese series with which it is compared. In the case of cephalic index, the av-

erage value is 76.96; with a standard derivation as. high as 3.95; which, according to the normal value, is far too large. The biometrical norm of standard deviation of C. I. for any homogenous propulation, such as that of the Egyptian E series, is only 2.68. The cranial bones of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sex of Anyang skulls are distinctly divisible into a dolichocephalic group (26.54%, 29.17%), a mesocephalic group (55.55%, 54.17%) and a brachycephalic group (18.52%. 16.67%).

So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Chinese as represented by the Shang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studies of the Angang skulls, indicates that Chinese in this early period, were already in a melting pot. Subsequently, we have more his torical records for a study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both within the boundary of China proper and in the borderland areas; successive foreign invasions, mainly from the north, gave impetus to most migrations. In every case,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process of hybridization became more intens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major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historical preiod, worthy the attention of every anthropologist as well as the historians. The first major movement of great importance in early historical time is the one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Shang-Chou period, when the Chou Dynasty replaced the power of the Shang (Yin) in the 12th century B.C. The second one is the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Tsang-Kuo period which started from the early 5th century B. C. and lasted to the late 3rd century B.C. But the best recorded population movements are those of the later two periods: namely the movements culminating in the 4th century A. D. and 12th century A.D. respectively, known as the Yüngchia movement and the Tsingk'ang movement. In each case, it started 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setting out the southward mass migration. The remnant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 China, as a consequence, absorbed the invaders from the stepps; while the immigrants who settled down in the new territory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in turn mixed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South China.

Völkerwanderungs are not unlik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those major movements mentioned above are typhoons and hurrican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seasonal winds and gentle breezes which occurred regularly, between the major storms. One may say that the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is land has always been continuous and is still increasingly active. To witness, one has only to took into th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oversea Chinese.

But back to the mainland, the interest of most students of history on the Chinese

phenomerion seems to be this problem: —What is the vital force that holds the Chinese together, if it is not deep rooted in their blood and flesh relationship? My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there are two things which have mad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are; first,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ir culture, and secondly, their geographical position. But both of them as you know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my talk today; so let me conclude my remark by returning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 I have tried to present to you the high lights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showing you the changing characters of their physical types and the scope of their variations; I have also told you that the Chinese are a highly hybridized group; although possessing certain Mongoloid features, they are by no means the typical Mongoloid in the accepted anthropological senses. It is also a remarkable fact that in Chinese history, while the social structure seems to be based fundamentally on kinship, yet in their philosophy of life, centuries before Christ preached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Chinese already extended the idea of brotherhood to men within the Four Seas, regardless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or cultural attainment The very well-know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Education without discrimination", was already an article of faith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s early as the middle of the 1st millenium B.C.; this famous Confucian motto,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has given to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more vitality than anything else. The uninterrupted course of her 3 300-year-old written history proves it abundantly. But even so, one may be tempted to say what chance is there to preserve this ancient heritage hereafter? At this point I think the anthropologist and archaeologist have to step out. Let me pass this question to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for an answer.

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 19－20 期，1962 年

Let the East and the We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without Pride and Prejudice

Address to the Tea Party of Sino – American Committe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there is one section which is truly instructive for the modern generation. Ever since the Han Dynasty, Chinese pilgrims of Buddhistic faith used to go to India,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land including, of course, Buddhism, During the pre-T'ang and the T'ang Dynasties, there were many Indian monks coming to China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Buddha; a numher of these Indian Buddhists not only understood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wrote in Chinese and produced monumental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many centuries, Buddhism united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ina, India and their neighbouring nations.

In modern age, as we are witnessing, Buddhism as a spiritual force has considerably deteriorated. In fact, Religion in general is on the decline, and is recording to a minor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s intellectual life.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especially as an ag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t is true that there have been many ambitious politicians who wanted to nationalize science; but they have all failed. The days of German physics and Russian biology are gone and are bound to go forever. Those who have been persuaded to the belief that science is a monopoly of the West, or of the Europeans, are also finding it illusory. And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the true nature of science is international in character. All of us, therefore, should be delighted to see the growing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radiating from the Temple of Science.

There seems to be little doubt that science alone in the modern world possesses sufficient strength to remove the barriers that separate peoples because of nation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The workshop program as designed by the Sino-American committe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to bring together learned man from East and West as well as those from other quaters of this globe by a joint program of studies and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 that not only scientific projects as such may be promoted; but also, by working together in pursuit of scientific truth, the scholars of China and America, to begin with, may learn to know each other as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he product of a particular culture. Our motto is: Let the East and the We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out pride and prejudice.

December 14th, 1967

原载《思与言》杂志,第 5 卷第 5 期,1967 年

Foreword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by K.C.Chang

I first came to know Dr. Kwang-chih Chang in the fall of 1950, when he enrolled as a freshman in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Taiwan University. Four years later I saw him graduate, having just completed a bachelor's thesis on the Lungshan Culture, written under my direction. He impressed me then as a most promising young scholar of remarkable industriousness, gifted with a quick mind and abundant natural curiosity which, if duly disciplined, might lead him to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a very high order. And, indeed, it must have taken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ental acuity and applied effort to complete the thesi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The fact that this book contains many hypotheses which are yet to be substantiated perhaps deserves some explanation. There are practical reasons why a book on Chinese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archaeology, compiled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research conditions in this field, has to go beyond the narrow limit of actual data, and be amply interpolated with some hypoth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reasons I shall mention only two.

Chang is trained as a specialist in Chinese archaeology. It is in China itself that he should carry on his scientific work in order to contribute his shar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ast and test the hypotheses of other scholars as well as his own. This normal course, however, cannot be followed under the present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Like many other specialist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on this side of the Iron Curtain, Chang is a victim of this tragic state of affairs. His industriousness and imaginative power can be applied only in the study of documentary data supplied to him by others. Fortunately, he ha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has obtained the best possible

training in anthropology at one of America's fines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 institution whose standard of discipline makes almost no allowance for the foreign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been able to read the archae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hina and, as a specialist with his particular training, to interpret the published material according to a well-planned perspective. As far as I can judge, he has made a good case on the basis of available data. He is naturally handicapped by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the source materials, over which he has absolutely no control. His interpretations, wherever they are drastically new, must therefore remain hypothetical until they can be tested in the field.

There is certainly a need for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rehistory and early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the late twenties and early thirties, when my colleagues and I began to undertake scientific excavations in China, the country enjoyed little peace, and field work was frequently carried out in the midst of military campaigns; then followed the Sino-Japanese War. I can recall all our difficulties in these years while we were engaged i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Scientific data were only beginning to be accumulated, and svstematic interpretations had scarcely been attempted, when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ollowing their custodians, had to be evacuated from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since 1949, under a totalitarian regime which has manpower to spare and uses archaeology as an effective political instrument, essentially the same group of trained field workers has been able to accumulate, at an accelerated rate,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mount of which has certainly outgrown the iriterpretative framework conceived before the war years by some of the pioneer workers. The time seems to have arrived when a number of possible new interpretations may be tried. The one chosen in this book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nly one, but it provides something that can serve as a basi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s well as for the planning of future excavations by trained archaeologists like the author himself.

When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agreed to publish his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the author asked me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this, his first book. I have consented to do it not without some hesitation. But I confess that I was very flattered. So, in concluding this short note, I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quote M. C. Burkitt's Preface, written thirty years ago, for J. G. D. Clark's book, *The Mesolithic Age in Britain*, wherein Burkitt said: "It is true that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giving him some part of his training in his prehistoric studies. But it is always refreshing when the new generation

thinks it worthwhile to make such a request."

Li Chi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wan, China, November, 1962

转载自张光直《中国古代考古学》(英文)第二版,1968年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The archaeological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a is usually dated from the year 1920 when J. C. Andersson sent his collector Liu Chang-shan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Honan where Liu discovered the first prehistoric village at Yang-shao in the Mien-ch'ih district sout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site was subsequently studied and excavated by Andersson under the anspice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in Peking; the results of this digging were first communicated in a scheduled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later published in the Society's bulletin of 1923.

For a number of years following this first discovery, the Geological Survey in Pek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vancement of prehistoric researches in north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promotion of field work. Most of the collections gathered by the field archaeologists were sent to the Survey's headquartors in Peking and scientific reports were published mainly in three periodicals: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922 –); *Memoir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1920 –);[1]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and new series* D (1923 –). The last of thes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includes not only the reports concerning neolithic culture, especially of the painted pottery group, but also almost all the important studies on Sinanthropus from the earliest writings of Davidson Black to the last monograph of Franz Weidenreich.[2]

Archaeology as a branch of academic research won its first government support in 1928 whe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organised an archae-

[1]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is periodical are: J. G. 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with a note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by Davidson Black), series A, no. 5 (June 1925); G. G. Yang, 'Fossil Man and Summary of Genozoic Geology in China', series B, no. 5 (1933); and W. C. P'ei, 'Choukoutien Excavation'. series B, no. 7 (1934).

[2] For a list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s in this periodical see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ological section as one of the three research units in its official programs. The Archa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 started its field work in the autumn of 1928 at An-yang.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excavation became world famous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discoveries. Among these,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hich proved to be the earliest known scripts in the whole of easter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attracted particular attention from classical scholars and arouse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among historians. This excavation was continued for nine successive years during which fifteen expeditions were organised. In the course of the excavation, the field archaeologists located, in addition to the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of the Yin period, a cemetery site where the royal tombs were found. Although, as is true with the remains of other ancient cultures, both the buried capital and the tombs had been plundered more than once after they were abandoned, the field workers nevertheless recovered abundant structural remains and many hidden treasures. The field reports and the detailed studies of the artifacts discovered have been reported in a number of journals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publications are: *Report of the Anyang Excavation*, 1 (1929), 2 (1930), 3 (1931), 4 (1933);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928 –); *Archaeologia Sinica*;[1] *T'ien-yeh k'ao-ku pao-kao* (no. 1); *Chung-kuo k'ao-ku hsüeh-pao* (nos. 2 – 4); Monographs of the Institute. No. 4 of Chung-kuo k'ao-ku hsüeh-pao, compiled and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was printed without changing the contents, although the title page was mutilated.

The collections of the An-Yang excavati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tems: inscribed turtle shells and shoulder blades; stone and jade artifacts; bronzes consisting of ceremonial vessels, weapons and tools, and chariot fittings; ceramics; animal bones; human skeletons; architectural remains. All these materials suffered a certain amount of damage and loss during World War II. On the whole,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collection,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and the devotion of many workers, has been saved and is well preserved; it is now available for scientific studies in the Institute at Nan – kang, Taipei, where a visitor still finds in the ar-

[1] No. 1 of this periodical is a paper entitled Ch'eng-tzu-yai by Li Chi and others (1934),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 book by Kenneth Starr (New Haven, 1956). No. 2 deals with Hsiao-t'un and contains contributions by Shih Chang-ju (on the site, its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s, and architectural remains); Tung Tso-pin, Ch'ü Wan-Li, and Chang Ping-chüan (on inscriptions); and Li Chi (on artifacts such as pottery). No. 3 deals with Hou-chia chuang and contains papers by Kao Ch'ü-hsün.

chaeological building a number of white-haired work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arly digging. Their similes have been continued all these years and are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rom time to time in monographs as well as in shorter articles in the various bulletin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continuing the important work of the early period, excavations were first resumed in 1949 at Chou-k'ou tien. In 1956 and 1957, remains of Gigantopithecus were found in Kwangsi Chuang Autonomous Region, dating as early as the Lower Pleistocene Period. Paleolithic findings as old as or even older than Peking Man were excavated in the district of Jui-ch'eng of Shansi and also in the Lan-t'ien district of Shensi. The latter yielded a nearly complete pithecauthropus lower jaw and some molar teeth. Other paleolithic sites of a later age have been turned up in Szechwan, Hupeh, Kwangsi, Kwangtung, Yunnan, and Inner Mongolia.

Since 1949 thousands of neolithic sites have been discovered scattered all over mainland China. Studies have centred on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tents as well as on the sequence of these cultures. The physical traits and the bi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ir inhabitants have also been studied. At An-yang, work was resumed at the royal cemetery in 1950 and excavations added greatly to the amount of new materials. Many other Yin-Shang sites were found not only in Honan, but also in Hopeh, Shantung, Anhwei, Shansi, and Shensi. Investigations and diggings have also been undertaken to trace a number of the ancient capitals of China from the Western Chou to the Liao dynasty; in fact, all over mainland China in this period, historical dwelling sites and burials of every dynasty have been excavated.

To report on these discoveries, important monographs have been 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published by the Science and Wen-wu Press of Peking. Other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s and museum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uthors, have also produced valuable books.[1] Among the many periodicals which contain field reports, essays, book reviews and archaeological news, the most important are: *Vertebrata Palasiatica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Peking, 1957– ; *Acta Palaeontologia Sinica*, The Paleont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Peking; *K'ao-ku t'ung-hsün*, bimonthly, Peking, 1955–8 (title changed to *K'ao-ku* after 1958); *K'ao–ku*, monthly, Peking, 1959– ; *K'ao-ku hsüeh-pao*, Peking; *Wen-wu ts'an-k'ao tzu-liao*, monthly, Peking, 1950–9; *Wen-wu*, monthly, Peking, 1959–.

[1] Some of the monographs written on the mainland since 1949 are listed in the bibliography.

As mentioned,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owes its star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thodology. Many Western and Japanese scholar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 a s well as studies and researches in this period. We have mentioned briefly the work of J. G. Andersson and also made reference to the works of the geologists and palaeontologists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Geological Survey. The contributions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avidson Black, and Franz Weidenreich are world famous. Sir Mark Aurel Stein, Professor Paul Pelliot, and a number of other European scholars did much work in Kansu and Sinkiang in the pre-Republican period, followed later by Andersson, who earned his reputation as a prehistorical archaeologist by his field work in Kansu. From 1927 to 1934, Folke Bergman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located a series of prehistoric sites along the route from Kalgan of Inner Mongolia westward to the region of Lopnor. In the Red Basin and along the YangtzeValley, stone implements and pottery remains were collected by J. H. Edgar, D. S. Dye, N. C. Nelson, and others.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Japanese scholars found and identified many neolithic and neolithic-like cultures. Chinese bronzes have for many decade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West. The reports of this field work and investigation appear in monographs and many learned journals published in Japan and Europe. They are undoubtedly better known to the English-speaking public than those in Chinese.

Finally, a few words should be said about the archaeological source materials of the Taiwan area.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has been engaged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in the training of archaeologists and in field investigation. At present, archaeolog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s gradually winning recognition by the general public. Some of the field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extremely fruitful and of great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the prehistoric study of this island, but also for the whole area of the southern Pacific. Most of the results are published in the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semi-annually since May 1953.

Bibliography

Some of the papers in series D and new series D of, Palaeontologia Sinica are:

Series D (*Ancient Man in China*)

Vol. 1. *Neolithic Man in China I*

Andersson, J. G., '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 fasc. 1 (1923).

Arne, T. J.,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China'. fase. 2 (1924).

Black, Davidson, 'Human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Sha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Material', fasc. 3 (1925).

Vol. 6. *Neolithic Man in China II*

Black, Davidson, 'A Study of Kansu and Honan Aeueolithic Skulls and of Specimens from Later Prehistoric Sites in Comparison with North China and Other Crania, Part 1, On Measure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fasc. 1(1928).

Vol. 7. *Lower Quaternary Man in China*

Black, Davidson, '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fasc. I (1927).

——, 'On an Adolescent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Hominid Skulls', fasc. 2 (1931).

'Obervations on the Form and Proportions of Endocrauial Cast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nd the Great Ap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ain Size', fasc. 4 (1936).

'The Mandihl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fasc. 4 (1936).

New Series D

'The Dentition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Odontography of the Hominids', no. 1 (1937).

Weidenreich, Franz,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in Fossil Hominids and its Bearing upon Phylogenetic Problems', no. 3(1938).

——, 'The Extremity Bon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no. 5 (1941).

P'ei Wen-chung, '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koutien', no. 9 (1939).

Weidenreich, Franz,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 Primitive Hominid Skull', no. 10 (Chungking, 1943).

Monographs

Important monographs published on the mainland since 1949 include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listed by title are collective works.

Ch'ang-sha fa-chueh pao-kao, Peking, 1957.

Cheng-chou Erh-li kang, Peking, 1959.

Chia Lan-p'o, *Chung-huo yüan-jen*, 5th ed., Shanghai, 1954.

——, *Ho-t'ao jen*, revised ed., Shanghai, 1955.

——, *K'o-ho. Shan-hsi bsi-nan pu chiu shih-ch'i shib-tai ch'u-ch'i wen-hua i-chih*, Peking, 1962.

——, *Pei-ching jen ti ku-chü*, Peking, 1958.

——, *Shan-ting tung- - jen*, 2nd ed., Shanghai, 1951.

Chiang Pao-keng and others, *I-uan ku hua - hsiang shih-mu fa-chueh pao-kao*, Peking. 1956.

Chiang-su Hsu-chou Han hua - hsiang shih, Peking, 1959.

Feng Han-chi, *Ch'ien-Shu Wang Chien mu fa-chüeh pao-kao*, Peking, 1964.

Hsi-an Pan-p'o, Peking, 1963.

Hsia Nai, *Collectcd Archaeological Papers*, Peking, 1961.

Hu Hou-hsuan. *Yin-hsü fa-chueh*, Shanghai, 1955.

Huang Wen-pi, *T'a-li-mu-pem-ti k'ao-ku chi*, Peking, 1958.

—, *T'u-lu-fan K'ao-ku chi*, Peking, 1958.

Hui-hsien fa-chueh pao-kao, Peking, 1956.

Kuang-chou Hsi-ts'un ku-yao i-chih, Peking, 1958.

Kuo Pao-chün, *Shan-piao cben yü Liu-li ko*, Peking, 1959.

Lo-yang Chung-chou lu (*Hsi-kung tuan*), Peking, 1959.

Lo-yang shao-kou Han-mu, Peking, 1959.

Miao-ti kou yu San-li ch'iao, Peking, 1959.

Nan T'ang erh-ling fa-chueh pao-kao, Peking, 1957.

P'el Wen-chung, *Tzu-yang jen*, Peking, 1957.

——, *Yen-pei wen-wu k'an-ch'a t'uan pao-kao*, Peking, 1951.

San-men hsia ts'ao-yün i-chi, Peking, 1959.

Shan-hsi T'ung-ch'uan yao-chou yao, Peking, 1965.

Shang-ts'un ling Kuo-kuo mu-ti, Peking, 1959.

Shou-hsien Ts' ai-hou mu ch'u-t'u i-wu, Peking, 1956.

Su Pai, *Pai-sha Sung-mu*, Peking, 1957.

T'ang Ch'ang-an Ta-ming kung, Peking, 1959.

Tseng Chao-chü and others, *Nan-ching fu-chin k'ao-ku pao-kao*, Nanking, 1952.

Wang-tu erh-hao Han-mu, Peking, 1959.
Wu Wen-liang, *Ch'uan-chou tsung-chiao shih-k'e*, Peking, 1957.
Yin Huan-chang, *Hua-tune hsin shih-ch'i shih-tai i-chih*, Shanghai, 1955.
Yün-nan Chin-ning Shih-chai shan kn-mn ch'ün fa-chüeh pao-kao, Peking, 1959.

原载《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澳洲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An-Yang》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An-Yang

An - Yang is a city of eastern China (36 05 ′ N , 114 21 ′ E ; population / 1970 est . / 100 000 – 300 000) in northern Honan Province, on the An-Yang Ho(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Wei Ho(river), which flows northeast to join the Grand/Canal(Yün Ho). An-Yang is a County-(hsien-) level municipali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centre of An-Yang area(ti-chü). Under the Chinese Empire, it was known as Chang-te or Changte-fu. The city is about 65 miles northwest of the Huang-Ho(Yellow River)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T'ai-hang Shan(mountains); to the west towers the elevated massif of Shansi Province.

An-Yang has been a regional agricultural and trade centre for centuries; in modern times, it became a station on the main morth-south rail line from Peking to Wu-han. Coal mining is improtant in the area(mines at Lin-ho-kou, about 20 miles northwest of the city). An-Yang's textile mills and food-processing plants have been supplemented by heavier manufactures since the Communists came to power (1949).

The district's significance, however, is pre-eminently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west of the city is the site of the las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from which the kings of Shang ruled China for 273 years (1384 – 1111 BC). The Shang palace stood about ten miles west of the site. Early historians gave the name Yin to the site of An-Yang; and thus the Shang dynasty was also recorded by later historians as the Yin dynasty or the Yin-Shang dynasty. Shang was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earliest dynasties of China (the first was the Hsia dynasty; the third, the Western Chou). Modern archaeology has discovered in the An-Yang district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the Shang, fully illustrating the splendour and advanced stage of a previously totally unknown civilization that developed more than half a millennium befose the beginning of authentic Chinese history in 776 BC.

The discovery, including the earliest Chinese written records, has provided the most authentic evidence to date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hina.

The site of the Shang capital at An-Yang had been known to schol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rough the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inscribed oraclobones (i.e., bones used for divination: questions were on graved on the bones, which were then touched with a burning stick, and resulting cracks revealed the answers); but it was not until 1928 that the first organized scientific expedition started systematic, excavation of these important remains under the auspices of Academia Sinica,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ield work was carried out by Dr. Li Chi, later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His party worked at the site for 15 seasons, from 1928 until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1937.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rty surveyed most of the early remains along the Huan River, which flows across An-Yang. Two sites located near the bank of the river prov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archaeologists spent 12 seasons at one of the sites—locally known as Hsiao-t'un and situated on the southern bank—where they uncovered the remains of the Shang capital city, and 3 seasons at the other site—locally known as Hou-chia-chuang and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bank—where they discovered a number of royal tombs of the dynasty, together with more than 1 000 small burial pits.

From their excavations at these two sites, the field workers made many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among which were many thousand pieces of inscribed tortoise shells and shoulder blades of oxen; this discovery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s they have been known in the academic world), which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had been assiduously studied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but had been discredited as sheer forgeries by a number of others.

The written records inscribed on the oracle bones have added greatly to the knowledge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d have served as a check on the traditional accounts about ancient China handed down from before the Han dynasty (began 206 BC). The contents of the inscribed bones are rich and variegated, Although dates on the bones are only relative, they show several moon eclipses, which have been used to check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the calendar of the Yin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se records, the Yin calendar was reconstructed, and it is believedthat the dynastic capital was moved to the site in the 15th year of King Pan Keng's era (c. 14th century BC).

The field expedition of Academia Sinica discovered extensive architectural remains

and thousands of tombs, most of which had been plundered ruthlessly in the 3 000 years since their construction. At the cemetery site, there ware 11 large burials, each occupying a huge under ground structure built of timber and stamped earth. Practically every one of the tombs had been entered by robbers more than once, so that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royal treasuries had been taken away long before scientific digging started. Neverthclesa, the archaeologists were still able to gather from both the royal tombs and the dwelling site a rich harvest of important and untouched artifacts, most of which, after decadea of detailed studies by specialists, proved to be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period of the oracle bone records.

The important artifacts recovered from the two sites may be grouped as follows: (1) building foundations, (2) animal bones, (3) stone and jade, (4) pottery, (5) bronzes, (6) chariots, (7) human skeletons, (8) imprints of perishable objects such as a snakeskin drum and textile fabrics on the covering earth soil. Architectural remains are divisible into two subgroups: those found in Hsiao-t'un were mainly foundations of palaces, temples, and living quarters, of which all the superstructures had completely disappeared; those from Hou-chia-chuang were all tomb structures buried deep underground, the largest of which occupied a floor space measuring about 725 square metres and was several metres high. The area appears to have been rich in the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its fauna; certain animals, like buffalo and deer, whose bones were found in enormous quantity, are now extinct in the region. The most interesting specimens were the bones of animal and bird species now known only in tropical or subarctic habitats (evidently there was a royal zoo in which animal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ere collected). Pottery shards were abundant, with nearly 250 000 pieces recorded in the field; from these, more than 1 700 complete pots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The bronzes of the period are known to collecto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cientific diggings uncovered hundreds of ritual bronzes in their original positions. These ritual vessels were found in every unptundered grave. Bronze weapons were also found in great numbcr, consisting chiefly of Chinese halberds, spearheads, helmets, arrowheads, hatchets, knives, and swords. A third group of bronzes was composed mainly of decorative pieces and small tools. Chariots were found in both the cemetery sites and dwelling sites; some were decorated extensively with bronze ornaments and fittings. The archaeologists found extensive evidence of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Bronze Age cul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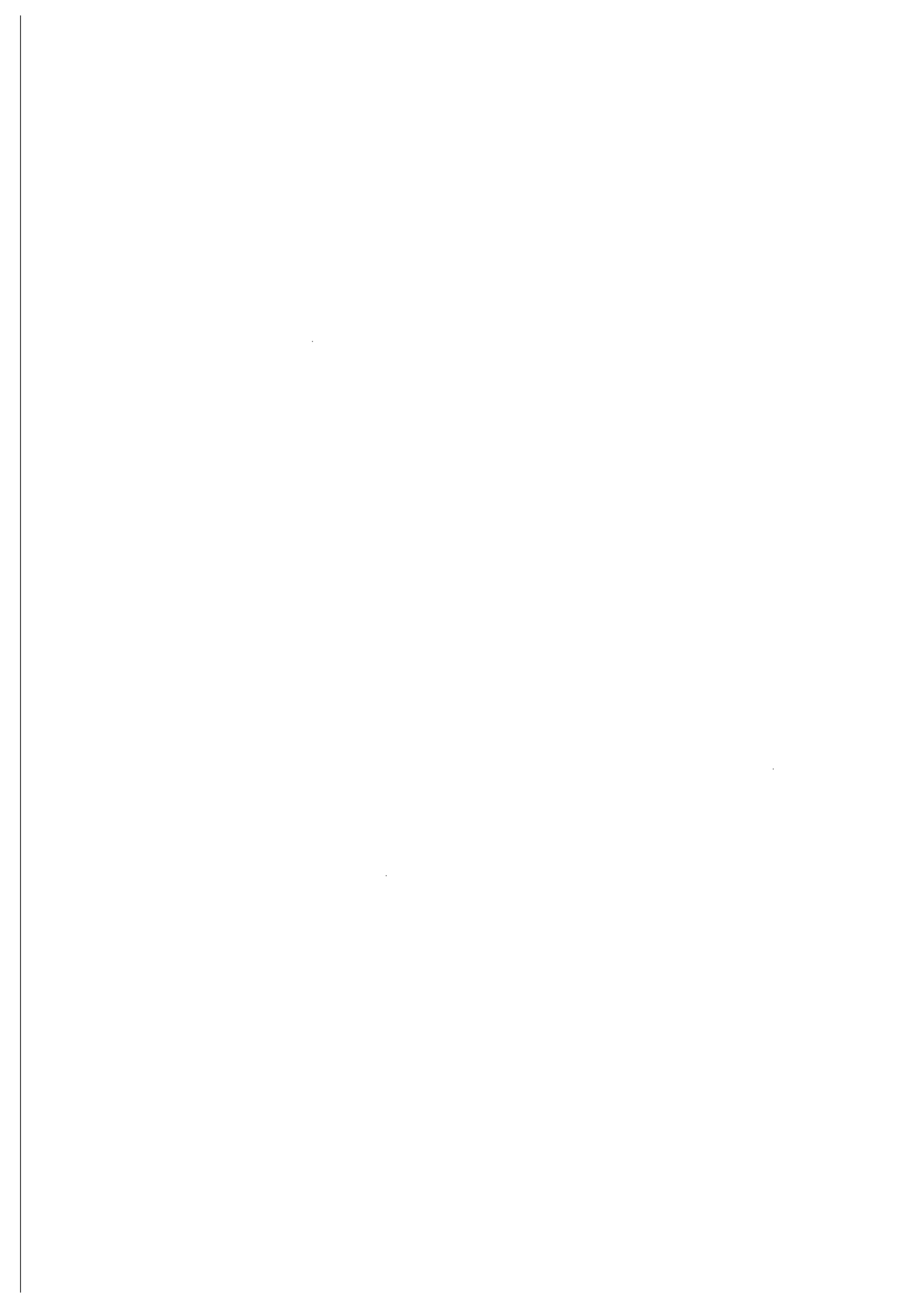
Stone carvings were among the surprise finds; before these excavations, scholars had

been un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one cutter's art in China during this early period. Although Yin-Shang China had reached an advanced stage of bronze casting, stone tools still appeared in great abundance. Genuine jades were also found, but most of them were small articles—decorative pieces or merely amulets; some larger ones may have borne important religious significance and may have been used only for ceremonial purposes.

BIBLIOGRAPHY. CHI L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57), three lectures dealing mainly with finds at An-Yang; TE-K'UN CHENG, *Archaeologf in China*, vol. 2, *Shang China* (1959), materials covering many aspects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that appeared in the original Chinese reports,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into English; EDITORS OF TIME-LIFE, INC., "The Shang, molders of China," in *The Epic of Man*, ch. 11 (1961), a summary of the An-Yang finds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in colour;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ch. 6 (1963), mainly on the An-Yang discoveries. The major reports in Chinese are all published in the two series of *Archaeologia Sinica*; the volumes of the later series are all appended with an extensive English summary.

原载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5th ed.).

早年文录



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时的史学作业*

问五帝本纪称尧命四岳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然则疏远隐匿者不举固非而避贵戚不举亦非圣人公天下之心试申其旨

定位者，天也；占天者，民也。昔者尧有天下，不传诸子而传诸舜；禹袭圣贤之业，不传诸益而传诸子。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唐虞之际，民不趋丹朱而趋舜。及禹之没，民不趋益而独趋夫启。是非禹之德不及尧与舜也？盖启之贤有以胜夫丹朱也！启既足胜天下之任，禹乌得而传诸他人，即传诸人矣。奈民不归何？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吾以是知治天下之非难也。夏之德及桀而衰，成汤取而代之，而人不觉其有惭德；武王袭其遗辙，而天下亦归焉；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履天下之藉，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是故苟得其道矣，则传贤可也，传子可也，取而代之可也，假而摄之可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矣。得其道云何？公诸天下而已。盖天之生材也不一，于彼焉，于此焉，凤生凤，乌鸦亦产凤矣。知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谓之俊，百人谓之豪，十人谓之杰。在在位者视之，或与我为亲，或与我为疏。圣人论之，亦曰吾评英俊豪杰以任其职而已。曷亲疏之有，盖材智者，天生也；亲属者，私谊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主者将去私欲以止乱也。故圣人以天下为公器，授受之际毫无所私于其间。其于天下之大器犹如此，况因官任职乎？尧命四岳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盖疏远隐匿者不举固非，而避贵戚不举亦非公天下之至意。三王本其道，因材而使，穷桑版筑之夫，得以兼任天下，而天下称治。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嗟乎！此岂神明变化不可测也哉。后世此意浸没，不肖者昵于近而昧于远，宦官外戚之祸兴矣。贤者过于自好，固避嫌疑。刘苍之材

---

* 本篇下含七题系作者 1915 年或 1916 年清华学校五年级史学作业。标点系编者所加。

智,不及三公之位;长孙之明惠,犹有脱簪之忧,是皆昧于圣人公天下之意也。于是资格之说兴而被褐怀玉之士多矣。虽然,此犹纲举而目张也。若夫豺狼一呼,狐狸是引;舆台之夫,旦夕可跻卿相。士无寡尤寡悔之功,皆怀干禄之心,则斯日曷丧,亡无日矣。又曷暇论夫先王之道哉。

[批语] 识踞题颠,行文亦疏疏落落,饶有林下风致。

问孝惠实承汉高吕后乃以女主僭窃史记立吕后本纪而不以孝惠标目得失若何

断代为史,始自班固,东汉以前无有也;正统之论,始自欧阳修,宋以前无有也。班史出而后正史之体定,欧论出而后正伪之辨严,故自欧以前,不论正统;班以前,不论史体,读史者宜具之识也。然古大人先生,或为已甚,乃以庐陵孟坚之说上绳史公,岂非洗肤索瘢,谬为颠倒乎?是非特不知史公,亦并不知班欧矣!尝考史记之作,本于网罗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述于篇籍,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自成一家之言也。天子不尽有本纪,本纪不尽载天子,凡司天下成败兴坏之责者皆纳焉;诸侯不尽有世家,世家不尽载诸侯,凡司一国一世兴坏之责者皆纳焉;下至列传所录,亦不限于名公馆衙,凡有瑰玮奇烈之行者,皆为之传,此史记之大体也。迨夫班固修汉史,虽沿史公之格,而其例已非,本纪限于天子,天子必有本纪。以此类推,成为一代之书,遂为后世修史者不变之宗。影响所及,乃夷项羽于列传,为孝惠立本纪。较之史记,亦所谓各还其是而已。后世不察,乃以班例衡迁,谓孝惠实承汉高,吕后以女主僭窃,史记立吕后本纪、又以孝惠附之,殊非体制,何其陋也。夫史公之所以不为孝惠立本纪者,非特事鲜可记,抑以其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徒为吕后之傀儡也。班固虽强为纪其年月,然七年之间,泰半为天地山川之变。自元年十二月遭戚夫人之乱,即归政太后,是吕后之称制,虽在孝惠崩殂之后,而其宰制天下,实始于孝惠御极之始。故高文之纪,天下有惠帝不为多;无惠帝不为少,治乱之责,吕后实司之焉。史公不为之立纪,正所谓总其终始,究其际而通其变也。班史更之,自成其说而已。又曷关夫正伪之说,后世修史,多为断代,岂得以此而遂非史公哉?且史记十二本纪之中,非特纪项羽遗孝惠之不符班例,其秦本纪实与周本纪并行,按之正统之义,岂非天有二日乎?不知此处皆史公巧称其例之证验正所谓本纪不尽载天子者是也。嗟乎!史公之意,本因书而传,后世昧乃先立一例以衡其书,虽以临川之识,犹狃于此。无惑乎史公当日欲藏之名山传

之其人也，非其人固不可传哉，实掩没而已矣！

［批语］ 分别条流饶有史识，字宜稍求匀整。

问慎为立言要义史记序三代世表特著之学者犹多称史公好奇然否

游侠传诲盗，货殖传诲贪，封禅书盛称黄帝神仙，多荒唐不经之谈，传之后世贻祸匪浅。史公诚好奇，史公诚不慎哉。不知慎之义有三：准一己之利害，避凶而趋吉，小人之慎也；验一事之得失，存是而去非，师儒之慎也；审事迹之有无，录实而删虚，史臣之慎也。史公之职，有闻必录。史记之作，上本诗书春秋国语国策诸子所载，下亦征诸见闻，虽有异辞，于其传信传疑之例，未或背也。是故善之所在，将以劝后世也；恶之所在，将以惩后世也。而史公未或奖盗也，未或奖贪也，亦未奖神仙诡怪之说也。其言曰：使后之君子，得以览焉。故是非之判，端在后之君子。乃或漫焉不察返以责诸史公，何其陋哉？何其陋哉？且夫游侠之传重义而轻财，开武士道之先风；货殖所纪，注意于民生，尤肇国民经济之原始；而封禅书讽隐之辞，更所以戒人主之荒迷也。说者乃谓史公以大乱余生，慨亲戚朋友之不一援手，发愤而作史记，遂有过激之言。其不慎之辞，亦情理之所当宥者，是亦非知史公者也。故以趋吉避凶之说例之，则史公不慎，或有其说，若以去取不慎责之，则已不当矣。其职守所在，录实而删虚，则好奇或有之矣。何不慎之有，非常之谓奇，征实之谓慎，斯二者并行而不背。

［批语］ 传信传疑，洞见良史一事。行文亦极操纵顿挫之致，是真读过太史公书者。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

韩信对高祖曰：臣之将兵，多多益善。此自喜之言，虽信亦不能自信也。今夫多多者，无穷之极也；多多益善，则将十万不如将百万矣，将百万不如将千万矣。然余考信用兵之绩，莫过井陉一役。其时所将之兵，不过数万耳。厥后救齐，收兵近二十万。虽

杀龙且,较之井陉之功,相差亦远矣。信终身将兵,未过此数。余固不能假定其苟将百万千万能立如何之奇勋,然以此证彼,大抵皆然者。信固不能独逃其数也。自古善用兵者,项羽、曹孟德、苻坚、李密、陈友谅皆与焉。斯数人者,皆以少而胜、因多而败,此其故何也?夫兵之所以能多,必以其常胜也。常胜则骄,兵多更骄,两骄相加,此以理言必败者也。多者,必不皆精,善战者分配于全军则杀其势,独聚于一隅则偏枯,良莠不齐,讵能为功?此以情言,必败者也。尾大者必不掉,驱百万之众于战阵之地,而欲其一一甘心效死,虽以王者掌之,亦不能为功;一发动则全身危,此以势言必败者也。是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智胜而不以量胜。汉唐宋明之定天下,兵皆不过三十万;而南宋岳武穆,北伐中原,百战百胜,其所恃者不过岳家军数百人已耳。以此而推,成败得失之数昭然矣。淮阴之论,岂不夸哉?

[批语]　见解明通,引证翔实。

问孟荀列传插叙当时游士多人而独以孟荀标题试申其旨

惟大人者,为能师表一世,拘鄙小儒不与焉。孟荀列传,插叙当时游士多人,而独以孟荀标题者,以大人师表一世之旨也。驺衍、淳于髡之徒,运其智慧,以干名利,犯学者之大禁。虽策名于时,高车驷马,出入于诸侯,然以承意观色为务,自侪于妇人宦者之行,君子不齿焉。其得附于大君子之末者,正见其萤火之光不足以自存也。若夫孟荀,学足为王者师,苟欲求名利于当时,一纵其舌即足俯视驺田,颠倒诸侯,何求不可得?而独舍此甘于穷困者,岂非欲葆大人之真也哉!史公私淑儒道,严于名义,特表孟荀,非独阿其所好至于此极也。殆所以操其文字之权衡也欤!

[批语]　识既正当,笔亦简洁。

问史公序儒林传其述儒学兴替之由具有微旨班氏乃讥以先黄老后六经然否

史记之作,上比春秋。匈奴传赞曰: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间则微,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公陈词,必有法于此者矣。乃百余年后,班固诋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何所尝者浅欤?夫使史公果有尊黄老之意,则老氏之言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史记正不宜作,而必欲绍名世正易传以继春秋,上法孔子者何耶?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之言,甚尊无为。班氏之意,或由于此。然谈处文景之际,天子喜清净自化,而窦太后尤喜黄老。春秋之义,不非时君,则谈之先黄老正谈之所以重春秋也。且父子不相袭,纵谈果有后六经之意,亦与迁无与。迁之所言,则尊孔子于世家,侪老聃于申韩,尊孔子曰至圣,呼老聃曰李耳,先黄老而后六经者,固如此耶?且六经兴废,特详儒林;而道德经之授受,只附见于老子传;仲尼弟子,则特纪列传;而河上公安期生之属不传焉。其旨虽微,岂不甚著乎?班氏一代良史,岂见不及此,而讥之亦或有因?盖史记虽成于武帝之时,然迁以学者而罹宫刑,必不齿于士大夫之口,其著述之不见重于当时可知。迨西汉之末,扬雄辈赞其有良史材,始渐有人论及。班固承天子之命以修汉史,自不能尽本其祖宗僇人之言无所贬抑,然谬矣。

[批语] 贯串驰骋,雅见匠心。

问游侠传序以史记与汉书较孰为正论

有公言者,有私言者。公言者守其常,私言者穷其变。汉书之言,公言也,故大五伦而守规矩;史记之言,私言也,故薄功令而原形迹,斯二者盖各有是非,未可同日语也。游侠之行,心或本乎仁义,而形实同乎盗贼。乱世之灵光,治世之毒也,数人之利,群众之忧也。倡之者或能本正谊,而和之者鲜有不偭其义也。在圣人处之,亦曰分别等差以为赏罚而已。不能因其心遂奖其迹,亦不能执其迹竟科其罪也。此所以皋陶曰杀者三而舜曰赦者三欤!观于此则史记以私言而重游侠,汉书以公言而责游侠。盖各自有其是非之所在,而不必为之邪正也矣。

[批语] 简练揣摩,足以自成一子。

自 撰 简 历*

李济，湖北钟祥人，生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岁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念书。那时候，家里人有一个狠(很)奇怪的理想。他们说，小孩子初念书的时候，要拣那顶难的给他念，然后再给他容易的，他的进步比平常就快多了。所以他发蒙的时候，不念“人之初”，却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四书念完了，继续的不是《诗经》却是《周礼》。但是他觉得他的进步不过同平常一样罢了。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欢喜打闷棍，所以他现在虽说记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次块垒。

十岁的时候，他进了那县立的高等小学堂，初尝那新教育的滋味，就渐渐觉得那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十一岁同他父亲到北京，在一个湖北省立的江汉学堂念了半年书，然后考进了琉璃厂厂甸的五城中学。清华学堂初开办的时候，在北京招生一百二十人，投考的有一千多。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1]

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可(也)是平平常常。要是把“中”字当“中样”讲，“庸”字当“碌”讲，他也总算是絜矩圣人之道的。

他初来美国(一九一八)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一九一九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B. A. 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边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种学。

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

* 本文系作者手稿。估计写于1920年左右，即李济离开克拉克大学去哈佛研究院前后。转载自李光谟撰《锄头考古学家的遗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据1990年代发现的资料，李济先生投考清华时是录取在备取榜内，排名倒数第三，所用姓名为李顺井。——文集编者注

仁友会史略*

我们要持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来论一切事实

新教育第一件要义是在研究儿童心理……

七年前五月初三下午，清华学校中等科有五个学生在一个大大的讲堂里边，正颜厉色的讨论做人的道理，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国家的义务；于是定了一个宗旨，划下几条相守相禁的条约，以范围各人一生的生活。这就是仁友会发动的时期，这就是仁友会初起的情形。

那时候名称并不叫作仁友会，却叫作新少年会。为什么叫作新少年会呢？我们要记得，民国二年离武昌革命时候甚近，一般青年受了那一种激刺，思想上不免有无数的变动。十三四岁的学生，知识已开了，心高望大，读了那市上时行的什么华盛顿、拿破仑、林肯的传，愈加鼓舞激动起来：人人都想作华盛顿、拿破仑、林肯。但是那时候华盛顿作不了，拿破仑可以不必作，要作林肯又不像。我们认为那意大利三杰是最可羡慕的，可以作我们的榜样。这三杰有一新少年意大利会，我们也就发起了这个中国新少年会。虽说是言大近夸，然少年要有这一种进取的精神，是应该受奖励的。

新少年会的宗旨是"励进道德……"。初成立的时候，会员是专注从研究道德、联络感情方面着手。进行的方法是每礼拜聚会一点钟；聚会的地点是没有一定的，有时候在讲堂上，有时候在野外，有时候在寝室，凡是可以开会的地方，他们都利用起来。聚会的程序却是极有一定。最可注意的就是那互相规过的一条。这条目却是没有一定的准绳：凡是一举一动、读书的勤惰、饮食的节制、起居的时刻、个人大概的脾气，都可以作规过的题目。现在回想那时候开会的情形，真令人生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这一个说那一个脾气太暴躁了，那一个说这一个饭食没有节制；书念少了是怕受罚的，睡过时了也是有规劝的。然而会员却都是融融乐乐，都有一种爱惜的意思，没有半点讥

* 本文1920年4月写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李光谟据手稿整理。转载自《李济与清华》("清华文丛"之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笑的态度。有一次甲会员向乙会员借中国信纸,乙会员稍微给迟了一点, 开会的时候甲即当众责乙不当养成一种悭吝的习惯。又有一次丙会员和丁会员同出门买西瓜;丙出的钱,叫丁拿进去。丁想道,我也不是你的奴隶,为什么要服从你的命令?(不拿!)丙想道,我既出了钱,又要我拿进去,你这人太要占便宜了!(也不拿!)两个人赌了气,把西瓜放在马路上,空手进门去;钱花了西瓜却没有吃。后来两个人同时都懊悔起来,见面各认各的不是;因为他们想,这种举动违反了那励进道德、联络感情的宗旨的缘故。这种故事虽说是近于琐碎,然却能表明那会员天真的性质及一种互相爱敬的意思。

会员的人数在发起的时候只有五个,等到暑假却增到六人。他们的年纪是差不多,性情是很契合,所以无论作什么事,一人发端,五个响应,好像是那空谷的回响、野林的鸟音一样。正如像是一个共和的军队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可作排长。那排长的号令,没有一个不听从的:叫着走就走,跑就跑,叫着立正就立正。除了开会之外,他们几个人同是在一块儿的时候也多。星期六拍球,星期日野游,或是进城赛驴、出城坐车,只要有机会总是同着一块儿的。

那一年暑假的时候,会员中六个人就有三个在西山消夏,一个回南去了,两个在北京。正式的会务是自然中止,然而那精神上的交通却更加别致。不住在一块儿的会员借邮政局传达他们讨论的问题。那住西山的三位自然是有一种特别的利益:他们身体是活泼的,意识界是没有约束;那性灵上受了那西山秀色的供养、朝日晚月的感化、暮鼓晨钟的惊动、古寺神刹的笼罩,不免就鼓荡起来。这种作用与那时时不离心的新少年会的宗旨媾合起来,就生发出许多人生的大问题。一位会员因为着想太深、用情过度,竟罹了一个疯魔的症候,几至不起;现在虽说是已经复原,然而竟不能继续追求那高深的学问,遂他的初志。同会会员现在替他想起来,没有不叹息的。

秋凉开学以后,会务尚是照旧,会员却一个一个的增加起来。到了十一月,因要练习演说,大众决议道:“我们的宗旨除了励进道德、联络感情之外,还有研究学术一条。共和之世辞令极重。中国国语之不振久矣,新少年安不从事于其间?乃立国语演说部。”清华学校研究国语的集会以此为最早。会员本来的意思,是借此练习各人的辩才,并可以此作为介绍同志入会之初步。但是因为种种的缘故,大家又决议令国语演说会独立。会员仍旧是在那边借那个机会练习演说;成绩虽说不大,后来中等科的同学练习演说的组织均是继此而起的。

快到年终的时候,常会的会序虽说是照旧,会员的心理是渐渐有一点变动。那规过的一条虽说是极有功效,时候久了,就不免无话可说。值这精神弛滞的趋势,一个会员提议一个新法门:“磋磨之道,检外心则有余,检内心则不足。根本修养端赖自省。昔者富兰克林常以十二德范身,就是自省的法子,我辈曷不仿行?”大家即时赞成,于是

仿照富兰克林的样子刻一种自省簿，印了五十本条目。地下就是一个样本。

这自省簿的用法，是纯粹仿照富兰克林的手续，每日注重一条，两礼拜作一个结束，周而复始。然而会员中也有自出心裁、另生法门。然而各人却有一种同样的经验，就是那十二规各自的界说极不分明，有时候自已做错了一件，不知道到底属于哪一条，心里不免就生了一种不快的感念。所以，用了一年多，大家就决定停止那形式上的束缚，随各人自便。

这时候的常会的会序无大变动；讨论的问题一多半是拿王阳明良知问题作引线，也没有什么特别。自省簿的实行期是在民国三年正月初一日（开始）。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会员大家聚在一起守夜：温习那过去的成绩，决定那来年的志趣；好像由北美洲到南美洲经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回头望望把走过的路程作一个收束，向前望望把将来的路线定一条路程似的。自此以后，这个习惯是年年守着没有间断的。

民国三年、四年的时期，会务没有什么特别的改新，会员也没增加。四年的情形尤为冷淡，会务并且中断了一个时期。国语演说部的独立、自省簿的停止，均在这一个时期。这个衰弛的原因却有几种。第一是进行的会序过于单简严肃，有时候比那星期日教堂牧师的演讲还要枯寂，兴趣活泼的青年是决难受这一种束缚。第二是会员正是心花怒放的时候，不但是功课这时渐渐的忙起来，外务也多了。分心的地方既多，把光阴计算、修养时期就不免减少。有了这两个原因，那新少年会这时期衰弛的情形，也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阴极阳生；心理上说，意识的流动像波浪一样，总是一起一伏。所以，这仁友会群众的心理经了一伏，大家回思，不免渐渐生了一个惭愧的意思，生了一个为德不力的观念出来。这种观念一发生，会务即时就得了一种效果。第一，增加新会友；第二，改造会章，另筹进行方法。恰值这个时候，是袁世凯想作皇帝，学堂受了影响，那种集会结社也受起干涉来。学堂的校长出了一个条（子），告诉新少年会的会长说，这个会名太刺耳，好像革命党的秘密团体，叫我们赶快改换。所以，这次修改会章，第一个变动就是那名称叫作“仁友会”，取那“以仁会友，以友辅仁”的意思。第二，那宗旨也改得简单得多了：“改良社会、振兴国家”八个字，包括一切的作用。第三就是那范围也扩张多了，仁友会底下可以设支部辅助进行。会员经了这一番整顿，精神就洗刷起来，进行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按着新章就即时设立清华学校高等科仁友会支部；清华学校以外的学生也介绍进会来。新入会会员自然有好多新理想辅助本会的进行，那常会的进行也有趣多了。里边除了那规劝的老规矩外，加了一种念格言及一种报告；每每月间也有一种俱乐会，杂添一点生趣。这个时候仁友会的精神就渐渐的稳固了。开会是有常定的会序，也比先前有味多了。然而那规过一方面竟不能实行，一则因为人太多了，实行不及，二则因为各人自省的功夫深了，所以也就不愿实行；

然而大家明确的心理如何,确是很难分析。此外还有那名人传记的一行极有价值。这一门的进行,不但是于会员精神上极有感化,无形中的历史的知识增加了许多。一时之间那欧西十八、十九世纪的哲人及中国历史上出色的伟人,均被各会友解剖考验起来。那报告方面也有一种很有价值的材料,即如民国六年会员费了一年的时候调查欧战的情形,虽说是不十分详细,然而学生于课外留心天下的故事总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仁友会的组织是如此。仁友会的失败却是很多,讲一两件作一个榜样。第一,会章中"七禁"的里边第一条就是早婚(以二十五岁为限)。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察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几个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个条件。第二,仁友会对外的态度是不守秘密的,然而会员却极力反对那一种"号召的习气"。所以介绍那新会员(的)手续,总是先得他真心的同意,然后才请他入会。开会的时候也不张榜,不过是期以信义相守、不必惊动他人的意思。然而因此不免就惹起外界种种的狐疑,以为我们是一种结党营私的团体,生发出无数的谣言,污及这会的名誉——说起来总算是一种极不幸的事体。

仁友会的会员现在有四十三(名),一多半在美国,其余多是在清华。那清华的会员开会仍是照常,在美国的会员因为分散了,不能常常聚会,只能借循环通信的方法及分班互相讨论一切有兴趣的问题。然而,因为会员散处四方,到底令人有种疏稀而不周密的感觉,大家会员应该想一种中兴的手续,重整旗鼓来才好。*

* 据《清华周报》1925年第三三五和三四四期刊载,仁友会直至该年度还存在。《周报》称该会"为清华最久之会";又载,任之恭君在1924—1925年度时担任该会会长,云云。看来,李济当年所作号召并未落空。——编者

社　　会　　学*

恭(孔)德是新社会学的开创鼻祖,这是大半人都承认的;然而现在治社会学的,皆以为他是一个哲学的社会学家,不是科学的社会学家。自恭(孔)德以后,以社会学号召世界的人也很不少,确(却)是一个也当不住(起)这“科学的社会学家”七个字。所以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社会学中没有人才,(而)是这社会学比别样科学格外复杂。到了现在,社会学家对这门学术的范围意见还不一致: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各人的门径,各人的宗旨。然而他们却有几种公认的条件。这几种条件是:

(1) 社会学是考察社会的现象,作系统的叙述,下因果的解释。

(2) 社会是动的不是静的,是有机的不是无机的,是天演以内的不是天演以外的。

(3) 社会的体、用、原始、变迁、进步,是社会学家最注意的。

(4) 社会学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种学的关系,就像生物学对动物学、植物学、组织学、解剖学的关系一样:一治大全,一治一曲。

社会学的基础尚未打定,所以它的进步虽说是一日千里,然而它的成绩还是幼稚得很。前几个月我见心理学家霍尔博士[1]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心理学与社会学还幼稚得很,你们中国人要贡献世界总算以这两门内的机会最多。”我想他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写了这边(些),以为同人的鼓励。

---

* 本文系作者手稿。李光谟整理于1993年3月19日,转载自《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 霍尔(Dr. C. Staney Hall)博士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研究青年心理的著名权威,曾任克拉克大学校长。李济在克校读书的第二学年(1919—1920),霍氏已退休。李济在这学年曾为打算转学哈佛攻读人类学事专门拜访霍氏求教,受到后者的热情鼓励。按此推算,并从对霍氏的称呼上看,这篇手稿大约是写于李济离开克校之前的1920年上半年。——整理者注

僵　　化*

移民初到新英(格)兰的时候,找出筑仓屋最妙的法子是靠住山边,把牛羊圈在地窨子(里),草车可以从山上溜入仓中。及至他们的后裔搬到平原芜芜的伊领诺伊(伊利诺州),他们仍旧是照那老样来筑仓屋。没有山可靠呀,他们却用木板(代)替山边,插上(入?)仓中,天天把草车向这假山上拖!!!

往时,美国的公学到芒种、秋收的时候就关门,让孩子们去帮他们的家人收割;这就是那长期暑假的起源。等到城里开学堂时,先生们也就不问根由,照例放这一个长假。其实,学堂的房屋地方,很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快快活活的应用起来,并且可以得一点切实的利益。但是不行。虽说我们有一半(人口)在城里住,那城里的学堂却是一到六月就关门,把孩子们赶得满街乱跑——好像也是让他们去帮他们的家人割谷子、拔番芋似的!

先前在那一片平阳的西边(部),建筑道路的习惯是分方段修。后来,有山的城池也仿效这种棋盘式的法子。虽说是拜(制?)那土地之宜随方就圆,顺分水的界线修是经济多了。到了现在,每季准(有)成万里的道路被水冲坏,这都是盲从先例的结果。

大概社会的习惯或者制度有了一二百年的历史,虽说它发生的原因已经失了作用,就那周境的变迁着想,它已没有存在的道理;但它却仍是被人拖住。最初创作的人用一副冷眼把它铸造经营的时候,却是使它变来变去,以合他的原旨为主:要是不行,就把它放弃了,再作一个。但是后世承袭了这种遗传,对于它就(生)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它的水性就失掉了,好像变成了一种硬骨头。这种社会制度由软而僵的程次,可以叫作"僵化"。

这"僵化"的原因很有几种:

我们一多半人是很懒,不肯用心,不愿意集中心力来解决社会上复杂的事体。一个小问题稍含一点因果关系,就要鼓动我们那种下围棋的心思来;所以复杂的问题非

---

* 本文系作者手稿。李光谟整理于1993年3月20日,转载自《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澄心渺虑不可解决，我们就望而生畏，赶快逃避。我们境遇变了，我们总是避开不想它，不愿意再把已做的工课重新温习。我们是在遗传的辙道(中)流来流去，除非碰了一块石头，或者他种阻碍物来把(它)们汤(蹚)开。一日到晚困于那点卯的功课里，哪一个肯停止起(下)来问自己："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用处没有？""我做的事情于社会有什么益处？"评判自己生活的本事确是一种很少的天赋，做得到的，也就可以算是才子。

百年以来，叫"社会改良"的声音，犹如狂风怒号。大众听了，或者以为是一种群众心中公共(共同)的目的、思想、志愿，但是当真说起来，不过几个人在那儿关心这个问题，为它(筹)划计策，或者情愿为它牺牲。那一切人也许愿意社会改良，不过甚想别人去做苦力的事，自己来收最后的效果。要揭穿一切大声疾呼(者)的真正态度，可以下这个试验：提议一种与这些人密切攸关的宗教、政治、风俗的具体改良政策，那时候他们的抵抗力只怕比那默然不言的还大，就是他们自己也觉悟不出来他们还是这样守旧的！一般心力极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牢守他们早年的成见，抱着一种意气的态度。

社会的事要是在老年的掌握中，颓唐的事情就不会如在少年掌握的时候[那样]受社会那一种注意、攻击了。若是教育的目的不合社会的生活，知识的进步过了迷信的范围，法律的作用不惬群众的关系，——这些事情只有无偏见的少年看得出，认得真，来要求那种适当的变迁来应付这种外界的潮流。那老者呀，实在是莫名其妙、不知其所以然咧。

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博士应了我的约，把近世史中十数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纪重新温习了一番。他找出来：十几个革命中兴人物的年纪是在三十五岁及四十六岁以内(之间)；这些人物的政敌的年纪却在五十四岁以上，老者或至六十六岁。大概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人，比守旧党的年(纪)总小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

写于 1920 年前后

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三年前我因为要分析组成现代中国民族的成分，写了一篇论文叫作《现代中国人民之体质》** 。在搜集关于这个题目的材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大事情，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有系统的材料已经印出来的是非常之少。那时我就发了一个大愿心：心想回国后我必定要测验几千几百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民国十二年，我初从美国回来，遇着了丁在君先生，就告诉了他这个意思，立时就得到了他十二分的赞许；他并且保险替我想法子使我能够遂一部分的愿心。那时候我尚不是正式的科学社的社员，然而因为得了丁先生的疏通，科学社就慨然允许我经济上相当的帮助；我的测验中国人民体质的工作因此就开始了。

今天的报告就是根据去年在湖北所测验的材料。我作这一件事情得了很多的公共机关及朋友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我要乘这机会申谢一番。科学社是我的主人，丁在君先生是我的第一个赞助人，没有这两方的帮助，这工作是根本上不能开始，所以在我的谢单上第一个机关是科学社，第一个朋友是丁在君先生。其次，南开大学及凌济东先生*** 也是极力帮助我这工作的。南开大学非但准了我很长的假期，使我得作这一件事情，并且给我两百块钱使我能把由科学社所得的经费省出一部分，这种盛意都是我应该表谢的。我又(要)谢谢前武昌师范大学的校长张春霆先生及事务课长李廉方先生；因为他们调了好些他们学校的职员随时地帮助我，所以我能于十数日之内测验到一千人数。但是我最应该申谢的是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叔澄先生：他领我到学堂量学生，到工场量工人，到监狱量犯人，到警察署量警察。因为他的介绍，所以武昌有

---

* 先父济之先生这篇手稿，是今年一月间很意外地在他的遗稿中发现的。原稿用墨笔写在毛边稿纸上，涂改之处不多，字迹清晰，从文字上可以认定是供演讲用的；但是否最后定稿尚未敢言必。这份手稿说明，先生在归国后第二年(1924)，继新郑发掘之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体质测量。经整理后的这篇文稿，转载自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考古琐谈》。文稿整理者　李光谟于1996年3月

** 此文即嗣后收入李济博士论文作为第二章的《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整理者注

*** 即当时南开大学教务长凌冰博士。——整理者注

一千人肯为科学牺牲十几分钟个人的自由，让我摸头、摸脚、翻眼睛、揪耳朵，把他们的模型记载下来。此外还有好多朋友帮我，应该谢谢的我都一起谢谢，但是我不能一一尽说了。

就测验的本身讲，第一个问题是选哪几种体质的特征作测量的根据？人身有好几十处可以测验；要是处处都量到，在最顺当的情形之下，最高的速率也是每人二十几分钟。所谓最顺当的情形者，就是受测验的人须把衣服脱得精光，绝对地受(听从)测验人的指挥。这种情形除了在军队中依长官命令之外，差不多是很难得到，所以我在最初就没有作这种希望。我采取的手段(是)“少量几点，多量几个”。意思就是与其每人量十处、只量一百人，不如每人量一处、量一千个。因为从统计上多多益准的公例看去，一百个人十处测量的可靠的程度，一定比不上一千个人一处的测量的可靠的程度。十个较为不可靠的测验与一个较为可靠的测验相较，还是取一个较为可靠的测验为经济。还有一层我们应该知道的：人身可以测量的地方虽很多，然而一多半都是因环境、因遗传而同时发生变化的，所以在研究人种学上的价值它们并不一样。总结以上种种的观察，我到湖北去测验的时候，我只选了十三个绝对的测验、二十三个观察的地方作我调查的根据，其中一多半是属于头部和面部的。由十三个绝对的测验，至少可以得五个相对的测验；结果是在我测验(的)一千人之中，每人可以由我形容的地方有四十五处。

有些朋友问，为什么先跑到湖北咧？有两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的计划原是想每省量一千人。十八省中总有一省我要第一去的。北方几省，有一个协和医学校的许大夫在我之先起首量了*；南方太远，当然是到中部去。碰巧湖北是我的故乡，容易得相帮的人，容易接洽，所以就选了湖北。

我今天的报告是就这四十五个观察测量的地方选出三点来讨论：第一体高，第二头宽指数，第三鼻宽指数。在我详细讨论之先，我有一件事要请诸位注意：我这三个分配图各县的均数所根据的是极不一样。最多的是黄陂，这一县的我竟测验了一百十九个，而代表长阳、鹤峰各县的一个也没有。就先前的府分讲，一千个人之中有六百六十一个人是武昌、汉阳、黄州籍，只有三百多人是由其他的七府一州来的。

总这一千个湖北人讲，他们的体高的平均是一六五六毫米，头宽指数为八三·零三，鼻宽指数为七三·六零。

拿人种学的名词来形容湖北人，他们的体高为中平，头为圆形，鼻为中宽。这是单就一千人的均数讲。但是我们知道均数代表的数目的伸缩甚大，没有差别数作它的陪衬，它的内容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第二步工夫是就地理上分析它的内容。我们要知道在湖北境内的中国人口是不是具纯一的体质，亦只有从这一步工夫入手。

* 所指应为许文生(Dr. Paul H. Stevenson)教授。许氏于二十年代起任协和医学校解剖学教授。——整理者注

先就体高讲:一千个人中最低的测量为一三七九毫米;最高的测量为一九四四毫米;两极的距离为五九六毫米。湖北的长子比湖北的矮子要高中国尺一尺七寸多。这里边的一个问题是:这长子矮子是不是生在一个地方?

考较各府的平均得以下的结果:

武昌	一六四一	汉阳	一六五九	黄州	一六六一
安陆	一六五三	荆门	一六六六	德安	一六五六
荆州	一六五六	襄阳	一六六八	郧阳	一六九二
宜昌	一六五二	施南	一六四八		

长江流域的体质较之汉水上游的人平均要矮三十个毫米。长江流域的人体高像湖南,像浙江;汉水上游的,近于河南、山东人的。中分的地方约在安陆、荆门、德安一带。就普通(遍)的趋势讲,湖北人的体高增高与地理上纬度的增高作正比例。

照同样的手(段)来分析头宽指数均数的内容,我们发现湖北虽是一个宽头省份,然而亦很有地域上的分别。简单讲,东南各县为圆头聚集的地方;这一方各县的均数多在八二以上,有高到八六的。同时,西北的头宽指数亦是很高。唯有安陆、荆门及襄阳与荆州的东部为稍低。所以,湖北头宽指数的分配在地图(上)呈一个"凹"字形:东西高,中间低。

再就鼻宽指数的分配讲,较之体高及头宽指数确又不同。东南部差别程度确没有什么高下,都在七零及七八之间;而西北一带由六零至九零各种指数皆具。一部分原因为所测的西北人数太少。然而不尽是因此。譬如,襄阳的人数为六十五,不能算少;荆州府所测的人数为五十六,不算多。然比较襄阳与荆州鼻宽指数的分配,荆州确像东南大部分的,极为整齐均匀;而襄阳却一如其他西北诸部,六零八零之间的鼻宽指数都为所具。

综以上三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第一件事我们想得到的:湖北东南部的人民与湖北西北部的人民体质上大有分别。东南部人矮、西北部人高,这是无可疑的了。不过东南、西北两部虽有高矮的分别,而头形又是相类。体高而头圆的湖北人是不是与体短而头圆的湖北人同属一派咧?我个人相信这个解释在鼻形分配图上求。

就历史上的趋势说,中国人民在中国以内的移动都是由西北向东南。永嘉、靖康两个大移动就是很好的证据。间或有向西北的,那是偶尔的政治现象,不是经济上自然的趋势。

我们要根据这个历史上的原则来解释湖北体质分配的现象,可以得一个暂时的或然试说:湖北的民族大概是由三个分支构成。最早的一支是体矮头圆而鼻宽,他们是遍布了湖北。以后由西北又来了一支头圆体高而鼻较窄。这一支方入湖北的时候,大

概与原来的一支不十分相人,但是到了武、汉、黄一带与原来的一(支)渐渐混合起来;所以混合的结果集中在武、汉、黄一带,而西北一带反保存了原有的两支。最近的一支大概是头长鼻窄身高的。他们人数不多,入湖北以后就停留在中部居多。他们与原来的两支混合起来,就是安陆、荆门、襄阳及荆州东部的湖北人。

有了这一个解释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体质的分配解释了;这个在历史上亦可以找出一部分相当的证据。陕西的居民,因为由新疆来的土耳其民族* 的影响,一大半是体高而头长。这一部分人由汉水而入湖北是意想中事。唯有这体高头圆鼻扁的是代表何支,我尚不敢臆断。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湖北邻省的居民亦通体测量一番。

附记 《科学》月刊1925年卷十期十上刊有如下一段报道:“1925年8月27日(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的第4日)上午在[北京]南池子政治学会宣读论文……首由李济之读《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文为李君近在鄂省实地测量各县人士身高鼻广头圆之结果,知湖北西北部与东南人种之构造颇有不同。次为马寅初《关于中外经济关系之几个要点》一文……”

---

* 大概是指突厥语族。——整理者注

幽　兰*

《李济与清华》一书编撰者说明:《幽兰》是著者于 1925 年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文章试图从学理上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和声的问题。(赵元任先生称此文涉及到"复音的试验")。当时中国现代音乐尚处于萌芽时期,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上尚无系统的科学理论可循。这位业余古琴爱好者的论点,肯定有些还值得重新讨论,但文章的方法论和逻辑推理仍大有可借鉴之处。

《古逸丛书》刻日本藏唐人卷子,《幽兰》一本,杨时百先生译成今谱,他的自序有一段说:

> 《幽兰》取音最为奇妙,与近时琴曲,迥不相同。近时琴曲,只用单弦,其用双弦者,必取按同声,然后两弦并用。《幽兰》纯用双弦,满指双声,两弦同按一徽,取其同声;初奏之,似绝不同,然对谱弹去,自然入调……[1]

衡阳刘蕙农先生,曾听过此曲的全奏,有一段很美丽的文字形容它。他说:

> 离披错糅,幽卉苍莽,翕如释如,靡猗条昶;霜雪霰零,荠麦青青;刁调如风之冷,绵芊如春之荣;清闳如谷音,錝脆如风琴,是为《幽兰》之声[2]……

我个人始终没有听过《幽兰》的全曲;所以这曲子前后的节奏到底如何,我的心中没有一个完全的印象。但是时百先生的律吕,蕙农先生的耳朵,都是北京琴界有数的。根据他们两人的品评,我们可以断定《幽兰》这一曲,必具一种特趣。

我所要讨论的,却并不是它在艺术上的价值;是与它相关所发生的一个历史问题。中国的音乐,就全部说,向未超过单声阶级,所以然的缘故,没有人严重讨论过。若论

---

* 本文原载《清华学报》第 2 卷第 2 期(1925 年 12 月)。转载自《李济与清华》("清华文丛"之七)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 杨宗稷:《琴学丛书》之三,《幽兰例言》,第 3 页,民国三年(1914)出版。

[2] 杨宗稷:《琴学丛书》之三,《琴谱序》第 1 页。

西洋的和乐亦不过数百年的历史。它的起源,有的说就是希腊的遗传,一线发展出来;有的说是与条顿民族俱兴的一种艺术[1]。但是大家都信在欧洲和乐完全发展之前,先有一和声实验时期。关于和声的知识,希腊人确有一点。不过希腊人虽知道数声可以合成一声的好些道理,然而不十分爱这合成的结果,就没把这知识实施于任何乐具。及至罗马时代,欧洲方有同时奏两个不同调的事实。要说真正以和声作乐,这是第十世纪以后的欧洲音乐家的工作。

《幽兰》一曲,为唐人抄写古乐之一种。曲前有一篇《小序》说:

> 丘公字明,会稽人也,梁末隐于九疑山,妙绝楚调,于《幽兰》一曲,尤特精绝。……隋开皇十年,于丹阳县卒……九十七,无子。……

隋开皇十年,依西历计算,为纪元后五百九十年。所以我们知道精于《幽兰》的丘明,生在合于欧洲第六世纪的时期。但是这个年月,确不能定作《幽兰》的时期,《小序》只说:"丘明精于《幽兰》",并没说他就是《幽兰》的作者。然而我们可以由此推定《幽兰》之作,至迟亦在第六世纪。

在这个合于欧洲第六世纪的时期,中国流行的琴曲,有以下的和声,这是治音乐史的人,极应注意的一件事。今分析《幽兰》所用之和声如下:

(一)宫徵 (二)宫商 (三)角徵 (四)徵羽 (五)商角 (六)变徵宫 (七)变徵羽 (八)商变徵 (九)变宫商 (一〇)羽宫 (一一)变宫角 (一二)羽变宫 (一三)变徵宫 (一四)变徵变宫 (一五)各音及各音的倍声。

这里边隔一律的为:

(一)宫商 (二)徵羽 (三)商角 (四)羽变宫

隔二律的为:

(一)角徵 (二)变徵羽 (三)变宫商 (四)羽宫

隔三律的为:

(一)徵变宫 (二)商变徵

隔四律的为:

(一)变徵变宫 (二)变宫角

隔五律的为:

(一)变徵宫

隔六律的为:

(一)宫徵

隔十一律的为:

---

[1] 参阅 William Pole: *Philosophy of Music*, *Chapter* XV, pp. 178—193, 1924 ed.

(一) 各音及各音的倍声。

《螾庐曲谈》以中国徵音,约等于欧乐C音[1]。准此,上列诸和声,其与欧乐之等量当如下:

第一组:

(1) 宫商=FG (2) 徵羽=CD (3) 商角=GA (4) 羽变宫=DE

第二组:

(1) 角徵=AC (2) 变徵羽=BD (3) 变宫商=EG (4) 羽宫=DF

第三组:

(1) 徵变宫=CE (2) 商变徵=GB

第四组:

(1) 变徵变宫=BE (2) 变宫角=EA

第五组:

(1) 变徵宫=BF

第六组:

(1) 宫徵=FC

故第一组为欧乐所谓长二度和声;第二组为短三度;第三组为长三度;第四组为完全四度;第五组为减五度;第六组为完全五度;其馀为完全八度。

长二度,减五度,西乐叫做不协音;短三度,长三度,不完全协音;完全四度,完全五度,完全八度,完全协音。

计《幽兰》所用之和声,以不协音之长二度为最多。全曲一千馀声,用长二度几两百次;其次就是不完全协音之短三度及长三度;再次方为完全四度,完全五度及完全八度。

熟于欧洲音乐史的人,大多数都承认第十世纪以前,欧洲所用的和声,只限于完全四度,完全五度及完全八度;用长三度,短三度,是第十世纪以后的发展;至于采用长二度,完全是中世纪以后的事实。

何以在中国梁、陈、隋的时候,已有用长二度作琴曲的事实,而在现在的中国音乐界,几不知和声为何事?现在流行的琴曲,多数是以单声为主的,惟有《释谈》一曲用双声之多,近似《幽兰》;不过《释谈》所用的和声,几全为完全八度及完全五度,只有两次用长二度,两次用长六度。照这件事实看来,中国音乐,自隋唐以后,全是退化。但是这话并不是答复上列的疑问。退化的缘故,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个人相信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单靠读以五行相生解释律吕的书所能的,至少我们也应该留心

[1] 长洲王季烈:《螾庐曲谈》上卷,第3页。

唐以来所传的乐曲及乐器，把它们作一番剔抉的工夫，以发现各时代乐曲所据之乐理何在。这一类的材料，并不是完全没有[1]，不过没人肯留心罢了。

也许有人不信时百所注的《幽兰》是完全对的。这个怀疑，也有成立的可能。如果有这个怀疑家，我只有请他把时百的《幽兰》双行谱，或《古逸丛书》所刻的《幽兰》再作一番钩稽校订的工夫了。

附　一次关于古琴的对话*

这里推出一个录音带的片段，是1979年7月李济在台北寓所中和他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教授(赵元任先生长女)的对话。这是在他去世前两周左右的事，大概是李济留下的最后一次录音讲话了。对话涉及的其他事都从略，这里只介绍关于古琴的部分，本文集编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用圈码)。

……(有杂音，不清)

李：年轻时，我常听韩世昌的昆曲……

……(不清)

赵：您以前学古琴时，是每天很 intensive 地练，还是……

李：晚上练。是黄勉之教我；他抽鸦片，是贵州人。我小时候在家，老太爷教家馆，有些人弹古琴我听过；因为当时没有好音乐，古琴比较高尚，我就常听古琴，觉得很有意思。在清华读中学时①，就跟黄勉之学(我说试试看)。那时是每逢暑假，我从清华回到达子营家中就学琴。每周三次，他来家教我；用两张琴，一个长桌，我和他面对面坐。我从调弦学起，学用指(初步)……完了就教我认他自己抄的琴谱。我学的第一个调子就是《归去来辞》……黄勉之每天写一段谱，我照弹；隔一天他来，先复习，纠正不对的地方。这样学了好几年暑假，开学上课后在校中就没学也没弹，回家才弹……

赵：您那时多大(岁数)了？

李：那时不到二十，才十几岁。去美国留学，学琴就中断了。但我是带了琴去的。那时，你的老太爷叫我弹给他听。你们家住在 Sacramento street，你刚刚出世，我还常抱你(二人同笑)。你的老太爷还说很想跟我学(古琴)：但弄了一阵子就没弄了，没有学成，我是不敢"误人子弟"(同笑)。在美国五年，念哈佛时陈寅恪、俞大维都在。一次陈寅恪在 Harvard Square 遇见我，他问我："你是跟黄勉之学琴的吧？"他告诉我黄死了。黄勉之最得意的学生是杨守稷(时百)，湖南人。他编了一部《琴学丛书》，想要印可是没有钱，后来是我帮他印的。我那时在南开教书，又跟 Freer Gallery 订了

* 本文转载自李光谟撰《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时百先生告诉我：日人所藏唐人乐谱尚有多种；中有《秦王破阵曲》亦为中国久已失传之曲。又敦煌所发现之唐人卷子内亦有乐谱，赵元任先生曾在巴黎见之。

① 指清华学堂(后改清华学校)的中等科(四年)。

合同,参加他们的考古工作,手里有几个钱,于是就帮他印了。他送给我十部,我也没有用,都留在北平;现在张奚若家里有没有,我也不晓得[1]。《幽兰》是敦煌的卷子,在日本找出来的(赵:从一个庙里找出的)。原卷是个文字谱,黄勉之把它弄过来,弄得能弹了[2]。杨时百能弹,杨的儿子也弹得很好,曾有一个 Dutch 从他学弹古琴……

赵:是凡·古立克[3]吧?

李:是凡·古立克。

赵:杨时百的岁数不大吧?

李:不。他跟我的老太爷同年。他最早在湖南学琴不得入门,到北平才找到黄勉之……黄是和尚出身……

赵:黄勉之教您时,岁数也不小了吧?

李:岁数不小了。

赵:现在大陆上的……(举了几个名字,听不清楚)。

李:不知道……古琴有好几派,四川有一派,不知广东有没有?

赵:有个泛川派。

李:以后我不搞了,也不清楚。

赵:清华沈鸿来(李方桂的同班)的太太是香港出名的弹古琴的,我跟她学的。

李:哦!……我记得黄勉之教琴最忌戴指甲(套)。他讲吟揉,最讲究这个指头(示左手拇指);左手大指要用好,否则弹不好。右手中指、食指、大指三个指头都可用,无名指不能用。无名指要跷起,跷不好,勾、剔、抹、挑就不对。指甲只能留一定长度(**赵:**太长不行)。黄勉之的指甲磨去一半,都生了老茧。黄勉之说,才磨时要用蚕茧熏,可以生茧快些(二人同笑)。看来,小姐们做起这事可是苦得很……

赵:谁磨都要很费劲……

李:男孩子反正无所谓,刀枪都玩。

赵:现在香港女孩子学弹古琴的反而多一点。

李:她们吟揉做得好做不好?这是个大问题。吟揉有好些种。指法在杨时百的书中是讲的,普通琴谱不讲……我先前在北平还收了一套《神奇秘谱》。新近新加坡有人送了一套琴谱给我,他知道我有兴趣。

赵:是大陆出的、香港翻印的《琴箫合谱》吧?

李:是《琴箫合谱》,是和箫合在一起的,注有工尺。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我也不知搁在哪里了,可以找出来送(**赵:**我有)。我觉得《幽兰》弄两弦同时弹是和声……(不清)似乎比地中海还早?Mediterranean 的和声从什么时候起有的?

赵:和声……theoretical 讲,cautiously 说……我也不知道……

李:《幽兰》这个曲谱,存心把两根弦同时弹,算不算和声?……它是有规律地用,不是偶然地用。……

赵:您的论文《幽兰》讲了有多少 intervals?讲没讲什么时候用?用在一句的起头?中间?还是后面?

---

① 李济留在北京的书箱二十余个,后由李光谟经手曾暂存张奚若先生家,故有此语。这批书后来转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② 李济在《幽兰》一文中说是杨时百把《幽兰》译成今谱的。

③ 即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R. Van Gulik)。

李:……(听不清)

赵:《幽兰》用泛音也多,每段加一点。

李:别的谱子尾声没用。……泛音外国话是什么?好像没这个词?

赵:Harmonics 呀! Violin 可用的多了,但没有古琴用的多。

李:可以用于一段。

赵:古琴用不用“变”?比方说一段叫一变?

李:有是有,比如《阳关三叠》就是三段嘛!

赵:能不能叫“三变”呢?

李:(听不清)……《渔歌》有八段,我学的最长一段(这里“段”指一个曲子——笔者注)就是它。这是杨时百的拿手。我从美国回来时跟他学过一阵,那时他正在刻书。

赵:他刻的书,拍子是定好的。

李:注了工尺,打了格子,等于拍子。

赵:是自己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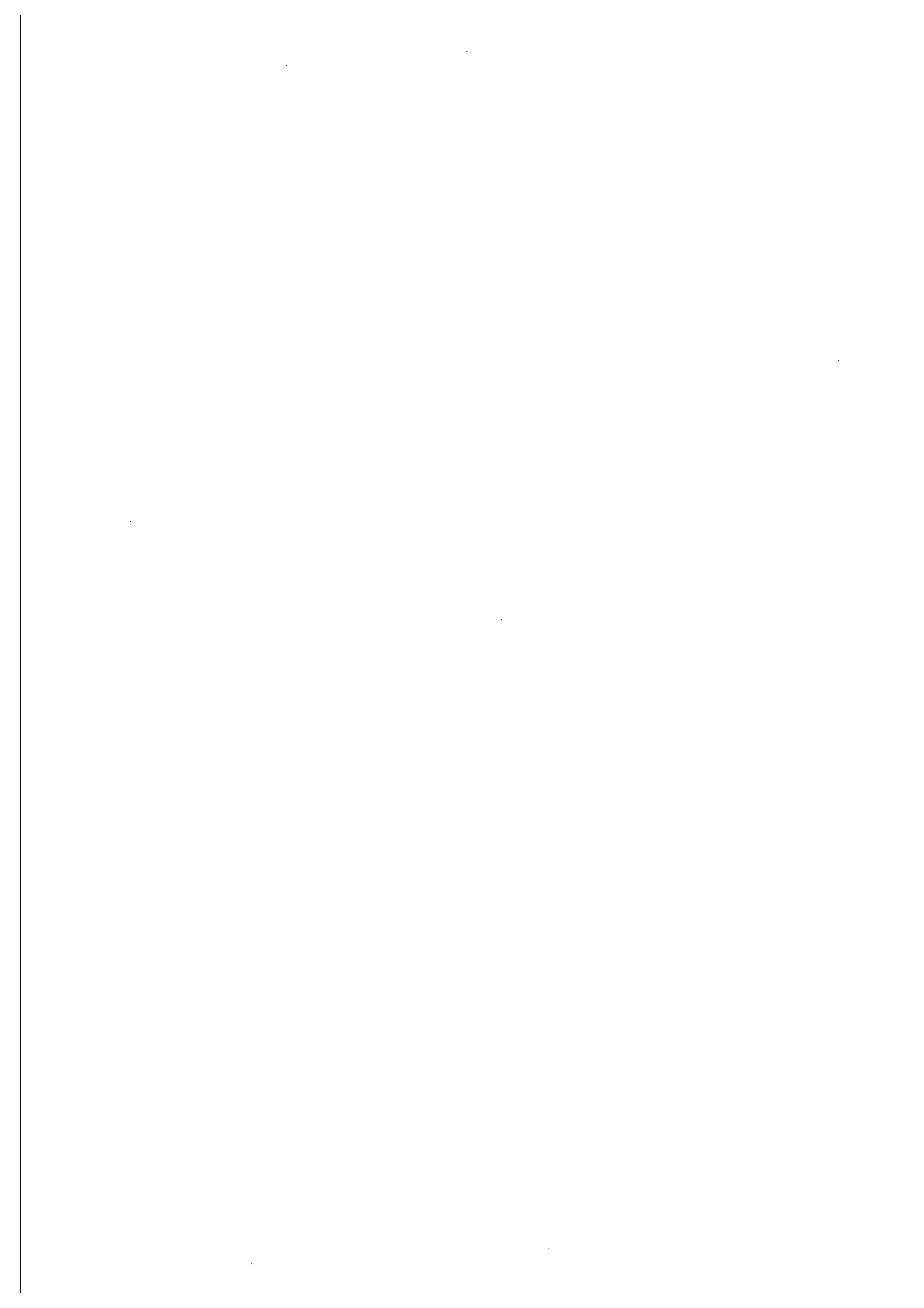
李:教琴的都教,用脚打拍子。

赵:哦! 我看见过用脚拍,我还不懂。

李:黄勉之叫广陵正宗,即广陵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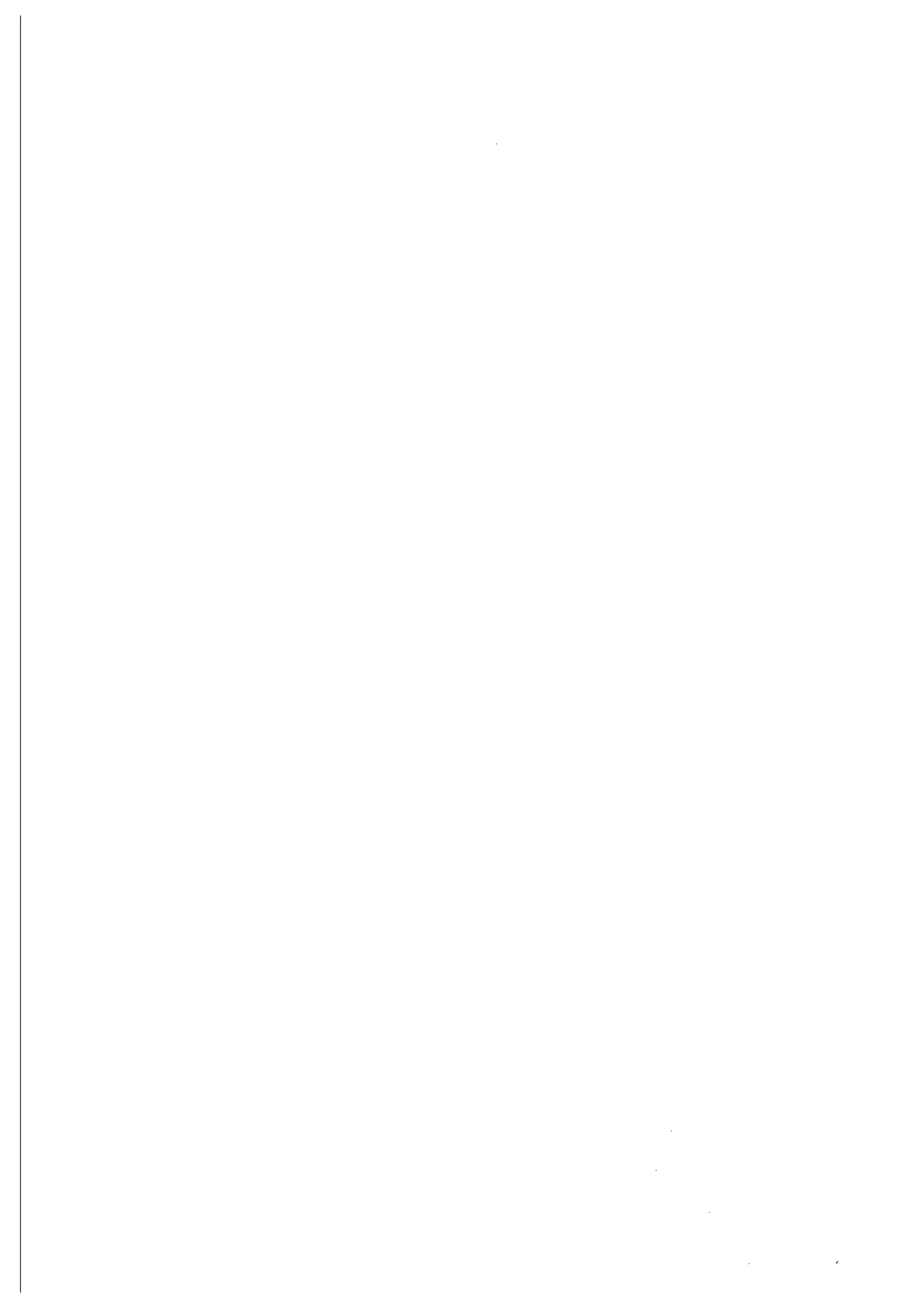
赵:您叫广陵 sǎn,还是广陵 sàn?

李:“散(sàn)”,在音乐上常用,最早是嵇康……(以下阙)。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

李光谟　敬撰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公历六月二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

父巽孚公(李权先生)、母涂氏夫人时年均为二十九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　三岁

童年居家。

王懿荣首次收集到河南安阳出土的十二块龟甲;是为甲骨文字最早问世之时。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四年(光绪二十六至三十年)　四至八岁

四岁时学念《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又念四书。但在四书念完后,接着念的不是《诗经》,而是《周礼》。"这件事完全是父亲一个人的主张,但他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拥有最大的学馆,就没有人责难他这一违背习惯的教育方法。"(李济:《我的初学时代》,见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六七年九月号)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刘鹗《铁云藏龟》问世。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一书(未出版)。

* 本文有部分内容曾以未定稿形式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的《考古学研究(二)》上。为了能较准确地表述李济先生一生的学行,本文也仿效通常年谱的方式,在有些年份附加了少量必要的背景性资料以供参照。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　九至十岁

《周礼》没有读完就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堂;虽说如此,但"这一课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但是却"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见《我的初学时代》)。

"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见自撰简历手稿)。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十一岁

父亲通过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北京会考),分发到学部,得了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把母亲、我、妹妹和一位堂兄接到北京,……火车走了三天"(李济:《从清华学堂到哈佛大学——我的学习过程》,见《杏林春暖》文集,一九七九年台北版)。

父亲"给我和几个亲戚的子弟补习《孟子》"(见《我的初学时代》)。

敦煌汉简初次发现。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　十二至十四岁

入湖北省在北京开办的江汉学堂念了半年书,然后考进了南城琉璃厂(厂甸)的五城中学。在五城中学由福建林琴南先生讲授国文课。

课外从父亲补习《孟子》至光绪三十四年(见《我的初学时代》)。父亲一再详解性善说,先生以为孟子宣扬"以牛易羊"的"不忍人之心"不如佛教"戒杀生"为合理,乃提出辨难。父亲斥后者为异端,不得与圣贤并论。

父亲的课外讲授持续了两年,但先生自进中学后对孟子的信仰开始动摇。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问世。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十五岁

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招生;在北京录取一百二十名新

生,投考者达一千余人。先生于本年被清华录取(报名和录取时所用姓名为李顺井)。录取名次列备取榜倒数第三。

入校半年后爆发辛亥革命,校名改称清华学校。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宣统三年辛亥至民国三年)
十五至十八岁

在清华读中等科(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初中至高中水平);读中等科时改名为李济(字受之)。

学校功课安排以学英文为中心,要求"读、写、听、说"四会;除主课外,图书、音乐、体育等副课也有外籍教师授课。国文教学相形见绌,但在几位名师指点下,也得益不少。

一九一三年五月,先生与同学四人发起组织了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五人"新少年会",暑期后增为六人(至一九一五年以后,在校方干预下更名为仁友会;是为清华成立最早、延续时间最久、"最有精神"的学生团体——见一九二五年第三三五期《清华周报》)。

一九一四年五六月份,先生在"国语演说会"中参加数次辩论会,曾任《解决今日中国农业较商业为尤要》一题的反组助辩,后又在与"国学研究会"联合辩论会中任《垓下败后为项羽计应否渡乌江》一题的反组助辩。

一九一二年,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问世。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　十八至十九岁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高等科共四年,相当于普通高中至大学二年级水平)。

从湖南饶麓樵老师学《荀子》,饶老师对先生的读书笔记很赏识,认为"所见可与《困学纪闻》比拟"。先生认为《荀子·天论》中萌芽的自然科学思想和《孟子》中的"民为贵"思想,对共和及科学等观念之启迪均十分有益,但更加重了向海外寻求救国"奇方"的热望。

任学校演剧队队长。

以下为先生在高等科一年级时的成绩*。

* 本年度及以下几年度在清华的成绩,俱见哈佛大学所存档案(原文为英文)。——编撰者

课　　目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评分
国文及作文	3	40	79.1
英国文学	4	40	80.6
英文修辞学及作文	4	40	85.4
平面几何	4	40	82.3
物理	2	40	87.9
地文学	3	40	85.5
生理学	3	40	79.9
手工	1	40	77.5
音乐	1	20	82.5
体育	1	40	及格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问世。

一九一五年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两卷在日本问世。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　十九至二十岁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

在一些课外集会中演奏古琴(七弦琴)。

一九一六年春,参加清华学生为筹办贫民小学而在米市大街青年会义演的话剧《贫民惨剧》,同时参加的有洪深、陆梅僧等。

现留存先生本年作文(论史)七篇原稿及教师批语;饶师评价甚好。

以下为先生在高等科二年级时的成绩:

课　　目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评分
国文及作文	3	40	85.6
英国文学及作文	5	40	88.8
德文(第一年)	5	40	87.1
古代史和中古史	4	40	90.8
生物学(讲课)	3	40	79.4
生物学(实验)	2	40	79.4
立体几何	4	20	81.7
三角	4	20	79.0
体育	1	40	及格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二十至二十一岁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

当选为高三级会干事。

当选为清华学校学报经理部经理之一。

一九一七年夏季,《清华周刊》公布戊午级学生经过六年多的筛选淘汰及其他减员,还留下六十二名,其中包括李济及其同学杨石先、刘崇纮、楼光来、沈履、陈克恢、叶企孙、董时、张歆海、张道宏等。

以下为先生在高等科三年级时的成绩:

课　　目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评分
国文及作文	5	38	92.9
英国文学及作文	4	38	81.3
德文(第二年)	4	38	80.0
经济学	4	38	79.5
物理(讲课)	2	38	71.5
物理(实验)	2	38	71.5
美国历史和民情	4	38	82.0
体育	1	38	及格

与陈启华女士完婚。

以丁文江为领导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于一九一六年在北京成立。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 二十一至二十二岁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

本年度任“仁友会”会长。

美国 G. D. Walcott(华尔考)博士为高等科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智商测验(先生被测定为 128)。在华尔考影响下,先生对心理学产生较大兴趣,报名准备去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与心理学专业。

以下为先生在高等科四年级时的成绩*:

* 本年度起清华的记分由百分制改为五级制,即评给“超、优、良、中、差”五级。——编撰者

课　　目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评分
中国哲学	1	40	良
中国历史	1	40	优
中国文学	2	40	良
英国文学及作文	4	40	良
德文(第三年)	4	40	良
心理学	4	40	优
化学(讲课)	2	40	优
化学(实验)	2	40	优
体育	1	40	及格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问世。

一九一八年夏季,先生在清华学校毕业(戊午级),共在清华学习七年半。在此期间所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除养成用功读书、讲求效率、遵守时刻、爱好清洁、重视体育(强迫运动)等良好习惯外,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对先生都没有什么影响;这时先生一心只想出去学点外国的东西,即"科学救国"的奇方。

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多年暑假在家中从民初名古琴家黄勉之习七弦琴。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　二十二至二十三岁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四日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船赴美留学。同行有清华戊午级五十七人,其他方面九十四人(包括校内外公费生三十七人和自费生五十七人),于九月四日抵旧金山。先生于同月入马萨诸塞州沃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专业。

与徐志摩结识,并在克拉克同住一公寓。时值"五四"前夕,同寓五人订立激励爱国的章程,每日举行朝会,晚上唱国歌。徐和李还参加红十字会员大会。李、徐等人于十二月去波士顿,听王正廷演说,并结识梅光迪、赵元任、吴宓等人,加入中国学生的"国防会"(后在克校组织分会)。

在克校第一年生活中,先生深感与美国人相处甚为符合中国之"人情"。社会学教授F.H.Hankins(韩金斯)对先生浏览书籍的方法很感兴趣(先读序及章节目录标题,就能了解全书大概);先生介绍说此法系由父亲处学来,教授表示十分钦佩。

老校长C.S.Hall(霍尔)教授提倡学生保留部分学习时间到图书馆自由阅读("啃

青草"),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架,因此养成先生广泛阅读之兴趣;先生对人口优生问题之兴趣,部分也由泛读养成。

第一学年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大学本科(第一名为徐志摩)。一九一九年六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

以下为先生在克拉克第一年的成绩*:

1918年9—12月	第一学期成绩	第二学期成绩	学分
欧战文献		80	
法文1		77	
心理学B		90	
心理学E		84	
社会学		95	
统计学		85	

1919年1—6月	第一学期成绩	第二学期成绩	学分
心理学2	B+	B	6
心理学4	A-	A-	6
心理学8	A-	A-	6
社会学	A	A-	6
生物学6	B	B+	6
逻辑-伦理学	B	A-	6

七月五日至八月十五日先生在绮色佳城康乃耳大学,进该校心理学暑期讲习班学习内省心理学等课目。以下为在该班时的成绩**:

课目	编号	(六周内)课时/周	相当于大学课时	学分
心理学	S5	7.5	2	95
哲学	S2	5	2	旁听不考
法语	S1	10	4	75
心理学	S1	5	2	旁听不考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　二十三至二十四岁

在韩金斯教授指导下,进克拉克的第二年作为研究生改念人口学和社会学课程。

* 本年度在克拉克的成绩,见哈佛大学所存档案。——编撰者

** 康乃耳大学暑期讲习班的成绩,见克拉克大学所存档案。——编撰者

这一年期间,先生与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徐志摩有频繁书信往来;信件表明,李和徐对国内"五四"前后的新事物(如《新青年》杂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等),都抱欢迎态度。

在做人口学硕士论文过程中,先生感到人口问题的基本训练在数学,而自己这方面根底不厚,加上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打算改学人类学。

在此之前,写了一篇很短的自传(自撰简历),谈及自己治学兴趣的转变,另外还撰写了一份《仁友会史略》,二文都寄回清华的《仁友年刊》(此时仁友会已发展为拥有数十名会员之团体,以海外会员居多)。

关于这一学年的学业,现存档案中只留有课程登记卡如下(没有反映成绩):

主课:

任课教师	课程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F.H.韩金斯	社会理论史	2	36
F.H.韩金斯	天资与培养	2	36
F.H.韩金斯	社会改造问题	2	36
C.O.费舍尔	经济学原理	1	36
E.G.波林	系统心理学	3	36

其他:

任课教师	课程	每周时数	共计周数
G.S.霍尔	精神分析学	1	
G.S.霍尔	统计方法	1	
J.W.伏奥贝根	心理学实验	1	

一九二〇年元月提出硕士学位申请,论文题目为《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 个体的差异及其原因;(2) 人口的质的演变;(3) 素质的改善。论文于六月通过(原稿存克拉克大学);同月,先生被授予硕士学位。

同年六月被美国社会学会吸收为会员。

六月,申请去俄亥俄州阿克隆市的米勒橡胶公司参加劳动一个月。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　二十四至二十五岁

一九二〇年夏季,先生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人类学研究所为研究生。

从 E. A. Hooton(虎藤)念体质人类学、比较解剖学和史前考古学;从 R. B. Dixon(狄克森)念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民族学;并选修了几门大学本科学生听的课程。

一九二一年三月,先生向文理学院的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要求在一九二二年考试通过。院方认为先生在一九二〇年九月进哈佛以前没有念过博士生的学分,因此建议他读满常规的学期,即到一九二三年考博士学位。

以下为先生在哈佛第一年时的成绩*:

课　　程	全年成绩	一学期成绩
人类学 2	B+	
人类学 3[2]		A-
人类学 5	B	
人类学 7[1]		A-
人类学 8[2]		(旁听)
人类学 11[2]		B+
人类学 15hf.		A-
心理学 20C	A-	

一九二一年三至十月在美国东部各大学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共一百一十一人)中做人体测量学调查。

一九二一年暑期协助虎藤教授洗刷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学得处理人头骨的经验和方法。

一九二一年四月,瑞典人安特生在我国河南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　二十五至二十六岁

随 McDougall(麦独孤)教授作了一年心理学实验:先生设计了教小白鼠在水迷宫中学习游泳并将习得的本领遗传给下代的实验。至一九二二年年中停止实验,将报告数据全部交给麦教授。

经过哈佛一年的探索,先生对人类学有了一般了解,也选定了自己要作的博士论文的方向。开始为此搜集材料。查阅了大量中国古籍;研究了几部传教士的著录,用以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的问题和现代社会问题相互印证;并从城垣建筑的资料中探寻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线索和人口状况。

研究院教务长 Chase(切斯)教授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讲授希腊考古学,激发起先生对考古学的兴趣。

* 本年度及以下几年度在哈佛的成绩俱见保哈佛大学所存档案。——编撰者

一九二二年暑假,在校写论文,工作紧张,每天在查尔斯河上划船锻炼一小时。

以下为先生在哈佛第二年的成绩:

课　程	全年成绩	一学期成绩
人类学 13^2		“超等”
人类学 20d	A	
梵语 $1a^1$		B
梵语 $1b^2$		B
心理 20e	A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　二十六至二十七岁

本学年先生集中精力撰写博士论文。论文先从叙述中国人的体质开始,接着由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归结出关于汉民族演变趋向的论点,然后再从传统和外来书刊中的研究推导中国少数民族变迁的沿革,最后归纳到中国民族迁移的总问题。结论认为中国民族之主要成分有五:(1) 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 通古斯:长头窄鼻;(3) 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 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 掸语群。次要成分有三:(1) 匈奴;(2) 蒙古;(3) 矮人。是为开中国人种学之科学研究先河的著作。论文初稿(打印稿)的标题是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民族的形成》)。

论文初稿的完成,受狄克森、虎藤教授以及先生的同窗好友印度籍研究生比拉加·古哈的鼓励和帮助,得益良多。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有北美当代多位人类学大师参加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先生作了题为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报告,扼要介绍自己作博士论文时遇到的中国人类学问题,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的重要论点;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化的问题。听取报告的一些资深学者认为所谈的问题确实言之有物。这篇报告先后两次(内容略有不同)发表在美东的留学生和研究生刊物上(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和一九二三年)。对前一篇,罗素在他的 *Problems of China*(《中国问题》)一书中深加赞许,作了大段引证,认为“从中看到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

十二月,先生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博士论文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通过，评语为“极佳”。六月，先生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因德语口试未能一次通过，考试委员会本拟缓期一年授给学位；经指导教授力争，最终同意于本年补试通过）。

以下为先生在哈佛第三年的成绩：

课　　程	全年成绩	一学期成绩
人类学 4[1]		B+
人类学 20d	A	

在美国五年，尤其是哈佛的三年，在学习科学知识方面有不少收获。对当时留学生的风气，认为他们在选择课业上有很大自由，也很少有人想在美国长期待下去。先生感到，既然要关心中国将来的命运，就要设法从了解它的过去入手，因而明确了从人类学和中国考古学开始自己一生的事业。

在哈佛期间，将表字“受之”改为“济之”。

一九二三年　二十七岁

获得博士学位后，先生在返国途中造访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勒士·赫得利奇卡教授；赫教授在得知先生只有 Ph. D（哲学博士）而没有 M. D.（医学博士）学位后，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

由克拉克时期的高年级同学凌冰先生（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推荐，暑期返国后受南开校长张伯苓之聘，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结识地质调查所原所长丁文江。由丁文江邀请并资助（二百银元），于十月间偕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去河南新郑县作考古调查和发掘，以确定是否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工作从十月一日到二十四日）。

修订博士论文，准备正式出版。

一九二四年　二十八岁

本年度起，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

暑期，应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之邀，先生前赴西安为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学（七月七日以后一个月时间）。同去讲学的有王桐龄、蒋廷黻、周树人（鲁迅）等十余人；先生所

讲内容大致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此行的较深印象一为同蒋廷黻散步时见到一群乞丐在旧戏台上大吸鸦片;一为参观青年会时得知美国人举办的灭蝇宣传运动中乡下农民指认放大之苍蝇图片为“洋苍蝇”的情景。

此行同文学家鲁迅初识,有赠书、赠工艺品、一同参加“易俗社”演戏纪念活动并捐款、赠匾(鲁迅题额:“古调独弹”)等举。

先生赴湖北各地进行居民体质调查,从身高、鼻阔及颅圆等方面发现鄂西北与鄂东南居民体质构造差别颇大。

整理新郑发掘出土的人骨,在此过程中结识了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的 C.W. Bishop(毕士博);二人的结识是从对毕氏和先生各自所获新郑遗骨做比较研究开始的。

新郑的发掘在中国近代考古工作中是一次没有成功的纪录。

一九二五年　二十九岁

三月,毕士博来信邀请先生参加弗利尔艺术馆之中国考古活动;先生在请教丁文江后,表示同意,并提出两个条件:(1) 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2) 出土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氏复信同意,于是便开始了此项合作。

四月以后,应聘回母校清华。商定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任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月薪由清华和弗利尔双方付给,合计四百银元)。同时在研究院任专任导师的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学)。

八月,在北京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上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报告。

同年九月,研究院开学,先生正式到校。

《清华学报》第二卷二期上发表了先生的《幽兰》一文。文章从音乐史角度探讨在公元六世纪时中国琴曲采用和声的问题,提出应对唐代以来所传乐曲及乐器做一番剔抉,以发现各时代乐曲所据之乐理何在。

发表了先生对古人类学家 Davidson Black(步达生)两篇文章的中译文:《甘肃史前人种说略》、《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

本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科学》月刊第九卷十一期上,发表了雷宝华对先生的博士论文中一章的译文,译名为《中国人种之构成》。

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筹备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

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明确提出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互相印证的

"二重证据法"。

一九二六年　三十岁

一月初，清华学校教务会议通过议案：今后研究院应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专题研究，不授普通国学，不添聘教授，学生甄取从严，与普通科、专门科完全划分，等等。在研究院教务会议上，对此议案先生与赵元任表示赞成，梁启超反对，王国维未表态（陈寅恪未到校）。

二三月间，先生与袁复礼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一次旅行调查，发现交头河、西阴村等史前遗址和多处历史遗迹；确定要对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行程中在介休作一次居民体质调查。

五至九月，先生患斑疹伤寒。病中从协和医院口授信件给毕士博，商定弗利尔与清华合作事。

五六月间，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商定双方合作、由先生主持进行考古发掘的条件；其主要内容为：(1) 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2) 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3) 发掘报告中英文各写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出版；(4) 所得古物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的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等。

六月五日，由先生牵头，并沈兼士、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步达生、周诒春、颜惠庆、曹云祥、蒋梦麟共十人联名写信致英庚款董事会，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设一所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

七月十四日，与弗利尔订立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v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

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先生与袁复礼再度赴晋，作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遗物六十余箱，大都为新石器时代陶片。另有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半个，这一发现把蚕丝因子开始上推到新石器时代。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作的遗址发掘。

国学研究院创考古学陈列室，并与大学部历史系共组考古学委员会，先生被推为主席；学校拨给该会经费每年六七千元。

吴金鼎入国学研究院，从先生专修人类学和考古学。

先生所著新郑发掘报告英文本 *The bones of Sincheng*（《新郑的骨》）写成。

《清华周刊》上发表先生所作《考古学》演讲的笔记稿。

考古学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访问北京。在北京考古界为其举行的招

待会上(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公布发现中国猿人的成果——北京人的牙齿。此时先生正和袁复礼在西阴村发掘,没有与会。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一岁

给弗利尔艺术馆写 *Digging a Prehistorical Site at Hsi-yin-ts' un*(《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初步报告打字稿四页(稿存弗利尔艺术馆)。

整理西阴村发掘物,并作展览和演讲。

一月十日,在研究院为西阴村发掘归来举行的欢迎会上,有人对半个蚕茧的切割有怀疑。王国维说,“未始没有金属工具”,并引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先生拿出一片石英石说,这可以切。王国维在会上建议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可好?”这一主张可能对后来选掘殷墟有影响。

梁启超在一月十日致书在哈佛念考古学的梁思永,要介绍他参加先生的田野考古工作。

一至三月,梁启超几次写信给“孩子们”,谈介绍梁思永回国跟先生一道搞田野考古,但因时局变化,未表乐观。七月,梁思永由美暂时返国,在国学研究院任梁启超的助教,并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先生从西阴村发掘的出土物。

先生撰写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作为清华学校丛书第三种发表(另英文本交弗利尔艺术馆)。

同年,先生所撰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êng River Valley, Southern Shansi, China* 在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第七十八卷七期上发表。

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并继续修改博士论文的初稿,同时任历史系兼职教授。

七月十八日,与赵元任、陈寅恪、吴宓、唐钺、叶企孙等在天津《大公报》联名发表《清华教授反对高等科学生提前出洋》的宣告。

本年,曾作为北京科学界代表参加了与瑞典斯文赫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几次会谈并草拟合作条件,但未参加该团的考察活动。

十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

年底赴陕西作学术调查(因平汉路有几段受北伐战事影响不能通车)坐海船绕道大连、上海,转汉口,再去西北;途经大连时拜访从上海退隐后的丁文江;丁仍专心致力于地质研究,为先生写去陕介绍信多封。先生经南京时,得到大学院负责人对调查的

支持。

发表对步达生又一论文的中译:《周口店储积中一荷谟形的下臼齿》。

王国维在北京逝世。

一九二八年　三十二岁

一月,先生去陕途中受阻滞留开封,在开封等候梁思永经上海赴汴会合同行,拟改去甘肃作考古调查,未果。

清华国学研究院改组。秋季,先生赴美国与弗利尔艺术馆商谈继续合作事宜,弗利尔艺术馆仍赋予先生全权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六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十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下筹设八组:史学,敦煌材料,文籍校订,汉语,汉字,民间文艺,考古学,人类学。史语所电邀先生回国主持考古组。

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由董作宾主持)于十月开始,是为殷墟发掘第一次(实施组织名称为"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

十至十一月,先生经欧洲、非洲、印度返国,至广州会晤傅斯年所长,正式应聘就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工作,辞去清华教职。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从而移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陈寅恪、赵元任亦于同年应聘到史语所工作。

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作题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的演讲,提倡引进科学考古方法、建立博物馆、保存古物等主张。演讲中批评安特生在甘肃发掘中急于求成而收购陶罐,毁了许多材料;并认为安氏的彩陶西来说不妥。

十二月赴开封会晤董作宾,确定安阳殷墟发掘的下一步安排。

先生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于本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专书,定名为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书的内容共分八章:(1) 问题的提出;(2) 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3) "我群"的演变:规模;(4) "我群"的演变:成分;(5) "我群"的迁徙:中国一千五百年来的人口状况;(6) 南方的"你群";(7) 公元一六四四年以前北方的三次大规模入侵;(8) 现代中国人的形成。

八月,梁思永返美,继续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并根据对先生在西阴村发掘的遗物之研究,完成 *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si-Yin Tsun*, *Shansi*, *China* 专文(于一九三〇年作为硕士论文出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于本年十月创刊。

母涂太夫人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二岁。

一九二九年　三十三岁

领导并参加安阳第二次(三至五月)、第三次(十至十二月)殷墟发掘(小屯),实施组织名称改用“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发掘团”。先生与参加发掘工作同仁约定:一切古物归公,私人不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民族学界的传统。

第三次发掘中的两大收获是:(1) 发现一片仰韶式彩陶(是为小屯发掘前后近十年中唯一的一片);(2) 发现俯身葬的例子。第三次发掘临结束时,出土了大龟四版。

吴金鼎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山东龙山镇进行了六次考古调查。

三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史语所接收北平午门博物馆,改称之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先生任筹备委员(于一九三三年改任筹备处委员长)。

六月,史语所迁入北海静心斋。所务会议议定,将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院聘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一、二、三组主任。

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

第一、第二次殷墟发掘的部分研究结果,于本年十月整理出版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由先生主编)。蔡元培为此写了序言,指出报告集中的成果“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的转方向”。蔡认为这种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 立足点是整体的,对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统性,“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2) 问题的结构,一如自然科学,取实物为证,“不以设定为决论”,而是按实物材料——问题——旁证参考——适当的观点这样一条路线处置,这乃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本期发表了先生写的《发刊语》,《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

给弗利尔艺术馆写 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Notes on Potteries from Hsiao-t'un-ts'un*(《小屯村陶器初论》报告稿)打印件(共五页、插图二十幅),稿存弗利尔艺术馆。

十二月二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梁启超在北平逝世。

一九三〇年　三十四岁

一月,所务会议推举先生为史语所秘书(至本年十二月起改由徐中舒担任)。

同月,中研院正式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聘先生等五人为顾问。

因河南地方势力的干预,史语所安阳发掘工作完全停顿。

五月,先生至南京调查栖霞山六朝墓葬及石器时代遗址。

六月,民国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定于一九三三年施行)。

鉴于弗利尔艺术馆的主要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史语所的工作旨趣有矛盾,弗馆乃有终止长期合作之考虑;先生遂于本年辞去弗馆职务,史语所与该馆的合作于六月终止。

七月起,先生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赠予的考古学讲座,每年报酬六千银元(一说为七千二百银元)。

在燕京大学作关于安阳发掘的学术演讲;演讲中特别提到第三次安阳发掘中发现的俯身葬的例子。

十月,至山东调查历下及齐都遗迹,确定发掘龙山遗址。先生被任命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工作主任。十一月开始,先生领导并参加发掘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大批黑陶及贞卜兽骨出土,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先生认为此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历史期间的重要桥梁。

本年主编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发表了先生所写《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小屯与仰韶》、《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等论文。在《小屯与仰韶》一文中,确立了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

夏,梁思永由美返国,应先生邀参加考古组工作;九至十一月梁去齐齐哈尔及热河作调查发掘。

郭沫若流亡日本,听到大龟四版消息,于本年写信给史语所要求赠给拓片一份。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均表示同意。郭获拓片后,立即将其编入自己的《卜辞通纂》一书发表。

先生给弗利尔艺术馆写 *Report on* 1928 - 1929 *Excavation at Yin-Hsu*(《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殷墟发掘报告》)打印件(共一三〇页,照片及图版三十幅),稿存弗利尔艺术馆。

一九三一年　三十五岁

一月,在青岛主持展览山东遗址出土器物三天。

与董作宾同赴南京,举办小屯遗址和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二月二十至二十四日);先生在南京作《由发掘所得关于中国上古史之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展览及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

同月十九日,先生在中央电台作《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年来之考古工作》的演讲。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从今年起拨给史语所田野考古经费每年一万银元。

考古组与河南省政府协议合作继续进行殷墟发掘,实施组织名称改为“殷墟发掘团”(以后各次发掘沿用此名)。

三至五月,领导并参加第四次殷墟发掘(小屯);此次发掘地带广,用工多,收获大。梁思永、尹达均从本次开始参加安阳发掘。

六月,北平市府把北海蚕坛拨给史语所使用,史语所将考古组移此。

十月,对山东城子崖作第二次发掘。

十一至十二月,发掘团组织了第五次殷墟发掘,在后冈发现小屯、龙山、仰韶三期的清晰叠压堆积,并发现后两者遗物多与小屯相似,从而确定三者的次序及其密切关系。

本年考古组还组织了对河北磁县陶瓷业的调查,对河南汲县、浚县、洹滨、偃师以及胶东的考古调查。

主编出版《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本期发表先生撰写的《俯身葬》一文。文章谈到,从当时的资讯信息所知,世界其他地区尚无俯身葬的发现。文章研究的结论是:俯身葬为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习惯,与殷墟文化相距不远;此种葬法从殷都由此迁移后仍继续一段时间,但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前已改为仰身葬;可以认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

本年撰写并发表了《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一文及为陈衡哲主编的英文版“SymposiumonChineseCulture”(“中国文化论丛”)写的*Archaeology*(《考古学》)一文。

三月二日写信给毕士博,就双方在安阳发掘时期的合作中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和误会作了详细说明,驳斥了对方的不实之词,并应允在年内送去最后一份英文报告。

给弗利尔艺术馆写 Manuscipt Report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of the Yin-Shang Site at Hsiao-t' un-ts' un*, *Anyang*, *Honan*(《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存性质的初步考察》报告稿)打印件(共十一页,附刘屿霞所摄地图一幅及计划,另照片一幅、插图七幅),稿存弗利尔艺术馆。

九月,日军发动沈阳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一九三二年　三十六岁

二月,与董作宾同去开封,组织河南古迹研究会,由先生任工作主任。会后至洛阳

调查伊阙造像、北邙冢墓、金墉故城及太学遗址等。

四至五月，领导并参加第六次安阳发掘（小屯、王裕口、霍家小庄），并视察辛村、大赉店的发掘工作。十月以后视察辛村第二次发掘及小屯第七次（殷墟第七次）发掘。

本年考古组还组织了淇滨、内黄以及豫北、鲁南的几次考古调查；组织了高井台子、四面碑等地的发掘。

上年和本年，先生在北平北海蚕坛设讲座，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作《考古人类学导论》的讲课，并聘请其他专家作专题报告。

十二月，受时局影响史语所准备南迁上海。

先生到上海洽办搬迁事宜时，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表示同情，接受同盟提出的在北平筹建分会的委托。

为傅斯年、蒋廷黻、徐中舒等编写的《东北史纲》写了一个英文节略，提交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内容主要说明东北三省在历史上即为中国领土。

一九三三年　三十七岁

一月，与杨杏佛联袂赴北平；中旬，与胡适、蒋梦麟等着手筹建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三十日分会成立，共发展四十余名会员。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被执委会推选为副主席及出席全国委员会之代表。先生于二月中旬迁沪，分会主席胡适于三月三日被开除出盟，分会即停止活动。

春，史语所由北平迁上海小万柳堂。

三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称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聘傅斯年为所长、李济为副所长；在由民国政府核批前，仍用旧称，傅、李二人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兼任所长、副所长。

“自本年春季起，（安阳小屯的）洹河两岸的区长，便是盗窃古物的领袖人物、古董商人，出了六七千元的‘捐款’给所谓的‘古物保存委员会’，他们就可以坐地分赃、公然买卖……”（见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

四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先生受聘为人文馆筹备主任。

四至五月，视察刘庄发掘、辛村（第三次）发掘。

十一月，视察第八次殷墟发掘（小屯、后冈），辛村第四次发掘，以及安上村、曹王墓的发掘。本年，考古组还组织了董福营、淇滨、鲁东、豫西、临淄、滕县、南阳、汲县、豫北等多处考古调查。

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并为改刊而写了《编后记》。

撰写并发表《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六次殷墟发掘成果作一总结;先生对殷墟文化作如下判断:(1) 殷墟文化层为一长期堆积;(2) 殷墟文化是多元的;(3) 殷墟文化是进步的,器物的形制总是不断变化的。

为《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撰《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就截至第四次发掘为止发现的(1) 矢镞、(2) 句兵、(3) 矛、(4) 刀与剑、(5) 斧与锛五种作为用器和武器用的铜器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青铜业至殷已鼎盛,原料丰富,大约来自南方;殷文化中不少来自南方的成分可为佐证。

(2) 形制来源较复杂,如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发明。

(3) 殷商时中西关系正如仰韶时代:中国接受西方一部分文化,但加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4) 殷商前、仰韶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相当于欧洲青铜器早、中期和中国夏及商前期的青铜文化,尚待发现。

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遇刺身亡。

一九三四年　三十八岁

四月,原社科所与史语所合并之议撤销,傅斯年、李济辞去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副所长职务。原该所的民族学组并入史语所,改称第四组(人类学组)。八月,中研院聘先生兼第四组主任;十二月先生辞去此兼职,由吴定良接任。第四组任务是研究考古组发掘积累的商代人骨。

四月十一日戴季陶通电各方,要求政府严禁一切地下发掘活动;先生于四月十六日致信丁文江,对戴季陶制造舆论反对科学考古事作严正批评,请丁设法唤起北方之舆论作一公开讨论。

在上海中研院总办事处作《河南考古之最近发现》的演讲。

五月二十八日,所务会议建议将中研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七月,先生继傅斯年任中博筹备处主任。

夏,与丁文江、许文生(Paul Stevenson)同时当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

六月,丁文江继杨杏佛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先生被任命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

五月,视察第九次殷墟发掘(侯家庄南地)。四至五月,发掘团还组织了南霸台、塌

坡、马峪沟、赵沟、陈沟等处的考古发掘。十至十二月,组织了同乐寨和青苔的发掘。

本年,考古组组织了鲁东、洹滨、豫西、新郑、广武以及洹水上游和寿县的考古调查。

冬初,先生视察侯家庄西北冈第一次发掘(殷墟第十次发掘)。此次发掘获得精美铜器和石器多件。先生与梁思永都确认侯家庄为帝后陵寝,而小屯则为殷都遗址。

十月,史语所由上海迁南京北极阁鸡鸣寺路一号新址。

先生用英文发表的 *Summary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当代中国考古工作概述》)刊出在《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文件集》第四卷。

为《东方杂志》撰写《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揭明三点主张:(1) 一切古物应归国有,不得私藏;(2) 设立国家博物馆,奖励以科学方法发掘整理历史遗存;(3) 在大学设立考古学系,以训练专门考古人才。

主编之《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出版,并为之作序。先生在这部中国现代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集中明确阐述了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

一九三五年 三十九岁

二月八日,河南古迹研究会三周年纪念日,在开封第二次展览河南出土文物。

先生以安阳发掘主持人身份,将梁思永提出的为进一步发掘侯家庄西北冈遗址所需的数目达两万银元以上的预算(比早期预算多五至十倍),提交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丁未附任何条件即予批准,动用了他有权支配的中央博物院的研究经费。

三月十六日行政院公布《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及《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公布后当即将全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发给第十一次殷墟发掘领队梁思永。

先生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侯家庄西北冈)。此次发掘共计九十五天(三月十日至六月十五日),所获极多,共发掘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磬、铜盔、戈、矛等,石、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夏鼐作为清华的毕业实习生参加了此次发掘。

六月二十日,由全国各国立研究院院长、大学校长选举全国最高学术领导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聘任评议员三十人,先生当选。当然评议员十一人(中研院院长及各所所长),加上聘任评议员,于九月七日组成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受聘为中央博物院第一届事理。

九月五日,发掘团组织第十二次安阳发掘,进行一百零一天,用工五百名,为历次

安阳发掘中规模最大者。共发掘大墓五座、假大墓一座、小墓七百八十五座,发掘收获极多。

第十二次发掘除侯家庄西北冈,还包括山彪镇(八至九月)及大司空村(十至十二月)两处。

同年十至十一月,发掘团还组织了范家庄和琉璃阁的两次考古发掘。

本年考古组还组织了汤阴、豫北、禹州、汲县、偃师和苏州的数次考察。

十一月,安阳出土铜器与其他文物运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

一九三六年 四十岁

春,视察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本次发掘中发现第一二七坑的整坑甲骨,包括三百余块整版,为历次发掘所仅见;先生亲自筹划并到现场指导将坑内三百余整版、两万余碎块甲骨整个连土装箱启运回京;后被称为"甲骨灰土柱的室内发掘"。

蔡元培主持中央博物院院址奠基式。

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拟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

先生应邀赴四川讲学。

本年度发掘团还组织了大司空村第二次及小屯第十一次(即殷墟第十四次)发掘(九至十二月)。此外,还在五至七月间组织了瓦屋村和大孤堆的发掘。

考古组还多次组织对南京、彭城、豫东、豫西、登封及安阳龙岩寺进行考古调查。

本年度,《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出版,刊有先生所撰《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文中指出:"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

撰写《怀丁在君》一文,追念在本年去世的丁文江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之功绩。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一岁

元月,先生应英国大学联合会之邀抵英讲学;先后在威尔士、伦敦、牛津、剑桥、里兹、利物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地高等学府作了十四次学术演讲。

继应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邀请去瑞典讲学。

在德国各地参观了多座博物馆。

二月,第二次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侯家庄西北冈及小屯出土器物参加展出。

三至六月，发掘团进行殷墟第十五次（即小屯第十二次）发掘。同一时期，另进行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的考古发掘。收工后仅十八天，即爆发卢沟桥事变。

四月，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ICSU）大会。六月返国。

受傅斯年所长委托，先生负责主持史语所向西南搬迁事宜。

七至八月，史语所迁抵长沙，分驻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

本年，考古组成员进行了洹水下游、西湖、登封、西康、北平、大同、包头、五原、归绥、长沙等地的考古调查。

十二月，因战事吃紧，史语所拟迁昆明。在此之前，考古组部分青年研究人员在长沙陆续离所，投笔从戎。

一九三八年　四十二岁

史语所于撤往昆明途中，取道桂林，暂住月余，在阳朔设工作站。

由于傅斯年代理研究院总干事，先生奉命代理所长。

二至三月间，史语所由桂林经安南之谅山、河内，迁抵昆明。所址设靛花巷及拓东路。

本年末组织考古发掘活动。

组织考古组成员进行了宝鸡、昆明、大理、苍山等地的考古调查。

中央博物院部分精品迁至重庆后转至乐山保存。

九月，吴金鼎、曾昭燏等由英返国，抵达昆明，参加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

九月，因日机轰炸昆明，史语所又由昆明市内迁往西北郊的龙泉镇，驻响应寺、龙头书坞、棕皮营等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工作人员和标本）及中国营造学社亦同迁。

一九三九年　四十三岁

本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办公机构迁往昆明龙泉镇竹荫村。

一至十二月，派吴金鼎在大理附近作考古调查。

三至七月，先生组织考古组与中博合作，对云南马龙峰进行考古发掘；九月开始至次年一月，由中博对清碧、佛顶峰、中和寺、龙泉峰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在中和山麓南诏遗址获有字瓦片一百余块，内有书“大罗全四年”字样者一片，成为研证南诏史

之重要资料。

在龙泉镇中博之工作地点设立简单实验室,先生亲手做殷墟出土各类陶片的比重实验。

本年先生被推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

五月,考古组赞助行政院参加苏联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因路途过远,先生决定只选送部分安阳出土器物及部分图片图表。苏联考古家基塞廖夫获见此批珍品后,据以推断其本人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之卡拉苏克文化之年代。

六月十日,先生在云南民族学会作题为《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的学术演讲。演讲中谈到不同文化养成的学者在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时遇到的困难,进而谈到运用比较法的局限性。再次提出要学会运用另一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思考的问题。讲稿于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国立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〇年　四十四岁

继续作殷墟出土陶片和陶器的研究。

一至六月,前后两次派中博吴金鼎、曾照燏赴大理、贵州至西部点苍山麓考察多处史前遗址及数处南诏遗址。

三月,先生当选为中研院第二届聘任评议员。

三至四月,中博组织对白云甲址进行考古发掘。

四月,史语所派李光宇赴长沙将存长文物运送重庆;回程经桂林,又将存桂文物运送昆明。

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陆续刊登谢华、叶蠖生、尹达等人根据殷墟发掘材料及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见》、《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等文章内容所写的讨论殷商社会性质的几篇论辩文章,得出殷商时代为奴隶社会和殷商时代为以氏族社会为主导形态的社会的两种不同结论。

本年一月,先生当选为英国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名誉院士。*

在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室及化学研究所同仁协助下,写成《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

---

* 关于当选年份,有说为1939年,有说为1938年。1940年之说系根据该学会会长乔·本梭尔1983年致笔者的来函,应是可信的。——编撰者

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九月由朱家骅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十月,由傅斯年继任总干事。

秋至冬季,史语所、中博筹备处由昆明经贵州迁至四川宜宾附近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驻地为板栗坳,中博驻地为月亮田。

本年十月自昆明迁运四川途中,卡车一辆倾覆,一辆落水,但损坏不重。十一月在宜宾转驳李庄之文物一百四十箱,因驳船超载失衡倾覆,箱内进水,损失不太大。

一九四一年　四十五岁

继续进行小屯遗址陶器研究,以及小屯一带殷商建筑遗址及古器物的研究。

一至四月,史语所与中博合作组织对宜宾、南溪、新津、彭山、成都、郫县一带的考古调查;九月又合作进行西康理番的考古学及人类学调查。

四月,先生受聘为中央博物院第二届理事。

七至十一月、又十一月至次年三月,由先生负责组织史语所、中博、营造学社三家合作的彭山发掘,在豆芽房、砦子山等地共掘获崖墓六十座,有重要石刻及特殊雕刻之发现。

十二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之文物,悉告损失。

一九四二年　四十六岁

继续上年之研究工作。

三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留存的部分文物悉告损失。

四至十一月,史语所与中博、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赴西北敦煌附近、黑水流域及甘州附近进行考古调查。

八至十月,西北史地考察团在阳关葬地、古董滩、察克图燧峰等地进行考古发掘。

三至十二月,继续组织彭山发掘,附完成砦子山墓地发掘外,又进行李家沟、牧马山等地墓地之发掘。

十一月,殷墟出土各期之甲骨文字图片送重庆参加教育部组织的第三次全国美展。

中博院筹备处由月亮田迁李庄镇张家祠。

先生参与主编之《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博专刊乙种之一出版。

一九四三年　四十七岁

研究并撰写有关小屯地下先殷文化层的问题。

一月,由先生负责组织中博、史语所以及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的琴台整理工作团,自三月至九月对成都西郊琴台进行考古发掘。收获有玉台、胡床,带文字的玉玺、玉册、银罐与玉带,壁画与浮雕及立体雕等极珍贵之文物,全部出土物悉数点交给四川博物馆。

二至三月,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泾河流域经彬县、乾陵、醴泉、咸阳至西安、洛阳进行考古调查。

二至六月,同上团在老虎煞、丰镐村及歧阳堡等地进行考古发掘。

四至八月,同上团在西安、耀县、斗门、户县、武功、宝鸡、临潼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经先生推荐,夏鼐转任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

十月,中博在李庄举办史前石器和周代铜器展览;同一展览于十一月在重庆又一次举办。先生为这一展览专门写了一篇《远古石器浅说》的文章,文章从进化论的角度,深入浅出地介绍人类如何开始使用工具,及石器演进的过程。指出只要认真把科学方法运用到史学上来,中国完全有可能写出四十万至五十万年(从"北京人"或更早直至清末民初)的历史。

在重庆与傅斯年、罗香林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

本年四月,日本须山卓把先生的博士论文译成日文《支那民族の形成》出版。

一九四四年　四十八岁

写《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一文,在中研院《学术汇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

四月,第四组研究工作之体质人类学部分由史语所划出,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任主任。第四组改由凌纯声任主任。

先生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博物馆与科学教育》。

五月,中研院、中博、北大、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之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对老爷庙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八月,该团调查月牙泉墓地,十月在月牙泉发掘;同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枚。

八月,先生为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作序。序中指出:"无论在记录科学或实

验科学中……最应该宝贵的是继续发现新的事实:材料的新,概念的新,方法的新,解释的新,都值得表扬。只有如此,方能使一门学问继续进步。”

湖北省参议会推选先生为湖北省参议员,被先生谢绝。

一九四五年　四十九岁

撰写《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一文并于本年出版。

一至二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调查,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五月该团在洮沙阳洼湾墓地发掘,获两块红底黑彩陶片,由此证明齐家期晚于仰韶期而修正安特生氏学说。六月在沙井进行考古调查。十一月在武威进行调查并发掘古墓。

八月十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先生于当日召集中博全体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谈到:“日本投降……昭告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

九月,史语所派石璋如随研究院第二批人员还南京,筹备史语所返都事。

十一月,先生赴重庆筹划中博筹备处复员工作。

由于战时条件限制及印刷技术的要求,由董作宾亲手书写的甲骨文巨著《殷历谱》,以石印法印刷于本年问世。

一九四六年　五十岁

春,先生返南京。旋以专家身份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任顾问,赴日本各地调查并接收日军方及各方战时自我国劫夺之文物,获重要成绩。五月初返国。

五月二十四日先生致裴文中的信中,提到“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东京帝大所存的周口店石器与骨器都已交还。此信表明先生对“北京人”和周口店遗址不仅有极大学术兴趣,且还有一段工作因缘。

自日本归国后,先生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工作报告,详述在日参观调查之内容*。

史语所及中博筹备处由李庄经重庆返回南京。梁思永因患肺结核返北平疗养。

夏季,在史语所所址会见郭沫若。郭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称颂身着破旧衣衫

---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徐森玉先生遗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书的部分残稿(抄件复写本);该稿业经整理发表于《学术集林》卷四(1995年上海出版)。——编撰者

待客的李济代表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郭氏由于李济在学术上对他的坦诚相待而颇受感动。

物价飞涨,先生底薪增至每月六百八十元。

十月,考古组派员赴古荡、良渚、笋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一岁

先生编制殷墟陶器目录的工作在本年完成。

主编之《中国考古学报》(即原《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出版。先生在前言中谈到这个“名称再改一次”的缘由:从《安阳发掘报告》改为《田野考古报告》是反映田野工作的扩大、兴旺;后《田野考古报告》改为现名,则反映近期内田野工作无法恢复,只能做些室内工作。

协助曾昭燏修订之《博物馆》一书于上海出版。

吴定良辞去中研院职务去浙大时,断然拒绝《中国考古报告集》主编李济发表其对殷墟人骨的十三年研究成果,材料亦不交出。

本年,先生辞去担任十四年之久的中博筹备处主任的工作,以集中精力整理殷墟发掘报告及筹划其出版。

十月,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名单评审组人文小组的工作,小组最终审定了一个五十五名候选人的名单。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七年由延安和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四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第一编(范文澜主编)中,大段摘引了先生在《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关于殷墟出土大量铜器(特别是矢镞)证明铸铜业当时已处于全盛时代的科学论点。据此,该书也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延安《中国文化》的讨论(见本文“一九四〇年”条)相似,作出了殷商“当然可以建立奴隶占有制度的国家”的结论。

本年,史语所和中博都未进行田野工作。

父李权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一九四八年　五十二岁

进行殷墟陶器之缀合工作。

本年,先生撰写了《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及中篇(并发表了上篇)。在这两篇

文字中,先生对分类问题都专门作了说明。如在“上篇”中解释了为什么对青铜容器要比照陶器分类法加以分类,首先是按最下部形态区分为:圜底器、平底器、圈足器、三足器、四足器五大类,然后再从各类中细分为各种“形”的器,如卣形器、鼎形器、斝形器等,认为这是超乎质料的容器分类法。在中篇中针对梅原末治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用“利器”和“武器”的笼统分类,提出了使用“锋刃器”这一较为科学的名称,其下再类分为:尖器、端刃器、边刃器、双刃器(下又分句兵、刺兵、长兵)。这种分类法对古器物学分类是一大突破。

三月,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鉴定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出土的一对兽角的标本,认为它属于一个扭角羚亚种的半化石标本。杨氏建议将其命名为“李济氏扭角羚”*,以“对李博士在划时代的安阳发掘上的功绩表示崇敬”。

四月,在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先生膺选中研院首届院士(共选出八十一名首届院士,其中文科组二十八名,包括考古专业四名: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九月,出席第一次院士会议,当选为中研院第三届聘任评议员。

十月上旬,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之邀,与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以《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为题在武昌和汉口作了演讲。

十月下旬致函苏秉琦,对苏氏所撰《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文作了颇高的评价。

十二月,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中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千余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徐森玉和先生被推请负责督运。

傅斯年受任台湾大学校长。

本年度史语所没有进行田野工作。

主编之《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出版。第四册稿存上海商务印书馆,次年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出版,编辑者署名为留在北京的梁思永、夏鼐,先生的主编名字被删去,内容似无改动。

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编图版》一巨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编图版上辑》一巨册出版。

撰写并发表了《殷墟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一文。

吴金鼎在济南病逝。

一九四九年　五十三岁

研究并整理豫北各遗址出土之句兵。

* 这一命名后来得到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编撰者

史语所所址暂租台湾铁路局杨梅车站仓库及附近民房。人员暂借台北台大医学院部分房屋安置。

二月,先生兼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二月,领导并参加史语所在台北圆山贝冢的考古调查。

五至六月,领导并参加史语所(与林氏学田合作)在大马璘、营浦等地的考古调查。

七月下旬,率台大历史系及史语所同仁共十人(由台大陈绍馨教授为团长)前往台中瑞岩对泰雅人进行一次体质人类学的统计调查(计调查二百一十六人)。

八月,先生创办并主持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

十一至十二月,组织史语所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合作(经费由林氏学田协助)对大马璘台地之考古发掘,获石棺五处,灰土坑八处,陶质、石质标本数千片。

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编图版中辑》一巨册出版。

一九五〇年　五十四岁

整理并研究殷墟出土之有刃石器。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招收本系的第一届新生。先生担任讲授大一新生的必修基础课程——考古人类学导论。

受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第一届理事。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本年第一期发表了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中研院作的演讲《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原有的古器物学经过八百年惨淡经营还只是因仍旧惯、没有展开新局面的原因,在于不注意原始材料审订的工作及材料取得的手续。文章提到第三次小屯发掘时在有字甲骨层内发现唯一的一块仰韶式彩陶片,使中国有文字记录的最早一段历史得以有希望与中国史前文化"合龙"。文章还列举了历年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器物、残片、人骨兽骨、原料状态的金属和其他矿质,以及痕迹、现象等,都是古器物学的研究对象,明显地扩大、改变了旧的古器物学的领域。

撰写《中国民族之始》一文,对中国民族的人种问题作了通俗的介绍。

郭沫若写《蜥蜴的残梦》一文,对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提出了批评和指责,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本年先生还撰写了《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一文;另外发表了上年度所作瑞

岩民族学调查的初步报告的体质部分。

本年还翻译了昂利·步日耶(Henri Breuil)的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一书的节译本《猎熊》,并写了一篇介绍此书的专文《历史圈外: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本年末组织田野工作。

傅斯年所长兼校长在台北病逝。

一九五一年　五十五岁

从一九五〇年底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先生写了两篇纪念傅斯年的文字,历数傅氏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功劳,极为推崇傅氏对建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所起的重要作用。

继续整理和研究殷墟出土之有刃石器。撰写《殷墟有刃石器图说》。

一月,受聘任清点"中央"博物院及故宫博物院存台文物委员会委员。

七月,"中央研究院"聘董作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十月,史语所与台大合作,组织对江头等遗址的考古调查。

为加强对大学生体质的调查并积累关于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身体测量数据,同时也给考古人类学系的同学增加亲手实践的机会,经台大校方同意,由先生组织对本年度入学新生的体质调查;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他在台大的学生宋文薰、唐美君、张光直、李亦园等。调查结果公布于台大校刊一五五期,先生写了一个引言。

为加强对人类学的基础建设,先生于年内先后又写成并发表了《从人类学看文化》、《中国史前文化》等导论性的文章,以简练的笔法论述了人类学问题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前一篇是一次学术演讲的讲稿);另外,在本年度还把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克罗泊(A. L. Kroeber)写的 *Anthropology* 一文译成中文(《人类学》)发表。

一九五二年　五十六岁

先生所撰《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初次发表(原文于一九四〇年写成)。文中根据化学分析结论证明:(1) 殷墟白陶原料的质地与现代江西瓷品原料的质地几乎完全相等;(2) 殷墟硬陶、釉陶(世界最早的陶器上釉例子)实质的化学成分,不但与汉代带釉陶器的内体相近,且与清代瓷器内体亦无大差别。

八月,为石璋如《考古年表》作序,强调资料“品质”的重要性以及科学事业通过一代代人接力的延续性。

先生所撰《殷墟有刃石器图说》在本年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小屯的殷商时代青铜的大量应用,以及大多数石器类型属于“蜕存”性质,故称殷商文化为金石并用时代不妥。

为《大陆杂志》撰写了《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上、下篇。这是一份“北京人”发现史的通俗介绍,对周口店发掘的缜密的科学性表示极大的推崇。

连任清点“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存台文物委员会委员。

七月,当选为“中央”、“故宫”两院共同理事会第二届常务委员。

“中央研究院”拟在台北南港镇旧庄为史语所建筑文物仓库及办公大楼。

本年,先生撰写了一篇题为《赴日小记》的三千余字的随笔性文章,为了解一九四六年去日本的调查经过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

本年,还发表了先生所写《关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之创设》一文。

一九五三年　五十七岁

整理并研究小屯出土之陶器。

为《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在台大《文史哲学报》发表,先生写了一篇后记,指出中国史学家两千年来上了秦始皇的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阐述了要到满洲、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寻找中国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根的思想,提出了“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的口号。

五月,开始出版由先生任主编的台大《考古人类学刊》,并刊出所写的《发刊词》。

八月,为方子卫主编的《科学方法与精神》文集写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先生有鉴于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以及一般人感兴趣的是应用科学,而对更重要的科学思想本身却不重视,在文章中特作了如下的分析:

(1) 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

(2) 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

* 该文手稿于1995年在先生留台遗物中发现,先生生前似未发表过。——编撰者

(3)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是工具;

(4) 今后科学教育应提倡:A. 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B. 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C. 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

本年一月史语所组织发掘桃园尖山遗址,四月进行台湾环岛考古调查及台中水尾溪、铁砧山、狗蹄山等处遗址的发掘。十一月,史语所与台大合作进行台北圆山贝冢的发掘。

十一月,先生率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八次太平洋科学协会(PSA)会议,在会上作题为 *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的演讲。同时参加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宣读了 *Diverse Backgrounds of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Yin Dynasty*(《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和 *Studies of Hsiao t' un Pottery: Yin and Pre-Yin*(《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两篇文章,会后并被选为该会议的常任理事。

先生在会后发表《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性质与成就》一文。

本年还发表了一篇对殷墟石刻的研究文章——《跪坐蹲居与箕踞》,先生根据典籍记载和实物对这几种习惯作了认真的考订,认为跪坐是商代统治阶级的起居法和祭祀、待客的礼,周人后来加以发扬,成为"礼"的系统,奠定中国"礼教"文化的基础。

著文评介 Martin Smith: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ranspacific Contacts*(马丁·史密斯:《亚洲和北美的跨太平洋接触》)文集。

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编·图版下辑》一巨册出版。

本年连任台湾"中博"、"故宫"两院清点委员。

一九五四年　五十八岁

继续整理及研究小屯出土之陶器。

台湾中国民族学会恢复成立,先生于一月十七日任成立大会主席。

一月,撰写《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文章列举许多事实说明一些英美学者主张中国早期文化若非来自西方定系来自北方之说是不可靠的,认为"中国文化之常常接受外国文化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能接受才能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文化的内容全是外来的,则它在世界文化史上却也不能占一

个重要的地位”。文章最后举出骨卜、丝蚕和殷代装饰艺术这三种作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艺术生活的代表,“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体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

负责制定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与台北文献委员会合作发掘圆山贝冢计划,并于三至四月间进行此项发掘(第二次)。

四月,撰写《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一文。文中指出:“新石器早、中期活跃于长城以外的人群,可能就是新石器晚期活跃于华北民族的先祖,可能杂有东北及西北来的新成分,与原在内蒙古者合而南移。”文章认为,“许多大发明家、科学家、哲学家的成绩都非自己独创的,而是全人类智慧文化的累积。因之,我们不必强调某一文化的创造者,而要更多注意某一文化、某一发明对全人类的贡献。”

九月二十二日先生致信张光直。信中谈到:“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

本年还出版了先生上年在PSA会议上作的报告 *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文中指明,在与华北先史时代以及金石并用期的人的头骨相比,殷人的短头成分明显增长,但在种族构成上并无根本性改变。侯家庄出土的颅骨几乎普遍带有蒙古人种的独特特征(铲形门齿)。在全文总结中指出:“中国是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任何变化都是大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这样来观察……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进展。”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太平洋科学会议》(一次座谈会上的约定讲话)、《台湾大学现行招生办法之商榷》、《如何办科学馆》、*Notes on Some Metrical Characters of Calvaria of th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ang, Anyang*(《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以及对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ed. by Arthur F. Wright(阿瑟·赖特著《中国思想研究》)一书的评介。

十月,任台湾“中博”、“故宫”两院共同理事会第三届理事(其后又连任数届)。

南港新所址落成,史语所由杨梅迁南港。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先生应邀于十月十九日赴美,在母校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哈佛燕京社作演讲;十二月赴墨西哥讲学。

四月,梁思永在北京病逝。

五月,早年业师虎藤教授在哈佛大学病逝。

一九五五年　五十九岁

一月，先生在墨西哥大学讲学完毕后，前往瓦哈卡城考察古迹。

二三月间，应邀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市）讲学，后将三次演讲汇集成书，名为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的开始》）。M. Rogers（米·罗杰斯）教授为本书作序言时，称先生领导安阳发掘之工作堪与 H. Schliemann（亨·谢里曼）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罗氏认为这三次演讲对向西方学术界择要介绍先生一生致力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成熟见解十分重要。

六月，先生经旧金山回台。

继续整理及研究小屯出土之陶器。

北京《考古通讯》第二期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要求“清理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章说：“我国考古学界过去和现在都拘限在枝枝节节的繁琐研究的圈子里……这种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显然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该刊第三期上发表《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作者以“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名义，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几个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

八月，在董作宾赴香港教书而未明确辞职的情况下，先生受研究院之命出任史语所所长，同时兼任史语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主任。

秋季，在希腊寻访六天，参观了雅典神庙，凭吊附近古迹，观赏了马拉松英雄石像等克里特岛这一爱琴文化中心（见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中央”日报》）。

九月，经先生推荐，张光直考取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赴美游学。

本年还出版了先生前年在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上宣读的两篇论文（名称见前）。二文扼要地介绍了先生本人近年来对殷代装饰艺术的研究和关于小屯陶器研究的概论。

撰文评介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主编出版了《“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二辑（上、下册）。

一九五六年　六十岁

由先生任总编辑并亲自撰写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墟器物甲

编·陶器上辑》一巨册出版。全书分序言及(1) 殷墟陶器导论;(2) 陶器质料之初步鉴定;(3) 序数的编制及图录说明;(4) 颜色与形制;(5) 制造痕迹;(6) 文饰;(7) 符号与文字。共七章十二万字另图版六十三版。序言中对殷墟近二十五万片陶片及一千五百余件可复原的陶器从出土到保管、分类、编号及进行各种研究的全部过程作了一个总的回顾。

张光直对上书写了评论,除列举各种特点外并举出了两个缺点:一是各章内陶器分群的标准不统一,张认为最好是以灰、红、黑、白、硬五种的区分作为标准;二是认为作者"过于科学",限制了"想象"的活动能力,忽略了对"功能"的专题讨论。先生在次年就此作了答复,除对许多意见表示同意外,强调了应在弄清器物结构之后再谈其功能;另外对张的"过于科学"一词提出异议。

本年为先生六十寿诞。劳榦为此写了《对于李济先生的简单叙述》的祝贺专文。文中称誉先生青年时期所写的博士论文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获文科学术奖金。

九至十月,先生撰写并发表《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一文,指出中国文化的若干最重要成分开始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之际,包括:

(1) 农业的基础开始于新石器时代;

(2) 家畜的豢养于新石器时代很普遍;

(3) 村落组织在新石器时代得到发展;

(4) 纺织业已存在于新石器时代,当时并开始养蚕桑;

(5) 陶器业已在新石器时代有辉煌成就;

(6) 骨卜最早存在于大部分黑陶文化遗址中;

(7) 版筑式建筑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痕迹;

(8) 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小屯一面不是最早的;

(9) 文字和青铜一样,在小屯已成熟;

(10) 车战继青铜而来;

(11) 城市宫殿建筑,同前;

(12) 人殉,同前;

(13) 龟卜由骨卜进展而来;

(14) 石雕与骨雕代表太平洋沿岸艺术最早作品。

上述十四种成分中,

甲. 可以明白言定属于中国本土的为:(1) 骨卜和龟卜;(2) 稻黍及水牛;(3) 蚕桑;(4) 青铜业中的大部分礼器与若干武器。

乙. 显然外来或受外来影响的为:(1) 铸铜业;(2) 车战;(3) 人殉;(4) 小麦。

丙. 尚难断定来源的为:(1) 水牛以外若干家畜的豢养;(2) 版筑营造方法;(3) 文字的开始;(4) 陶业的开始;(5) 埋葬风俗;(6) 村落组织。

文章指出,“中国民族性特点之一,为能吸收其他区域文化之优点”。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作起》,《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人之初——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y Max Loehr(《评介麦·罗越〈中国青铜时代的武器:中国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宁史氏收集品〉》)。

本年主编出版的还有:《“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一岁

整理并研究殷墟出土之笄形器物。

成立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接受哈佛燕京基金资助),先生受聘为主任委员。台大及“中研院”学人以后十余年里在研究经费上受惠于此会者颇多。

朱家骅于十月辞去任职十八年的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评议会票选胡适、李济、李书华为第三任院长候补人。胡于十一月被圈定为院长。

胡适初以健康为由力辞,推荐先生继任。后经恳劝应允在恢复健康后就任。有关当局乃于十二月任先生暂行代理院长。

本年先生赴联邦德国参加第二十四届东方学家会议及第十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

先生所著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书在华盛顿大学出版,沈刚伯著文加以评介。沈认为该书初步回答了近代史学家关注的两大问题,即中华民族的来源及形成和中国文明之本质及缔造。沈文认为,作者的见解是,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已是中国土著;吸收仰韶文化而加以发扬的殷商文明,其要点都在中国本土孕育而成;但此民族在史前已非纯一的,青铜文化尤受不少外来影响。

沈文归纳了作者在书中提到或暗示的许多披杂有趣之问题如下:

(1) 彩陶文化同西方的关系;

(2) 黑陶文化同海洋的渊源;

(3) 青铜文化和象形文字究竟起于何时,创自何地?

(4)《大荒北经》所说“毛民”若真系山顶洞中老人苗裔,是否在商周间仍占重要地

位? 今日北海道之虾夷是否其子孙?

(5) 水牛在商代大规模用于耕田而绝不作牺牲,可见非其祖先豢养之物,是否来自东南亚? 怎样传来?

(6) 殷墟之锡是航海而入还是梯山而来? 用何物换来?

(7) 位于西的仰韶文化无马,而位于东的龙山文化却有,马种究从何地、经何路线输入?

(8) 太史公所说匈奴为夏后氏苗裔,而夏属仰韶时期可信的话,则彩陶文化是否夏人在直接观摩过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后创作出来的?

(9) 春秋时蹲踞的东夷如是龙山文化承继人,而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人之话确有所本,则舜时是否龙山文化高度发展时期? 果如此,何以龙山文化似反较仰韶文化稍晚?

沈刚伯认为以上问题为本书最富暗示、启发之处,无异为下一代治史者指示途径。

先生为纪念早年业师虎藤教授并阐述鉴定"原始资料"的原则,撰写了《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提出供新史学家参考的几点境界观:

(1) 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史料,是为第一境界;

(2) 废墟中固有黄金,但拣取工作很艰难,应该亲自动手。因此新史学家的第二境界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3) 新史学家的第三境界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

(4) 用作证据的资料之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为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故第四个境界可叫作"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本年撰写并发表的文章还有:《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Pottery and Bronze of the Yin-Shang Period*(《殷商时代的陶器与铜器》);*Hunting Records, Faunistic Remain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安阳遗址出土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纹样》)。

主编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下册),第二十九本(上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上辑(一)》一巨册。

一九五八年　六十二岁

继续整理并研究殷墟出土的笄形器物。

受聘为"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

一月一日起先生正式代理“中研院”院务,接任视事。同月聘全汉升代理总干事。至四月十日胡适到院,乃卸去代理院务事。

四月,新建考古馆落成,正式启用。

六月,胡适请假四个月,再次请先生代理院务。

秋,董作宾返台湾,继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十一月,“中研院”院务会议决议,史语所增设甲骨文研究室,聘董作宾主持。

北京的《考古通讯》第十期刊载尹达的文章:《考古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先生本年撰写《由笄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一文。文章从出土骨笄的上端雕刻平顶鸟体的形态分析出有五级的演变,再和出土各级骨笄的小屯遗址的层次及侯家庄墓葬之墓号对比,得出如下的相应联系,认为这确是梦想多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比较材料:

平顶鸟型骨笄分期	小屯遗址		侯家庄墓葬		平顶鸟型演变等级
	遗址及其层次	出土骨笄	墓葬	出土骨笄	
Ⅰ前期	下灰土坑	B2312	大墓以前	无	第一级
Ⅱ早期	乙七版筑遗址	B1284	HPKM:1001	B2281	第二级
Ⅲ中期	丙一版筑遗址	B2408	HPKM:1002	B2295	第三级
Ⅳ晚期	灰土堆积上层	B2186	HPKM:1174	B2293	第四级
Ⅴ后期	地面扰动土层	B1276	无	无	第五级

撰写《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先生在文中明确写道:“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

本年主编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册)。

一九五九年　六十三岁

受聘为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人文组委员。“长发会”补助建筑史语所图书馆。

先生辞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职务,仍任教授。

发表《文化沙漠》一文,对五十年代末台湾的教育文化现状流露出十分不满。文章对留学生不愿回台的原因作了分析,对高等教育的瘫痪也作了解剖。文章认为,除各种客观的理由外,最基本的原因还在于传统文化中没有“纯粹知识”即科学知识的地位。社会重视的是“力量”、“德性”,而对追求知识的人只当作“匠人”看待;他们基本处于最下等(从“天地君亲师”的师到“军公教”的教)。全文调子很悲观。

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十月二十日先生以访问学者身份偕夫人去美国。经西雅图短期逗留,赴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

北京《考古》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某集体署名的文章《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害怕“由此真理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逻辑结论”,“企图用他的谬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文章认为,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他的资产阶级考古学是反动的、反科学的”,必须加以粉碎。

本年先生撰写的文章有:《斝形八类及其纹饰之演变》、*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pecimens of Anyang*。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下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一巨册,并为此写了序言;另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上辑(二)》一巨册。

一九六〇年　六十四岁

春,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学术演讲。

六月,先生应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之邀,分别前去代为设计中国藏品整理研究及陈列计划。

七月,取道芝加哥转赴西雅图,出席七月十至十五日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

八月,偕夫人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香港、澳门等地返台,九月三日抵台北。

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就尹达于一九五九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说:“刘照林(指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因患糖尿症及眼疾,台大的史前史课程改由宋文薰担任。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率代表团参加在台中举行的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的多边会议,并致开会辞。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四届评议员。

十二月,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将傅的藏书八千余册捐赠史语所图书馆;该馆改称“傅斯年图书馆”。

主编出版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

种(上册)。

一九六一年 六十五岁

一月,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改选执委,当选者为胡适、梅贻琦、王世杰、李济等十一人。

一月,先生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谈话对一生的学术活动作了个概述。文中谈到安阳鸟兽骨的发现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夏鼐于一九八一年见到此文时,曾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

六月九日,胡适致信先生,言及文史各科院士之提名"太不成样子",盼先生出面领导提名工作。六月十五日,李济、王世杰、姚从吾、董作宾、凌纯声、劳榦等在胡适寓所共商提名之事。

九月,美国《生活》杂志第五十一卷十三期刊登了大型文章 *Robust Life of the Shang: the Oldest Civilization in the Far East is Revealed in Rich Chinese Treaures*(《殷商的粗犷生活:丰富的中国宝藏揭示了远东最古老的文明》),配有多幅图片,用五个标题介绍殷墟的发掘:(1) 征战的狂热;(2) 罕见的瑰丽青铜器;(3) 可怖的王室葬礼;(4) 君侯的荒淫生活;(5) 保存下来的古文字。文章最后专门介绍了先生发掘殷墟的功绩。

十二月,胡适说要请病假一年,请先生代理院长职务,先生以体病推辞。

本年,先生还为美国柯里尔百科全书撰写了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的条目。

本年主编发表的有:《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下册);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一巨册。

一九六二年 六十六岁

在一月写成的《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里,先生系统说明了编写《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想法,指出这里需要利用七种材料:

---

* 其实,在李济先生写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重要专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请参看先生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 *Anyang*,等等。可能夏鼐已无暇读这些论著了。——编撰者

(1) 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

(2) 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

(3) 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文化遗迹;

(4) 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5) 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

(6) 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

(7) 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

同时并向史学家提出了三点参考意见:

(1) 史学家应充分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2) 应防备冒牌科学,甚至有计划的欺骗,尤应防备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

(3) 中国历史只有放在全人类历史背景上考察才能显现其光辉,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

文中对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作了如下的认定:“它已经到了一种高度的发展……背景……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其来源有一部分……是与两河流域即中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

一月下旬,胡适又两次敦请先生在三月份为他代理院务,都被谢绝。

二月,先生在国际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Reconsidered*(《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回顾了本人自一九二二年作同一题目的报告后,四十年来中国在人体测量学、考古研究、民族学调查和语言研究方面的进展,并对中国人类学的进一步研究提出看法。

二月二十四日在南港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后的酒会上,先生对科学不能生根的问题表示了看法。吴大猷和胡适认为他的想法太悲观。胡适发言后不久,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死去。

先生为悼念胡适写的挽词为三句小诗: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写《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指出胡的一生成就“自有千古”,无需任何纪念标志,他留下的工作成绩就是最好的纪念品。

胡适逝世后,由先生代理院长职务两个月;五月由王世杰继任院长。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上、下),*Chinese People*,《我的记忆中的梅月涵先生》。

本年主编出版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上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中辑(一)》一巨册。

一九六三　六十七岁

撰写并发表《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

撰写《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序》,对梁思永和史语所十位青年考古家的贡献及大墓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作了回顾。

四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五届评议员。

五月,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委托"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国上古史编纂委员会";先生任主任委员,主持上古史编纂工作。为此,拟定了一个"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强调以下几点:

(1) 以文化的形成、演变和民族的成长、教养为重点;

(2) 材料必须是经考证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应尽量利用一切有关资料,尤其是最新资料;

(3) 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看,不宜夹杂地域成见;

(4) 以叙史实为主来组织已成立之研究成果,不是专题专证或史料排比;

(5) 以普通读者为对象,行文深入浅出,不尚艰深;

(6) 每章自成首尾,为独立单元,各章之间须互补配合;编辑部在写作过程或完稿后统一协调;

(7) 批评他人学说时不得人身攻击;

(8) 初稿完成后由编辑部聘专家征询意见,每章至少有专家一人校阅。

赞助经济部参加一九六四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史语所提供展出安阳出土石虎及甲骨等以及中国文字演进图片。

十一月,台北《文星》杂志社以该社名义发表"封面人物介绍"《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文长一万五千字,从各方面分析了先生一生事业上的成就和他面临的种种问题,认为他是今日台湾文化沙漠里数一数二的凿井工程师,是有执照的人,但他却无法凿井,因为:

* 台湾文人李敖后来说,此文是他写的。他并把此文与另两篇文字合成一篇大文章,起名叫《一个学阀的悲剧》,在李济去世后出版。

第一,他无法把老学人、老教授从牌桌上拉下来;这些人不会凿井,或只会把持水源不放。结果是:年轻一代泪眼望李济,李济泪眼望牌桌;

第二,他年纪老了,不再能施展朔方健儿身手,判断力有时也有问题。他是"有道而行"的西化文人,在满是羊肠曲径的中国社会里显然不够成熟;

第三,他的性格狷介,严肃而不可亲,这是基本的不适宜做领导人的缺憾,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的十字街头。

先生本年撰写并发表的文章还有:*Foreword in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by Kwang-chih Chang(《张光直著〈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前言》),《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下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二本·一〇〇一号大墓》一巨册。

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八岁

研究青铜爵形器问题,撰写并发表了《殷商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一文。

四月,"中央研究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合组之科学合作委员会成立,在"中研院"组织联席会议,决定二院分别成立"中方委员会"与"美方委员会"。受聘的十四名中方委员有王世杰、钱思亮、李济、凌鸿勋等。

本年开始出版先生主编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的第一本:李济、万家保合著《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一大册,先生撰写该书之下编:《花纹的比较》。

在这一专刊的发刊词中,先生强调指出,以前的各集中国考古报告集,是以发掘工作为单位,只限于描写每一遗址或墓葬,是一切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这套《新编》则不局限于一个区域或一个时代,也不以田野资料为限,而是根据第一手地下知识对各种古器物本身的历史作系统的陈述。这是一种与传统古器物学大相异趣的科学的古器物学。

先生在为该专刊第一本写的序中,指出了殷代铸铜业技术的改进大部分都反映在装饰的设计与安排上,特别指出了技术与艺术的亲密关系。

为悼念董作宾的逝世,先生口述并发表了名为《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的

一个长篇讲话，从二人结识三十五年来的过程看董作宾一生的学术活动的贡献，对董在晚年由于种种条件所限而未能在中国古文字学上作出更有价值的成绩深表惋惜。

本年还发表了一篇《谈勇于负责》的杂谈。先生指出，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环境不如国外，老一辈诚然有责任；但民族要延续下去，不能在这一代就中断，有才干的青年如果都留在国外，民族的前途指望什么？有两点为中国文化所重视的，一是不自欺，即对自己负责，不能护短，而要服从真理；二是职业的勇气，即择善固执，凡是认为对的就义无反顾。

主编并出版的还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

七月，许倬云发表《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一文，认为先生对知识的追寻锲而不舍，又具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因而构成做学问的最根本先决条件。作者举例说明先生的研究方法合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从小材料着手而追索的问题是全部人类的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境内人类文化的演进。以全人类为背景而无先入之见，寻求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是先生认为的史学家应追求的境界。

曾昭燏在南京去世。

一九六五年　六十九岁

撰写并发表《"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一文，是为《中国上古史·第一册·史前部分》之第二章。

研究并撰写《青铜爵形器的形制、花纹与铭文》一文。

二月，钱思亮、李济等赴美国参加科学合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先生在华盛顿住蒋廷黻处，蒋表示愿为史语所工作尽力协助，惜蒋不久即过世。

《故宫季刊》第一卷一期上发表了先生于一九六一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演讲词：《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青铜器的六个方面》一文。文中提出应对青铜器表现在其本身的四种现象——制造、形制、文饰、铭文，以及推想和流传下来的另两种现象——功能、名称，这六方面的差异和演变，分别加以处理，以明确其相互关系是随时代及地点而有所不同的。文章并提出以形制加以分类的新分类原则。

为庆祝先生七十寿辰，学术界同仁编辑了《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下册)，由清华学报社分别于今明两年出版。

八月，先生受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

九月，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补助史语所建筑考古馆工作室。

十一月，将考古馆陈列室列为第一陈列室，另辟第二陈列室，分别陈列古器物供研

究观摩使用。

本年先生还撰写并发表了《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比较》一文,对东西方旧史学的几点共有的传统,以及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和人类化石的发现对旧传统的冲击,进而到近代考古学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作了概括的介绍和分析。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下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三本·一〇〇二号大墓》一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丙编中辑(二)》一巨册。

一九六六年　七十岁

撰写《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是为《中国上古史·第一册·史前部分》之第三章。

二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六届评议员。

三月,台湾与美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会议规划订立,商定由美方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等三学术团体派九名代表来台,中方由王世杰、李济、张其昀等八名代表另顾问和专家十二人参加。

六月,史语所酌选文物参加旧金山M. H. de Young纪念博物馆的大规模文物展览。

七月,史语所制定《与台大合作指导高级学位研究生的合作办法》草案。

八月,(台湾)与美国科学合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人文及社会科学特别委员会,推定以先生为首的十二人执行委员会。

八月,先生赴旧金山参加亚洲艺术讨论会。

主编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郑州的商代遗址早于安阳殷墟的遗址,就可以断定前者出土的商代器物也必然都早于殷墟的器物。地下现象需要详细的观察、描写及说明,才能得到正确解释。

本年先生撰写并发表《大龟四版的故事》一文,讲述了一九二九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最后一天出土的刻满贞卜文字的四块很大而并不完整的龟版的经历及其历史价值;认为这一发现在甲骨文研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董作宾对它的研究是“头等天份、头等方法与头等材料的结合”。进而谈到作科学考古工作处理新材料的方法,指出既需要有作大胆假设的本领,又不要被丰富的想象力引入歧途、作超乎材料性质以外的推论——即要具备**学术上的自约精神**。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下篇:青铜爵形器的形制花纹与铭文》、《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关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一般问题和建议》、《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高去寻于本年膺选"中央研究院"第六届院士。

一九六七年　七十一岁

研究并整理安阳出土青铜斝形器,并与著录中之斝形器进行比较。

二月,先生应澳洲大学之邀,赴南半球进行学术研究及讲学。

四月上旬,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台湾与美国科学合作第三次联席会议,同行有王世杰、钱思亮、李先闻、许倬云等。

六月,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补助史语所考古馆工作室建筑费。

八月起,石璋如代行考古组主任职务。

八月,先生为《传记文学》撰写《我的初学时代》一文,回顾了青少年时代所受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使自己产生了种种疑问,从而带来许多苦恼,加重向国外求学的热望;副作用则是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想去寻找海外奇方。

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感旧录》一书,其中搜集了先生历年的十六篇自叙、感旧的文字,包括几篇序文和论文。屈万里为之作序,称这些文章虽属记叙性作品,但笔调更为清灵,风格更加隽逸,"实而能华,质而有文",非常人所能企及。

十月,史语所与台湾故宫博物院合作,在台北中山博物院展出侯家庄西北冈一〇〇一号大墓实况。

本年写成并发表的文章还有:为纪念蔡元培百岁诞辰的纪念文章《融汇中西学术的大师》(口述),《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上、下册)。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四本·一〇〇三号大墓》一巨册。

一九六八年　七十二岁

准备并写作《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

* 这一标题特指1940年蔡元培院长逝世以后的中央研究院。——编撰者

撰写《青铜斝形器的形制与花纹》。

一月十六日,先生主持所务会议,议定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迁入广州柏园正式工作日期为史语所的成立日。

春,台东长滨八仙洞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先生即时前去视察。归来后,组织考古、语言、民族、社会各科的科际综合研究计划,并出面向科学委员会申请补助(第一期即有三十万新台币)。其考古工作由宋文薰负责,所发掘的若干大小洞,得先陶文化资料数千件,并在潮音洞先陶文化层下发现更早文化层。先生对此命名为台湾"长滨文化"。据宋文薰研究,这一文化年代距今已超过一万五千年,存续在台湾到距今五千年前。

四月,史语所与台湾故宫博物院合作,在中山博物院展出安阳甲骨十七版。

十月二十二日,先生主持史语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演讲会并作主席报告,对史语所四十年的成绩作了小结,并邀请沈刚伯及赵元任作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史学与世变》、《中文里音节跟体裁的关系》。

撰写《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一文,文中对华北各新石器文化遗址,尤其是对五六十年代大陆考古团体发掘所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研究,作了集中的探讨。

本年撰写并发表的文章还有:《自由的初意》,*Let the East and We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without Pride and Prejudice*,《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序》。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一大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第四十本上。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下辑(一)》一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六本·一二一七号大墓》一巨册。

本年为中研院第一任院长蔡元培先生百岁诞辰纪念。

一九六九年　七十三岁

发表《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一文,先生在文中指出,安阳历次发掘所积累资料的最大价值就是:

(1) 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

(2) 将中国古史与史前史的资料联系起来;

(3) 对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丰富具体的说明;

(4) 证明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承袭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同传

统,表现出综合创造的能力。

研究青铜鼎形器并撰写《青铜鼎形器的形制与花纹》一文。

三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七届评议员。

六月下旬在台北参加台湾与美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第三次联席会议。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先生撰写了标题为《考古琐谈》的一系列短文,刊登在台北《自由谈》杂志上;其中(一)至(六)篇发表于一九六八年,(七)、(八)两篇发表于本年。这一系列文章带有普及科学知识的性质,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现代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斝的形制及其原始》,《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Pa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第四十本下、第四十一本第一至四分。*

陈寅恪在广州去世。

一九七〇年　七十四岁

完成《青铜鼎形器的形制与花纹》一文。为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一书写序言,序中特别提到用块范的拼凑试验殷代铸铜技术取得的成功。对殷代青铜鼎形器复原的实验,可以为认识当时冶金技术取得好的开端。

三月,为悼念陈寅恪去世,先生主持史语所同仁的纪念会,邀请俞大维作《怀念陈寅恪先生》的长篇演讲。

四月,王世杰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五月,由钱思亮继任院长。

萌芽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圈外》一书,内中选收了先生已发表的有关考古学、人类学和上古史的论文、评介共十三篇。

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先生的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明的开始》(万家保译)。

本年撰写并发表的文章还有:《试谈治学方法》,*The Tuan Fang Altar Set Reexamined*。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一大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一至二分。

---

* 自本年度第四十一本开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恢复了原来的每本分开为四个分本的作法。——编撰者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五本·一〇〇四号大墓》一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北组墓葬》上、下两巨册。

一九七一年　七十五岁

开始撰写《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文饰之分析简述及概论》一文。

八至九月,先生率团参加第十二届太平洋科学协会(PSA)大会。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吴相湘主撰的《民国百人传》。该书第四册刊载《李济领导考古发掘》一文,扼要介绍了先生半个世纪的主要学术贡献,称他为"中国现代学人中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及远古文化的先驱";文章说,由于先生的工作成绩,"现代考古学与人类学……在中国奠定基础。"

本年先生撰写《科学运动的现阶段及其展望》一文,专门谈到用欧洲文字写科学论文的趋势和用科学的汉文翻译外国科学论文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下几点应注意的事实:

(1) 文字只是符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并非先天的神秘的东西,人们可以决定它的涵义;其定义一经公认,它的功能就具备了;

(2) 中国文字是形、声、意三方面的综合创造,经过种种演变到现在,比西方拼音文字复杂得多,但在使用上各有短长;

(3) 我们祖先创造的世界最优美的文章和纯美学,固然出于民族的气质禀赋,但中国古代作为思想工具的文字实起很大作用,汉唐的作品表现尤为辉煌;

(4) 宋代以来的说理文章,却以语体文为最方便,如《朱子语录》即为一例。白话文运动以来,证明语体文也可以产生艺术作品;但事实表明其最要紧用途为表达科学思想,写科学报告;

(5) 日益发展的新学问、新概念,需要新符号,可以采用铸造新字、借用他国已有的专门名词、死字活用、利用方言词汇等办法。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中华民国所颁发的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本年主编出版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三至四分;第四十三本第一至四分。

一九七二年　七十六岁

《中国上古史》的第一本《史前部分》(待定稿)于本年出版,全书共分十三章。书前

登载了编辑部写的“缘起和过程”以及先生拟定的“编辑大旨”(已见本文一九六三年记载)。正文中由先生撰写的除第二、三章(已见本文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记载)外,又有本年所写的第十三章《踏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其余还有张光直写的九章和阮维周写的一章。全书各章的审阅人分别由高去寻、李济、张光直担任。

一月,撰写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的序言。

四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八届评议员。

七月,因病由高去寻代理考古组主任职(直至一九七九年李济先生去世)。

十二月,任期届满,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务。

年底,批准退休,受“终身研究员”待遇。

本年主编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一大册。

本年主编出版的还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四本第一至四分。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下辑(二)》一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中组墓葬》一巨册。

* * *

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二年的十七年所长任内,先生除自己的研究写作工作以及所担负的各种学术活动和职务外,对建设史语所本身的贡献,还有以下数端:*

(1)建筑考古馆、傅斯年图书馆,使运台标本图书全部开箱,同仁得以安心开展研究;

(2) 于建所以来传统的四大组(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外,新设立甲骨文研究室、明清档案室、人类体骨研究室;

(3) 为配合研究工作,更设立殷周铜器实验室(金相学实验室)、语音室、照相室、裱褙室等附属机构;

(4) 奠立各组、室之研究基础,成为“中央研究院”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资料最丰、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所。

一九七三年　七十七岁

为撰写《中国上古史稿》(殷商部分)作准备。

屈万里继任史语所所长。

---

* 参看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见《拓垦者的画像》,1975年台北版。——编撰者

夏,日本考古家国分直一教授(即后来《安阳》一书的日文版译者)造访,先生向国分表示,“在我闭上眼以前还要写一本书”。据国分回忆,先生还提到,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考古,这本书要在美国出英文本,也要出日译本,但不必出中文本。

十月,先生不慎跌伤腿部,因糖尿症不能手术,采用保护性治疗。

本年,仍继续主编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至二分。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南组墓群》一巨册。

一九七四年　七十八岁

准备中国上古史稿(殷商部分)的撰写工作。

次子李光周(考古学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上发表《再看鹅銮鼻——台湾南端的史前遗址》一文,是把美国式“新考古学”介绍到台湾的第一炮。张光直说,“新考古学的一个重点特点,是使用社会科学或生物学里面的某些一般理论来发引出关于史前时代或古代社会中的某种一般性的法则,然后由这条法则推引出来若干实验原则,再到实际考古资料里面去寻求这些原则的实证或反证,最后用这道手续来证明或反证最初提出来的法则……”(张光直:《台湾新考古学的播种者——忆李光周先生》)。

本年先生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撰写 *An-yang* 的条目。

本年,仍继续主编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至四分(自第四十六本起,先生不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主任)。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七本·一五〇〇号大墓》一巨册。

七月,张光直膺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院士。

一九七五年　七十九岁

继续中国上古史稿(殷商部分)的撰稿工作。

准备对古器物研究专刊五大册的总结。

为撰写 *Anyang*(《安阳》)一书。

四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九届聘任评议员。

四月十四日,参加纪念古人类学家德日进神甫的会议,作学术演讲半小时。

石璋如发表《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长篇文章,庆贺先生八十寿辰。文章共分简历、领导的考古团体、田野发掘的方法、室内研究、主编刊物、重要著作目录六大部分,约二万五千字。

先生本年撰写并发表了《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一文。

十一月,夫人李陈启华女士在台北病逝。

一九七六年　八十岁

本年,先生写成对五本古器物研究专刊的总结文字:《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对青铜器研究作了几点概括性的论断:

(1) 中国青铜时代所制大体以兵器居多,实用礼器较晚;

(2) 制造青铜日用品为有权阶级之专利,这大约在黑陶文化开始以后,此时平底容器已渐为圈足器代替;

(3) 骨刻及木雕艺术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某一区域盛行,这是青铜装饰艺术的一大来源;

(4) 殷商已是中国青铜器时代中期,青铜制之日用品已有一段长期历史,冶铸的技术方法已经很高。

继续撰写 *Anyang*(《安阳》)一书。

继续中国上古史稿的撰写工作,写成并发表"殷商篇"第十二章的未定稿:《殷墟出土的工业成绩——三例》,从土木工程、制陶业和石器业的角度论述殷墟发掘的成果。

任总编辑出版的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一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八本·一五五〇号大墓》一巨册。

一九七七年　八十一岁

四月十五日,发表了先生《对美国文化的几点认识》的专题演讲。演讲从人类学的观点,对美国文化的优劣提出了四点看法:(1) 从英国人移民开始传下来的守法与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2) 教育早期的发展从实用科学着手,形成今日各种领先世界的技术;(3) 热心福利,企业界肯于花钱用到兴办福利、教育事业,以上三点为正面的;还有(4)种族偏见和歧视,为负面的。

费正清夫人慰梅两次访问先生,对他的生平做了采访笔记。费慰梅后来跟别人谈及,

先生曾表示:他一生有两位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位是夏鼐,一位是张光直。

七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下两册。全书十六开本精装,共收中文论文二十九篇,英文论文七篇,共计一〇三二页,约合五十五万字。

Anyang(《安阳》)一书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九月,先生为日文版《安阳发掘》一书(即 *Anyang* 的英文打字稿的日译本)作序,序中简述了安阳发掘的缘起,论说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工作上的革命变革的成就,以及安阳出土的大量"无言"材料对弄清古代文化的重要性。

十二月十七日,为纪念胡适诞辰,先生以胡适讲座教授名义作学术演讲《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近两万字)。此文对安阳发掘以来殷文化方面的一些重大发现作了总结性的概述,从"物质遗存"、"精神文化"、"特殊文化成分"(如祖先崇拜和战争)、"体质"等方面加以论列;并强调自己所讲全是本着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行事,每一件都有实物的证据。

一九七八年　八十二岁

元月,写信给张光直,认为张是最有能力评议 *Anyang* 一书的人。先生要求张"直说"出他对这本著作的印象。张光直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对李济著〈安阳〉一书的评介》,认为由于本书作者是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创始者和中国考古学的元老,所以他作为安阳发掘领导者本人所作的对这一发掘的总结性回顾,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张对这本书的优缺点作了坦率的评述。

四月,先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十届聘任评议员。

六月九日,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先生作题为《中央研究院五十年》之报告。

七月,在"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一次评议会上先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咨议委员会委员。

屈万里于七月在台北逝世。高去寻继任史语所所长。

本年先生撰写并发表了《六十年前的清华》这篇纪念文字,刊登在新竹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新六十三期(校庆专号)上。

写信致费慰梅,感谢对他的生平所作的口述笔记。信中谈到自己在八十岁以后所感到的"岁月的重担",谈到由于一些"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的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对身体条件还能否完全适应自己的心智活动产生了怀疑。

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本年，石璋如膺选“中央研究院”第十二届院士。

一九七九年　八十三岁

准备撰写有关上古史的文字。

五月上旬，先生在对尹建中谈话时，批评了现在学术刊物缺乏详细的资料描述，多为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先生说：“理论并非一蹴可及，基础资料不稳的理论会造成失误。所谓理论必须经过千锤百炼……”

六月二十七日，先生又对尹建中说：“人的一生很短暂，无法兼顾太多；与其求广博，不如求其精到，……长期定心致力某一范围的研究是很必要的。”

七月十四日，先生对宋文薰说，自己正计划写一本关于考古的书，又说：“最后一本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

七月十四日，先生与从美国来访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专门谈论中国古琴（七弦琴）的发展和自己早年习琴的体会，并回答了她的提问。

七月十五日，先生致函许倬云说：“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

八月一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三十周年。

八月一日（农历闰六月初九日）晨九时三十分，先生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市温州街寓所逝世。

*　　*　　*

本年发表了先生口述的《从清华学堂到哈佛大学——我的学习过程》，由彭碧玉笔记，刊载于《杏林春暖》文集（华欣文化事业中心版）。

夏鼐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认为蔡元培院长在一九二八年任命先生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选择是明智的”；但文中还未点出先生姓名。

许倬云在本年发表的《悼念济之师》一文中说：“有两件他想做完而终于未能办完的事，一件是他负责的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事……另一桩事是中国上古史论文集的计划。这一工作现在终于完成，比原定时间表慢了九年……济老原拟自己整个复审一遍，再做一篇长序……这篇未完成的序文，将是中国古史研究园地中永难弥补的长恨……”

张光直在一篇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后记

我为先父撰写的这部《李济先生学行纪略》,原拟写成为一份年谱;在撰写过程中,由于材料的不断积累,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即将收笔之际,回过头来再看一看,用“年谱”的叫法未必相称,遂改为今名。

关于先父一生的著述,这部《纪略》只能对一些重要篇章作扼要的介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纪略》中所提到的论著,多篇已由张光直先生和我合编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版)收入。二〇〇〇年光直兄和我着手编辑的《李济文集》历经七年,现已定在二〇〇六年纪念李先生一百一十岁冥诞时问世,读者将有机会领略李先生遗作的全貌。深感遗憾的是,张先生在病重时签字肯定了《文集》的编辑方案和体例后,没有几天,竟然撒手西去。他最后承担的为老师遗作尽力的工程,只能留给我们这些后人了。

说实在的,除了编“文集”或“全集”外,要给一位科学家一人文学者写一篇准确的行述也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编写这篇《纪略》的进程并不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只要把可靠的材料排列起来,做一些选择和文字加工,排除不同材料相互间的矛盾,就可以顺理成章了。我虽然作了不小的努力,而且也尽可能想突出先生的学术业绩和他对中国考古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但我毕竟对这方面的学术是个外行。而我也真体会到,外行人要做好这些是很难的,就连挑选资料、摘引学术观点这样的“技术”工作也不能说是足堪胜任的。在这项工作中只能说我是“尽了心”,只能说做到了要求写出的东西尽量“求实”,但不敢说产品就够格了。

原先的《纪略》初稿是一九九四年写成,为先父百岁冥诞献礼而印成的;因为是非卖品,原来的“后记”就写得长了一些,而且为了及早印出,甚至在去纽约做客的行旅中赶写完成的。

一晃十年又过去了。这期间我对原稿作了多次改动,今年为纪念先父一百一十岁冥诞又认真修订、整理了一下,打算重印一次。虽然希望能正式出版,但仍想用非卖品的形式广为赠送给学术界同仁和亲友。

十年来的变化可是真不小,原先为初稿帮过大忙的前辈和亲友已有多人陆续走上了不归路,这里我首先要提到的就有杨石先、袁复礼、劳榦、石璋如、高去寻、贾兰坡、胡厚宣、张政烺、张光直、费慰梅诸位先生,他们为这本《纪略》尽过的宝贵力量是长久难忘的。另外,在先父生前和身后,已有多位考古人类学界和博物馆界、历史学界的前辈及友人,如徐炳昶、徐森玉、徐中舒、裴文中、郑振铎、夏鼐、尹达、郭宝钧、苏秉琦、曾昭燏、李霖灿、王天木、赵青芳、马承源、邹衡等先生,先后告别了人世,他们都是应该铭记的。至于对《纪略》中已多次提到的各位先辈,以及对关心此事的大陆、台湾和海外的众位朋友的感谢,就不一一表述了。

读者若能从这篇《纪略》中了解到李济先生的学术贡献的概貌,了解到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的概貌,也就足以使编撰者感到很大的欣慰。

本稿得以成编,要特别感谢我妻宋梅凤和小女李宁的全力协助;外孙北辰也在定稿的技术处理上尽了不小的力,他对这位"太公公"的怀念和崇敬,也是应该在此书识的。

本文虽几经修订,仍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指教。

李光谟

初稿写于 1995 年

改定于 2006 年元月　北京